天安門之爭──六四的關鍵內情

封從德

1998 年 6 月

天安門之爭----六四的關鍵內情

封面
【以上第-1 頁】

版權頁

封從德著《天安門之爭》，明鏡出版社，1998.
http://www.mirrorbooks.com/C11.htm
Tiananmen Memoir
By
Feng Congde

Chief Coordinator
Ho Pin

USA.Office: P.O.Box 366, Carle Place, NY l.1514-0366, U.S.A
TEL:(516)338-6976 FAX:(516)338-6982
http://www.mirrorbooks.con/
E-mail: mirrorbo@mirrorbooks.com

Internatlional Standard Book No.1-896745-68-7

【以上第 0 頁】

目錄

照片

【以上第 4 頁】

○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人們自發匯聚到其寓所悼念。
○ 四月十六日以後，人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演講、朗誦和張帖詩抄… …【以上第 5 頁】

○ 四月十八日，北大三角地貼出去天安門聲援靜坐同學的「建議」
○ 四月十八日，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以上第 6 頁】

○ 四月二十一日晚，十萬北京大學生首度聯合遊行去天安門，悼胡並抗議軍警動武。
○ 四月二十二日，佔領廣場的首都大學生參加悼胡，然後提出「請願七條」。【以上第 7 頁】

○ 五四。廣場集會遊行。
○ 五月十三日下午，絕食隊伍接近北師大。李祿騎車和柴玲、熊焱等同學一道。【以上第 8 頁】

○ 連夜趕製的「絕食」黑旗在五月十四日上午昇起。
○ 絕食同學在天安門廣場讀《人權宣言》。五月十四日。
○ 五月十五日凌晨。絕食同學聽從吾爾開希東移，為戈爾巴喬夫騰出地方

獻花。【以上第 9 頁】

〇 生命線。絕食暈倒的同學六千餘人次從這個通道送去首都各家醫院。五月十七日。

〇 五月二十日戒嚴後，北京市「全民截兵」。

〇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天安門城樓毛像被污，頓時天昏地暗。隨即換上新的毛像。【以上第 10 頁】

〇 廣場後期的凌亂景象。（五月二十三日以後）

〇 五月二十九日起，紀念碑上貼出「每日財務通報」。財務制度也貼在上面。

〇 六月二日「四君子」絕食。【以上第 11 頁】

〇 六二絕食吸引大批群眾。從紀念碑望天安門。「民主女神」像。

〇 六月三日，同學們將收繳的軍械放到新華門前，大部份則已送交附近公安局。

〇 六月三日截獲的「軍火」。【以上第 12 頁】

序一

一

有一段時間，很想放下「六四」，從心底放下。這段時間持續了大約五年。然後，我被驚醒，被《天安門》所警醒。於是明白，只能直面，不能放下；心裡可以放下，手中不能放下。

本書記載的，即是放下前的反思和醒來後的掙扎。天安門之爭，就是這些掙扎。

二

醒來之前，曾有五年夢尋。

尋夢，是找回自我，還是戰勝自我？一場大悲劇的倖存者，不能不捫心自疑。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敵人，這句老話也向我印證。自我中心、好高騖遠卻又優柔寡 斷，夜的清輝映出晝的幽暗。我被自己所擊倒，開始暗中尋覓。五年間遇到六種宗教，卻一直很困惑：天安門風雲的背後，一個主宰的【以上第 13 頁】意 志究竟存在與否？那崇高的，和那卑怯的，一道混跡於轟轟烈烈之中，又轉瞬即逝，莫非是在演繹色空？內在的善性與惡習到底有沒有一個形上的來源？善性戰勝惡 習的根據又在哪裡？如果有一個上帝，竟允許悲劇的發生，那非全善；若未允許而悲劇依然發生，則非全能。這個千古公案，困倒了多少一神教的經師，自然不會對 我揭謎。於是夢回東方，繼續長夜獨行。這邊星光燦爛，卻又眼花繚亂。答案反倒簡單：某顆災星降禍天外，要不就是宿世因緣。我的慧根必定淺

淺，既照不見前世，也無法瞭悟劊子手何以逍遙。心靈之旅告一段落，於是開始了時間長河中的溯洄。終於似乎找到了參照系，要在經史中知止而定，好安頓自己，放下過去。

尋夢，是找回自我，還是戰勝自我？一場大悲劇的倖存者，不能不捫心自疑。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敵人，這句老話也向我印證。自我中心、好高騖遠卻又優柔寡斷，夜的清輝映出晝的幽暗。我被自己所擊倒，開始暗中尋覓。五年間遇到六種宗教，卻一直很困惑：天安門風雲的背後，一個主宰的【以上第 13 頁】意志究竟存在與否？那崇高的，和那卑怯的，一道混跡於轟轟烈烈之中，又轉瞬即逝，莫非是在演繹色空？內在的善性與惡習到底有沒有一個形上的來源？善性戰勝惡習的根據又在哪裡？如果有一個上帝，竟允許悲劇的發生，那非全善；若未允許而悲劇依然發生，則非全能。這個千古公案，困倒了多少一神教的經師，自然不會對我揭謎。於是夢回東方，繼續長夜獨行。這邊星光燦爛，卻又眼花繚亂。答案反倒簡單：某顆災星降禍天外，要不就是宿世因緣。我的慧根必定浮淺，既照不見前世，也無法瞭悟劊子手何以逍遙。心靈之旅告一段落，於是開始了時間長河中的溯洄。終於似乎找到了參照系，要在經史中知止而定，好安頓自己，放下過去。

就在這時，我被驚醒。於是，在這番自我掙扎之後，又有四重掙扎。

三

影片《天安門》的蒙太奇，再加某些記者和「民運理論家」的編排處理，人們憤怒了：「女神」原來是騙子，柴玲「讓別人流血，而自己逃生」！造神與找替罪羊，本無二致：將幻望投射出去，定格於某人身上，然後拍拍手，萬事大吉。這樣的人，不配主宰自己的命運。

此片有人解為「兩個女人的戰爭」，我不以為然，作者沒有這麼偏狹。影片中我也出現，採訪是在九零年七月，波士頓，卡瑪家裡。我還記得那個炎熱的夏日，卡瑪夫婦汗流浹背地張羅器材。到了九五年五月，卡瑪還透過國際長途與我有數次探討。我也不相信甚麼「親共背景」，實際上影片的【以上第 14 頁】幾位中國問題顧問也被中共視為「反華份子」。但是，該片也確實反映出美國的中國研究重骨架輕材料的傾向，我後來的批評都是針對一些預設框架及材料不確有違史實之處。但這並不減我對他們的欽佩，有關六四的紀錄片中，這確實是取材最為全面、剖析最為透徹的一部。在我幾篇批評文章發表之後，卡瑪並未暴跳

如雷，文章 寄給他們也未見回應。嘆服其冷靜之餘，也不無遺憾：我多麼希望能開誠布公地辯論，以找到問題的癥結，好總結教訓鑒示未來。

此片有人解為「兩個女 人的戰爭」，我不以為然，作者沒有這麼偏狹。影片中我也出現，採訪是在九零年七月，波士頓，卡瑪家裡。我還記得那個炎熱的夏日，卡瑪夫婦汗流浹背地張羅器 材。到了九五年五月，卡瑪還透過國際長途與我有數次探討。我也不相信甚麼「親共背景」，實際上影片的【以上第 14 頁】幾位中國問題顧問也被 中共視為「反華份子」。但是，該片也確實反映出美國的中國研究重骨架輕材料的傾向，我後來的批評都是針對一些預設框架及材料不確有違史實之處。但這並不減 我對他們的欽佩，有關六四的紀錄片中，這確實是取材最為全面、剖析最為透徹的一部。在我幾篇批評文章發表之後，卡瑪並未暴跳如雷，文章寄給他們也未見回 應。嘆服其冷靜之餘，也不無遺憾：我多麼希望能開誠布公地辯論，以找到問題的癥結，好總結教訓鑒示未來。

所敬佩與所批評的，是同一對象。這是第二重掙扎。

四

眾所周知，我對柴玲也不會沒有看法。但我的文章基本上是同情與維護，因為從流血那一刻起，她就注定成了替罪羊。她太天真，太輕信，也太不懂得政治的險 惡。一個天真輕信而又不知政治險惡的女子卻偏偏穿上了紅舞鞋，要在政治漩渦中旋轉不止，還有甚麼比這更無明？我的看法在此，我的同情與維護也在此，尤其是 在她被媒體構陷的時候。不錯，她曾在台上，但是，我敢說，她何曾留心過台詞。當編撰台詞的人們要送她上祭壇的時候，我就不能緘默良知，要為歷史留個公正。 沒錯，我不自量力。我也不知量力。

柴玲確曾被人當作「女神」。我自然沒有這份悟性。遠望與近觀本來就不一樣。但我也曾因她而感動，聽她唸《絕食書》時，同許多人一樣，也都流過淚。這位在日常生活中那麼平凡的女子，卻【以上第 15 頁】在 運動中得到了升華，成為強權面前不屈精神的一個化身。我所維護的，是這個柴玲，升華的，運動中的。那是個主觀精神，已隨運動結束而結束，更無法借客觀所謂 理性而還魂。二者如火之於冰，柴玲之拒絕卡瑪的採訪，在人或是「戰爭」，在我卻是相抗的兩種精神。為此，我深深感到遺憾。

柴玲確曾被人當作「女神」。我自然沒有這份悟性。遠望與近觀本來就不一樣。但我也曾因她而感動，聽她唸《絕食書》時，同許多人一樣，也都流過淚。

這位在日常生活中那麼平凡的女子，卻【以上第 15 頁】在 運動中得到了升華，

成為強權面前不屈精神的一個化身。我所維護的，是這個柴玲，升華的，運動中的。那是個主觀精神，已隨運動結束而結束，更無法借客觀所謂 理性而還魂。二者如火之於冰，柴玲之拒絕卡瑪的採訪，在人或是「戰爭」，在我卻是相抗的兩種精神。為此，我深深感到遺憾。

所維護的與所遺憾的，是同一個人。這是第三重掙扎。

五

難。披露過去，就不能不觸及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責求真實，又難免給友情帶來陰影；然而，一味顧及友情，對真相知而不言或欲言又止，則將愧對歷史、愧對 死難者和千千萬萬曾經參與運動的人。我的折中，本來是先留個備忘，在歷史背景中和盤托出。三十萬字完稿後，九一年夏又在巴黎會議上與各當事人核對。因夠不 上出版社的商業眼光，我的備忘中途擱淺；幸得留德學人鼎力相助，巴黎會議記錄印了三百本。我如釋重負，欲再放下六四，繼續長夜之行。

然而，《天安門》的警鐘敲響，柴玲身臨危難。我於是找到那位戰友，準備一道澄清，一道承擔。這時我才發現，他是那麼惶恐，與當年的俠義勇猛已判若兩人。 一步不能讓，他說，否則不光斷送政治生命，以後還有斷頭台。聞言驚心，當年中共寡頭不是也說：再退，就是全綫崩潰。悵然之餘，更加相信政治對人的異化。 「戰友」看著同伴在前面擋箭，卻不敢承擔自己理應承擔的責任。而在報端卻有這樣的答問：當年嗎，誰也不代表誰。這樣輕描淡寫，是友情的幻

滅，還是本來即 空？無論如【以上第 16 頁】何，我卻得到了解脫—在史實與友情之間，我曾那麼徘徊。但心還是隱隱作痛，我知道失去了甚麼，我為此而深深悲哀。

然而，《天安門》的警鐘 敲響，柴玲身臨危難。我於是找到那位戰友，準備一道澄清，一道承擔。這時我才發現，他是那麼惶恐，與當年的俠義勇猛已判若兩人。一步不能讓，他說，否則不 光斷送政治生命，以後還有斷頭台。聞言驚心，當年中共寡頭不是也說：再退，就是全綫崩潰。悵然之餘，更加相信政治對人的異化。「戰友」看著同伴在前面擋 箭，卻不敢承擔自己理應承擔的責任。而在報端卻有這樣的答問：當年嗎，誰也不代表誰。這樣輕描淡寫，是友情的幻

滅，還是本來即空？無論如【以上第 16 頁】何，我卻得到了解脫－－在史實與

友情之間，我曾那麼徘徊。但心還是隱隱作痛，我知道失去了甚麼，我為此而深深悲哀。

真實與友情之間的抉擇，這是第四重掙扎。好在我已無須抉擇。

六

我的悲哀還另有來源，說來也是自家人，被人冠以「民運理論家」的，而我呢，也被恭維，稱作「民運人士」。理論家曾獻過一策，曰「見壞就上」，在戒嚴次 日。此前他說，絕食學生太溫和，五四還燒趙家樓呢。六四凌晨同學們撤出廣場，他也生氣，說有違其理論。但是不久氣候變化，理論家也就成了「見好就收」的捍 衛者，讓人越聽越納悶：天晴賣矛，天陰鬻盾，還都無敵天下。於是我質疑：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這位曾以在國內發表《論言論自由》聞名的理論家就現出 原形，遂欲乾脆要封住我的嘴－－結果其「民運刊物」成了一「家」之言，而我的八篇文章則被相繼壓制，掩耳盜鈴也算有術。反正，他又有理論，這也夠不上壓制 言論自由。承蒙啟發，八篇「壓卷之作」便從本書終於找回了言論自由。

「民運人士」對峙「民運理論家」，這是第五重掙扎。

七【以上第 17 頁】

本書就是這五重掙扎的印記。第一章「為柴玲辯護」，收有針對影片《天安門》及其報導的五篇文章，及有關「逃亡費」和 《絕食書》兩篇。第二章「廣場備忘錄」，主要取自九一年初的備忘錄，記載廣場上的撤留大事。尤其是五二六至五二八那篇，在九五年因為「戰友」的強烈反對而 推遲發表。另加三篇澄清與分析，材料則主要根據九一年夏的巴黎會議記錄《回顧與反思》。分析「自焚」的一篇完稿於最近，作為對我曾參加過的指揮部的反思。 第三章質疑理論家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並對其《回應》作回應。幾篇文章都被其「民運刊物」所壓制，別章也有被壓的，詳見各文按語。第四章「反思中的 困惑」則匯集了幾年的多番剖析與沉思。同名的首篇文章，作於三十萬言備忘錄收筆之時，至今仍是我整體反思的大綱。最後第五章附錄，收入五篇相關文章，尤其 是《柴玲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錄像談話校對稿》是迄今首次出版的全文，為了昭示柴玲錄像被逐步扭曲的過程，我保留了校對清樣。此外，《辭職書》寫就於八 九年五月六日，幼稚中可鑒當時

的心跡。【以上第 18 頁】

為了歷史的見證(代序二)

(作者按：本書簡稱「會」的《回顧與反思》一書，是本書最重要的參考資料。九三年五月出版前我曾撰文介紹，又有一點當時的心情寫照，姑作序二。)

花開花落又一年。幾乎同時，兩位舊友，有消息來。《中國之春》新任主編張伯笠要我寫一篇紀念六四的文章，介紹自己在八九民運期間的活動和流亡生活；正犯 難之際，德國「萊茵筆會」前任社長石川傳來一個好消息：《回顧與反思－－八九學運歷史回顧研討會》一書即將出版，並囑我寫文章介紹一下。

兩年前在巴黎法蘭西學院召開的這次研討會，有十七位流亡同學參加，歷時八天。該書即由會議錄音整理而成，共近四十萬字，除了文字潤色及個別內容因涉及國 內同仁的安全等敏感問題，由發言人自己對整理清樣作了少量刪減或模糊處理以外，基本保持會議上的發言原樣。由於這十七位同學幾乎涵蓋八九北京學運的全部重 要的學運組織及其中的最重要角色，又經大家當面核對，故此書記載的八九學運的組織與決策過程，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尤其會上透露的大量第一手資料，許多第一 次向外界公開，很多事實，連與會者也是第一次了解到。故此書的史料價值，自不必言。【以上第 19 頁】

不過，與會同學還是希望 研究者充分注意此會的局限性。首先，討論範圍有限。會議重點在北京學運；八天時間仍嫌不足，因此並未擴展到全國民運層面。只涉及到部分外地學運及社會各階 層與北京學運之關係。其次，參加人數有限，比如當時王丹等人還在國內獄中，吾爾開希與項小吉均未與會。故此書勿宁說只作了第一步，擬出了框架，當中諸多史 實尚待填空。另外，限於與會者在運動期間的個人視野、兩年後回憶的準確度及主觀性，必然有許多矛盾乃至不實之處，會上發現的皆當場糾正或留下「不同版 本」，其餘有待史家甄別。

研討會由巴黎「中國民主之家」主辦，錄音整理出版等有巴黎「華人之聲」、德國萊茵筆會及亞琛八九學社共同參與。全書近四十萬字。

至於我在運動期間的行為，好在有這本書，就不必再說甚麼了。關於流亡生活，多謝讀者關心，不過三言兩語怕是說不清。簡單說來，這三年勉強做成的，就數這 本書的聯絡工作，其餘時間都是讀書。書有兩本，一本是文字記載的人類經驗與歷史，一本是社會中活生生的人和事。因緣時會，感謝上蒼，似乎這幾年讓我讀夠了 人生之豐富與無常。從狹隘的「科學」轉入浩渺的人文，從無知的「無神論」轉入畏天順命的各色宗教，又從這些宗教的框限中蛻脫出來，不再迷惑於它們五彩的外 衣，而直接進入心靈的證悟。幾年的人生經歷算不得甚麼，但這幾年理性與感性的經驗都告訴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個東西的存在。彌漫宇宙之中又超乎萬物之上之 「道」，它無形無相，卻是生命之本源與歸屬，也是物質宇宙及人類社會之基礎與律法。(寫於一九九三年五月)【以上第 20 頁】

第一輯：為柴玲辯護

【以上第 21 頁】

有感於《天安門》一片的報導

如果一個人說了一個小時的話，我們只抽取其中的一兩句巧妙地編排一下，便很容易扭曲其原意，乃至完全反轉。最近有關柴玲當年的一段錄像談話的報導，便可說明一個昭然的事實可以被歪曲到何種程度。

基本的事實是：

一、柴玲絕沒有「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相反，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屠城開始，直至六四凌晨，柴玲和指揮部的成員，一步都沒有離開過廣場。清晨五點 過，集中在紀念碑的數千同學撤出廣場時，柴玲帶着指揮部全体成員走在第一排，上到長安街時，坦克從隊伍後尾衝來，當場壓死壓傷十二位同學，如果坦克是衝隊 首輾來，柴玲和其他人便不堪設想。然而上蒼自有安排。

二、說「柴玲談話的這段錄影從前未公佈」或只是「部分被用過」，也未符事實。這段講話的全文，可以在「天安門一九八九」一書中找到，第二六四至二六九 頁。該書由台灣聯經出版，時間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初，距六四僅兩個月。知名學者普林斯頓教授余英時先生為該書作序，是當時【以上第 22 頁】有關六四較普遍而權威的資料。該文是由錄像轉抄的，說明全文早已公佈過(其實亦非全文，參見「柴玲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八日錄影談話」全文。—作者九八年註。）

二、說「柴玲談話的這段 錄影從前未公佈」或只是「部分被用過」，也未符事實。這段講話的全文，可以在「天安門一九八九」一書中找到，第二六四至二六九頁。該書由台灣聯經出版，時 間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初，距六四僅兩個月。知名學者普林斯頓教授余英時先生為該書作序，是當時【以上第22 頁】有關六四較普遍而權威的資料。該文是由錄像轉抄的，說明全文早已公佈過(其實亦非全文，參見「柴玲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八日錄影談話」全文。－－作者九八年註。）

三、先不管柴玲這一個多小時的內容如何，她第一句話就是「我想，這是我最後的幾句話了。」中間又叮囑「這些話先不要披露」，完全是以留下遺言的心情說出肺腑之言。

四、再看內容。柴玲要求「不要披露」的那些話，我認為她有資格那麼說，

她沒有在任何情況下臨陣脫逃，又以如此之坦誠說出了自己的心情和不甘，正顯出她是能戰勝自我的強者。真的勇士，不是沒有畏懼，而是能夠戰勝畏懼的人，柴玲的行為證明了她是勇者。

五、然而，如果將她的這些話編排起來，成為如報導的那個樣子，那麼，給人的印象完全可以反過來－－「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這是對柴玲的中傷。具体內容，還是留待讀者看完全文，自作評價。

六、為何柴玲想離開廣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作完這次談話之後，她找到我說要去南方發動「聯省自治」，以便更好地配合北京的運動，我以為此舉與學生「不 參與黨派之爭」,「不政治化」之基本原則有所偏離，廣場上也脫不開身，即行勸止。當晚，她在「營地聯席會議」上辭職。是在如此情況下作這番談話的，其實一 出廣場，比在學生堆中的危險大得多，柴玲說她「不在廣場上堅持下去」，哪裡是「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此即其談話帶「遺言」性質的因由。

七、那麼，她說「我和大家不一樣，我是上黑名單的人，對政府這樣的殘害，我不甘心，我要求生」，又是怎麼回事呢？第一，這句話在原文中，是在「期待流血」那些話之後半個小時【以上第 23 頁】說 的，二者本連不上，記者硬是將其緊接在一起，混淆視聽，自然達到歪曲的效果。第二，如果讀原來的全文就知道中間柴玲講了許多感人的話。她也是人，為何不可 以期望自己也有一個安宁的生活？「因為她是總指揮」？—正是因為她是總指揮，她說自己與別人不同就很坦白，一般沒上黑名單的人，法不治眾，上了黑名單的 人，不是應該特別注意安全嗎？第三，要明白，五月二十八日，還沒有六四屠殺，誰也沒料到會有這麼慘烈的結局，當時最有危險的，不就是這些上了黑名單的人 嗎？大家不要用六四屠殺之後的眼光看之前的事。而報導的效果恰好利用了這一時間差，而令讀者不自覺。

七、那麼，她說「我和大家不一樣，我是上黑名單的人，對政府這樣的殘害，我不甘心，我要求生」，又是怎麼回事呢？第一，這句話在原文中，是在「期待流血」那些話之後半個小時【以上第 23 頁】說 的，二者本連不上，記者硬是將其緊接在一起，混淆視聽，自然達到歪曲的效果。第二，如果讀原來的全文就知道中間柴玲講了許多感人的話。她也是人，為何不可 以期望自己也有一個安宁的生活？「因為她是總指揮」？－－正是因為她是總指揮，她說自己與別人不同就很坦白，一般沒上黑名單的人，法不治眾；上了黑名單的 人，不是應該特別注意安全嗎？第三，要明白，五月二十八日，還沒有六四屠殺，誰也沒料到會有

這麼慘烈的結局，當時最有危險的，不就是這些上了黑名單的人 嗎？大家不要用六四屠殺之後的眼光看之前的事。而報導的效果恰好利用了這一時間差，而令讀者不自覺。

八、關於「期待流血」一段，報導用移花接木，前後拼湊的方法，同樣也扭曲了其本意。上下文很清楚，這裡的「期待」，不是「期望」，而是「等待」、「準 備」之意。實際上廣場上的許多同學，不斷地用自我犧牲的方式以感化政府，促成對話：從絕食到絕水，乃至準備自焚，其作法可以討論，其精神實在可嘉－－要清 楚，他們不是要犧牲別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犧牲的是自己，難道這種自我犧牲精神也當韃伐嗎？五月二十八日柴玲講這話是在四千同學絕食七天七夜無效，政 府反施以戒嚴令的情況下，對政府不再抱幻想的心情。事實不是證明，共產黨的真面目確實以其屠殺而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了吧？

九、柴玲的過錯，在於說了這些話，自己又沒死。如果柴玲死在廣場，或被坦克壓碎在長安街上，大家再看這個錄像，還會這麼指責她嗎？然而，真有人希望她死掉嗎？不是大家聽到她逃出中國時，都歡欣鼓舞嗎？【以上第 24 頁】

十、柴玲逃出中國時，這篇談話已公諸於世半年多了，鋪天蓋地的榮譽堆在她身上，沒人提起此文，是為甚麼？五年之後，卻用如此卑劣的手法來中傷，又為甚麼？彼一時矣，此一時矣，這個公案值得一參。

最後，鑒於八九民運許多基本史實的調查長期受到忽視、誤解乃至歪曲，建議有能力的民運機構，及有關史學研究單位，組織力量，趁大家記憶還未模糊，當事人 都在的有利條件下，開始全面的研究，成立專業或業餘小組，逐步搞清六四有關的重大史實，以防止諸如此次的歪曲。一個不吸取歷史教訓的民族，是一群白癡，將 在同一個坑裡跌兩跤。（作於巴黎，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九八年元月修訂）【以上第 25 頁】

柴玲沒有「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

《天安門》剪接的一段話，是前後拼接的。前半段（即「讓別人流血」）與後半段（即「自己求生」），在錄映帶上相隔半小時，中間裁掉八千九百字，而且前後半段提問的人不相同，二人的思路並不一致。最後，柴玲並未逃離廣場，而是堅守到六四凌晨與同學一齊撤出。

（《九十年代》編者按：卡瑪□韓丁的影片《天安門》，其中摘錄柴玲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八日接受訪問的談話，引起社會上普遍對柴玲在天安門運動時的姿態的 質疑。本文為柴玲前夫封從德寄來的澄清函件。原信並附有長達一萬三千字的柴玲錄音談話記錄，證明確是兩段談話出自先後不同的錄音。）

《九十年代》今年二月號十三－十五頁文章的作者，在看過柴玲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的錄像談話被影片《天安門》作剪接處理的片斷之後，直指柴玲「野心顯 然不小……她想以別人的血來成全自己」，答責柴玲「暗藏心底的『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民運』哲學」，且在最後呼籲：「我們有權知道自己的同胞因何而 死」。在這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年代，該作者為六四死難**【以上第 26 頁】**者 鳴不平，並決心查出真相，實在難能可貴；同時我也感到她對事實的把握可能還有欠全面的地方，或許並沒有見過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因全文從未真正出版過。現 寄上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校對稿，請轉該作者，相信她讀後能有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若貴刊認為全文太長，不宜一次刊登，或請連載，或請盡早告知，我可另擇一 報，於錄像談話八週年之際刊布，以饗讀者。

《九十年代》今年二月號 十三－十五頁文章的作者，在看過柴玲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的錄像談話被影片《天安門》作剪接處理的片斷之後，直指柴玲「野心顯然不小……她想以別人的血 來成全自己」，答責柴玲「暗藏心底的『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民運』哲學」，且在最後呼籲：「我們有權知道自己的同胞因何而死」。在這假作真時真亦假 的年代，該作者為六四死難【以上第 26 頁】
者鳴不平，並決心查出真相，實在難能可貴；同時我也感到她對事實的把握可能還有欠全面的地方，或 許並沒有見過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因全文從未真正出版過。現寄上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校對稿，請轉該作者，相信她讀後能有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若貴刊認為全 文太長，不宜一次刊登，或請連載，或請盡早告知，我可另擇一報，於錄像談話八週年之際刊布，以饗讀者。

對「史料」的三點澄清

另外，貴刊在該文之後所附背景資料「柴玲讓『別人流血』的一段問答」，有不準確之處。因篇幅不長，茲引全文如下：

「以下是《天安門》一片最具爭議性的一段說話。記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應柴玲本人的要求，六四發生前在一所國際公寓所拍下的片段：

「柴玲：『同學們總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著它的人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

「金培力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

「柴玲：『我想我不會的。』

「金培力問：『為什麼呢？』**【以上第 27 頁】**

「柴玲：『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我是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麼的。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接著幹下去，因為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

這一段「史料」有三點需澄清。一是金培力當時是在北京師範大學的美國留學生，非正式「記者」；二是那段當中的提問者並非金培力，而是香港《天天日報》的 記者梁淑英；三是整個段落是前後拼接的結果。（這還不算上文既不是《天安門》中那一段的全部，又在一些細小的地方有所刪改，如刪掉了「被這樣的政府殘害， 不甘心。我要求生。」一句，讀者可參看我提供的全文校對稿。）

上面第一點是《天安門》作者卡瑪告訴我的，她看過金培力事後的回憶手稿。就第二點來說，一些影片觀眾已經注意到：後半段中的提問者明明是女聲；而梁淑英 一九八九年的一篇文章也談到該次採訪（見六十四名香港記者合著的《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記者協會出版，一九八九年九月初版，一九八九年十 二月增訂版。頁二一三－五）；尤其是梁淑英最近親口向我承認，那個提問者就是她，不是金培力。

兩個採訪者，思路不一致

關於第三點，後半部梁淑英提問的那幾句（即所謂「自己逃生」者），與前半部柴玲對金培力【以上第 28 頁】說的那一段（即所謂「別人流血」者）即便在現有的錄像帶上也相隔四十分鐘，中間裁掉了八千九百字。

關於第三點，後半部梁淑英提問的那幾句（即所謂「自己逃生」者），與前半部柴玲對金培力【以上第 28 頁】說的那一段（即所謂「別人流血」者）即便在現有的錄像帶上也相隔四十分鐘，中間裁掉了八千九百字。

問題的關鍵出自梁淑英與金培力二人在錄像談話中的思路並不一致：金培力在錄像之前已知柴玲的「南下計劃」，而梁淑英則不瞭解情況。九五年五月，卡瑪告訴 我，她看過金培力的回憶手稿，當中明言柴玲見到他時便講了「南下計劃」；這一情況我也得到了柴玲的承認。而梁淑英這一方面，我是今年四月才找到她（本文所 介紹的情況便出自這次電話的內容，亦徵得其同意）。在電話中梁淑英兩次明確告訴我：在採訪時，她完全不知道柴玲有去南方的計劃。從錄像全文中可知，就在梁 淑英問柴玲「你自己會不會留在廣場？」之前幾分鐘，金培力與柴玲有這麼一段對話：

「金培力問：下一步呢？

「柴玲：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不過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

到來的， 要是他敢採取下策的話，即使不敢採取下策，保留一些火種和力量，在下一次革命中，我想我還會再站出來，如果我還活著的話。……」

這段話在現行的各個出版物中都不見。梁淑英向我承認，她當時就是因為沒有明白柴玲這句話，弄不懂柴玲為何一方面強調自己要求生，一方面又說「廣場上的同 學只能是堅持到底」，故才在幾分鐘後找到機會，插入柴玲與金培力的對話，問柴玲「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以上第 29 頁】

梁淑英還告訴我，她加入採訪，是很偶然的。那天上午，她在北京飯店見到金培力與柴玲等要出去作錄像，才臨時加入的。因此梁淑英在整個錄像談話中很少插入提問，而五月二十八日那天是她第一次見到柴玲。這一偶然性在卡瑪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印證(《天安門》頁三七二)。

由此可見，金培力與梁淑英二者的提問在邏輯上應當是不太一致的。從全文展現的上下文可看出，正是因為金培力事先知道柴玲的「南下計劃」，故對柴玲說「下 一步願意求生下去」時毫不驚訝，且在這段話之前甚至提示柴玲「你希望其它城市市民，什麼上海、西安，也參加運動？」(該段問答亦全部被刪去)；也正是因為 梁淑英不瞭解柴玲有離開北京的打算和目的，所以才去追問她「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

梁淑英告訴我，錄像談話完她都還不瞭解柴玲的切實打算；是在談完之後，在柴玲換衣服準備走時，才知道柴玲南下的計劃。

柴玲並未「自己逃生」，她堅持到六四凌晨

柴玲當時並未「自己逃生」，私自擅離職守，逃離廣場。相反，她一直堅守到六四凌晨，直到與同學們一齊撤出廣場，這大家是知道的。五二八錄像談話是在中午 作的，晚上她面對二、三百各校代表，在「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上正式請求辭職。是在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同學的勸阻下，她才打消辭職南下的計劃，繼續留在廣場， 直至六四。【以上第 30 頁】

關於柴玲當時「南下計劃」的情況及其背景，幾篇拙文可供參考：《柴玲「遺言」之所指及其背景》、《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廣場日誌：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二十八日(撤與不撤)》。

柴玲所期待的「流血」，也不是今日在六四慘案發生之後所理解的「大屠殺」；與非大陸人士所理解的有所差異，這個詞是黨文化下的產物，廣場上許多知識分子都當作平常詞來用，我在上述文章中也有論述，茲不多言。

「期待流血」與「等待血洗」

另外，順便指出一點，正是因為上面被刪掉的那段話大家沒看到，批評家們又沒去核對錄像，因此，有人硬是將柴玲「期待」一詞理解為「盼望」(Hope)；而從上引刪文中「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一處可知，柴玲用的「期待」一詞就是「等待」(Wait)之意。九五年五月《紐約時報》以「Hope」譯 「期待」，

一位「民運理論家」還為之辯護。同年六月三日我在北京之春編輯部召開的討論會上當眾問之，就連這位早在九零年便在其《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引用 柴玲錄像談話內容並作深入批評的「民運理論家」也根本沒看過錄像全文！最令人不解的是,《天安門》一片的作者是仔細研究過錄像全文的,也不會不知道對「期 待」一詞譯法的爭議，卻依然在英文版中用 Hope 譯「期待」，而在法文版中則更加聳人聽聞,竟將「期待流血」譯作「盼望【以上第 31 頁】屠殺」(espérons le carnage)！

另外，順便指出一點，正是因為上面被刪掉的那段話大家沒看到，批評家們又沒去核對錄像，因此，有人硬是將柴玲「期待」一詞理解為「盼望」(Hope)；而從上引刪文中「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一處可知，柴玲用的「期待」一詞就是「等待」(Wait)之意。九五年五月《紐約時報》以「Hope」譯「期待」，一位「民運理論家」還為之辯護。同年六月三日我在北京之春編輯部召開的討論會上當眾問之，就連這位早在九零年便在其《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引用柴玲錄像談話內容並作深入批評的「民運理論家」也根本沒看過錄像全文！最令人不解的是,《天安門》一片的作者是仔細研究過錄像全文的，也不會不知道對「期待」一詞譯法的爭議，卻依然在英文版中用 Hope 譯「期待」，而在法文版中則更加聳人聽聞，竟將「期待流血」譯作「盼望【以上第 31 頁】屠殺」(espérons le carnage)！

柴玲在錄像講話中的言辭未經斟酌，說話很不成熟，有些觀點於今看來也不妥當。對柴玲五二八錄像談話的批評，尤其是「獻身」與「求生」兩種價值觀的混淆與衝突，我亦將另文詳述。(參看《獻身與求生的迷茫－質疑《天安門》》一文)

盼望加強六四史料研究

鑒於八九民運史研究中的諸多問題，我再次呼籲各個關注八九民運和中國未來的學術團體，以及各個以推動重評六四為己任的民運團體，加強對八九民運史料的整 理和研究工作，以免再次出現類似的誤解，或至少在誤解出現之後能夠及時糾正。這樣，我們才對得起那些在八九民運中作過貢獻與犧牲的人們。

還有一個情況需要提出，梁淑英和柴玲都說，五二八錄像的當事人共有五位。另兩位一是當時幫助柴玲聯絡金培力的同學，當時叫王力，本名韋安，六四後在台 灣；一是國際公寓的女主人，可能是美籍華人，梁淑英還記得她叫某某蓮，現居香港。另外，金培力我也沒有與其聯絡，希望與這三人能通過《九十年代》或別的管 道取得聯繫。當然，我更希望他們直接發表作為當事人的回憶，比如金培力那篇已寫成的手稿。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於荷蘭萊頓大學。筆者九八年按：本文開頭的提要、編者按與文中的小標題都是《九十年代》所加。九七年四月，我將此函及柴玲談話全文寄至該雜誌，主編李怡先生與那位專欄作家都改變了看【以上第 32 頁】法。李怡先生在《蘋果日報》上撰文說「看影片《天安門》時，筆者也誤解了柴玲。今天，筆者相信封從德所作的澄清」；那位專欄作家也在《明報》上撰文：「讓歷史還她一個清白」。兩篇文章刊登的時間都是六月三日，在香港回歸中共前夕。我對他們的求實態度和勇氣十分敬佩。）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於荷蘭萊頓大學。筆者九八年按：本文開頭的提要、編者按與文中的小標題都是《九十年代》所加。九七年四月，我將此函及柴玲談話全文寄至該雜誌，主編李怡先生與那位專欄作家都改變了看【以上第 32 頁】法。
李怡先生在《蘋果日報》上撰文說「看影片《天安門》時，筆者也誤解了柴玲。今天，筆者相信封從德所作的澄清」；那位專欄作家也在《明報》上撰文：「讓歷史還她一個清白」。兩篇文章刊登的時間都是六月三日，在香港回歸中共前夕。我對他們的求實態度和勇氣十分敬佩。）

附：《蘋果日報》李怡專欄(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

複雜情緒

柴玲在她說期待「流血」與她自己「不會在廣場堅持」之間，說了甚麼話，其實是很關重要的。由於篇幅太長。《九十年代》沒有刊登。但我作為編者，是讀過的。

在兩段話中間，柴玲所表達的情緒是複雜的、矛盾的。她邊哭邊說，情緒異常激動。她說了她對學運的失望，由於許多人要與她爭奪權力，使她覺得「特別累」， 也「很悲哀」，她甚至說，「有時候我想，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不值得為你獻身……」她又說，「昨天我跟我愛人說，我再也不願在中國待下去了，我說我想 到國外去，我們不是為死而戰，而是為了生而戰。」她還說，「我很喜歡這一種安詳的，有一些 baby，有一些小動物的那種……平靜、安詳的生活。」但「如果 是在大家捨生忘死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我坐一邊，不去衝鋒陷陣……一旦這個權利到來的時候，我說，給我拿來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個

時候我覺得我 很慚愧。我做不出這種事情來……」【以上第 33 頁】

這就是柴玲的矛盾。以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若不考慮自己日後過的日子，不珍惜生命，那是不可能的。她說了她想求生，是很人性、很自然的反應。她期待天安門廣場會流血，也很自然而坦率，倘若她告訴人們，當局是會仁慈的，是決不會鎮壓的，那才可怕。

只要她說期待流血，以及她想求生的話，不是連在一起說的，我們又能對她有甚麼責備呢？而最終，柴玲並未「自己逃生」，在矛盾中她還是一直堅守到六四凌晨，直到與同學們一齊撤出廣場。

看影片《天安門》時，筆者也誤解了柴玲。今天，筆者相信封從德所作的澄清。【以上第 34 頁】

獻身與求生的迷茫－－對影片《天安門》史料根據的質疑

在有關八九民運的資料片當中，《天安門》是至今為止取材最為全面、剖析最為透徹的一部影片，這一點是本文作者一直在各種場合所肯定的。用了五年多的時 間、花了一百六十萬美元，作者們的心血在讚譽面前是當之無愧的。本文不再進一步重複這一公認的褒揚，而是提出幾點質疑，與影片作者及有心人商榷。

首先需要說明我進行質疑的資料基礎。影片作者卡瑪九六年秋通過一位朋友轉給我該片的英文原版，共長三個小時八分多。雖然一年前我已從新聞中得知影片在美 國上映的消息，但我首先看到的是十月初在法國電視台播出的法文版，我錄了下來，長二小時二十分鐘，比英文版短一些，總體印象也較溫和一些，祇是在一些關鍵 字眼上的翻譯似又更為強烈。後來在無意間發現卡瑪他們在電腦國際網絡上的網面，從中取下影片的文本，與英文原版對照幾乎沒有差別。最近(今年四月)也是偶 然讀到《九十年代》二月刊中的一篇文章，才知道又出了中文版，我托朋友從香港購來與影片同名的書，是明鏡出版社三月份才出版的，當中也有影片中文版的全 文，與英文原【以上第 35 頁】版也幾乎無異，個別字眼似乎還要激烈些。為了讀者查詢方便，以下便主要參照這本書中的文本內容和頁碼。

首先需要說明我進行質疑 的資料基礎。影片作者卡瑪九六年秋通過一位朋友轉給我該片的英文原版，共長三個小時八分多。雖然一年前我已從新聞中得知影片在美國上映的消息，但我首先看 到的是十月初在法國電視台播出的法文版，我錄了下來，長二小時二十分鐘，比英文版短一些，總體印象也較溫和一些，祇

是在一些關鍵字眼上的翻譯似又更為強 烈。後來在無意間發現卡瑪他們在電腦國際網絡上的網面，從中取下影片的文本，與英文原版對照幾乎沒有差別。最近(今年四月)也是偶然讀到《九十年代》二月 刊中的一篇文章，才知道又出了中文版，我托朋友從香港購來與影片同名的書，是明鏡出版社三月份才出版的，當中也有影片中文版的全文，與英文原【以上第 35 頁】版也幾乎無異，個別字眼似乎還要激烈些。為了讀者查詢方便，以下便主要參照這本書中的文本內容和頁碼。

一、用「蒙太奇」作「大手術」

蒙太奇(Montage)是電影製作中最平常的一種手法，說白了就是剪輯，將不同來源或同一來源不同段落的影視資料拼接在一起。這是節省篇幅、增強效果、突出作者觀點的一個常用技巧。《天安門》一片採用這種技術本來無可非議。不過它不是一部普通的電影，而是探討歷史真相的記錄片，並且影片作者又在各種 場合都說這是一部「客觀的、理性的、照顧到了各個方面觀點的」作品，因此，它在運用「蒙太奇」手法時，就應當具有比一般電影更嚴格的前提條件，比如應該較 為細致地介紹剪輯在一起的各個片段的基本背景情況，尤其是在作「大手術」時。

這種「大手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柴玲被某些記者抓住而簡化為「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的那兩段話。我們來看一看它是否作了必要的背景介紹。

先看剪輯的情況。

影片中柴玲那兩段話其實是由五個片段組成，為了敘述方便，姑且標為甲乙丙丁戊。以下是它們的全文：

(甲)：最近我一直感覺到特別悲哀，而且同學，就他們本身的民主素質也是相當差的。而且說句【以上第 36 頁】實在的，在我倡議發起絕食這一天我心裡就很明白，不會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事業注定是失敗的。我一直清楚這一點，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給大家一個堅定的形象——我們在爭取勝利。但我心裡很明白。

(甲)：最近我一直感覺到特別悲哀，而且同學，就他們本身的民主素質也是相當差的。而且說句【以上第 36 頁】實在的，在我倡議發起絕食這一天我心裡就很明白，不會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事業注定是失敗的。

我一直清楚這一點，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給大家一個堅定的形象－－我們在爭取勝利。但我心裡很明白。

（乙）：我就是越幹越悲哀。大該四月二十幾號時我就開始感覺到了。那時我想，我現在也想說但一直不願說，因為中國人不能罵中國人，但我不得不說，就是， 有時候我想，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哭)我不值得為你獻身！(哭)可是我又想到這次運動的確還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學生、工人、市民，也 有知識界的人……

（丙）：同學們一直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 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 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學，有一些什 麼上層人士，什麼什麼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這個工作，就是幫助政府，不讓政府採取這種措施，而在政府最 終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如果是這種同學們自我崩潰、自我瓦解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要撤回原地的話，他們就會把--大批這次運 動中的先進的領袖，還有一些黨內的、軍內的、能與他們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以上第 37 頁】益和呼聲的這樣一些人全部清洗乾淨。

（丙）：同學們一直在 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 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尤其可 悲的是，有一些同學，有一些什麼上層人士，什麼什麼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這個工作，就是幫助政府，不讓 政府採取這種措施，而在政府最終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如果是這種同學們自我崩潰、自我瓦解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要撤回原地 的話，他們就會把一大批這次運動中的先進的領袖，還有一些黨內的、軍內的、能與他們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以上第 37 頁】益和呼聲的這樣一些人全部清洗乾淨。

（丁）：所以，我覺得很悲哀。這些話，沒有辦法直接跟同學們講－－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在這裡流血，用鮮血和生命來喚起民眾。同學們會這樣做，但是他們是年輕的孩子們……(哽咽)

(戊)：記者：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

柴玲：我想我不會的。

記者：為什麼呢？

柴玲：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麼的，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來接著幹下去，因為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天安門》頁一七五至一七七)

這是影片中剪輯後的順序，而在原錄像中的卻是丙－丁－乙－甲－戊。前四段構成「讓別人流血」，尤其在丙段中；戊則是「自己逃生」。前四段相隔並不遠，丙 －丁－乙－甲之間剪斷的時間分別是一分十七秒、二分四十秒和六分鐘，意思較為一致，我不明白有何必要這樣倒置，或許是為了拉近「期待流血」(丙)與(戊) 「我要求生」兩處的距離，以增強反差效果吧。

問題最大的是在丁戊二段之間，剪掉的時間長達三十九分鐘，中間刪去八千多字。如果按丙處「期待流血」一句與戊「我要求生」一句來算，相差則是四十三分鐘，隔了八千九百字。(順【以上第 38 頁】便 說一句，許多人將聯合報出版的《天安門一九八九》一書中的柴玲錄像談話當全文來看待。其實該書的這個文本只有七千字，而柴玲錄像全文卻是一萬三千字，刪掉 近半；更不用說這個文本沒有介紹錄像的背景，也沒採用原來的對話體。)這麼大的刪節拼接，用上「蒙太奇」手法，一般觀眾是不易察覺柴玲那兩句話本來是隔得 那麼遠的；而影片又沒在任何地方作出說明，這就導致了下面一系列的問題。

問題最大的是在丁戊二段之間，剪掉的時間長達三十九分鐘，中間刪去八千多字。如果按丙處「期待流血」一句與戊「我要求生」一句來算，相差則是四十三分鐘，隔了八千九百字。(順【以上第 38 頁】便 說一句，許多人將聯合報出版的《天安門一九八九》一書中的柴玲錄像談話當全文來看待。其實該書的這個文本只有七千字，而柴玲錄像全文卻是一萬三千字，刪掉 近半；更不用說這個文本沒有介紹錄像的背景，也沒採用原來的對話體。)這麼大的刪節拼接，用上「蒙太奇」手法，一般觀眾是不易察覺柴玲那兩句話本來是隔得 那麼遠的；而影片又沒在任何地方作出說明，這就導致了下面一系列的問題。

有趣的是，甲、乙、戊三段在一九九六年夏的法文版中消失，可能影片作者們也已感到剪裁得不妥。但是，在後來的中文版中又都重新出現了，因此，我要質疑：這麼長的剪輯拼接卻不作說明，是否符合歷史記錄片的標準？

二、作「大手術」而沒作必要的背景介紹

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如果說用「蒙太奇」作「大手術」而不作說明也不算犯規的話，那麼下面的情況可能就難說沒有問題了。很不幸，我也是最近才瞭解到這些情況的，這才大致弄清整個錄像事件的癥結所在。

癥結就在於影片作者對一些背景情況秘而不宣。首先是沒有介紹柴玲「期待流血」與「我要求生」那兩句話是對兩位不同的記者說的。（見上文「兩個採訪者，思路不一致」一節）

由此可見，柴玲「期待流血」和「我要求生」的那兩段話，本來是對兩個不同的人在不同【以上第 39 頁】的思路下說的，隔得又那麼遠；而影片和一些記者將它們剪裁在一起，卻又不向觀眾和讀者作必要的背景介紹，這種做法是否誠實、是否是對觀眾與讀者的知情權的蔑視，這是我所質疑的。

由此可見，柴玲「期待流血」和「我要求生」的那兩段話，本來是對兩個不同的人在不同【以上第 39 頁】的思路下說的，隔得又那麼遠；而影片和一些記者將它們剪裁在一起，卻又不向觀眾和讀者作必要的背景介紹，這種做法是否誠實、是否是對觀眾與讀者的知情權的蔑視，這是我所質疑的。

順便提一句，十分有趣的是，法文的名詞分得出陰陽性，而該片的法文版又恰恰刪去了最後這一段(戊)對話，否則觀眾就會奇怪到底有幾位記者、是男是女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巧合。為何分不出陰陽性的英文與中文的版本沒有刪呢？

三、顛倒時間順序

卡瑪讀過金培力的手稿，應該清楚柴玲告訴金培力「南下計劃」在先，錄像在後。有關「南下計劃」的詳情與背景，我在影片定稿前的一些文章中已作介紹(《柴 玲「遺言」之所指及其背景》和《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其中對卡瑪有質疑)。但是，影片中卻是在引用錄像過後才說，「在採訪結束之後，柴玲委托這位美國記者 將採訪錄像向世界公佈。她說，她即將離開北京轉入地下。」(頁一七八)明顯是將這一關鍵的時間順序顛倒了過來。

時序的顛倒可以導致問題實質的顛倒。比如中共的宣傳片說六三之夜是「先暴後鎮」，將軍隊開槍與市民燒軍車的時序顛倒過來，這樣一來，「鎮壓反革命暴亂」 就不是沒有道理的了。同樣，在影片《天安門》當中，美國記者知道柴玲的「南下計劃」是在錄像之前還是之後，也並非無關緊要。如果金培力早已知道柴玲要離開 北京是為了南下去發動全國更大規模的反對戒嚴、【以上第 40 頁】支援北 京學生的運動，那麼，他對柴玲在錄像中的許多話就很容易理解了，尤

其是考慮到她不能直接在這即將公開的錄像中透露這一保密而危險的計劃。這一時序是確定金 培力與梁淑英在與柴玲對話時是否有同一思路的關鍵，也就是說，柴玲那兩句話是否可以剪輯在一起的關鍵。影片作者一方面對有二位記者的情況秘而不宣，將柴玲 對不同的人說的兩句不同的話剪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在時序上作了顛倒的說明，客觀上進一步掩蓋了兩句話是不同思路的實質。

時序的顛倒可以導致問題 實質的顛倒。比如中共的宣傳片說六三之夜是「先暴後鎮」，將軍隊開槍與市民燒軍車的時序顛倒過來，這樣一來，「鎮壓反革命暴亂」就不是沒有道理的了。同 樣，在影片《天安門》當中，美國記者知道柴玲的「南下計劃」是在錄像之前還是之後，也並非無關緊要。如果金培力早已知道柴玲要離開北京是為了南下去發動全 國更大規模的反對戒嚴、【以上第 40 頁】支援北京學生的運動，那麼，他對柴玲在錄像中的許多話就很容易理解了，

尤其是考慮到她不能直接在這 即將公開的錄像中透露這一保密而危險的計劃。這一時序是確定金培力與梁淑英在與柴玲對話時是否有同一思路的關鍵，也就是說，柴玲那兩句話是否可以剪輯在一 起的關鍵。影片作者一方面對有二位記者的情況秘而不宣，將柴玲對不同的人說的兩句不同的話剪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在時序上作了顛倒的說明，客觀上進一步掩蓋 了兩句話是不同思路的實質。

這一時序的顛倒因為影片下面的處理手法而得到進一步加強。影片接下說，柴玲在第二天夜間有個採訪，當中這麼一段對話：

記者：你是否想到今後通過什麼其他的方式來推動目前的運動呢？

柴玲：對，我有這樣的考慮，因為我覺得工作的重點已經不在廣場了，而應是在全國各地上。本來我有一點心願，我想我很希望到全國各地去走一走，甚至有可能 到香港或別的地方看一看，究竟外面是怎麼一種局面，我要親自去看一看，然後決定廣場這個戰役究竟應該打多久，有可能出現一種什麼樣的效果。

和前面柴玲「說她即將離開北京轉入地下」一句相呼應。但是，這一段其實也正好可以用來說明柴玲五二八的錄像談話中隱含的「南下計劃」的思路。我不明白為何影片作者就是不把這一關鍵情況明確地向觀眾講出來。【以上第 41 頁】

四、用詞與翻譯的問題

《天安門》一片中用了許多模棱兩可的詞。比如上面的柴玲「說她即

將離開北京轉入地下(Go underground)」。「轉入地下」既可理解為進行秘密工作，也可理解為私下開溜。尤其在影片剪輯的「我要求生」那一段之後馬上就說柴玲準備「轉入 地下」，觀眾可能很難不理解為柴玲準備逃跑；加之南下計劃又被隱秘起來，「轉入地下」被大家理解為「進行秘密工作」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最嚴重的用詞問題是「期待」的翻譯。這在九五年五月已引起爭議，許多人批評《紐約時報》將「期待流血」中的「期待」譯作「期望」(hope for)而不是「等待」(wait for)。意味深長的是，有的民運理論家還去為這樣的譯法作辯護。他們的根據是：字典裡面的「期待」就是有「期望」的意思。有這個意思，但這個意思是不是 「期待」一詞的全部含義呢？辯護者們不再說了，似乎解讀文本(text)全然可以不顧及背景(context)而任取一義。

影片作者卡瑪一直堅持這樣的譯法。實際上，早在九五年五月她便給我寄來美國廣播公司(ABC)Ted Koppel 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底對柴玲錄像的引用文稿，當中譯的是「等待」(Waiting for)；卡瑪在信中向我指出，這個譯法不對，應當譯作「期望」(Hoping for)。最近我從新出的《天安門》一書中讀到，也是在九五年五月，卡瑪給《中國時報週刊》的採訪中也持同一看法(頁三〇〇、三〇六)。【以上第 42 頁】

說來很慚愧，我是最近才發現不能這麼翻譯的證據。許多人雖然直覺到這種譯法不會是柴玲的本意，但是因為沒有 仔細研究過柴玲談話的全文，就不知道當時讀到的文本是經過刪節的;而恰恰是在這些被刪節的文本中漏掉了一段很關鍵的話，與「期待流血」那句話同一結構、同 樣意思，當中用的字眼是「等待血洗」。因此，按照漢學考據方法或西方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中「以經解經」的原理，用同一文本中的「等待」來詮釋「期待」要比用字典裡的另一含義「期望」應該優先得多。

為「期望」譯法作辯護的人怕是更沒有耐心去研究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比如九五年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編輯部召開的討論會上，我驚訝地發現，就連那位早在九 〇年便在其《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引用柴玲錄像談話內容並作深入批評的民運理論家也根本沒看過錄像全文！於是我對其「反思」提出質疑：反思要不要根據史 實？

不過，最令人不解的是，仔細研究過柴玲錄像全文的影片作者卻自始至終都堅持將「期待」譯作「期望」，在影片的英文版中用 Hoping bloodshed(希望流血、殺戮)，而在法文版中竟然成了「盼望殘殺」(Espérons le carnage)！

至於「等待流血」，「等待鎮壓」，「不怕犧牲」，「獻身」之類，這是黨文化下的一些平常概念，一九八九年是天天掛在學生和知識分子嘴邊的，翻一翻當時的 資料就不難看出的。遠的不說，即便是影片中令人感覺非常理性的梁曉燕老師，也提到五月十四日晚大家等待軍警清場時「焦慮不安的心情」：「怎麼還不來呀？」 (頁一二六)影片在許多方面都有歷史性的透視和對【以上第 43 頁】共產黨文化的深入剖析，可惜對這種「等待流血」的心理似乎理解不深。而對「流血」的理解從其譯法來看，要比當時廣場上人們的理解嚴重了幾千倍—這樣說還不準確，因為「流血」與「屠殺」、「殘殺」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

至於「等待流血」,「等 待鎮壓」,「不怕犧牲」,「獻身」之類，這是黨文化下的一些平常概念，一九八九年是天天掛在學生和知識分子嘴邊的，翻一翻當時的資料就不難看出的。遠的不 說，即便是影片中令人感覺非常理性的梁曉燕老師，也提到五月十四日晚大家等待軍警清場時「焦慮不安的心情」:「怎麼還不來呀？」(頁一二六)影片在許多方 面都有歷史性的透視和對【以上第 43 頁】共產黨文化的深入剖析，可惜對這種「等待流血」的心理似乎理解不深。而對「流血」的理解從其譯法來看，要比當時廣場上人們的理解嚴重了幾千倍－－這樣說還不準確，因為「流血」與「屠殺」、「殘殺」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

五、轉述變成了自述

柴玲在影片中的突出形象是「激進」。這一形象得到了一些特殊手法的加強，比如將間接引語變成直接引語。例如影片介紹絕食團指揮部成立經過時引用的柴玲錄像當中的一段(頁一二六)：

「如果政府看著同學一個個消耗生命的話，那麼我們就採取更極端的措施，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餓死的話，那麼我們就作第一個死掉的人！」

這句話其實是李祿說的。我們來對照一下柴玲錄像中這一段的全文就很清楚了：

「第二天早上我，還有李祿找到我，就是現在的副總指揮。他很痛心，他說，『如果政府如此無賴下去，這樣看著同學一個個這樣消耗生命的話，那我們就採取更極端的措施』，他說，『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眼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死掉的話，那麼我們就作第一個死掉的人。』」

可見，柴玲轉述的一句話被當作柴玲自己說的了。影片作者甚至極為細心地去掉了這段話【以上第 44 頁】中央的「他說」二字。把轉述變成自述在史料分析上應該是最忌諱的了，而且卡瑪自己就曾對李祿的影片《移山》有這方面的質疑(《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十八—五十九)，為何在自己的影片中又明知故犯呢？

可見，柴玲轉述的一句話被當作柴玲自己說的了。影片作者甚至極為細心地去掉了這段話【以上第 44 頁】中央的「他說」二字。把轉述變成自述在史料分析上應該是最忌諱的了，而且卡瑪自己就曾對李祿的影片《移山》有這方面的質疑（《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十八－五十九），為何在自己的影片中又明知故犯呢？

六、李鵬與學生有「電視直播」的「公開對話」嗎？

李鵬既未與學生「對話」，那次見面也不是像民運理論家編造的那樣「現場直播」了。對「李鵬讓步論」、尤其是「李鵬與北高聯負責人公開對話了」之類的說法 的駁正，見拙文《五一八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了嗎？》給出的九條根據，這裡不再重複。當時我還未讀到影片的中文版，祇是根據英文版判斷說：「影片《天安 門》在這一點上要謹慎一些。」現在看來需要作些修正。

該片中文版中沒有用「公開對話」的字眼，確實比《八九民運反思》等文章要嚴謹許多。但是影片中卻說，「這次會見通過電視向全國廣播」（頁一三七；英文版 和 Internet 網面都是 a televised meeting），同時給出李鵬與吾爾開希的兩個畫面，許多人以為這就是一場「電視直播的公開對話」了。特別是這一段放在閻明復與學生的對話之後，更加強 了這一印象。

七、五一四有「公開」對話嗎？

【以上第 45 頁】
參見本書《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

八、戴晴提了甚麼條件？

五一四晚，知識分子來廣場向同學們勸撤的情況，影片也隱匿了一個關鍵的地方。我們先看影片採用的當時的一組鏡頭（頁一二一－一二四）：

戴晴：為了避免發生親痛仇快的事情，為了使中蘇最高級會晤能夠順利地進行，我們懇請同學們發揚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一會兒我再說條件，如果條件符合的話－－暫時離開天安門廣場。

影片在這裡插入吾爾開希的訪談，對知識分子將學生當小孩極為不滿。然後是蘇曉康面對廣場上十幾萬人的一個鏡頭：

蘇曉康：我們還有沒有這樣的理性啊？ ！

眾 人：有！！！

蘇曉康：那好！如果在政府作出讓步以後，我們能不能用我們的理性來回答他們呢？

眾 人：能！！！【以上第 46 頁】

蘇曉康：我的話完了！

接下來又是吾爾開希及王丹對知識分子不滿的話，當中王丹說「對不起，我沒有那麼高的理性，因為我沒有面對理性的對手！」最後是戴晴受訪時的總結：「我們 當時的勸說失敗了！我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知識分子夾在兩批人中間－－那就是毫無理性的學生和毫無理性的政府。我們不知道怎麼辦。」

這樣，影片成功地塑造了「毫無理性的學生」的形象。但是，這一塑造本身是不是理性的呢？我們發現它缺了關鍵的一環：戴晴提出的撤離條件究竟是甚麼呢？如 果戴晴提出的條件(即蘇曉康說的政府的「讓步」)符合情理的話，那麼學生當然就有「非理性」的問題了。然而，影片卻對此守口如瓶。實際上，當時戴晴提出的 是：要李鵬或趙紫陽來廣場說一聲「同學們好！」，絕食便停止，大家就撤出廣場。難怪吾爾開希要抗議這是把同學當小孩來耍！

關於戴晴的建議，有好幾個版本的說法，但差異都不大，可以相互印證。戴晴：「讀畢《緊急呼籲》，由我宣佈撤出條件：總理和總書記來看望大家，同學們從廣 場撤出」；陳小雅：「只要來站一下，不說什麼」；劉曉波：「來廣場與學生們見面」；蘇煒、王超華和我的記憶中也都只有「同學們好」。唯一的例外是包遵信的 回憶，他說戴晴建議的是李、趙來廣場宣佈「同學們是愛國的」，且在建議前與學者們商量過。但戴晴自己都沒提到「愛國」二字，也沒提商量的事，蘇煒更因此而 說大家都埋怨她，比如離開廣場後「李洪林還在喃喃地說：戴晴那樣說很不好，她不應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地哄，她說的那番代表我們十二人的話，也並不是大家早 先商量好的。【以上第 47 頁】

這個事情這樣一弄僵，往後這個中間斡旋的角色是誰也沒法當了。」可見，連十二學者內部也沒達成一致，那還怎麼勸學生？（詳情見《見好沒法收，怎麼辦？－－答胡平公開信之三》第五節）

因此，影片刻畫學生「非理性」的處理方式是很值得商榷的。影片在後面批評「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不具備可靠的代表性，因為廣場後期的人員流動性太大(頁一 三七)，這很有道理。而在絕食之初的五月十四日，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柴玲在九一年的巴黎會議上兩次強調：十二學者到廣場後，各校代表六十四票中四十六票決 定不撤(《回顧與反思》頁一三一，一三三)。這一情況未見報導，有待進一步的考察。不過根據最近發現的一盤當時的錄音帶顯示，就連目前大家公認的最為溫 和、最有理性的王超華也認同了堅守廣場的意見。以下是超華當時在廣播站的聲明的全文：

王超華：同學們，由於政府現在這種態度－－我是北高聯的常委－－我希望同學們都提高警惕，做好一切準備。現在北高聯、對話代表團和絕食請願團以及廣大聲 援的同學、以及市民們、各校的教師聲援機構，我們現在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我們的基本態度也是一致的：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堅持到最後勝利！

眾喝彩：好！！！

根據錄音判斷，時間是在錄音者標定的十五日零點零六分之後半個小時以內。在超華講話之前，有個同學代表幾位北大研究生還認為十二學者的建議很有

理性，應當把他們請回來，但從【以上第 48 頁】錄音聽來，受到的響應遠不如超華。可見柴玲說的表決不是不可能。

根據錄音判斷，時間是在錄音者標定的十五日零點零六分之後半個小時以內。在超華講話之前，有個同學代表幾位北大研究生還認為十二學者的建議很有理性，應當把他們請回來，但從【以上第 48 頁】錄音聽來，受到的響應遠不如超華。可見柴玲說的表決不是不可能。

總而言之，戴晴提出的建議太過輕巧，不僅勸不動學生，就連請他們來的王超華以及知識分子內部都沒完全認同。

九、其他問題

影片還有一些值得商討的地方，比如有一段用對比手法：先用一段柴玲六月八日的錄音講話對廣場屠殺的描述，然後馬上是侯德健那一段很有名且極有道理的話：「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頁二三二)這樣反襯的客觀效果是，《九十年代》的一位專欄作家在今年二月號上發表觀感：「影片直指柴玲說謊……」。實際上卡瑪在九五年就對柴玲在李祿那部影片《移山》中用直接引語方式轉述他人對屠殺情況的描述提出了質疑(《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八－五九)。那是關於一個女孩擋坦克被碾的情況，是一位北大的博士生親眼所見而對我和柴玲講的。他是我的朋友，從當時他義憤而平靜的語氣來看，不會對我們說謊，因為那實在沒有必要。柴玲在六月八日的錄音中明確提到了這位博士生，說是聽他說的，這也許就是影片《天安門》最終沒有採用這段曾被質疑的話的原因吧。其實影片拿來與侯德健的話作反襯的柴玲的那句話裡，也都有「我們事後才知道……有人說……也有人講……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樣的申明，可見是不可以當作柴玲親眼所見來指責她說謊的。而許多觀眾依然覺得是柴玲在說謊，可見影片這種對比是多麼的強烈和不當了。【以上第 49 頁】

與影片作者的理解相反，柴玲作這個錄音的本意恰恰是希望外界不要誇大對屠殺的描述。六四之後我們一起逃亡，途中聽美國之音等電台，覺得有些離譜。我當時就有侯德健那種「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的感觸。這也就是柴玲為何在錄音一開始就強調自己作為廣場總指揮「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的原因。順便說一句，這個錄音是在武漢大學自治會主席李海濤的宿舍裡作的，是在我們要轉移之前一個小時才臨時決定的，因此倉促之中錯誤難免，柴玲也一直說對這個錄音不太滿意。李海濤立即複製和散發了一百盤錄音磁帶，為此他坐了三年牢。另一位自治會負責人很快將其中一盤帶到了香港，他就是大家知道的蔡崇國。

柴玲「聽說」的死亡數字從二百多到四千是相當寬泛的，今天看來，真實

數字應當就在這個範圍內。如果與當時的一些報導對照一下便可看出，柴玲用間接引語的 描述在當時還是較溫和的。吾爾開希幾個星期之後還在講：「廣場死亡數以千計，北京，我想數以萬計，我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我的很多同學被坦克車完全扁 平的壓死在天安門廣場」、「六月四日那天，我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時候，我清楚地看到了很多我的同學、我的同胞，他們被喪盡天良的，喪失人性的野獸、法 西斯軍隊打的，用槍用木棍打的，很多人在天安門廣場死去了。我清楚地看見就在送我走的那輛救護車上，有一個同學腦袋、頭部和腹部中彈，頭部已經被他們打碎 了，肚子還在咕嘟咕嘟地冒血。」這是香港電視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播出吾爾開希在離開中國後的首次錄影帶，影響也不算不小，又是「親眼所見」，又是現成 的影視材料，內容也正好與侯德健否認看見廣場上死人的說法相對立；而柴玲的那段，不僅是轉述，而且還祇是錄音，我不明白為何影片作者就選用了後者。

影片系統性的偏向，我將另文詳述。其它一些更細致的問題，比如忽略了知識分子激進思【以上第 50 頁】潮對廣場上的激進傾向的影響，也幾乎看不到任命指揮部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作用等等，限於篇幅，這裡從略，以後有機會再詳細分析。

影片系統性的偏向，我將另文詳述。其它一些更細致的問題，比如忽略了知識分子激進思【以上第 50 頁】潮對廣場上的激進傾向的影響，也幾乎看不到任命指揮部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作用等等，限於篇幅，這裡從略，以後有機會再詳細分析。

影片作者的 Internet 網面上也有一些問題，比如英文版那一面沒有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卻有成百上千人批評柴玲的觀感，也就是說，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也是沒有機會瞭解談話全文的情況下發的議論，影片作者卻正而八經地收集在一起。而在中文版這一面，「全文」也不全，刪掉了柴玲講述家庭與父母的一段話，當 中有一句：「我很想活下去，都是為了他們(父母)」。這一句對於理解柴玲為何希望求生不能說沒有意義。影片作者在這個刪節處註明了一句，「因柴玲要求，此 處刪去約二百五十字」。我還很奇怪，不是說柴玲拒絕卡瑪的採訪嗎，何以又去要求甚麼呢？我一直以為柴玲真的為此與卡瑪有交涉，但最近要將整理的全文發表而 去詢問柴玲是否同意全文照發時，才聽她說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這裡所謂「因柴玲要求」，其實就是錄像原文中的話，這樣的要求在錄像原文中又不是只有這一處（特別是「我要求生」那一段），為何別的地方不刪，偏偏刪去含有這麼關鍵的一句話的段落呢？

十、對柴玲錄像談話的幾點批評

如果只對影片進行批評也是不公正的。這裡我要重複文章開頭的話：《天

安門》是至今為止取材最為全面、剖析最為透徹的一部有關八九民運的資料片。實際上它也很正確地指出了八九【以上第 51 頁】學運中的許多缺失。這裡就提出我的一些理解。

如果只對影片進行批評也是不公正的。這裡我要重複文章開頭的話:《天安門》是至今為止取材最為全面、剖析最為透徹的一部有關八九民運的資料片。實際上它也很正確地指出了八九【以上第 51 頁】學運中的許多缺失。這裡就提出我的一些理解。

影片的一個重大貢獻是為八九民運提供了一個較大尺度的歷史透視，尤其是與二十多年前的文革和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的對照。稍有欠缺的是沒有指出許多廣場學 生(包括我)激進的「救亡」、「啟蒙」與全盤西化思潮的直接來源，即八十年代中後期一些知識分子的言論，尤其以劉曉波、方勵之、《河殤》、《醜陋的中國 人》等為代表。影片中知識分子這方面的言論幾乎看不見，在一九一九年五四的「救亡」之後，陡然就跳到一九八九年柴玲「這個國家快亡了」的呼喊，大有空穴來 風的感覺。

廣場學生正是從八十年代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價值轉型期的混亂造成我們思想上的迷茫。柴玲錄像談話正是這種混亂最好的例證。比如「獻身」與「求生」的 衝突，前者是黨文化下的產物，而後者則不能不說與開放後新來的個人主義思潮有關，哪怕是對個人主義的誤解。柴玲也是絕食書的主要作者，當中有一句向父母告 別的話:「別了，父母！忠孝不能兩全。」「忠」是對國家和民族的，與「獻身」相連;「孝」則是對父母的。顯然當柴玲在五月十三日唸絕食書時是將為國獻身的 「忠」看得高於「孝」的，但是，十五天後，她在錄像談話中則發出「我要求生」的呼叫，並且說「我很想活下去，都是為了他們(父母)」。可見柴玲當時價值觀 的混亂。

這一混亂造成了「忠」的對象的模糊不清。一方面在尋找中國的「希望」，要「喚醒民眾」;另一方面卻對「中國」、「民眾」這些「忠」的對象又無徹底的信 任。錄像中柴玲重複了《絕食書》的一句話，「我們要看一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國到底還有沒有良心」;因為運動中的一些【以上第 52 頁】人和事，導致柴玲在錄像中發出「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獻身！」的哭訴。

這一混亂造成了「忠」的 對象的模糊不清。一方面在尋找中國的「希望」，要「喚醒民眾」;另一方面卻對「中國」、「民眾」這些「忠」的對象又無徹底的信任。錄像中柴玲重複了《絕食 書》的一句話，「我們要看一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國到底還有沒有良心」;因為運動中的一些【以上第 52 頁】人和事，導致柴

玲在錄像中發出「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獻身！」的哭訴。

這種價值觀的混亂，並非柴玲所特有，九一年拙文《反思中的困惑》曾就缺乏堅定的價值系統和信仰發出感嘆：我們祇是在一堆矛盾的選擇中避重就輕。實際上，當時許多「學生領袖」也是徘徊在「獻身」與「求生」兩難選擇之間的，具體事例這裡從略。

柴玲錄像談話中另一個明顯的矛盾是：一方面批判中共的「封建大一統統治」，另一方面卻說「維護廣場指揮部的統一領導這是對的」。其它思維混亂的地方還不 少，暫也從略。總之，柴玲似乎是將成長過程中吸收的許多思潮都濃縮在這篇談話裡了，也許當時她自己都沒感覺到自相矛盾的地方是那麼多。

問題是，柴玲這些激進思想和混雜的觀念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影片《天安門》可能限於篇幅，無法面面俱到，這是不應當吹毛求疵的。不過，這確實是以後類似 的史料片或論著值得留心的地方。(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於荷蘭萊頓大學，一九九八年元月補正於巴黎南 Cachan)【以上第 53 頁】

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

－－對當前爭議的幾點質疑

《北京之春》九五年六月號辟出大量篇幅，討論一九八九年五、六月在天安門廣場上所發生的學運內部情況，在六年後的今天，難能可貴。作為其中諸多事件的當 事人或見證人，我首先要感謝貴刊的努力。其次希望能將此探討深入下去，以便對未來中國的民主事業總結出一些經驗和教訓，好讓中國人不再在一個坑裡跌兩跤。 這裡，謹就一些基本史實作一澄清。

(一)關於柴玲錄影帶的三條線索

六月三日，在貴社主辦的討論會上，我指出柴玲錄影帶(簡稱「遺言」，作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有三條內在線索，而柴玲只明說了一條：求生的意志。

這一條線索直接與民主自由的理念相聯。民主與自由，不是求死，而是求生，是爭取生命【以上第 54 頁】更 加充實，更有尊嚴。柴玲在絕食前唸的《絕食書》不知激發了多少人的崇高情感。當中，一句話—「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柴玲曾在許多場合，包 括「遺言」錄像中，一再重複，當年聽柴玲這些話而落淚的，不計其數；今天，卻有人將柴玲的話前後拼接，論證她是「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天下之大，無奇 不有。只要看過錄像全文，聽她用那麼大篇幅談自己的成長過程，談父母、家庭，談與便衣交談的情況，談她不甘於十七年

的「反革命」刑期……自然對此線索了 然。

這一條線索直接與民主自由的理念相聯。民主與自由，不是求死，而是求生，是爭取生命【以上第 54 頁】更 加充實，更有尊嚴。柴玲在絕食前唸的《絕食書》不知激發了多少人的崇高情感。當中，一句話－－「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柴玲曾在許多場合，包 括「遺言」錄像中，一再重複，當年聽柴玲這些話而落淚的，不計其數；今天，卻有人將柴玲的話前後拼接，論證她是「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天下之大，無奇 不有。只要看過錄像全文，聽她用那麼大篇幅談自己的成長過程，談父母、家庭，談與便衣交談的情況，談她不甘於十七年的「反革命」刑期……自然對此線索了 然。

（二）「期待流血」與「掌握權力」

第二條線索柴玲沒說清楚：廣場上的奪權壓力。其實，柴玲「期待流血」指的正是這個情況：高壓之下，內部才會更加團結。六四凌晨，屠城之後，學生撤離廣場 的那一刻，劉曉波對柴玲說：「吾爾開希不是個東西，還是指揮部不錯。」柴玲後來，念念於斯，認為六三之夜，終於達成了廣泛的團結。

因為，就在一周前，即作「遺言」錄像的頭一天，五□二七「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劉曉波還竭力保舉吾爾開希作「人民發言人」－－「中國的瓦文薩」，欲形 成另一個代表整個運動的最高權力。而吾爾開希則一直力圖掌握運動最高權力。比如沈彤在九一年巴黎會議上回憶，五□一九下午在統戰部復食，氣氛活躍，「開希 踢碎了三個暖壺。就在這時，開希突然宣佈成立廣場【以上第 55 頁】總指 揮部，總指揮全局。我問這總指揮部幹什麼？開希就說：我當總指揮。我說具體怎麼和絕食團協調呢？開希就說：我當總指揮。我說下一步成立總指揮部，怎麼組織 撤離呢？開希說：我當總指揮。回答了我三句。所以在此情況下，大家高高興興地去廣場，邊走邊在路上說，一定要停止絕食，最擔心絕食團不同意。」（《回顧與 反思》二零三頁）因此，在五□二七聯席會議上，開希還嫌劉曉波的褒獎不力，甚至說出他最有「個人魅力」，最有「知名度」云云，來爭取作「中國的瓦文薩」。

因為，就在一周前，即作 「遺言」錄像的頭一天，五□二七「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劉曉波還竭力保舉吾爾開希作「人民發言人」—「中國的瓦文薩」，欲形成另一個代表整個運動的最 高權力。而吾爾開希則一直力圖掌握運動最高權力。比如沈彤在九一年巴黎會議上回憶，五□一九下午在統戰部復食，氣氛活躍，「開希踢碎了三個暖壺。就在這 時，開希突然宣佈成立廣場【以上第 55 頁】總指揮部，總指揮全局。我問這總指揮部幹什麼？開希就說：我當總指揮。我說具體怎麼和絕食團協調 呢？開希就說：我當總指揮。我說下一步成立總指揮部，怎麼組織撤離呢？開希說：我當總指揮。回答了我三句。所以在此情況下，大家高高興興地去廣場，邊走邊 在路上說，一定要停止絕食，最擔心絕食團不同意。」(《回顧與反思》二零三頁)因此，在五□二七聯席會議上，開希還嫌劉曉波的褒獎不力，甚至說出他最有 「個人魅力」，最有「知名度」云云，來爭取作「中國的瓦文薩」。

會後，柴玲哭了，對我說，真沒想到，參加運動的「精英」和「領袖」竟有這許多私貨！第二天，柴玲在錄像中，說她不願將權力交給野心家，指的就是此事。可惜柴玲欲言又止，未將事情明說，反揹黑鍋。

奪權壓力的來源複雜又繁瑣，為外界難以想像。巴黎會議對此有較充分的討論(《回顧與反思》二七九－－二九〇頁)，而就在柴玲作錄像那天凌晨，還有一些外 高聯的同學「衝進學生廣播站，要找柴玲等北京學生領袖理論」(見《大公報》二十九日)。廣場後期的權力爭奪當時報刊有大量報導。其實，當時指揮部夾在撤與 不撤之間，是真正的「中間派」。

(三)「離開廣場」與「南下計劃」

第三條線索，柴玲更不能在錄像中明說，她準備去南方發動「聯省自治」。此議當時雖已【以上第 56 頁】有醞釀，但真要實施，卻是件十分有風險的事。比起留在廣場，萬人保護之中，不知危險多少倍。不知情的，以為柴玲說了「不會留在廣場」，便是「讓別人流血，而自己逃生」，未免小人之心。至於少數明知此計劃者，還要故意這麼推斷，真不知安了什麼心。

第三條線索，柴玲更不能在錄像中明說，她準備去南方發動「聯省自治」。此議當時雖已【以上第 56 頁】有醞釀，但真要實施，卻是件十分有風險的事。比

起留在廣場，萬人保護之中，不知危險多少倍。不知情的，以為柴玲說了「不會留在廣場」，便是「讓別人流血，而自己逃生」，未免小人之心。至於少數明知此計劃者，還要故意這麼推斷，真不知安了什麼心。

那天下午，柴玲作完錄像，找到我，要求一道辭職南下，發動自治。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錄影的事－－當時柴玲說的就是「作了個遺言」－－她亦明白此舉之冒險， 亦證明她並非要抓權不放，南下亦多少出於無奈。我因為二個原因未同意：一、指揮部剛從北高聯接管廣場，廣場秩序尚未恢復，走不開，輕率離任更不負責，可能 導致廣場更加混亂；二、聯省自治乃政治以至軍事行為，可能偏離學運「不參與黨派之爭」及「非暴力」原則。柴玲見勸不走我，沒堅持，晚上還是在三百代表前請 求辭職，未准，此後一直在廣場，直至六四凌晨，帶領幾千同學撤出廣場，她與指揮部走在第一排。史跡昭然。哪裡是「讓別人流血，而自己逃生」！

給柴玲作錄像的是一個美國留學生(金培力)，事後寫了一個回憶，卡瑪見過其手稿，對我印證說，金培力作錄像時，就已經知道了南下計劃，是柴玲在採訪前對 他說的。當時情況已很緊張，卡瑪說，金培力是將磁帶綁在腿上，才躲過便衣的監視，傳到外面的。而複製的另一盤據另一當事人王力同學稱，確被公安局抄走。可 見，當時情勢，不許柴玲在錄影中說出她「不會留在廣場」的真正動機，導致今日之聚訟，亦柴玲之天真與不慎－－她實在不是個成熟的政治人物。

(四)見壞怎麼上？見好怎麼收？

【以上第 57 頁】

《北京之春》六月號胡平在《回首天安門》中稱：「在『八九民運反思』中，我對激進策略提出了分析與批評」， 對於廣場後期是否應當撤離，胡平說：「但即便到那時，『撤』很可能猶勝於『不撤』，『壞』總比『更壞』略好。有關這一問題，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細致的 分析，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翻閱。」

我「翻閱」了《反思》，大惑不解。

我們知道，世稱「民運理論家」的胡平，有一個著名的理論，說八九民運之失敗在於未能「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九〇年三月起，胡平在《中國之春》上發表系 列文章「八九民運的反思」，評述此論。當中，他還提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寫的文章，就叫「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他說，當時他已清醒地意識到，「所 謂戒嚴令，一定會採取極為殘酷的方式實行」。下面，具體看胡平當時怎麼說：

「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接著，九〇年五月胡平在文章中又解釋說：「在非暴力鬥爭 中，如同在暴力鬥爭中一樣，當情況緊急，迫不得已，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則不能勝利，而且到頭來仍免不了犧牲，只是徒然地使犧牲失去了它的最 可貴的價值。我當然不是說血肉之軀可以抵擋得過坦克機槍。但是，倘若屠夫(所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中國 之春》八十四期十五頁)。【以上第 58 頁】

問題是，若按胡平的策略，見壞就上，死守廣場，讓市民和學生與中共軍隊拼死到底，以期待「政局確實有可能出現劇變」，那麼，這不正是今天胡平所竭力撻伐的極端激進嗎？胡平在一九八九年的言論，不是比他今天所批判的「激進學生」還要激進千百倍嗎？我之不解，此其一。

其二，胡平早在六四屠殺前二周(戒嚴第二天)便已驚人準確地預見到八九民運將出現「血流成河」的「極為殘酷」的結局，其政治智商，怕是無出其右。柴玲說 「期待流血」，不過是期待在高壓下的內部團結，她能想像到的最殘酷的事情，充其量不過是「四五」那樣的「血流成河」，南韓那樣的「橡皮子彈」和對她的十七 年「反革命罪刑期」(見柴玲錄像)；而胡平預見的「血流成河」，有幾人在「六四」前想像得到呢？胡平「六四」前有如此殘酷的預見，又如此激進地主張「見壞 就上」，又憑什麼在「六四」之後去指摘別人的「激進」和政治道德呢？怪哉！怪哉！

其三，更有甚者，胡平一九八九年極端的激進，不僅停留在言論上，而且努力落實在行動中。據當時的民聯骨幹楊巍說(我的原文是：「據當時民聯的一位骨幹 說」－－作者按)，戒嚴後，民聯內部對胡平「見壞就上」的主張深為不安，要他以民聯主席的身份，向國內建議撤離廣場，卻遭到胡平的壓制。其一意孤行，正如 他在《反思》中所說，「然後我得知了劉曉波等四人計劃接力絕食，感到振奮。」(《中國之春》八十四期十五頁)而劉曉波據說也是民聯成員，且正好是從胡平所 在的紐約，在學運期間匆匆回國的。胡平在廣場後期，對「堅持不撤」的片面主張到底有沒有影響？有多大影響？這些史實，需民聯來澄清。

(以下兩段刊出時被刪去－－作者按)【以上第 59 頁】

其四，而今的胡平，卻完全倒向另一個極端，使出渾身解數，來口誅筆伐他冠以的「激進學生」。今天的《回首天 安門》，胡平只提「見好就收」，閉口不談「見壞就上」，把自己當年的言行「忘」得一乾二淨，反過頭來把自己當年極力堅持的激進主張栽到別人頭上，大加鞭 笞，這哪裡具備一個「民運理論家」的嚴謹？又哪裡具有一個「學者」的嚴肅？我百思不得其解。

其五，再說，「見好就收」，如何算「好」？又怎麼「收」？－－一個脫離實際的理論，比沒有理論還要糟糕。比如說，如果我們照著胡平當年的理論，在六三之 夜「見壞就上」，死守廣場，拚命到底，後果當如何，不是很明顯嗎？(胡平在《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對同學們沒有堅持到天亮大為不滿)胡文曰，四二七算 「好」，該「收」，那麼，五四復課時不也算「好」嗎？同學們不是「收」了嗎？「收」了之後，效果真的像胡平所推想的那麼理想嗎？再者，四二二在廣場上有十 幾萬大學生，粉碎了北京市「十條」，不也該算「好」嗎？這時如果徹底「收」了，又怎麼會有四二七大遊行的巨大勝利呢？至於五一六、五二八，更不知胡平的根 據是甚麼，是否可以全面闡述一下？

(五)對卡瑪質疑的質疑

卡瑪□韓丁在《北京之春》六月號的文章「對影片《移山》的幾點質疑」，引用了大量史料，來論證《移山》之偏頗，很具說服力。令我特別感動的是，卡

瑪是第一位仔細參考過九一年【以上第 60 頁】巴黎會議的學者。(有關巴黎會議記錄《回顧與反思》，參見序二)卡瑪五六年來，一直致力於拍攝《天安門》，參考了大量資料，可謂八九學運史的專家之一。因此，她在北春上撰文指出《移山》一片有不合史實之處，分量很重。

卡瑪□韓了在《北京之春》六月號的文章「對影片《移山》的幾點質疑」，引用了大量史料，來論證《移山》之偏頗，很具說服力。令我特別感動的是，卡

瑪是第一位仔細參考過九一年【以上第 60 頁】巴黎會議的學者。(有關巴黎會議記錄《回顧與反思》，參見序二)卡瑪五六年來，一直致力於拍攝《天安門》，參考了大量資料，可謂八九學運史的專家之一。因此，她在北春上撰文指出《移山》一片有不合史實之處，分量很重。

可惜的是，卡瑪引用的史料，也有靠不住的地方。

比如說，為了證明李祿用畫外音來配當時選舉場面是在抬高自己，卡瑪說：「事實上，影片中的畫面取自四月二十八日北大原官方研究生會的臨時代表大會的場 面」，「可見這次選舉是為產生與政府對話的代表機構而舉行的。從影片中所包含的學生發言的片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會議是根據原來研究生會的章程進行的，結 果是選出了一些新的代表機構成員。像這樣注重民主程序的選舉在一九八九年的運動中實屬罕見。而所有經過某種程序選舉出來的學運負責人在運動的過程中都先後 被主張更激烈行動的人取代了。尤其是李祿和柴玲，根本就不是由本校同學選舉產生的。」

卡瑪這段論證，問題很多。

第一，首先時間搞錯了，不是四月二十八日，而是三十日。

第二，不僅是為了對話，而且是對北大研究生會主席團作根本改造，具長期性。

第三，結果並非「選出了新的代表機構成員」，而是以北大籌委會中的研究生接替原研究生會主席團，比如王遲英、孔慶東、熊焱、王有才、郭海鋒、丁小平、張志勇和我。

為了說明前面這三點，我們先看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北大研究生會監委會的公告：【以上第 61 頁】

……鑒於目前形勢緊迫，決定今天上午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對現任研究生會主席團投信任票。代表證每個宿 舍一張，共三百零四張。上午九時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百四十四人。投票結果，同意罷免主席團的為二百四十一票，同意選舉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 會的研究生成員作為研究生會臨時主席團成員的贊成票二百九十九張。表決有效。要求校研究生會主席團在十二小時內(從上午十點起)向臨時主席團移交權力及有 關事項。(中共《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六十頁)。

印象中，當時有委托代投票，故投籌委會贊成票的，比實到代表多。

接下來，還有三個問題：

第四，「像這樣注重民主程序的選舉在一九八九年的運動中實屬罕見」，卡瑪當是漏了說：「據我所參考的資料。」首先，卡瑪不是當事人，其次，她是否參考了 全部史料，很難說；再次，即便她參考了全部史料，是否涵蓋整場運動，更難說；最後，就我的經歷而言，類似的選舉在一九八九年並不罕見，相反，「校園民主」 是學運的首要目標，比如北大四二五籌委會競選及其之前的各系籌委會的選舉、同日清華籌委會選舉、北高聯四三〇改選、北大籌委會五一改選……因此，卡瑪說 「罕見」，不知何據。

第五，接下一句，「所有經過某種程序選出來的學運負責人在運動的過程中都先後被主張更激烈行動的人取代了」，問題更大。更不知卡瑪憑什麼能說「所有」 －－卡瑪的「罕見」論與「所有」論，到底是根據什麼研究，憑藉什麼原始材料做出如此斷然的結論呢？那麼一大批堅持到運動最後的「經過某種程序選舉出來的學 運負責人」，怎麼能一筆勾銷呢？卡瑪是專家，此言必有【以上第62 頁】所本，懇此請教。

第五，接下一句，「所有 經過某種程序選出來的學運負責人在運動的過程中都先後被主張更激烈行動的人取代了」，問題更大。更不知卡瑪憑什麼能說「所有」——卡瑪的「罕見」論與「所 有」論，到底是根據什麼研究，憑藉什麼原始材料做出如此斷然的結論呢？那麼一大批堅持到運動最後的「經過某種程序選舉出來的學運負責人」，怎麼能一筆勾銷 呢？卡瑪是專家，此言必有【以上第 62 頁】所本，懇此請教。

第六，最後一句，「尤其是李祿和柴玲，根本就不是由本校同學選舉產生的」，更令我驚訝－－卡瑪作為八九學運史的專家，怎麼能不知當時情勢，而像一般人那 樣想當然呢？比如柴玲，絕非有些人想像的，「在運動後期才不知從什麼地方冒了出來」，正相反，柴玲恰是運動中最早受到外界注意的學運骨幹之一。例如，《香 港時報》與《大公報》四月二十四日皆引述「法新社北京二十三日電」：「北大新成立的學生聯合會發言人蔡玲（譯音）說……」。

其實，四月二十三日的北大籌委會上大家推選柴玲作召集人，只是由於我說：「她已不是北大學生」，大家才讓她作了秘書長。雖然柴玲當時是北師大研究生，但 之前四年她在北大本科，我們八八年結婚後，她也一直同我住在北大，因此，整個運動中，柴玲的群眾基礎主要在北大，決非一些記者臆想的那樣，「柴玲老提北 大，是虛榮。」運動中，特別在初期，哪能有那麼多名利虛榮？誰又想到運動會發展得如此驚天動地？當時那麼危險的情況下，只要你敢幹，能幹，大家自然推選 你，名利的東西，只是在後來運動大了，許多人以為要成功了，尤其到了海外有了現實利益，才跑出來的。用名利的眼光看八九學運，我只好說，對不起，這是小人 之心。

這些情況，我在巴黎會議及一些文章中已有說明，卡瑪作為學者、專家，

從這次她的「質疑」一文也可看出，她是詳細考查了大量史料的，尤其《回顧與反思》會 議記錄。那麼，卡瑪之引用史料，有如許問題，是她的學問沒有做到家，調查研究不深入，還是根本上就不客觀公允，明知故犯，同樣犯了她所批評的「主觀片面情 緒化」的毛病？我質疑。【以上第 63 頁】

(六)關於五月二十一日

從對五月二十一日史料引用的方式上，我更要質疑－－卡瑪用史料，是否客觀公允？胡平在引用第二手材料時是否太著急了？其根本的問題是：卡瑪與胡平，是否在故意割裂史實，混淆概念？

卡瑪引用《回顧與反思》二〇七、二〇八、二二三、二二四頁，張伯笠、柴玲、李祿的話，證明「在從上層渠道得到了軍隊準備屠城的消息後，他們決定讓指揮人員離開廣場躲藏起來。」(《北京之春》六月號五十七頁)

問題出在「指揮人員」一詞太含混，而實際上絕食團已隨兩天前的復食而結束。卡瑪徵引《回顧與反思》，用得那麼仔細，不可能沒有讀到．張伯笠那段話前，頭 一句便是：「五月二十日北京宣佈部分地區戒嚴以後，絕食團指揮部就基本上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高聯這時在廣場的介入是非常強的，王超華、鄭旭光、梁二，很 多人都在廣場。相對來講，絕食團指揮部在廣場就失去了控制的地位。」

要是卡瑪漏掉一次，尚有情可原，但在引用柴玲的話時，卡瑪又裁掉了類似的見證，且就在引用的那句話前，我便不能相信卡瑪是沒有看見了。柴玲前面那句話 是：「當時指揮部作出了暫時撤離的決定，認為當時絕食同學已經大部分送到學校和醫院裡去，絕食團的任務基本完成。」【以上第 64 頁】同樣，李祿在《回顧與反思》中也說：「我說，絕食已經結束了，我們的領導時期也已經結束了。」(二一九頁)卡瑪又沒看見嗎？還是明知故犯？

要是卡瑪漏掉一次，尚有 情可原，但在引用柴玲的話時，卡瑪又裁掉了類似的見證，且就在引用的那句話前，我便不能相信卡瑪是沒有看見了。柴玲前面那句話是：「當時指揮部作出了暫時 撤離的決定，認為當時絕食同學已經大部分送到學校和醫院裡去，絕食團的任務基本完成。」【以上第 64 頁】同樣，李祿在《回顧與反思》中也說：「我說，絕食已經結束了，我們的領導時期也已經結束了。」(二一九頁)卡瑪又沒看見嗎？還是明知故犯？

更有甚者，卡瑪接下來引用劉燕的話：「我和開希到了廣場指揮部之後，找人都找不著。」並以此來作對照，開希首先想到的不是保存自己這個「火種」。此證亦 問題多多。首先，五月二十一日，「廣場指揮部」根本還沒成立；其次，如果劉燕只是口誤，而是說沒有找到「絕食團指揮部」的話，也有問題，因為絕食

團指揮部 設在絕食團廣播站，劉燕和開希去的是「學運之聲」廣播站，不存在找不到指揮部人員的問題，劉燕最多只能說「找不到北高聯的常委」，因為「學運之聲」是北高 聯主要去的地方，而且，凌晨三四點，吾爾開希喊撤退前後，我就在絕食團廣播站，也沒見到她和開希來這邊。

最後，也最嚴重的是，卡瑪明知劉燕所稱的「廣場指揮部」不實－－這一點，卡瑪在一次電話中也對我承認了，說她引用時也注意到這個細節－－卻還要強行引 用，又不作註解，為了證明吾爾開希的英明，以與指揮部作對照，是一時不慎呢，還是偏向一方？－－無論如何，卡瑪用這種手法引用史料，選料是否公允，論證是 否客觀？我質疑。

卡瑪徵引第一手材料，還算明智，沒下太多武斷的結論，只是在選材與論證上有偏頗之嫌；胡平引用第二手材料，急於總結別人的「道德」與「責任」，問題就更大了。

例如《北京之春》六月號上，胡平說：「重要的是領袖不能擅離職守而獨自求生。其它組織的領袖，由於不負有領導廣場的同學們的直接責任，若各自躲避，倒並無不可；負有直接責任【以上第 65 頁】的 領袖們又怎麼能這樣做呢？」(五十三頁)此話不錯，但是，接著，胡平便提到五月二十一日那個決議，並指責柴玲「身為廣場示威者的直接領袖」，不該獨自求 生。此言差矣。看來，從九〇年三月起，胡平就從不放過任何機會，要把「讓別人流血，卻自己求生」的帽子，牢牢地扣在柴玲和指揮部的頭上，又在另一側面，去 證明吾爾開希與北高聯的合理性。

例如《北京之春》六月號上，胡平說：「重要的是領袖不能擅離職守而獨自求生。其它組織的領袖，由於不負有領導廣場的同學們的直接責任，若各自躲避，倒並無不可；負有直接責任【以上第 65 頁】的 領袖們又怎麼能這樣做呢？」(五十三頁)此話不錯，但是，接著，胡平便提到五月二十一日那個決議，並指責柴玲「身為廣場示威者的直接領袖」，不該獨自求 生。此言差矣。看來，從九〇年三月起，胡平就從不放過任何機會，要把「讓別人流血，卻自己求生」的帽子，牢牢地扣在柴玲和指揮部的頭上，又在另一側面，去 證明吾爾開希與北高聯的合理性。

可惜，這次胡平又搞錯了。其上述的論證，只說明他所採用的第二手材料一點也靠不住，說明胡平對八九學運所知有限，他正好把話說顛倒了－－因為，五月二十 一日的廣場上，柴玲和絕食團指揮部，早已隨著十九日的復食而不再是「廣場示威者的直接領袖」，而在當時夠得上這一稱號的，實際上正好是吾爾開希和北高聯， 而廣場指揮部之接任，是在五月二十三號。

(七)胡平與鬥爭哲學

胡平在五年前的《反思》中，也有同樣的混淆和顛倒，比如他說戒嚴之前應當「見好就收」，尤其五□一八與李鵬「對話」就應當收，並把帳算到指揮部頭上，說 沒能收是由於指揮部的阻撓。這也是顛倒的。實際上，正是絕食團指揮部(李祿和柴玲)在五□一九宣佈了復食，而我和北高聯的實際運作者王超華卻是在阻止復食 的。

王超華當時聽到復食時，立即在學運之聲廣播：「現在雖然有一部分同學說復食了，實際上還有很多同學在堅持絕食。大家一定要堅守，我們要和這些同學在一起，為了保證這些同學的【以上第 66 頁】生命健康，為了我們的目的還沒達到，我們不能撤。」（《回顧與反思》第二百零五頁）

王超華當時聽到復食時，立即在學運之聲廣播：「現在雖然有一部分同學說復食了，實際上還有很多同學在堅持絕食。大家一定要堅守，我們要和這些同學在一起，為了保證這些同學的【以上第 66 頁】生命健康，為了我們的目的還沒達到，我們不能撤。」（《回顧與反思》第二百零五頁）

因此，廣場上的情況，遠遠超出了胡平的想像，哪裡是「不撤=激進，撤=穩健」這麼簡單的公式可以涵蓋？依此公式，王超華算激進還是穩健？王丹在吾爾開希 喊撤退後十分鐘，當場宣佈開希喊撤，既不代表北高聯，也不代表絕食團。王丹是這兩個組織的骨幹，他又反對開希喊撤，那麼王丹算是激進還是穩健？最傾向於堅 守廣場的外高聯主席連勝德，卻在六一早晨開記者會宣佈撤，也該算穩健派嘍！

胡平一心一意要在八九學運中尋找「激進派」和「穩健派」的決然對立，客觀上是在學運骨幹中製造分裂與敵對，是以為大家都有深重的名利心和懼怕擔責任，再用一種斷然的二分法來形成二元對立，從理論的深處講，並沒有跳出共產黨的「鬥爭哲學」，望胡平深思，望八九同學自重。

其實，八九學運一點也不像胡平所用的二分法那麼簡單。比如王丹，該分到哪一邊呢？又如我，雖在指揮部，之前也曾是北高聯的主席，又該分到哪一邊呢？王超 華一直在北高聯，又真是與吾爾開希意見一致嗎？要知道，王超華最初通過北大籌委會去北高聯，正是由於柴玲在北大籌委會的引薦；而四月二十九日超華把我從北 大叫去北高聯，也明說要我以北大常委身份換下開希，而且第二天改選果真換了下來，直到五月六日，我辭職復課。……

這些情況，希望胡平先生在深入調查研究之後，再來作總結不遲。此一諫胡平。【以上第 67 頁】

(八)四諫胡平

除了胡平二分法的問題以外，我對胡平的史證方法還有三點質疑：

第二，「歷史假設」問題。對歷史能否作假設來展開推論，史學界多取否定或懷疑態度。例如當代知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六四」採訪時，便斷然否定了對歷史的假定的方法，特別是對「六四」的其它歷史可能性的假定。

然而，胡平則向來以歷史假定或假想為依據，來作推論和總結。如其五、六年前說「倘若屠殺(所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是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 現劇變」，因此在當時「見壞就上」才正確。又如今年他又說：「撤」很可能猶勝於「不撤」，因為「壞」總比「更壞」略好。並由此來論證廣場上要堅持不撤，便 是「激進」，應該負有責任。

但是，正是胡平自己的歷史假定方法，將他 自己陷入了矛盾的深淵。比如上述二句假定，便是自相矛盾的：胡平當年假定不撤才好，後來又假定撤了才好，結果是自毀長城，將他處心積慮構想出來的一套「見 好就收，見壞就上」的理論，搞得連他自己也沒能自圓其說，不知該如何應用才好。

因此，對於歷史假定方法，若不是說絕對不可用，也小心為妙。此二諫胡平。

第三，「第二手材料」問題。胡平的理論，除了以歷史假定作空談與假想以外，還有另一面更嚴重的問題：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急於批評。【以上第 68 頁】

比如九〇年三月，「六四」還不到一年，我和柴玲還在國內逃亡，胡平便匆匆在《中國之春》上發表了他那篇漏洞 百出的《八九民運反思》。當中便對柴玲那個「遺言」作斷章取義的評論，乃今日「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之最初版本，是今日漸成氣候的聲討柴玲之始作俑者。 然而，胡平那麼早引用柴玲的話，卻從來沒有看過柴玲的錄像本身！甚至連柴玲和任何指揮部成員，胡平也沒有對他立論之論據作過任何求證。這是今年六月三日 《北京之春》主辦的討論會上，我當眾問知的。

胡平如果九〇年找不到我們也罷了(當時李祿其實也在紐約)，九二年胡平又將該文放進其巨著《中國民運反思》一書中，並在序言中稱他在出版前「又重新檢查 了一遍，並糾正了原先排印中的一些錯誤，對文章內容未作修改。」依然對其論據之求證毫不放在心上。而那時柴玲就在離紐約不遠的普林斯頓！

而五年後的今天，胡平在《回首天安門》一文中大肆渲染柴玲「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堅持九〇年《反思》一文的論證，對其論證方法還認為「談不上『斷章 取義』」，「至少算不上什麼大毛病」，也依然在發文前不去向當事人求證，那麼，作為學者，胡平是否應該更加嚴肅一點呢？作為「民運理論家」是否應該更嚴謹 一點呢？此三諫胡平。

第四，其實，最令我為海外民運捏一把汗的是胡平 的功利意識。胡平在《反思》中，反覆強調「民運應有強烈的功利意識」，「沒有這種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們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 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中國之春》八十三期十六頁)【以上第 69 頁】

恰恰正是這種現實功利意識，這種政治化的總結歷史之指導思想，導致了《反思》一文的匆促上馬，也致使該文漏洞 百出，而至今還貽害大方。這一指導思想，從胡文一開篇便是赤裸裸的，他說，雖然運動的許多重大事實尚未弄清，缺乏足夠的第一手資料，「然而，作為一場現實 運動的投入者，我們有必要及時地對這場運動作出我們的回顧。」胡平對八九民運(尤其對學運)能作多少回顧，又作了多少，很難說，他實質上作的，恰是總結， 而且是歷史的總結，這在《中國民

運反思》一書的封面文字中，一目了然：「……我們必須要有自己書寫的歷史。」

要自己書寫歷史，野心也太大了一點，這是以前皇帝想做也沒有做到的。而胡平有此雄心，可見其「現實功利」與「政治」了。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太史公 史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二十四史，皆述前而戒後，沒見過要「自己書寫歷史」的。於是，我愕然，在現代「黨史」、「派史」之後，竟然見識了民運理論家 「自己書寫的歷史」！

我想，我夠不上「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也不懂怎麼「搞政治」，我只希望一條－－實事求是。此四諫胡平。

（九）三點倡議

因此，我建議：

一、適時召集一個討論會，對柴玲錄像、李祿《移山》、卡瑪《天安門》作一深入的探討,【以上第 70 頁】由當事人和學者等諸方共同以嚴謹的態度盡可能地對一九八九年的歷史作些澄清和深入核實。此會建議由《北京之春》發起和主持。

一、適時召集一個討論會，對柴玲錄像、李祿《移山》、卡瑪《天安門》作一深入的探討,【以上第 70 頁】由當事人和學者等諸方共同以嚴謹的態度盡可能地對一九八九年的歷史作些澄清和深入核實。此會建議由《北京之春》發起和主持。

二、民運團體成立長期的歷史調查機構，長期作下去，至少可以廣泛收集「六四」死難者的情況，及一九八九年的一些關鍵史實。

三、希望社會各界關注八九學生對史實的整理工作，並予應有的支持。最富歷史諷刺意味的是，一九八九年捐給學生的全球上千萬美元的捐款，皆落到了形形色色 的非學生的政治團體手中，而九一年「巴黎會議」的八九學生只得到一九八九年捐款中來自全美學自聯轉交的幾千美元，連會議資料也無錢出版，最後由德國萊茵筆 會整理出版，竟只印了二、三百本（《回顧與反思》），且多由幾位德國同學捐助！

今年五月二十七日，全球三十位八九同學開電話會議，共同發起一個「八九檔案」的全球電腦網絡，收集八九史料的計劃，望慧者助之。我受大家信托，承擔其籌建工作，茲留下我的Ｅ－mail 地址：feng@ext.jussieu.fr 望有心者聯絡。

一九九五年六月八日作於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補正於巴黎

（作者按：九五年本文投給《北京之春》，胡平千方百計阻攔；七月號發表時又有刪節，尤其是第四節的其四與其五。一些詞句嚴重誤植，另外又將我沒有提到的 「楊巍」也增加進去，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曾再三去函要求更正與說明，

以便進一步與胡平作平等的討論，卻被置之不理。今據底稿補正。）【以上第 71 頁】

柴玲「遺言」之所指及其背景

要想弄清柴玲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八日的那篇錄像講話（下稱「遺言」），需得就以下三方面進行討論：

一、「遺言」之所指及其背景

二、廣場混亂的深層原因：

三、八九學運中的價值混亂。

下筆寫此文，心情很沉重，尤其讀了近一個月來「聯合報」系及「紐約時報」的報導與爭議，及「北京之春」六月號上的幾篇文章。本來一直希望這些複雜問題留 在八九學生及民運內部，待作深入全面的調查討論後，再向外界披露，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傷和內訌。現在看來，如果再不將我之所見公諸於眾，便會有另一方面 的危險：聽任謬誤不實之詞去誤導讀者，進而導致對整個八九民運之否定。生者有口，死者難辯，百年之後，何顏去見千百「六四」死難者？尤其在讀到胡平及吾爾 開希的文章之後，方痛下決心，以公開的形式，披露我對八九學運之所見所思。誠不得已，祈諒大方。【以上第 72 頁】

第一部分：相煎何太急－－「遺言」之所指及其背景

狼入羊群，饜饜而去。群羊懾於一隅，竟作窩裡鬥－－悲乎，相煎何急，至忘乎狼之洞外歟！

此正當年柴玲「遺言」之主調，亦吾今日之哀嘆。所不同者，唯當年乃窩裡爭權，而今則急於追究激怒狼大人之責任，忙著要獻上替罪之羔羊。

(一)事實與背景

最為外界所不知，或忽略者，有以下幾點：(一)柴玲錄像談話之「遺言」性質；(二)柴玲作此錄像時，已下決心辭職，去南方發動「聯省自治」；(三)作錄 像前二十四小時之內，柴玲連續遭受到幾方面的奪權壓力：外高聯、北高聯，尤其在五□二七「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劉曉波力舉吾爾開希為整個運動的「人民發 言人」－－「中國的瓦文薩」；(四)其實柴玲決非一意死守廣場，實際上那三天(廿六、廿七、廿八)她三次對三種撤離廣場或廣場外行動計劃極有興趣，贊同及 試圖推行，皆未成就而已；(五)廿八日柴玲得知中共已開始秘密逮捕，狼已叼羊，而廣場上一些人卻在忙於奪權，才發此悲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與「遺言」有關的背景情況還很多，如：(六)戒嚴八日，軍臨城下，全民截兵，李鵬政府繼【以上第 73 頁】續 無賴，企圖拖垮廣場同學，而胡績偉等人大常委三十六人聯名倡議召開人大緊急會議，罷免李鵬，且有幾省軍區未發電支持

李鵬政府；(七)當時廣場，氣氛緊張， 又僵持疲乏，連日謠傳「狼來了」，甚至於「暗殺團」已入廣場之類；(八)廣場秩序，越發失序，衛指揮部廣播站來的奪權「政變」、綁架，層出不窮；(九)當 時，柴玲已知政府人員正在廣場，大肆收買學生；(十)但是，廣場同學之主流意識—堅守廣場，則從未動搖，尤其廿六日凌晨三百高校代表投票，同意堅守者達 百分之九十七；(十一)當時的「流血」概念，與六四後所認識到的實際上的流血，相距甚遠。(十二)當時離開廣場，比留在廣場萬千同學保護之中，危險百倍。

與「遺言」有關的背景情況還很多，如：(六)戒嚴八日，軍臨城下，全民截兵，李鵬政府繼【以上第 73 頁】續 耍賴，企圖拖垮廣場同學，而胡績偉等人大常委三十六人聯名倡議召開人大緊急會議，罷免李鵬，且有幾省軍區未發電支持李鵬政府；(七)當時廣場，氣氛緊張， 又僵持疲乏，連日謠傳「狼來了」，甚至於「暗殺團」已入廣場之類；(八)廣場秩序，越發失序，衛指揮部廣播站來的奪權「政變」、綁架，層出不窮；(九)當 時，柴玲已知政府人員正在廣場，大肆收買學生；(十)但是，廣場同學之主流意識－－堅守廣場，則從未動搖，尤其廿六日凌晨三百高校代表投票，同意堅守者達 百分之九十七；(十一)當時的「流血」概念，與六四後所認識到的實際上的流血，相距甚遠。(十二)當時離開廣場，比留在廣場萬千同學保護之中，危險百倍。

以下逐一對這些背景事實作簡明介紹。

(一)關於「遺言」

到五月廿八日，留個遺言，在學運中早已不是新鮮事了。四□二七大遊行前夜，因為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之恐嚇言詞，許多同學已有留遺言之舉；五□一三大絕 食，數百絕食同學亦寫了遺書－－實際上，「絕食書」本身即有遺言性質：五月十二日晚，柴玲在北大「自由論壇」上，和王丹一道向同學們講完絕食計劃後，有一 位女生找到她說：「你們有沒有這種絕食書，好像是你們的遺言？」這才有「絕食書」的誕生。

因此在五□二八「遺言」裡，柴玲隨口引用了「絕食書」中大量的語句，如：「我們不是為了死而戰，是為了生而戰，因為民主不是一代人的事業」。「我們絕 食，是要看看政府的面孔，看看它是鎮壓還是不理睬；看看人民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希望」；「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以上第 74 頁】生 而戰，死亡不是我們的要求，死亡在期待永久的回聲—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

和國的天空！」「絕食書」在五月十三日中午，北大絕食隊伍出發前， 由柴玲在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唸出，聞者鮮有不落淚的。當時我正好在主持廣播站「自由論壇」，全文錄下「絕食書」錄音，在北大及後來廣場廣播站反覆播出，每次 我都會掉淚，如許多人一樣。五□二八「遺言」之所以是「遺言」，從形式上，第一，其開頭一句便是「我想這是我最後的幾句話了」，第二，整篇談話，柴玲一直 在流淚(其實在廣場上公開場合我從未見她哭，媒体中常傳其流淚，其弱弱的聲音，致使海外人士有些誤會)。再從內容實質上看，人們會問：那麼作為廣場指揮部總指揮的柴玲，在五月二十八日那麼緊張的時刻，何以有閒心作這麼一個長達一個半小時的『遺言』呢？」這就必須談到她在錄像中避而不談的「南下北上聯省自 治」計劃。

因此在五□二八「遺言」 裡，柴玲隨口引用了「絕食書」中大量的語句，如：「我們不是為了死而戰，是為了生而戰，因為民主不是一代人的事業」。「我們絕食，是要看看政府的面孔，看 看它是鎮壓還是不理睬；看看人民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希望」；「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以上第 74 頁】生而戰，死亡不是我們的要求，死亡 在期待永久的回聲－－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

國的天空！」「絕食書」在五月十三日中午，北大絕食隊伍出發前，由柴玲在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唸出， 聞者鮮有不落淚的。當時我正好在主持廣播站「自由論壇」，全文錄下「絕食書」錄音，在北大及後來廣場廣播站反覆播出，每次我都會掉淚，如許多人一樣。五□ 二八「遺言」之所以是「遺言」，從形式上，第一，其開頭一句便是「我想這是我最後的幾句話了」，第二，整篇談話，柴玲一直在流淚(其實在廣場上公開場合我 從未見她哭，媒体中常傳其流淚，其弱弱的聲音，致使海外人士有些誤會)。再從內容實質上看，人們會問：那麼作為廣場指揮部總指揮的柴玲，在五月二十八日那 麼緊張的時刻，何以有閒心作這麼一個長達一個半小時的『遺言』呢？」這就必須談到她在錄像中避而不談的「南下北上聯省自治」計劃。

（二）關於「南上北下」計劃

又稱「星火燎原」計劃，這是柴玲當時想離開廣場的直接動因。

那天下午，柴玲作完錄像後，立即找到我，要求我與她同行，離開廣場去南方，一道發動「聯省自治」。她當時感到廣場－－北京，若無全國支持，也獨樹難立， 我當時沒同意，一是廣場指揮部工作剛展開，脫不開身；二是覺得捲入政治太冒險，且甚至會有軍事行動，這與學運「民主啟蒙」，「不參與黨派之爭」，「和平非 暴力」的原則有偏離；第三，個人安全也難保障。

最後這一點，同現在一些人指責柴玲的論點，正好相反－－六年後，沒有經歷過一九八九年廣場上氣氛的人，怕是不太了解，當時最不危險的，反而就在廣場上，萬千同學的保護和千百記【以上第 75 頁】者關注之下。以為柴玲說了她「不會留在廣場」，便是偷生，實在是誤解。

最後這一點，同現在一些人指責柴玲的論點，正好相反——六年後，沒有經歷過一九八九年廣場上氣氛的人，怕是不太了解，當時最不危險的，反而就在廣場上，萬千同學的保護和千百記【以上第 75 頁】者關注之下。以為柴玲說了她「不會留在廣場」，便是偷生，實在是誤解。

至今，我還不覺得當時柴玲去南方發動「聯省自治」是明智之舉，但是，這並不是說「聯省自治」在當時絕對是幻想。這個計劃的形成過程，我不清楚，不過，當 與北大提的「空校計劃」有關。當時的大背景是，戒嚴已數日，胡績偉等數十名人大常委聯名要求召開人大緊急會義以取消戒嚴，罷免李鵬，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有 幾個省和軍區對戒嚴遲遲未發電支持，因此，當時包括柴玲在內的許多同學，希望通過外省，尤其是南方幾省的支持，來維護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大旗，並非一點道理沒有。實際上，據唐柏橋介紹，湖南一些軍政要人確已在五月底主動與學生聯絡，準備六月六日宣佈湖南自治－－唐柏橋至今存有當時軍方起草的宣言－－ 「湖南應當愛國自治」。好多事情，不便現在公開，但一些人還沒弄清事實之前，便匆匆為六四找替罪羊，真是相煎何太急！

(三)關於五□二七聯席會議

促使柴玲想辭職離開廣場的第二個直接原因，來自頭一天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大致是這樣：從上午十一點至下午五點，主要討論「十點聲明」和劉曉波的一個建議。

「十點聲明」草案本來提議：「廣場靜坐堅持到六月二十日。」我向大家介紹說，二十四日北高聯只給廣場留下九千元人民幣，這兩天都是在賒賬買麵包維持廣場 幾萬張嘴，要堅持到六二〇，技術上不可能。是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才通過了五月三十日「勝利大撤退」方案。(兩天後聯席會議又通過維持原議)。【以上第 76 頁】

對「十點聲明」，除了覺得學者們咬文嚼字推敲來推敲去，心裡有點急以外，我和柴玲並無反感。問題出在劉曉波推薦吾爾開希作「人民發言人」的那個建議上。

劉曉波用了很長時間，根據其「民間制衡」及「英雄凝聚力」的高論，說明為甚麼當前中國的民運需要一位「中國的瓦文薩」，然後，便列舉了許多理由，來證明 開希是「中國瓦文薩」的最佳人選(或是非開希莫屬)。劉曉波已為代表整個中國民運的這最高位置想好了一個名稱－－「人民發言人」。

劉曉波講的那一大篇話，其中推論的細節我記不太清了，但是，開希的話卻令人難忘。

開希在劉曉波的一堆溢美詞之後，似乎並不太滿意，便直接了當地對大家說：我之所以自認能勝任「人民發言人」一職，是因為在整個運動的領袖中，我最有個人魅力，在媒体中有最高的知名度。

有多少人被吾爾開希「個人魅力」自白所震驚，我不知道，當時一片寂靜。我打破了大家的沉默，向大家提了二點：一、人民發言人必須要有起碼的政治素養和基本的社會、法律知識；二、他必須具備遵守組織約束的習慣，且能受組織制約。

開希馬上對號入座，說政治素養和法律知識，可以從劉曉波這樣的老師那裡學習，而他的吸收力是很強的；至於組織約束，他保證以後不再拿著話筒，以組織的名義說自己的話。

當時已是下午五點，我和柴玲以退場來反對劉曉波的建議，會亦到此散了。會後，柴玲哭了，對我說，她對中國太悲哀，沒想到在爭民主的人中，還有這一類的人。【以上第 77 頁】

記得與會者有：王丹、包遵信、劉曉波、開希、老木、張倫、梁二、柴玲與我。

當時不認識的有王軍濤，陳子明，劉剛(？)，甘陽(張倫說是他起草的「十點聲明」)，還有市民，工人代表。

(四)相煎何太急？

促使柴玲留「遺言」的第三個原因，似乎也不為外界所知或重視：當天中共已下手秘密逮捕了于浩成等知識分子。「遺言」中明確提到這一點，並說是「兩位知識界的朋友」向她透露的。「他們兩人說，我們要撤了，因為我們有個使命，我們要寫本書，讓全世界都知道。」

于浩成當時是否被捕，我不得而知。不過，這一訊息促使柴玲留「遺書」的內在邏輯是，狼已叼羊，羊還在窩裡鬥，嗚呼哀哉！相煎何急！

除了五□二七聯席會上與劉曉波、吾爾開希的衝突外，窩裡鬥最明顯的例證，

莫過於六一凌晨對柴玲和我的綁架，此事大家都知道。不過，大家不一定知道六一綁 架只是廣場上無數次綁架、奪權、「政變」之一例。比如，柴玲留「遺言」的那天凌晨，外高聯的一些同學又衝進指揮部，「找柴玲理論」，認為她贊同五月三十日 撤出廣場，是對廣場同學的出賣。這都還是較大的內訌，當時報紙都有報導(大公報二十九日頭版)。大大小小的「政變」，每天總得二、三次，指揮部許多人都遭 到過綁架(「回顧與反思」二七九頁)。

近來，在民運內部，又有人高喊「審判柴玲」，我真悲哀，直想到曹植那首七步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上第 78 頁】

(五)柴玲絕不願撤出廣場嗎？

其實，與現在許多人的想像差很遠的是柴玲並非非要固執在廣場上不可的。外高聯的一些同學對她不滿，也正好有此因素。就我親身經歷過的，柴玲至少有三次對 撤離廣場或非廣場活動表示贊同或試圖實施。五□二七會上的「五三〇大撤退」和五□二八「南下」計劃，上面已提及，現再舉一例－－五□二六「空校計劃」。

二十六日下午，北大籌委會主席楊濤，當時也是北高聯負責人，來到廣場找到柴玲與我。幾人在一輛麵包車上開會，他提出了一套新穎的觀點：群眾運動是情緒化 的運動，只能用情緒化的方式加以引導，這就需要找對興奮點。比如，絕食就是一次成功的例子。因此，現在為了將廣場的局面有一個良好的收場，北大籌委會提出 「全國空校」計劃，讓廣場同學各回家鄉，在校同學也離校回家，全國自然形成全面無限期罷課的局面，迫使政府在強大壓力下讓步 。

我和柴玲當時都對「空校計劃」極有興趣，我還補充了一個技術細節：為了保證空校後學生組織依然存在，建議在空校之前，先約定好，比如每個週日上午十點，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市中心廣場集會。

因此，當時廣場上主要不是撤與不撤的問題，而是怎麼撤的問題。

(六)柴玲為甚麼「期待流血」？

柴玲「遺言」中說不會留在廣場，主要是隱含不能說的南下聯省自治計劃，比留在廣場更危險；也是對廣場上形形色色的奪權活動厭倦。那麼，柴玲又為甚麼說到「期待流血」呢？【以上第 79 頁】

首先，要澄清一點，當時柴玲能想像到的「流血」，怕是與現在大家頭腦裡充滿六四屠殺鏡頭的「流血」，相距甚 遠。大家不要用六四後的眼光，來看六四前的事。記得八八年南韓學生運動吃緊，北京中央電視台幾乎天天都有軍警用橡皮子彈、催淚瓦斯之類來驅散學生的鏡頭。 六四屠殺時，許多人挨了槍彈，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呢！

其次，廣場上「流血」之類的詞亦見慣不驚，可以當時照片為證。比如，北師大同學的絕食車上，橫幅斗大的幾個字：「血濺中華」。甚至大家尊敬的學者嚴家其老師，也在民主大學典禮上說：將用鮮血和生命來捍衛民主事業。（白夢有當時的磁帶。）

第三，其實，柴玲講「期待流血」有其隱含的內在線索，她真正要說的是對窩裡鬥的悲哀－－只有中共拿起屠刀，我們內部才會團結起來。

對這一點，我得多說幾句。

前文已談到，劉曉波推吾爾開希作「人民發言人」，外高聯等一部分同學的奪權活動，均使柴玲傷心不已。因此，她才有「只有流血，才能團結」之忿。實

際上， 當六四凌晨五點，指揮部宣佈撤時，鬆了一口氣的劉曉波便馬上對柴玲說：「看來還是指揮部不錯，吾爾開希真不是個東西。」當時柴玲很感安慰，一直將之視為最 後大團結的場面。順便說一句，劉曉波、侯德健都不相信吾爾開希總在關鍵時候昏倒，是真有病（「開放」九〇年七月），故劉有此語。但是劉曉波後來卻將這話栽 在柴玲口裡，故此澄清。

（七）柴玲「遺言」的責任與局限

【以上第 80 頁】

但是，柴玲也不是沒有責任。其「遺言」中的話，確實太容易引人誤解。如果沒有前面那麼些背景事實，誰看了心中 也難免打鼓。她太不懂政治，太不會用政治套話，太天真，太坦白，太直接同時又太含混：她錄像講話本來有三個線索，卻只講明了一個：「人性與求生」。另一個 線索－－冒險南下的決定，總隱而不見：再一個線索－－對窩裡鬥的悲傷，也未言明。結果便形成了邏輯上的大混亂，不知道三個線索的，讀完「遺言」之後，自然 極易誤會。

柴玲另一個責任是，她將錄影的性質也混淆了－－這是我在遺言二字上加引號的原因－－她將「遺言」與採訪混為一談，而她留了「遺言」卻沒真去南方，六四又未傷及她，錄影卻很快便公佈出來，使這篇「遺言」不成其「遺言」更是引人誤解了。

柴玲「遺言」中的許多觀點，確實值得商榷。比如，本來是對幾個人的悲哀，她可以很容易地上升到對整個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失望，混淆起來，令人不明白其真 正之所指。其實，這也是大氣候使然，很少人能夠擺脫當時在國內的認識局限－－我們太把「中共文化」當作中國文化本身了。耐人尋味的是，柴玲內心真正失望的 是劉曉波這一類人，而其言詞，卻是在責備中國文化；而在責備中國文化方面，卻正好是劉曉波的專長－－在罵中國人與中國文化方面，誰也沒有劉曉波走得更遠 －－他甚至希望中國由西方殖民三百年！

柴玲當時的局限，其實也是我們許多人的局限，比如我運動前也真以為中國沒希望了，要「解散」中國，「開除球籍」了。「黃色文明」必然由「藍色文明」來取代－－其實，我那時連四書都沒讀過，哪裡知道甚麼是「黃色文明」？【以上第 81 頁】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於巴黎。篇幅有限，本部分評議，第二三部分，待日後再說：二、廣場混亂的深層原因；三、八九學運中的價值混亂。）【以上第 82 頁】

廣場上的「逃亡費」

幾個月來，動筆撰寫幾次學生運動的回憶。偶然讀到香港《解放》雜誌（即《開放》）一九八九年七期上的一篇文章，叫《榮譽不能盡歸柴玲－－談學運新聞要講 真話》，這才知道，對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凌晨，天安門廣場上所發生的綁架，還有這樣的報導。也才明白，為甚麼去年四月，我們逃出大陸之後，還有一些香港 人質問柴玲：廣場上的捐款問題，為甚麼還沒有說清楚？

鑒於我是少數幾個當事人之一，有必要向公眾作個交待，為柴玲的「榮譽」辯護。藉此也向大家說明，當時的「學運新聞」，是怎樣誤導了公眾，又為何講不出「真話」。

兩年後的今天，再舊事重提，不僅是為了澄清事實，以正視聽，也是為了將來，希望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使得在下一次的大陸風雲中，各方都有個前車之鑒。

一、「綁架錄音」基本屬實

記者在前文中提到，綁架事件的主謀，北京農業工程大學的學生王文(現居法國)，向她出示【以上第 83 頁】一盤錄音帶。她在文中作了摘錄，內容包括柴玲介紹五月二十一日「決定七名常委每人分發一千元「保命費」，以作『保護火種』之用」的經過，及其他幾個常委講述各自一千元的去向。以此為根據，記者認為柴玲是「訛稱被綁架」、「並指可能是政府收買學生領袖，實在是誤導公眾」。

記者在前文中提到，綁架事件的主謀，北京農業工程大學的學生王文(現居法國)，向她出示【以上第 83 頁】一盤錄音帶。她在文中作了摘錄，內容包括柴玲介紹五月二十一日「決定七名常委每人分發一千元「保命費」，以作『保護火種』之用」的經過，及其他幾個常委講述各自一千元的去向。以此為根據，記者認為柴玲是「訛稱被綁架」、「並指可能是政府收買學生領袖，實在是誤導公眾」。

事件經過如下：

六月一日凌晨四點左右，王文等四、五個人闖入我們休息的小帳篷裡，用毛巾堵嘴，並反剪雙手。我們奮力反抗，驚醒了周圍的同學，才得以解脫。後來才發現， 在我們帳篷保護我們的糾察隊長，此前已被人灌醉。同時又有人約李錄(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負責糾察等)在凌晨兩點去廣場外某處去接受一筆捐款，企圖將他騙 離廣場。

綁架未成，趕來的同學又多，王文等人反被帶到廣場指揮部總部 的大帳中，同時叫來李錄等指揮部成員。這時，王文等人還想狡辯，於是以「逃亡費」為藉口，質問柴玲。這就是記者所得到的錄音帶開始記錄的時間。實際上是郭 海峰(北高聯秘書，現被判入獄五年)用袖珍錄音機偷錄的，被我發現，當即指出，他答應不對外傳。從他當時的態度來看，很有可能他也參與了綁架密謀。

與綁架事件還有關連的，是當時廣場上的廣播台和外界聯繫的唯一的一條電話線，都被人剪斷。早晨七點，外高聯的總指揮連勝德在廣場上宣佈大撤退，

並欲召集 記者會，幸為外高聯同學所阻，當即罷免了他的總指揮職務。此前一、二天，有個自稱「代表李鵬和政治局」的國務院辦公室的秘書，到廣場指揮部來對我們說：要 是能將請願同學撤出廣場，你們就是國家的功臣；【以上第 84 頁】要是覺得有困難，我們在廣場上還有不少人隨時可以聽從你們的調遣。同時，我們得知，這個國辦秘書為外高聯的領袖在北京飯店包了房間，而從那時起，連勝德便在外高聯遊說退場。（此事也是我們不願撤退出廣場的一個重要原因。）。

與綁架事件還有關連 的，是當時廣場上的廣播台和外界聯繫的唯一的一條電話線，都被人剪斷。早晨七點，外高聯的總指揮連勝德在廣場上宣佈大撤退，並欲召集記者會，幸為外高聯同 學所阻，當即罷免了他的總指揮職務。此前一、二天，有個自稱「代表李鵬和政治局」的國務院辦公室的秘書，到廣場指揮部來對我們說：要是能將請願同學撤出廣 場，你們就是國家的功臣；【以上第 84 頁】要是覺得有困難，我們在廣場上還有不少人隨時可以聽從你們的調遣。同時，我們得知，這個國辦秘書為外高聯的領袖在北京飯店包了房間，而從那時起，連勝德便在外高聯遊說退場。（此事也是我們不願撤退出廣場的一個重要原因。）。

鑒於此，我們在當天上午召集了一個記者會，說明廣場上已出現的危機和潛伏著的危機。當時我們也意識到這樣將學生內部矛盾公開化，成為輿論焦點，會帶來許 多困擾，但是，如果我們不及時地揭露政府的陰謀，後果更嚴重。權衡利弊，還是公開宣佈出來。當時，甚麼「綁架隊」、甚麼「暗殺團」，我們聽到不少，而同學 們沒有甚麼心理準備，也是記者們所不能設想的。

二、關於「表面堅守而實則開溜」－－「逃亡費」問題

這實在是個十分敏感的道義問題，當時一直困擾著學生骨幹層。比如，六四屠城之後，我只敢為廣場指揮部的全部成員們留下五千元人民幣。而李錄在一種類似負疚的神情之中，只要了二百元。

下面，我將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分發「逃亡費」的經過作個交待，是非問題，留待大家評說。

這筆經費，本質上應該叫做「活動經費」，且帶有分散保存的性質。柴玲稱其為「逃亡費」、「保命費」，不過為了方便而已（「活動經費」一詞在大陸是貶意，

讓人聯想到「特務」、「壞蛋」之類），不幸被作為焦點問題。【以上第 85 頁】

當時的情形，是第三晚喊 「狼來了」，各路情報都斷言軍隊在凌晨五點清場。這時的「絕食團指揮部」既不是廣場上的主角（已讓位於北高聯），二天前的復食，又等於宣告了它的結束。但 絕食團還有一小筆錢（一萬左右，我不清楚。大筆的捐款可能已經送到北大籌委會去了）。在軍隊鎮壓之後會是甚麼一種情況，並不難預料－－我們當時自然不願去 等著坐牢。於是，李錄說要準備轉入地下，柴玲則說要「保存民主火種」。實際上，真正離開了廣場、離開了北京的，只有我一個。我是在凌晨四點，吾爾開希喊撤 之後走的。我認真地去執行地下鬥爭計劃，甚至在外地的一天時間中，擬定了設置秘密電台的地點，還同當地學生組織的首領們作過交流。要是沒錢，這些活動能行 嗎？難道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參加運動，就是為了這一千元錢？

三、關於「鮮為人知的幾個事實」

文中提到一位香港同學旁聽了北高聯的一次會議，「常委張志清在會上提出，封從德從北高聯提取十萬元到廣場指揮部使用，但到指揮部則只報數一萬，被揭發後才交出其餘九萬。……」

我不知這是從哪一級出來的誤會。實際上，我是「逼」著北高聯交出這十萬元捐款給廣場同學用的。因為北高聯藉口已將錢分藏在私人處，難於按二十七日「首都 各界聯席會議」上的承諾交給我，才由北大籌委會先墊上三萬元由我帶回廣場，後來七萬元是否送到廣場，不得而知。卻根本沒有甚麼十萬變一萬之說。【以上第 86 頁】

將十幾萬的數字的標點移了一位變一萬多之事，倒有所聞，但不是我。

關於柴玲「手諭」和我接任總指揮之事，更說明這位記者不了解情況，犯了移花接木的毛病。

我之「履行總指揮之職」，並非由柴玲「辭職」，更不是憑甚麼「手諭」，而是應絕食團指揮部郭海峰（？）等人之邀，代理柴玲主持一晚（五月十六日）的會議。當時柴玲已經昏倒入院。

至於那個「手諭」，倒是存在，由李錄在記者會上唸出，時間卻在五月二十九日。當時王丹也為我寫過一份。實質上是「信任狀」，原因是當時從海外送捐款的 人，只認他倆，卻不願將錢交給我這個「廣場指揮部財政、後勤責任常委」。凡真正「掌握內情」，了解我在學生運動中的作用，又對人性中的自尊有點感覺的人， 不難理解當時我是何等心情。若不是廣場上的財政吃緊，賒著賬買麵包，誰願作此舉？

關於「吾爾開希所稱」，五月二十七日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柴玲和我提議二十八日撤出廣場，會後卻因李錄的阻止而改口，若是開希真這麼說，就更加暴露了 他在學運中一直搞不懂所謂「民主程序」為何物。就是否在當時撤出廣場一事來說，「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對廣場指揮部只有建議權，而決策權甚至不在廣場指揮部 －－這樣的決定必須經由「廣場各校代表聯席會議」上三百多人表決方能生效，而每個代表投票之前，都得先回去徵求本校同學們的意見。

開希不懂(或忽視了)民主程序，最明顯、也最壞事的，是在五月十八日，李鵬與學生的座談「對話」會上。他竟然說「廣場上現在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百分之九十九服從零點一－－【以上第 87 頁】如果有一個絕食同學不離開廣場，廣場上的其他幾千個絕食同學也不會離開。……」

開希不懂(或忽視了)民主程序，最明顯、也最壞事的，是在五月十八日，李鵬與學生的座談「對話」會上。他竟然說「廣場上現在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百分之九十九服從零點一—【以上第 87 頁】如果有一個絕食同學不離開廣場，廣場上的其他幾千個絕食同學也不會離開。……」

我和柴玲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建議撤離的時間，不是二十七日，而是三十日。諸如此類的細節錯誤，說明該記者並非其自稱的「掌握內情的人」，至少不全面和可靠。

四、為柴玲辯－－另幾個鮮為人知的事實

柴玲在運動初期便在北大籌委會起過重要作用，並非有人所說的那樣，「是在廣場後期才不知從甚麼地方冒了出來，是個只會哭的小女孩。」四月二十三日的北大 籌委會上，大家甚至要推選她作召集人，只是因為我以「不是北大同學」為由，大家才讓她當了北大籌委會的秘書長。而我個人認為，秘書處是北大籌委會最為成功 的一個部門。「香港時報」與「大公報」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四日皆轉引法新社電稱：「北大新成立的學生聯合會發言人蔡玲(譯音)說……。」

柴玲名義上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但實際上她更應該說是個北大學生。當時，她到北師大才一年多，此前四年本科都在北大；而這一年的研究生課程又不多，她 多是在我們安在北大南門附近的家裡寫論文；因為我先加入北大籌委會，可以說她因為我的緣故，從一開始就在籌委會裡幫忙。

有記者稱柴玲「虛榮」，根據是她「總以北大學生自居」，實在是臆斷。

《絕食書》的起草人正是柴玲。在五月十三日上午起草，由北大作家班的白夢(現也在美國)【以上第 88 頁】補充潤色而成。此文堪稱一代青年之心聲，其思想之尖銳、感情之充沛、行文之優美，不知感動了多少熱血青年。任何人讀了，無不為之動容；幾乎所有關於八九民運的書刊，都有轉載。

《絕食書》的起草人正是柴玲。在五月十三日上午起草，由北大作家班的白夢(現也在美國)【以上第 88 頁】補充潤色而成。此文堪稱一代青年之心聲，其

思想之尖銳、感情之充沛、行文之優美，不知感動了多少熱血青年。任何人讀了，無不為之動容；幾乎所有關於八九民運的書刊，都有轉載。

五月十三日中午，她到我主持的北大籌委會廣播站來唸稿，我開始沒有注意，後來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其錄音帶，每遍我都落淚。我相信受此感動的，不在少數。北大響應絕食的同學，當天由四十人猛增到二百人。

但是，柴玲並沒有將自己的名字署在後面，甚至後來連北大也不提，註為「首都高校志願絕食同學」。其不居功如是。

去年四月，逃出大陸後，我也很少提及，礙於我們的關係。今天，藉此機會作個交代，也算了卻一樁心事。

柴玲是絕食的實際發起人之一，而她本人有慢性胃病。

照一般傳媒所載，絕食計劃是由吾爾開希等六人，於五月十二日，在一家飯店吃飯時想到的。但是，就我所知，柴玲實際上是在十一日晚或更早便在北大活動，在 她一幫「哥們兒」的宿舍裡商議絕食之事。我記得那晚她同我提及此事時，神情還頗調皮，說是可以偷偷藏點麵包甚麼的(當然，後來真絕食了，情緒與環境都是不 允許任何人作此苟且之舉的)。

而關於絕食的提議，北大在五月九日便有 「四十六樓研究生」的大字報首倡，十一日又有「二十五樓博士生」進一步倡導。十二日晚，柴玲和王丹在我主持的「自由論壇」上，面對數千同學作了絕食倡議。 十三日清早統計時只有四十人參加。上午柴玲宣讀《絕食書》，下午北大同【以上第 89 頁】學出南校門時，有二百人參加。這個變化，也同北高聯與北大籌委會最初反對絕食，這時變為默認、「理解」與支持有關。

而關於絕食的提議，北大 在五月九日便有「四十六樓研究生」的大字報首倡，十一日又有「二十五樓博士生」進一步倡導。十二日晚，柴玲和王丹在我主持的「自由論壇」上，面對數千同學 作了絕食倡議。十三日清早統計時只有四十人參加。上午柴玲宣讀《絕食書》，下午北大同【以上第 89 頁】學出南校門時，有二百人參加。這個變化，也同北高聯與北大籌委會最初反對絕食，這時變為默認、「理解」與支持有關。

當時，柴玲的胃病，除我之外，幾乎無人知曉。八八年四月，我陪她一道去北醫作胃鏡檢查，大夫說是「淺表性胃炎」。但我估計要嚴重得多：幾乎每月一次的周期性發作，且受情緒影響，一發作便是劇痛、嘔吐，吃不下東西。絕食期間，她至少兩次暈倒入院。

五、關於「學運新聞要講真話」

該位記者的許多觀點，我頗為贊同。諸如「運動主角是成千上萬、可敬可愛的北京學生和市民」，反對「偶像化」。對於「學運新聞」的失實與誇大，我也深惡痛 絕。這不光是甚麼「榮譽」問題，而是它提供的扭曲和片面報導，所給人的不實印象，成為大家評價六四的根據。而這些報導的背後，商業甚至政治功利的味道，更 是難聞。有個記者在評述吾爾開希的起落時，感慨地說：「新聞業是製造業、修補業和屠宰業！」這自然是激憤之言，卻不失為一種悲哀。

我認為，當時海外媒體的兩個最大的副效果，是捧開希和關於「廣場屠殺」的失實報導。當時記者不能作到如實、全面，除了運動和緊迫性以外，還有兩個原因： 一是記者不了解大陸人的心態，只注重明星(政府和學生骨幹層雙方的)，而忽視了民眾；一是在大陸人中，愛與記者打交道的，許多確有雜念。從這個意義上講， 該位記者是個真誠的受害者－－她所堅持的立論根據，【以上第 90 頁】

她不知並不可靠。

我認為，當時海外媒體的 兩個最大的副效果，是捧開希和關於「廣場屠殺」的失實報導。當時記者不能作到如實、全面，除了運動和緊迫性以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記者不了解大陸人的心 態，只注重明星(政府和學生骨幹層雙方的)，而忽視了民眾；一是在大陸人中，愛與記者打交道的，許多確有雜念。從這個意義上講，該位記者是個真誠的受害者 —她所堅持的立論根據，【以上第 90 頁】她不知並不可靠。

實際上，根據這樣的報導為立論依據，海外人士對八九民運的許多評價都有問題。這不光是歷史真相的問題，而是：下次怎麼辦？

有鑒於此，我決心將當時情形，無論美醜，逐一記錄。現已完成三十萬字初稿，敘述我所經歷的見聞與感覺，分出當時我個人局限下的真實感覺和後來逐步了解更多情況後的反思，希望對八九民運有個客觀公允的記載。

(作於一九九一年四月廿九日，法國 BAGNEUX 市，增訂於一九九八年元月十二日，法國 CACHAN 市)【以上第 91 頁】

《絕食書》的原文及緣起

(筆者九八年按:《絕食書》的作者到底應該是誰，目前尚無一致意見。本文對此有一定的責任，須向柴玲白夢致歉。本文作於九一年五月，我剛剛完成三十餘萬 字的備忘草稿不久，有感於《絕食書》對絕食運動的巨大作用，尤其是見到海外流傳的版本刪掉了極為關鍵的段落，正好人大一位于姓講師給了我一盤當年的錄音 帶，故此作一校訂與說明。當時我在巴黎，柴玲在美國，我們也剛剛宣佈分手不久；白夢也剛經香港逃到美國，故發表前未能與他們核對就趕在

二週年的時機寄給香 港《百姓》雜誌發表了。文中稱「柴玲起草，白夢潤色」，是按我當時的印象和李祿的自傳作的推斷，文章重點本不在此，故亦未細加推敲。不巧的是，白夢在香港 時已經寫了一份回憶給港支聯，說他是《絕食書》的作者。不同的的說法引起人們的關注，到同年七月，二人一道從美國來巴黎參加「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 會」，我才知道自己給他們帶來的困擾。二人加上張伯笠和我，四個當事人在會前討論過此事，沒作定論；會上擬定發言順序時，也沒專門提出這一問題。不意沈彤 在會上對柴玲提出質疑，分歧由此公開化（《回顧與反思》頁一一八－一二三）。平心而論，白夢與柴玲各自皆言之成理，二人的回憶也相差不遠，唯一的出入只在 於柴玲當時給白夢的草稿，是柴玲說的「一頁零兩行」還是白夢說的「幾行」（同上頁一二一）。柴玲基本上認同本文的提法，由她「起草，白夢拿去修改」以及 「總是說還有另外一個作者」（同上頁一一九）；白夢則認為那個草稿「不成文」故不能說是「潤色」，後來在許多文章中也一直堅持自己才是《絕食書》的作者。 此事竟成公案，我既自責不慎，又不無遺憾：合而相讓，本是美談；分而相【以上第 92 頁】爭，兩敗俱傷。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常常犯的毛病。

（筆者九八年按：《絕食 書》的作者到底應該是誰，目前尚無一致意見。本文對此有一定的責任，須向柴玲白夢致歉。本文作於九一年五月，我剛剛完成三十餘萬字的備忘草稿不久，有感於《絕食書》對絕食運動的巨大作用，尤其是見到海外流傳的版本刪掉了極為關鍵的段落，正好人大一位于姓講師給了我一盤當年的錄音帶，故此作一校訂與說明。當 時我在巴黎，柴玲在美國，我們也剛剛宣佈分手不久；白夢也剛經香港逃到美國，故發表前未能與他們核對就趕在二週年的時機寄給香港《百姓》雜誌發表了。文中 稱「柴玲起草，白夢潤色」，是按我當時的印象和李祿的自傳作的推斷，文章重點本不在此，故亦未細加推敲。不巧的是，白夢在香港時已經寫了一份回憶給港支 聯，說他是《絕食書》的作者。不同的的說法引起人們的關注，到同年七月，二人一道從美國來巴黎參加「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我才知道自己給他們 帶來的困擾。二人加上張伯笠和我，四個當事人在會前討論過此事，沒作定論；會上擬定發言順序時，也沒專門提出這一問題。不意沈彤在會上對柴玲提出質疑，分 歧由此公開化(《回顧與反思》頁一一八–一 二三)。平心而論，白夢與柴玲各自皆言之成理，二人的

回憶也相差不遠，唯一的出入只在於柴玲當時給白夢的草稿， 是柴玲說的「一頁零兩行」還是白夢說的「幾行」(同上頁一二一)。柴玲基本上認同本文的提法，由她「起草，白夢拿去修改」以及「總是說還有另外一個作者」(同上頁一一九)；白夢則認為那個草稿「不成文」故不能說是「潤色」，後來在許多文章中也一直堅持自己才是《絕食書》的作者。此事竟成公案，我既自責不 慎，又不無遺憾：合而相讓，本是美談；分而相【以上第 92 頁】爭，兩敗俱傷。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常常犯的毛病。

另，白夢在九七年六月一日《世界週刊》上的文章《還〈絕食書〉本來面目》中，只說柴玲唸了絕食書，而完全不提柴玲的草稿。白夢文中又說，「後來，李祿告 訴我：如果沒有絕食書，他當時就不可能加入絕食……」，以此印證他作為「絕食書作者」的作用。但是，白夢大概沒有讀過李祿的英文自傳，當中明確說明《絕食 書》是柴玲寫的(頁一三四)。

又，王超華在回憶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 中午的北高聯會議時，提到柴玲堅決主張絕食，「她幾乎是把《絕食宣言》裡的那點話都說出來了。」(會頁九六)這在唸《絕食書》前一天，由此可以旁證柴玲應 該是起草人。另一個可查證的材料是柴玲五二八錄像談話，當中也有許多《絕食書》的語句。這些語句她在整個運動中不斷重複，因此聽柴玲在十三日中午唸《絕食 書》時，完全以為都是她寫的。

－－封從德一九九八年元月注)

《絕食書》的原文與緣起

柴玲《絕食書》的原文與目前書刊中所載的有出入。最近剛收到一份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的廣場上錄製的由柴玲唸的《絕食書》錄音，現整理發表。【以上第 93 頁】

《絕食書》的起草與錄音過程

據北大籌委會常委、副主席常勁(現就讀美國舊金山大學)在九〇年六月的《開放》雜誌上回【以上第 94 頁】憶：

據北大籌委會常委、副主席常勁(現就讀美國舊金山大學)在九〇年六月的《開放》雜誌上回【以上第 94 頁】憶：

「……但北大籌委會因對『絕食行動』早有決議，多數幹部認為時機不到，

所以並不積極，北大同學也對此頗有顧慮，所以頭一天只有四十多個同學簽名。

「柴玲看到簽名名單，當時就哭了，說：『堂堂北大一萬多名學生，難道只有這些人願意為中國的未來做出犧牲嗎！』第二天，柴玲完全變了一個人，一早就去廣 播站作演講，宣傳絕食。她一邊哭，一邊講，奉盡了她的真誠和希望。三角地的人並越聚越稠，人們在靜靜聆聽，被這悲壯所感動，心中湧起深藏在心底的最高尚的 感情。一向自負狂妄的北大學生被這纖弱、悲切、勇敢、真誠的聲音震撼了，報名的人越來越多……」

就我所知，柴玲是在早上起草了一份草稿，交由北大作家班的白夢(現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潤色。上午十一點左右，她匆匆赶到二十八樓二樓樓道中設置的廣播 站。當時我正是廣播站的主持，她唸《絕食書》時，我在和另一同學商討問題，開始沒引起注意。幸好我作了錄音。後來不厭其煩地為北大同學反覆播放，每遍都催 我落淚。是在這種感動中，隨著北大籌委會立場的轉變，才使北大絕食的同學猛增了四、五倍。

關於那盤錄音帶，我原打算請人翻錄一千盤(此前，北大同學採訪方勵之、各樣演講內容的錄音帶我曾翻錄過二百盤)。但是由於太忙，一直未能如願。我自己只 翻錄過二盤，一盤留北大，原盤帶到廣場上放，另一盤流傳到了天津。許多同學用簡陋的錄音機在廣播時錄了下來，現在我得到的這盤正是這樣的錄音，很不清楚。 【以上第 95 頁】

為何絕食—《絕食書》的實蘊

柴玲原文中有這樣兩句被莫名其妙地刪掉了：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政府的面孔－－是答復、不理睬、還是鎮壓？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人民的表情－－我們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

這是當時發起和參加絕食的同學悲憤心境的真實寫照。這種悲天憫人的哀怨與激憤，才是同學們絕食的根本原因。思路源於同學們將學運視作一場「新啟蒙運 動」，而又發現了民眾(包括知識分子)的麻木。對政府，憤其無賴，企圖拖延對話以拖垮學運；對民眾，則恨其不爭，發現你為其獻身的人並沒有多少熱切反響。 五月八日夜晚，北大同學在一種失落中遊行到教師住宿區去爭取支持；五月十日，一萬北京學生騎車去廣場和《人民日報》社前示威；那幾天，同學們非常需要老師 和市民的支持，但無論怎麼做，效果都不大，於是才有絕食之舉。

上面提到運動的「新啟蒙」性質，我認為這才是八九學運的主旋律，其它如保持學運純潔性，不參與黨派之爭，堅守廣場，不怕流血等，都是其變奏。有關細節，另文詳述。(參看拙文《困惑中的反思》)【以上第 96 頁】

柴玲的感覺

柴玲口才之好，是公認的，不光有急智，更有內容，我個人以為，她對這場運動，從人性的角度看，是最有感覺的。對於她來說，八九學運不是為了追求甚麼政治功利，而是尋求人性的解放。持這種理想主義觀點的學生(至少在感情上)是不少的。

北大籌委會有紀律，幹部不得與記者接觸。(原因是為了避免蹈魏京生之覆

轍。）因此，柴玲在學運初期是沒有甚麼聲音的（只見到四月二十四日《香港時報》第 一版上稱她為「北大新成立的聯合學生會發言人蔡玲」）後來，我們把這一習慣帶到廣場，但發現形勢變了，意識到媒體的重要，於是在廣場後期，多由她來作發言 人，這就是有人說她是「在學運後期才不知從甚麼地方冒出來」的原由。

柴玲本著人性的立場來看學運，並不怕講自己的真感覺。五月二十八日，她感到前途黯然，就在一個美國留學生的協助下作了一個錄像，談對學運的悲哀，講出 「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獻身」的激憤之言，背後蘊含的卻是深愛。當晚她提出辭職，不久還是出於對廣場上那麼一批優秀的中國人的厚愛而留下，心路歷程十分複 雜。最後在六月八日錄製的錄音帶更顯出她的才華。當時完全沒有準備，只是因為同那些沒有到過廣場的同學談起時，發現他們滿腦子都是海外媒體關於「廣場大屠 殺」的偏頗報導，於是覺得有責任將廣場最後情形向公眾作個交待。在只剩半小時就要轉移的倉促中，她沉靜地錄製了那盤傳遍世界的錄音。

【以上第 97 頁】

如果五月十四日與閻明復或十八日與李鵬的對話會上，由柴玲唸一段《絕食書》，在直播的電視中傳到全國，會怎樣？－－歷史的發生是偶然的。

附《絕食書》原文錄音整理稿

在這陽光燦爛的五月裡，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將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是，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心甘啊！

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懸、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存關頭，同胞們，一切有良知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幹？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稚嫩，儘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最真誠的愛國感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靈，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真誠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一個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那些給我們炮製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 舉在你（們）的心口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甚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了甚麼？

可是，我們的感情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饑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毒打，幾十萬民族精英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經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我們怎麼辦？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情感，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些卻需要

我們這麼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

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且不得不為之。

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

而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啊！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看你的兒女吧。當饑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時，當死亡正向他們靠近時，你們難道無動於衷嗎？

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沒有權利留下祖國就這樣去 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以上第 98 頁】權利去偷生！

我 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沒有權利留下祖國就這樣去死 －－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以上第 98 頁】權利去偷生！

當我們挨著餓時，爸爸媽媽們你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讓你們[1]能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政府的面孔－－是答覆、不理睬、還是鎮壓？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人民的表情－－我們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2]

人將去矣，其言也善；鳥將去矣，其鳴也哀。

別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樣的忠誠。

別了，愛人，保重！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別終。

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兒不能忠孝兩全。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效。

祖國，母親！在這個自然的、嫵媚的五月，我們去絕食了。我們……永遠……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北京大學絕食團全體成員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

[1] 錄音為「我們」

[2] 普通書刊中缺此二句或有誤。【以上第 99 頁】

註－－此係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柴玲錄音整理稿(錄音缺第一段，由「人民是我們的人民」始)。此文由柴玲起草，白夢(北大作家班)潤色。

括號內為錄音中所無；旁劃線者為錄音不清。【以上第 100 頁】

第二輯：廣場備忘錄

【以上第 101 頁】

「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

一、問題的提出－－「中共讓步論」的根據何在？

時下有一種流行的說法：一九八九年中國政府已經讓步了，學生還不退出廣場；造成大屠殺的後果，雙方都有責任。作者是當事人，歷來認為對於責任問題不應置喙；但是，交代和澄清當時的事實真相，則是當事人的責任。

持「中共讓步論」者有一些基本論據，本文單表「五一四對話」這件事。作者考察了以「五一四對話」支撐「中共讓步論」的來源，大致有二：近者源於九五年秋 以後各種版本的影片《天安門》；遠者可追溯到六四不到一週年時胡平發表的長文《八九民運反思》。問題是二者皆有偏離史實乃至背離事實的地方。

我們首先看看二者怎麼說。

先說遠的。胡平在文中申明：「……更重要的是，當局，從閻明復到李鵬，都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北高聯的負責人進行了對話，這應視為對北高聯的一種默認。並且，這些對話是公開進【以上第 102 頁】行 的。」(《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九)這是《八九民運反思》長文中集中證明「中共讓步論」的地方，這裡所引是他提供的三點論據的後兩點。對於這些結 論式的「論據」，未見進一步的說明，不知道他做這些判斷是採用了甚麼資料和研究。本文僅就這裡所謂「閻明復對話是公開進行的」這一判斷提出質疑。其餘參看 拙文《五一八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了嗎？》。

先說遠的。胡平在文中申明：「……更重要的是，當局，從閻明復到李鵬，都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北高聯的負責人進行了對話，這應視為對北高聯的一種默認。並且，這些對話是公開進【以上第 102 頁】行 的。」(《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九)這是《八九民運反思》長文中集中證明「中共讓步論」的地方，這裡所引是他提供的三點論據的後兩點。對於這些結 論式的「論據」，未見進一

步的說明，不知道他做這些判斷是採用了甚麼資料和研究。本文僅就這裡所謂「閻明復對話是公開進行的」這一判斷提出質疑。其餘參看 拙文《五一八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了嗎？》。

再看近者。《天安門》英文原版對「五一四對話」的處理全過程是這樣的：影片首先採用中共官方電視台播送的「李鐵映等同首都高校學生對話」的幾個鏡頭，然 後是吾爾開希說：「我們把政府拉到我們的談判桌上坐下來。我認為，這整個學生運動之中這是絕食這個策略引起的最大勝利！我們要求實況直播，政府是錄像轉 播。我們看到這種情況時，我們讓步了。我們也知道在當時這種情況下爭取到這一點已經很不容易了。」緊接著的解說詞是：「但是在廣場上的絕食同學沒有聽見答 應好的廣播(did not hear the promised broadcast)」，即對話現場的實況直播或轉播。同時播出絕食學生高喊著「現場直播！！！現場直播！！！」走向統戰部對話現場的鏡頭，解說詞：「因 為懷疑被出賣了，許多同學衝到對話現場，打斷了對話。」最後吾爾開希總結道：「對話給破壞了，完全被學生破壞了！(《天安門》頁一一七至一一九)

上述兩個材料導致一系列疑問：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中共官方電視台播送的「李鐵映等同首都高校學生對話」的幾個鏡頭是在何時首次播出的？當時中共 有「實況轉播」嗎？是廣場上的學生「沒有聽見」還是中共當時根本「沒有播」？五一四對話「完全被學生破壞了」嗎？……以及《天安門》的處理手法等問題。 **【以上第 103 頁】**

二、對話團長的回憶

以下便是我質疑的根據。

提到「閻明復對話」，首先要判斷一下到底有幾次。閻明復與絕食同學的公開接觸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五一三下午，在統戰部的第三會議室。據沈彤的回憶，當 時王軍濤向他強調，「這次接觸不是對話，而是增進相互的了解」(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是在五一四下午，在統戰部禮堂，是經過雙方 事先協商過的對話。第三次是五一六下午，閻明復到絕食團的廣播站講了幾句話。因此，說閻明復與學生對話，僅限於五一四下午那一次。

那麼，五一四對話是不是「公開進行的」呢？我們來看看對話團團長項小吉怎麼說。項小吉在《新聞自由導報》上的一篇文章「回憶對話代表團」中，首先回憶了 對話團成立的背景，即四二九當局導演的那場假對話，然後簡述了絕食前籌備對話的情況，特別提到他曾回絕中共提出的對話，因為當局「又想要故技重演」，搞一 場攙砂子的假對話。然後，他寫道：

五月十三日絕食請願開始，當晚學生代表與政府官員緊急會議，絕食代表吾爾開希、王丹、王超華、程真等人和對話代表沈彤、我等人，與政府官員達成口頭協 議：政府盡快與對話代表團對話，絕食團十四日停止絕食撤出天安門廣場。十四日上午我和沈彤再度與鄭幼枚談判，鄭不同意用對話代表團這個名稱，也不承認北高 聯。這時他接了一個電話，然後就說中央同意與對話代**【以上第 104 頁】**表 團對話。第一個障礙解決了。第二個障礙是現場直播對話實況，並

允許中外記者旁聽。鄭一再強調直播有技術上的困難，但他後來答應實況轉播，考慮到廣場絕食的 同學，我們並沒有在直播問題上過於堅持，我考慮實況轉播也可以接受，但一定要在當晚七點的新聞聯播中播出，電台同時廣播。只有這樣，廣場絕食的同學才可能 撤出。絕食團由吾爾開希負責，我只負責對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絕食，也不知道北高聯和絕食團是否能有效控制絕食活動。五月十四日下午四時二十分，對話在統 戰部會議廳舉行，政府方面有十幾位部長級官員出席，學生方面除對話團全體成員之外，絕食團有五位代表出席。對話進行到晚上七時十五分，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 播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此都無報導，學生再次感到受騙。儘管這樣，我當時仍想將對話持續下去，但此時已有大批學生湧入統戰部大院，部分衝進了會議廳。對話 中斷。（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五月十三日絕食請願開 始，當晚學生代表與政府官員緊急會議，絕食代表吾爾開希、王丹、王超華、程真等人和對話代表沈彤、我等人，與政府官員達成口頭協議：政府盡快與對話代表團 對話，絕食團十四日停止絕食撤出天安門廣場。十四日上午我和沈彤再度與鄭幼枚談判，鄭不同意用對話代表團這個名稱，也不承認北高聯。這時他接了一個電話， 然後就說中央同意與對話代【以上第 104 頁】表團對話。第一個障礙解決了。第二個障礙是現場直播對話實況，並允許中

外記者旁聽。鄭一再強調 直播有技術上的困難，但他後來答應實況轉播，考慮到廣場絕食的同學，我們並沒有在直播問題上過於堅持，我考慮實況轉播也可以接受，但一定要在當晚七點的新 聞聯播中播出，電台同時廣播。只有這樣，廣場絕食的同學才可能撤出。絕食團由吾爾開希負責，我只負責對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絕食，也不知道北高聯和絕食團 是否能有效控制絕食活動。五月十四日下午四時二十分，對話在統戰部會議廳舉行，政府方面有十幾位部長級官員出席，學生方面除對話團全體成員之外，絕食團有 五位代表出席。對話進行到晚上七時十五分，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此都無報導，學生再次感到受騙。儘管這樣，我當時仍想將對話持續下 去，但此時已有大批學生湧入統戰部大院，部分衝進了會議廳。對話中斷。（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三

十一日）

可見，中共當時是否現場直播或實況轉播了，便很成問題。項小吉一向是以嚴謹著稱的，他以對話團團長的身份專門撰文所描述的對話中斷的情況應當是比較可靠 的。由此看來，影片所引用的吾爾開希的那句話：「我們要求實況直播，政府是錄像轉播；我們看到這種情況時，我們讓步了。」似乎表明中共一方確已讓步，作了 轉播，這是靠不住的。

三、何謂「公開」？

【以上第 105 頁】

項小吉的回憶是比較準確 的，因為有沈彤與王超華的回憶加以印證（《回顧與反思》，頁八六、一〇二。該書由九一年巴黎會議錄音整理而成，九三年由德國萊茵筆會出版）。除鄭幼枚（中 共中央信訪局局長）答應了「實況轉播」以外，王超華（北高聯副主席）還提到閻明復也有類似的承諾：

（吾爾開希和王丹）同時和閻明復對現場是否有直播有激烈的爭論。閻明復說技術有困難，一定說廣播車都為迎接戈爾巴喬夫做準備了，當天晚上沒有辦法利用。 最後他說：『我們把錄音帶當場錄好，你們的代表看著給封，封了跟著我們送到中央電視台，一盤一盤放，可不可以？你們同學也可以錄音，錄音磁帶可以拿到廣場 上去放。這個錄像是對全國廣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覺得很有信心把同學們帶出廣場，沒有及時對同學們做工作，直接就在這邊答應了。」（《回顧與反思》， 頁一〇一）

超華的信心是有道理的。只要能在廣場聽到直播的對話，絕食同學還是會答應的，不會故意作梗。柴玲回憶道：

「第二天十四日上午就開始討論要繼續對話。這個時候學生就很積極，條件是一定要現場直播。學生這邊知道的消息是，現場直播因為廣場沒有電視，沒辦法看 到。但廣場的喇叭是可以用的，由於技術性的問題，把對話的記錄直接送到廣播電台需要一個小時。在晚一個小時的情況下，同學還是答應，只要能夠聽到現場直 播。」（《回顧與反思》，頁一〇五）「達成的協議是，一個小時以後可以在【以上第 106 頁】廣場的廣播系統裡面，我說的是中共的廣播系統裡面廣播出來，不是說其他的什麼廣播站的廣播，那是全國直播。再一個是晚上電視新聞聯播之後可以看到電視直播。是這麼一個條件。」（《回顧與反思》，頁一三四）

「第二天十四日上午就開始 討論要繼續對話。這個時候學生就很積極，條件是一定要現場直播。學生這邊知道的消息是，現場直播因為廣場沒有電視，沒辦法看到。但廣場的喇叭是可以用的， 由於技術性的問題，把對話的記錄直接送到

廣播電台需要一個小時。在晚一個小時的情況下，同學還是答應，只要能夠聽到

現場直播。」（《回顧與反思》，頁一〇 五）「達成的協議是，一個小時以後可以在

【以上第 106 頁】廣場的廣播系統裡面，我說的是中共的廣播系統裡面廣播出來，不是說其他的什麼廣播站的廣播，那是全國直播。再一個是晚上電視新聞聯播之後可以看到電視直播。是這麼一個條件。」（《回顧與反思》，頁一三四）

可見，對話算不算「公開」，關鍵在於是否「直播」，至少也得是可證實的「實況轉播」，而中共不僅這點承諾也沒遵守，甚至直到對話已經快三小時之後，在晚間新聞聯播中，竟然隻字未提。這怎麼稱得上是「公開」呢？所謂「對話是公開進行的」，根據何在？

四、進一步的見證

正是因為沒有現場直播或實況轉播，廣場上的絕食同學才要召回對話同學。王超華最後衝進現場中止對話，也是出於這個根本原因：

「這些絕食學生就是堅決不幹，『停止對話！立即現場直播！』，有人在那喊。……所以我進去就大喊：『不要對話了！三個組織是三位一體的，在絕食團同學沒 有接受的時候，你們這種對話是不能接受的。馬上停止！』」（《回顧與反思》，頁一〇二）「……我衝進去就衝著對話團同學說，學生三個組織是三位一體的，在 沒有達到絕食同學關於『現場直播，不是動亂』的要求之前，對話不應當再繼續下去，應說明我方對對話條件不滿意，要求暫時休會。我站在那兒等

【以上第 107 頁】著回答，停了一會兒，大約是項小吉，無奈只好宣佈我方暫時退出對話。」（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九日）

「這些絕食學生就是堅決不 幹，『停止對話！立即現場直播！』，有人在那喊。……所以我進去就大喊：『不要對話了！三個組織是三位一體的，在絕食團同學沒有接受的時候，你們這種對話 是不能接受的。馬上停止！』」（《回顧與反思》，頁一〇二）「……我衝進去就衝著對話團同學說，學生三個組織是三位一體的，在沒有達到絕食同學關於『現場 直播，不是動亂』的要求之前，對話不應當再繼續下去，應說明我方對對話條件不滿意，要求暫時休會。我站在那兒等

【以上第 107 頁】著回答，停了一會兒，大約是項小吉，無奈只好宣佈我方暫時

退出對話。」(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九日)

柴玲也提到對話中斷時的情況，印證了超華的說法：
「就在這個時候，外面開始有騷動。然後超華就進來了，說『外面同學希望現場直播』等等情況。」（《回顧與反思》，頁一〇六）

超華與開希的區別是，二者雖然在對話前都得到閻明復實況轉播的允諾，但是由於超華只有北高聯的身份而未能進入對話現場，當時在外面就知道中共沒有遵守承 諾實況轉播，故有理由衝進現場打斷對話；而吾爾開希在頭一天絕食時便不再代表北高聯，他是以絕食代表的身份參加對話的，由於他一直在對話現場，便同其他人 一樣以為當時有直播或轉播，因此他也有理由責怪「對話給破壞了，完全被學生破壞了！」奇怪的是開希將此印象一直帶到美國，九〇年十月還對我這麼說；《天安 門》攝製組採訪他時也這麼說。

現在再來看一看廣場同學在沒有聽見現場直播或轉播時的反應。常勁(當時北大籌委會副主席)看到了對話時廣場同學的情況：

「五月十四日我到了廣場以後，北大廣播站建立起來了。當時廣播站播送了兩個消息，一是讓各校學生到廣播站附近集合，然後一起到六部口統戰部參加對話。在 召集學生代表的時候，我看到有一百多個學生上去做與政府對話談判的代表。第二個是過了一陣子以後，有人在上面說：「請同學們【以上第 108 頁】

到六部口去增援對話的學生，有人要出賣學生。」從這個時候開始，有一大批的學生集中在六部口，開始時六部口沒有多少人。那一陣，人一直鬨鬨鬧鬧的，很多人就拉到六部口去了。」（《回顧與反思》，頁一〇七）

「五月十四日我到了廣場以 後，北大廣播站建立起來了。當時廣播站播送了兩個消息，一是讓各校學生到廣播站附近集合，然後一起到六部口統戰部參加對話。在召集學生代表的時候，我看到 有一百多個學生上去做與政府對話談判的代表。第二個是過了一陣子以後，有人在上面說：「請同學們【以上第 108 頁】

到六部口去增援對話的學生，有人要出賣學生。」從這個時候開始，有一大批的學生集中在六部口，開始時六部口沒有多少人。那一陣，人一直鬨鬨鬧鬧的，很多人就拉到六部口去了。」（《回顧與反思》，頁一〇七）

「北大廣播站」即「絕食團廣播站」，我當時在那裡主持。常勁說的第一個情況我沒印象；第二個情況是由於當時在廣場上的同學，起初並不十分清楚到底是哪些 人在同政府對話，擔心又是一場假對話，因此馬上派了一批同學去查看究竟。等了半個多小時還不見回音，才又派了第二批同學去。後來得知對話沒直播或轉播，政 府藉口有技術障礙。我當時提了一個方案。九一年初我還記得比較清楚，在備忘錄中寫道：

「我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即讓中央廣播電台作現場直播，對話結束之後再按照政府先前所許諾的那樣在電視中放錄像帶。絕食同學可以通過收音機聽到

對話實況，並能將廣播同電視中的對話時間作一對比。如時間相合，則證明沒有剪輯，同學們便可以宣佈絕食勝利結束，撤離廣場。關於絕食請願的第一項要求，即『平反』，可以在對話中達到。只要政府方面承認『學生是愛國的，學生運動不是動亂』即可。這樣，既以最低限度滿足了廣場同學的要求，政府方面在技術上又不會存在任何問題。作一個廣播現場直播，實在是再簡單不過了。只要想辦法將能收到的現場實播信號換到廣播電台的話筒插孔上即可。或用最好的遠程無線電台，或兩隻簡單的對講機，或實在不行，用最簡單的電話也就能將對話現場同廣播電台連接起來。」【以上第 109 頁】

這是最低條件，得到當時在場的同學的認同。然而這套最低妥協方案，是否傳到了對話現場，我到現在還沒見到有人討論。在九一年七月的巴黎會議上，我也作了類似的描述：

「廣播站建好後，突然傳出消息：開始對話了。這時，絕食的同學都非常不清楚，到底是誰，是哪些同學在對話，就擔心又出現四月二十九日那種情況。所以我覺得在五月十四日，為什麼沒有對成話呢？非常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同學之間缺乏溝通。大家對那些去對話的同學，還不知道是誰，所以不信任。我想，背後的更深的原因，大概是由於組織結構的混亂，沒有統一領導。然後，傳來說那邊已經答應可以對話，而且可以轉播，但是因為技術問題，現場直播沒有辦法。這個時候，我就提出來，如果電視不能現場直播的話，可不可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先有一個廣播的直播。然後，我們再檢察電視的轉播。這是我們的最低要求。這個也能算直播。我們就只能讓到這一步。但是，我不知道這個話傳回去了沒有。」（《回顧與反思》，頁一三三－一三四）

五、其它一些細節

超華在巴黎會議上說，「下午的時候，程真（絕食主要的發起人之一）曾經拿著錄音帶回到廣場，要求廣播，好像是封從德，在廣播站不讓廣播。」（《回顧與反思》，頁一三四）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當時成千上萬人急切地想知道對話進展的情況下，無論是誰，要阻止播放來自對話現場的錄音，是絕不可能的。而這也同我提出最低妥協方案的思路不相符。這應當是記憶錯誤，【以上第 110 頁】因為當時超華並不在場；或許是指對話結束後？無論如何，我自己一點沒印象，而在當時阻止播放對話錄音帶可不是件小事。這得向程真求證。

超華在巴黎會議上說，「下午的時候，程真（絕食主要的發起人之一）曾經拿著錄音帶回到廣場，要求廣播，好像是封從德，在廣播站不讓廣播。」（《回顧與反思》，頁一三四）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當時成千上萬人急切地想知道對話進展的情況下，無論是誰，要阻止播放來自對話現場的錄音，是絕不可能的。

而這也同我提出最低妥協方案的 思路不相符。這應當是記憶錯誤，【以上第 110 頁】因為當時超華並不在場；或許是指對話結束後？無論如何，我自己一點沒印象，而在當時阻止播放對話錄音帶可不是件小事。這得向程真求證。

關於這一點，也許沈彤的回憶可以說明程真當時不是拿到廣場上學生的廣播站來的：

「所有跟廣場方面的聯繫，尤其是五月十四日這些聯繫，都是程真做的。關於時間上的差別，在廣場上廣播不是送到廣播電台，是送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廣播系統，是人民大會堂的廣播(即官方的廣播系統－－作者注)，而且時間是半小時以後。」(《回顧與反思》，頁一三四)

另外，同超華一樣，我也是一年多以後才清楚參加對話的同學到底都是哪些人。特別是聽開希向我回憶當時的情形時，我深感惋惜，並在一篇文章中深為自責，且以「阻撓五一四對話是我最大的過失」為小標題，主動承擔責任：

「絕食第二天五月十四日，統戰部長閻明復與學生代表對話，是可能將學運引向良性發展的一次重要機會。對這次機會的認識，是在九○年十月在舊金山與吾爾開希的交談中才明白的，這才在恍然大悟中，深深地自責自己當時的自負。

「五月十四日……下午廣播站建好，自然由我主持，這時絕食同學驚惶地聽說已有同學在與官方對話了。這顯然違背了絕食者的意願：第一，不是公開的(電視直 播)；第二，沒有徵得絕食者的認可。這時，我和廣播站便投入了阻撓對話的行列，先後三次派代表去召回對話同學。我在自以為堅持民主原則的激昂中，犯下了不 可彌補的失誤。」(見拙文《反思中的困惑》)。【以上第 111 頁】

不過，我也沒有道理顛倒輕重和因果。前面的資料顯示，五一四對話之中斷，主因還是由於政府方面未遵守承諾， 沒能直播或轉播對話。問題是，到底是誰從中作梗的呢？沈彤的分析可能近於真相：「五一四對話中的過程其實很有意思。可以看出國務院系統和中共中央系統之間 的矛盾，就是胡啟立與李鵬之間的矛盾……王超華進來大鬧會場，項小吉當時在外面調解。我當時拍著桌子站起來，指著閻明復說，『為什麼答應了直播不直播？』 閻明復、李鐵映、當時其他十二個副部長和鄭紡枚是政府方面的代表，他們都覺得應該是在直播的。所以，實際上說明政府內部有人在阻止直播。」(《回顧與反 思》，頁八六)究竟是誰拆了閻明復的台呢？得問國內的知情人。

總而言之，五一四對話在當時既未「現場直播」，也沒「實況轉播」，也沒在廣場上的官方廣播系統中播放，在當晚的新聞聯播中更是隻字未提。因此，所謂「五一四對話是當時公開進行的」這一論點，不知有何根據？

六、「蒙太奇」的問題

現在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天安門》對「五一四對話」的描述給人的總體印象：首先是中共的高級幹部與學生對話了；對話的場面在官方電視台裡有播

出。然後是吾 爾開希強調這次對話的重要性。緊接著是廣場學生開赴對話現場中斷對話。最後是吾爾開希的感慨「對話完全被學生破【以上第 112 頁】壞了！」總之，進一步印證影片的主調：學生是非理性的學生；即便政府有所讓步，激進學生也不妥協。

現在讓我們來回顧一下 《天安門》對「五一四對話」的描述給人的總體印象：首先是中共的高級幹部與學生對話了；對話的場面在官方電視台裡有播出。然後是吾爾開希强調這次對話的重 要性。緊接著是廣場學生開赴對話現場中斷對話。最後是吾爾開希的感慨「對話完全被學生破【以上第 112 頁】壞了！」總之，進一步印證影片的主調：學生是非理性的學生；即便政府有所讓步，激進學生也不妥協。

這一印象，除了因為沒有交代中共電視台何時播放對話現場錄像這一點以外，還被另兩點細節所加強。一是吾爾開希說，「我們要求實況直播，政府是錄像轉播。 我們看到這種情況時，我們讓步了。」一是在廣場學生開赴對話現場時的解說詞，「但是在廣場上的絕食同學沒有聽見答應好的廣播(did not hear the promised broadcast)」，即對話現場的實況直播或轉播。三個細節在影片中是很緊密地連接在一起的，給人的印象自然是：雖然中共遵守承諾，作了「實況轉 播」，但還是讓一些頭腦發熱的學生給無理中斷了。

進一步加強這一印象的，是影片作者在這裡用的一個具有歧義的說法：「在廣場上的絕食同學沒有聽見答應好的廣播」這句話可以有倆個理解：一，播了，但同學 沒聽見；二，根本沒播。這是一個極其高超的手法：雖然影片的上下文明白地暗示的是「播了，但同學沒聽見」，然而影片作者卻迴避了直接這麼說。

由此可見，雖然用的似乎都是有根據的材料，用「蒙太奇」手法剪輯處理加上解說詞暗示的結果，也完全可能讓觀眾形成一個偏離事實的印象。這是我對《天安門》在處理手法上是否足夠嚴肅的質疑。

七、選材上的的偏向

【以上第 113 頁】

上述有偏差的印象，還因為影片作者在選材上的偏向而進一步加強。在推導「對話完全被學生破壞了」這一結論 時，影片根據的資料是什麼呢？一是中共官方電視台播送的幾個鏡頭，二是對吾爾開希的採訪。這便有幾個問題需要探討。影片中引用的中共電視台播放的對話場 面，下有「李鐵映等同首都高校學生對話」一行字幕。這一鏡頭是在何時首次播出的呢？影片未作說明。但是，從上面引用的項小吉的回憶文章中可知，對話近三個 小時直到中斷時，中共也沒

有在任何傳媒中播放。後來播出的是不是涵蓋了對話的全過程呢？影片也無說明。中共電視台播放對話場面時的字幕只提李鐵映而不提閻 明復，又說明甚麼呢？影片依然沒有說明。對這些細節的追究，從上文可以看出，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天安門》一片的處理手法還是給人以「中共當時已經公 開與學生對話了」的錯覺。這是我對影片選材上的質疑。

另一方面，影片中對吾爾開希的採訪顯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相當一段時間，從上文的論證已經知道，所謂「對話完全被學生破壞了！」的說法是相當偏頗而遠離 一九八九年的實際的。不清楚吾爾開希是後來變了還是一直就這樣。以上我所徵引的文章與書籍，都是在九五年以前早就公諸於眾的，影片作者不至於看不到別的當 事人的較為翔實的說法，但是，卻恰恰只選用了吾爾開希的偏頗說法。這是我對《天安門》在採用資料方面的主觀偏向的質疑。

另外，還有許多必要的背景情況介紹，影片也隱而不宣。比如，在這裡也未指出，去統戰部的絕食學生所擔心的是第二次「假對話」。在此之前，第一次「假對話」，即四月二十九日袁【以上第 114 頁】木 導演的那場對話，影片只用了一個簡短的鏡頭，給人的印象不深；這裡，又不將二者聯繫起來，對學生這種擔心不加說明，而只稱去中斷對話的學生是「因為懷疑被 出賣了」，這樣的處理手法，如果不是影片作者對當時學生的真實心理瞭解得不夠全面，就只能是故意朝著「學生非理性」的方向傾斜。

另外，還有許多必要的背景情況介紹，影片也隱而不宣。比如，在這裡也未指出，去統戰部的絕食學生所擔心的是第二次「假對話」。在此之前，第一次「假對話」，即四月二十九日袁【以上第 114 頁】木 導演的那場對話，影片只用了一個簡短的鏡頭，給人的印象不深；這裡，又不將二者聯繫起來，對學生這種擔心不加說明，而只稱去中斷對話的學生是「因為懷疑被 出賣了」，這樣的處理手法，如果不是影片作者對當時學生的真實心理瞭解得不夠全面，就只能是故意朝著「學生非理性」的方向傾斜。

又如，在這段的最後，吾爾開希說「從五月十四號開始，這場運動就走向一個重大的挫折」。為何特別強調五月十四號，或許不是偶然。因為這不僅是對話失敗的 一天，而且從這天起吾爾開希便實際上失去了在北高聯的領導席位。雖然他在當時的媒體上和公眾面前總是以學運領袖的形象出現，但在學生組織內部，吾爾開希卻 從上廣場那天起便喪失了領導權，當晚北高聯便不再承認其代表性。以至於出現這樣一個荒唐的情況：五月二十二日凌晨，開希喊撤遭北高聯罷免；但事後大家才發 現他其實根本沒有甚麼職務可以罷免！這些情況，北高聯的梁二和王超華在九一年巴黎會議上早已有較詳細的介紹，影片作者又不是沒有仔細研究過該會議記錄，但 在影片中卻對這一情況置之不理，完全隱去當時在北高聯起主要作用的王超華，反而是這位既無實際職位卻又經常以個人名義代

表組織說話的吾爾開希作為廣場上北 高聯的代言人，豈非咄咄怪事？

八、餘論

既然在作「閻明復對話是公開進行的」這一判斷時，胡平並未在文章裡提供其作判斷的依【以上第 115 頁】據，我們也就無從進一步考察其資料是否可靠，因為根本沒有資料可言，令人疑惑他是否注意過作判斷需要有根據。兩年前，我已質疑其在寫《八九民運反思》時「慣用第二手資料」、「懶於求證，急於批評」的毛病，此不贅述。

既然在作「閻明復對話是公開進行的」這一判斷時，胡平並未在文章裡提供其作判斷的依【以上第 115 頁】據，我們也就無從進--步考察其資料是否可靠，因為根本沒有資料可言，令人疑惑他是否注意過作判斷需要有根據。兩年前，我已質疑其在寫《八九民運反思》時「慣用第二手資料」、「懶於求證，急於批評」的毛病，此不贅述。

至於本文開頭引胡平的那段論據所導致的許多問題，諸如「李鵬是否和北高聯的負責人進行了對話？」、「王丹、吾爾開希是否是當時北高聯的負責人？」、「五 一八『對話』是否公開進行的？」、「五一八『對話』是否真正能算對話？」、「五一八『對話』是否可視為對北高聯的一種默認？」這些問題，也不在本文範圍以 內，有另文詳述。

影片《天安門》作者和胡平在處理六四史料時是否足夠 嚴肅與公正，這一質疑見於九五年七月《北京之春》上我的一篇文章。在接下來的一期當中，胡平對我作了回應，以後卻不再刊登我的進一步討論的文章。以公器而 逞私意，倡「論言論自由」之名於先而行壓制言論之實於後，何公正嚴肅之有？《天安門》的作者較有雅量，將我的質疑文章摘要放到其 Internet 網面上。 不過，在前言中卻說「影片還未問世就有人批評」，似乎沒有明白我的質疑祇是針對她在同一刊物頭一個月的那篇文章；而且至今也沒看見她對此的回應。

在持「中共讓步論」者的一些基本論據當中，本文僅僅論證了以「五一四對話」來支持此論時的一些靠不住的地方。此論另一論據即所謂「李鵬讓步論」，曰李鵬 已經在五月十八日與學生「公開對話」了。作者另有一文專門引用大量史料，證明李鵬在五一八上午與學生代表的會面，既非「對話」，也不是「公開」的，更無甚 麼「讓步」可言。【以上第 116 頁】

國人向來有「和稀泥」與「大而化之」的妙訣，以為「各打五十大板」問題就解決了；有誰不服，則再打五十大 板。這絕不是弄清事實真相的態度。今

天許多所謂的「知識精英」對於六四真相的處理，同以前昏庸的縣官判案時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又真有幾多進步嗎？不問青 紅皂白，反正學生與政府雙方都有責任，這是「和稀泥」而不是甚麼「理性」。

鑒於八九民運史研究中的諸多問題，我再次呼籲各個關注八九民運和中國未來的學術團體，以及各個以推動重評六四為己任的民運團體，加強對八九民運史料的整 理和研究工作，以免再次出現類似的誤解，或至少在誤解出現之後能夠及時糾正。這樣，我們才對得起那些在八九民運中作過貢獻與犧牲的人們。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二日於荷蘭萊頓大學。作者按：此文本是《見好怎麼收？－－答胡平公開信之一》中的一節，結果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既不發表，也不說明理由。之後只好整理出來轉投《前哨》，刊於九七年六月。）【以上第 117 頁】

「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凌晨，吾爾開希拿到廣播站的話筒，呼籲絕食同學東移，以便騰出一半廣場給白天即將到達的戈爾巴喬夫，讓他能在紀念碑前獻花。我沒有 絕食，而是幫助絕食團建立了廣播站。這時，本來反對絕食的北高聯來到廣播站，轉而支持發起絕食的開希。我不忍心看著廣場秩序就此混亂，將話筒給他之後，便 回家休息去了。

下午再回到廣場，有人告訴我，「柴玲要自焚！」等我找 到柴玲時，她說事情已經過去，不會自焚，我這才放下心來。這時，我壓根沒意識到「自焚」是剛成立的絕食團指揮部的基點，一心只惦記著廣播站。十六日晚加入 指揮部時，也沒有任何人告訴我那個條件：軍隊鎮壓前，指揮部成員首先自焚。這個空白，一直保留到六四以後。

然而，正是這段空白引發了後來的許多問題。本文便是對這段歷史的整理與反思，以圖對學生組織在廣場上的嚴重混亂局面作一新的探討。這樣的反思與探討，對於總結經驗教訓和深入瞭解國人在實踐民主時可能常犯的毛病，也許不無裨益。

＊＊＊【以上第 118 頁】

五月十五日早晨宣告成立的「絕食團指揮部」，是八九學運後期的一個關鍵組織。它在絕食初期主導了廣場上的方 向；在戒嚴之後，又通過由其蛻變出來的「廣場指揮部」，繼續主導運動的第一線。因此，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是運動後期至關重要的一環，其中埋伏的問題，以 及這些問題在整個運動後期中的影響，至今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

然 而，非常遺憾的是，這樣重大的事件，不僅在當時的報刊上看不到，在後來有關運動的各種各樣的書籍中也幾乎未見涉及。實際上，無論是後來的編著者，還是當時 的記者，也確實不太容易瞭解到這樣關鍵的內幕情況：這不僅因為這些學生團體的封閉性，而且由於當時剛剛絕食，大家所關心的焦點亦絕不在此。真正瞭解絕食團 指揮部成立過程的人，屈指可數。最重要的當事人，自然是李祿與柴玲，他們各自對此都有敘述。另外，從現有的資料來看，至少程真、馬少方與王文應當也有一定 的作用，可惜尚未見到他們對這段歷史的見證。

一、先決條件是「自焚」

根據九一年巴黎會議上的回憶，絕食團指揮部成立的經過大略如下：五月十五日凌晨五點過，李祿找柴玲談了一個多小時，又徵求了十幾個人的意見，便在八點左 右，由柴玲在廣播站宣佈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李祿；而參加指揮部的唯一條件是在遭鎮壓時率先自焚。【以上第 119 頁】

此前的背景是，五月十一日晚上，吾爾開希、王丹、馬少方、程真、王文、楊朝暉在一個小飯店商議絕食；次日 晚，王丹與柴玲在北大「自由論壇」發動同學參與絕食；十三日中午柴玲在北大廣播站念《絕食書》；傍晚，數百學生在廣場開始絕食；十四日與政府對話破裂；當 晚十二學者到廣場勸撤未果，柴玲（可能也有李祿）主持了絕食同學的一個表決，多數反對撤；深夜至十五日凌晨，吾爾開希主持廣場同學東移之後，廣場上出現無 序與混亂的局面。

二人宣佈成立指揮部之後馬上召集的代表會議，一方面確立其領導權，另一方面卻否決了李祿的兩項提議：「自焚」與「臥路」。然後召開記者會對外宣佈；當晚 十點發生了第一次人事變動，王文、馬少方、程真等人另立一份名單，除去李祿；當夜的兩次代表會議中，李祿一度落選，結果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揮部，從此 二人的地位不再動搖，直至六四。而馬少方等人則與指揮部漸行漸遠，以至於六一凌晨王文等人發動綁架。

下面考察一些關鍵的細節。

首先是「自焚」。「自焚」由李祿提議，作為成立指揮部時，參加者的唯一資格。這一點，最早見於柴玲一九八九年五二八錄像談話中的敘述：

第二天早上我，還有李祿找到我，就是現在的副總指揮。他很痛心，他說，「如果政府如此無賴下去，這樣看著同學一個個這樣消耗生命的話，那我們就採取更極 端的措施」，他說，「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眼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死掉的話，那麼我們就作第一個死掉的人。」我把這句話拿到廣播站說了， 我說我自己願意做這個絕食團的總指揮吧，好像是，不記得怎麼說的了。【以上第 120 頁】而參加這個絕食團唯一的資格就是在同學們犧牲之前你願意首先犧牲自己來使更多的同學們活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還有李 祿找到我，就是現在的副總指揮。他很痛心，他說，「如果政府如此無賴下去，這樣看著同學一個個這樣消耗生命的話，那我們就採取更極端的措施」，他說，「我 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眼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死掉的話，那麼我們就作第一個死掉的人。」我把這句話拿到廣播站說了，我說我自己願意做這個絕 食團的總指揮吧，好像是，不記得怎麼說的了。【以上第 120 頁】而參加這個絕食團唯一的資格就是在同學們犧牲之前你願意首先犧牲自己來使更多的同學們活下去。

九一年巴黎會議上，柴玲對指揮部的成立經過有更細致的回憶：

十五日凌晨四點左右開希宣佈轉移，到紀念碑東側，這時候廣場已非常凋敝。就在這個時候，大概是五、六點鐘李祿回來了，他說：「怎麼回事，我就走了幾個小 時，怎麼一下子變成這樣？這怎麼行。這個運動不知道要持續多久，而且對話也沒希望，也不知什麼時候進行。這樣一折騰二折騰整個絕食運動不打自垮了。這不 行。咱們一定該成立一個機構。這樣吧，基於兩點：一點是不知對話要拖多久，完全有可能政府不管你，一直拖直到學生不打自垮，或者同學出現生命危險。」第二 個我記不起了，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如果這樣的話，乾脆成立一個指揮部。如果在政府給答覆之前，同學出現生命危險，我們採取更激烈的措施，絕食指揮部的這 批人首先自焚。」當時我一聽眼淚就下來了。

我一知道自焚這個事情，我沒有想到別人，就想到老封、我父母，他們肯定特別受不了。李祿說別哭別哭。因為我知道那個時候我們也沒有別的選擇，我就說「那 你當總指揮。」李祿說「不行不行，別人對我還不太了解，還是你來當吧。」後來我們幾個人的基本條件是在同學犧牲生命前首先犧牲，迫使政府給大家答覆，通過 這唯一方式拯救更多的人的生命。成立以後馬上就宣佈，在八、九點時我跟大家作了個演講，很多人流了淚，在掌聲和眼淚中，絕食團指揮部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報 名的同學一下子增加到十幾個，有了十幾個絕食指揮部的成員。（會頁一四四，即《回顧與反思－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記錄》第一四四頁，下同）【以上 第 121 頁】

李祿在其英文自傳中(一三九頁，即 Moving the Mountain.)，也簡單講述了他向柴玲建議自焚與成立指揮部的情況，與柴玲的回憶基本一致，此不贅述。

二、代表會與記者會：確立合法性

按照柴玲的說法，絕食團指揮部是在「掌聲和眼淚中」宣告成立的。這顯然不夠，無論是對絕食同學還是對外界，都還缺乏形式上的代表性與合法性。這就需要補充兩個環節：代表會與記者會。對此，李祿當時已經有了考慮，馬上召集了代表會。他在巴黎會議上回憶道：

因為當時只是宣佈成立，沒有其合法性，沒有確定基本的運行規則、下屬的部門、人員的選擇等等，所以我建議首先召開各校的代表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絕食 團的一些最基本的重大問題，包括組織問題和政策問題。大概在五月十五日早晨七點多鐘吧,剛宣佈完之後就召集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由我主持。很顯然當時我 沒有多少權威，因為對大多數絕食同學來說我是一個生面孔，我也自己介紹我不是北京同學，當時在場的還有少方等等，這些都是絕食發起人，所以我的權威自然就 受到一些挑戰，當時柴玲作了一下介紹。我想我這個權威後來很快就受到穩固，主要因為會議主持進行得不錯。因為大家剛來的時候七嘴八舌，感情激動，其他人包 括少方都試圖過主持這次會議，但後來沒有成功，我把會議主持成功下來，算是第一次的合法性的承認吧。（會頁一三六）

隨即召集記者會。【以上第 122 頁】

「柴玲、梁二、王丹、少方、楊朝暉五個人作了主持，還有一些人參加，同時選了北醫兩位同學作代表，介紹同學健康情況，發了幾個呼籲書。回來後又開了一次會議，進一步認可了第一次會上確定的原則。……」(同上)

柴玲的回憶，對這兩步可作印證與補充：

然後召開各學校代表會議，大概四十多個代表，討論我們下一步是採取更激烈的還是維持現狀等等，讓同學們下去徵求意見。……一個是徵求大家的意見，第二統 計絕食人數的名單，以及絕食人員的布局。第三件事就是馬上開新聞記者招待會，在中午十二點到一點之間，我們在一個大車前面，當時的成員有絕食指揮部的成 員，普通絕食同學的成員，還有北醫的二位同學。……我們發起招待會的時候，一個就是宣佈絕食指揮團的成立，第二個是說當時基本的策略，第三個就是說同學健 康狀況，有五十四人次暈倒。……記者招待會在這邊絕食圈裡邊的一個大車子前面，就是救生車前開過一次，後來又開到歷史博物館前面又開了一次，這是十五日。（會頁一四五）

這樣，以二人為核心的絕食團指揮部暫時取得了合法性，由柴玲任總指揮、李祿任副總指揮。

三、第一次人事變動

【以上第 123 頁】

但是，二人的地位很快就受到了挑戰。當晚，乘李祿與柴玲不在場，另幾位絕食發起人醞釀改選。改選的結果，李祿出局。在巴黎會議上，柴玲這樣回顧道：

我們回來以後，十五日的時候[晚上十點—作者註]，王文跟我說：「柴玲，來，我們要重新開個會，重新改選。」我看見有馬少方，有程真，還有誰我就記不清 了。我說：「李祿呢？」「李祿不在。」我說：「你們人數不全，我不參加你們改選。」我就拒絕了。過了有半個小時以後，王文過來說：「這是改選的新名單。」他衝我一笑，說：「我是總指揮。」我一看李祿的名字已經被去掉了，好像王文是總指揮，馬少方是副總指揮，程真是什麼我記不得了。我一看就笑了，我說：「你這個我不承認。」他說：「不承認也不行，我們是改選了。」過一會兒，陳明遠來了，他看了說：「不行，不行，你們要重選，怎麼能夠把柴玲選掉了。咱們重新討 論一下。」這個時候李祿來了，陳明遠就很權威地跟他說：「李祿，你跟我談一下。」……

之後大家重新選，選出我跟程真是總指揮，兩個總指揮。當時反正李祿不在。我跟程真的分工是，程真負責跟上面的聯絡、對話什麼的，我就負責廣場的情況。之 後我見到李祿，李祿非常頹喪，他說：「既然這樣的話，那我就回南京去了，因為南京也非常需要我。」我一聽，這眼淚就下來了。我說：「如果你走的話，那我也 沒辦法再搞下去了。我一個人也應付不了這麼多事情。」因為馬少方在十四日之後非常主張讓大家撤離，從此我就很不信任他，而程真她也是個女孩子，又管著那邊 一些事情，她並沒有對廣場實際的組織起那麼大的作用，王文就是個小孩子，有時哄哄他，我還挺喜歡他的，覺得他像個小孩子一樣很天真，但實際上他沒有這個把 廣場局勢鎮住的能力，讓我怎麼搞。李祿【以上第 124

頁】就很痛苦地在那兒閉著眼睛，我覺得我也沒有辦法勸他。(會頁一四八)

之後大家重新選，選出我 跟程真是總指揮，兩個總指揮。當時反正李祿不在。我跟程真的分工是，程真負責跟上面的聯絡、對話什麼的，我就負責廣場的情況。之後我見到李祿，李祿非常頹 喪，他說：「既然這樣的話，那我就回南京去了，因為南京也非常需要我。」我一聽，這眼淚就下來了。我說：「如果你走的話，那我也沒辦法再搞下去了。我一個 人也應付不了這麼多事情。」因為馬少方在十四日之後非常主張讓大家撤離，從此我就很不信任他，而程真她也是個女孩子，又管著那邊一些事情，她並沒有對廣場 實際的組織起那麼大的作用，王文就是個小孩子，有時哄哄他，我還挺喜歡他的，覺得他像個小孩子一樣很天真，但實際上他沒有這個把廣場局勢鎮住的能力，讓我 怎麼搞。李祿【以上第 124 頁】就很痛苦地在那兒閉著眼睛，我覺得我也沒有辦法勸他。(會頁一四八)

四、第一次反「政變」

李祿在第一個回合中暫時失利。兩年後，他在巴黎會議上用了「政變」一詞來形容這次人事變動(會頁一三八)。但是，這場「政變」很快就被平息。柴玲接著上面的回憶說：

直到凌晨的時候，李祿跟我說：「我決定留下。」我就說：「是嗎？」我很高興。我沒有問他是怎麼一個轉機。十六日凌晨就馬上召開一個班代表會議，大家重新 改選的結果，我的印象中是馬少方跟王文都沒有列到重要位置上，重新認可了李祿的主席的位置。我們大家經過了一場衝擊以後都比較輕鬆。……

九點鐘的時候就是記者招待會。這次記者招待會不同以前，就是邀了更多的絕食同學的代表。當時我記得有楊朝暉，他注射了液以後，整個胳膊都腫起來了，還有 王丹，還有「北醫」的同學。當時還有一些對北大，對絕食同學的質問什麼的，我記得王丹講過以後，李祿主持記者招待會。然後我講了一段以後，一下子就開始不 行了，暈倒了。這是十六日，暈倒以後我就被送到醫院去了。後來我就一直在醫院裡面，當天晚上才回到廣場。老封被指定接替我的暫時領導權，所以十六日中午閻 明復來的這段過程，我就都不知道。【以上第 125 頁】

代表會加記者會，同樣的程式再走一遍，進一步鞏固了二人核心的合法地位。第一次「政變」就此平息下去。指揮部也從此壯大起來。

關於這次「政變」，李祿後來的回憶與柴玲稍有出入。按他的說法，他很快「召集了一次代表會議」，在幾個「造反的」同學(Insurgents)和幾位老 師的圍攻下，李祿中途離開會場準備「正式辭職」，但責任感與柴玲的挽留使他回到會場並「受到了鼓掌歡迎」，因而「這次政變持續兩個小時」便平息了。下面來 看李祿在巴黎會議上和自傳中的敘述。

五、李祿的回憶

在巴黎會議上，李祿說這次變動很快就解決了：

十五日晚十點多絕食團指揮部發生了第一次人事變動，變動只持續了一、兩個小時。當時是王文、少方、程真等幾個人覺得絕食團指揮部這個東西不合法，他們自 已確定了一份名單，來告訴我們絕食團指揮部被取消了。新的人選，王文是總指揮，他們不叫團長，柴玲作宣傳部長，如此等等有份詳細名單。後來這個事情比較順 利地解決主要是我召集了一次代表會議，在會上我的主要觀點是，不能這樣搞，完全沒有任何民主程序。在這次代表會議上他們幾位很不幸都被選掉了，所以這次政 變持續兩個小時結束。(會頁一三八)

但在李祿自傳中，情形卻要複雜些。關於這次「政變」，書中寫道：「我們回來時，我看【以上第 126 頁】見 一些人在開會，當中一個指揮部的成員也沒有。我所建立的民主程序完全被忽視。」二人「成了眾矢之的」，尤其是李祿，大家聽說他是外地學生，就不斷追問他為 何沒有學生證，懷疑他是特務。然而，李祿也以攻為守。「我問他們要選誰作總指揮，他們馬上給出一份清單，由一個誰也不認識的人任總指揮。」接着，李祿抗 議，「這場運動並不只是北京同學的運動；……你們誰又能證明有學生證的就不是特務呢？—大家無言以對。」李祿藉機重申民主程序，並提議召集聯席會議重新 選舉。接下來，自傳回憶了這次改選會的情況：

但在李祿自傳中，情形卻要複雜些。關於這次「政變」，書中寫道：「我們回來時，我看【以上第 126 頁】見 一些人在開會，當中一個指揮部的成員也沒有。我所建立的民主程序完全被忽視。」二人「成了眾矢之的」，尤其是李祿，大家聽說他是外地學生，就不斷追問他為 何沒有學生證，懷疑他是特務。然而，

李祿也以攻為守。「我問他們要選誰作總指揮，他們馬上給出一份清單，由一個誰也不認識的人任總指揮。」接著，李祿抗 議，「這場運動並不只是北京同學的運動；……你們誰又能證明有學生證的就不是特務呢？ －－大家無言以對。」李祿藉機重申民主程序，並提議召集聯席會議重新 選舉。接下來，自傳回憶了這次改選會的情況：

他們同意召開代表會議。代表們到後都莫名其妙……當我告訴他們有人想從現任指揮部成員手中奪權的時候，大家都很氣憤。那個名單立即作廢，而幾個造反的 (Insurgents)由尷尬而憤怒，集中火力對我圍攻。我唯一的罪狀就是我拿不出學生證和沒法證明自己不是特務。幾個老師也作同樣的質問。既然柴玲還可以繼續作總指揮，我想我也不必一定要在領導層內。我說我得好好想一想，要是決定回南京，我會正式辭職。(作者譯自李祿英文自傳，下同)

然後就是柴玲所不清楚的那個「轉機」：

我離開指揮部的帳篷，深感沉痛，尤其是在人民大會堂前所發生的那一幕之後。政府麻木不仁。而就在這一關鍵時刻，有些同學卻可能只想到自己的名譽和個人利 益。要真是這樣的話，運動怎能健康發展？我們怎能保障絕食同學的生命安全？我感到責任重大，又深深地感到幻滅、失落與絕望。

柴玲與幾位代表走過來，說，「我們都希望你回來。那幾個人被代表們趕走了。請回來吧。」【以上第 127 頁】我 很感激柴玲，自從見面，她從未懷疑過我。我的孤獨感稍微輕了些。我很難不去幫助柴玲，但我不希望指揮部的工作與團結因為我而受到破壞。我知道有些人還會恨 我，還會發起進攻。我對她說，「你繼續去開會。我也許會辭職。離開之前我會告訴你我的決定。」柴玲看著我，沉默不語。從她的眼睛流露出信任與遺憾。我離開 指揮部，走到絕食同學中間。……

柴玲與幾位代表走過來，說，「我們都希望你回來。那幾個人被代表們趕走了。請回來吧。」【以上第 127 頁】我 很感激柴玲，自從見面，她從未懷疑過我。我的孤獨感稍微輕了些。我很難不去幫助柴玲，但我不希望指揮部的工作與團結因為我而受到破壞。我知道有些人還會恨 我，還會發起進攻。我對她說，「你繼續去開會。我也許會辭職。離開之前我會告訴你我的決定。」柴玲看著我，沉默不語。從她的眼睛流露出信任與遺憾。我離開 指揮部，走到絕食同學中間。……

我在絕食同學中間大步走，感到對他們的愛在升騰。他們才是這場學生運動的心臟，而不是那些想篡奪權力與名譽的野心家(would－be leaders)。我對絕食同學負有責任。他們的生命安全每分鐘都在受到威脅。我拋開了所有雜念。有人懷疑我，又怎麼樣？ ！我要是離去，就會成為歷史的罪 人。於是，我豁然開朗。

這樣，改選會議的尾聲便是：

帶著這些想法，我回到了會場。我受到了鼓掌歡迎。我告訴他們大夫的話。我派他們去安排人員，每過一些時候就給每個睡著的人翻一下身……到了凌晨三點我才 躺下。五月十六日拂曉。才睡兩個小時，就有人叫醒了我。我召集學生代表開了個會，討論如何清點絕食人數。（李祿自傳頁一四六－九）

現在歸納二人回憶的差別。(一)、雖然二人都說是兩次會議，但「反政變」成功的時間卻不一致：李祿說是當晚就解決了；柴玲則說是在次日凌晨。(二)、對 於李祿來說，程真、馬少方、王文等人是在「造反」，「完全沒有任何民主程序」；而柴玲則認為兩次都是經過程序的「改選」，【以上第 128 頁】祇 是第一次李祿被選下，第二次別人被選下而已。(三)、因而，對於離開會場，李祿說是「準備辭職」，且是在幾個「野心家」被代表們趕走之後，由柴玲和幾個代 表請他回去的；而柴玲則說，是在第一次改選李祿被選下之後，她「也沒有辦法勸他」，是李祿自己願意留下，才又開一次改選會的。

現在歸納二人回憶的差別。(一)、雖然二人都說是兩次會議，但「反政變」成功的時間卻不一致：李祿說是當晚就解決了；柴玲則說是在次日凌晨。(二)、對於李祿來說，程真、馬少方、 王文等人是在「造反」，「完全沒有任何民主程序」；而柴玲則認為兩次都是經過程序的「改選」，【以上第 128 頁】祇是第一次李祿被選下，第 二次別人被選下而已。(三)、因而，對於離開會場，李祿說是「準備辭職」，且是在幾個「野心家」被代表們趕走之後，由柴玲和幾個代表請他回去的；而柴玲則 說，是在第一次改選李祿被選下之後，她「也沒有辦法勸他」，是李祿自己願意留下，才又開一次改選會的。

二者差別的實質是，若按柴玲的回憶，第二次改選後指揮部的合法性則還有疑問；若按李祿的回憶，以二人為核心的指揮部則完全合法。但是，李祿在九一年巴黎 會議上的這些回憶，不僅與柴玲的記憶有出入，而且與半年前出版的自傳也有差異，於是便降低了其記憶的準確性。比如，幾個「造反的」到底是會上說的那樣，是 在李祿主持的代表會議上「被選掉了」的呢，還是書中說的那樣，是在李祿離開會場後「被代表們趕走了」的？

絕食團指揮部成立之初的情形基本如此。以下需要對這些素材作進一步的分析。

六、巴黎會議上對「自焚」的質疑

有關絕食團指揮部的回顧，在巴黎會議上，李祿的發言在柴玲之前。敘述指揮部的成立過程時，李祿沒有提到「自焚」，祇是強調了犧牲的原則：

……那天早晨我就很感悲哀了，我突然感覺到運動中需要這樣一批人，他們希望犧牲自己的一【以上第 129 頁】切 乃至生命，去為維護運動到此為止的勝利果實，去維護這些方向已經變得模糊了，但又異常堅決的絕食同學的生命權力。所以當時我就找了柴玲，跟她說我們需要成 立這樣一個組織，更有效地保護同學的生命，同時在學生中建立共識，我們到底要什麼、怎樣要，因為時間倉促，情況緊急，我們沒辦法再去開會去商量如何去成立 組織，我想我們定一個條件，把那些願意自薦，願意最終為絕食運動，為民主運動獻身的那些同學召集起來。當時柴玲就作了一個演講，當時周圍有十幾人吧，後來 這十幾個人大多成了絕食指揮部秘書處的骨幹。當時柴玲作了一個演講，絕食團指揮部就正式成立了。(會頁一三六)

……那天早晨我就很感悲哀了，我突然感覺到運動中需要這樣一批人，他們希望犧牲自己的一【以上第 129 頁】切 乃至生命，去為維護運動到此為止的勝利果實，去維護這些方向已經變得模糊了，但又異常堅決的絕食同學的生命權力。所以當時我就找了柴玲，跟她說我們需要成 立這樣一個組織，更有效地保護同學的生命，同時在學生中建立共識，我們到底要什麼、怎樣要，因為時間倉促，情況緊急，我們沒辦法再去開會去商量如何去成立 組織，我想我們定一個條件，把那些願意自薦，願意最終為絕食運動，為民主運動獻身的那些同學召集起來。當時柴玲就作了一個演講，當時周圍有十幾人吧，後來 這十幾個人大多成了絕食指揮部秘書處的骨幹。當時柴玲作了一個演講，絕食團指揮部就正式成立了。(會頁一三六)

李祿最早提到「自焚」是一天之後，指揮部勸阻「自焚」：

在十六日開始出現要絕水、自焚等。……當時我們的能力實在有限，而且支持實在過熱，所以不僅內部的各種更激進的要求得不到制止，外面的人更無法制止。(會頁一四〇)。

避而不談「自焚」，也許是因為實際上沒發生，而這個話題可能也太敏感或太複雜。但是，「自焚」在絕食之初確是一件大事，影響極廣，因而聽了李祿的敘述之後，會上馬上就對「自焚」有質疑：

常勁：關於廣場自焚事件，這在北大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事件，對北大對於廣場的決策都有很多影響。因為我聽說李祿是當事人，我希望他對廣場自焚事件做一明確解釋。

李祿：這個事情最先提出來是在五月十五日五點到六點，我跟柴玲還有其他十幾個同學，提出【以上第 130 頁】來 說成立指揮部要有個條件，那些需要願意獻身的人，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到後來我提出真的到了政府監獄車來把大家都送到監獄去的話，我就當著他們的面先自 焚給他們看。但是這個並沒有作為標準。後來這個想法喊起來實際上是在十五日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個從河南來的小孩，個子很小，決心特別大，他一定要我給 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十分鐘讓他講他要自焚，而且他要有記者在。當時我把他壓著，他當然很氣憤。最後我強行宣佈記者招待會結束時，他終於喊出來了，有些記者聽 到了，就追著去問他了。但是這個指揮部絕對不提倡。後來這個人一直沒停，一直在絕食圈裡轉來轉去，喊的人越來越多，到最後，出現絕水後自焚就變成一個很強 烈的呼聲了。學校代表一般來說都比較理性一些，我希望他們每次都向會議匯報一下情況，我就不斷聽到匯報了。(會頁一七二)

李祿：這個事情最先提出來是在五月十五日五點到六點，我跟柴玲還有其他十幾個同學，提出【以上第 130 頁】來 說成立指揮部要有個條件，那些需要願意獻身的人，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到後來我提出真的到了政府監獄車來把大家都送到監獄去的話，我就當著他們的面先自 焚給他們看。但是這個並沒有作為標準。後來這個想法喊起來實際上是在十五日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個從河南來的小孩，個子很小，決心特別大，他一定要我給 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十分鐘讓他講他要自焚，而且他要有記者在。當時我把他壓著，他當然很氣憤。最後我強行宣佈記者招待會結束時，他終於喊出來了，有些記者聽 到了，就追著去問他了。但是這個指揮部絕對不提倡。後來這個人一直沒停，一直在絕食圈裡轉來轉去，喊的人越來越多，到最後，出現絕水後自焚就變成一個很強 烈的呼聲了。學校代表一般來說都比較理性一些，我希望他們每次都向會議匯報一下情況，我就不斷聽到匯報了。(會頁一七二)

似乎有點答非所問。其實，常勁的質疑確實代表了當時的一種普遍疑慮，對「自焚」的疑慮。張伯笠說他正是因為「聽到柴玲要自焚的消息，跟北大七個教授到廣 場去勸說」才參與了廣場活動的。(會頁一四二)而我聽說「柴玲要自焚」，當時心情也很惶惑(會頁一五一)。梁二、王超華對「自焚」也都有質疑(會頁一七 四)，超華也說「這個事牽扯到後來對北大的老師和對我的影響都很大。」

七、「自焚」、「臥路」與「絕水」

但李祿的回答卻進一步淡化了「自焚」的作用：似乎後來絕水、自焚的呼聲與行動，主要【以上第 131 頁】是 記者會上那個「個子小決心大的河南小孩」的影響所致，而「這個指揮部絕對不提倡」。如果情況確實如此，也應當是代表會議否決了李祿「自焚加臥路」的二項建 議之後的事；而在指揮部成立與召開代表會議之間，這兩項建議的影響已經通過組織的力量傳播開了。這一點，從巴黎會議上柴玲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在第一節裡， 柴玲講到指揮部成立，有了十幾個成員，緊接著，柴玲談到了執行「臥路」與「自焚」的情況：

但李祿的回答卻進一步淡化了「自焚」的作用：似乎後來絕水、自焚的呼聲與行動，主要【以上第 131 頁】是 記者會上那個「個子小決心大的河南小孩」的影響所致，而「這個指揮部絕對不提倡」。如果情況確實如此，也應當是代表會議否決了李祿「自焚加臥路」的二項建 議之後的事；而在指揮部成立與召開代表會議之間，這兩項建議的影響已經通過組織的力量傳播開了。這一點，從巴黎會議上柴玲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在第一節裡， 柴玲講到指揮部成立，有了十幾個成員，緊接著，柴玲談到了執行「臥路」與「自焚」的情況：

之後李祿對我說，我們還要搞另外一個方式。既然這個對話沒有搞成，我們要不要再增加壓力，把同學們全部拉到長安街上臥路，阻礙長安街的交通，這樣迫使政 府趕快跟我們對話。北京電影學院的同學馬上就來了，他們是非常藝術性的人，「一個是臥路，一個是自焚。」他馬上就去買汽油去了。（會頁一四四）

另外，從王超華見到程真勸阻「滾長安街」的情況來看，當時「臥路」的呼聲已很高：

然後，我回到廣場上。我見到有兩個人架著程真從南邊往北，就是絕食團前面那個空的地方一路走過來，程真挨個地跟大家說：「大家千萬要冷靜啊。」我就問王 丹是怎麼回事，他在自己隊伍中坐。他說，有人說，要到長安街上去滾馬路，去擋路。「我們不要做那種事啊。」程真從那頭一直到這頭。我印象當中，之所以那些 絕食同學對程真有印象，而且覺得她是一個主要的領袖，就是因為這個。她很虛弱的，穿著黃長袍的裙子，兩個人架著她走的，到處走，說是有人要滾長安街。（會 頁一五六）【以上第 132 頁】

李祿後來也不再迴避談「自焚」、「臥路」與「絕水」：

十五日，我建議可能的話，是不是把隊伍乾脆拉到天安門廣場的長安街上。原來是認為十五日可能有回答，既然十五日沒有回答，那最多十六日就有結果。

要有結果的話，恐怕只能施加壓力，因為當時在場的只有幾千人了。但是這個決議在第一次聯席會議上被當場否決掉了。……自焚呢，當然更是被限制了。勸說絕水、自焚，用的主要理由就是，指揮部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有這麼一些人，為了避免其他人的犧牲，他們願意首先犧牲，他們願意站出來，為大家做這份貢獻，做這個犧牲。如果你要自焚的話，你也先讓我自焚啊；如果你要是真想自焚的話，不如你先到指揮部來工作吧。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勸動了南開二十幾位想絕水的人。後來也是以同樣的理由，他們全部參加了指揮部的工作，使得指揮部的人員擴展到上百人。（會頁一六五）

這樣，照李祿的敘述，「自焚」不僅在成立指揮部時起過作用，而且隨著成立而立即否決之後，「自焚」對指揮部的壯大也功不可沒。這種英雄主義與悲天憫人的思想，雖然沒有付諸實踐，其衝擊卻極其深遠。

八、「自焚」與指揮部合法性危機

這種衝擊不僅是當時，如上面提到的幾位所受到的觸動，而且直到戒嚴之前，程真與馬少【以上第 133 頁】方這兩位絕食發起人都還深受「自焚」的刺激。劉燕對此有所見證：

這種衝擊不僅是當時，如上面提到的幾位所受到的觸動，而且直到戒嚴之前，程真與馬少【以上第 133 頁】方這兩位絕食發起人都還深受「自焚」的刺激。劉燕對此有所見證：

五月十九日下午……三點鐘以前的時候我和開希就已經知道當晚要戒嚴的消息……我記得特別清楚，程真和馬少方兩個人情緒特別激動。他們到統戰部一坐就開始哭，後來程真和馬少方說他倆當天要絕水，要到新華門跟前去絕水。程真特別激動，說如果絕水不行的話，誰對廣場這麼多同學負責？那我就要自焚。這是程真當天說的話。（會頁二〇一－二）

馬少方與程真正好是李祿與柴玲的主要競爭對手，「第一次人事變動」之後，二人便被排除在絕食團領導層之外。為何到了幾乎快復食的時候，還要重提作為參加指揮部的唯一前提的「自焚」呢？而且，更奇怪的是，馬上首先公開宣佈復食的，也正是他們倆：「差不多四、五點鐘的時候，少方和程真宣佈復食。」（沈彤，會頁二〇三）「馬少方當時即興創作了一篇復食書，寫得慷慨激昂。讀給閻首長聽，閻首長好像感動得嗚咽不語。」（梁二，會頁二〇二）

二人從要「自焚」到宣佈復食，還不到兩個小時。如此強烈的反差，該怎麼解釋呢？注意到程真的那句話，「誰對廣場這麼多同學負責？」這是她要「自焚」的理由，是在兵臨城下、大敵當前時的直接反應：犧牲自己，保護同學。而這正是成立指揮部的基點。完全同一個邏輯。但我們注意到，無論提出「自焚」還是宣佈「復食」，都與當時的指揮部針鋒相對。因此，一個合理的解釋是：這是質疑指揮部合法性的心理繼續在起作用。

這一分析，還有進一步的依據。

程真與馬少方實際上曾經在絕食團初期擔任過重要角色，王超華質疑李祿時，兩次提到這【以上第 134 頁】一 點：「我是從廣播上聽到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馬少方和程真。這我記得。」（會議錄音稿頁一一五）「當時我聽說過馬少方是副總指揮」。李祿答道：「當時確實 是這樣。你聽說的那個大概是十五日晚上九點多鐘的那個名單，是他們擬定的。少方在第一次代表會、第一次記者會時都在，十五，十六日的幾次會都在，十七日就 不在會上。」（同上頁一三六）

程真與馬少方實際上曾經在絕食團初期擔任過重要角色，王超華質疑李祿時，兩次提到這【以上第 134 頁】一 點：「我是從廣播上聽到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馬少方和程真。這我記得。」（會議錄音稿頁一一五）「當時我聽說過馬少方是副總指揮」。李祿答道：「當時確實 是這樣。你聽說的那個大概是十五日晚上九點多鐘的那個名單，是他們擬定的。少方在第一次代表會、第一次記者會時都在，十五，十六日的幾次會都在，十七日就 不在會上。」（同上頁一三六）

總之，馬少方與程真作為絕食發起人，在絕食團初期舉足輕重，是因為李祿的介入而失去了原有的地位。這必然導致他們與李祿之間的緊張關係。這從十五日晚的 第一次人事變動已見端倪，上面第五節引用過李祿在巴黎會議上的話：「當時是王文、少方、程真等幾個人覺得絕食團指揮部這個東西不合法」。另外，李祿在回憶 五一八晚防備政府開走絕食車而決定「扎車胎」時，也提到「馬少方對我進行激烈地攻擊，讓我要對國家的財產負責。那次他有些歇斯底里。」（會頁一六八）

而馬少方等人與李祿的緊張關係，柴玲也有所描述：

有一個細節：就是馬少方差一點要和李祿打起來，他們說李祿你在操縱民主，陳明遠也在那兒嚷嚷。後來李祿很嚴厲地批評了他們幾句。完了之後他們都不吭聲，氣氛很緊張。（會議錄音稿頁一四七）

這次在十九日中午，正好就在馬少方與程真去統戰部之前。綜上所述，可以判定，這時的少方與程真，已經對以李祿和柴玲為核心的絕食團指揮部失去信任，不相信指揮部還會按照成立【以上第 135 頁】時 的那個「唯一條件」，在同學們受到生命威脅之前首先自焚；而在他們看來，在軍隊即將來臨之際，繼續絕食也是對絕食同學的生命不負責任。無論如何，正好應該 與指揮部反其道而行之。這大概就是二人在統戰部時的兩極反應的內在理路。按照沈彤的記憶，在統戰部的這些同學決定重組「廣場臨時總指揮部」，在回廣場的路 上都還擔心指揮部不

同意復食。(會頁二〇三)

這次在十九日中午，正好就在馬少方與程真去統戰部之前。綜上所述，可以判定，這時的少方與程真，已經對以李祿和柴玲為核心的絕食團指揮部失去信任，不相信指揮部還會按照成立【以上第 135 頁】時 的那個「唯一條件」，在同學們受到生命威脅之前首先自焚；而在他們看來，在軍隊即將來臨之際，繼續絕食也是對絕食同學的生命不負責任。無論如何，正好應該 與指揮部反其道而行之。這大概就是二人在統戰部時的兩極反應的內在理路。按照沈彤的記憶，在統戰部的這些同學決定重組「廣場臨時總指揮部」，在回廣場的路 上都還擔心指揮部不同意復食。(會頁二〇三)

在與絕食團指揮部漸行漸遠，以至對立的同學中，不止程真與馬少方。廣場後期經常發生的「政變」，不能說與指揮部成立時的合法性問題無關。我自己到廣場後 期就遇到一些學生骨幹、甚至是指揮部成員對指揮部的不信任言行。可惜我對五一五清晨到十六日晚指揮部的情況不甚了然，因而遇到這些衝突時還很奇怪。後來王 文等人對柴玲和我的「綁架案」不過是最突出的一次。當時王文對我說：「包涵著點，我們不是衝你來的。」今天聯繫起來，才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

「自焚」是指揮部合法性的關鍵，是許多問題的根源。本來運動經過一個月已經形成一個學生骨幹群，彼此有了基本的瞭解和信任，這時突然冒出一個大家都不認 識的李祿，對柴玲又出了一個異常極端的主意，以「自焚」為唯一條件另立指揮部。在大家措手不及當中，結果發起絕食的幾位骨幹被排除在外，只有柴玲加上陌生 的李祿形成了指揮部的核心，這自然引起普遍的疑慮。尤其嚴重的是，「自焚」這一先決條件在指揮部剛一成立便被取消了，好比將自己坐在上面的樹枝鋸斷，其合 法性便懸在空中。「自焚」－－成立指揮部－－取消「自焚」，這樣的三部曲在那些被排斥在外的絕食發起人看來，無異於毀約與篡權－－正如馬少方等人指李祿 「操縱民主」的那樣。【以上第 136 頁】

九、進一步的反思

不僅是「自焚」，許多沒有絕食的同學也成為「絕食團指揮部」的重要成員。我自己就沒正式絕食，張伯笠、白夢應當也類似。而我和張伯笠後來成為副總指揮， 白夢作了絕食團廣播站的站長，可見問題之嚴重。如果香港記者的記錄無誤，李祿其實也「並沒有參加絕食行動」(香港記者協會，《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 錄(增訂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二六五)加沒加入、何時加入絕食，李祿自傳中也沒講。也就是說，除了總指揮以外，指揮部的三個副總指揮可能都沒正式加 入絕食。這是指揮部合法性危機的第二方面。

第三，指揮部的八九個常委中，多數也沒有經過選舉程序。除了柴玲、李祿以外，吾爾開希、王丹、張伯笠、郭海峰、王文、王超華和我也作過常委，或

長或短， 或虛或實。王丹和開希的加入，按柴玲的說法，是「因為他們的老資歷，雖然他們沒有通過那個先決條件，就是說要自焚，因為我們要承認一些既成的事實。」(會 頁一四五)而我和張伯笠大概也是因為有些「老資歷」，尤其是我們當時掌握著廣播站，「沒有廣播站，實際上指揮部只是一個名字，廣播站才是一個實際的團 體。」(李祿，會頁一三八)十六日晚柴玲暈倒之後，郭海峰與李祿來找我作臨時代理，主持當晚的代表會議，才自然加入指揮部的。而王文在指揮部中的地位更具 戲劇性，是柴玲「哄小孩一樣哄著他」而隨便加進去的(會頁一七一；一四五，一四八)，十八日大家還是把他選了出去。【以上第 137 頁】

這三方面無論哪一條現在看來都很成問題，那麼當時為何就被大家接受了呢？我認為有如下原因。首先是運動的緊張形勢，迫 使大家沒有工夫細究。實際上並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幾位絕食發起人。但是因為後面的幾點，這些反對者沒有成功。第二是當時北高聯的積弱。高 聯沒能阻止絕食，連高聯主席吾爾開希與常委王丹都成了絕食發起人和絕食團的首領，因此在絕食頭幾天，北高聯的角色極為尷尬。當時高聯的實際運作主要依靠王 超華的凝聚力，但她也承認，「我們對絕食團的各校代表會採取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絕食團自己搞了一個代表會。可是事實上，高聯在這個階段基本上沒有再 召開代表會，因為都亂了。」(會頁一五九)第三，北大的支撐。廣場之爭主要表現在北高聯與指揮部之間，而指揮部的骨幹則多與北大籌委會有極深的淵源。李祿 雖從外地來，但他很準確地找到了柴玲，而柴玲曾任北大籌委會的秘書長，許多北大同學參加絕食又與柴玲唸的《絕食書》有關；郭海峰、張伯笠、白夢和我等都是 北大背景。王丹與我還同時在北大和高聯擔任過要職，對緩衝高聯的壓力也有作用。另外，北大籌委會還派人幫助指揮部管理財務、後勤與糾察，尤其是保護指揮部 的「特別糾察隊」。這不是說別的院校作用不大，而是說指揮部這個班子早已形成基本信任，是不易被其它鬆散的群體所動搖的。第四，李祿的能力。

正因為高聯的 積弱，廣場上才形成了由絕食同學組成的各校「代表會」，進一步與高聯抗衡。而李祿則是這一抗衡的最有力的組織者，他成功地主持了「代表會」，其能力遠遠超 出其他同學。這不僅被幾乎所有同學所公認，從第二節中可知，李祿自己也認為其權威主要來自於其能力。【以上第 138 頁】

最後這一點，需要進一步的反思。它其實重複了古今中外民主進程中常常發生的現象：大變動導致人心饜亂，於是一個強人出來 維持局面；混亂中，強人的出現成了一種歷史的需要。李祿在八九學運後期的崛起，當屬此例。具體來說，當時我對李祿的信任，一方面來自柴玲的介紹，另一方面 則來自其能力。我相信，其他許多同學也是如此。而李祿常常對柴玲和我講「大思維」，講他所擁有的高層社會關係，講他從自己的「內線」那裡剛剛得到的內幕情 報。這大大超出了我這理科學生的視野，無論今天看來如何幼稚，但在當時則確實令我佩服不已，於是幾乎言聽計從，遇到意見相左時，我也不多堅持。總之，當時 李祿顯得很堅定，而我和柴玲則沒有這份確定性。這也就是為什麼五二一「轉入地下」的決議明明違背自己的意願，我還是堅決地去執行；這也是為什麼五二六李祿 決然反對楊濤代表北大和北高聯提出用「空校」方案撤離廣場時，我也沒有力爭；甚至六月初李祿準備取代柴玲而私下找我支持時，我也認為他更有能力作總指揮， 以收拾廣場的混亂局面。作為一個沒有社會經驗的理科學生，我只願「搭台」，不敢「唱戲」；而柴玲頻頻亮相卻沒注意「台詞」。這也是為什麼到了九五年我是那 麼失望，一方面是「民運理論家」和媒體揪住柴玲的「台詞」大作文章，一

方面則是李祿在媒體中表現得與柴玲的「台詞」毫無關係。然而，從李祿自傳和柴玲五二 八錄像談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祿對柴玲的影響，甚至連對「野心家」的指控都如出一轍。連劉曉波的回憶都說「柴玲聽李祿的」，看來這一印象在廣場上也 很普遍。【以上第 139 頁】

十、結語

八九學運後期，「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是一件至關重要的大事，它因應廣場上的混亂局面而生，卻進一步導致了學生組織的混亂，這有三方面的表徵：第 一，切斷了統一組織的連貫性，而這本來已經十分微弱（北大時有抗衡，但還是表示服從高聯的統一協調），至此北高聯不再是運動的唯一最高領導機構，而這一分 裂格局一直延續到六四，後來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也不能駕馭指揮部；第二，領導人物的斷層，尤其是李祿的介入，開始以全新的人物掌握運動的決策核心。柴 玲絕食前已經辭去了北大籌委會秘書長的職務，我當時也都辭了職，張伯笠在北大籌委會中也不任要職，因此，作為「廣場上的一貫決策人」，李祿所依賴的北大支 撐實際上也沒有組織上的連貫性；第三，極端組織方式的開始，尤其是以「自焚」為旗號，而掌權後又馬上取消。實際上，「自焚」與後來的「政變」是同一思路： 雖然是非常手段，但是我們的目的是正當的；而執政的同學沒有能力，故我等應當取而代之。以「自焚」另立指揮部，實際上開了廣場「政變」之先河。

但是，也必須充分肯定指揮部對廣場秩序的維持作用。如果沒有指揮部的努力，而是由一些「政變」的同學主導廣場，局面更不能設想會亂到甚麼程度。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對李祿能力的肯定和眾多「政變」最終都不成功的根本原因。

總體而言，本文的反思集中在組織成立時的合法性上面。廣場「政變」是對指揮部合法性【以上第 140 頁】的 質疑，而指揮部則是對北高聯合法性的挑戰，柴玲與我正是這一質疑的代表。絕食之所以能發生，除了王丹、吾爾開希等人的發起以外，柴玲在北高聯的極力抗爭是 在組織上的關鍵一環；我對北高聯的質疑則由來已久，對其四二三「圓明園成立大會」的合法性一直有疑慮，認為在眾多院校還沒成立自治會之前就組織全市高聯， 不符合民主程序；五四前後我在北高聯作了一週的主席，更體會到懸在空中的無力感，五月六日辭職，之後對高聯一直持消極態度。這種消極態度對北大有一定影 響，今天回想起來，覺得這

也是自己必須檢討的地方。現在看來，如果我留在高聯中對學運的統一領導和連續性可能會好一些。然而五四之後我還很天真，辭職後便 回所趕碩士論文，以為一個月後還能答辯。回所「復課」的第二天，我用的計算機再次壞掉(第一次恰好在四一五胡耀邦去世的那一天)，從此我才全力投身學運， 義無反顧。事情這麼巧，「歷史的發生有許多偶然，結果有許多必然」。提到這一細節，無非是在反思中也提醒一下歷史環境的複雜因素，許多細小的事情在當時卻 是轉折點，這又常常是「理性」所忽視的。

總體而言，本文的反思集中在組織成立時的合法性上面。廣場「政變」是對指揮部合法性【以上第 140 頁】的 質疑，而指揮部則是對北高聯合法性的挑戰，柴玲與我正是這一質疑的代表。絕食之所以能發生，除了王丹、吾爾開希等人的發起以外，柴玲在北高聯的極力抗爭是 在組織上的關鍵一環；我對北高聯的質疑則由來已久，對其四二三「圓明園成立大會」的合法性一直有疑慮，認為在眾多院校還沒成立自治會之前就組織全市高聯， 不符合民主程序；五四前後我在北高聯作了一週的主席，更體會到懸在空中的無力感，五月六日辭職，之後對高聯一直持消極態度。這種消極態度對北大有一定影 響，今天回想起來，覺得這也是自己必須檢討的地方。現在看來，如果我留在高聯中對學運的統一領導和連續性可能會好一些。然而五四之後我還很天真，辭職後便 回所趕碩士論文，以為一個月後還能答辯。回所「復課」的第二天，我用的計算機再次壞掉(第一次恰好在四一五胡耀邦去世的那一天)，從此我才全力投身學運， 義無反顧。事情這麼巧，「歷史的發生有許多偶然，結果有許多必然」。提到這一細節，無非是在反思中也提醒一下歷史環境的複雜因素，許多細小的事情在當時卻 是轉折點，這又常常是「理性」所忽視的。

最後，關於「民主」與「集權」，我準備從更大的歷史尺度上作一點更大膽的反思，以便對現實有所討論。廣場上的經歷使我瞭解到在權力中心和在其外，可能會 有完全不同的立場。掌權者的首要任務是維持秩序，否則一切都談不上，因而會竭力維護組織的權威；而無權者首先考慮的則是權力公正與否，許多人在自以為會更 公正的想像中，便不惜一切代價要取而代之。廣場指揮部與發動「政變」的諸多學生群體的差別在此，一九八九年的中共與反對派的差別是否也是如此？雙方的衝突 激化後，掌權的一方只能是更趨保守，更趨集權，越發要求強人出來穩定局勢。【以上第 141 頁】廣 場後期混亂的學生內部，實際上無法再堅持「民主」而贊同「集權」；那麼當時中國面臨內亂的危險，致使許多原來同情民運的人也轉而支持戒嚴，是不是有內在相 通之處呢？聯繫到百年國史，歷次

社會運動的領袖在掌權前後的變化，是不是也正好重複了這一模式呢？孫中山先生最終認為中國人不是個人自由太少而是太多，以 至於「一盤散沙」無力禦外，對內也不得不組建黃埔軍校推行「軍政」；蔣介石上台之前利用「民主力量」甚至共產黨的支持，上台後馬上施行軍事獨裁；毛澤東在 奪權前推崇「美國式的民主」，奪權後施行蘇聯式的「人民民主專政」，而專政就是獨裁，通過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最終集權於一身，鄧小平上台前也利用過西 單民主……所有這些，都越來越讓我懷疑那些口口聲聲保證馬上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人，一旦掌握權力是否可能兌現其諾言。

最後，關於「民主」與 「集權」，我準備從更大的歷史尺度上作一點更大膽的反思，以便對現實有所討論。廣場上的經歷使我瞭解到在權力中心和在其外，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立場。掌權 者的首要任務是維持秩序，否則一切都談不上，因而會竭力維護組織的權威；而無權者首先考慮的則是權力公正與否，許多人在自以為會更公正的想像中，便不惜一 切代價要取而代之。廣場指揮部與發動「政變」的諸多學生群體的差別在此，一九八九年的中共與反對派的差別是否也是如此？雙方的衝突激化後，掌權的一方只能 是更趨保守，更趨集權，越發要求強人出來穩定局勢。【以上第 141 頁】廣場後期混亂的學生內部，實際上無法再堅持「民主」而贊同「集權」； 那麼當時中國面臨內亂的危險，致使許多原來同情民運的人也轉而支持戒嚴，是不是有內在相通之處呢？聯繫到百年國史，歷次社會運動的領袖在掌權前後的變化， 是不是也正好重複了這一模式呢？孫中山先生最終認為中國人不是個人自由太少而是太多，以至於「一盤散沙」無力禦外，對內也不得不組建黃埔軍校推行「軍 政」；蔣介石上台之前利用「民主力量」甚至共產黨的支持，上台後馬上施行軍事獨裁；毛澤東在奪權前推崇「美國式的民主」，奪權後施行蘇聯式的「人民民主專 政」，而專政就是獨裁，通過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最終集權於一身，鄧小平上台前也利用過西單民主……所有這些，都越來越讓我懷疑那些口口聲聲保證馬上要 在中國實現民主的人，一旦掌握權力是否可能兌現其諾言。

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已經落到我的頭上，那位曾在國內以《論言論自由》而

知名的「民運理論家」，如今在其主持的刊物卻無論如何要壓制我的言論，無論是回應他 對我的一面之詞，還是對民運策略的討論，還是根本不涉及他個人而祇是對八九民運的回顧與反思。我能猜想到的，還是那種掌權者維持局勢的需要。我認為這是一 個現實，致力於民主的人士應當正視這一現實，而且理解到其中也有維護大局的因素。

因此我認為，對中國民主進程的一個合理的態度便是「時間表」的概念，正如孫中山先生當年早已設想到的分階段推行民主的計劃(軍政、訓政、憲政)，在如今 的中國大陸提倡推行民主的時間表。由此緩解兩方緊張對立的關係，可能避免類似六四這樣的僵局和犧牲。一個可行的方【以上第 142 頁】案應當是，中共在經濟自由化的基礎上接受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定出由基層選舉最終到高層選舉及黨政軍法分權獨立的綱領性文件和時間表，而民運這方面最應當做的是鼓勵政府的這一趨勢，促進民主進程時間表的問世與實施，而不是一味與當局對抗。

因此我認為，對中國民主 進程的一個合理的態度便是「時間表」的概念，正如孫中山先生當年早已設想到的分階段推行民主的計劃(軍政、訓政、憲政)，在如今的中國大陸提倡推行民主的 時間表。由此緩解兩方緊張對立的關係，可能避免類似六四這樣的僵局和犧牲。一個可行的方【以上第 142 頁】案應當是，中共在經濟自由化的基礎上接受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定出由基層選舉最終到高層選舉及黨政軍法分權獨立的綱領性文件和時間表，而民運這方面最應當做的是鼓勵政府的這一趨勢，促進民主進程時間表的問世與實施，而不是一味與當局對抗。

(一九九八年元月於巴黎)【以上第 143 頁】

五一八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了嗎？ － －駁「李鵬讓步論」

論者常以「李鵬讓步論」來支撐八九民運應當「見好就收」的說法，其重要論據是：李鵬已經在五月十八日與學生「公開對話」了。再進一步，便得出這樣的結 論：一九八九年中國政府已經讓步了，學生還不退出廣場；造成大屠殺的後果，雙方都有責任。作者是當事人，歷來認為對於責任問題不應置喙；但是，交代和澄清 當時的一些基本事實，則是當事人的責任。本文將以大量史

料為依據，證明李鵬在五一八上午與學生代表的會面，既非「對話」，也不是「公開」的，更無甚麼「讓 步」可言。

也許，八年後的今天還去咀嚼一九八九年的一些細節，在一些願意「淡忘六四」的人來看，已經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然而，如果「李鵬讓步論」能夠成立，那麼天 安門前的學生和市民便成了胡鬧，血腥鎮壓便找到了成立的一絲藉口，而那些六四受難者的犧牲也就成了無謂和荒唐。作為當時學運組織的參與者，作者假此文作一 份祭獻，奉於六四受難者的靈前，亦願其親友能有一分慰藉，而感到並不孤單。【以上第 144 頁】

一、五一八算對話嗎？

如果說五一四算不上「公開對話」(見拙文《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那麼五一八是不是「對話」則還都是一個問題。

這個疑問首先來自兩方面。一是當時報刊報導李鵬與絕食學生的接觸，所用的字眼皆是「會談」,「交談」,「會見」之類。不僅港台報刊如此，甚至中共官方的 《人民日報》也說是「會見絕食代表」。就連當時的英文報紙也用同樣的字眼，如「meeti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和「talking with」(The Hongkong Standard，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而另一方面，最能說明五一八難以稱得上是「對話」的證據，來自於這次會談本身，因為當時官方與學生公認的字眼是「見面」。根據官方的記載，五一八會談開篇便是「李鵬同志說，很高興同大家見面。今天見面只談一個題目，……。」而會談又是以這麼幾句話收尾的：

閻明復：……對話就到此結束。

王志新：這不是對話，而是見面。

閻明復：對，是見面。(《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李鵬是政府總理，閻明復是中共統戰部部長，王志新是北高聯秘書長，上面幾句話是在會談現場，當著其他政府官員和同學們的面說的，故應視為交談雙方的共識。考慮到王志新在北高【以上第 145 頁】聯 的身份和他歷來反對絕食、希望撤出廣場的態度(據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沈彤、白夢、張伯笠、王超華、梁二；《回顧與反思》頁八四，頁二六七– 九)，他絕不會不願與政府對話以便盡早結束絕食。而李鵬在場，閻明復也是不敢輕易亂說的。加上李鵬自己也說是「見面」，因此，這次會晤的真正原因，只能是 李鵬召來絕食同學見個面、亮個相，以表現其於絕食學生的生命安危並非麻木不仁。

李鵬是政府總理，閻明復是中共統戰部部長，王志新是北高聯秘書長，上面

幾句話是在會談現場，當著其他政府官員和同學們的面說的，故應視為交談雙方的共識。考慮到王志新在北高【以上第 145 頁】聯 的身份和他歷來反對絕食、希望撤出廣場的態度(據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沈彤、白夢、張伯笠、王超華、梁二；《回顧與反思》頁八四，頁二六七－ 九)，他絕不會不願與政府對話以便盡早結束絕食。而李鵬在場，閻明復也是不敢輕易亂說的。加上李鵬自己也說是「見面」，因此，這次會晤的真正原因，只能是 李鵬召來絕食同學見個面、亮個相，以表現其於絕食學生的生命安危並非麻木不仁。

這一判斷，還可以得到其它五方面進一步的印證。

第三，這次見面沒請對話團。對話團正副團長項小吉、沈彤均未到會場。而熊焱則是以絕食學生身份出場的。對話團當時也並未解散，直到十九日夜裡還有開會 (沈彤，《回顧與反思》，頁八七)。由此可見，李鵬不邀請對話團，而讓一些餓了五天、對於對話又無充分準備的絕食同學出來同他亮相，其用意決非要與同學們 真誠對話。

第四，當局還事先安排了學生方面的主要發言人。超華與梁二 在這次會見之前，都看見統戰部長閻明復把王丹與吾爾開希拉到另一個房間密談；出來以後，開希便向其他同學宣佈，「閻部長說了，今天這個對話，就是我和王丹 做主要發言人，其他同學都不要說話。」(《回顧與反思》，頁一六三)後來果然如此，基本上就是二人主談。

第五，這些疲憊的同學是在臨會面之前才得到通知的。超華描述了當時倉促的情況：直到應召去人民大會堂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要見誰」；她臨時「寫了兩張小 紙片」，也就是「對話」當中吾爾開希唸的關於平反「動亂」的方式的那三點建議。超華說，她會前根本沒時間明白解釋，【以上第 146 頁】開希連看都沒來得及看清楚，就在見面會上莫名其妙地一口氣把三條全給唸了，而超華本來的設想是要一條一條地去爭取。(《回顧與反思》，頁一六三)。

第五，這些疲憊的同學是在 臨會面之前才得到通知的。超華描述了當時倉促的情況：直到應召去人民大會堂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要見誰」；她臨時「寫了兩張小紙片」，也就是「對話」當中 吾爾開希唸的關於平反「動亂」的方式的那三點建議。超華說，她會前根本沒時間明白解釋，【以上第 146 頁】開希連看都沒來得及看清楚，就在見面會上莫名其妙地一口氣把三條全給唸了，而超華本來的設想是要一條一條地去爭取。(《回顧與反思》，頁一六三)。

第六，將這種倉促的情形，聯繫到頭天夜間直到十八日凌晨二點開的政治局會議(中共《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香港註釋本，頁一一四；香港快報一九八九年五月 十八日)，大約可以看出，當是在這次鄧小平拍板決定戒嚴的會議之後，

即十八日清晨，李鵬才決定召見絕食的同學。既然已經決定要動武，再去找絕食同學，無異 於黃鼠狼給雞拜年，哪裡談得上想與學生真誠對話？

最後，第七，在會見中閻明復自己也還透露出這次會面的因由。他說，「中央領導同志本想到廣場看望同學們，因為沒有同你們取得聯繫，就沒辦法進去，這一點你們可能知道。」也就是說，去廣場看望你們不成，只好請你們來人民大會堂見個面，慰問慰問。

綜上所述，五一八會面是不可以當成是正式「對話」的。

二、進一步的澄清

不過，也許讀者已經注意到了，連我們這些同學自己，事後也老是將五一八會面稱作「對話」。比如說上面王超華引述開希的話裡，用的就是「今天這個對話」； 此亦巴黎會議上的普遍叫法，包括我本人也曾這麼叫。(柴玲，《回顧與反思》，頁一五〇；頁一六一乾脆用了「五一八對話」這樣的標題；王超華，頁一六二、一 六三、二〇四；封從德，頁一九四) 這是一種錯誤【以上第 147 頁】

的叫 法。也許是為了簡便起見，將錯就錯，但更可能是五一八會談確實給人以一種「對話」的印象。當時絕食同學一天到晚要求對話，五一八晚間新聞和第二天《人民日 報》上真的出現了李鵬面對學生的鏡頭，大家便情不自禁地將其誤解為「對話」了。指揮部的同學因為忙著轉移絕食同學到公共汽車上去避雨，而且都相繼昏倒（《回顧與反思》，頁一九四—五），沒能去參加這次會面，因此也不了解情況，便混淆了。

不過，也許讀者已經注意 到了，連我們這些同學自己，事後也老是將五一八會面稱作「對話」。比如說上面王超華引述開希的話裡，用的就是「今天這個對話」；此亦巴黎會議上的普遍叫 法，包括我本人也曾這麼叫。(柴玲，《回顧與反思》，頁一五〇；頁一六一乾脆用了「五一八對話」這樣的標題；王超華，頁一六二、一六三、二〇四；封從德， 頁一九四) 這是一種錯誤【以上第 147 頁】

的叫法。也許是為了簡便起見，將錯就錯，但更可能是五一八會談確實給人以一種「對話」的印象。當 時絕食同學一天到晚要求對話，五一八晚間新聞和第二天《人民日報》上真的出現了李鵬面對學生的鏡頭，大家便情不自禁地將其誤解為「對話」了。指揮部的同學 因為忙著轉移絕食同學到公共汽車上去避雨，而且都相繼昏倒(《回顧與反思》，頁一九四－五)，沒能去參加這次會面，因此也

不了解情況，便混淆了。

因此，今天我們坐下來冷靜地討論時，澄清這一誤解，是極有必要的。不僅要澄清五一八不能稱作「對話」，而且也要看清這次會談並不是「公開」的。

第八，後面這一點，可以吾爾開希當場的要求為證：「關於對話，應該是公開、平等直接、真誠地同廣大學生代表對話。這一點，國務院也說過，要對話，那麼， 我們這樣提為什麼不可以？公開，就應有電視直播，這也是真正地公開，而且應有中外記者在場。」（《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王丹當時也提出公開對話的要求。如果當時已經是與政府總理，與同學們長期以來點名要見的李鵬是公開對話了，那麼，開希，王丹又要求個什麼勁呢？而且，這其實又證明了這次只是會面的實質。

實際上，這次會見完全沒有作公開的現場直播；中共首次播放會談內容是在六個小時之後，即下午五點，而且是經過刪節的。這第九點在下一節將詳細闡明。

總而言之，根據上述九個方面的事實，我認為很難說「五一八李鵬會見絕食同學是『公開【以上第 148 頁】對話』」。

總而言之，根據上述九個方面的事實，我認為很難說「五一八李鵬會見絕食同學是『公開【以上第 148 頁】對話』」。

三、刪節的情況

關於五一八，還有一點，有位「民運理論家」認為「當局畢竟已經停止了對學生運動是動亂的指責」，由此證明中共有所讓步；接著又引用李鵬五一八的話，「無 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就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以此進一步支持「李鵬讓步論」。現在，讓我們來檢驗一下，到底李鵬讓了哪一步？

李鵬那句話，其實只不過是個文字遊戲。因為事實上，四二六社論也沒有直接講「學生運動是動亂」，也沒有說「廣大學生是在搞動亂」。因此，「民運理論家」 居然作出「當局畢竟已經停止了對學生運動是動亂的指責」這樣的結論，正好是中了李鵬的圈套。四二六社論用的字眼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人民日報》之 後所說的也衹是「極少數人製造的動亂」。因此，李鵬那句話，「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不僅一步沒讓，而且從嚴格意義上講也不是說不通的。這樣 一來，在「平反動亂」這一關鍵點上，李鵬不僅沒有任何讓步，而且還給人一種作了讓步的假象。

何況，事實上，李鵬當場還真就點了王丹、開希的名，指責他們要為「動亂」後果負責。恰恰是因為這不是公開的對話，外界看到的內容是經過當局刪節過的，所以這位「民運理論家」【以上第 149 頁】才以為李鵬沒有對「學生是在搞動亂」的指責。香港的《快報》十九日報導了當時刪節的情況：

何況，事實上，李鵬當場還真就點了王丹、開希的名，指責他們要為「動亂」後果負責。恰恰是因為這不是公開的對話，外界看到的內容是經過當局刪節過的，所以這位「民運理論家」【以上第 149 頁】才以為李鵬沒有對「學生是在搞動亂」的指責。香港的《快報》十九日報導了當時刪節的情況：

「……隨後，李鵬就嚴厲指責學生是次運動，指出北京已陷入無政府狀態。其後，他說：「我沒有想法，把責任推到王丹、吾爾開希身上，我沒這個意見，這是客 觀的事實。」但這段話，在下午五時的廣播及七時半電視播放中卻被刪掉，只是記者從吾爾開希帶去的錄音帶中得知。此外，李鵬在說到從來沒有說認為學生在搞動 亂後，還說：「客觀事實是，這場學生運動在某些程度上比文化大革命還要動亂得歷害。」此段亦被刪去。」（《快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吳牟人，《八九民 運記實》，頁二八一）

王丹在五一八會談後的反應，印證了這一報導的確實性。柴玲聽到他剛回廣場時的描述：

「王丹跟另外一個人匆匆回來說：壞了，出事情了。李鵬口氣非常兇，說：你們要為歷史負責任。談話已經徹底崩了。」（《回顧與反思》頁一五零）

王丹與開希是學生領袖，學生領袖都「在搞動亂」，跟隨他們的「廣大同學」不就是「在搞動亂」嗎？

有關五一八會談受刪節的情況，又見於十九日《明報》，《東方日報》和《香港時報》。然而，我們的「民運理論家」似乎不僅未留意當時的報導不稱五一八為 「對話」，而且又好像完全不知道其公開出來的內容是經過刪剪的。而這二點，隨便翻一翻當時的報紙，是很容易明白的。一個「民運理論家」，以其在民運中的資 歷和角色，作出這樣一個有利於李鵬的辯護，應當說不【以上第 150 頁】是一樁小事；而在這麼嚴肅的事情上，又似乎並沒有作起碼的求證，便輕下斷言，以支撐「李鵬讓步論」為代價來苛責廣場同學的激進，這不是「懶於求證、急於批評」又是什麼？當然，我無法設想他會是明知故犯。

有關五一八會談受刪節的情 況，又見於十九日《明報》，《東方日報》和《香港時報》。然而，我們的「民運理論家」似乎不僅未留意當時的報導不稱五一八為「對話」，而且又好像完全不知 道其公開出來的內容是經過刪剪的。而這二點，隨便翻一翻當時的報紙，是很容易明白的。一個「民運理論家」，以其在民運中的資歷和角色，作出這樣一個有利於 李鵬的辯護，應當說不【以上第 150 頁】
是一樁小事；而在這麼嚴肅的事情上，又似乎並沒有作起碼的求證，便輕下斷言，

以支撐「李鵬讓步論」為代價來答責廣場同學的激進，這不是「懶於求證、急於批評」又是什麼？當然，我無法設想他會是明知故犯。

四、李鵬讓了哪一步？

再者，李鵬不僅在會場上指責學生在搞動亂，直接將責任推到王丹和開希的頭上，而且即便是在刪剪後公開出來的內容中，也有類似的強烈暗示。我們來看十九日的《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電訊中李鵬的口吻：

「……但是，事態的發展是不以你們的善良的願望、良好的想像和愛國的熱情為轉移的。事實上現在北京已出現秩序混亂，並且波及到全國。我沒有把這個責任加 給同學們的想法，絕對沒有這個意思。現在這個局面是客觀存在……北京這幾天，已經基本上陷入了無政府狀態。我再說一遍，絕沒有把這個責任加給同學們的意 思。我希望同學們想一想，這樣下去最後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動亂，中國出現過很多次，原來很多人並不想搞動亂，但是最後發生了動亂。」(《人民日報》一 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吳牟人，頁二七九)

這番話大約就是上面那二句話刪掉後作的處理的地方。接下來，便是李鵬的那句名言：【以上第 151 頁】

「作為政府的總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是我今天不講，我會在適當的機會來講這個問題，而且我也差不多講了我的觀點。」

李鵬當天不講，會在合適的機會講，而且當時差不多已經講了的觀點，還會是什麼呢？這個暗示不是很強烈嗎？你能說它不是一種威脅嗎？第二天晚上，李鵬便在 黨政軍幹部萬人大會上，大講特講「制止動亂」，講「進入五月以後，又更加動亂起來」，講「如再不迅速扭轉局勢，穩定局勢，就會導致全國範圍內的大動亂」， 講「廣大青年學生在主觀願望上是不想搞動亂的，但是，事態的發展正越來越走向他們願望的反面」……同樣地，自始至終，李鵬還是沒有說，「廣大同學是在搞動 亂。」然而，他拿起了刀，調來了二十萬正規軍。而他在一面磨刀的時候，一面對同學講「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時，你怎麼 就相信他是在作讓步呢？他與同學會面，不可以是一種姿態，表示他並不是麻木不仁，並非置絕食同學之生死於不顧嗎？不也可以是一種緩兵之計，好給自己留下充 分的磨刀時間嗎？不也可以是一次舉起屠刀前的試探嗎？不也可以是在試探中搜尋一點動刀的藉口嗎？要知道，戒嚴的決定就是在五一八李鵬與學生會面前幾個小時 作出的(中共《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香港註釋本，頁一一四，及香港《快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剛決定了動刀，又馬上在學生前亮相，李鵬這兩手，不是 黃鼠狼給雞拜年，又是什麼呢？不知道我們的「民運理論家」是否對於上述其他幾種可能性作出過什麼必要的探討。

總而言之，和「民運理論家」的判斷不同，我認為根據這四節提供的九條依據，李鵬五一【以上第 152 頁】八與絕食同學的會見，既不是「公開對話」，也沒有在「平反動亂」這一點上有何真正的讓步。而這兩點，恰恰是絕食同學的直

接訴求。

總而言之，和「民運理論家」的判斷不同，我認為根據這四節提供的九條依據，李鵬五一【以上第 152 頁】八與絕食同學的會見，既不是「公開對話」，也沒有在「平反動亂」這一點上有何真正的讓步。而這兩點，恰恰是絕食同學的直接訴求。

五、「李鵬讓步論」波及之一

追溯「李鵬讓步論」之淵源，自九〇年四月那位「民運理論家」在《中國之春》上發表的《八九民運反思》一文開始，距六四慘案還不到一年。從此以後「李鵬讓步論」、「中共讓步論」便愈演愈烈，以至於一些曾經支持八九學運的知識分子要反過頭來追究學生的「罪責」。即便是一些較為嚴肅的學者，也受到這些虛構理論的影響，作出偏離事實的判斷。比如《八九民運史》一書。該書於九四年定稿、九六年出版，作者是國內少見的公正記述和評價六四的史學學者，並且因其正直與勇氣而遭中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除名。遺憾的是，即便是這樣一位剛直的作者，似亦中了「李鵬讓步論」的埋伏，如在該書第三百四十一頁有這樣的評述：

況且，絕食提出的三項要求，已因下述事實的出現，而使「堅守」漸漸喪失意義，或顯得理由不那麼充分：趙紫陽五月十七日書面講話已明確，不會對同學們「秋後算賬」；李鵬在五月十八日與絕食代表的談判中也聲明：「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我們一直肯定大家的愛國熱情。愛國願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對的，提的很多意見，也是我們政府希望解決的問題」。該次對話也進行了現場直播。……在進行這些退讓的時候，雖然不那麼明快，不那【以上第 153 頁】麼情願，不那麼徹底，發言人甚至要用惡狠狠的口氣來挽回他們失去的顏面。但它的確是按照學生的要求進行了答覆。這也給學生的繼續堅持，帶來了一些輿論的壓力。」（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一九九六年六月。頁三四一）

況且，絕食提出的三項要求，已因下述事實的出現，而使「堅守」漸漸喪失意義，或顯得理由不那麼充分：趙紫陽五月十七日書面講話已明確，不會對同學們「秋後算賬」；李鵬在五月十八日與絕食代表的談判中也聲明：「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我們一直肯定大家的

愛國熱情。愛國願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 做得對的，提的很多意見，也是我們政府希望解決的問題」。該次對話也進行了現場直播。……在進行這些退讓的時候，雖然不那麼明快，不那【以上第 153 頁】麼情願，不那麼徹底，發言人甚至要用惡狠狠的口氣來挽回他們失去的顏面。但它的確是按照學生的要求進行了答覆。這也給學生的繼續堅持，帶來了一些輿論的壓力。」（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一九九六年六月。頁三四一）

對照一下《八九民運反思》文中有關「李鵬讓步論」的說法，便不難看出它可能與上文的淵源關係：

1）當局雖未公開否定四二六社論，但是畢竟已經停止了對學生運動的指責。李鵬在和學生代表對話時說：「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都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 搞動亂。」所謂「從來沒有說過」云云，顯見是強詞奪理；在「廣大同學」這個詞的背後還留著「抓一小撮」和抓「背後長鬍子的人」的一條大尾巴。不過我們還是 應該看到，李鵬這句話是對王丹、吾爾開希公開講的，它比起四二六社論而言確屬一種退讓。其它一些溫和派領導人的講話則更明確一些。2）當局雖然沒有公開地 承認北高聯的合法性，但當時並未採取實際的取締措施。更重要的是，當局，從閻明復到李鵬，都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北高聯的負責人進行了對話，這應視為對北高 聯的一種默認。並且，3）這些對話是公開進行的。」（《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九）

「具體談到五一八這場對話，我們尤其要懂得，這一對話的舉行，本身就已宣告了民運力量的勝利。絕食學生提出了兩條要求，一是肯定學運是愛國不是動亂，二 是對話、現場直播。第一點要求，可以說在當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趙紫陽書面講話中已得到肯定；而李鵬等人前來與學生領袖會談並【以上第 154 頁】現場直播，也等於實際上滿足了第二點要求。換句話，李鵬的到來，本身就意味著學生的勝利。（《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二〇：廿一、關於五一八對話。以上兩段中的著重記號是本文作者所加）

「具體談到五一八這場對 話，我們尤其要懂得，這一對話的舉行，本身就已宣告了民運力量的勝利。絕食學生提出了兩條要求，一是肯定學運是愛國不是動亂，二是對話、現場直播。第一點 要求，可以說在當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趙紫陽書面講話中已得到肯定；而李鵬等人前來與學生領袖會談並【以上第 154 頁】現場直播，也等於實際上滿足了第二點要求。換句話，李鵬的到來，本身就意味著學生的勝利。（《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二〇：廿一、關於五一八對話。以上兩段中的著重記號是本文作者所加）

可見，二人從論據到論證方式可以說是一脈相承。尤其注意到，從「對話是公開進行的」、「並現場直播」到「該次對話也進行了現場直播」，是明顯的以訛傳訛。不幸的是，這些判斷皆與事實不符－－根據上面四節的論述，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六、「李鵬讓步論」波及之二

影片《天安門》在這一點上要謹慎一些。該片在處理五一八「對話」時，用的解說詞是「總理李鵬召集一些學生領袖到人民大會堂作了一個電視會談(A televised meeting)」。影片只用了很短的兩個鏡頭，李鵬於吾爾開希的兩句話的結尾是：

李鵬：……如果我們今天一味要在這個問題上糾纏，我認為是不合適的，是不理智的！

吾爾開希：糾纏的不是我們這些學生代表。……我們如果廣場上有一個人不離開還在繼續絕食的話，我們就很難保證剩下的幾千人不離開！

這讓人立即聯想到吾爾開希在會談前部分的一通語驚四座的話，幸而當時王丹趕緊接上，彌補了開希的漏洞：【以上第 155 頁】

吾爾開希：……李老師，現在的問題並不是在於要說服我們這些人。我們很想讓同學們離開廣場。廣場上現在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百分之九十九□九服從百分之零□一，－－如果有一個絕食同學不離開廣場，廣場上其他幾千個絕食同學也不會離開！

王丹：我們昨天對一百多個同學做了一次民意調查，閻明復同志來講話之後，是不是同意撤離廣場。調查結果是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學投票表示不撤離廣場。在 這裡把我們的要求再明確一下：一、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民主愛國運動，而不是所說的動亂；二、盡快對話，並現場直播。這兩點如果政府能盡快圓滿地答覆，我們 可以去廣場向同學做工作，撤離廣場。否則，我們很難做這樣的工作。

但是，《天安門》完全沒有採用王丹這些非常有根據、有理性的說明，而只用了上面吾爾開希信口開河的話來同李鵬的要求學生「不要糾纏」、要有「理智」的話 作反襯，而且又不指出李鵬召集「電視會談(televised meeting)」的背景：一、李鵬這時已經得到政治局的多數通過和鄧小平的首肯而決定戒嚴；二、該電視會談並沒有在當時(上午)就「現場直播」，晚上在 中央電視台的也不是「實況轉播」，而是經過剪輯的。(香港《東方日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第二版等)刪除了這些情況，難怪影片還是給人以政府讓了步而學 生太偏激的印象，乃至有人看過《天安門》之後，指吾爾開希「與李鵬對話時也根本沒有誠意」。

七、「李鵬讓步論」波及之三

【以上第 156 頁】

不過，王丹對李鵬所說的「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學投票表示不撤離廣場」，這句話是否有效，現在又成了問題。這是因為，在一九九五年六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王丹似乎又否定了自己在一九八九年五一八的說法：

「……，廣場作為全國乃至全世界關注的焦點，成了民運的象徵，很多學生和各界人士在堅守廣場的問題上形成了一種狂熱的情緒，以至於出現『百分之九十九的 同學願意撤，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同學反對也撤不下來』的局面。後來當局指責吾爾開希說的這句話是『不民主』，殊不知這正是當時的客觀事實。」(「八九民運 的經驗教訓和歷史意義」，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一七)

王丹的這一說法，正好與他當年對李鵬所說的話相對立；這樣自相抵牾，或許又是「李鵬讓步論」的犧牲品，尤其考慮到王丹這些觀點正好發表在該論最風行的九 五年。好在有其他同學的回憶，我們還是可以知道五--六閻明復到廣場後絕食同學的表決情況。在九一年夏的巴黎會議上，張伯笠回憶道，「五十多個代表參加了會 議，這個會議是李祿主持的。沒通過撤出廣場。」(《回顧與反思》頁一四三)；李祿則指出「緊急代表會議，五十多人」「當時百分之七、八十的發言主張堅決不 能夠撤，說這完全不夠級別，跟我們的要求不一樣。」即沒有「直播對話、平反動亂」。(《回顧與反思》頁一四二)

到九四年，張伯笠還有一篇文章較詳細地提到這次代表大會：

「閻明復和吾爾開希走後，絕食團指揮部立即召開了各高校絕食代表參加的會議。大家在廣播【以上第 157 頁】站 前圍成一堆，柴玲不知去哪了，封從德也不在(我當時並非張伯笠在文章中說的那樣已經是絕食團常委了—作者註)，王丹拿著一束不知誰獻的鮮花在欣賞著，而 李祿手拿著手提話筒成了會議的主持人，我和馬少方、郭海峰還沒發言，李祿已宣佈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繼續絕食』的議案。當時我和郭海峰對繼續絕食是持支持立 場的。日後王丹曾埋怨我：『怎麼把麥克風交給李祿，讓他主持呢？我們不瞭解這個人嘛！』我也反唇相譏：『你當時幹甚麼了？在欣賞一束美麗的鮮花？！』」(中國之春一九九四年三月四月合刊號，頁七五)

「閻明復和吾爾開希走後，絕食團指揮部立即召開了各高校絕食代表參加的會議。大家在廣播【以上第 157 頁】站 前圍成一堆，柴玲不知去哪了，封從德也不在(我當時並非張伯笠在文章中說的那樣已經是絕食團常委了－－作者註)，王丹拿著一束不知誰獻的鮮花在欣賞著，而 李祿手拿著手提話筒成了會議的主持人，我和馬少方、郭海峰還沒發言，李祿已宣佈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繼續

絕食』的議案。當時我和郭海峰對繼續絕食是持支持立 場的。日後王丹曾埋怨我：『怎麼把麥克風交給李祿，讓他主持呢？我們不瞭解這個人嘛！』我也反唇相譏：『你當時幹甚麼了？在欣賞一束美麗的鮮花？！』」（中國之春一九九四年三月四月合刊號，頁七五）

可見，王丹後來指責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同學反對也撤不下來」，大約就是指李祿。這裡的問題是，李祿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李祿自己也說，「從開始到後來 大部分營地聯席會議都是我主持的」，那麼，他祇是中立地主持了代表大會呢，還是更積極地影響了會議的議程與表決？若是像一些人指稱的那樣，是李祿操縱了廣 場的決策過程，但他當時還不過是一個大家尚不熟悉的外地同學，何以有如此法力？

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李祿與張伯笠都未能給出這次代表大會的表決票數，而當時的報紙也極少報導這次會議，我見到的唯一一例報導，也祇是說「據悉，在閻明 復離開廣場後學生代表召開緊急會議，由於多數學生反對，結果仍然拒絕閻明復的要求，堅持絕食。」（香港《東方日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第二版）依然未提 到票數。也許，從李祿自己的敘述可能判斷出當時並未作投票表決。在九一年巴黎會議上，李祿自己也強調「這個會議真是非常非常地激烈」，之後又指出「與此同 時我說這還不是最後的結論，希望大家回去商量，然後再開第二次會議。第二【以上第 158 頁】次 會議仍然是同樣的決定。」（《回顧與反思》頁一四二）這個「第二次會議」首先便是一 個問題，我祇見到李祿一人這麼說。其次，李祿說「同樣的決定」，顯然是 將討論當作「決定」了。聯繫到張伯笠上面的回憶，即在其他幾個學生骨幹尚未發言時，「李祿已宣佈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繼續絕食』的議案」；綜合起來，最有可 能的是當時確實沒有進行投票，而李祿是根據「當時百分之七 八十的發言主張堅決不能夠撤」而宣佈「繼續絕食的議案」的。這在民主程序上便留有漏洞：程序未 進行到底，主觀的判斷可能取代客觀的投票。

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李 祿與張伯笠都未能給出這次代表大會的表決票數，而當時的報紙也極少報導這次會議，我見到的唯一一例報導，也祇是說「據悉，在閻明復離開廣場後學生代表召開 緊急會議，由於多數學生反對，結果仍然拒絕閻明復的要求，堅持絕食。」（香港《東方日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第二版）依然未提到票數。也許，從李祿自己 的敘述可能判斷出當時並未作投票表

決。在九一年巴黎會議上，李祿自己也强調「這個會議真是非常非常地激烈」，之後又指出「與此同時我說這還不是最後的結論，希望大家回去商量，然後再開第二次會議。第二【以上第 158 頁】次會議仍然是同樣的決定。」（《回顧與反思》頁一四二）這個「第二次會議」首先便是一個問題，我祇見到李祿一人這麼說。其次，李祿說「同樣的決定」，顯然是將討論當作「決定」了。聯繫到張伯笠上面的回憶，即在其他幾個學生骨幹尚未發言時，「李祿已宣佈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繼續絕食』的議案」；綜合起來，最有可能的是當時確實沒有進行投票，而李祿是根據「當時百分之七、八十的發言主張堅決不能夠撤」而宣佈「繼續絕食的議案」的。這在民主程序上便留有漏洞：程序未進行到底，主觀的判斷可能取代客觀的投票。

這些問題，從現有的資料上還一時難以下結論，有待於更多的回憶文章、尤其是當時的會議錄音帶內容公佈後才能作進一步的判斷。不過，有一點大約還是可以判斷的：即便王丹所說的「民意調查」可能不是李祿和張伯笠所說的「代表會議」，即便當時可能還不至於像王丹所說的那樣「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學投票表示不撤離廣場」，但多數同學認為政府尚未滿足絕食同學的二點要求故不願撤出廣場，這一點怕是不會有錯。而且，這時的各校代表大會的主體還是北京高校的同學，即五十多個代表中的四十幾位，尚無後來因外地同學流動性太大而造成的難以確定代表性的問題，按民主程序也是不可能撤的。這一民主程序上的難題，是「李鵬讓步論」和「見好就收」論者所避而不談的，似乎民主運動也得由一群強人來控制，而廣場指揮部也可以不顧廣場上的代表大會就能決定撤的。

受到「李鵬讓步論」波及的例子還有很多，從九〇年到現在一直不斷。比如牛年生的《八九民運反思之反思》，直接批評《八九民運反思》，卻也以為「學生們與黨政高級領導人直接對【以上第 159 頁】話，並向全國作現場轉播的要求，實際上由李鵬出來接見學生代表而達到了。胡平認為這是『見好就收』的又一好時機，這一點我想很多人都同意。」而學生們「沒有意識到政府已經作了重大讓步」，是因為「未必把這一對話及現場直播，作為他們當時的『最高綱領』」。（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九月，頁四五）到了九五年，甚至當事人王超華也明確地說「五月十八日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了，對話並向全國原封不動地播發了。」（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二五）可見此論波及之深遠。其它例子這裡從略。

受到「李鵬讓步論」波及的例子還有很多，從九〇年到現在一直不斷。比

如牛年生的《八九民運反思之反思》，直接批評《八九民運反思》，卻也以為「學生們與黨政高級領導人直接對【以上第 159 頁】話， 並向全國作現場轉播的要求，實際上由李鵬出來接見學生代表而達到了。胡平認為這是『見好就收』的又一好時機，這一點我想很多人都同意。」而學生們「沒有意 識到政府已經作了重大讓步」，是因為「未必把這一對話及現場直播，作為他們當時的『最高綱領』」。(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九月，頁四五)到了九五年，甚至當 事人王超華也明確地說「五月十八日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了，對話並向全國原封不動地播發了。」(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二五)可見此論波及之深遠。其它 例子這裡從略。

值得玩味的是，這種「李鵬讓步論」未見於陳希同的報告(《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反而是由民運內部的理論家發明的，豈不令人仰天長嘆。

在結束本文之前，還有一句話，但願不是多餘的。鑒於八九民運史研究中的諸多問題，我再次呼籲各個關注八九民運和中國未來的學術團體，以及各個以推動重評 六四為己任的民運團體，加強對八九民運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免再次出現類似「李鵬已經在五一八與學生公開對話並現場直播」這樣的誤會，或至少在謬誤出 現之後能夠及時糾正。這樣，我們才對得起那些在八九民運中作過貢獻與犧牲的人們。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二日於荷蘭萊頓大學。作者按：此文本是《見好怎麼收？－－答胡平公開信之一》中的兩節，結果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既不發表，也不說明理由。之後只好整理出來轉投《爭鳴》，刊於九七年六至七月。)【以上第 160 頁】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六至廿八日：撤與不撤

第一部分：回憶摘要

回憶摘要取自本人九〇年底至九一年四月寫成的廣場備忘錄底稿。此稿三十餘萬字，尚在向各當事人徵詢修正意見和聯絡出版。

之所以選取五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是因為這三天集中發生了一些內部事件，對於進一步了解廣場撤留之爭，及柴玲五二八錄像談話的背景，不無助益。因篇幅不宜過長，故刪去無關的部分。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晴間多雲

凌晨三點，柴玲發布緊急動員令：據可靠消息，軍隊將在今晨清場……。[1]

上午九點，柴玲在廣播中宣佈凌晨五點的投票結果－－廣場上最高決策機構，由三百多位各校代表組成的「營地聯席會議」確定日後學運的方向是：「堅持廣場，主動出擊」方案。［２］【以上第 161 頁】

「廣場營地聯席會議」自昨晚九時開始［３］，直至今晨五時議決，提議與議決時均作了最充分的辯論。會議由李祿主持。實際投票人數二百八十八人，四個方案的投票情況分別是：

甲、堅守廣場，主動出擊：一百六十二票，百分之五十六。

乙、積極對話，堅持廣場：八十票，百分之二十七。

丙、保持純潔，不撤不談：三十八票，百分之十三。

丁、維持現狀，自生自滅：八票，百分之三。

其中，甲、乙、丙皆為「堅守廣場」，佔百分之九十七！［４］

但是，今天的「廣場半軍事化整編計劃」，因為糾察總長張倫胃病發作，吐血昏倒而流產。

這時的廣場指揮部，雖有七名常委，實際上王丹與王超華很少來，［５］郭海峰則神出鬼沒，常搞些具體的單幹，因此，指揮部實際上還是柴玲、李錄和我，及抓 宣傳的張伯笠，作為實際領導核心。我們的默契是：柴玲掌握全面，負責任命、授權，並代表指揮部接待記者和各界聯繫；李祿逐步成為廣場上的鐵腕人物，負責 「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的召集和主持工作，並組織、控制廣場上形成的各式半軍事化力量，因此，遇到或預防「政變」時，我們都靠他來調兵遣將施行「鎮壓」；我 則管財務與後勤，這是最易出漏洞、也是最易損害學運形象的薄弱環節。［６］

北高聯已於二十三日被迫撤返高校整頓，由廣場指揮部接管廣場；外高聯則內部紛亂。這些天來，指揮部以外的一些勢力，一直力圖奪權，廣播站每天都有一兩次 「政變」［７］記得當時我對大家開玩笑說：「這下我可明白鄧小平為何強調『安定團結』，李鵬為什麼要戒嚴了！」【以上第 162 頁】

－－這是一個悲哀的玩笑。

……

二十六日下午，北大籌委會主席楊濤(當時也是北高聯主席)來到指揮部，找我們商討下一步行動計劃。他讓我們上到一輛麵包車，繞著北京城二環路緩行，車內成了理想而安靜的會議室。柴玲、張伯笠、郭海峰、老何、Ｓ老師和我上了車。

楊濤吸著一支煙，這位十九歲的主席顯得分外沉穩。［８］他提出一個新穎的觀點：「群眾運動實際上是一種情緒化的運動，我們也只能用情緒化的方式加以引 導，比如絕食便是一次情緒化引導。因此，北大籌委會現在建議同學撤走，各回家鄉；各校罷課同學也都回家，全國來個『空校運動』！這樣，學生組織不用多大力 氣，便可對政府施加更大壓力－－一日不對話平反，一日不返校復課。」［９］

我對這個建議極有興趣，認為是個極好的戰略性方案，因為它與學運「新啟蒙」的定位(廣泛的社會宣傳)，及當前學生組織疲軟的現狀相適應。於是仔細考慮了 一番，並補充了幾個技術細節：「大家一散，各回各家，缺乏聯絡，學生組織便會垮掉。因此，空校回家之前，應先約定：各大城市尤其是省會，每個星期天中午， 定時在市中心廣場集會。這樣做有幾方面好處：一是同學們可以定期聚攏，保持運動的熱情；二是對社會(在全中國範圍內！)起到很好的宣傳作用；

三，同時自然 對政府造成更大的威懾，逼迫它答應我們的條件－－它不可能在全國實行戒嚴，北京現在學運勢頭已衰，應將重心轉移到地方；四，這也是各省各地成立地方性自治 學聯的好機會，這個【以上第 163 頁】基礎上可以建立全國自治學聯，將學運組織更加擴充和發展，現在利用各地同學特別是骨幹分子匯聚廣場的好機會，可以在施行空校運動之前，召集各地方與全國性學聯的籌備會議，以便日後聯絡。……」

我對這個建議極有興趣， 認為是個極好的戰略性方案，因為它與學運「新啟蒙」的定位(廣泛的社會宣傳)，及當前學生組織疲軟的現狀相適應。於是仔細考慮了一番，並補充了幾個技術細 節：「大家一散，各回各家，缺乏聯絡，學生組織便會垮掉。因此，空校回家之前，應先約定：各大城市尤其是省會，每個星期天中午，定時在市中心廣場集會。這 樣做有幾方面好處：一是同學們可以定期聚攏，保持運動的熱情；二是對社會(在全中國範圍內！)起到很好的宣傳作用；三，同時自然對政府造成更大的威懾，逼 迫它答應我們的條件—它不可能在全國實行戒嚴，北京現在學運勢頭已衰，應將重心轉移到地方；四，這也是各省各地成立地方性自治學聯的好機會，這個【以上 第 163 頁】基礎上可以建立全國自治學聯，將學運組織更加擴充和發展，現在利用各地同學特別是骨幹分子匯聚廣場的好機會，可以在施行空校運動之前，召集各地方與全國性學聯的籌備會議，以便日後聯絡。……」

柴玲對「空校運動」的態度已記不太清，似乎她並未就此發言，大體是傾向於贊同的［１０］。這時，一直沉默的Ｓ老師向大家潑了一盆冷水：「廣場決不能撤！ 你們怎麼能想像政府是多麼卑劣與凶殘。同學們一散，政府正好來個『關起門來打狗，堵住籠子抓雞』，秘密逮捕與處決，沒人能知道。現在在廣場上，有全世界的 關注，政府不敢明目張膽下手。廣場大旗不能倒；一倒，全國的運動也就結束了。」［１１］

大家都陷入沉思之中。

……

車開回廣場，正遇到李祿，提起「空校計劃」時，他立時很著急：怎麼能撤呢？不是剛通過「堅守廣場」的決議嗎？［１２］

……［１３］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晚小陣雨

這一天最重要的，也是最沒效率的事情，是參加「首都各界聯席會議」。

上午十點過，柴玲與我跟著劉蘇里(北師大青年教師)等人乘地鐵趕到一座研究所大樓。門衛【以上第 164 頁】很嚴，外高聯連勝德被攔在外面。……[１４]

上午十點過，柴玲與我跟著劉蘇里(北師大青年教師)等人乘地鐵趕到一座研究所大樓。門衛【以上第 164 頁】很嚴，外高聯連勝德被攔在外面。……[１４]

這是一間三、四十平米的寬敞會議室，中央大通桌四周圍坐有十幾人，記得有包遵信、王丹、吾爾開希、劉曉波、劉蘇里、老木、張倫、邵江、梁二、柴玲和我， 王軍濤、陳子明、甘陽、劉剛等我不認識，還有工自聯等組織的代表。包遵信作開場白，介紹說此會是由總召集人王丹召集的。[１５]

從上午十一點，直到下午五點，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討論「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精英們熱心於推敲字句，在「這次學運和民運」與「這次民主運動」之間，「純粹自發」與「基本自發」之間，展開了雄辯。有人在打磕睡，我和柴玲卻急得不得了－－要是在廣場上，一分鐘也是那麼珍貴啊！

討論到第九條時，引起了我和柴玲的注意：學者們起草的「聲明」，建議廣場同學堅持到六月二十日召開人大後才撤。[１６]

我利用這個機會發言說，廣場沒法堅持到六月二十號，－－因為根本錢不夠。這班精英們似如夢初醒，驚異地問：不是有那麼多捐款嗎？我這才有機會向大家匯報 財政情況：捐款是不少，但絕大部分都被北高聯在二十三日帶回高校了，究竟多少，指揮部至今也沒交接到高聯的帳目。高聯二十四日只給指揮部留下九千元毛票和 鋼蹦，每天雖有約二、三萬元的市民捐款，但起初光為十幾萬廣場同學買麵包，每天就得花四萬，加上廣場外的和雜費，每天得五萬。因此這幾天的麵包都是賒賬買 來的，至今還是財政赤字！大家便把目光投向梁二，他是北高聯的財務主管。他【以上第 165 頁】申辯說：北高聯並非大家想像的那麼有錢，若按每天五萬算，絕對堅持不到六月二十號。[１７]

我利用這個機會發言說，廣場沒法堅持到六月二十號，—因為根本錢不夠。這班精英們似如夢初醒，驚異地問：不是有那麼多捐款嗎？我這才有機會向大家匯報財政情況：捐款是不少，但 絕大部分都被北高聯在二十三日帶回高校了，究竟多少，指揮部至今也沒交接到高聯的帳目。高聯二十四日只給指揮部留下九千元毛票和鋼蹦，每天雖有約二、三萬 元的市民捐款，但起初光為十幾萬廣場同學買麵包，每天就得花四萬，加上廣場外的和雜費，每天得五萬。因此這

幾天的麵包都是賒賬買來的，至今還是財政赤字！ 大家便把目光投向梁二，他是北高聯的財務主管。他【以上第 165 頁】申辯說：北高聯並非大家想像的那麼有錢，若按每天五萬算，絕對堅持不到六月二十號。［１７］

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有人建議「堅持到五月三十日」，我要求餘下的這三天，北高聯應當轉十五萬到廣場(本來就是捐給廣場同學的嘛！)，梁二最終答應給十萬。

最後，也最起爭議的，是劉曉波提名開希作「人民發言人」。

劉曉波在會議上用了很長的時間(記得近半個小時)，長篇大論為何要設「人民發言人」來代表整個運動，又為何得由開希來當。他的基本理論是，中國也需要一個「瓦文薩」，依靠其「英雄凝聚作用」才能形成一種「民間制衡力量」。他反覆論證說，唯有吾爾開希才最適合於作「人民發言人」－－「中國的瓦文薩」。［１８］

開希似乎並不滿足於劉曉波的贊美，又接下劉的話頭，補充了一大堆他如何足以勝任「人民發言人」的理由。最後，他乾脆說他自己「最有個人魅力」、「知名度最高」，說如今這場全民運動需要一個統一的聲音，而他因為「個人魅力」而在同學中樹立了崇高的威望，在傳播媒介中也最有知名度云云。［１９］

大家聽了，鴉雀無聲。有的仰頭，望天花板吐煙圈。開希是怎麼回事，我太清楚了：拿到話筒前，懇切之極；拿到話筒之後，則完全可以拿組織的名義，來說他自己的話。五一四夜裡如此，五二二凌晨也是如此，他因此也被北高聯開除出局。現在又要來覬覦整個運動的最高代表地位，對運動的潛在危害將難以估量。我打破會場上的沉默，沉著臉說：

「設立人民發言人很好，運動實在需要一個統一的聲音。但其人選，第一，我以為必須具【以上第 166 頁】備起碼的政治素養和基本的社會經驗；第二，既是發言人，必須具備遵守組織約束的習慣。要能對他有所制約，他也只是代表組織說話，而不是以組織名義說他自己的話。」

「設立人民發言人很好，運動實在需要一個統一的聲音。但其人選，第一，我以為必須具【以上第 166 頁】備起碼的政治素養和基本的社會經驗；第二，既是發言人，必須具備遵守組織約束的習慣。要能對他有所制約，他也只是代表組織說話，而不是以組織名義說他自己的話。」

開希紅著臉辯白說：「雖然沒有許多在座的那麼豐富的政治素養，但我吸收力強，又有劉老師的指導；既然是大家推選出來的，自然對我有制衡力量，我也願意接受大家的監督。」

我當時一定是很激動，但要是不能阻止吾爾開希作「人民發言人」，我簡直覺得會是對歷史的犯罪。柴玲也加入反對的行列。我們覺得這麼無謂地爭論下去，實在沒有意思，時間已是下午五點，「十點聲明」的新聞發布會又定於七點開始，

於是起身退席。記得當時有兩個人趕上來，可能是陳子明和王軍濤，勸慰我們幾句，語 氣是相當同情的。隨即，大家也就此散會。

趕回廣場，我立即去為晚上七點的記者會作技術準備。新聞發布會快到八點才開始。王丹宣讀了「十點聲明」，其中第九條是：

「九、在北京宣佈戒嚴第十天(五月三十日)將整個運動告一段落，撤離天安門廣場，並且舉行大規模遊行和集會。……」［２〇］

隨後，我便去主持廣播站的「自由論壇」，許多同學和市民搶到話筒後，很激動地說不該撤。這種聲音應該是有偏差的，因為這時在廣場的，多是些頑強分子，激 情澎湃。沉浸其間，我深受感染，自然也帶上其中的偏頗。我沒有主持完，便將話筒交給老何，自己趕回北大去找梁二。……［２１］**【以上第 167 頁】**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陰

……上午「全球華人大遊行」。……

下午二點過，一個高鼻子外國年輕人上到紀念碑三層找到我，略顯神秘地說，柴玲在前門某處等我。我們趕去，未遇，又回廣場，直到五點過才見到她。原來，柴 玲計劃去南方去發動各省支持北京學運，以解廣場僵持疲軟之危［２２］。她說，中午她已經準備好了一份「遺言」，是個錄像，就是那個老外幫助拍的，他叫金培 力，是在北師大留學的美國人。［２３］

當時，我對柴玲的南下計劃和「遺言」並不在意。南方離北京萬里之遙，遠水哪能解近渴？至於「遺書」，早已見慣不驚了，四二七大遊行和五一三絕食之前，不也有許多人寫「遺書」嗎？

那天的柴玲，比平時顯得更累，心情沮喪。昨天「各界聯席會」之後，她對「知識精英」們越發失望，廣場上山頭林立，「政變」不斷的局面更讓她灰心，這大概是促動她將希望寄托在南方諸省上的直接原因。

在晚上的「營地聯席會議」上，柴玲向三百多位各校代表提出辭職。她說身體支持不住了，精力與能力都有限，希望同學們能選出更有能力的人接替。她又批評了 一些外地同學的不良行為：立山頭，不聽指揮，甚至搞「政變」，搶佔廣播站要奪權；有些同學白天遊長城，晚上回廣場睡覺，廣場一片混亂……「你們要想一想， 你們來北京是為了什麼！」［２４］柴玲的話，打動**【以上第 168 頁】**了大家。代表們一次比一次熱烈地鼓掌，好些代表插話表示希望柴玲不要辭職，並願意參加指揮部工作，幫助整頓廣場。

在晚上的「營地聯席會 議」上，柴玲向三百多位各校代表提出辭職。她說身體支持不住了，精力與能力都有限，希望同學們能選出更有能力的人接替。她又批評了一些外地同學的不良行 為：立山頭，不聽指揮，甚至搞「政變」，搶佔廣播站要奪權；有些同學白天遊長城，晚上回廣場睡覺，廣場一片混亂……「你們要想一想，你們來北京是為了什麼 ！」［２４］柴玲的話，打動【以上第 168 頁】

了大家。代表們一次比一次熱烈地鼓掌，好些代表插話表示希望柴玲不要辭職，並願意參加指揮部工作，幫助整頓廣場。

這時，楊濤發言了。他是以北大籌委會主席和北高聯負責人的身份列席的。他先提「空校運動」計劃，但立即遭到多數代表的反對，大多數都不贊同撤離廣場。在 這種氣氛感染下，楊濤便說：「看來我低估了大家的熱情，請原諒。既然大家堅持留在廣場，那麼，我們就應當把廣場的衛生和秩序搞好！」楊濤的這番話，馬上博 得代表們的掌聲和響應，當即委任他主管廣場整頓工作。［２５］

凌晨二點半，由三百十七校代表組織的「廣場營地聯席會議」（廣場議會）的決議是：（1），堅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召開之前不撤出廣場；（2），任命北大代表楊濤為「廣場整頓臨時總指揮」。［２６］

第二部分：補正與註釋

補正的必要性顯而易見。首先，個人角度很有局限，決不能代表整個運動過程的全貌；其次，個人視角的限制，難以保證絕對的客觀中正；第三，個人記憶模糊不 清的地方，更不得不藉助其它資料加以補充與訂正。保留九〇年底的底稿原樣，寧願對其加註作補正，主要是因為這是離六四最近的一稿，也許是個人記憶最可靠的 一個版本。【以上第 169 頁】

此次補正，因時間倉促，參考的資料有限，以後當逐步擴大範圍。現主要取六資料：

１）《回顧與反思》（八九學運歷史研討會記錄，詳情參見序二，本文引用時簡稱「會」）。

２）《八九中國民運報章頭版專輯》（港支聯資料中心，一九八九年十月，香港），港支聯所匯集的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至六月二十九日之間的各報頭版，對於準確標定學運大事件很有價值。其中報紙簡稱如下：

人民日報－－「人」；
大公報－－－「大」；
文匯報－－－「文」；
快報－－－－「快」；
東方日報－－「東」；
明報－－－－「明」；
香港時報－－「時」；
台灣聯合報－「聯」；
北京日報－－「北」；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C；
The Hong Kong Standard－－－－HS。
如「東二八」指東方日報五月二十八日的報導。

３）《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紀實》（中國國家教委；香港註釋本，一九九〇年六月，香港），簡稱為「驚」。

該本原為中共之「內部材料，不得公開引用」但實際上大量記載了運動的過程與內容，史料價值極高，且有很精確的時間標定(感謝大陸便衣之細心！)。經香港「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之註釋，又更加詳細地糾正了原文的片面記載，很有參考價值。

4)《天安門一九八九》(聯合報，一九八九年八月初，台灣聯經)，簡稱「天」。該書由吾爾開希題字，余英時先生作序，乃六四後最早的一本大部頭資料匯 集。柴玲「遺言錄像全文」也在此書中錄出，比其他一些資料匯集中的都更完整，但也刪減近半，亦非原來的問答形式，使對答不甚連貫。該書出版倉促，許多基本事件之描述不準確。【以上第 170 頁】

5)《移山》(李錄英文自傳：Moving the Mountain， MacMillan， London，一九九〇年)，該書刪去了大量細節，部分敘述不甚可靠。

6)《北京地震》(法文資料：J. P. Beja, M. Bonnin, A. Beyraube: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ekin. 一九九一年一月， Paris)，簡稱 TT。該書由巴黎的三位中國研究學者合譯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大字報、聲明等)，對本文最有價值的是九〇年四月他們對吾爾開希等人的採訪 記錄。

另外，近日為撰此文，還特地向柴玲、李錄、常勁、唐柏橋等人核實了一些細節。

下面是根據這些資料所作的註解與補正：

1)、廣場上一直是喊「狼來了」的地方。謠傳軍隊將在夜間清場，幾乎每天都有，較大的如四□二一悼胡前夜；四□二七大遊行前夜(當時傳三十八軍入京，備 冬衣；很多同學寫「遺書」。)；五□一四開希喊東移，中共「預定的清場工作未能進行」(驚，頁一〇二)；五□一九夜戒嚴前夕；五□二〇、五□二一軍隊進城受阻，直升機在廣場上空盤旋；五□二一夜開希喊撤遭「罷免」(當時他聽信鄧樸方的人說將清場，會二六三：「吾爾開希為什麼喊撤？」)；之後幾天，皆有軍隊將強行清場的各式傳言，但總是被市民堵在城外，但事實上，軍隊早已從地道進入人民大會堂(廣場西)和中南海待命。戒嚴當天，地鐵也停駛了。有一天，我甚至 聽到說：確實已有「暗殺團」混進廣場。當時廣場氣氛又激動，又恐怖，但「狼來了」之聲聽多了，到五月底大家都睏乏不堪，不怎麼信了。

二十六日凌晨柴玲發布緊急動員令時，營地聯席會議還未結束(快二十六日)。【以上第 171 頁】

2)、「主動出擊」是指：(一)、包圍中南海；(二)、佔領電台等重要機關；(三)、重新絕食；(四)、發動罷工。多數代表選擇此方案，只是反應了同學們的激烈情緒，實際上後來指揮部皆未實施。

3)、一說自七時開始(快二十六日)。但我記得不會這麼早。實際上，因代表太多，我們分二批開會，皆由李錄主持，他的記憶力與會議組織能力給我極深印象。能將亂哄哄的學生會議主持得有條不紊，這在運動中是罕見的。巴黎會上他說，那晚「開了將近五小時」(會頁二二三)。

4)、最初的丁方案當是「維持現狀，自生自滅」的放任方案，一些早期報導(如快二十六日)和李錄與我的記憶皆如此，可能是後來柴玲宣佈時修改了詞語，結 果稍後的報導(二十七日)皆是「得到承諾，主動撤離」。無論如何，丁方

案也並非是絕對無條件的撤離，而是有條件的（「得到承諾」）因此，當時，「堅守廣 場」的傾向，甚至應當超過百分之九十七！

5）、王超華實際上在二十三日退出當時的臨時指揮部（會，頁二七〇）。當時我不在場，對北高聯被迫撤返高校整頓、臨時指揮部成立的過程細節皆不清楚。

6）、五月二十四日我接手廣場財務時，已感到財務問題和學運骨幹的「生活作風問題」很可能是日後中共給學運抹黑的最方便有利的兩手。整個運動中，我自認 是「搭台的」而非「唱戲的」，一直將自己定位在「組織者」與見證人的位置，而不敢充當「決策者」的角色，因為自感內心還沒有一個堅定的體系和足夠的知識和 能力。因此，像廣播站、財務部這樣的實際構架，便是我理想的用武之地。當時連想都沒想到，我和柴玲的關係，又去管財務，竟成了日後一些人的【以上第 172 頁】話柄。廣場後期的財務部，實際上有相當進展，可惜財務部長、監察組長等人及帳本皆在國內，但願終將有見天日的時候。關於財務問題的澄清，可參考拙文「廣場上的『逃亡費』」。

6）、五月二十四日我接手 廣場財務時，已感到財務問題和學運骨幹的「生活作風問題」很可能是日後中共給學運抹黑的最方便有利的兩手。整個運動中，我自認是「搭台的」而非「唱戲 的」，一直將自己定位在「組織者」與見證人的位置，而不敢充當「決策者」的角色，因為自感內心還沒有一個堅定的體系和足夠的知識和能力。因此，像廣播站、財務部這樣的實際構架，便是我理想的用武之地。當時連想都沒想到，我和柴玲的關係，又去管財務，竟成了日後一些人的【以上第 172 頁】話柄。廣場後期的財務部，實際上有相當進展，可惜財務部長、監察組長等人及帳本皆在國內，但願終將有見天日的時候。關於財務問題的澄清，可參考拙文「廣場上的『逃亡費』」。

7）、廣場上的「政變」層出不窮，六一凌晨對我和柴玲的綁架，不過是較嚴重的一次，因其預謀之周密，我們擔心中共在背後有動作，才向外公佈的，否則，外 界可能對學生內部的「權力鬥爭」會毫不知情。其實廣場上發生過無數次「政變」，其頻率與規模，外界怕是難以想像得到的。比如北高聯一常委自封為主席，並對 廣場指揮部發生過至少七八次的奪權行動（李錄，會，頁二八一）；連勝德（外高聯主席）和一些外地同學也常常衝進廣播站，要奪指揮部的權。李錄、辛苦、白夢 等人也皆遭到過綁架（會，頁二七九－二九〇：奪權與「政變」；廣播站後期二小節）。指揮部未能及時吸收更多的外地同學一道工作，是當時的失誤之一。但外地 同學流動性太大，也很難辦。參註二四。

8）、楊濤是八九學運中做得多說得少的一位。他是王丹的同學（北大歷史系八八級）、同屋和老搭檔（「民主沙龍」中，二人皆為骨幹）。就我瞭解，楊濤

在北 大籌委會中的威望與王丹不相上下，卻鮮為港台海外所知。常勁說，十五日以後，北高聯的負責人應當是楊濤，不是開希。梁二、王超華則說從五一三絕食當晚的高 聯常委會以後，吾爾開希便不再代表高聯，也失去了在高聯的常委一職(會頁一〇一；一六〇，一八二，二九六－二九七)超華還說，五二三高聯整頓，「北大主席 就是高聯主席」(會頁二一七)。她在一篇文章中也明確稱楊濤為「北高聯主席」(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以上第 173 頁】

9)、關於「空校運動」的原委，我不清楚。就手中資料，最早見於北高聯秘書處五二六公佈的「會議簡報」，五 二五晚十點北高聯會議上，「北大ＸＸ同學提出『空校』的提案，認為學生應回家搞宣傳工作，六月二十二日再回京統一行動。對此，在場代表就廣場撤不撤得下？ 回家後被家長說服或校方宣佈放假該怎麼辦等問題提出疑問，ＸＸ作了回答，對於此項提案未作最後表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頁三二 〇)現在看來，這位北大提案人應當就是楊濤。另據報導(聯二十六日)，二十五日深夜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上，「有一北大同學提出空校計劃，但大家懷疑其可行性 而沒能通過。」「空校」方案同時在在北高聯和廣場上提出，可能是北大籌委會的共識。據邵江回憶，是北大幾個研究生向籌委會建議的，二十四日他們寫了一張大 字報。

另外，北高聯二十五日決定「用最激烈的方式」向政府施壓，組派五個宣傳團去外地，吾爾開希等十五人去天津；二十六日北大籌委會準備改組，成立東北組、西北組、華東組、華南組和西南組(大，二十七日；驚，頁一四八，一五一)，似與「空校運動」有關。

１０)、這次向柴玲電話核對，她說那天她對楊濤的「空校計劃」確實也很有興趣，是傾向於試探與推行的。第二天(二十七日)中午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 還提出「空校運動」，詳見註十六。晚上又在指揮部會議上提出「主動組織學生宣傳隊伍南上北下，發動全民運動，部分外地同學亦回家鄉進行宣傳」(快二十八 日)，當與「空校計劃」和「聯省自治」的設想都有關係。

１１)、S老師在整個運動中，對柴玲、我和廣場指揮部，都有極大的影響。他是中共歷次【以上第 174 頁】政 治運動的直接受害者，入獄、流放十幾年。他曾詳細地對我們講述毛澤東的「陽謀」、中共歷次秋後算帳、出爾反爾的情況，和他許多同學入獄、流放和遭處決的悲 殘結局。曾幾何時，我對運動中人和事也極度失望，想離開廣場，逃離中國，但當見到S老師那麼堅定、執著而大無畏的神情，便自慚形穢；而S老師的言行，令我 認識到，中國真正的脊樑，多是默默的；為了他們，我不能氣餒。

１１)、S老師在整個運動中，對柴玲、我和廣場指揮部，都有極大的影響。他是中共歷次【以上第 174 頁】政 治運動的直接受害者，入獄、流放十幾年。他曾詳細地對我們講述毛澤東的「陽謀」、中共歷次秋後算帳、出爾反爾的情況，

和他許多同學入獄、流放和遭處決的悲 殘結局。曾幾何時，我對運動中人和事也極度失望，想離開廣場，逃離中國，但當見到Ｓ老師那麼堅定、執著而大無畏的神情，便自慚形穢；而Ｓ老師的言行，令我 認識到，中國真正的脊樑，多是默默的；為了他們，我不能氣餒。

１２)、這次電話核實中，李錄說他記不太清了；他對當時有印象的有兩點：(一)撤出廣場，並不意味著能避免屠殺，只不過是由公開的屠殺變為秘密處決而已；(二)，按民主程序，應當尊重「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的決議。也許李錄對「空校計劃」的可操作性也不以為然，使他對此事根本不太重視。

不過，柴玲對當時的情況還記得很清楚，與我的印象一致。見到在指揮部都通不過，也就沒有對此計劃進行組織。二十七日的指揮部內部會議(見註十；快二十八 日)，我因返北大找梁二，沒有參加，不清楚柴玲是否明確提議了「空校運動」，還是「聯省自治」。李錄自傳對此事沒有提及。

１３)、與五月二十六日相關的重要事件還有：

(一)、廣場上紀念碑頂層打出紅色橫幅：「召開人大，推進民主；罷免李鵬，結束軍管。」此舉自然是受到厲以寧、胡績偉等三十六位人大常委聯盟要求召開人 大常委緊急會議這一事件的影響。此事由來已久，十七、八日三十六常委既已聯名，為何遲至二十六日才公開打出橫幅，其【以上第 175 頁】過程待考。

當時新聞媒體有廣泛報導，甚至在二十五日傳已有近六十名人大常委聯名(東二十六日)，離法定自動無條件召開緊急會議的半數(七十八人)並不太遠。這也是當時激勵同學們堅守廣場的大氣候之一。後來，胡績偉在三十號作了一個「鄭重聲明」(文三十一日)，似已受到很大壓力。

(一)、廣場上紀念碑頂 層打出紅色橫幅：「召開人大，推進民主；罷免李鵬，結束軍管。」此舉自然是受到厲以寧、胡績偉等三十六位人大常委聯盟要求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這一事件的 影響。此事由來已久，十七、八日三十六常委既已聯名，為何遲至二十六日才公開打出橫幅，其【以上第 175 頁】過程待考。

當時新聞媒體有廣泛 報導，甚至在二十五日傳已有近六十名人大常委聯名(東二十六日)，離法定自動無條件召開緊急會議的半數(七十八人)並不太遠。這也是當時激勵同學們堅守廣 場的大氣候之一。後來，胡績偉在三十號作了一個「鄭重聲明」(文三十一日)，似已受到很大壓力。

(二)、包遵信、王丹等四十餘人在社科院十二樓經濟所禮堂開會(「知識界聯合會」或「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作四決議：(１)要求李鵬下台；(２)軍隊撤離；(３)天安門靜坐堅持下去；４)組織動員工人罷工。(驚，頁一五一)

(三)、王丹在北大貼大字報「來自廣場的緊急呼籲」：建議組四支隊伍，每

支二百人，去廣場輪流值班。「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打一場持久戰」(明二十七日；頁一五〇)。我的印象，當時北大留在廣場上的同學已很少，王丹當是為了增援廣場。印象中，王丹在五月六日同我一道，已辭去北大籌委會中的職務，故這時 才用大字報的形式向籌委會提建議；也許他本人也沒時間回北大。

(四)、嚴家其、包遵信發表「告李鵬書」，具體提出「推倒李鵬政府的二個步驟」：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和人大臨時大會。(天頁三四二)

(五)、深夜，北大籌委會廣播「五千人絕食計劃」，由「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自願組織絕食團，替代現在廣場上的學生。」(驚，頁一五一)此舉當與劉曉波有關。據梁二在巴黎會議上說，劉在同學絕食當天，即已提出知識分子也絕食(會頁二七一，二九五)。劉等到六月二日才找到三人支【以上第 176 頁】持，可見其受阻之大，亦見其決心之烈。

(五)、深夜，北大籌委 會廣播「五千人絕食計劃」，由「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自願組織絕食團，替代現在廣場上的學生。」(驚，頁一五一)此舉當與劉曉波有關。據梁二在巴黎會議上說， 劉在同學絕食當天，即已提出知識分子也絕食(會頁二七一， 二九五)。劉等到六月二日才找到三人支【以上第 176 頁】持，可見其受阻之大，亦見其決心之烈。

１４)、連勝德係天津航海學院學生，能力極強，精力極旺，是廣場上最激烈的堅守派，也是令廣場指揮部最頭痛的一個人。到五月底，他的激烈作風已不被各方 所接受。至六月一日凌晨我和柴玲遭綁架，他卻召集記者會宣佈大撤退，當即被外高聯二十一校代表罷免其主席職務(聯六月二日)，以致許多人相信他已被中共收 買。但六四後，連勝德亦被捕，有同學(如熊焱、王丹)與他同獄。八九學運中，同學們之間因觀點、做法之不同，而導致互不信任乃至內鬨，是可悲的教訓之一。

１５)、「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成立於五月二十三日。雖然對王丹作總召集人並不驚訝，但這麼一個全社會性的組織，竟然還得由學生來打前鋒，我總覺得不對 勁。整個運動中，我始終覺得，這麼一場驚天動地的運動，竟不得不由一群少不經事的學生來「領導」，這個事實本身，實在是歷史的悲哀(參拙文《反思中的困 惑》)。

但實際上，據張倫的回顧，「聯席會議的主要發起和組織的人， 是陳子明和王軍濤他們這批人」(會頁二三一－二三三)。包遵信的回憶與陳小雅的分析也印證了這一點。五二七是第三次會議，也是我唯一參加過的一次，在社科 院政治所開的。當時的所長嚴家其先生，後來在巴黎告訴我，那天他就在所裡，但沒有與會。中共對陳子明、王軍濤定罪為「黑手」，就與此會有關。我當時的印象 是，此會以一小批知識精英和一些學生骨幹，加上工自聯等代表組成，並沒有多大覆蓋面，但「十點聲明」卻署了十個團體的名，當時只覺得是空架子。【以上第 177 頁】

１６）、堅持到六月二十日確實是「十點聲明」本來的建議。大公報二十九日對此有較清晰的記載：

二十八日北京專電：「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今天在一印發的聲明中提出，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靜坐請願活動至少將延續至六月二十日人大八次會議召開為止。「聯 席會議」昨天由學生領袖王丹宣佈一份聲明曾建議：在本月三十日撤出廣場，靜坐請願告一段落。今天印發的聲明修正了以上建議。聲明解釋說，「聯席會議」最初 草擬的聲明就提出，要堅持到六月二十日，但後來聽取了廣場總指揮柴玲等的匯報廣場情況，以及市高聯動議撤出廣場後，「聯席會議」把建議改為於五月三十日撤 出廣場。「聯席會議」今天再開會討論後，否決了五月三十日撤退的建議，維持原來堅持至六月二十日的建議。

另據文匯報二十九日：「廿七晚，提前撤離廣場的決定，是由於聽取廣場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封從德的意見。」老木在巴黎會議上也回憶道：「五月二十六日（當是二十七日－－作者註）的聯席會議是封從德和柴玲兩人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參加聯席會議。他們當時神情非常疲憊，也非常激動，要求撤退。」（會頁二三 六）這與我在該會上的回顧相印證：「關於撤與不撤。撤是我用策略性的方式提出的，以當時廣場上沒有錢為理由，那是二十七日，是我接管廣場財務的第三天，廣 場上沒有錢，我認為堅持不到六月二十日。」（會頁二七一）

劉曉波對此的記述是：

「最先發言的是柴玲，她介紹了廣場上的令人沮喪的局面，『外高聯』和廣場指揮部的衝【以上第 178 頁】突、 外地學生在北京造成的不良影響，最後她提出了『空校運動』。王丹和吾爾開希都反對『空校』，王丹認為『空校』是不可能的。吾爾開希提出他帶人南下上海、廣 州、武漢、成都等地的計劃，爭取從外地聲援北京。接著是封從德發言，他講了廣場上的物資管理狀況和財政狀況。他說廣場上每天大約需要五萬元人民幣，要求 『高自聯』撥款。邵江和梁二代表『高自聯』參加會議，他們說這要開籌委會討論決定。」（《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頁一七九－一八〇）

「最先發言的是柴玲，她介紹了廣場上的令人沮喪的局面，『外高聯』和廣場指揮部的衝【以上第 178 頁】突、 外地學生在北京造成的不良影響，最後她提出了『空校運動』。王丹和吾爾開希都反對『空校』，王丹認為『空校』是不可能的。吾爾開希提出他帶人南下上海、廣 州、武漢、成都等地的計劃，爭取從外地聲援北京。接著是封從德發言，他講了廣場上的物資管理狀況和財政狀況。他說廣場上每天大約需要五萬元人民幣，要求 『高自聯』撥款。邵江和梁二代表『高自聯』參加會議，他們說這要開籌委會討論決定。」（《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頁一七九－一八〇）

據邵江回憶，當時開希與王丹都不贊成「空校」，王丹說「空不了。」

１７)、當時廣場財政吃緊的情況，有廣泛的報導(東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大、快、明；二十八日大、文、快、東、明)，基本情況是：二十四日接手，北高聯只留下九千元；二十五日買麵包賒帳一萬五；二十六日仍欠九千；二十七日晚才無赤字，亦不過正五千。

我接收財務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五日，便向各界公開財務情況(東二十六日)，以後每天傍晚都有一個收支大帳向外公佈(見圖１６)，同時在記者問到時，也坦 承當時遇到的財務混亂問題(組織間的)和一些貪污跡象，為的是將財務透明化以杜絕腐化，以保護學運形象。後來出到海外，讀當時報導，才明白，其效果並不 佳，反遭致懷疑，以至許多捐款不敢直接給廣場，而幾十萬幾十萬的捐款竟送到中共控制的市紅十字會口中。事後觀之，扼腕慨嘆。

梁二和我是廣場上前後手的財務主管，詳情見二人的發言和答疑（會頁二四一－二六二)。當時北高聯總共接到的捐款，梁二在一次記者會說是九十八萬五千元(會頁二五七，二六二)。

１８)、劉曉波對吾爾開希的指導，梁二在巴黎會議上有詳細介紹(會頁二九四)：「……開【以上第 179 頁】希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高來高去，脫離群眾基礎的現象呢？這實際是曉波給他造成的虛假現象。曉波一直提倡所謂『民間制衡力量的英雄』、『英雄凝聚力的作用』。曉 波當時對開希講：『開希，你現在應該樹立自己的形象。』所以開希就一直到處找名聲，到廣場要總指揮，到師大要主席，到高聯自己充當主席，總而言之，我想是 他受到曉波的勸說。開希第一信奉精英主義，第二希望自己成為『瓦文薩』。我覺得曉波這一點對他產生了很強的誤導，以至於開希對師大失去控制，在廣場上失去 同學的信任，這都是有大的影響的。在這裡對曉波提出一些批評。開希一直也比較信奉這個，實際上在當了名譽主席之後，他也就完全『名譽化』了，一直跑聯席會 議，一直再沒有回到師大處理實際事務。……」

１８)、劉曉波對吾爾開希的指導，梁二在巴黎會議上有詳細介紹(會頁二九四)：「……開【以上第 179 頁】希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高來高去，脫離群眾基礎的現象呢？這實際是曉波給他造成的虛假現象。曉波一直提倡所謂『民間制衡力量的英雄』、『英雄凝聚力的作用』。曉 波當時對開希講：『開希，你現在應該樹立自己的形象。』所以開希就一直到處找名聲，到廣場要總指揮，到師大要主席，到高聯自己充當主席，總而言之，我想是 他受到曉波的勸說。開希第一信奉精

英主義，第二希望自己成為『瓦文薩』。我覺得曉波這一點對他產生了很強的誤導，以至於開希對師大失去控制，在廣場上失去 同學的信任，這都是有大的影響的。在這裡對曉波提出一些批評。開希一直也比較信奉這個，實際上在當了名譽主席之後，他也就完全『名譽化』了，一直跑聯席會 議，一直再沒有回到師大處理實際事務。 ……」

但是，僅僅一周時間，六四凌晨的紀念碑上，劉曉波便對柴玲說「吾爾開希不是個東西！」他和侯德健都相信開希是裝病昏倒，臨陣脫逃。(開放九零年七月刊)。劉出獄後寫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更是對昔日栽培過的「中國瓦文薩」大加鞭笞。

倒是開希在九〇年還撰文為獄中的劉曉波辯護，因為在美國聽見一位華裔教授對他「老師」的批評。開希文中稱，「我在天安門廣場運動時是從曉波那裡學到的民 主的最基本知識。劉曉波所推崇的一個觀點是：人應該自我表現、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並以這種『自我意識』作為基礎形成的公民意識，才是民主的基礎。」該學 者指劉曉波「沒有獨立的觀點，是隻跳來跳去的青蛙」，開希則在文尾以「蛤蟆」回敬之(「劉曉波是隻『青蛙』？」香港《百姓》，一九九零年五月一日，第二一 五期。)【以上第 180 頁】

１９)、開希想要獲取運動最高地位，由來已久，其見證並不止梁二一人。沈彤在巴黎會議上(會頁二〇三)講到 五月十九日下午四 五點，在統戰部見到開希等人復食吃面條的情形。當時「氣氛開始比較活躍，那時知道戒嚴的事情反而感到輕鬆了。大家很高興，互相簽字，照 像啊什麼，開希踢碎了三個暖壺。就在這時開希突然宣佈成立廣場臨時總指揮部，總指揮全局。我問這總指揮部幹什麼？開希就說我當總指揮。我說具體怎麼和絕食 團協調呢？開希說我當總指揮。我說下一步成立總指揮部怎麼組織撤離呢？開希說我當總指揮。回答了我三句。」劉曉波也提到吾爾開希「當上總指揮再說」的表述（《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頁一八二)。

開希到了海外，更加相信他是學運中「最有個人魅力」的「學生領袖」。九〇年四月在巴黎的一個訪談中（ TT，四八一)，法國的中國研究專家聽他介紹到北高聯的四□二八的選舉時問：

學者：你只是師大一年級的學生，怎麼就選了你了呢？

開希：我怎麼知道？大家有幾個標準：能力，魅力和代表性。從這三點來看，我都是最佳的。

另外，劉曉波的「民間制衡機制」理論，還可以從當時媒介中開希的言論裡見到。如五□二七傍晚那次記者會上，開希說，宣佈三十日撤離，「是為了在民間創造一種民主機制，使人民成為一種制衡力量。」(文二十八日)

實際上，開希作為「學運領袖」的形象，確實得力於媒體和劉曉波的這套理論的栽培；而【以上第 181 頁】其實，整個運動期間，開希在北高聯，有相當長的時間並無「主席」頭銜，只是大家不好說穿而已。

實際上，開希作為「學運領袖」的形象，確實得力於媒體和劉曉波的這套

理論的栽培；而【以上第 181 頁】其實，整個運動期間，開希在北高聯，有相當長的時間並無「主席」頭銜，只是大家不好說穿而已。

２０）、「十點聲明」有二個版本，老木在巴黎會議上說：「到了廣場，我和甘陽兩個人炮製了一個關於撤退的《十點聲明》。這個《十點聲明》在海外出現了兩 個版本：一種是關於三十日撤退，一種是關於堅持到六月二十號。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混亂呢？我的印象就是到了廣場表決的時候李祿反對，多少人參加表決我不知 道。我當時是趕快去印這個《十點聲明》去了。回來之後他們要求我改，我當時就火了，我說，剛剛印好，都作出決議了，怎麼又要改呢？我聽說，王軍濤也同意你 們這個反對撤退的意見。因為你們學生作什麼決定，我們都支持。」（會頁二三六）

李錄自傳中將王丹唸的說成是堅持到六月二十號（頁一八〇），顯然是搞錯了，因為當時的媒體，最初報導的都是三十日撤退（二十八日大、文、明、時）。李錄書中對此二版本的修改過程說得也很含混。

這次電話核實中，李錄說，當他聽見柴玲回到指揮部（張伯笠也在場）時說三十號撤的建議，便說：那麼就在「營地聯席會議」（「廣場議會」）上提吧，看通得 過不；今晚召集營地聯席會議，不知還來得及不。不過李錄自傳中還是提到了他當時反對的兩條理由（頁一八〇），同頭一天他反對「空校計劃」的兩條是一樣的（見註十二）。

李錄在電話中還印證了老木說王軍濤也支持不撤的情況。李祿的回憶是：當時柴玲說，本來知識分子也不是說三十號撤；這時，王軍濤拍拍李錄的肩膀，很誠懇地說：要是同學們願意堅【以上第 182 頁】持到六月二十號，我們全力支持；你們指揮部說要什麼吧，人力財力，我們都可以提供。說完，大概也是王軍濤，當即將「五月三十日」劃掉，改回為「六月二十日」。

李錄在電話中還印證了老木說王軍濤也支持不撤的情況。李祿的回憶是：當時柴玲說，本來知識分子也不是說三十號撤；這時，王軍濤拍拍李錄的肩膀，很誠懇地說：要是同學們願意堅【以上第 182 頁】持到六月二十號，我們全力支持；你們指揮部說要什麼吧，人力財力，我們都可以提供。說完，大概也是王軍濤，當即將「五月三十日」劃掉，改回為「六月二十日」。

這可能正好是我主持「自由論壇」的時候，很快我又回北大去取錢，因此這一反覆我當晚並不知情。第二天回廣場，也沒在意。撤不撤，當時我其實無所謂，最關心的還是通過民主機制沒有。

２１）、據報導（快二十八日），就在這個晚上（五月二十七日），指揮部還討論過撤留問題。柴玲又在會上提到「南下北上，發動全民運動」。詳見註十。

２２）、「聯省自治運動」之設想，柴玲當早有意向。當時我也聽到過一些類似理論，總不以為然，因為學運不是說「不介入黨內之爭」嗎？對其可操作性

亦甚懷 疑。不過，事後發現，當時全國形勢，確有這麼一股勢頭。比如這次唐柏橋回憶(他當時是湖南學運主將)，五月二十八日「全球華人大遊行」，湖南省高聯乘勢真 的來個「勝利大遊行」，將同學撤出市中心廣場。就在第二天，他便在一位軍政要人家中，與一些人商討「湖南自治」、「聯省自治」的計劃。當時有軍方元老手下 的人來找到唐柏橋等同學，說他們已作好了大量準備工作，打印好了一份宣言，題為「湖南應該愛國自治」(唐柏橋現在還有此稿，並給了我一份複印件)，並已準 備在六月六日宣佈湖南自治，離六四只差二天。唐後來又了解到，廣東軍區、雲南省也有類似情況。同樣，湖南同學也有是否應當「介入黨派之爭」的爭論，這可與 湖南另一骨幹劉衛在巴黎會議上的發言相印證(會頁三三六)。【以上第 183 頁】

２３)、Philip Cunningham，近年來報導稱他是「美國記者康寧漢」，其實他叫「金培力」，當時是在北師大的留學生。九〇年四月柴玲同我逃到巴黎，還見過他一面。

２４)、就在這天(二十八日)凌晨，又在柴玲身上發生了一起「政變」，見(大二十九日)：「進京的學生大都抱著一腔熱情而來，對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抱有 很大期望，對撤退多有抵觸，持反對態度。他們認為，北京是全國學運的焦點，是一面具有巨大象徵意義的旗幟，這旗倒了，將是對全國學運的沉重打擊。今天凌晨，因而發生了外省市高校學生代表要衝進學生廣播站，要找柴玲等北京學生領袖理論的事件。」廣場「政變」參註七。

２５)、楊濤在二十八日晚的一百八十度轉變，從一直力圖勸撤，到毅然接受主持廣場整頓，只能說明當時廣場上那股「磁場」之強；第二天楊濤又立即辭任，也 說明當時要整頓廣場秩序談何容易。我總沒弄清楊濤辭職的原委，也許因為他是北大和北高聯主席的緣故吧。在我的印象中，楊濤一直是個很冷靜的幹才。參註八。

２６)、二十八日晚「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的情況，廣見報導(二十九日明、文、快)。

另據(文三十日)：北高聯常委二十八晚亦在北大開會，作出四項決議：(１)廣場靜坐請願繼續堅持；(２)繼續全面罷課；(３)號召離校宣傳；(４)健全高聯組織。其堅持廣場的方針，與指揮部不謀而合。

(一九九五年五月作於於萊頓大學，一九九八年二月略有補正於巴黎。作者九七年按：本文原作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中旬，由於文中一位當事人的堅決反對而未發 稿。當時柴玲五二八錄像談話所引發的爭議正沸沸揚揚，這位當事人認為文中將他描述得過於強硬；我也考慮到不宜在這個敏感時期使問題複雜化，尤其是史料整理 的【以上第 184 頁】工作必須盡量避免讓當事人產生抵觸情緒，因此也就將此稿壓了下來。

(一九九五年五月作於於 萊頓大學，一九九八年二月略有補正於巴黎。作者九七年按：本文原作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中旬，由於文中一位當事人的堅決反對而未發稿。當時柴玲五二八錄像談話 所引發的爭議正沸沸揚揚，這位當事人認為文中將他描述得過於強硬；我也考慮到不宜在這個敏感時期使問題複雜化，尤

其是史料整理的【以上第 184 頁】工作必須盡量避免讓當事人產生抵觸情緒，因此也就將此稿壓了下來。

然而當時許多批評柴玲或衛護柴玲的文章都對一九八九年五月底的廣場上的實際情況不甚瞭解，我壓著一些情況不說出來，心中本來就有愧；等到影片《天安門》 出來之後，我發現我在其它一些文章中提到的柴玲錄像的一些背景情況並未在影片中得到反映，導致不小的偏差，這時我更加感到不安。再次與這位當事人聯絡時他 已平靜許多，不再反對我發此稿。封從德謹識於一九九七年五月荷蘭萊頓大學，作者九八年按：以上文字於一九九七年五月寄給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結果既未 發表，也不說明理由。）【以上第 185 頁】

六四血夜－廣場滅燈的一刻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星期日 陰，下午雷陰雨

轉移指揮部

凌晨一點。轉移了財務部之後，我鬆了一口氣。下一步要轉移指揮部。經商議，我們決定將廣場上所有同學都集中到紀念碑周圍，憑藉地勢作最後抵抗。李錄與柴 玲留在絕食團廣播站，在廣播中請求同學們向紀念碑匯聚，並批駁了「拿起武器」的言論，強調學生運動歷來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紀 律。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在紀念碑上重建指揮部。兩個廣播站都在平地，很容易受到攻擊，因此都不能繼續作指揮部。我讓李錄和柴玲等人二個小時之後到紀念碑三層去找我，便告辭開始行動。

新的廣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揮部)建在紀念碑三層西南角，即原先財務部所在的地方。這個方【以上第 186 頁】位 最不容易受到軍隊攻擊──我估計軍隊主要從西面和北面來。而確保軍隊找不到學生的指揮系統，是我重建廣播站和指揮部的主要原則。技術並不複雜，只須將「學 運之聲」的廣播器材搬上來即可。我們啟用了那台長期不用的發電機來供電，以防軍方突然斷電。有兩桶汽油，足夠燒一夜。我請了一位懂行的同學專門看管發電 機，並讓人將汽油隱藏到子彈打不著的地方，以防不測。

新的廣播站(也就是新的指揮部)建在紀念碑三層西南角，即原先財務部所在的地方。這個方【以上第 186 頁】位 最不容易受到軍隊攻擊－－我估計軍隊主要從西面和北面來。而確保軍隊找不到學生的指揮系統，是我重建廣播站和指揮部的主要原則。技術並不複雜，只須將「學 運之聲」的廣播器材搬上來即可。我們啟用了那台長期不用的發電機來供電，以防軍方突然斷電。有兩桶汽油，足夠燒一夜。我請了一位懂行的同學專門看管發電 機，並讓人將汽油隱藏到子彈打不著的地方，以防不測。

凌晨二點過，柴玲、李錄等人撤到紀念碑三層上來，絕食團廣播站的站長王童告訴我，他將那裡所有的器材都砸爛了，只帶了一隻收錄機上來。

隨著指揮部轉移過來，各種情報、爭議和混亂也隨之而來。流血事件的報告不絕於耳，紀念碑上的市民和學生便出現了巨大的意見分歧，而這些分歧都戲劇性地匯 聚到柴玲的頭上－－一個工人拿一隻手槍頂著柴玲:「我的兄弟已經被打死了，你們學生要是還要說什麼『非暴力』的屁話，我就一槍崩了你！」另一個學生則拔出 一把森人的匕首，衝她喊道:「誰對軍隊動手就是害大家的命，誰要是說拿起武器，我就先和他拚！」

最後的紀念碑

當時的緊張氣氛，難以描述。實際上，在紀念碑上同時有好幾起不止於「文鬥」的兩派爭執，也不盡是市民要以牙還牙，血債血償，也不是所有學生都堅持「非暴 力」。在擁擠的人群中，不時爆發陣陣騷動，新的廣播兩度險些被衝垮。那個拿槍的工人大約是「工人敢死隊」的，後來【以上第 187 頁】這班人馬乾脆離開紀念碑，紅著眼去跟軍隊拼命去了。後來聽說沒有一個有下落。

當時的緊張氣氛，難以描 述。實際上，在紀念碑上同時有好幾起不止於「文鬥」的兩派爭執，也不盡是市民要以牙還牙，血債血償，也不是所有學生都堅持「非暴力」。在擁擠的人群中，不 時爆發陣陣騷動，新的廣播兩度險些被衝垮。那個拿槍的工人大約是「工人敢死隊」的，後來【以上第 187 頁】這班人馬乾脆離開紀念碑,紅著眼去跟軍隊拼命去了。後來聽說沒有一個有下落。

我竭力維護指揮部的秩序，一面在廣播中不斷呼叫〇〇八和北大二十八支隊來虛張聲勢，一面將帶上來的那二箱「北京大學」T 恤衫分發給守衛在廣播站周圍的同 學，實際上無論是誰，套上這身「號衣」便自然成了廣播站的糾察－

－廣播站的糾察－－廣播站周圍立即一圈的白色，如此氣勢之下，再也沒人搗亂了。一個簡單的 技術，往往可以起決定性的作用。

新開放的廣播，採用「自由論壇」的形 式，讓大家自由辯論，實際上還有發泄與穩定情緒的作用。經過一段激烈的辯論，「非暴力」的原則得到了捍衛。這個原則最有說服力的論點是：眼下，大軍壓境， 一個人的暴力反抗等於是全體遭殃；長遠來說，我們從一開始便堅持非暴力，不讓血仇一環接一環地反覆下去，便等於是拯救了無數無辜的生命和祖國的安寧。

三點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絕食四君子趕到廣播站，要勸說同學們撤離。

侯德健是我很推崇的詞曲作家，我不光覺得《龍的傳人》唱出了中國人的屈辱與希望，也十分欣賞他其它一些歌曲的深沉。在大陸共產黨允許的文化氛圍之內，他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與個性的藝術家。而劉曉波在激進反傳統的大學生中，也頗有影響。

因而，他們的勸說，最初引起許多同學的驚訝與反感：知識分子的軟骨病。這背後的潛意識大概是：你們當然很清楚，夾在學生最中間，是無法臨陣脫逃的。

同仇敵愾

【以上第 188 頁】

與指揮部講和的，還有那些平時總來與我作對的人。如那個穿 T 恤衫自稱「無領無袖」的劉強，和近日反叛的糾察總 長張建，這時都到廣播站來，重重地點點頭，說：嗯，烈火見真金。工人糾察隊和市民敢死隊的人也站到了指揮部一邊，大林和程真上到紀念碑來同我們擁抱，說要 與我們死守到底。劉曉波低聲地對柴玲說：「吾爾開希真不是個東西！我現在才了解了你們。」……

共同抵禦外強的決心，促成了我們內部的團結。

因此，「絕食四君子」在廣播中最初勸說大家的，尚是關於堅持非暴力原則的重要性。他們依然採用習慣的知識分子的腔調作長句大段的演說，但我記得很深的是 劉曉波說：「……請你們放下手中的不成武器的武器，否則等於是謀害大家的性命，也給政府製造口實，損害整個學生運動的形象。」

口才最好的還數侯德健，他說：「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

這時，柴玲和李祿去北面巡視，我在廣播中配合他們，請大家將手中的磚塊、木棍、汽油瓶和槍枝交給指揮部，並重申了學生運動一貫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和這個 原則與達到我們追求的必要性，也強調了指揮部的權威和同學們應遵守的紀律。我要求○○八的下屬、北大二十八支隊和所有在場的糾察隊員配合指揮部的收槍行 動。

一個工人含著眼淚交出一挺重機槍，辛苦和其它同學抬到毛主席紀念堂前的群雕下給砸【以上第 189 頁】了。木棍、磚塊、槍械集中到一個帳篷中，由專人看守。劉曉波也收了一些槍砸了。二個來自法國的記者傳口信到指揮部：「我們一定與同學們堅持到最後！」我很感動地在廣播中向大家宣佈這個情況，紀念碑

上一陣掌聲。這時只有極少的外國記者敢於到廣場上來。

一個工人含著眼淚交出一挺重機槍，幸苦和其它同學抬到毛主席紀念堂前的群雕下給砸【以上第 189 頁】了。木棍、磚塊、槍械集中到一個帳篷中，由專人看守。

劉曉波也收了一些槍砸了。二個來自法國的記者傳口信到指揮部：「我們一定與同學們堅持到最後！」我很感動地在廣播中向大家宣佈這個情況，紀念碑上一陣掌聲。這時只有極少的外國記者敢於到廣場上來。

又有一人來指揮部捐了一張一百元的人民幣，他指著與他一起的另二人，說他們來自海南島，「這是我們最後的捐款，請指揮部收好。我們要與同學們死守到底 ！」我異常感動，在紙幣上註明「海南捐款」，向他們保證將用生命保護好它。又有一個糾察隊長交給我他剩下的所有錢，二百左右，連毛票帶鋼蹦兒都給了我。

這時的氣氛，依然是「同仇敵愾，死守廣場！」

「談判」還是「斡旋」？

接下來，「四君子」開始勸撤了。滔滔不絕有半個小時。停頓之間，紀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與槍聲如除夕的炮丈，從遠處傳來。

自然也有同學操起話筒表示反對，最主要的理由是：

一，北京市民冒死堵軍車，我們在最後關頭主動撤出陣地，日後無顏見江東父老；

二，軍隊不一定能夠立即佔領廣場，只要堅持二個小時到天亮，百萬市民就會湧到廣場上來，我們就有希望堅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廣場，一切便無可挽回了(作者九八年註：我當時並未【以上第 190 頁】聽說「趙紫陽傳話：堅持到天明。」)。

二，軍隊不一定能夠立即佔領廣場，只要堅持二個小時到天亮，百萬市民就會湧到廣場上來，我們就有希望堅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廣場，一切便無可挽回了(作者九八年註：我當時並未【以上第 190 頁】聽說「趙紫陽傳話：堅持到天明。」)。

這時，許多同學並沒有真切地意識到，軍隊是決心而且已經採用了最為殘酷的手段。大家還不能相信，這些「人民子弟兵」會不用木棍和橡皮子彈來驅趕人群，而 會用惡毒的開花子彈(達姆彈)。許多人設想到的最壞情況不過是頭上挨兩棍子，最多打傷打殘抓進監牢。在同學們的頭腦中，南韓學生與警察對峙時的催淚彈、警 棍和橡皮子彈的印象太深刻了，這兩年在大陸電視裡，幾乎天天都有這樣的新聞鏡頭。

在辯論過程中，指揮部除了堅持提倡非暴力原則以外，並沒有加入。我作為廣播站的主持人，更不宜加入辯論的任何一方。

四君子有點著急了，侯德健過來向我提議：由他們四人出面，與軍方談判，要求和平撤離廣場，要求戒嚴部隊在大家撤出時保證安全，他希望徵得指揮部的同意。

我沉吟片刻，對侯德健說：

「你們願意做什麼，是你們的自由；你們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態去與戒嚴部隊交涉，我個人表示欽佩；但是，你們絕不能說是代表學生指揮部去與軍方談判。與軍方交涉的結果也必須經過同學們的表決才能生效。」

我記得很清楚，侯德健是在明確得到我的這樣界定之後，才與另三個走下紀念碑，去與軍方交涉的。

因此，這次所謂「談判」，勿寧稱為「斡旋」。【以上第 191 頁】
這時，是凌晨三點三刻。

四點正，廣場燈滅

凌晨四點正，廣場上的燈全滅了。驚駭之中，大家感到死神在黑暗中披著一道道閃光向紀念碑襲來。剎那間，一切都像是凝固了，廣場上靜得怕人。

為了安定大家的情緒，我將已經準備好的《國際歌》等錄音在廣播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以上第 192 頁】
INTERNATIONAL
就一定要實現！
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
讓思想衝破牢籠
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
趁熱打鐵才能成功

《義勇軍進行曲》(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與《國際歌》遙相呼應，同樣激勵著這次運動中，為爭取憲法中賦予的言論、結社等自由的眾多青年公民：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讓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每個人都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以上第 193 頁】

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炮火
前進
冒著敵人的炮火
前進，前進，進！

突然，從南面的紀念堂方向傳來一陣猛烈的槍響，是士兵在向紀念碑點射，大概用的是自動步槍。當時我是站著的，面向東北，劉光一下子將我的頭按下，後來他 說，當時一顆子彈就在我們倆的頭頂上空穿過，語氣神情，頗有責備之色。而當時我覺得要蹲下身來躲槍彈，簡直是一種羞辱。

點射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十幾分鐘，目標主要是紀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這些喇叭離我們頭頂不足一米。很快，他們便將喇叭殼打成蜂窩一般，但是並沒完全擊中連到廣播站的導線。

我實在驚詫於這些「人民子弟兵」竟毫無顧忌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開槍！

而這黑暗中，又有多少罪惡發生？

「四君子」勸撤

【以上第 194 頁】

四點半，廣場上的燈又亮了。侯德健等人「談判」回來，繼續紀念碑上的去留之爭。侯德健在廣播中對大家說，戒嚴 部隊願意在廣場東南角留出一條通道，讓同學們和平撤走，保證不向和平的同學開槍。記得他提到，戒嚴部隊的唯一要求是要大家務必在早晨七點之前撤出廣場，這 是他們接到的命令中清場的最後期限。

侯德健接下來要勸大家趕快走，這時，從四面八方傳來陣陣的咒罵：

「軟骨頭！」

「投降派！」

「侯德健，你滾開！怕死鬼，要走你自己走，沒人攔你！」

有人衝到廣播站前，揪住侯德健要揍他，說是不許他再動搖軍心，周圍的糾察隊員死死地圍住廣播站，和當中的四君子與指揮部的成員。

劉曉波抓住話筒，急了就結巴：

「同學們，我是劉曉波！請大家相信我們，不要犧牲了！我們已經流了太多的血！一滴血和更多的血是一樣的。」

咒罵的勢頭稍微平息下來，侯德健緩過一口氣，接著對大家勸說道：

「同學們，我相信，現在留在紀念碑上的沒有一個怕死的！我們都不怕死！」

在靜聽的人群中傳來陣陣輕微的哭聲。他接著講下去：

「但是，我們死得要有意義！眼前的事實說明，現在的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為之犧牲了！【以上第 195 頁】我再說一遍：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

「但是，我們死得要有意義！眼前的事實說明，現在的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為之犧牲了！【以上第 195 頁】我再說一遍：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我們追求的是真的生命！」

他最後加上一句：
「同學們，請相信我們，趕快撤走！我會留到最後一個同學撤走為止！」
是侯德健這番英雄主義氣概感動了大家，為最後決定撤走作好了心理準備。

口頭表決，撤離廣場

但是，還缺少一種形式。沒有人願意站起身來率先撤走。
一片寂靜。
這時，劉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須作個表決！趕快！趕快！」
李錄顯得很沉默。柴玲蜷在我旁邊似乎睡著了，我不忍心去驚動她。話筒在我手裡。靜默之中，我用期盼的目光看了李錄好一會兒，要把話筒給他，以為他會像往常一樣，來主持這個重大的表決。但是，不知何故，李錄似乎並沒領會我的意思，照舊的沉默。

然而，就在這一瞬間，我忽然感到內心異樣的平靜，宛如一汪清潭。這是我從未體驗過的奇妙時刻。在我平常最應該睏倦的時刻，我的頭腦中異常清醒地產生了一 個計劃：口頭表決。記得五月十五日凌晨，開希正是用這種口頭表決來推行他的東移計劃的。與開希不同的是，我這時感到最強烈的責任是作個表決，而並不十分在 乎表決的結果如何。【以上第 196 頁】

其實，這時我並不清楚形勢有多險惡。從一點左右，我就在紀念碑三層的東南角上，幾乎是寸步不離，擔心廣播站 被人奪走或毀壞。而北面廣場和長安街的一切情況我都沒看，既不清楚戒嚴部開槍殺人到何等程度，也不知道這時廣場上實際上已經布滿士兵，而且後來聽說，這一 時刻離我們最近的士兵已經到了紀念碑北面的台階下。我甚至沒有聽到廣場上中共發佈的一道道通告。

儘管如此，當時我確實相信，做個表決本身，實在比表決出的結果還要重要。這既是因為經驗之上形成的對於民主程序的信念，也適應於我當時兩可的矛盾心情： 這時我已經不再堅持死守這一唯一道路了，其原因僅用侯德健的說服力並不能涵蓋完全：原先「堅守廣場」的優勢意識已經被打破，確實已經軍心不穩。在兩種對立 的意見僵持不下時，任何群體都是脆弱而不足以抵禦攻擊的。

我站穩腳根，握住話筒，憑藉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決：

「同學們，大家安靜一下，這裡是廣場指揮部。我們現在把廣場上的決定權交給在場的全體同學。現在情況不允許召開各校代表大會，我們就用喊聲大小來作口頭表決－－我數一，二，三，然後願意留守廣場的喊『留守』；再數一，二，三，同意撤離的喊『撤離』。重複一遍，……」

沒有人對這樣的表決方法質疑。我就此執行。結果，憑我的聽覺，兩次喊聲大小不相上下，無法作絕對的分辨。但是，這時的情形不容許我們指揮人員有任何遲疑，於是，我緊握話筒，向【以上第 197 頁】在場的三五千學生和市民，宣佈了這一決斷：

沒有人對這樣的表決方法質疑。我就此執行。結果，憑我的聽覺，兩次喊聲大小不相上下，無法作絕對的分辨。但是，這時的情形不容許我們指揮人員有任何遲疑，於是，我緊握話筒，向【以上第 197 頁】在場的三五千學生和市民，宣佈了這一決斷：

「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較大，因此所有的人從現在起，馬上撤離廣場！」

沒有歡呼，也沒有咒罵，但隱約聽到有人抽泣。我進一步宣佈了撤退方案：

「同學們、工人、市民們，請分批有秩序地離開紀念碑，各校旗幟先打起來走在前面，從廣場東南角，撤到海淀區去。」

心理分析

關於撤離決定，進一步說明原因如下：

一，這一決議雖然幾乎衹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頭表決之後，我同身邊的人小聲徵詢了幾句，沒有人說留，而劉光非常堅決地在我耳邊催促說「喊撤的大聲，喊撤的大聲！」他絕不是個膽小鬼。李祿也不再反對撤離。

二，心理分析。喊「撤離」的人應當不如喊「堅守」的人那麼理直氣壯，既然聽起來一樣大聲，自然判斷想撤的人更多。

三，戰術分析。即使雙方各佔一半，我也傾向於撤。因為若決定留，那麼對喊撤的人，判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數的人自行散去，實際的後果只能是更加動搖 軍心，使紀念碑上的組織結構疏鬆；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趨勢，還是會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帶走，而其混亂局面【以上第 198 頁】將不堪設想；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讓這部分人留下，因為有這麼多人要撤，一旦受到軍隊的攻擊，哪怕是只有少數人撒腿開跑，整個場面必然大亂。無論哪種情形，我都十分擔憂軍隊乘虛而入，而在混亂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幾個弱小者，必然被中共

當作笑柄，說死傷的學生是被同學自己踩的，玷污學生運動的形象。這樣的判斷來 自幾次親身觀察，這樣的預計結果是我最不願意見到的。

三，戰術分析。即使雙方 各佔一半，我也傾向於撤。因為若決定留，那麼對喊撤的人，判撤也不是，留也不是：若半數的人自行散去，實際的後果只能是更加動搖軍心，使紀念碑上的組織結 構疏鬆；弄不好，一旦形成人流，造成趨勢，還是會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帶走，而其混亂局面【以上第 198 頁】將不堪設想；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 讓這部分人留下，因為有這麼多人要撤，一旦受到軍隊的攻擊，哪怕是只有少數人撒腿開跑，整個場面必然大亂。無論哪種情形，我都十分擔憂軍隊乘虛而入，而在 混亂中要是再自己踩死幾個弱小者，必然被中共當作笑柄，說死傷的學生是被同學自己踩的，玷污學生運動的形象。這樣的判斷來自幾次親身觀察，這樣的預計結果 是我最不願意見到的。

四，戰略分析。斷然決定「撤」，也與當時的理論有關。即所謂「新民主啟蒙運動」，這是運動中許多言論和大字報的主調。既是「啟蒙」，目光就要放遠些，收 效也不指望一朝一夕。而這三千同學的生命，絕不應當像有的人希望的那樣，拿去換取甚麼政治功效。我將他們視為未來中國民主之光。這一批人，更加上那些在各 處堵軍車的同學和市民，他們來自祖國四面八方，必然將再遍布全國各地，經過北京血與火的洗禮，爭取自由的意志與追求民主的理念，必將牢牢在心中紮根。十 年、二十年之後，這些促使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富強的希望的種子，必將在祖國的秀麗山川之間，開花、結果、繁衍不息。

自然，作此決斷時，我也有不少顧慮。最大的顧慮是擔憂北京市民將怎樣看待學生，和政府會怎樣加以利用。因此，在說「指揮部認為撤離的聲音更大」時，我已經準備好了，讓歷史來作評價吧。當時內心異常的平靜與堅定，使我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軍方未守承諾

【以上第 199 頁】

撤離的決定剛宣佈，軍方便加緊了行動。一排點射，喇叭被徹底打啞了。當我和柴玲、李祿等人隨隊伍走下紀念碑 三層南側的台階時，十來個穿迷彩服的士兵已經佔領了第三層，離我們不到五米遠。他們頭戴鋼盔，有的手持木棍，有的舉著小型衝鋒槍，在三層上得意地來回走 動，或是忙於收查廣播站的器材與文件－－自然，他們所獲有限，一切重要物件早已轉移。

這時是四點五十分，離七點的期限還差兩個多小時。

軍方沒有遵守承諾。

走下紀念碑，向東南形成一股龐大而緩滯的人流。我夾在這人流中，默默

然，一種決戰後的疲憊，幾絲對未來的茫然。劉光與我寸步不離，隨時警惕地環顧左右。 離開紀念碑不到一百米時，柴玲和李禄過來，說：「我們指揮部的人員應該走到隊伍最前列，以帶領同學們走完最後一程，也讓大家有個主心骨。」

於是，我們向前趕，周圍逐漸匯集了一些失散的護衛人員和秘書處的同學。邊趕邊對同學們說：「這裡是指揮部，我們同大家在一起。」

紀念堂北側集中了好幾百士兵，到了南側時，則見成千上萬黑壓壓一片鋼盔。但是，同學們從廣場東南角向前門方向走時，並沒任何阻礙。大家照舊在兩側拉起了 糾察線，近處有零星的市民圍觀。大家邊走邊唱《國際歌》，聲音低沉，眼含熱淚。有的市民安慰說：「同學們，好樣的。我們都能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 柴燒。」也有的市民習慣地鼓起掌來，隨即便有同【以上第 200 頁】學去攔道，「還鼓什麼掌啊。」然後是一片抽泣。

紀念堂北側集中了好幾百士 兵，到了南側時，則見成千上萬黑壓壓一片鋼盔。但是，同學們從廣場東南角向前門方向走時，並沒任何阻礙。大家照舊在兩側拉起了糾察線，近處有零星的市民圍 觀。大家邊走邊唱《國際歌》，聲音低沉，眼含熱淚。有的市民安慰說：「同學們，好樣的。我們都能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有的市民習慣地鼓 起掌來，隨即便有同【以上第 200 頁】學去攔道，「還鼓什麼掌啊。」然後是一片抽泣。

悲憤、壓抑的情緒到了極點。

踏著「血路」試圖重返廣場

到前門大街時，遇到許多隊士兵，或嚴陣以待，或頻頻調動。這時，同學們終於爆發了：

「狗！」

「法西斯！」

……

軍隊中無人理睬同學們的咒罵。

李錄很是沮喪，說：「我要是死在廣場上就好了！」

柴玲悄悄地告訴我：「他覺得我們幾個總指揮至少死一個在廣場上才好，」她頓了一下，聲音更低，「他最希望是我死了。」

我默然無言，心情愈加沉重。

繞過正陽門樓，向西走到前門大街時，我們趕到了隊伍的前頭。前面就是堂皇的「肯塔基燒雞店」。指揮部成員在隊伍前列一字排開，柴玲居中，我與李錄護其左右，大家手挽著手，迎接前面的任何危險與挑戰。【以上第 201 頁】

李錄建議說：「我們帶著同學們走那條『血路』，一直走到首都首鋼去，發動罷工。」所謂「血路」，是指西長安街，這是傳到指揮部的流血報告最多的地段，從天安門向西數，主要的流血衝突發生在六部口、西單、民族飯店、阜新門立交橋、軍事博物館和公主墳。

然而，當我們穿過狹窄的北新華街，上到六部口時，竟沒能見到任何慘烈的景象。空曠的長安街上，除了幾輛被燒的軍車還在冒著煙，地上撒滿了瓦礫、碎磚。沒有屍體，沒有士兵，大街上空空如也，只有兩邊佇立垂淚的零星市民。

這時，指揮部中形成一股衝動，要帶領同學向東折回廣場這時，不知從哪裡冒出許多市民來，攔在同學們前面，哭著說：

「同學們，不要再犧牲了。前面的士兵架著機槍排在路上。」

噩耗傳來，坦克壓死十一位同學

於是，大家還是向西。過幾百米，到電報大樓時，隊伍後方突然一陣騷動，嘩嘩的如浪如潮地向前湧。我們在隊伍第一排，穩住陣勢。但是幾分鐘後，我們得到後 面來的匯報：幾輛坦克從東面衝來，闖進隊伍，當場壓死十二個同學！（作者九八年註：後來聽說是十一名學生當場慘死，另有兩名學生被輾斷雙腿，其中一名是北 京體育學院的學生方政。又聽說北京大學地理系一政工幹部的兒子被壓殘，不知是不是在六部口。）【以上第 202 頁】

我震驚而憤怒了，發誓要報仇。

接著，又有市民將部分在六部口與西單死難者的名單交給我們。記得那是寫在幾頁通訊錄上的，兩處分別有二十幾個和十幾個名字與單位，是在送往醫院時收集的。

再向西就是西單路口了。十分嗆鼻的煙霧，證明這裡也發生過激戰，催淚瓦斯的毒氣還沒有散盡。這時，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麼的陰沉，空氣是那麼的滯悶。猛然間，發現一個商店的玻璃的窗上，赫然畫著幾個烏紅的字：

「這不是墨寫的，是人血！」

這時六點左右，天已蒙蒙亮，市民們仿佛都回家去了，往日繁華的街面上，再也見不到人影。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在這沉寂中，又有多少母親在垂淚！

我一路上沉悶地思考著眼下的種種情景，對軍隊的行動大惑不解。顯然軍隊內部是有區別的，因為有的部隊對同學們相當克制，有的卻是那麼野蠻。最讓我費解的 是，為什麼要在周末採取流血鎮壓行動？六月三號是星期六，六四是星期天，市民們都在家休息，聚集起來反抗的風險比平日大得多，那麼為何還是選擇了這個時候 鎮壓呢？為何不能等一兩天呢？反正宣佈戒嚴而不能進城已經十幾天了。看來，軍政上層內部極有可能出現了比趙紫陽更進一步的分裂，而這次鎮壓背後實際上極有 可能是一次政變！我又想到了鄧小平在四月底便讓三十

八軍帶棉衣，楊尚昆說【以上第 203 頁】「軍隊進城，絕不是為了對付學生的。」

許多內幕，還在迷霧之中。

我一路上沉悶地思考著眼 下的種種情景，對軍隊的行動大惑不解。顯然軍隊內部是有區別的，因為有的部隊對同學們相當克制，有的卻是那麼野蠻。最讓我費解的是，為什麼要在周末採取流 血鎮壓行動？六月三號是星期六，六四是星期天，市民們都在家休息，聚集起來反抗的風險比平日大得多，那麼為何還是選擇了這個時候鎮壓呢？為何不能等一兩天 呢？反正宣佈戒嚴而不能進城已經十幾天了。看來，軍政上層內部極有可能出現了比趙紫陽更進一步的分裂，而這次鎮壓背後實際上極有可能是一次政變！我又想到 了鄧小平在四月底便讓三十八軍帶棉衣，楊尚昆說【以上第 203 頁】「軍隊進城，絕不是為了對付學生的。」許多內幕，還在迷霧之中。

青天白日，四具橫屍

隊伍在西四路口分為兩路，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的同學繼續往北走；北大、人大、清華等校向西折。混亂之中，柴玲、李錄帶著隊伍向西來與我匯合，奔海澱方 向。許多人不斷鑽到第一排，儼然以指揮部成員自居。我和劉光都受不了，便到前面去探路。這時，開始有市民站在路邊，遞給同學們油條、饅頭做早點。這時，有 幾個同學手中提著血衣攥著子彈，向市民展示軍隊的罪惡，邊走邊敘述：

「你們看看！你們看看！」

路旁的男女老少，見了學生，個個垂淚，有的女人經不住，就「嗚嗚」地哭起來。一路上都是這樣。

白塔寺路口聚了不少市民，約有二十來人站在路當間議論著什麼。我猛然見到十字路口當中，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橫躺著四具屍體！急忙跑到市民當中，拉著一個過路的三輪車工人的手，央他將屍體收起來拉走，在那工人的躲閃中，我說願出錢買他的三輪車。

這時，市民們圍了過來，一個中年壯漢將我推到一邊，用威脅而憤憤的聲音粗聲對我喊道：

「你們學生要敢作這樣的事，我就跟你們沒完了！」【以上第 204 頁】

在我大惑不解之中，才有一位長者提示我說：

「學生，這幾個人都是解放軍！昨晚這裡死了四十多個老百姓，可比他們慘。你看那邊（他指著東面一家醫院，有幾個護士出入），連穿白大褂的都不願救這班凶手啊！」

我這才仔細打量了一番，這些屍首渾身黑乎乎的，分不出是血還是泥。有一個還沒斷氣，神經地抽搐幾下，卻沒有呻吟。

我實在不忍再看下去。在幾分內疚和十分無奈之中，棄之而去。

後隊的同學繞過他們，不知最後有沒有人將他們收殮起來。

再往西不久，到了《解放軍報》社門口，因為是星期天，裡面空無一人。大家也走累了，索性坐在街上，有幾個同學翻過鐵柵門，爬到裡面的建築上將牆上掛垂著的「堅決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定」、「實施戒嚴，維護首都人民的安定團結」之類的紅布標語點上火，燒了。

一路上，同學們一見到這樣的標語就要發瘋似地燒掉。

從阜城門外立交橋向北，沿展覽路到了西苑飯店，幾十層高的大樓上也掛有這樣的巨幅標語。同學們費了較長時間，才爬到樓頂，將標語卸下，用火燒掉。我實在睏得要命，躺在馬路上便睡著了。

李祿將我拍醒，隊伍要繼續開拔。這時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要趕快與北大籌委會聯繫，安排這批外地同學食宿。於是，在西苑飯店外想找輛出租，劉光攔住了我：「你得同大家一道走回學校！」我只好找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同學先回北大報信。【以上第 205 頁】

死亡數字二千七？

自白塔寺之後，便不斷聽到死亡數字在不斷增大：一千六、二千、二千六、二千七……每次我都十分驚詫：怎麼會這麼快就有了統計數字？對其可靠性十分懷疑。 到了西苑，見一個同學抱著一台碩大的中波收音機，這才恍然大悟：地球對岸的「美國之音」在收集北京城的傷亡情況方面，可能比我們廣場指揮部還要詳盡而迅 速。從那個同學的收音機中聽到，「美國之音」報導死了二千七百人，說是紅十字會的一位負責人透露的。另一家很清楚的電台叫「中廣新聞網」，後來才知道是台 灣新辦的，也是類似的報導。我告訴周圍的同學，在指揮部查實之前，不要再傳播這樣的數字。恐怕有的記者又會從同學們口中「引證」死亡數字。

隊伍在人大又分走--批，到北大時，只剩下五百人左右。許多是外地同學。臨近黃莊，我那個黨員同學十分興奮地跳到我和柴玲跟前：「你們還活著！」

張伯笠不知何時歸隊的，在中關村時，有上千市民圍觀，他十分起勁地施展了他的演講才華。到北大校門口時，籌委會在這裡組織了一個歡迎儀式，幾百北大師生圍著廣場同學，聽柴玲和張伯笠向他們控訴軍隊的暴行。

我無法記錄那麼多的眼淚。沿途總有婦女號啕大哭，無人不掩面而泣。這時我才明白，這一夜，全城的人都沒睡，他們很清楚長安街上的慘狀。【以上第 206 頁】

北大博士生的故事

回到北大，已臨近中午。我們將隊伍帶到二十九樓外面，北大籌委會安排了這些同學的食宿。有許多教師、市民願意將外地同學領回家中，以躲避軍隊的搜捕。我 與籌委會的常勁等人談了幾句，便帶著廣場指揮部的人到二十八樓廣播站去，在廣播中，我向廣場回來的同學宣佈廣場指揮部解散，對他們的安排由北大籌委會接 替。

然後，和指揮部幾個人在二三八室商量下一步怎麼辦。這時，有一個 台灣

女記者跑進來，拿著一張條子要請柴玲看。柴已經趴在雙層床上層睡著了，我接過條子，看了看，說:「對不起，我們不認識這個人。柴玲累得不行，能不看 嗎？」記者十分理解地不再說什麼。李錄好像與她很熟絡，同她聊了一會，得知竟有一個台灣記者脖子上挨了一槍，另一個下巴挨一槍，他們真夠勇的。

大家都睏得不行，我和李錄商量著下一步行動計劃。現在必須逃亡或組織地下活動了。我堅持大家必須分散行動，「總不能讓他們一網打盡」。於是，商定好聯絡方案之後，我們分成了三組，辛苦和李錄和他的保鏢等人一組，他們只要了六百元！

我叫醒柴玲，準備我們的逃亡。首先要換衣服，我們到二十九樓找到那個博士生，他給我和柴玲各找了一件換上。我將一些文件留在博士生那裡，請他保留或處置。【以上第 207 頁】

從這位計算機博士生的口中，我們又聽到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原來，昨晚他也到了西長安街上堵軍車，「我們一 隊學生糾察，排在路當中，後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什麼？『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 ！』子彈打來，我左手挽著的同學，一槍倒了；右手的同學，一槍也 倒了－－我是從死人堆中跑出來的。這時我看見什麼？一個女孩，不到二十，左手插腰，右手揮動著(博士學給我們看)，站在路當間，她竟相信坦克會在她面前停 下！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過去。……」

他沒有哭，只是低著頭說，他已不再激動，如其平常一般的泰然。

出來，聽雷雨之中，有籌委會在廣播中放羅大佑的歌：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面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以上第 208 頁】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黑夜裡無奈地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
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

小白兔

柴玲從睏倦中醒來，對我並沒有一個現實的計劃很不滿意。當時我還堅持認為在校園內比哪都安全。找了幾處皆無法藏身。幾個小時之後，我們終於失望，在雨後的校園內盲目地遊蕩，一切已經成為過去，前途卻茫然。一種深深的失落與無力感，向我們襲來。

在電教東面，意外碰到了天安門民主大學的一個籌辦人。他說知識分子要在某校集合，已經準備好了幾十本護照，問我們要不要去。柴玲沉默不語，我卻很生氣，冷冷地說:「謝謝，不必了。」

他沒多加勸說，拎著一隻小手提箱要走。突然，又轉過身來，對柴玲說：「你等著瞧，以後我的名氣會比你更大。」說完就走了。

我幾乎不敢相信，這竟是我們同伴的臨別贈言！但當時，我簡直沒有甚麼知覺，心已麻木。

下午的北大校園，經過暴雨的洗禮，空氣異常清新，與籌委會廣播站中的緊張氣氛宛如兩【以上第 209 頁】個世界。

下午的北大校園，經過暴雨的洗禮，空氣異常清新，與籌委會廣播站中的緊張氣氛宛如兩【以上第 209 頁】個世界。

我們繼續在電教北面躑躅，突然柴玲臉上一副歡欣，宛如幼兒天真的笑：

「兔！」

青草叢中，一隻小白兔蹦來蹦去。昨夜的槍聲並不影響它迎接新的陽光。

小白兔是我們結婚前的寵物，我們曾一道養了幾隻，常常拿到北大的草地上去放。她已經對未來完全放棄了希望？還是依然對生命有執著的頑強？她並不怨我沒有 為自己準備一條後路，而將未來的安排暫時放下，這是完全信托於我？她因我而參加運動，現在卻……這時我鼻子一酸，摟住她，含著淚說：

「我實在對不住你。……」

柴玲一聽，眼淚也落下來，我們就在這個草地邊發誓：活下去！

從此，我們振作起來。具體辦法依然沒有，我想到同學那裡借兩部自行車，走到了二十九樓外時，常勁十分驚異地看著我們：

「你們怎麼還沒逃走！四十個人黑名單上有你們，知道嗎？李鵬說見到這些人可就地處決！」這時我才慚愧地說，我們沒什麼辦法可想。危難之中，還是北大籌委會幫助了我們，給了我們五千元人民幣和兩部自行車，以及一些朋友的地址，讓我們去那裡躲避。

天已濛濛黑，我們騎上自行車，離開了北大，懷裡揣著約八千元錢，從此踏上了長達十個月的逃亡之路。【以上第 210 頁】

（初稿於法國 BAGNEUX 市，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六－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二次修訂於 VICHY 市，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日－三十一，一九九八年元月補正於巴黎南郊 CACHAN 市）【以上第 211 頁】

絕食後的表決與廣場撤留之爭

前言

六四之後，廣場上的撤留之爭成為聚訟的一個焦點。作者是當事人，不宜介入孰是孰非的道德評判當中。不過，當看到爭執的雙方，常常忽略當時的具

體情況和歷史背景，卻又不免黯然，感到作為當事人或知情人的責任：交代和澄清事實的真相。

先藉一件往事來說明這種責任感並非空穴來風。九五年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編輯部召集的一個討論會上，項小吉講了一個極有趣的故事：文革時評判意大利導演安 東尼奧尼的一部電影，叫作「中國」。那個時候全國上下批判這部電影，等到粉碎四人幫之後才發現：看過這部電影的只有四個人，可是批判文章卻不下四萬份。項 小吉接著說道，在影片《天安門》還未上映之前許多人就開始瞎批，很不可取。這部影片引發爭議的焦點，在於柴玲一九八九年五二八的錄像講話。會上我順著項小 吉的思路，問大家：諸位當中許多人對錄像事件寫了不同觀點的文章，但有誰看了柴玲的這個錄像呢？四座啞然；只有張伯笠說他看過。我們知道，胡平在九〇年三 月發表了一【以上第 212 頁】篇長文，叫《八九民運反思》，批評柴玲錄像講話和激進學生，但當時他也沒吭聲，說明他批了五年也沒看過錄像本身。這時有人脫口而出，說「有人看過 transcript(錄像謄寫稿)」。

先藉一件往事來說明這種 責任感並非空穴來風。九五年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編輯部召集的一個討論會上，項小吉講了一個極有趣的故事：文革時評判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一部電影，叫作「中國」。那個時候全國上下批判這部電影，等到粉碎四人幫之後才發現：看過這部電影的只有四個人，可是批判文章卻不下四萬份。項小吉接著說道，在影片《天 安門》還未上映之前許多人就開始瞎批，很不可取。這部影片引發爭議的焦點，在於柴玲一九八九年五 二八的錄像講話。會上我順著項小吉的思路，問大家：諸位當 中許多人對錄像事件寫了不同觀點的文章，但有誰看了柴玲的這個錄像呢？四座啞然；只有張伯笠說他看過。我們知道，胡平在九〇年三月發表了一【以上第 212 頁】篇長文，叫《八九民運反思》，批評柴玲錄像講話和激進學生，但當時他也沒吭聲，說明他批了五年也沒看過錄像本身。這時有人脫口而出，說「有人看過 transcript(錄像謄寫稿)」。

但問題就在這裡。因為這個錄像的謄寫稿在當時最全的文本出自《天安門一九八九》一書。該書出版於一九八九年八月，距六四才兩個月，因此影響極大；吾爾開 希題寫書名，又是聯合報這樣的大機構整理出版，大家就多把它當全文來看待。其實，該書刊載的文本只有七千字，而柴玲錄像全文卻是一萬三千字，刪掉近半。被 影片和一些報導剪輯的那兩句話(被簡化為「期待流血」與「自己

逃生」)，中間刪了八千九百字，相隔四十分鐘；最嚴重的是那兩句話不是對同一個記者說的：美 國人金培力錄像前已知柴玲的「南下計劃」(發動外省的力量來對抗北京的戒嚴)，而香港《天天日報》女記者當時卻不知道這一不能馬上公開說的計劃，故對柴玲 所說的廣場上只能「期待流血」感到驚訝，便問柴玲「你自己要不要留在廣場」。將兩個不同思路下、對不同的人說的前後相隔半個多小時的話拼接在一起，中間連 省略號都不用，還有甚麼話不可以扭曲呢？胡平說他寫《八九民運反思》時用的正是聯合報的文本，後來還堅持那就是「第一手資料」，也以為是全文；有人將「期 待」解讀為「期望」(Hoping)時，也是因為只見到這個節本，而不知道正是這個文本刪掉了柴玲當中的另一句類似的話：當中用的字眼卻是「等待 (Waiting for)血洗」。按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以經解經」的原則，用同一文本、同一思路、同一結構中的「等待」來詮釋「期待」，應該比字典裡的另一含義「期望」要有更高的優先 級。

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挖掘史料、整理史料和澄清事實真相的重要性。我是在最近才找到問【以上第 213 頁】柴 玲「你自己要不要留在廣場」的那位香港記者，她在電話中肯定地說，問這話時她尚不知道柴玲的南下計劃；也是在最近仔細對照了錄像全文與聯合報文本後，我才 發現被刪掉的還有「等待」一詞。如果沒有這些細節的挖掘，我們就很難明確問題的癥結在那兒。這些發現或許對於重構歷史真相不無裨益，但是「說出去的話潑出 去的水」，柴玲的形象早已受此「錄像醜聞」之重創，而被這一形象所代表的八九學運也平添一層陰影，在當今這個越來越繁忙的年代，那些沒有時間和條件去追尋 真相的人們，也許一輩子也難以糾正這一強刺激下的印象了。幾年來，我一再呼籲關心民運和未來的人們走出明星政治的怪圈、注重史料的整理與澄清，可以說與此 不無關聯。

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挖掘史料、整理史料和澄清事實真相的重要性。我是在最近才找到問【以上第 213 頁】柴 玲「你自己要不要留在廣場」的那位香港記者，她在電話中肯定地說，問這話時她尚不知道柴玲的南下計劃；也是在最近仔細對照了錄像全文與聯合報文本後，我才 發現被刪掉的還有「等待」一詞。如果沒有這些細節的挖掘，我們就很難明確問題的癥結在那兒。這些發現或許對於重構歷史真相不無裨益，但是「說出去的話潑出 去的水」，柴玲的形象早已受此「錄像醜聞」之重創，而被這一形象所代表的八九學運也平添一層陰影，在當今這個越來越繁忙的年代，那些沒有時間和條件去追尋 真相的人們，也許一輩子也難以糾正這一強刺激下的印象了。幾年來，我一再呼籲關心民運和未來的人們走出明星政治的怪圈、注重史料的整理與澄清，可以說與此 不無關聯。

以下是我在整理六四史料時的發現的大家可能同樣忽略而又極為重要的情況：在評判廣場撤留之爭孰是孰非時，許多人也似乎並不清楚絕食以後的各種重大表決情 況。我覺得，脫離這些具體情況而去空談甚麼應該「見好就收」還是「見壞就上」，無異於閉門造車，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可能貽害大方。

必須申明一點，以下所收集整理的情況亦不能自稱全面，不過是盡我所能而已：它是在有限的範圍、有限的資料和有限的時間下的一個產物。當中的概況性的語句 是我個人的理解，不一定準確；有的是不同版本的說法，則原文照引，是否妥當也很難說。故希望讀者去核對原文作出自己的判斷，更期待各位當事人不同角度的回 憶文章與批判指正。在後記中我將說明這些資料的出處與其局限之所在。

下面就是絕食以後可查證的投票與表決的情況：【以上第 214 頁】

一、戒嚴前的表決

五一三夜間或五一四凌晨：北高聯常委五人碰頭會決定由北師大的梁二取代吾爾開希的常委職務，原因是開希違反高聯組織原則，擅自發動絕食，不能再代表高 聯。(王超華，《回顧與反思》，頁一一〇一一；梁二，頁一六〇、一八二、二九六–二九七)此前北高聯反對絕食，但五一三凌晨發表聲明，對絕食「給予充分的理解 和同情」(王超華，同上，頁九七)而北大籌委會決定支持絕食以後，在十三日下午絕食人員出發後，馬上成立了北大聲援絕食指揮部，全力支持絕食。(常勁，同 上，頁一七六)

五一四晚：十二學者到廣場後，各校代表六十四票中四十六票決定不撤(柴玲，同上，頁一三一，一三三)。未見報導。九一年初我的備忘錄中記得有此表決，後 來反倒忘了。根據當時的一盤錄音帶，王超華也認同了堅守廣場的意見。因為是第一次公佈，這裡引用超華當時在廣播站的聲明的全文：「同學們，由於政府現在這 種態度－－我是北高聯的常委－－我希望同學們都提高警惕，做好一切準備。現在北高聯、對話代表團和絕食請願團以及廣大聲援的同學、以及市民們、各校的教師 聲援機構，我們現在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我們的基本態度也是一致的：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堅持到最後勝利！」眾喝彩：「好！！！」根據錄音判斷，時間是在 錄音者標定的十五日零點零六分之後半個小時以內。

在超華講話之前，一位同學代表幾位北大研究生認為十二學【以上第 215 頁】者的建議很有理性，應當把他們請回來。

五一四晚：十二學者到廣 場後，各校代表六十四票中四十六票決定不撤(柴玲，同上，頁一三一，一三三)。未見報導。九一年初我的備忘錄中記得有此表決，後來反倒忘了。根據當時的一 盤錄音帶，王超華也認同了堅守廣場的意見。因為是第一次公佈，這裡引用超華當時在廣播站的聲明的全文：「同學們，

由於政府現在這種態度——我是北高聯的常 委——我希望同學們都提高警惕，做好一切準備。現在北高聯、對話代表團和絕食請願團以及廣大聲援的同學、以及市民們、各校的教師聲援機構，我們現在的基本 要求是一致的，我們的基本態度也是一致的：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堅持到最後勝利！」眾喝彩：「好！！！」根據錄音判斷，時間是在錄音者標定的十五日零點零 六分之後半個小時以內。在超華講話之前，一位同學代表幾位北大研究生認為十二學【以上第 215 頁】者的建議很有理性，應當把他們請回來。

五一四晚十一點至凌晨二時：幾十所高校自治會負責人聚會表決，多數舉手同意撤到使館區，結果無法執行。（熊焱，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未見報導。我對此無記憶。

五一五凌晨四時：「學生討論是否向東挪動，讓出廣場中央舉行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各校代表投票結果，決定原地不動。吾爾開希則在五時許，以個人身份懇求學生挪一挪，最後學生以『聲音』投票，決定向東挪動。」（《人民不會忘記》，頁七九）

五一五晨：「絕食團指揮部」在廣播站宣告成立，柴玲自薦為總指揮、李祿為副總指揮；並稱參加指揮部的條件是：在遭政府鎮壓時首先自焚。「在掌聲和眼淚 中，絕食團指揮部得到了大家的認可」。此前李祿向柴玲等人談了一個多小時，提議成立指揮部、自焚及帶領絕食同學到長安街上臥路。（柴玲，會，頁一四四 - 一 四五；李祿，頁一六五、頁一七三；柴玲五二八錄像談話，《天安門一九八九》一書中刪掉了李祿提議自焚的話。）絕食團指揮部成立時在廣場而現在到了海外的， 就我個人所知，除柴玲、李祿以外，還有程真、王文、熊焱等，或許張華潔、超華、梁二、開希、周勇軍、周峰鎖、劉剛等人也在，希望能夠看到他們相關的回憶文 章，以便從多方位核對史實。

五一五晨：指揮部宣告成立後即刻召開代表會議，四十多校代表參加，承認柴玲為總指揮、李祿為副總指揮。否決李祿的兩項提案：一、指揮部成員在鎮壓時首先 自焚；二、把隊伍乾脆拉到天安門廣場的長安街上。（李祿，《回顧與反思》，頁一六五、一七三、一七四）【以上第 216 頁】

五一五傍晚：對話團傳來 可能與政府對話的消息，絕食團一千一百三十幾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傾向結束絕食，但仍然堅持「平反動亂，直播對話」二點要求（李祿，同上，頁一三七、頁一 六六）；一千一百三十幾票，百分之九十五決心堅持到政府「平反動亂」（李祿英文自傳，頁一四三）。未見報導和他人回憶。我對此表決無記憶。

五一五晚：絕食團指揮部第一次人事變動：王文、馬少方、程真等另列絕食團幹部名單。兩小時後，李祿召集一次代表會議，重新承認柴玲與李祿的領導職位。（李祿，《回顧與反思》，頁一三八）大家重新選，選出柴玲跟程真是總指揮，兩個總指揮。當時李祿不在。十六日凌晨又召開一個班代表會議，重新認可

了李祿的 位置。（柴玲，同上，頁一四七－一四八）未見報導及其他當事人的回憶；程真有一篇文章，但未提到此事（《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王文似乎 從未發表過回憶；馬少方現在國內。

五一六下午：閻明復到廣場後，「五十多個代表參加了會議，沒通過撤出廣場」（張伯笠，《回顧與反思》，頁一四三；中國之春一九九四年三／四月號，頁七 五）；「當時百分之七、八十的發言主張堅決不能夠撤」（李祿，《回顧與反思》，頁一四二；李祿自傳頁一五四說是百分之九十）。「此講話廣播後，各校絕食學 生派代表經過討論表決後，大多數表示不應停止絕食。」（香港時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我對此表決無記憶。當時我尚未加入絕食團指揮部。

五一七：「我們昨天對一百多個同學做了一個民意調查，閻明復同志來講話之後，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學投票表示不撤離廣場」（王丹五一八，「李鵬等會見絕食請願學生代表」，《人【以上第 217 頁】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王丹此說緊接在吾爾開希相反的表達之後：「廣場上現在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百分之九十九□九服從百分之零□一，——如果有一個絕食同學不離開廣場，廣場上其他幾千個絕食同學也不會離開！」

五一七：「我們昨天對一百多個同學做了一個民意調查，閻明復同志來講話之後，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學投票表示不撤離廣場」（王丹五一八，「李鵬等會見絕食請願學生代表」，《人【以上第 217 頁】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王丹此說緊接在吾爾開希相反的表達之後：「廣場上現在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百分之九十九□九服從百分之零□一，－－如果有一個絕食同學不離開廣場，廣場上其他幾千個絕食同學也不會離開！」

五一七上午：對話團進入廣場，決定積極加入到高聯裡面去，因發現鄭旭光另組的高聯並無實力而退出廣場。這時的對話團依然支持廣場絕食行動。（沈彤，《回顧與反思》，頁一八五）

五一七：北高聯正式罷免吾爾開希，所有常委拒絕與開希合作。（梁二，同上，頁二九七）。

五一七夜至五一八凌晨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比二決定戒嚴：趙紫陽、胡啟立「不同意」；李鵬、姚依林「贊同」，喬石「同意小平同志意見」。此會在鄧小平 家中進行。（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頁一六一－一六二；中共《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香港註釋本，頁一一四；香港快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高新，《中國之春》，一九九五年五月，頁二一；但也有資料稱此會在當天上午召開：共青團北京市《七十天大事記》北京，一九九零年六 月：頁四〇－四一）。隨後，李鵬與絕食學生代表「見面」；下午中共電視台播放錄像片斷。（這次見面不能稱作「對話」也未「實況直播」，詳見拙文《五一八李 鵬與學生

「公開對話」了嗎？》)

五一八下午：絕食團常委開會商討內部復食，王丹反對，未通過(封從德，《回顧與反思》頁一九五)。

五一九：北高聯、對話團、外高聯四點聯合聲明：第二，「建議將絕食改為靜坐。如果絕食同學繼續絕食，我們將繼續聲援他們。我們的鬥爭目標絕不放棄。」(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以上第 218 頁】九年五月二十日)。

五一九：北高聯、對話團、外高聯四點聯合聲明：第二，「建議將絕食改為靜坐。如果絕食同學繼續絕食，我們將繼續聲援他們。我們的鬥爭目標絕不放棄。」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以上第 218 頁】九年五月二十日)。

五一九下午六點過：各校代表一百七十三票贊成復食，二十八票反對，七票棄權。(張伯笠，《回顧與反思》頁一九六；李祿，頁一六九；柴玲，頁二〇〇；)一百七十三票贊成復食，十七票反對，三十三票棄權。(張伯笠，《中國之春》，一九九四年五月， 頁四七)。

五一九晚九點：柴玲宣佈，各校代表投票結果，五十二票同意復食，十四票反對，一票棄權(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

五一九晚十點：第二次表決，八十多個學校的代表，至少百分之八十堅持絕食(封從德，《回顧與反思》，頁二〇四)。

二、戒嚴後的表決

五二〇中午：各校代表會，王丹任名義總指揮，執行總指揮是一個青島來的學生(王超華、李苦，《回顧與反思》頁二一二－二一三)；

五二一下午：「北高聯四十多北京高校代表基本上都同意撤」(王超華，《回顧與反思》，頁二一三)三十二票贊成撤離，十四票反對，二票棄權(《驚心動魄的 五十六天》香港註釋本，頁一三三)；群眾情緒都是希望撤。……高聯沒作出過決議要撤出廣場。只是建議各校代表回校去收集反應，結果發現這個決議根本作不出 來。」(王超華，《回顧與反思》，頁三〇四)似有矛盾。【以上第 219 頁】

五二一晚：「絕食團常委會決定第一批成員轉入地下。(張伯笠，《回顧與反思》，頁二〇七；李祿，頁二二三；柴玲，頁二二四；封從德，《前哨》一九九一年五月)實際上未實施。

五二二凌晨三點：吾爾開希喊撤，當即遭北高聯「罷免」(王超華，《回顧與反思》頁二一四)；北高聯決定暫時不撤出廣場(明報二十三日)；開希後來稱，喊撤之前「他曾與九名北高聯常委談過並得到支持」(明報二十四日)。

五二二：王超華統計到二百多個學校同意撤退的名單(張伯笠，《回顧與反思》頁二〇八)；

五二二夜：「一百五十多人大會，全部舉手通過堅守廣場、成立臨時指揮部的議

案」（張伯笠，《回顧與反思》頁二〇八；王超華，頁二一四；柴玲，頁二二四； 共同核對，頁二六六－二七〇；李祿轉述柴玲的介紹，頁二一八、二七四；）；「三〇〇多高校代表，約百分之九十堅持不撤」（白夢，《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 月，頁四一）；凌晨二時，北高聯與絕食團指揮部召集各校代表聯席會議，廣場上八十九校代表中六十九校投票，四十五票同意，二十四票反對，通過組建廣場臨時 指揮部，堅決不撤；北高聯則被迫同意撤返高校整頓，由臨時指揮部接管廣場二日。（台灣聯合報二十四日第三版，通告；明報二十四日）

五二三上午十一點至下午四點：「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決議：一，授權成立「廣場指揮部」，統一廣場上的指揮(李祿引柴玲語，《回顧與反思》，頁二一九；老 木，頁二三三、二三五、二三六、二七二、二七四、二七五；李祿、張倫對此有較模糊的置疑，頁二七二－二七五)；指揮部與首聯「既不是隸屬關係，也不是平行 關係；一個進行協商，一個負責執行。」(包遵信引甘陽【以上第 220 頁】語，《未完成的涅槃》頁二三三–二三四)；二，籌辦民主大學，以備堅持到六月二十日(李祿，《回顧與反思》，頁二二三)

五 二三上午十一點至下午四點：「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決議：一，授權成立「廣場指揮部」，統一廣場上的指揮(李祿引柴玲語，《回顧與反思》，頁二一九；老木， 頁二三三、二三五、二三六、二七二、二七四、二七五；李祿、張倫對此有較模糊的置疑，頁二七二–二七五)；指揮部與首聯「既不是隸屬關係，也不是平行關 係；一個進行協

五二五：北高聯決定「用最激烈的方式」向政府施壓，組宣傳團到各地(大公報二十七日，中共《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香港註釋本，頁一四八)

五二六：包遵信、王丹等四十餘人在社科院十二樓經濟所禮堂開會(「知識界聯合會」或「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四項決議：(1)要求李鵬下台；(2)軍隊 撤離；(3)天安門靜坐堅持下去；(4)組織動員工人罷工。王丹在北大呼籲「組隊輪流去廣場值班」大字報：「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打一場持久戰」(明報二 十七日，中共《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香港註釋本，頁一五〇－一五一)。【以上第 221 頁】

五二六傍晚：楊濤到廣場指揮部，商定推行「空校運動計劃」，以期將同學引出廣場。楊濤當時是北大籌委會主席， 也是北高聯負責人。我贊同楊濤的分析，還補充了一條「同學空校回家之前先約定好：每星期天上午十點，各省同學在就近的大城市定時在市中心廣場集會，以保持 對政府的壓力和學運組織的延續。」柴玲認同，傾向於試探與推行。後李祿得知，反對此計劃，指揮部便未向營地聯席會議提議。(第二章廣場備忘錄五月二十六 日)九五年五月，柴玲說她還記得此事；李祿則說他記不太清了，但對當時有印象的是：一、撤出廣場，並不意味著能避免屠殺，只不過是由公開的屠殺變為秘密處 決而已；二，按民主程序，應當尊重「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的決議。李錄自傳，對此事沒有提及，可能他對「空校計劃」的可操作性很懷疑，故不太重視。

五二六深夜：北大籌委會廣播「五千人絕食計劃」，由「社會各級知名人士自願組織絕食團」替代現在廣場上的學生。(中共《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香港註釋本，頁一五一)劉曉波等人六二絕食當與此有關。

五二七晨：北高聯常委會決定號召廣場同學在五二八「全球華人大遊行」後光榮撤退。(東方日報二十八日)

五二七下午：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起初建議堅持到六月二十日，聽取廣場指揮部的情況匯報後改為五月三十日撤離(老木，《回顧與反思》，頁二三六；封從德，頁二七一；二十八日的大公報、文匯報、明報、香港時報；二十九日的大公報、文匯報)

五二七晚：廣場指揮部未接受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五月三十日撤離的建議

(李祿，《回顧【以上第 222 頁】與反思》，頁二三八–二三九；柴玲，頁二二六、

二二七及「五二八錄像談話」)

五二七晚：廣場指揮部未接受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五月三十日撤離的建議

(李祿，《回顧【以上第 222 頁】與反思》，頁二三八－二三九；柴玲，頁二二六、

二二七及「五二八錄像談話」)

五二八凌晨：廣場指揮部五常委四：一希望撤；柴玲與張伯笠主張堅守廣場。但柴玲亦提出「主動組織學生宣傳隊伍南上北下，發動全民運動，部分外地同學亦回家鄉進行宣傳」(快報二十八日)，當與「空校計劃」和「聯省自治」的設想都有關係。

五二八：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重新開會，否決了昨天關於五月三十日撤退的建議，維持其原來堅持至六月二十日的建議。（大公報、文匯報、香港時報、快報二十九日；李祿，《回顧與反思》，頁二三九）；

五二八晚：「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中，三十日撤離的建議被否決，但是六月二十日的建議被接受。當時是兩個建議，都是從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來的。」（李祿，《回顧與反思》頁二三九）；凌晨二點半，由三百十七校代表組織的「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的決議是：（１）。堅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召開之前不撤出廣場；（２），任命北大代表楊濤為「廣場整頓臨時總指揮」。（明報、文匯報、快報二十九日）

二十八晚：北高聯八常委亦在北大開會，一致通過四項決議：一、廣場靜坐請願繼續堅持；二、繼續全面罷課；三、號召離校宣傳；四、健全高聯組織。其堅守廣場的方針，與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和廣場指揮部不謀而合。（文匯報三十日）；

五月底：香港學聯在廣場做了一個簡單統計：訪問三十位同學，全是外地來的，「如果沒有香港物資站的支持」，七人表示「不會留在廣場」；四人「要看情形」；一人「拒絕回答」；**【以上第 223 頁】**十六人「將堅持留下」。（李蘭菊，《回顧與反思》，頁三二五）；

五月底：香港學聯在廣場做了一個簡單統計：訪問三十位同學，全是外地來的，「如果沒有香港物資站的支持」，七人表示「不會留在廣場」；四人「要看情形」；一人「拒絕回答」；【以上第 223 頁】十六人「將堅持留下」。（李蘭菊，《回顧與反思》，頁三二五）；

五月底：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幾經討論，最後全體同意劉曉波關於發動知識界到廣場大絕食的建議。（老木、張倫，《回顧與反思》，頁二七二；老木，頁二七四）此前，劉曉波在同學絕食當天即已提出知識分子也應當絕食（梁二，同上，頁二七一，二九五）；五二六深夜，北大籌委會廣播「五千人絕食計劃」，由「社會各界 知名人士自願組織絕食團，替代現在廣場上的學生。」（見「五二六深夜」巷條）劉等到六月二日才找到三人支持，可見其受阻之大，亦見其決心之烈。

六月一日晚八點半，北高聯、外高聯與廣場指揮部發布「關於學運的聯合聲明」，提出對話和撤離廣場的四點最低條件，即解除戒嚴、撤軍、不報復和新聞自由。 新聞發布會上，王超華還介紹了北高聯調整組織結構的情況，「吾爾開希及王丹均不再是北高聯常委」。（明報六月二日；王超華：文匯報、東方日報六月二日）

六月二日，北高聯常委會否決與指揮部合作案，參與協調的香港同學非常失望。（李蘭菊，《回顧與反思》，頁三二六）李蘭菊說是六月一日，疑誤（王超華、封從德、梁二、李蘭菊，同上，頁三二七）。

六四凌晨五點左右：留在廣場紀念碑上的人員全體口頭表決，通過撤離（李祿，《回顧與反思》頁二三九；封從德，頁三一七－三一八；影片《天安門》）。

後記

【以上第 224 頁】

以上內容，主要取自「八九學運時序表」(Chronology)，那是我在九零年底撰寫八九學運備忘錄時開 始為自己作的，後來寫文章時屢有增補和修正。該時序表中，絕食後的表決與廣場撤留之爭佔的篇幅本不多，但近來卻越來越成為關注的焦點，故此整理出來，又核 對了一遍，供大家參考，也希望得到進一步的補正。

上述資料多是當事人原話，為了簡練也用了一些概況性的語句，那是我個人的理解，故亦希望讀者在引用之前自己去核對原文。另外，這裡所收集整理的情況並不能自稱全面，不過是盡我所能而已：它是在有限的範圍、有限的資料和有限的時間下的一個產物。

所謂有限的範圍，是指側重於北京學運組織的表決情況。所謂有限的資料，是因為我所參考的報紙主要來自於港支聯在一九八九年十月編的《八九中國民運報章頭 版專輯》，台灣歐美報章幾乎沒有涉及；各當事人的個人回憶主要取自九三年出的《回顧與反思》一書，即九一年夏天巴黎會議十七位學運骨幹共同核對的史實，但 會議時間太緊，許多情況並未得到仔細核實；我還參考了各當事人在各種雜誌上的回憶文章，但我的雜誌收集得不全；我手中的相關書籍也很不全。

所有這些，當然同我不可能拿出更多的時間來作這一工作有關。在放眼未來、充實自己和回顧過去、勿忘六四之間，我常常無所適從。今天所做的一切，不過求一 心安，將來不至於無顏見江東父老，百年之後亦能坦然面對那些受難者。(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於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增補於巴黎)【以上第 225 頁】

[空白頁]【以上第 226 頁】

第三輯：質疑「見好就收，見壞就上」

【以上第 227 頁】

見好怎麼收？－－答胡平公開信之一

胡平先生：

讓我們以朋友的姿態和公開的方式，繼續我們自去年開始的公開與私下的討論吧。用第二人稱來討論，讓我感到輕鬆一些。這樣我們更容易將對方當作朋友來交 談，而不是去爭個你輸我贏。我同時又希望開始公開討論，而這也不僅僅是我的意願，因為我在去年底給你的信中提出討論的內容，也是很多人所關心的。

我們的討論，從去年七月《北京之春》上我向你質疑的那篇文章開始的。八月你撰文《回應封從德》。那時，我還不太認識你。之後，我們有了通信。我相信你是 願意以朋友的態度來進行討論的。因為你在今年七月的信中說，你「相

信我們一定會有更多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結論」，並「非常希望我們有機會促膝長談」。這當 然也是我所極樂意的。何況你九月的信中還以「封從德友」相稱。朝著這種友好的方向，我相信我們一定能達到一些有益的共識，同時也更理性地認識到我們的分歧 點。【以上第 228 頁】

在繼續公開討論之前，還有二點需要交代一下。

一、為何遲答

首先，應當回顧一下我們討論的情況。

你去年八月在《北春》上刊文回應我的質疑之後，我本應當盡快作答。當時，一方面我在等待《北春》編輯部(當包括你在內)的答覆。因為此前貴社刊出拙文時 出現增文，加了楊巍的名字的問題，故我當即致函詢問。另一方面因為我正在作全職的技術培訓，又同時在趕寫碩士論文，還必須在十月份之前交稿，所以沒有多少 精力去催促貴編輯部的答覆。等到論文完成，讀到你的大作，更覺得問題很多，又一直未見到貴社的回音，故分別向編輯部和楊巍和你再去一函。

今年一月收到社長于大海覆函，但並未答應我的請求。而直到今年六四也未見到你的回音，故於六月八日，再向貴編輯部致函，全文如下：

北京之春編輯部諸君，貴刊一九九五年第七期刊出拙文「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對當前爭議的幾點質疑」，一九九五年第八期則有胡平「回應封從德」一文，我本當及時撰文回覆，惟如下幾點，窒礙至今：

一、去年七月拙文刊出後，我發現當中不僅有誤植與刪節，且更有增文，我的手稿本未提及楊巍，卻在文中出現(頁三四)，當時我曾致函貴編輯部，未見回音。【以上第 229 頁】

二、去年底再上一函，又問及此事，因為胡文正好以楊巍事作文章。于大海社長一月二十日覆函曰：「對文章作刪節在編輯部來說還屬正常，至於加上楊巍的名字，就確實有些蹊蹺了。這顯然是因為有人特意建議這樣改的，至於是誰建議的呢？現在似已難查證了。」至今未見進一步說明。

三，胡文即以楊巍事反駁我引證不確(一九九五年第八期四八頁)，並建議我查閱當年《世界日報》他與楊巍的電話記錄，以證實其並未壓制楊巍當時(一九八九 年五月下旬運動後期)希望民聯向廣場提議撤離的建議。我非當事人，楊巍之言是否屬實我無從判斷，亦不排除我誤會了楊巍之可能。因此，我自然願意查閱《世界 日報》，惟胡平未明確日期，我在巴黎亦難以找到，便致函向胡平本人索取，至今半年無回音。

四，胡平的「回應」文中，又正好利用了貴編輯部刪節拙文所造成的文意不連貫。如胡文指拙文《見壞怎麼上？見好怎麼收？》一節中「其實封從德並不是真的在 那裡批評激進策略或探討八九民運中的策略得失，他只是在反唇相譏而已」(一九九五年八期四八頁)。但是，正是這節，貴編輯部在我底稿的五點內容中刪了與此 相關的兩點，而作為主筆與主要編輯之一的胡平竟然不知情？我給胡平的信中亦問及此事，並其它共十八條，亦如石沉大海。

五，楊巍與我只是去年六月才初次見面，七月文中即將其涉入，我難免不安，見文即致函楊巍，他說無所謂；見胡平「回應」文，又向楊巍詢問，他稱胡文並

非完全屬實。但我還沒有他的進一步說明。

另外，貴刊誤植亦造成拙文有幾處背離本意，如「阻止復食」印作「組織復食」(頁三六右)等等，【以上第 230 頁】還有一些微小而關鍵的刪節，皆在去年底的信中有所詳述。希望貴部或作更正，或刊此函，以示公正，亦便我對胡文作回應。特此懇請鄭重考慮。

另外，貴刊誤植亦造成拙文有幾處背離本意，如「阻止復食」印作「組織復食」(頁三六右)等等，【以上第 230 頁】還有一些微小而關鍵的刪節，皆在去年底的信中有所詳述。希望貴部或作更正，或刊此函，以示公正，亦便我對胡文作回應。特此懇請鄭重考慮。

順頌　　文安

封從德　上於巴黎

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

之後，我便收到了你七月二十三日寫的一紙短信。信中你完全迴避了我以前在信中提到的問題，只是簡單地講了一下你在六四以後不久急於寫《八九民運反思》的 理由，並要我多讀你的書與文章，「相信我們一定會有更多的共識。」，並希望能促膝長談。八月底，我回信重申以前的問題。這一次你很重視， 九月十一日便回了一封信，並以「友」相稱。我真的很高興， 九月二十一日博士資格答辯剛通過，當天下午就著手起草此文。

以上便是我們討論的大致情形。下面交代一下本文的總體思路。

二、答什麼？

胡先生，在九月十一日的信中，你對我們的討論提出了要求。你首先重申了你以前在《反思》一文中的主要觀點，即八九民運失敗並非必然，其主要失策是未能見 好就收。然後，你聲稱，「我不是說你提出的問題不可以討論，但我認為首先地，主要地，我們應對我前面提出的觀點展【以上第 231 頁】開地討論」，「你應該先抽象地討論在當時怎樣做對怎樣做不對」。這樣看來，我以前提出的十八個問題，你似乎也不願意直接地討論，而你自己又好像忘記了你「回應」一文也主要不是討論「前面提到的觀點」，而我的問題則是直接因為你「回應」一文而提出的。

胡先生，在九月十一日的 信中，你對我們的討論提出了要求。你首先重

申了你以前在《反思》一文中的主要觀點，即八九民運失敗並非必然，其主要失策是未能見好就收。然後，你聲稱，「我不是說你提出的問題不可以討論，但我認為首先地，主要地，我們應對我前面提出的觀點展【以上第 231 頁】開地討論」，「你應該先抽象地討論在當時怎樣做對怎樣做不對」。這樣看來，我以前提出的十八個問題，你似乎也不願意直接地討論，而你自己又好像忘記了你「回應」一文也主要不是討論「前面提到的觀點」，而我的問題則是直接因為你「回應」一文而提出的。

不過，為了使我們的討論能夠進行下去，我也願意尊重你現在的建議。根據你的要求，我首先對你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一策略作一分析，然後再就你的「回應」作答。本文的大致結構如下：

一、「見好怎麼收」：分析「好」是什麼及對「好」能否有共識；

二、「見壞怎麼上」：分析「見壞就上」面臨的問題，及你自己是否有一貫的好壞標準；

三、「見好沒收怎麼辦」：分析八九學生運動組織的得失；

四、回應你的「回應」：逐條檢討我們之間可能達成的共識與存在的分歧。

前面三點基於這樣的觀察，即我們之間有可能已經有了相當的共識。對此我引用你《反思》中的話，並歸納如下：

1、「光有見好就收的原則是不夠的，還必須在當時就能夠準確地測量到什麼是好」，即你所謂的「最佳時機」。（四章十三節，《中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頁九）

２、對「見好就收」還得有「足夠的共識」，而「民眾缺乏足夠的共識是八九民運失敗的基本原因」。（十二節，頁一四）

３、如果民眾達不到「足夠的共識」，那該怎麼辦呢？那就需要「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十【以上第 232 頁】一節，頁一三）。.

３、如果民眾達不到「足夠的共識」，那該怎麼辦呢？那就需要「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十【以上第 232 頁】一節，頁一三）。

４、「總結經驗教訓必須注意不能脫離實際」。（四節，頁九）

本文便是沿著這些共識，去考察是在那些地方我們有了分歧。這樣，我們也許能達成更多的共識。而我們的討論便更是積極而具有建設性了。

「好」的分析

胡先生，「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八字方針，就我所知，始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你所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即此八個字，不過，順序倒過來，叫「見

壞就上，　見好就收」但真正對此作詳盡論述的，是自你《八九民運反思》一文始，刊登在《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四月至十月號。今年九月的信中，你向我概括了你《反思》　一文的基本思路，抄錄如下：

「我在「反思」中提出的主要論點是，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必然，它也和民運自身的失策有關。民運的主要失策是未能見好就收，這主要是缺少共識所致。我們必須認真總結經驗，從而重建非暴力抗爭的信心。」

這樣，你便將你的「反思」濃縮在「見好就收」這一焦點上。而「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必然」不過是討論這一焦點的鋪墊。至於總結經驗教訓，重建信心，我自然認同，不必多言。【以上第 233 頁】

本章便針對「見好就收」這一理論進行分析，並將它同一九八九年的實踐作一對照。

一、「好」是什麼？

「見好就收」要成為一個可行的策略，必須首先解決一個基本問題，即：「好」是什麼？怎樣才算「好」？換言之，拿什麼樣的標準去測定它呢？

在《反思》第四章十三節中，你宣稱「現在回過頭去看整個八九民運，如果運動在五一六閻明復赴廣場談話後，或在五一七趙紫陽書面講話後撤離，當是最佳時　機。」但是你自己也馬上就注意到一個問題：四二七見好未收，後來反而更好，那麼，「這個最佳時機在當時怎麼能夠準確無誤地判斷呢？」

你的回答很簡單，計有四條：

一、策略性的原則多是抽象的，需要憑經驗和直覺，去正確應用於實際。「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二、抽象性原則畢竟還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九八九年大家對「見好就收」的原則有明確的共識，結局必不至如此；

三、「更好是好的敵人」，寧可「不及」，亦勿「過」。若五四之後就復課定比五一八之後還不撤要好得多。【以上第 234 頁】

四、搞政治不是做一錘子買賣；「見好就收」，不是「見最好就收」。（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一五）

下面，先分析一下，你這裡用的「好」，都指的是什麼？

你這裡的「好」至少有三個層次，五個等級的理解。一是「最高的好」，即你所謂的「最好」，也就是「成功」或「大獲全勝」；一是「最低的好」，即對方稍有　鬆動就算「好」；一是「最佳的好」，或你所謂的「最佳時機」介於前二者之間。假定確實存在所謂的「最佳的好」，那麼在「最佳」與「最低」之間還有一個等　級，即「偏低的好」，也就是你所謂的「不及」；類似地，在「最佳」與「最高」之間，還有一級「偏高的好」。即你所謂的「過」或「更好」。圖示如下：

「成功」　最高的好

↑

「過」　｜　偏高的好　「見好不收」

↓

「最佳時機」　↑　最佳的好　「見最佳時機才收」

↑

「不及」 | 偏低的好 「一見好就收」

↓

對方稍有鬆動 最低的好

所謂「三個層次」，是因為「偏低的好」的下限是「最低的好」，故可包含之。同樣地「偏【以上第 235 頁】高的好」也可以包含「最高的好」。但是，二者不可以包含「最佳的好」。這是因為「最佳」與「偏低」或「偏高」都是相對而言的。

所謂「三個層次」，是因為「偏低的好」的下限是「最低的好」，故可包含之。同樣地「偏【以上第 235 頁】高的好」也可以包含「最高的好」。但是，二者不可以包含「最佳的好」。這是因為「最佳」與「偏低」或「偏高」都是相對而言的。

由上圖還可以看出，「偏低的好」之上限與「偏高的好」之下限都根據「最佳的好」而上下遊移。這樣一來，所謂「最佳的好」，實際上其域值便可以涵蓋從最低 到最高的一切值；也就是說，從「對方稍有鬆動」直到「大獲全勝」都可算作「最佳的好」。故而當我們籠統地用「好」來說「見好就收」之時，實際上，便可以從 「最低的好」直至「最高的好」隨心所欲地取其所需，愛怎麼用就怎麼用了。這一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可以說正是你八字方針在邏輯上的各種內在矛盾的根本原因。

弄清了「好」的各個層次，現在可以回過頭來具體地看一看你是怎麼回答「如何在當時準確判斷最佳時機」這一基本問題的。

你的第三點與第四點回答衹是否定追求「偏高的好」乃至「最高的好」：「更好是好的敵人」，「過猶不及」，「見好就收」不是「見最好就收」。而你的第二點 講的是抽象原則的重要性，與如何測定無關。也就是說只有你的第一點涉及「最佳時機」的測定問題。但是，對此你又只有這麼兩句話作答：「這就離不開經驗和直 覺了。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這個意思」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你沒再說。因此這兩句話也沒有真正地解決具體如何測定的問題。由此分析，你這四點回 答，其實基本上是文不對題，答非所問；至於到底「如何在當時準確判斷最佳時機」，你也只是歸之於經驗與直覺，歸之於玄之又玄的「心」。【以上第 236 頁】

二、「一見好就收」還是「見最佳時機才收」？

你的「見好就收」到底是「一見好就收」還是「見最佳時機才收」呢？

如果對此不加分析，是很容易混為一談的。也就是說，會將「偏低的好」與「最佳的好」籠統地稱作「好」來用。

舉例來看，就是上面你的第三點回答。本來你是要回答的是「最佳時機如何判斷」這一問題，但你的第三點卻說的是什麼呢？－－「更好是好的敵人」，「過猶不 及」，進而贊同追求到手的「好」，乃至「不及」都比「過」好，試圖

以此來解答「最佳時機」如何測定這一問題。這實際上是用「偏低的好」來搪塞關於「最佳的 好」的問題。本來是問，你怎麼在五一六至五一八就判斷出當時是最佳時機，你卻回答說：五四也不錯，比五一八不撤還要強。這顯然是答非所問。造成這一邏輯問 題的根源，就是因為混淆了兩個不同層次的「好」。

曹長青早就看出你這八字方針在用詞上的模糊性：「以『好』和『壞』這樣抽象的詞做標準，隨意性太大，無法操作。例如胡平曾分析說戒嚴令前有六次『好』的 機會，學生都沒有見好就收。他並把第六次『好』定性為『大好』。但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如果學生在前幾次『好』時就按胡平的理論『收』了，不是就錯失了後來 的『大好』了嗎？」(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頁九七及中國之春一九九六年三月，頁八七)。這其實就是看出你將「偏低的好」與「最佳的好」【以上第 237 頁】混為一談，不知道應當是「一見好就收」還是「見最佳時機才收」？如果「一見好就收」的話，「最佳時機」豈不是不可能達到了嗎？對曹長青的批評，我看見你後來的一些簡答(前哨一九九六年二／三月號)，但你完全迴避了他對你「見好就收」隨意性以及不可操作性的質疑。

曹長青早就看出你這八字 方針在用詞上的模糊性：「以『好』和『壞』這樣抽象的詞做標準，隨意性太大，無法操作。例如胡平曾分析說戒嚴令前有六次『好』的機會，學生都沒有見好就 收。他並把第六次『好』定性為『大好』。但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如果學生在前幾次『好』時就按胡平的理論『收』了，不是就錯失了後來的『大好』了嗎？」(北 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頁九七及中國之春一九九六年三月，頁八七)。這其實就是看出你將「偏低的好」與「最佳的好」【以上第 237 頁】混為一談，不知道應當是「一見好就收」還是「見最佳時機才收」？如果「一見好就收」的話，「最佳時機」豈不是不可能達到了嗎？對曹長青的批評，我看見你後來的一些簡答(前哨一九九六年二／三月號)，但你完全迴避了他對你「見好就收」隨意性以及不可操作性的質疑。

另外，你說「過猶不及」，寧可「不及」也勿「過」，「五四之後就復課也比五一八之後還不撤要好」。這其實是誤解了「過猶不及」的語意。子貢問孔子：「子 張與子夏孰賢？」孔子答道：子張常過，子夏又常不及，過猶不及。即二人相當，皆不得其正，有違於中庸。故此，無論「過」，還是「不及」，都沒法獲得你所希 望的「最佳」的。本來你是在回答「最佳」如何獲取，五一六、五一七的「最佳時機」如何把握，你卻回答一句「寧可「不及」也勿「過」」，可謂驢唇不對馬嘴。你最多可以說，「我們寧可不要最佳時機，也應該滿足於偏低的好」。

換句話說，即是：「寧可不要五一六、五一七的大好時機，在五四後就復課取得的好也還是不 錯的。」但是，你真的贊同這樣的話嗎？我很懷疑(理由詳後)。「過猶不及」，也可能反過來說，「不及猶過」。

再者，你一會兒否定追求「過」，一會兒又想要「成功」。這偏高的「過」都不應當追求，哪裡還可以去爭取更高的「成功」呢？然而，不能追求「成功」，又怎麼和你《反思》中一再強調的「功利意識」相合呢？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可嘆的是，這矛與盾都是你自己提供的哩。【以上第 238 頁】

三、「一見好就收」？

現在假定你所說的「見好就收」指的是「一見好就收」，即最低的好。我們來看一看這樣通不通。

如果說，「最佳時機」怎麼判斷這一問題你沒有真正解決，那麼，「一見好就收」這一問題你是否就解決了呢？上面已經提到，你的第三點回答似乎是針對「偏低 的好」的答案。但是，在這一回答中，你只是答了「應該怎樣」(即「寧不及勿過」)，而並未回答應「如何判斷」。也就是說，你還面臨著一個如何把握的問題。 更何況，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樣，你是在用「偏低的好」來搪塞關於「最佳的好」的問題。所以，總結這兩方面的漏洞，你的這第三點的回答可以說是雙重的文不對 題，答非所問。

不僅如此。

在這第三點中，你以五四復課作為「偏低」之例，說「現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即使五四之後就復課，也要比五一八之後仍不撤離好得多」。然而，這是你「現在」 即事後才搞清的，而你要回答的問題，是「當時怎麼能判斷」？顯然，這又是答非所問，是三重的文不對題！由此可見，因為概念的混淆而導致邏輯上的混亂，是多 麼的容易；而澄清概念也就很有必要了。

關於五四復課，還得多說幾句。

退一步來講，就算憑你的「妙心」與直覺，在五四當時就判斷出了「好」，你也還是面臨【以上第 239 頁】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往前看，五四見好就收了，那怎麼會有五一六至五一七的「最佳時機」呢？—這一點曹長青已論之，上節有提到。第二，退後看，又何必非得等到五四才收呢？四二二不也算「好」嗎？第三，到底是四二二更好呢還是五四更好？下面，將後二點展開來談。

退一步來講，就算憑你的「妙心」與直覺，在五四當時就判斷出了「好」，你也還是面臨【以上第 239 頁】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往前看，五四見好就收了，那怎麼會有五一六至五一七的「最佳時機」呢？--這一點曹長青已論之，上節有提到。第二，退後看，又何必非得等到五四才收呢？四二二不也算「好」嗎？第三，到底是四二二更好呢還是五四更好？下面，將後二點展開來談。

四二二那天，北京十多萬大學生和市民衝破當局禁令（北京市禁止遊行集會的《十條》），佔據廣場。人數之眾，已開學運歷史之先河；而當局也派出官員與學生 代表協商。你在《反思》中稱「空前規模是八九民運的最高價值」，又說寧可「不及」也勿「過」，照你的邏輯，四二二不也當算是「好」嗎？要是四二二就收了， 又怎麼會有五四之「好」及四二七、五一六、五一七之「大好」呢？四二二之好，直至今日，你似乎從未去考慮；也沒說四二七應當「見好就收」。可見，從「一見 好就收」這一理解而言，連你自己也沒有遵守你的「見好就收」理論，而是根據批評別人的需要，隨心所欲地發揮而已。

你只提五四，大概是因為前面有四二七之「好」，有百萬人大遊行的「勝利」，又有趙紫陽的溫和講話。但是，你似乎忘記了，當時四二六社論的緊箍咒還在頭上，它隨時都可以向同學們收緊。就此而言，你一方面把五四時稱作「好」，另一方面又把戒嚴之後稱作「壞」，二者是有明顯的內在矛盾的。比如你在《反思》中 說，戒嚴之後再撤，給人以「一嚇就回去了」的懦弱印象（四章十六節，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一六），當時應當「見壞就上」（十五節。頁一五；十七節。 頁一七）。對照來看，五四時其實也有很類似的情形：政府也用了恐嚇的手段（四二六社論稱「動亂」），民眾也無視當局的威脅又蔑視其禁令（四二七大遊行；五 四佔據廣場及集會示威）。【以上第 240 頁】但你一會兒稱五四時「好」，一會兒又定戒嚴之後再撤是「一嚇就回去」，那麼，試問，在四二六社論未推翻，「動亂」帽子未去除之後真的就收了，你不是還會加以譏諷，說「帽子沒摘去就收兵」嗎？

你只提五四，大概是因為前 面有四二七之「好」，有百萬人大遊行的「勝利」，又有趙紫陽的溫和講話。但是，你似乎忘記了，當時四二六社論的緊箍咒還在頭上，它隨時都可以向同學們收 緊。就此而言，你一方面把五四時稱作「好」，另一方面又把戒嚴之後稱作「壞」，二者是有明顯的內在矛盾的。比如你在《反思》中說，戒嚴之後再撤，給人以 「一嚇就回去了」的懦弱印象（四章十六節，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一六），當時應當「見壞就上」（十五節。頁一五；十七節。頁一七）。對照來看，五四 時其實也有很類似的情形：政府也用了恐嚇的手段（四二六社論稱「動亂」），民眾也無視當局的威脅又蔑視其禁令（四二七大遊行；五四佔據廣場及集會示威）。 【以上第 240 頁】但你一會兒稱五四時「好」，一會兒又定戒嚴之後再撤是「一嚇就回去」，那麼，試問，在四二六社論未推翻，

「動亂」帽子未去除之後真的就收了，你不是還會加以譏諷，說「帽子沒摘去就收兵」嗎？

相反，若在四二二之後就「收」，大概會更符合你的邏輯。因為，你的《反思》第一章第九節以「八九民運的巨大規模是這場運動的最重要的意義所在」為標題， 當中又明確寫道，「我強調八九民運主要在規模上而不是在內容上勝過以前幾次民主運動，這並不是貶低它的意義，恰恰是對它的偉大的意義的最充分的也是最準確 的評價。」(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四月，頁一三)而在此之前一節你更是宣稱「空前規模是八九民運的最高價值所在」(頁一〇)。這樣看來，規模空前本身，是你 非常看重的一個標準。而四二二那天，十多萬人大學生和居民佔據了廣場，其規模在紅色中國學運史上堪稱空前，照你的「最高價值」的標準，當然是算得上是 「好」了。此其一。其二，同學們以藐視當局禁令的方式佔據天安門廣場，當局卻派了官員與同學們協商。若這時同學們「見好就收」，不是更符合你的「良性互 動」的理論構想了嗎？(四章十節。中國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頁一一、一二；十三節。頁一五)更何況，第三，當時四二六社論沒有出來，形勢還沒「壞」，不存 在「一嚇就回去了」、「打不贏就跑」的尷尬。因此，照你的邏輯，四二二應更接近於戒嚴之前而五四更接近於戒嚴之後的情況。但是，你一方面說戒嚴前該收，戒 嚴後該上；另一方面，卻從不見你說四二二之後四二六之前就該收，你只是反覆地強調四二六之後的五四復課也不差。這一內在邏輯的自相矛盾，不又是很明顯嗎？ 【以上第 241 頁】

現在再退一步，取你兩面矛盾的邏輯中的一面，即假設認同四二二之後當「見好就收」，那麼，對這一點你自己是否又真的會贊成呢？我看未必。為什麼呢？因為這又撞上了你《反思》中的另一個自我矛盾。這來自於你對八七年元旦那次學潮的評價。

八七年元旦那次學潮，應當說是達到了你所強調的「寧可不及」的「好」。那天中午抓的學生，在廣大同學的壓力之下，當夜就放了；之後學運也就平息下來。同學們「見好」也就收了。這你是清楚的。但你卻不以為然。在《反思》中你有這樣的述評：

「八六－八七年那次學潮的最後一仗，是北大學生衝破軍警封鎖，深夜進軍天安門，終於奪回了白天遊行被捕的同學。應該說也取得了部分主動。但總體來講，它還是失敗了。」(《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一六)

本來，這段論述也沒什麼大問題。那次學潮的確從總體上來說，難以稱得上是什麼成功；「收」了之後不多久，胡耀邦便下了台。但問題是，你的這些評斷，恰恰 證明了對於「見好就收」的結果，搞得不好連你自己也是不會滿意的。你的這段評述是在關於「打不贏就跑」那一節中給出的一個反面例證。在同一篇文章中，你一 會兒說，一九八九年五四之後復課也不差，應當「見好就收」；一會兒卻又說，八七元旦「見好就收」的結果「還是失敗」。胡先生，我想知道，你究竟想要說什 麼？

帶點黑色幽默味道的是，柴玲在八七元旦那天，恰恰是北大學生深夜進軍天安門中的一員。而我也正好是白天被捕的學生之一。六年前你譏評八七學潮最後「見好就收」還是失敗了；去年【以上第 242 頁】你又責備八九學運沒能「見好就收」。胡先生，你看究竟應該怎麼做呢？你是否可以更明確地說明一下？

帶點黑色幽默味道的是，柴玲在八七元旦那天，恰恰是北大學生深夜進軍天安門中的一員。而我也正好是白天被捕的學生之一。六年前你譏評八七學潮最後「見好就收」還是失敗了；去年【以上第 242 頁】你又責備八九學運沒能「見好就收」。胡先生，你看究竟應該怎麼做呢？你是否可以更明確地說明一下？

總而言之，假如你的「見好就收」指的是「一見好就收」，無論五四還是四二二，都會陷入矛盾。因為你自己就是前後矛盾的。這樣一來，把「見好就收」理解為 「一見好就收」這條路也給堵死了，而這還算是相對有一點可操作性的策略。更何況既便這「偏低的好」，你也未能說清楚當時怎麼「準確地測定」。五四之 「好」，在《反思》中你是怎麼判斷的呢？那不過是一句事後的閑話，說什麼「現在大家看得很清楚」而已。

四、「見最佳時機才收」？

「偏高的好」，你早就認定不當追求，而追求「偏低的好」，又是那麼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現在你只剩下「最佳的好」一途可循。雖然第一節已證明，你並未能提供「如何在當時就能測定『最佳時的好』」之可靠依據，但你總算還給出了一個「最佳時機」的判斷。你是這麼說的：

「現在回過頭去看整個八九民運，我們或許可以說，如果運動在五月十六日閻明復赴廣場談話後撤離。或者是在五月十七日趙紫陽代表政治局發表書面講話後撤離，當是最佳時機。」（中國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頁一四）【以上第 243 頁】

另外，你又常提到五一八，比如上一節提到的你將五四與五一八作的對照，以及在《反思》第四章第六節中，你認 為這一天李鵬已經與同學們公開對話，是「好」就該「收」。因此我曾認為你的「最佳時機」可能也包括了五一八與李鵬「對話」。但後來看到曹長青的文章，才知 道不是這樣的。在前一節中引用的曹的兩篇文章中，他都轉述了你分析過的六次「好」。而最後一次是「大好」，指的是趙紫陽講話。曹先生曾是你的好朋友，他的 轉述當非杜撰。要是我沒猜錯的話，你是覺得五一八李鵬「對話」後撤是給李鵬一分，而不是給趙紫陽，故也不合適。

再就是你以戒嚴為分界，說「戒嚴令之前，民運未能見好就收；在戒嚴令之後，民運未能堅持見壞就上。這可以說是八九民運的兩大失誤。」（十七節，頁一七）故你認為「見好就收」的最後期限當是在宣佈戒嚴之前。同時，你一貫認為是在「五一九中共頒佈戒嚴令」的。（十三節，頁一五；及北春一九九六年八月，頁四 七）。因此，綜上所述，你認為「見好就收」的「最佳時機」是在五一六至五一八，主因是閻明復到廣場與趙紫陽的書面講話，閻明復到廣場講話是在五一六下午六 點，趙講話是五一七清晨，李鵬「對話」是在五一八上午十一點。故此，稱得上「最佳時機」的，是從五一六下午六點到五一八上午十點，總共四十小時。包括一個 白天，一個上午和兩個晚上。

現在來看一看你事後判斷的這段「最佳時機」有沒有什麼依據。

先說九〇年你的《反思》提供的依據。《反思》中除了「現在回過頭去看」一句話以外，對於五一七趙講話後為何便是「最佳時機」，並沒有見你作出什麼具體的分析和解釋。而對於為【以上第 244 頁】何 五一六閻明復到廣場講話之後就算「最佳時機」，其實你也未作出解釋。不過，你倒是提出三點理由，說明在絕食之後，「當局事實上已經作出了讓步」，包括閻明 復與李鵬同學生們的對話，也算「好」該「收」了。(詳後)這一段可謂你在《反思》中唯一集中論證為何絕食後戒嚴前那段時間為最佳時機的地方。可嚴格地說 來，你這還是算不上是在對「最佳時機」的判斷提供依據，而僅僅是在用一個籠統的「好」來搪塞，即用混淆概念的方式來蒙混過關。

先說九〇年你的《反思》提供的依據。《反思》中除了「現在回過頭去看」一句話以外，對於五一七趙講話後為何便是「最佳時機」，並沒有見你作出什麼具體的分析和解釋。而對於為【以上第 244 頁】何 五一六閻明復到廣場講話之後就算「最佳時機」，其實你也未作出解釋。不過，你倒是提出三點理由，說明在絕食之後，「當局事實上已經作出了讓步」，包括閻明 復與李鵬同學生們的對話，也算「好」該「收」了。(詳後)這一段可謂你在《反思》中唯一集中論證為何絕食後戒嚴前那段時間為最佳時機的地方。可嚴格地說 來，你這還是算不上是在對「最佳時機」的判斷提供依據，而僅僅是在用一個籠統的「好」來搪塞，即用混淆概念的方式來蒙混過關。

比如，你在這裡爭辯道，當時「見好就收」並非「無功而回」。而且按照改革運動中官方對民間的力量「反對－－默認－－承認」的三段論，「從負數過渡到正數 一般都要經過一個零這個點」。因而，「凡是要打一場有限戰爭的人，他必須滿足於這種不可靠的勝利。」換言之，「學生們完全可以滿足於當局對北高聯的默認態 度」，停止絕食，撤離廣場了。(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九－－一〇)由此可見，你又一次只針對「偏低的好」，即寧「不及」，勿「過」之好來評斷，又一 次將「最佳的好」擱到一邊不予理睬，又一次文不對題。

退一步來看，你畢竟還是提供了三條理由，那怕只證明了一個籠統的，傾向於偏低的「好」，也算不錯了。但是，這一點你又真的達到了嗎？你那三條論據真的能夠證明「當局事實上已經作出若干讓步」了嗎？這得看你那三條具體怎麼說。現全文引用如下：

１)當局雖未公開否定四二六社論，但是畢竟已經停止了對學生運動的指責。李鵬在和學生代表對話時說：「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都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 搞動亂。」所謂「從來沒有說過」云云，顯見是強詞奪理；在「廣大同學」這個詞的背後還留著「抓一小撮」和抓「背後【以上第 245 頁】長 鬍子的

人」的一條大尾巴。不過我們還是應該看到，李鵬這句話是對王丹、吾爾開希公開講的，它比起四二六社論而言確屬一種退讓。其它一些溫和派領導人的講話 則更明確一些。2)當局雖然沒有公開地承認北高聯的合法性，但當時並未採取實際的取締措施。更重要的是，當局，從閻明復到李鵬，都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北高 聯的負責人進行了對話，這應視為對北高聯的一種默認。並且，3)這些對話是公開進行的。(第四章第六節，中國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頁九)

1)當局雖未公開否定四 二六社論，但是畢竟已經停止了對學生運動的指責。李鵬在和學生代表對話時說：「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都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所謂「從來沒有 說過」云云，顯見是強詞奪理；在「廣大同學」這個詞的背後還留著「抓一小撮」和抓「背後【以上第 245 頁】長鬍子的人」的一條大尾巴。不過 我們還是應該看到，李鵬這句話是對王丹、吾爾開希公開講的，它比起四二六社論而言確屬一種退讓。其它一些溫和派領導人的講話則更明確一些。2)當局雖然沒 有公開地承認北高聯的合法性，但當時並未採取實際的取締措施。更重要的是，當局，從閻明復到李鵬，都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北高聯的負責人進行了對話，這應視 為對北高聯的一種默認。並且，3)這些對話是公開進行的。(第四章第六節，中國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頁九)

因為這三點涉及閻明復五一四的對話、李鵬五一八的「對話」、默認北高聯以及停止指責「動亂」這四個方面，因此，下面分四節來討論，看一看政府都作了些什麼樣的「事實上的讓步」，又能不能稱之為「好」。

（作者按：以下三節從略，因為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既不發表本文，也不說明理由，只好整理出來轉投它刊，分別發表於《前哨》九七年六月和《爭鳴》九七年六至七月。）

五、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

中共沒有遵守承諾實況轉播對話，因此不能說是「公開對話」。詳見拙文《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

六、五一八算對話嗎？

【以上第 246 頁】

七、李鵬讓了哪一步？

五一八既非「對話」，也不「公開」，更沒有「現場直播」；除了文字遊戲以外，李鵬一步未讓。詳見拙文《五一八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了嗎？－－駁「李鵬讓步論」》。

八、當局默認了北高聯嗎？

關於當局在絕食後是否曾有讓步，你的三條依據中的二條已經被證明靠不住了。那麼，當局就真的一步沒讓嗎？你說，還有一條，當局默認了北高聯。你的理由 是，「當局當時並沒有採取實際的取締措施」，而且，「更重要的是，當局，從閻明復到李鵬，都和王丹、吾爾開希等北高聯的負責人進行了對話。」這兩點看起來 似乎很有道理，不過還是經不住分析，也經不起與一九八九年的實際相對照。

首先，暫時沒有採取措施取締北高聯，並不一定就意味著是默認，而完全可以是因為運動的形勢所迫，當局還來不及下手。對這麼簡單的道理，我不打算在這裡多 說。只提三點事實：一，四二六社論斥責「非法學生組織」，自此以後中共就從未收回社論；二，四二九對話時，開希、周勇軍以北高聯的身份參加，因官方不承認 北高聯合法而退出；三，五四宣佈復課後，許多學校【以上第 247 頁】的自治會即刻受到壓制，詳情另述。可見當局祇是暫時沒有大規模下手而已。

首先，暫時沒有採取措施取 締北高聯，並不一定就意味著是默認，而完全可以是因為運動的形勢所迫，當局還來不及下手。對這麼簡單的道理，我不打算在這裡多說。只提三點事實：一，四二 六社論斥責「非法學生組織」，自此以後中共就從未收回社論；二，四二九對話時，開希、周勇軍以北高聯的身份參加，因官方不承認北高聯合法而退出；三，五四 宣佈復課後，許多學校【以上第 247 頁】的自治會即刻受到壓制，詳情另述。可見當局祇是暫時沒有大規模下手而已。

其次，李鵬不能算與學生有過「公開對話」，前面一節已證之。

第三，五一四對話與五一八會談的對象，中共都刻意迴避了北高聯。《人民日報》五月十五日：「……與首都三十多所高校學生推舉出來的學生代表對話，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同學也派代表參加」；十九日：「李鵬等會見絕食學生代表」。根本不提北高聯。

第四，你列出開希與王丹的名字，說明你並不知道，在絕食之後，開希便不能代表北高聯了。甚至可以說，自五月十三日起，開希便已失去了在北高聯的身份。這有王超華與梁二的發言為證。先看超華回憶開希參加五一四對話的背景：

「……開希覺得這個協議是我們做的，為什麼只有對話團參加對話。下午我們坐在一起時就對他說，『開希你參加絕食已經違反高聯紀律了，你不要再代表高聯講 話。』所以十三日晚上連坐都沒跟他坐一塊。他先說了一下，他代表北高聯。然後我發言時還說了一聲，他不代表北高聯。北高聯是另外有決議的。他們兩個在絕食 行動中和北高聯不是一回事。所以十四日他整個的情緒是，我不是北高聯，我就是絕食團。而且他是以絕食團的名義要求參加沈彤他們對話團的對話。」（《回顧與 反思》，頁一〇一）

梁二在巴黎會議上也多次提到開希在絕食後不再是師大駐北高聯常委這件事。也許是礙於情面，梁二的發言有些含糊而前後稍有些出入。不過，總體上還是很清楚 的，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大致是這樣的：絕食前夕，梁二與開希私下有個協議，即開希退出高聯，梁二加入高聯，【以上第 248 頁】而開希去領導絕食團(頁二九六)；五一三晚上，在與閻明復會談之後，五位高聯常委開了個碰頭會，確定梁二的高聯常委身份，自此開希在北高聯便不再有職位了（頁一八二；二九六—七）。梁二還提到，「五一七那天正式罷免開希，所有常委都拒絕與開希合作，這主要由於開希當晚撤退的那種決定」也許是時間弄錯了，當 是指五一四晚。當聽到開希實際上並不在北高聯任職時，李錄還奇怪地追問：那麼，五二二凌晨開希喊撤時，北高聯罷免他都罷免什麼呢？梁二坦承：「實際上開希沒有任何職務可罷免。」(頁二九七)

梁二在巴黎會議上也多次提到開希在絕食後不再是師大駐北高聯常委這件事。也許是礙於情面，梁二的發言有些含糊而前後稍有些出入。不過，總體上還是很清楚的，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 話，大致是這樣的：絕食前夕，梁二與開希私下有個協議，即開希退出高聯，梁二加入高聯，【以上第 248 頁】而開希去領導絕食團(頁二九 六)；五一三晚上，在與閻明復會談之後，五位高聯常委開了個碰頭會，確定梁二的高聯常委身份，自此開希在北高聯便不再有職位了(頁一八二；二九六－七)。 梁二還提到，「五一七那天正式罷免開希，所有常委都拒絕與開希合作，這主要由於開希當晚撤退的那種決定」也許是時間弄錯了，當是指五一四晚。當聽到開希實 際上並不在北高聯任職時，李錄還奇怪地追問：那麼，五二二凌晨開希喊撤時，北高聯罷免他都罷免什麼呢？梁二坦承：「實際上開希沒有任何職務可罷免。」(頁 二九七)

我不大清楚王丹的情況。但從王超華的敘述來看，王丹應當是同開希一樣，因絕食違反高聯紀律而不能再代表高聯了。上面超華說的「他們兩個」，顯然是

指開希和王丹。

第五，由此可見，五一四對話根本就與北高聯隔得很遠。開希和王丹與會，並非以北高聯代表參加的，因此不能證明當局默認了北高聯。那麼，還有別的同學呢？ 第五節中曾引述了項小吉的回憶，他說這天對話的對話團及五位絕食同學代表，絕食團有開希負責。這五位絕食團的同學，我根據各人的回憶確定是王丹，開希，程 真，柴玲和王文：正好都是絕食的主要發起人。柴玲從未參加過北高聯的工作。程真在北師大秘書處曾是開希的筆錄員，後來作用又很大(梁二，會，頁一九四)， 而北師大曾是北高聯的執行機構(梁二，頁三一)，開希又是兩邊的主席，因此說程真曾在高聯工作也不會錯。程真自己還有一篇文章提到五一一發起絕食，就是在 北高聯例會之後，他們幾個人去一個小餐館裡商定的。(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不過，她不會是高聯常委或秘書長，也就不能代表高聯。至於王 文的情況則比較清楚。他確實想到高聯工作，【以上第249 頁】但沒成功。梁二提到王文發動絕食的一個緣由：

第五，由此可見，五一四對 話根本就與北高聯隔得很遠。開希和王丹與會，並非以北高聯代表參加的，因此不能證明當局默認了北高聯。那麼，還有別的同學呢？第五節中曾引述了項小吉的回 憶，他說這天對話的對話團及五位絕食同學代表，絕食團有開希負責。這五位絕食團的同學，我根據各人的回憶確定是王丹，開希，程真，柴玲和王文：正好都是絕 食的主要發起人。柴玲從未參加過北高聯的工作。程真在北師大秘書處曾是開希的筆錄員，後來作用又很大(梁二，會，頁一九四)，而北師大曾是北高聯的執行機 構(梁二，頁三一)，開希又是兩邊的主席，因此說程真曾在高聯工作也不會錯。程真自己還有一篇文章提到五一一發起絕食，就是在北高聯例會之後，他們幾個人 去一個小餐館裡商定的。(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不過，她不會是高聯常委或秘書長，也就不能代表高聯。至於王文的情況則比較清楚。他確實 想到高聯工作，【以上第249 頁】但沒成功。梁二提到王文發動絕食的一個緣由：

「王文呢，他的動機是想混入高聯。自稱是高聯的監察委員，是獨立於常委之外的一個監察部長，北高聯監察官，當然後來被否決了。後來，又自稱是王志新的副秘書長兼助手。他是找不著事幹想鬧一鬧。」

由此可見，參加五一四對話的五位絕食同學，都不代表北高聯。其實，高聯不參加對話、只管運動的協調，對話團只管對話，這個原則本身，在五月初就確

定了。因此，在五一四對話中沒有北高聯參加，反而是很正常的事。

最後，第六，退一步講，就算五一四對話與五一八會談給人以「當局默認北高聯」這種印象，你由此來證明當局就有讓步，也是偏離當時的實際的。絕食之後，同 學們集中要求的是對話與平反二點。而高聯合法化這一問題已退居二線，不是當時的焦點了。無論王丹，開希，還是柴玲，以及其他同學，當時要求的，都是這二 點。五一三見閻明復時，開希給沈彤寫了這二點，要他提這二點(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王丹唸的絕食宣言中提的也是這二點；柴玲在廣場上 還向我講了她為什麼堅持這二點。她說，十二日計劃絕食，很多同學提出許多要求，但她堅持只提兩條最基本的要求，一來政府最能妥協，二來世人也容易明白。第 三，這樣也最能贏得人民的理解與支持。因此，即便當局有過一絲默認的味道，也不能充分說明在當時情形下是一種「事實上的讓步」。人都快餓死了，向你要碗 飯，你卻給口水，算什麼呢？何況，連這口水也沒有保障。【以上第 250 頁】

現在總結一下以上四節的要點：五一四對話算不上是「公開」，五一八連「對話」都不是，李鵬實際上一步都沒 讓，而北高聯在實質上是否得到當局的默認還很成問題。總而言之，胡先生，根據以上的論證，我認為你在九〇年《反思》中給出的「絕食後當局曾實際上讓步」這 一論點的三條依據都靠不住。

九、五一七講話是中共集體的讓步嗎？

何以判斷五一七趙紫陽書面講話之後撤離廣場是「最佳時機」呢？雖然在九〇的《反思》系列文章中你從未給出論據，但是在九五年底，你補了這個漏洞，找來趙 紫陽講話的原文作為證據。雖然你並未論證何以謂之「最佳」，但這已是你很大的一個進步了，至少你這次注意到了史料的重要性。現在的問題是，你提供的史料， 對於論證你提出的論點是否充分？你的分析與論證又是否堅實呢？我們來看一看。

《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上你的那篇文章，是為了回應鄭義和曹長青的批評的。他們批駁過你的「中共讓步論」，你便在這篇文章中首先全文徵引了趙書面 講話的內容，並強調「這不是趙紫陽一個人的表態，而是他代表中共政治局五常委的集體表態」，由此反駁鄭義關於「中共寸步不讓」的論點。然後你說，「我敢斷 言，當聽到趙紫陽五一七講話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清清楚楚地測定出那是好。當時大家不是沒覺出「好」，而是因為一個個的「好」衝昏了頭腦，指【以上第 251 頁】望再加把勁去得到更好的好」。不過，你還是提出，對於絕食者，認為 不夠「好」和不肯收兵，你有二個「完全理解」。最後，你宣稱，「五一七講話雖然沒有明文否定四二六社論，然而它實質性地改變了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的一切 錯誤指控。我不以為在這一點上，還有什麼爭論的餘地。」(《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頁三一—三二)

《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十 二月上你的那篇文章，是為了回應鄭義和曹長

青的批評的。他們批駁過你的「中共讓步論」，你便在這篇文章中首先全文徵引了趙書面講話的內容，並强調「這不是 趙紫陽一個人的表態，而是他代表中共政治局五常委的集體表態」，由此反駁鄭義關於「中共寸步不讓」的論點。然後你說，「我敢斷言，當聽到趙紫陽五一七講話 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清清楚楚地測定出那是好。當時大家不是沒覺出「好」，而是因為一個個的「好」衝昏了頭腦，指【以上第 251 頁】望再加把 勁去得到更好的好」。不過，你還是提出，對於絕食者，認為不夠「好」和不肯收兵，你有二個「完全理解」。最後，你宣稱，「五一七講話雖然沒有明文否定四二 六社論，然而它實質性地改變了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的一切錯誤指控。我不以為在這一點上，還有什麼爭論的餘地。」（《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頁三一 –三二）

但是，很對不起，胡先生，我認為還是有爭論的餘地。而且，這個餘地還不小。實際上，將四二六社論拿出來，與五一七講話對照一下，便不難看出。四二六社論 的核心是指稱這次運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場動亂」，而五一七講話對「動亂」只字未提，反而希望「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影射 「動亂」的局面；四二六社論嚴辭譴責「極少數人」，既包括社論中提到的「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的學生，也包括袁木後來斥責的「長鬍子的」「黑手」，都「要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五一七講話則只針對泛泛的「同學們」保證不秋後算帳；四二六社論宣稱「這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而五一七講話則對此諱莫如深。因 此，胡先生，至少有這三點「錯誤指控」，五一七講話沒能作出「實質性改變」，而這三點恰恰是當時問題的核心。

最後的那一點，似乎很少有人留心。然而，趙講話本身，其實就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的產物。趙紫陽講話的第一句宣稱他代表其他四位政治局常委，你也強 調這一點來證明中共有集體性的讓步。但是，胡先生，你這種觀點應該說是只看見了文本(text)，而未留心其背景(context)，只見有木，未見有 林。不用說「現在回過頭去看」，就是在當時，稍有政治頭腦的人，也清楚李【以上第 252 頁】鵬 與趙紫陽的對立，而他這所謂的「代表」一說，很難說不是「此地無銀」。因為聯繫到他頭天下午見戈爾巴喬夫所說的那一番話，端端地將個鄧小平抬了出來，說什 麼鄧才是「總設計師」和掌舵的，無非是要表白他對時局負不了責，至少負不了全責。我當時聽到他亮出鄧小平時，吃了一驚，覺得有二種可能：一是趙將失勢，故 鋌而走險，背水一戰；一是趙已失勢，故對天放槍，留個清名。我當時還納悶，趙哪來的實力去和老鄧對抗？因此，恰恰是五一七清

晨的講話，加強了我的第二個判 斷：趙已失勢。等到五一九凌晨，趙的眼淚便將這一判斷明朗化了。因此，胡先生，至少有我這麼一個人，在當時聽到趙講話時，不是以「好」來解讀的。當時還有 很多不以「好」解讀趙講話的人，故而你說「敢斷言我們每個人都清楚地測定那是好」我看有修正的必要。你似乎有點覺得你是那麼想的，別人也應該那麼去想。

最後的那一點，似乎很少 有人留心。然而，趙講話本身，其實就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的產物。趙紫陽講話的第一句宣稱他代表其他四位政治局常委，你也強調這一點來證明中共有集體 性的讓步。但是，胡先生，你這種觀點應該說是只看見了文本(text)，而未留心其背景(context)，只見有木，未見有林。不用說「現在回過頭去 看」，就是在當時，稍有政治頭腦的人，也清楚李【以上第 252 頁】鵬與趙紫陽的對立，而他這所謂的「代表」一說，很難說不是「此地無銀」。 因為聯繫到他頭天下午見戈爾巴喬夫所說的那一番話，端端地將個鄧小平抬了出來，說什麼鄧才是「總設計師」和掌舵的，無非是要表白他對時局負不了責，至少負 不了全責。我當時聽到他亮出鄧小平時，吃了一驚，覺得有二種可能：一是趙將失勢，故鋌而走險，背水一戰；一是趙已失勢，故對天放槍，留個清名。我當時還納 悶，趙哪來的實力去和老鄧對抗？因此，恰恰是五一七清

晨的講話，加強了我的第二個判斷：趙已失勢。等到五一九凌晨，趙的眼淚便將這一判斷明朗化了。因此， 胡先生，至少有我這麼一個人，在當時聽到趙講話時，不是以「好」來解讀的。當時還有很多不以「好」解讀趙講話的人，故而你說「敢斷言我們每個人都清楚地測 定那是好」我看有修正的必要。你似乎有點覺得你是那麼想的，別人也應該那麼去想。

進一步來看，五一七那天，廣場上多數的人當然還不清楚頭天深夜召開的政治局緊急會議。這個會議最能說明趙紫陽的「代表性」。中共《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對五一六會議有這樣的描述：

「常委中多數同志認為，面對當時的形勢，絕不能退讓，只能更加堅定地反對動亂，制止動亂。趙紫陽仍然堅持退讓。他當時還提出向同學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 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去是經他批准的，由他承擔責任。這是他耍弄的另一手腕，受到多數同志的拒絕。」(港本，頁一〇九；這一情況也可從五月十八的香 港快報得到印證；吳牟人《八九民運紀實》頁二四七)。【以上第 253 頁】

這次會議在趙講話前沒幾個小時，由此可見，你所謂的中共集體讓步，與實際情況有多大的差別！而且，這也證實 了五一八會談上李鵬所謂「黨中央從

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確實是個彌天大謊。另外，所謂「另一手腕」，說明趙紫陽還有一手；至於具體是什麼，《五 十六天》沒明說。這既可以指趙五一六見戈爾巴喬夫時的言論，也可以指五一七凌晨的講話。而該書在處理五一七講話內容時，對「保證絕對不秋後算帳」這一點絕 口不提。連貫起來看，趙的這番話是否徵求過全體常委的意見，徵求過哪些意見，是否全體贊同，又是否經過集體討論和通過，便很值得考查了。因為該書敘述的這 次會上，並未提到這篇講話，那麼，是隱去了還是根本沒討論，便很難說。無論如何，根據大量的材料顯示，至少李鵬和姚依林，是很難說會心甘情願地同意趙五一 七講話內容的。因此，胡先生，你只是從趙一人講話的本文來證明中共政治局集體讓步，從論證的方法上是不充分的，從論證的內容上是不可靠的。

再者，關於「保證不秋後算帳」。的確，趙紫陽五一七講話保證不秋後算帳，至少比閻明復頭天下午的同樣保證要有份量。不過，他們是被公認是屬於「改革派」 的。「改革派」的保證是否能夠兌現，這要看他們日後是否還在台上，否則只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都難保。因此，你籠統地說，當局有所讓步，是混淆而意義不大 的。因為，所謂讓了步的人，其實早就傾向於學生這一邊，無論是閻還是趙，這一點大家不是不知道。因此，要說中共真要有讓步，則必須是所謂的「保守派」那一 方才會有意義。而在這種情形下，趙五一七講話給人的印象，不僅不是中共一個團結的形象出現，來作一個集體的讓步，反而是增加了一個分裂的聲音。【以上第 254 頁】

趙紫陽五一六、五一七兩次公開的言論，中間只隔一個晚上。但是他給出的信號實在太模糊，大家既不知道他葫蘆 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就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瞎猜一通。有的人以為他要跟老鄧幹一仗，五一七便「倒鄧倒李」之聲陡增，之前之後都沒有這一天這麼響 亮；有的人看出他是在向廣場求救，五一七便有百萬餘人上街遊行，比頭一天高出一倍以上，也許是在這個運動中人數最多的一天。這兩種人都以為是在幫趙的忙， 而無論如何，能達到你「清清楚楚地測定出那是好」，且能高瞻遠矚，「見好就收」的人，我很難相信會有多少。

奇怪的是，趙為何一直沒出來對話？更奇怪的是，這個問題後來似乎沒有多少人探討。當時和之後，許多人相信要是五一七趙不是只作一個書面講話，而是到天安 門廣場去支持學生，那麼，他就會像當年毛澤東那樣掌握民眾巨大的支持這一強大的資源，而整個運動中，只有他握有這一主動權。阮銘先生認為趙當時還握有宣傳 媒介和立法機構兩大主動權（《鄧小平帝國》，頁頁二五五）；陳一諮先生還認為當時中央警衛團（原八三四一部隊，曾逮捕四人幫）三分之二都支持趙（BEJA 等，《北京地震》，頁五二三。法文）。那麼是什麼原因讓他不出來直接與學生對話呢？又是什麼原因促使他五一六非得向戈爾巴喬夫講那一番話呢？我只能提出這 一問題，以待討論。也許他是怕弄不好又搞成一場「文革」或引發內戰？

言歸正傳。現在再來看看你的二個「完全理解」。你說，

「我完全理解為什麼當初絕食者對趙紫陽五一七講話感到不滿足：共產黨既然不是靠自由選舉上的台，執政四十年又犯下那麼多錯誤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體下台也不為過。我也完全理解為什麼【以上第 255 頁】在當時絕食者不肯鳴金收兵：一場天安門運動喚起了千千萬萬民眾，我們憑什麼不乘勢追擊，爭取更大

的勝利？」

「我完全理解為什麼當初絕食者對趙紫陽五一七講話感到不滿足：共產黨既然不是靠自由選舉上的台，執政四十年又犯下那麼多錯誤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體下台也不為過。我也完全理解為什麼【以上第 255 頁】在當時絕食者不肯鳴金收兵：一場天安門運動喚起了千千萬萬民眾，我們憑什麼不乘勢追擊，爭取更大的勝利？」

胡先生，從你的「完全理解」，我倒看出了你的「完全不理解」。首先，我上面也一再說了，當時同學們急切希望的，就是滿足對話與平反二點要求，而你對此隻字不提。

其次，你的第一條「理解」似乎以為同學們希望推翻共產黨，但實際情況是什麼呢？你大概不知道當時任畹町因為喊「打倒共產黨」而遭到同學們刻意「劃清界 限」之類的事實。當時同學們思想當中一個很流行的觀點是，「不參與黨派之爭」，遑論「推翻共產黨」了。也許當時大家覺悟不夠，沒能達到你所強調的「政治功 利意識」，但這畢竟是當時的事實。你能舉出多少例證來證明戒嚴之前絕食者的主體思想是想推翻共產黨嗎？

最後，我也不明白，「爭取更大的勝利」是指的什麼？又從何談起？你真的覺得當時已經是勝利了嗎？

在結束本節之前，胡先生，我都有點不好意思去再次指出，你說「敢斷言五一七講話時每個人都測定出那就是好」，這個「好」還是「偏低的好」，而不是「最佳的好」。因此，你還是根本沒有回答「怎麼在當時測定出那就是最佳時機」這一根本問題。

現在小結一下：你說趙紫陽五一七講話是中共政治局集體對絕食者的讓步，這很可懷疑；你斷言當時「每個人都清清楚楚地測定出那就是好」，很不符合實際；你 所宣稱五一七講話「實質性地改變了四二六社論的一切錯誤指控」，漏洞很大；你說你「完全理解絕食者的追求」，我【以上第 256 頁】看未必。無論如何，最關鍵的一點是，你自始至終還是沒有說明，你究竟「怎麼能夠在當時就準確測定那就是最佳時機」。

現在小結一下：你說趙紫陽 五一七講話是中共政治局集體對絕食者的讓步，這很可懷疑；你斷言當時「每個人都清清楚楚地測定出那就是好」，很不符合實際；你所宣稱五一七講話「實質性地 改變了四二六社論的一切錯誤指控」，漏洞很大；你說你「完全理解絕食者的追求」，我【以上第 256 頁】看未必。無論如何，最

關鍵的一點是，你自始至終還是沒有說明，你究竟「怎麼能夠在當時就準確測定那就是最佳時機」。

十、本章結論

本章分析了你所用過的各種各樣的「好」的情況，證明它們分屬於不同的層次，而你使用「見好就收」一詞時所用的「好」是在「偏低的好」與「最佳的好」之間 隨意遊移，浮動不定。這種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導致了「見好就收」一詞上的不確定性。不知該是「一見好就收」還是「見最佳時機才收」。由此便導致了許多邏輯 上的混淆和自我矛盾。

本章還證明，你既沒能真正堅持「一見好就收」，也沒能解決「最佳時機在當時如何準確測定」這一基本問題。

總之，你所謂的「好」，沒有可測量性；你所謂的「見好就收」策略，不具可操作性。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於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略有調整)

本章主要參考資料：

（１）、港支聯匯編，《八九中國民運報章頭版專輯》，一九八九年。

（２）、十七位流亡同學，《回顧與反思》(一九九一年巴黎會議記錄)。德國萊茵筆會，一九九三年。

(3)、中共，《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香港註釋本)，一九九〇年。【以上第257頁】

(4)、BEJA 等，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ekin (北京地震)，Paris，Gallimard，一九九一。

(5)、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一九九二年。

(6)、吳牟人，《中國民運紀實》，紐約，一九八九年。

(7)、《新聞自由報》，洛杉磯，一九八九年至今。

(8)、《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紐約)、《前哨》(香港)等雜誌。

(9)、我一九九〇年底至一九九一年初的手稿。

(作者按：此文是按胡平來信的要求而作的理論分析，繼續我們在《北京之春》上關於八九民運策略的討論，結果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刊出《回應封從德》之後，胡 平主持的《北京之春》既不發表我的文章，也不說明理由。之後只好轉投《中國之春》，於一九九七年六月發表，至今未見胡平的答覆。)【以上第 258 頁】

見壞怎麼上？－－答胡平公開信之二

胡先生：

「難道我們可以責怪學生們太不知道『適可而止』嗎？不。學生們採用的手段實在是太和平了(不要忘記，五四時的學生還曾放火燒了趙家樓)，他們提出的要求 實在是太起碼了。」胡先生，這是你《中國：面臨著改革》一文中的一段話，寫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當時正是絕食高潮，你還記不記得？

幾天後，你繼續鼓動廣場學生堅持下去：「中共溫和派已經失勢，戒嚴令已經頒佈，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勢在必行。……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 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這段話見於你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一文，是不是？

到了五月二十五日夜裡，你還對楊巍強調「見壞就上」，認為形勢會好轉，鄧小平將拋出李鵬，讓李鵬下台，軍隊可能不會開槍；而楊巍則一再催促你作為民聯主席向廣場學生呼籲撤離，【以上第 259 頁】反覆提醒「胡平，流血的危險依然嚴重存在」，聽到你說現在應該「見壞就上」，楊巍急了，說：「只怕是越上越壞啊！」胡先生，這是楊巍發表的一段回憶，你還記得嗎？

到了五月二十五日夜裡，你還對楊巍強調「見壞就上」，認為形勢會好轉，鄧小平將拋出李鵬，讓李鵬下台，軍隊可能不會開槍；而楊巍則一再催促你作為民聯主席向廣場學生呼籲撤離，【以上第 259 頁】反覆提醒「胡平，流血的危險依然嚴重存在」，聽到你說現在應該「見壞就上」，楊巍急了，說：「只怕是越上越壞啊！」胡先生，這是楊巍發表的一段回憶，你還記得嗎？

甚至六四凌晨你都認為廣場上的學生不該撤：「如果有相當數量的人冒死堅守，或許真有可能死裡求生，轉敗為勝」；「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則不 能勝利，而且到頭來仍免不了犧牲，只是徒然地使犧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貴的價值。我當然不是說血肉之軀可以抵擋得過坦克機槍。但是，倘若屠殺（所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這是你九〇年三月開始發表的《八九民運反思》中的判斷，你不否認吧？

……

怪哉！怪哉！胡先生，後來批評廣場學生「激進」、沒有「見好就收」最用力的，怎麼偏偏又是你呢？不正是你在八九民運期間「吶喊助威、廣造聲勢」（你自己 的概括）不斷鼓動廣場學生們「上」的嗎？我不是說你沒有資格批評激進思潮和言行，我也並不認為這類批評完全沒有切中時弊，但是，我很奇怪，你在「反思」別 人的時候，怎麼不先反省自己過去同樣的言行呢？當阮銘先生指出你前後不一自相矛盾時，你又為何矢口否認呢？

胡先生，我疑惑的重點是，即便不從做人的起碼原則上說，而單從理論上講，一個連發明者本人都反覆不定的策略，又怎能希望它適用於大眾呢？

一、你依然堅持「李鵬讓步論」和「見好就收」論嗎？

【以上第 260 頁】

上一封公開信完成了總體架構的第一章（因為你在貴刊的壓制，只好刊於中

國之春一九九七年六月)，這個總體架構共有四章，它們是：

一、「見好怎麼收」：分析「好」是什麼及對好能否有共識；

二、「見壞怎麼上」：分析「見壞就上」面臨的問題，及你自己是否有一貫的好壞標準；

三、「見好沒法收該怎麼辦」：分析八九學生運動組織的得失；

四、回應你的《回應》：逐條檢討我們之間可能達成的共識與存在的分歧。

第一章分析了你所用過的各種各樣「好」的情況，證明它們分屬於不同的層次的「好」，而你使用「見好就收」一詞時所用的「好」是在「最低的好」與「最佳的 好」之間隨意遊移，浮動不定。這種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導致了「見好就收」用詞上的不確定性，不知該是「一見好就收」還是「見最佳時機才收」。由此便導致了 許多邏輯上的混淆和自我矛盾。第一章還證明，你既沒能真正堅持「一見好就收」，也沒能解決「最佳時機在當時如何準確測定」這一基本問題。總之，你所謂的 「好」，沒有可測量性；你所謂的「見好就收」策略，不具可操作性。

這些分析，是在第一章中提供的大量史實基礎上作出的。在分析的同時，我發現支撐你的理論的許多關鍵論據極不可靠。比如為了論證應當「見好就收」，你在 《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說，「絕食後當局事實上已經作出若干讓步」，為此，你給出三條依據(《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 頁九)，結果沒有一條靠得住，尤其是你所說的「五一四對話是當時公開進行的」、「五【以上第 261 頁】

一八李鵬會見絕食同學是『公開對話』」，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對史實本身都沒弄清楚就輕下斷言。而李鵬是否在「平反動亂」這一點上像你所說的「確屬一種退讓」，又是否算是默認了北高聯，在這些問題上，你也不過「想當然耳」。

這些分析，是在第一章中提 供的大量史實基礎上作出的。在分析的同時，我發現支撐你的理論的許多關鍵論據極不可靠。比如為了論證應當「見好就收」，你在《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說，「絕食後當局事實上已經作出若干讓步」，為此，你給出三條依據(《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 頁九)，結果沒有一條靠得住，尤其是你所說的「五一四對話是當時公開進行的」、「五【以上第 261 頁】一八李鵬會見絕食同學是『公開對話』」，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對史實本身都沒弄清楚就輕下斷言。而李鵬是否在「平反動亂」這一點上像你所說的「確屬一種退讓」，又是否算是默認了北高聯，在這些問題上，你也不過「想當然耳」。

第一封公開信的大致內容概括如上，至今未見你的回應。

關於「李鵬讓步論」，還得補充幾句。

把五一八李鵬召見學生當作「公開對話」且作了「現場直播」的，正始於

你九〇年的《反思》。貴文第四章第二十一節的標題就是「關於五一八對話」，你用了千 餘字來闡述「李鵬讓步論」，斷定「李鵬等人前來與學生領袖會談並現場直播，也等於實際上滿足了『對話、現場直播』的要求。換句話，李鵬的到來，本身就意味 著學生的勝利。」而學生卻「在對話中堅持強硬立場」、「得寸進尺」、「年輕氣盛」、「鋒芒畢露」，也就是說，李鵬有所讓步，而學生卻寸步不讓，甚至「得寸 進尺」！（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二〇）這些論據與論點之不實與荒謬，我已有另文詳述。不過，我希望你對此有所回應；如果認為我講的是事實，就請承認 它。

如此要求，不是為了迫你認錯，實在是因為你有「民運理論家」的聲譽。如果民運理論家都堅持「李鵬讓步論」和學生「得寸進尺」說，那麼李鵬鎮壓學生運動不 就很有道理了嗎？希望你有聞過則喜的雅量，知錯就改。否則，「李鵬讓步論」還將謬種誤傳，貽害大方，以至於像陳小雅這樣國內少見的公正記述和評價六四的史 學學者，也會掉進「李鵬讓步論」的誤區。民運與眾人受損，高興的只有李鵬。事關大局，茲固請之。【以上第 262 頁】

二、你依然堅持戒嚴後應當「見壞就上」嗎？

胡先生，關於「見壞就上」，你似乎有四期轉變，從你的言論與行動顯示出來。首先，你在八九民運期間的言行主要是鼓動廣場學生堅持的，尤其是在運動後期， 五二〇戒嚴之後，你更提出「見壞就上」的理論，堅決主張並積極推動，甚至六四凌晨你也認為廣場學生不撤死拼更好，這是第一期；六四屠殺之慘烈，你的態度也 隨之而變，不到十個月，你便刊出八萬言書《八九民運反思》，偏向於指責廣場學生沒有「見好就收」，但這時你尚未完全放棄戒嚴後「見壞就上」的構想，此第二 期；然而，到了九五年，當媒體猛烈批判廣場學生的激進時，你又熱切附和，批評文章比誰都多，一改過去堅持「見壞就上」的言行，轉而批評學生在戒嚴後還「不 撤」，甚至宣稱你過去的主張「當然是『穩健節制』的」，此第三期。不過，你的轉向又搖擺不定，很快，在別人指出你八九民運後期力主「見壞就上」與今日批 評「激進派」自相矛盾時，你又回到原點，說戒嚴後還是應當「見壞就上」，此第四期。這樣四期三變，一波三折，下文將詳細給出證據，說明並非憑空冤枉你；若 有不實或誤解，也希望你予以澄清。

時至今日，依然主張戒嚴後應當衝上去與中共死拼的人怕是不多了，而你自己也閃爍其辭。因此，在討論「見壞就上」這一策略之前，必須首先弄清楚：「如今你 還堅持戒嚴後應當『見壞就上』嗎？」如果你作為策略的提出者都不再堅持，我們繼續討論的意義就不大了。由於你上述【以上第 263 頁】所提到的搖擺現象，我們只能具體先看一看你的這三次轉變，然後才能審視你目前的真實意圖。

時至今日，依然主張戒嚴後 應當衝上去與中共死拼的人怕是不多了，而你自己也閃爍其辭。因此，在討論「見壞就上」這一策略之前，必須首先弄清楚：「如

今你還堅持戒嚴後應當『見壞就 上』嗎？」如果你作為策略的提出者都不再堅持，我們繼續討論的意義就不大了。由於你上述【以上第 263 頁】所提到的搖擺現象，我們只能具體先看一看你的這三次轉變，然後才能審視你目前的真實意圖。

三、一九八九年：你堅持「見壞就上」

胡先生，八九民運期間，你主要堅持「見壞就上」，這是一個磨滅不掉的事實。這至少有六點依據來證實。

首先，即便是戒嚴之前，你也並非主張「見好就收」，而是希望廣場學生繼續「上」的，這可從你的文章《中國：面臨著改革》中看出。該文寫於已經絕食了「四 天四夜」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照你後來的說法，當時已與閻明復等「公開對話」了，閻明復還到廣場保證不「秋後算帳」，但你呼籲了廣場學生「見好就收」 嗎？完全沒有。恰恰相反，你在這時寫道，「難道我們可以責怪學生們太不知道『適可而止』嗎？不。學生們採用的手段實在是太和平了(不要忘記，五四時的學生 還曾放火燒了趙家樓)，他們提出的要求實在是太起碼了。」通篇文章，你高度讚揚學生的「勇敢精神」，稱「他們是長大的而不是嚇大的。他們有著我們這個過於 古老、過於災難深重的民族所最需要的東西－－勇氣。自由的秘訣只在於勇敢。」對於「過去，常常有人批評說，民間的民主運動給改革派『幫倒忙』」的論調你也 予以回應，與你後來的說法也正相反。你當時還對形勢作了非常樂觀的估計，認為「面對著方興未艾的民主浪潮，中共當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血腥鎮壓」，「事實 上，到目前為止，事態的變化也使人們對這種非暴力式的民主演變【以上第 264 頁】前 景抱有更樂觀的希望。決定性的步驟也許就取決於這幾天的事態之中。」「幾天之內，必有分曉。」因此，你在最後一段只有兩句話，呼應題目，再加一句強有力的 祈使句:「中國：面臨著改革。讓我們全力以赴。」全力以赴「收」嗎？不，當然是要全力以赴地「上」！這是五月十六日，正屬你後來批評廣場學生「激進」而錯 過了「見好就收」的「最佳時機」！這篇文章直到六四後你都讓它刊登在《中國之春》一九八九年七月號上，說明到這時你都尚未察覺，鼓動廣場學生「上」是否也 有「激進」的問題。直到九三年一月，該文還被收入《中國之春文選》(頁四七二–四七五)。

首先，即便是戒嚴之前， 你也並非主張「見好就收」，而是希望廣場學生繼續「上」的，這可從你的文章《中國：面臨著改革》中看出。該文寫於已經絕食了「四天四夜」的一九八九年五月 十六日，照你後來的說法，當時已與閻明復等「公開對話」了，閻明復還到廣場保證不「秋後算帳」，但你呼籲了廣場學生「見好就收」嗎？完全沒有。恰恰相反， 你在這時寫道，「難道我們可以責怪學生們太不知道『適可而止』嗎？不。學生們採用的手段實在是太和平了(不要忘記，五四時的學生還曾放火燒了趙家樓)，他 們提出的要求實在是太起碼了。」通篇文章，你高度讚揚學生的「勇敢精神」，稱「他們是長大的而不是嚇大的。他們有著我們這個過於古老、過於災難深重的民族 所最需要的東西—勇氣。自由的秘訣只在於勇敢。」對於「過去，常常有人批評說，民間的民主運動給改革派『幫倒忙』」的論調你也予以回應，與你後來的說法 也正相反。你當時還對形勢作了非常樂觀的估計，認為「面對著方興未艾的民主浪潮，中共當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血腥鎮壓」，「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事態的變 化也使人們對這種非暴力式的民主演變【以上第 264 頁】前景抱有更樂觀的希望。決定性的步驟也許就取決於這幾天的事態之中。」「幾天之內， 必有分曉。」因此，你在最後一段只有兩句話，呼應題目，再加一句強有力的祈使句：「中國：面臨著改革。讓我們全力以赴。」全力以赴「收」嗎？不，當然是要 全力以赴地「上」！這是五月十六日，正屬你後來批評廣場學生「激進」而錯過了「見好就收」的「最佳時機」！這篇文章直到六四後你都讓它刊登在《中國之春》 一九八九年七月號上，說明到這時你都尚未察覺，鼓動廣場學生「上」是否也有「激進」的問題。直到九三年一月，該文還被收入《中國之春文選》(頁四七二－四 七五)。

第二，戒嚴後你明確提出「見壞就上」。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或二十三？)日《世界日報》上，有你「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一文。你自己說，你在文中寫 道，「中共溫和派已經失勢，戒嚴令已經頒佈，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勢在必行(我當時就相信所謂戒嚴令一定會採取極為殘酷的方式實行，絕不僅僅是『清場』、『恢 復秩序』而已)。……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這是你在《八九民運反思》一文中「關於 『見壞就上』」一節中的記述(中國之春一九九零年五月，頁一五)。

其三，你甚至認為六四屠殺時也應當「見壞就上」。你說六四凌晨「如果有相當數量的人冒死堅守，或許真有可能死裡求生，轉敗為勝」；為此，你解釋道，「在 非暴力鬥爭中，如同在暴力鬥爭中一樣，當情況緊急，迫不得已，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則不能勝利，而且到頭來仍免不了犧牲，只是徒然地使犧牲失 去了它的最可貴的價值。我當然不是說血肉之軀可【以上第 265 頁】

以抵 擋得過坦克機槍。但是，倘若屠殺(所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然後，你又用了七百字來論證當時中共內部可能分 裂，因此最後的堅持有可能勝利。接下來你還用了整整一節，一千餘字，來論證戒嚴後不應當「打不贏就跑」，要人們「理解民運在高壓面前流血犧牲的偉大意 義」。(同上，頁一五－一七)

其三，你甚至認為六四屠 殺時也應當「見壞就上」。你說六四凌晨「如果有相當數量的人冒死堅守，或許真有可能死裡求生，轉敗為勝」；為此，你解釋道，「在非暴力鬥爭中，如同在暴力 鬥爭中一樣，當情況緊急，迫不得已，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則不能勝利，而且到頭來仍免不了犧牲，只是徒然地使犧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貴的價值。我 當然不是說血肉之軀可【以上第 265 頁】以抵擋得過坦克機槍。但是，倘若屠殺(所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 現劇變。」然後，你又用了七百字來論證當時中共內部可能分裂，因此最後的堅持有可能勝利。接下來你還用了整整一節，一千餘字，來論證戒嚴後不應當「打不贏 就跑」，要人們「理解民運在高壓面前流血犧牲的偉大意義」。(同上，頁一五－一七)

其四，你自己也承認，「八九民運興起時，我也祇是忙於吶喊助威、廣造聲勢」，戒嚴後「才匆匆寫下『見壞就上，見好就收－－對當前民運策略的緊急建議』」(同上，頁一四)。總之，按你自己的敘述，你在八九民運中公開的表現都是支持學生堅守廣場的，你所提出的策略，重點也是見戒嚴之「壞」要求學生趕快「上」 的。

其五，這一點也可從《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十年簡史》中得到印證。該 文載於民聯機關刊物上(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月；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六月－一九九四年六月)因此可視為民聯的正式記錄。八九民運期間，你任民聯主 席，但民聯的這一記錄中滿篇遊行支持、聲援、募捐……，沒有一條是呼籲廣場學生撤退的；你事後認為「見好就收」最佳時機的五月十八日，按記錄，你所主導的「紐約的民運組織」卻在忙於拜會僑領，「希望結合僑胞的力量，以募捐的實際

行動支援正在如火如荼迅速開展的大陸民主運動」；接下來還是各種遊行、聲援，五 月二十六日廣場指揮部呼籲外界的支持遊行「包圍天安門廣場民主陣地」，民聯還以首先響應為榮。直到六四屠殺，只見民聯支持學生，未見呼籲撤退，胡先生，作 為民聯主席，你的「穩健節制」在哪裡？

最後，第六，楊巍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其中曲折，以下分兩節詳述之。**【以上第 266 頁】**

四、楊巍的回憶說明你堅持「見壞就上」

胡先生，戒嚴後你同楊巍的幾次通話，他有一篇回憶文章記述了其大致內容，茲引如下：

五二二晚：在上海的楊巍「力主民聯出面呼籲北京學生與政府談判，在一定條件下撤回校園，以避免大規模流血。胡平問：『你認為軍隊真會開槍嗎？』我說：『戒嚴令允許軍隊採取一切手段，當然是包括了殺人手段，……一旦流血就是大流血，可能會死十幾萬人，而大流血後必是很大的倒春寒，絕對不利於民運。』胡平 不置可否，但亦不願和我爭論，我一廂情願地想胡平大概還是同意我的。」（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六、七月號，頁五六）

五二三晚：楊巍「向胡平報告說，『上海學生領袖已接受我的談判建議，業已派人進京。希望總部能速速呼籲北京同學與政府談判。』胡平未表示意見，只是讓我 把『談判建議』的四個條件以記錄速度重複說一遍。我當時認為這次民聯將以此為基礎，作談判呼籲了，心裡很高興。」（同上一九九三年八月，頁九一）

五二五夜：楊巍問，「『我好像沒有得到什麼支持（指民聯始終未發談判呼籲），是不是你們不同意我的想法？』胡平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說：『我認為應該見好 就收，見壞就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句後來變得很著名的話，聽這意思，他是說現在是應該『見壞就上』，我便著急地說：『只怕是**【以上第 267 頁】**越 上越壞啊！』到這時，我算是證實了我一直在懷疑的事：胡平等人根本不同意發談判呼籲……。我努力沉住氣問胡平，他對形勢怎麼看，胡平說有可能形勢會好轉， 鄧小平將拋出李鵬，讓李鵬下台，以平息局勢，我們有可能爭取這一前途。我說：『李鵬不可能下台，……』。我再次強調了流血的危險的嚴重性，希望胡平等能再 好好考慮一下，一小時後再回電。」（一九九三年九月，頁八八─八九）

五二五夜：楊巍問，「『我好像沒有得到什麼支持（指民聯始終未發談判呼籲），是不是你們不同意我的想法？』胡平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說：『我認為應該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 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句後來變得很著名的話，聽這

意思，他是說現在是應該『見壞就上』，我便着急地說：『只怕是【以上第 267 頁】越上越壞啊 ！』到這時，我算是證實了我一直在懷疑的事：胡平等人根本不同意發談判呼籲……。我努力沉住氣問胡平，他對形勢怎麼看，胡平說有可能形勢會好轉，鄧小平將 拋出李鵬，讓李鵬下台，以平息局勢，我們有可能爭取這一前途。我說：『李鵬不可能下台，……』。我再次強調了流血的危險的嚴重性，希望胡平等能再好好考慮 一下，一小時後再回電。」（一九九三年九月，頁八八－八九）

同夜，「一個多小時後胡平回電……我沒法跟胡平解釋那麼多，就是解釋我也沒信心說服他，他還是那不置可否的樣子，但顯然他的決心是無法改變的。……絕望 之中，我只好悲愴地說：『胡平，流血的危險依然嚴重存在，流血之後將是倒春寒。我只是一個普通的盟員，我能說的都已經說了。如果你們認為我的意見還有一點 可取之處的話，請你們打電話給我，否則我也不想再打電話了。』沒有什麼反應，我只好放下電話，對著窗外仰天長嘆。在我看來，這場運動已經輸定了。」（同 上）

胡先生，從你和楊巍的這幾次通話內容可以進一步判定，你在戒嚴後確實是力主「見壞就上」的。此前，五一九晚你似乎同意楊巍的建議，與你當時一貫主張 「上」的做法相左，也是我見到的唯一一例。上面已經引證，你在五一六晚還希望廣場學生繼續「上」，因此，需要向你求證，你是否曾轉變為主「撤」？始於何 時？五一九晚九點，你是否已經知道中共要戒嚴？因為這一「機密」在那天下午二點就已經傳到廣場上了，而你後來也一直說是在五一九宣佈的戒嚴（中國之春一九 九〇年五月，頁一五；北春一九九六年八月，頁四七）因而你也一直將五一九排除在「見好就收」的「最佳時機」之外。【以上第 268 頁】

五、楊巍的慨嘆說明你堅持「見壞就上」

將楊巍寄給我的原文與《中國之春》上的刊文對照，可以看出有刪節。楊巍原文題為「命中注定？」，刊載時這一悲情題目被改作「上海八九民運回憶」。該文共 四次連載，九三年六月至九月刊登了前三篇，最後一次在九四年一月刊出時，有重大刪節。而所刪部分，正好是他感嘆與批評你的「見壞就上」的地方。

比如，楊巍在「六四驚心」一節開頭描述了當他聽到屠殺時的心情：「雖然流血在預料中，但我還是極度震驚；在悲憤中，罵了胡平一些很情緒化的話。」此處的後半句被刪去。

又如，文章最後一段是：「八九民運的意義是偉大的，它的教訓也是深刻的，許多人都從中得到了自己的教訓。我想胡平在其中也有了不少教益吧，他已做了不少經驗總結的工作。……」此段被全部刪除。

楊巍文章被刪得最厲害的，是「我的報告」一節。他首先提到六四後一個月與一位歸國朋友的談話。他的朋友說：「留學生一般對胡平印象較好，認為胡平是書生，王炳章是政客。」楊巍接著寫道：

我那時正在生胡平的氣，便憤憤不平地說：「這真是中國的悲哀，民主的悲

哀。政治就是政客去搞的，『書生當政，害大於利』古有明訓。縱觀世界各民主國家， 哪家不是政客政治，哪有書生當家的。書生只能去當學者，執國政則禍國，當黨魁則誤黨，臨陣決疑更是一無可取，因為書生講原則，【以上第 269 頁】

政 客思勝負。書生不知利害，只認死理，抓住一個公式就自以為是真理，從此油鹽不進。王炳章不管怎樣，卻深知利害。如果他還能作主，能聯繫上，我自信有把握讓 他明白利害，選擇良策。這次學潮，如果幕前幕後的決策人中多幾個政客，何至於一敗塗地，血染長街。」請讀者和民運人士不要怪我說得情緒化，凡在六四中有過 撕心裂膽的痛苦的，都能理解我為什麼這樣耿耿於懷。

我那時正在生胡平的氣， 便憤憤不平地說：「這真是中國的悲哀，民主的悲哀。政治就是政客去搞的，『書生當政，害大於利』古有明訓。縱觀世界各民主國家，哪家不是政客政治，哪有書 生當家的。書生只能去當學者，執國政則禍國，當黨魁則誤黨，臨陣決疑更是一無可取，因為書生講原則，【以上第 269 頁】政客思勝負。書生不 知利害，只認死理，抓住一個公式就自以為是真理，從此油鹽不進。王炳章不管怎樣，卻深知利害。如果他還能作主，能聯繫上，我自信有把握讓他明白利害，選擇 良策。這次學潮，如果幕前幕後的決策人中多幾個政客，何至於一敗塗地，血染長街。」請讀者和民運人士不要怪我說得情緒化，凡在六四中有過撕心裂膽的痛苦 的，都能理解我為什麼這樣耿耿於懷。

總之，楊巍的這些感嘆既說明他對你力主「見壞就上」多麼不滿，也印證了你當時「上」的熱情是多麼高昂。正如你在《反思》中所述的，甚至到了六月二日，你 「得知了劉曉波等四人計劃接力絕食，感到振奮」，還為此舉「未挽回廣場上已出現的頹勢」而惋惜。六月三日，你又同你後來所批評的「強硬派」柴玲一致起來： 「到了最後階段，我認為她和其他堅決留在廣場上的人的作法是正確的。……如果有相當數量的人冒死堅守，或許真有可能死裡求生，轉敗為勝。」因為你以為趙紫 陽可能會反戈一擊(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一五)

楊巍的報告寫得很有見地，對他所接觸過的學運提出了反思，指出「學生方面，常常對形勢的嚴峻性估計不足，只進不退，勇而無謀，時驕時躁……」，並對運動 中迷信「五四模式」、民主素質低下等問題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可惜整個這一節都給刪去了。由於以上內容未能公開，徵得楊巍同意，在此引用。

現在小結一下。以上六點，足以證明你在八九民運期間鼓動學生堅守廣場、尤其是「見壞就上」是一不爭的事實。這六點依據，還祇是我從非常有限的幾篇文章中 看到的。據說你在八九民運期間發表了大量文章，基本上是鼓勵學生「上」

的。胡先生，你曾建議我好好讀一下你當時【以上第 270 頁】的文章，我曾寫信向你索取，因為巴黎的圖書館實在查不到，不知你為何沒有回音？關於楊巍的見證，還有一段故事，留在第四章再說。這裡先繼續考查你關於「見壞就上」的變化情況。

現在小結一下。以上六點， 足以證明你在八九民運期間鼓動學生堅守廣場、尤其是「見壞就上」是一不爭的事實。這六點依據，還祇是我從非常有限的幾篇文章中看到的。據說你在八九民運期 間發表了大量文章，基本上是鼓勵學生「上」的。胡先生，你曾建議我好好讀一下你當時【以上第 270 頁】的文章，我曾寫信向你索取，因為巴黎的圖書館實在查不到，不知你為何沒有回音？關於楊巍的見證，還有一段故事，留在第四章再說。這裡先繼續考查你關於「見壞就上」的變化情況。

六、一變：九〇年《反思》強調「見好就收」

胡先生，九〇年三月至十月你在《中國之春》上連載的八萬言《八九民運反思》中，你將「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策略倒了個個兒，改稱「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重點放在「見好就收」上。這是你第一次變化。下面舉四個例子。

第一，你說「在戒嚴令之前，民運未能見好就收；在戒嚴令之後，民運未能見壞就上。這可以說是八九民運的兩大失誤。但是，嚴格說來，我認為八九民運只有一 大失誤，那便是前一個失誤。因為，要求廣大民眾在巨大的危險面前長盛不衰，屹立不動，那顯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因而是一種脫離實際的過份要求。」（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一七）由此可見，六四屠殺幾個月之後，你已經從六四前力主「見壞就上」轉變為強調「見好就收」了。

第二，你後來一直將此論定為你《反思》的基調。比如九六年九月十一日給我的信中，你說：「我在《反思》中提出的主要觀點是，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必然，其主要失策是未能見好就收」。

第三，又如，你在回應阮銘先生的一篇文章中，首先重複了上述第一點的那段話，接著就【以上第 271 頁】說：「不難看出，我始終強調的是民運應該善於『見好就收』，因此它當然是『穩健節制』的。」（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四四）其中的偷換概念，我後面再作評述。

第三，又如，你在回應阮銘先生的一篇文章中，首先重複了上述第一點的那段話，

接著就【以上第 271 頁】說：「不難看出，我始終強調的是民運應該善於『見好就收』，因此它當然是『穩健節制』的。」(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四四)其中的偷換概念，我後面再作評述。

最後，第四，為了配合「見好就收」，你在《反思》中開始批評八九學生的「激進」，比如上面第一那段話便見於「兩種激進派」一節。這種批評在《反思》中比比皆是，此不多引。

奇怪的是，你九〇年以後的這種論調與你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的文章實在矛盾，也與你八九民運期間的整個言行相左，而在這篇以《反思》為題的文章中，卻完 全看不見你對自己言行的具體反省，也不解釋自己這麼大的轉變的原由，卻在在拿別人開刀，批這人「激進」，那人「強硬」，這怎麼能叫做「反思」呢？叫「八九 民運批判」不是更準確些嗎？又為何掩蓋自己在八九民運期間同樣乃至更甚的「激進」言行呢？

不過，九〇年你還沒有完全轉向，留了一條尾巴，就是「見壞就上」，雖然在《反思》中比「見好就收」篇幅小多了，卻還是予以討論，上面已經提到。這條尾巴一直留著，直到九五年。

七、二變之一：九五年附和媒體

九五年四月底，媒體開始聲勢浩大地批判八九學運中的激進傾向，你便熱切附和，激烈批評「激進派學生領袖」，指責他們沒有「見好就收」，而「見壞就上」這條尾巴，你卻小心翼翼地收藏起來。【以上第 272 頁】

首先看一看你的附和。《紐約時報》記者邰培德 Patrick Taylor 以為「柴玲控制的領導集團的秘密策略是：激怒政府以暴力對付赤手空拳的學生。」就我所知，廣場指揮部並沒有這樣的「秘密策略」。奇怪的是，你 竟去為該記者辯護，再添一句，「其實，那無非是指一種不便公開講出的想法或打算而已。」(《回首天安門》，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二)跟真的似的。 阮銘先生批評你在「為《紐約時報》圓謊」，指的是這個「秘密策略」和「激怒政府」為子虛烏有(《天安門》創刊號，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二一，二七)，你再為 之辯護，用的卻是偷換概念的手法，完全迴避討論是否真有這麼一個「秘密策略」(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四五)。

又如，《香港聯合報》記者薛曉光以「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為題報導影片《天安門》關於柴玲錄像談話的處理，你在文章中全文抄錄了報導的那兩段話，用大 量的筆墨去渲染，並稱「這兩段話，既無所謂『篡改』，也談不上『斷章取義』。」你更將柴玲說的「期待流血」解為「期盼」，說「畢竟，期待不同於等待。期待 兼有期盼、期望之意。」你甚至詮釋說，「柴玲認定同學們甘願為民主流血，因此讓他們流血就沒有什麼不道德」；「至於說『自己求生』，柴玲認為自己很重要， 不甘心就這樣給共產黨毀掉。」用了這樣的語言，還自稱「盡量以同情的角度，對柴玲的講話作出我以為講得通的解釋」(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

一–五 二)，怎不令我莫名驚詫！影片《天安門》在處理柴玲那兩段話時，極其細致地隱藏了一些關鍵背景。比如那兩句話是對兩位不同的記者說的，即便在原錄像帶中也 隔開有四十分鐘，刪去八千九百字而不露痕跡。「期待」應當詮釋為「等待」，因為柴玲在錄像的另一處明明說了同樣的話，用的是「等待【以上第 273 頁】流血」。有關詳情見拙文「獻身與求生的迷茫」及「柴玲沒有『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

又如，《香港聯合報》記 者薛曉光以「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為題報導影片《天安門》關於柴玲錄像談話的處理，你在文章中全文抄錄了報導的那兩段話，用大量的筆墨去渲染，並稱「這 兩段話，既無所謂『篡改』，也談不上『斷章取義』。」你更將柴玲說的「期待流血」解為「期盼」，說「畢竟，期待不同於等待。期待兼有期盼、期望之意。」你 甚至詮釋說，「柴玲認定同學們甘願為民主流血，因此讓他們流血就沒有什麼不道德」；「至於說『自己求生』，柴玲認為自己很重要，不甘心就這樣給共產黨毀 掉。」用了這樣的語言，還自稱「盡量以同情的角度，對柴玲的講話作出我以為講得通的解釋」(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
一–五 二)，怎不令我莫名驚詫！影片《天安門》在處理柴玲那兩段話時，極其細致地隱藏了一些關鍵背景。比如那兩句話是對兩位不同的記者說的，即便在原錄像帶中也隔開有四十分鐘，刪去八千 九百字而不露痕跡。「期待」應當詮釋為「等待」，因為柴玲在錄像的另一處明明說了同樣的話，用的是「等待【以上第 273 頁】流血」。有關詳情見拙文「獻身與求生的迷茫」及「柴玲沒有『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

再舉一個誤導公眾的例子，即「李鵬讓步論」。此論的根據是：李鵬已經在五月十八日與學生「公開對話」，甚至作了「電視直播」了。由此推論：政府已經讓步 了，學生還不「見好就收」，過於「激進」，造成大屠殺的後果，雙方都有責任。此論源於你的《反思》，其波及之廣，危害之深，許多人對於李鵬「公開對話」、 「電視直播」的虛構認定信以為真。一些人以此為據在媒體上推波助瀾，你在九五年也一直堅持這是中共讓步的重要表現。類似的，你說五一四對話是「公開進行」 的，也非事實。以上澄清的細節參見拙文《五一八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了嗎？》及《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

九五年批判激進，應該說是很有價值的，我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充分肯定了這一點(如《明報月刊》一九九七年七月，頁七一)。不過，是非歸是非，真假歸真假，我寫了許多文章，基本上不是討論是非問題，而是澄清一些真假判斷。

現在來看一看你試圖掩飾「見壞就上」的情況。

八、二變之二：九五年開初只提「見好就收」

在九五年四月底構陷柴玲的「新聞」爆發後，你馬上寫了大量文章呼應。在初期的文章中，以你五月初寫的《回首天安門》最具代表性。這篇文章五次提到「見好就收」，卻只字未提「見【以上第 274 頁】壞就上」。這五次很說明問題，茲引其所在的段落如下：

在九五年四月底構陷柴玲的「新聞」爆發後，你馬上寫了大量文章呼應。在初期的文章中，以你五月初寫的《回首天安門》最具代表性。這篇文章五次提到「見好就收」，卻只字未提「見【以上第 274 頁】壞就上」。這五次很說明問題，茲引其所在的段落如下：

(一)在四月三十日《紐約時報》的文章中，該報駐北京記者 Patrick Tyler 寫道：這場辯論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在那六周期間穩健節制是否曾向激進強硬讓步，以及比較激進的學生領袖是否因為不肯結束示威而破壞了學生們見 好就收而宣稱勝利的機會。」(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頁五〇)

(二)這是一個核心問題，但並不是一個現在才提出的新問題。……在九〇年三月－十月，我發表了一篇八萬餘字的長文《八九民運反思》(連載於《中國之春》雜 誌)。文章指出：八九民運的主要失敗是未能「見好就收」。激進派學生領袖過高估計了群眾承受風險的能力，或者更準確地說，過於低估計了中共當局的殘忍程 度，故而導致了運動的失敗結局。……也許我可以說，這種觀點早已成為民運界大多數人的共同結論。(同上)

(三)其實，在最近這些天，由《世界日報》和《紐約時報》的文章引發的熱烈討論，其焦點已經不在於 Tyler 所說的那個「核心問題」，即廣場上的激進派 是否壓倒了穩健派而破壞了運動見好就收的勝利機會。現在最熱門的話題是，少數激進派學生領袖在廣場上究竟做了些什麼？對他們的某些言行，以至於對他們的政 治品德，究竟該做出何種評價？(同上)

(四、五)李祿說：「我一再回 憶那些日子，思考我們是否應該在屠殺之前就離開天安門廣場。但是我覺得離開與否，後來的情況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怎麼會沒有兩樣呢？就算運動注定了會失 敗，會流血，那也有一個由誰－－是由民運人士、民運領袖，還是由一般參與者、由支持民運的普通老百姓【以上第 275 頁】－－ 來付代價的區別；而這對於維繫民運的道義感召力絕不是無足輕重的。

再者，你不能把撤與不撤之爭只限定在屠殺之前的時刻。因為在此之前出現過不止一次的有利 時機，使得民運能夠贏得見好就收的勝利，起碼是會使民運方面的損失大為減輕。除非你斷言八九民運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流血的結局。倘如此，民運豈不真的成 了給民主改革「幫倒忙」？……有關八九民運是否有過見好就收的機會，我在《反思》一文中作過詳細的分析，茲不贅述。我看不出李祿在作此表白時曾經認真考慮 過別人的論證。（同上，頁五四）

（四、五）李祿說：「我 一再回憶那些日子，思考我們是否應該在屠殺之前就離開天安門廣場。但是我覺得離開與否，後來的情況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怎麼會沒有兩樣呢？就算運動注定了 會失敗，會流血，那也有一個由誰—是由民運人士、民運領袖，還是由一般參與者、由支持民運的普通老百姓【以上第 275 頁】－－來付代價的 區別；而這對於維繫民運的道義感召力絕不是無足輕重的。

再者，你不能把撤與不撤之爭只限定在屠殺之前的時刻。因為在此之前出現過不止一次的有利時機，使得 民運能夠贏得見好就收的勝利，起碼是會使民運方面的損失大為減輕。除非你斷言八九民運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流血的結局。倘如此，民運豈不真的成了給民主改 革「幫倒忙」？……有關八九民運是否有過見好就收的機會，我在《反思》一文中作過詳細的分析，茲不贅述。我看不出李祿在作此表白時曾經認真考慮過別人的論 證。（同上，頁五四）

前面三段進一步可看出你與媒體相呼應的情況，此不再多言。最後一段，可與另一段互為補充：

四月三十日《紐約時報》的文章引用了激進派學生領袖李祿的話。他認為，「假如我們撤離廣場，將發生的事會非常簡單。政府仍會大肆搜捕、秘密殺人和迫 害。」這話是否正確，我以為要依撤離選定的時間而定。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刻，民運佔據上風；此時撤離意味著民運的勝利，並由此開啟朝野雙方良性互動的局面。 在另外一些時刻撤離，效果就不會如此美妙；而拖到運動末期，撤離確實會引出李祿所說的後果。但即便在那時，「撤」很可能猶勝於「不撤」，因為「壞」總比 「更壞」略好。有關這一問題，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細致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翻閱。（同上，頁五一）

以上引證都表明，在九五年批評「廣場後期激進派」的熱潮中，你實際上放棄了你一九八九年和九〇年關於戒嚴後應當「見壞就上」的主張，轉而支持「撤」了；與此相配合，你更將撤離的【以上第 276 頁】最佳時間模糊化，不再提須佈戒嚴這一「收」和「上」的分水嶺，而只提「運動末期」，試圖掩蓋《反思》一

文的真相。

以上引證都表明，在九五年批評「廣場後期激進派」的熱潮中，你實際上放棄了你一九八九年和九〇年關於戒嚴後應當「見壞就上」的主張，轉而支持「撤」了；與此相配合，你更將撤離的【以上第 276 頁】最佳時間模糊化，不再提頒佈戒嚴這一「收」和「上」的分水嶺，而只提「運動末期」，試圖掩蓋《反思》一文的真相。

九、二變之三：掩蓋曾經主張「見壞就上」

你對李祿的批駁，平心而論，說得不無道理。問題是這與你過去說的也太對不上號了：「學生們太不知道『適可而止』嗎？不。」、「學生們採用的手段實在是太 和平了」、「五四還燒了趙家樓」、「中共當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血腥鎮壓」，這不都是你在戒嚴前說的嗎？你不是還對民運給改革派「幫倒忙」一說予以駁正 嗎？「戒嚴令已經頒佈，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勢在必行……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這不是你 戒嚴後更加主張「上」所提供的理由嗎？李祿的傾向不正好同你一致嗎？何以責人甚嚴而不自責呢？

不僅沒有自責，而且混淆與偷換概念，以掩蓋自己曾經力主「見壞就上」。把李祿說的主要意思，即當時即便撤也免不了流血失敗，偷換為「由誰來承擔」這樣的 問題，你便迴避了自已也有同樣問題的尷尬，又能立於道德的高處去評判別人，以至於最後你竟能完全站到李祿的對立面，兩段末尾你都冒充說「我在《反思》一文 中有更細致的分析」，似乎你早就是主「撤」的「穩健派」了。這樣蒙混過關，是你的一貫手法，無論是九〇年的「反思」還是九五年別的文章。【以上第 277 頁】

掩蓋了「見壞就上」，再混淆「流血」的概念，這是更大的問題。同學們以為法不治眾，只能「槍打出頭鳥」，「四人幫」也不過對四五天安門廣場的民眾用棍棒，當時電視裡常見的南韓警察也只用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對中共殘暴性的估計普遍偏低，這確實是應當吸取教訓 的地方。子彈打到身上，許多人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傷亡的也是普通市民和學生，而非所謂「領袖」們。相反，你說早已預測到「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勢在必行」、「血流成河」、「絕不僅僅是『清場』」，大大超出了同學們的想像，可以說是八九民運期間少有的先知先覺。明知會殘酷鎮壓還要別人「見壞就上」，胡先生，你 說誰更應當反思？你「反思」別人「激進」，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 －－不，應當說是「一百步笑五十步」。笑完之後，為何又把那條「見壞就上」的尾巴小心翼 翼地藏起來呢？

十、三變之一：九五年被迫再提「見壞就上」

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阿二不曾偷。胡先生，你捉迷藏的遊戲很快就碰到了明眼人。九五年五月十九日，阮銘先生寫了「末日審判前的賭博」一文，提到你過去那 篇「見壞就上，見好就收」，指出你前後的矛盾。阮先生提到一些朋友評論你的八字方針的「好」與「壞」難以測定，「好比在拉斯維加斯賭博，贏多少才算好？至 於見壞就上，更是凶險莫測，非賭到傾家蕩產焉有止時？」阮先生接著寫道：【以上第 278 頁】

譬如胡平說他在五月二十一日文中就指出：「中共溫和派已經失勢，戒嚴令已經頒佈，大規模的殘酷鎮壓勢在必行。既然我們沒有能在此前形勢有利時收兵，那麼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

接著他又說：「在非暴力鬥爭中，如同在暴力鬥爭中一樣。當情況緊急，迫不得已，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非如此則不能勝利。而且到頭來仍免不了犧牲， 衹是徒然地使犧牲失去了它的最可貴的價值。我當然不是說血肉之軀可以抵的過坦克機槍。但是倘若屠殺一直拖延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 變。」

我於是想，假如是胡平而不是柴玲在天安門廣場，他將怎樣見壞就上，讓屠殺一直拖到天亮？政局又將出現怎樣的劇變？先不去說這場難以預測的賭博結局如何，我實在看不出這策略的「穩健節制」在哪裡？（《爭鳴》一九九五年六月）

六月三日，在北京之春編輯部開的討論會上，我也據此向你質疑：

－－如果「見壞就上」的話，那麼戒嚴以後也就要上啊。

－－那個你可以細細地看一看，對不對？

細細地看甚麼呢？數次追問，你皆閃爍其辭。你的《反思》我當然「細細地看」了，當中明明白白不是說「戒嚴後應當見壞就上」嗎？在阮銘先生和我的追問下， 你才被迫回到原點，重提「見壞就上」，卻強調說「嚴格說來我們只犯了這一個錯誤，沒有見好就收。」（北京之春一【以上第 279 頁】九九五年七月，頁九〇）六三會議上有二十幾人，沒法細致討論，你又用老辦法說你以前的文章裡面已經寫得很清楚云云。你後來的文章對我作回應，對此也一筆帶過，說是與阮銘一樣，將你「歸入激進派，顯然是誤解」。因此，先來看看你對阮銘質疑的回應。

細細地看甚麼呢？數次追 問，你皆閃爍其辭。你的《反思》我當然「細細地看」了，當中明明白白不是說「戒嚴後應當見壞就上」嗎？在阮銘先生和我的追問下，你才被迫回到原點，重提 「見壞就上」，卻強調說「嚴格說來我們只犯了這一個錯誤，沒有見好就收。」（北京之春一【以上第 279 頁】九九五年七月，頁九〇）六三會議上有二十幾人，沒法細致討論，你又用老辦法說你以前的文章裡

面已經寫得很清楚云云。你後來的文章對我作回應，對此也一筆帶過，說是與阮銘一樣，將你「歸入激進派，顯然是誤解」。因此，先來看看你對阮銘質疑的回應。

十一、三變之二：賴帳不認「見壞就上」

你對阮先生的回應，是典型的賴帳。你這樣「澄清」道：

阮銘還引用了我《反思》中的一段話。其中講到犧牲的意義，講到「倘若屠殺一直拖延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劇變。」阮銘大概是想暗示讀者 我其實是更大的激進派，是不惜流血換取勝利的更熱烈的倡導者。然而在實際上，我這段話並不是出自五月二十一日那篇文章。它並不是我的主張，並不是我的結 論，而只是我對別人提出的一種可能性作出的理論分析。（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四五）

青天白日、黑紙白字的抵賴莫過於此。事實正相反，「見壞就上」恰恰就是你的主張，就是你的結論，絕不止是你對別人理論的分析，這清清楚楚寫在你的《反思》中。對於六四後海外一些人認為「八九民運的失誤不在於沒有『見好就收』，而在於沒有『見壞就上』」，你說：

其實，這種批評我早在去年五月二十一日寫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一文中就提出過。在這【以上第 280 頁】篇文章中，我指出：中共溫和派已經失勢……。（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一五）

其實，這種批評我早在去年五月二十一日寫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一文中就提出過。在這【以上第 280 頁】篇文章中，我指出：中共溫和派已經失勢……。（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一五）

接下來就是阮銘引用的那兩段話，你明明白白引述了五二一那篇文章中試圖證明「見壞就上」必要性的論點，怎麼可以說不是你自己的主張呢？此其一。

其二，你賴帳的手法也實在高超。你說，「倘若屠殺一直拖延……」那段話「並不是出自五月二十一日那篇文章」。這話一點也不會錯，對六四凌晨的評議怎麼會 在五二一就作出了呢？你的反駁似乎很站得住腳。但是，胡先生，你把讀者當傻瓜了。否則，是阮銘先生說傻話？當然不是。阮銘引你《反思》中的話可不只一段， 我們在前面看得很清楚，他是明確將你五二一文章與後面的話分作兩段來引用的，兩段引用之前的說明也有分別，一是「譬如胡平說他在五月二十一日文中就指 出」，是間接引你《反思》中的引語，一是「接著他又說」，是直接引你的「反思」，可見阮先生的嚴謹。而你的反駁卻故意混淆，將直接引用你九〇年《反思》中 的話與間接引你一九八九年的話混為一談，用心何其良苦！

由此可見，胡先生真是偷樑換柱的高手。

十二、三變之三：偷梁換柱、蒙混過關

偷樑換柱、蒙混過關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你又說：【以上第 281 頁】

阮銘提到我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策略，不過他並沒有正面評論過這一策略。他只是說對於「好」或「壞」的判定，對「上」或「收」的時機把握都是很難測定的。這一點我在《反思》第四章第十三節已經作出細致的分析，建議阮銘再讀一讀。（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四四）

《反思》真的分析清楚了嗎？其中不也是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只好憑藉「經驗和直覺」嗎？上一章已論證了你自己多次判定「好」時就自相矛盾、忽東忽 西。而你說阮先生沒有「正面評論」你的策略，難道說「難以測定」、「見壞就上」太冒險等等，就不算評論嗎？也許你是想說那只能算「負面評論」因而不算數 吧。

接下來，你對《反思》的論述作了改頭換面的新詮釋。你說先見壞就 上才能再見好就收；如果沒能見好就收，「理論上較好的辦法就是：再上一次或幾次，贏回部分主動，然後再撤退。」這番新詮釋也許不失為一種可取的策略，可視 為你在《反思》基礎上的修正與發展，很值得深入下去。奇怪的是，你接著又說：

我提到「凱旋在子夜」的計劃，提到八六－－八七年學運，北大學生深夜進軍天安門救回被捕同學一事，它們都不失為在困境中求得--種相對較好或曰相對不太壞的結局的辦法。因此那和我在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觀點並不矛盾。（同上，頁四五）

又是公然賴帳！《反思》中的「凱旋在子夜」，不是被當作一個反面例證來用的嗎？「搞一個『凱旋在子夜』固然能爭得幾分主動，但終究不能改變整體上的被動。」胡先生，這不是你【以上第 282 頁】說 的嗎？而八六—八七年學運怎麼就成了「相對較好的辦法」了呢？你不是說「總體來講，它還是失敗了」嗎？（《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一六）這不是你 在「關於『打不贏就跑』」那一節中用來論證「很難避免別人產生『敬酒不吃吃罰酒』、『勸是勸不動的，一嚇就嚇回去了』這種印象」的嗎？這些說法怎麼就與你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觀點並不矛盾」呢？

又是公然賴帳！《反思》中的「凱旋在子夜」，不是被當作一個反面例證來用的嗎？「搞一個『凱旋在子夜』固然能爭得幾分主動，但終究不能改變整體上的被動。」胡先生，這不是你【以上第 282 頁】說 的嗎？而八六－－八七年學運怎麼就成了「相對較好的辦法」了呢？你不是說「總體來講，它還是失敗了」嗎？（《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一六）這不是你 在「關於『打不贏就跑』」那一節中用來論證「很難避免別人產生『敬酒不吃吃罰酒』、『勸是勸不動的，一嚇

就嚇回去了』這種印象」的嗎？這些說法怎麼就與你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觀點並不矛盾」呢？

可見，你是多麼善於在不經意間，扭轉你過去的說法，重作詮釋，還給人以「早就如此」的英明形象。不是嗎？你就在這一段裡誇獎起自己來：「不難看出，我始終強調的是民運應該善於『見好就收』，因此它當然是『穩健節制』的。」……原來如此。

十三、三變之四：以攻為守，倒打一耙

賴帳之後，胡先生，你又倒打一耙，似乎自己一貫正確。請看你接下來對白夢的批判：

在《天安門審判》中白夢寫道：「我以為，我們不能因為最後的屠殺去認定堅守廣場在策略上就一定是錯誤的。如果當時真的堅持到了人大常委會的召開，或者軍 隊中的某一將領為了順乎民意而反戈一擊，八九民運中的一些現實目標不就達成了嗎？要知道，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很有可能發生的。」這個觀點是白夢所有觀點中最 有份量的一個觀點，也是最能表露他激進特色的一個觀點。如前所言，我可以承認這種可能性的確是存在的，但我仍然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可取的，因為它太過冒險。 除非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否則，誰會認為把全部身家性命去作一次成功率不高的投資是明智的呢？……(同【以上第 283 頁】上，頁四五)

在《天安門審判》中白夢 寫道：「我以為，我們不能因為最後的屠殺去認定堅守廣場在策略上就一定是錯誤的。如果當時真的堅持到了人大常委會的召開，或者軍隊中的某一將領為了順乎民 意而反戈一擊，八九民運中的一些現實目標不就達成了嗎？要知道，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很有可能發生的。」這個觀點是白夢所有觀點中最有份量的一個觀點，也是最 能表露他激進特色的一個觀點。如前所言，我可以承認這種可能性的確是存在的，但我仍然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可取的，因為它太過冒險。除非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否則，誰會認為把全部身家性命去作一次成功率不高的投資是明智的呢？……(同【以上第 283 頁】上，頁四五)

噫，胡先生，白夢「最有份量的觀點」不正好與你的《反思》不謀而合嗎？怎麼又「不可取」、「太過冒險」了呢？何況白夢說的還不是「最後階段」，更沒

有像 你那樣「當時就估計到是血流成河的殘酷方式」，如果這就表露了白夢的「激進特色」，你不就更激進了嗎？至少不能自吹「穩健節制」了吧？

這樣倒打一耙的手法，在你九五年的文章中比比皆是，你對李祿的某些批評，也正好可以用到你自己身上，而我們卻完全看不見你有何自省。篇幅有限，茲不多印 證。忘了誰說的，「謊言可能欺騙所有人一段時間，也可能永遠欺騙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胡先生，讓我們引以為戒。

十四、本章結語

總之，胡先生，本章證明：戒嚴後你極力主張「見壞就上」，之前也並未提出「見好就收」；六四屠殺之後，你卻將「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次序倒轉過來，開 始強調「見好就收」，批判激進；九五年媒體構陷柴玲時，你更附擁而上，連篇累牘批判激進，同時卻極力掩蓋自己曾經鼓動「見壞就上」，甚至不惜公然抵賴。

現在回到我們爭論的原點。「見壞就上、見好就收」是否能夠作為民主運動的一個基本策【以上第 284 頁】略，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從這兩章的分析可知，你有關「見好就收」的論述，不僅論據嚴重違背史實，論證也概念不清、前後矛盾，不知應該如何操作；而在如何「見壞就上」這一方面，你自己更是隨風向而變，以今日之是否定昨日之是，令人無所適從，因此更難以確定其可操作性。

現在回到我們爭論的原點。「見壞就上、見好就收」是否能夠作為民主運動的一個基本策【以上第 284 頁】略，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從這兩章的分析可知，你有關「見好就收」的論述，不僅論據嚴重違背史實，論證也概念不清、前後矛盾，不知應該如何操作；而在如何「見壞就上」這一方面，你自己更是隨風向而變，以今日之是否定昨日之是，令人無所適從，因此更難以確定其可操作性。

因此，二章總的結論是，對於「見壞就上、見好就收」這一配套策略，你的證明不充分，不具可操作性。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於巴黎，一九九七年九月二稿於巴黎，一九九八年二月刪改與修訂。作者按：本文曾投給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結果既未發表，也不說明理由。）【以上第 285 頁】

見好沒法收，怎麼辦？ －－答胡平公開信之三

胡先生：

上二封公開信完成了總體架構四章中的前二章，本文是第三章。前兩章重點在「破」，即證明：「好」、「壞」難以測量，因而「見好就收，見壞就上」也難以操 作，你自己就常常自相矛盾，尤其是在戒嚴後主張「見壞就上」，幾年後卻批判別人激進，沒有「見好就收」；本章重點在「立」，即論證一點：民主機制不健全， 才是民運組織的根本問題，一九八九年不能收放自如，教訓主要在此。

你《反思》中的「見好就收」論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只是太表面，把問題太簡化，因為當時並非沒有「收」的打算和嘗試，而是收不下來；尤其是「見好就收」若 是與「見壞就上」作為配套策略，還可能壞事。其實，我很贊同你的一個論點，即「光有見好就收的原則是不夠的，還必需在當時就能夠準確地測量到什麼是好」； 如果民眾達不到「足夠的共識」，那就需要「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可惜你未能展開論述。【以上第 286 頁】
在這一思路的基礎上，本文首先探討「為何八九民運沒能做到見好就收」，然後從組織結構上討論一下如何才能收放自如，這對未來民運，也許有所借鑒。

一、撤出廣場的呼聲

廣場上並非沒有「見好就收」的打算和嘗試，這是首先要說明的。這有兩方面，正式的表決和一般的勸撤。首先列舉表決撤離的情況：

五一四晚：幾十所高校自治會負責人表決撤離，吾爾開希喊東移；
五二一下午：北高聯四十多北京高校代表三十二票贊成撤離；
五二二凌晨：吾爾開希喊撤，之前曾得到高聯常委的支持；
五二二：王超華統計到二百多個學校同意撤退的名單；
五二六傍晚：楊濤到廣場指揮部商定「空校運動」計劃；
五二七晨：高聯常委會決定在五二八「全球華人大遊行」後光榮撤退；
五二七下午：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建議五月三十日撤離；
五二八凌晨：廣場指揮部五常委四：一希望撤；
六四凌晨五點：留在廣場紀念碑上的人員全體口頭表決，通過撤離。【以上第 287 頁】

除了最後在士兵的刺刀下撤出之外，前面的努力皆不奏效。以上雖只能算一個不完全統計，也許還不完全準確，卻是我幾年來收集的結果，詳情見拙文《絕食後的表決與廣場撤留之爭》。

另一方面，還有許多知名人士的勸撤。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有一些記載，比如絕食初期的十二學者尤其是戴晴、李澤厚，五一九薊門會議上的陳明遠、五二二 北高聯籌備會上的蘇紹智、嚴家其、高瑜等人，以及五二九的何維凌，當然還有政府開明派如閻明復等人，都是明確希望同學們撤離廣場的，雖然其中有的也不是一 貫這麼主張，而且常常帶有對政府的批評和對學運的同情。另有資料顯示，清華、人大等校撤出廣場的時間比較早，北大籌委會也一直主張撤。

二、撤出廣場的可能

撤出廣場不是沒人努力，那麼，有沒有可能呢？這就得進一步解決一個問題，即廣場上是不是真的只有群眾沒有領導，換句話說：學運組織是不是真的一點都不能 左右局勢？我認為不是這樣。五一九復食最能顯示指揮部的作用。五一九傍晚召集學生代表大會之前，指揮部已經知道即將戒嚴，但沒向代表們透露，張伯笠在巴黎 會議上反覆強調這一點。復食是在指揮部的影響下由代表大會通過的，但無論王超華、辛苦還是剛從醫院回來的我，都發現廣場上反對復食的同學很多，李祿與柴玲 也說當時指揮車都差點兒被推倒。我主持了第二次表決，結果是百分之八十堅持絕食，但已無濟於事。(《回顧與反思》頁二〇四－二〇六)可見指揮部對局勢不是 完全沒有控【以上第 288 頁】制力。

撤出廣場不是沒人努力， 那麼，有沒有可能呢？這就得進一步解決一個問題，即廣場上是不是真的只有群眾沒有領導，換句話說：學運組織是不是真的一點都不能左右局勢？我認為不是這 樣。五一九復食最能顯示指揮部的作用。五一九傍晚召集學生代表大會之前，指揮部已經知道即將戒嚴，但沒向代表們透露，張伯笠在巴黎會議上反覆強調這一點。 復食是在指揮部的影響下由代表大會通過的，但無論王超華、辛苦還是剛從醫院回來的我，都發現廣場上反對復食的同學很多，李祿與柴玲也說當時指揮車都差點兒 被推倒。我主持了第二次表決，結果是百分之八十堅持絕食，但已無濟於事。(《回顧與反思》頁二〇四－二〇六)可見指揮部對局勢不是完全沒有控【以上第 288 頁】制力。

現在再看一看最可能撤離的時機。你的《反思》認為最佳時機是在戒嚴前的五一六至五一八，但近幾年你也不怎麼提了。實際上從廣場上的情緒來看，要在戒嚴前 或剛戒嚴時撤，難度很大；但是戒嚴一週後，這種可能性就不能說不存在了。特別是五二七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商定的五三零撤離的建議，應該是最好的一次機會。 其實，五二七聯席會議上既有知識分子(包遵信、王軍濤、陳子明等人)，也有北高聯(邵江、梁二)和指揮部(柴玲與我)，總共號稱十個組織，而三十號撤是會 上的共識，怎麼就沒法施行呢？

關鍵卡在廣場上的「營地聯席會議」。當時北京學生多已撤回，最大阻力來自於外地同學。他們到北京就是支持學運來的，一兩天也摸不清形勢，自然要堅守廣 場。有的在赴京之前已是當地學運骨幹，無功而歸不僅沒面子，還可能受打壓。另外，廣場上有吃有住，撤了反而無處可去。而呆了幾天真覺得該撤的，許多就自動 離開了北京。幾個因素一綜合，留在廣場上的自然多是堅守派。由這麼一個群體的代表組成的「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當然作不出撤離的決議。再加上其「代表」的流 動性很大，其代表性就大打折扣。李祿以此「民主程序」抗

衡首聯的撤離建議，我和柴玲都沒看出問題，連王軍濤也被說服，首都聯席會議第二天就把建議改回「堅 持到六月二十日」。(《回顧與反思》頁二三八－二三九)有人認為李祿之所以一直反對撤，也和外地同學的心態一樣，因為撤了沒地方可去，更會失去在運動中的 地位，這可能是他與北京學運骨幹最大的不同。沒充分意識到廣場上的成分變化所帶來的問題，這也是我很大的失誤。【以上第289 頁】

現在回過頭來想，如果「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的局限性在當時就被普遍意識到，再依靠幾大組織的通力合作，首聯 作為北京各界的權威機構，北高聯作為北京高校的權威機構，並從個院校調集各校代表到廣場上，與指揮部攜手召集代表大會，通過撤離的決議，同時從各校調集大 批糾察隊，外地同學在組織鬆散的情況下是可能跟著北京同學撤回各校的。這時再採用北大籌委會的「空校」方案，學生各回原籍，將北京的運動分散到全國，在北 京唱個空城計，戒嚴也就失去意義，而回到老家的同學每個星期天中午在各大城市聚會，保持組織的存在和對政府的壓力，運動也許可能取得進一步的成果。

可惜，這一理想狀態的假設太多，當時都難以達到。

三、一面倒的支持

為何這些假設當時達不到？為何見好沒法收？這有外因也有內因。外因有二：各界一面倒的支持和政治派別的介入。內因也有二：主撤派的無力與運動組織的民主機制不健全。以下分四節來逐條分析。

先看一面倒的支持。這也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隨便翻一翻當時的報章，翻一翻《八九民運史》，甚至中共出版的記載，都不難看出，毋庸贅述。我個人接觸到 的有影響力的勸撤微乎其微，在廣場上聽到的幾乎都是一面倒的支持，尤其在戒嚴前和戒嚴初期。六四之後，一些人見【以上第 290 頁】流 了血，調子馬上壓低，講起「理性」來。有的甚至轉過來「反思」別人的激進，偏偏忘了自己當年的言行。胡先生，這當中你算一個典型，上封公開信有詳細分析。 簡而言之，你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就撰文，說不該責怪學生們不知「適可而止」:「五四還燒了趙家樓」。戒嚴後，你更提出「見壞就上」，五二五楊巍與你通 電話時就急了，對著話筒直喊：「只怕是越上越壞啊！」六月二日你「得知了劉曉波等四人計劃接力絕食，感到振奮」；後來甚至認為六四凌晨同學們都不該撤出廣 場，「如果有相當數量的人冒死堅守，或許真有可能死裡求生，轉敗為勝。」但是，六四不到一年，你《反思》的調子就變了，九五年柴玲受到媒體構陷時，

批判文 章數你最多。阮銘先生和我都質疑：你自己當年「見壞就上」算甚麼呢？答曰：那不過是對別人理論的分析！以上的引用都取自楊巍和你自己的文章。

先看一面倒的支持。這也 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隨便翻一翻當時的報章，翻一翻《八九民運史》，甚至中共出版的記載，都不難看出，毋庸贅述。我個人接觸到的有影響力的勸撤微乎其 微，在廣場上聽到的幾乎都是一面倒的支持，尤其在戒嚴前和戒嚴初期。六四之後，一些人見【以上第 290 頁】流了血，調子馬上壓低，講起「理 性」來。有的甚至轉過來「反思」別人的激進，偏偏忘了自己當年的言行。胡先生，這當中你算一個典型，上封公開信有詳細分析。簡而言之，你在一九八九年五月 十六日就撰文，說不該責怪學生們不知「適可而止」：「五四還燒了趙家樓」。戒嚴後，你更提出「見壞就上」，五二五楊巍與你通電話時就急了，對著話筒直喊： 「只怕是越上越壞啊！」六月二日你「得知了劉曉波等四人計劃接力絕食，感到振奮」；後來甚至認為六四凌晨同學們都不該撤出廣場，「如果有相當數量的人冒死 堅守，或許真有可能死裡求生，轉敗為勝。」但是，六四不到一年，你《反思》的調子就變了，九五年柴玲受到媒體構陷時，批判文章數你最多。阮銘先生和我都質 疑：你自己當年「見壞就上」算甚麼呢？答曰：那不過是對別人理論的分析！以上的引用都取自楊巍和你自己的文章。

劉曉波與吾爾開希也有類似的轉變。劉曉波現在在國內坐牢，我不多說；開希我真懶得細說。我較詳細舉你的例子，是為了說明當時輿論一邊倒的情形，遠遠不是 後來許多人為自己洗刷的那樣有那麼多人勸撤。如果有，最多也不過私下動動心眼動動嘴唇。動動心眼誰不會，拿到決策會議上的有幾個？又有幾人打標語或到廣播 站說應該撤的呢？有，可惜太少，完全淹沒在激情的海洋之中，即所謂「廣場效應」。

四、政治派別的介入

【以上第 291 頁】

除了普通民眾、新聞界、知識界的大力聲援以外，各種政治勢力也介入了學運。部分學運骨幹也準備與黨內政治勢 力結合，吾爾開希五月底就公開這麼說；柴玲也用了「打倒李鵬偽政府」之類的詞語，實際上已經偏離了學運「不介入黨派之爭」的原則。這個原則是否正確、又在 多大程度上得到了遵守，都是值得討論的課題。

影響學運的政治勢力主要 有四方面。一是體制外，介入最深的是陳子明、王軍濤為核心的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及其周圍朋友，最明顯的表現是創立「首都

各界聯席會議」，差點兒成為運動後 期的最高機構。二是體制內，趙紫陽手下的一班人為核心的某些行動，最突出的是陳一諮等人三所一會發的「六點聲明」，陳小雅稱之為「集體自殺」式的壯舉；以 及嚴家其等人發的反鄧宣言，鮑彤也有一些行動，但具體情況尚不清楚。三是鄧樸方殘聯周圍的努力。吾爾開希五二二喊撤與他們有關；鄧樸方的同學和好友何維凌 可能暗中也起重要作用，五二九他透過包遵信找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自稱能代表鄧小平和楊尚昆，結果當晚就被捕了。

最後，第四，學運的對立面，即以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等人為前鋒的中共強硬派，許多人早已洞察到，這其實是真正左右了學運的政治力量。他們不斷刺激學 生，從四二六社論到四二九假對話，從五一四違背承諾不實況轉播對話到五一八見面會時威脅王丹等人要對動亂負責，從不顧絕食同學的生命安危到公然違背法律程 序宣佈戒嚴……一環扣一環，每當學運稍微平靜一些的時候便加強刺激。更有甚者，強硬派還直接派人介入了學運，張伯笠和李祿的回憶都提到中辦、國辦甚至戒嚴 部隊的代表與指揮部的幾次秘密接觸，作種種暗示與威脅；他們還暗示收買了廣場【以上第 292 頁】上的一些外地同學，條件是宣佈撤退。

最後，第四，學運的對立 面，即以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等人為前鋒的中共強硬派，許多人早已洞察到，這其實是真正左右了學運的政治力量。他們不斷刺激學生，從四二六社論到四二九假 對話，從五一四違背承諾不實況轉播對話到五一八見面會時威脅王丹等人要對動亂負責，從不顧絕食同學的生命安危到公然違背法律程序宣佈戒嚴……一環扣一環， 每當學運稍微平靜一些的時候便加強刺激。更有甚者，強硬派還直接派人介入了學運，張伯笠和李祿的回憶都提到中辦、國辦甚至戒嚴部隊的代表與指揮部的幾次秘 密接觸，作種種暗示與威脅；他們還暗示收買了廣場【以上第 292 頁】上的一些外地同學，條件是宣佈撤退。

由此可見，黨內鬥爭的兩派也各有明暗兩面。明的都是勸撤，只是一個溫和一個強硬；暗的在指揮部聽來，鄧李楊強硬派比趙系人馬和體制外民主派更希望撤，甚 至不惜威逼利誘也要學生們撤出廣場。這種解讀是否準確有待討論，但確是當時指揮部的反應。這樣一來，不撤又加了一條理由。

五、激昂中的婉約

撤不下來的第三個原因是主撤派的無力。雖然有第一節所顯示的撤離表

決，但堅守廣場的表決卻要多得多。粗略數一數拙文《絕食後的表決與廣場撤留之爭》中堅守廣場的表決，不撤的至少比主撤的多一倍，許多還在廣場上同時出現，或是先表決撤離隨即又被否決。

這些眾所周知的情況可被大量材料所證實，毋庸贅述。八九民運中的主流是激越高昂的，但其中並非沒有溫和妥協的聲音，可惜完全被淹沒了。就我個人的瞭解， 這些婉約的聲音可以說前後還比較一貫的，有王超華、戴晴和楊濤。當然還有其他人，但這三位曾對學運有較大直接影響，又是我稍微知情的。從他們的行為，正好 可以看出激越中的婉約聲是如何被淹沒的。

王超華在八九學運骨幹中可能是最穩健而實幹的一個。她當時是社科院的研究生，學生當中她年齡也最大，有文革、上山下鄉和機關工作等社會經驗，又熱情、實幹、具有獻身精神，自【以上第 293 頁】然 受到同學們的擁戴。四二五進北高聯，三天後成為常委，五月後還任副主席，一直是高聯的核心人物。超華本來反對發起絕食，與柴玲有過激烈爭執，絕食後又反對 發起絕食的吾爾開希和王丹再代表高聯。她覺得趙紫陽的五四講話比較溫和，學運也應該溫和地回應，不宜再發起大規模抗議活動。這一觀點在絕食前兩天已經成為 高聯的決議，但是等不及或不相信趙紫陽的同學還是以悲天憫人的激情斷然絕食，以促對話。

王超華在八九學運骨幹中可能是最穩健而實幹的一個。她當時是社科院的研究生，學生當中她年齡也最大，有文革、上山下鄉和機關工作等社會經驗，又熱情、實幹、具有獻身精神，自【以上第 293 頁】然 受到同學們的擁戴。四二五進北高聯，三天後成為常委，五月後還任副主席，一直是高聯的核心人物。超華本來反對發起絕食，與柴玲有過激烈爭執，絕食後又反對 發起絕食的吾爾開希和王丹再代表高聯。她覺得趙紫陽的五四講話比較溫和，學運也應該溫和地回應，不宜再發起大規模抗議活動。這一觀點在絕食前兩天已經成為 高聯的決議，但是等不及或不相信趙紫陽的同學還是以悲天憫人的激情斷然絕食，以促對話。

絕食後，超華更成為高聯在廣場上的核心，她時常見機行事，召集北京各校代表會，希望撤離廣場。戒嚴前後，這樣的代表會好幾次都已決定撤離，結果廣場同學 還是不答應。尤其是戒嚴後外地同學過半，更不願聽北京同學的決定。這是超華的大體情形，其中也不乏變化，比如又常常在廣播中宣佈「高聯支持堅持廣場」，照 她後來的解釋，其「目的就是讓大家跟高聯認同」。這種變化成為她的致命弱點，連溫和的王有才都說，「怎麼你這個反對絕食的整天泡在廣場？」更何況本來就與 超華有爭執的柴玲了。當時有位社科院的同學就在指揮部說超華是特務，我們雖然不信，但對超華確實有抵觸情緒。這種情緒加在策略分歧之中，高聯與指揮部便越 來越勢不兩立，結果超華的努力也被消磨殆盡。

超華不固執己見，尊重民主程序，哪怕導致自己的不一致也服從大多數的意見，這也是她受到尊敬的原因。五一四晚十二學者來廣場勸撤本來是她請的，之後同學 們不答應，她便代表高聯在廣播中宣佈「北高聯、對話團和絕食團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堅持到最後勝利！」五一九指揮部組織代表會通過復 食，超華發現許多同學還在堅持絕食，於是又在廣【以上第 294 頁】播站 呼籲「大家一定要堅守……目的還沒達到，我們不能撤。」五二二凌晨開希喊撤，全場嘩然，超華也在廣播中馬上宣佈「高聯常委沒作出這樣的決議」。這些情況或 採自廣場錄音，或見《回顧與反思》頁二〇五與頁二六七她的回憶。超華當然不是「激進派」，恰恰相反，這些細節證明所謂「不撤＝激進，撤＝穩健」的邏輯是多 麼的簡化與不實。

超華不固執己見，尊重民 主程序，哪怕導致自己的不一致也服從大多數的意見，這也是她受到尊敬的原因。五一四晚十二學者來廣場勸撤本來是她請的，之後同學們不答應，她便代表高聯在 廣播中宣佈「北高聯、對話團和絕食團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堅持到最後勝利！」五一九指揮部組織代表會通過復食，超華發現許多同學還在 堅持絕食，於是又在廣【以上第 294 頁】播站呼籲「大家一定要堅守……目的還沒達到，我們不能撤。」五二二凌晨開希喊撤，全場嘩然，超華也 在廣播中馬上宣佈「高聯常委沒作出這樣的決議」。這些情況或採自廣場錄音，或見《回顧與反思》頁二〇五與頁二六七她的回憶。超華當然不是「激進派」，恰恰 相反，這些細節證明所謂「不撤＝激進，撤＝穩健」的邏輯是多麼的簡化與不實。

類似的戲劇性變化也發生在楊濤身上。楊濤是另一個實際作用很大而外界不甚瞭解的同學。他與王丹是同班同宿舍的同學，學運前就在一起辦「民主沙龍」，也同 是北大籌委會第一批委員，五月以後還是籌委會主席，五二六來廣場找指揮部時更是北高聯主席。那天他向柴玲和我等指揮部成員正式提出「空校」方案，我還補充 了撤後定期在各大城市集會的技術細節，詳情見《廣場備忘錄》一章。就在第二天，柴玲還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提出「空校」，這在批評柴玲的劉曉波的回憶中都 有提到。五二八中午柴玲在做那個後來闖大禍的錄像談話時，已準備親自南下；晚上廣場學生聯席會議上，她辭職時又提了一次「空校」。為什麼說楊濤戲劇性呢？ 正是在這晚的會上，本來提「空校運動」的楊濤反而被廣場同學的熱情所感動，決心留在廣場，並馬上被大家推舉為「整頓廣場總指揮」。可見到了廣場，那點溫和 婉約的聲音是多麼微弱，多麼容易被淹沒，而後來把

柴玲作替罪羊送上承擔流血責任的祭壇又是多麼荒謬。

至於戴晴，也許只有她堅持勸撤的立場始終如一。她面對面勸廣場學生撤大概就五一四晚那一次，可惜她提出的條件在當時的氛圍中實在顯得荒唐：只要李鵬或趙 紫陽來廣場說聲「同學們好」，大家便撤。戴晴說到這裡，全場先愣了一下，接著就有許多人喊「不好！」。這樣輕巧，【以上第 295 頁】同 學們當然不答應。絕食剛宣了誓的兩個條件，平反「動亂」與直播對話，怎麼可以就此罷休？不平反，戴著「動亂」帽子，不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了嗎？有壓 力，中共還說話不算數，今天下午的對話答應了轉播結果也沒兌現，那麼在壓力減弱時又會怎麼樣，不是很明顯嗎？剛剛被騙，憑甚麼還要相信？何況祇是一句話「同學們好」，連不秋後算帳的擔保都算不上。因此，那怕事後看來戴晴再「理性」，當時卻很難被接受。不是嗎？連請他們來的王超華在他們走後都與堅守廣場的 同學站到了一起，更何況別的人。

至於戴晴，也許只有她堅 持勸撤的立場始終如一。她面對面勸廣場學生撤大概就五一四晚那一次，可惜她提出的條件在當時的氛圍中實在顯得荒唐：只要李鵬或趙紫陽來廣場說聲「同學們 好」，大家便撤。戴晴說到這裡，全場先愣了一下，接著就有許多人喊「不好！」。這樣輕巧，【以上第 295 頁】同學們當然不答應。絕食剛宣了 誓的兩個條件，平反「動亂」與直播對話，怎麼可以就此罷休？不平反，戴著「動亂」帽子，不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了嗎？有壓力，中共還說話不算數，今天下 午的對話答應了轉播結果也沒兌現，那麼在壓力減弱時又會怎麼樣，不是很明顯嗎？剛剛被騙，憑甚麼還要相信？何況祇是一句話「同學們好」，連不秋後算帳的擔 保都算不上。因此，那怕事後看來戴晴再「理性」，當時卻很難被接受。不是嗎？連請他們來的王超華在他們走後都與堅守廣場的同學站到了一起，更何況別的人。

關於戴晴的建議，有好幾個版本的說法。包遵信的回憶說，戴晴建議的是李、趙來廣場宣佈「同學們是愛國的」，且在建議前與學者們商量過（《未完成的涅槃》 頁一一二－一一三）。但蘇煒、王超華和我的記憶中只有「同學們好」而無「愛國」二字（《民主中國》一九九二年六月，頁八四；《百姓》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 頁四八；《回顧與反思》頁一〇八，一三二，一三三）；劉曉波則說是「來廣場與學生們見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頁一二一－一二二）；陳小雅更說是「只要 來站一下，不說什麼」（《八九民運史》頁二八一）。連戴晴自己也這麼說：「讀畢《緊急呼籲》，由我宣佈撤出條件：總理和總書記來看望大家，同

學們從廣場撤出。」(《百姓》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頁三三)沒提商量的事。蘇煒也不記得戴晴與大家商量過，而且「李洪林還在喃喃地說：戴晴那樣說很不好，她不應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的哄，她說的那番代表我們十二人的話，也並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這個事情這樣一弄僵，往後這個中間斡旋的角色是誰也沒法當了。」(《民主中國》一九九二年六月，頁八四)到了五二二知識界遊行時，香港記者見到戴晴【以上第 296 頁】「顯得有些落寞」，還聽她說「蘇煒已疏遠我」。她打著「首都知識界」的大旗，卻被遊行總指揮、《強國夢》的作者趙瑜呵斥離開。(《人民不會忘記》頁二五四)可見，戴晴的意圖連十二學者和知識界內部也沒接受，那還怎麼勸學生？

關於戴晴的建議，有好幾個版本的說法。包遵信的回憶說，戴晴建議的是李、趙來廣場宣佈「同學們是愛國的」，且在建議前與學者們商量過(《未完成的涅槃》頁一一二–一一三)。但蘇煒、王超華和我的記憶中只有「同學們好」而無「愛國」二字(《民主中國》一九九二年六月，頁八四；《百姓》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頁四八；《回顧與反思》頁一〇八、一三二、一三三)；劉曉波則說是「來廣場與學生們見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頁一二一–一二二)；陳小雅更說是「只要來站一下，不說什麼」(《八九民運史》頁二八一)。連戴晴自己也這麼說：「讀畢《緊急呼籲》，由我宣佈撤出條件：總理和總書記來看望大家，同學們從廣場撤出。」(《百姓》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頁三三)沒提商量的事。蘇煒也不記得戴晴與大家商量過，而且「李洪林還在喃喃地說：戴晴那樣說很不好，她不應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的哄，她說的那番代表我們十二人的話，也並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這個事情這樣一弄僵，往後這個中間斡旋的角色是誰也沒法當了。」(《民主中國》一九九二年六月，頁八四)到了五二二知識界遊行時，香港記者見到戴晴【以上第 296 頁】「顯得有些落寞」，還聽她說「蘇煒已疏遠我」。她打著「首都知識界」的大旗，卻被遊行總指揮、《強國夢》的作者趙瑜呵斥離開。(《人民不會忘記》頁二五四)可見，戴晴的意圖連十二學者和知識界內部也沒接受，那還怎麼勸學生？

六、運動組織的散亂

最後，撤不下來最重要的原因，是學運組織的鬆散與不統一。前三個原因都可遇不可求，組織卻要看我們的本事。組織問題我在《八九學運組織結構的反思》中已談到，本節僅簡述一下當時組織不統一的源流，說明撤不下來的癥結。

非常粗略地劃分，整個運動中的統一指揮機構，名義上和實際上的各有兩個：北高聯、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偏於名義，北大籌委會和廣場上的指揮部的實際作用較 多。具體來說，從四一九到四二四，主導八九學運方向的組織可以說是北大籌委會；四二四以後直到五一三絕食，當數北高聯；五一五到五一七，絕食團指揮部成為 廣場上的核心，也就是整個運動的核心；大約從五一八到五二二，北高聯又佔上風；五二三，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認可下，廣場指揮部再居核心地位，直至六四。

再強調一下，以上劃分是相當粗糙的，尤其是北高聯也有相當長的時間是實際上的統一指揮機構；說她是名義上的，主要是相對於指揮部而言。另外，北大籌委會有一段時期強調自主權，【以上第 297 頁】比 如不執行高聯宣佈的五四復課。因此，從名義上看，北高聯與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應該是當然的最高機構，但實際上在它們遇到北大籌委會和指揮部時，又承認自己「不過是協調機構」，這樣一來，運動實際上常常處於群龍無首、政出多頭的狀態。於是導致一系列嚴重後果，絕食是一個，高聯沒有權威阻止；從廣場上撤不下 來，則是本文要探討的。

再強調一下，以上劃分是相當粗糙的，尤其是北高聯也有相當長的時間是實際上的統一指揮機構；說她是名義上的，主要是相對於指揮部而言。另外，北大籌委會有一段時期強調自主權，【以上第 297 頁】比 如不執行高聯宣佈的五四復課。因此，從名義上看，北高聯與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應該是當然的最高機構，但實際上在它們遇到北大籌委會和指揮部時，又承認自己 「不過是協調機構」，這樣一來，運動實際上常常處於群龍無首、政出多頭的狀態。於是導致一系列嚴重後果，絕食是一個，高聯沒有權威阻止；從廣場上撤不下 來，則是本文要探討的。

細究撤不下來的組織上的原因，還得從兩方面探索：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自下而上的組織方式因其自發性，容易造成斷裂與混亂。比如五一五絕食團 指揮部的成立，就造成了三個斷裂：一是統一組織的斷層，至此北高

聯不再是運動的唯一最高機構；二是核心成員沒有連貫性，尤其是李祿的介入，開始以全新的人 物掌握運動的決策核心；第三，權力更替的斷層，或曰極端組織方式的開始，尤其是以「自焚」為旗號，而掌權後又馬上取消，原先許多學運骨承認為不合法，於是 圍繞著李祿的「自焚」建議及其個人，「政變」與「反政變」層出不窮。詳細討論見拙文《「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

另一方面，自上而下方式的組織則可能造成懸空，名義上佔據運動領導地位，實際上卻無力領導。這樣的組織有兩個，北高聯與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北高聯沒能成 功阻止絕食，到了廣場後也沒能將同學們撤下來，其中的根本弱點就在於這種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造成的懸空。高聯在四二三圓明園會議上成立時，有二十多個院校 的「代表」，但是當時已成立自治會的院校卻很少，也就是說還沒有地基就建了高樓。因此北大一直認為其代表性有問題，這是北大強調自主權的根源，與北大部分 同學的老大心理加在一起，便削弱了高聯的影響力。因此在發起絕食時，柴玲可【以上第 298 頁】以對高聯常委會說：「高聯只是一個協調組織，我們有權決定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自上而下方式 的組織則可能造成懸空，名義上佔據運動領導地位，實際上卻無力領導。這樣的組織有兩個，北高聯與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北高聯沒能成功阻止絕食，到了廣場後也 沒能將同學們撤下來，其中的根本弱點就在於這種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造成的懸空。高聯在四二三圓明園會議上成立時，有二十多個院校的「代表」，但是當時已成 立自治會的院校卻很少，也就是說還沒有地基就建了高樓。因此北大一直認為其代表性有問題，這是北大強調自主權的根源，與北大部分同學的老大心理加在一起， 便削弱了高聯的影響力。因此在發起絕食時，柴玲可【以上第 298 頁】以對高聯常委會說：「高聯只是一個協調組織，我們有權決定自己的生命。」

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到了戒嚴後達到頂峰，即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同樣的原因，首聯也名實難符，並非運動的最高決策機構，因此，五二七面對決定三十號撤的 「決議」，李祿也可以對王軍濤、對柴玲和我說「首聯只是一個協調機構，廣場聯席會議才有權力決定撤不撤。」（《回顧與反思》頁二三八－九）

七、收放自如的條件

現在，胡先生，可以回到我們爭論的主題：八九民運失敗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由上述分析可見，廣場學生撤不下來，除了別的原因，群龍無首可以說是組織上的 原因。我十分同意你在《反思》中的一個說法：如果民眾達不到「足夠的共識」，那麼就需要「強有力的組織領導」。這確是一個洞見，可惜你沒有進一步展開，而 停留在「沒有對『見好就收』的共識所以失敗」這麼一個粗淺的認識上。實際上，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達成這一共識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強有力 的組織領導」便成為解決問題的根本。

問題是這種「強有力的組織領導」急不來，而當時又形勢逼人。該「民主」還是該「集權」？這就是八九民運在組織過程中最深刻的矛盾。急於自上而下建立最高 統一領導機構的典型是吾爾開希的做法。比如在四二一貼張大字報宣佈師大自治會的成立，「簽名：主席吾爾開希」；同樣【以上第 299 頁】的 大字報複印了貼在三十多個院校，衹是改為「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同樣的「簽名：臨時主席吾爾開希」。這是一年後開希向法國學者的自述， 還自豪地說「當時就我一個光桿司令」。劉燕、沈彤和常勁在巴黎會議上都異口同聲地見證「開希的主席是自封的」。之後他便不斷為自己製造新聞形象，私自召開 各種「個人記者招待會」。更不顧高聯的反對擅自發起絕食，絕食後卻向閻明復打保票「一定能將同學撤出廣場」。高聯常委因其僭越而讓梁二取代他在高聯的位置，但開希端端靠了媒體所造成的「北高聯主席」的形象，繼續發揮「學運領袖」的作用，以至於五二二喊撤被「罷免」時，他根本沒有任何職務！被「罷免」後，開希一度低落，但在劉曉波的鼓動下，又在五二七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急切要做運動最高的「人民發言人」，他自認能勝任的理由竟然是「我最有知名度，也最有 個人魅力」！……

問題是這種「強有力的組織 領導」急不來，而當時又形勢逼人。該「民主」還是該「集權」？這就是八九民運在組織過程中最深刻的矛盾。急於自上而下建立最高統一領導機構的典型是吾爾開 希的做法。比如在四二一貼張大字報宣佈師大自治會的成立，「簽名：主席吾爾開希」；同樣【以上第 299 頁】的大字報複印了貼在三十多個院 校，衹是改為「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同樣的「簽名：臨時主席吾爾開希」。這是一年後開希向法國學者的自述，還自

豪地說「當時就我一個光 桿司令」。劉燕、沈彤和常勁在巴黎會議上都異口同聲地見證「開希的主席是自封的」。之後他便不斷為自己製造新聞形象，私自召開各種「個人記者招待會」。更 不顧高聯的反對擅自發起絕食，絕食後卻向閻明復打保票「一定能將同學撤出廣場」。高聯常委因其僭越而讓梁二取代他在高聯的位置，但開希端端靠了媒體所造成 的「北高聯主席」的形象，繼續發揮「學運領袖」的作用，以至於五二二喊撤被「罷免」時，他根本沒有任何職務！被「罷免」後，開希一度低落，但在劉曉波的鼓 動下，又在五二七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急切要做運動最高的「人民發言人」，他自認能勝任的理由竟然是「我最有知名度，也最有個人魅力」！……

顯然，這種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有違民主原則，而代表性與合法性恰恰是這場「民主」運動中同學們非常強調的。這也就是八九民運中的上層組織懸空，遇到內部 實力派的挑戰時只能甘居「協調機構」而不能發揮統一領導的根源。而這些自上而下的漏洞又給自下而上的組織的集權帶來方便，廣場上的指揮部便是這種典型(另 文詳述)。結果，無論北高聯、絕食團指揮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還是廣場指揮部，都不名正言順：高聯無力指揮全北京的學運，首聯也不能對首都的民運作決議， 而絕食團與廣場指揮部領導的實際上並不限於絕食同學或廣場人員，而成為整個運動的實際核心。所謂運動的最高統一領導機構，有此名義的則沒有實力，有實力的 卻又無這一名義，而兩邊又沒能通力合作，這才是八九民運組織上的根本教訓。【以上第 300 頁】

由此可見，統一領導與民 主程序是八九民運中的一個基本矛盾，也就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組織方式的矛盾。要做到收放自如，必須有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組織領導」，而要能統一， 又必須是自下而上具有堅實的民主基礎。王超華勸撤的無力原因在此，首聯撤離建議的無力也在此。八九民運的問題是來得太突然，大家都沒有準備，尤其是組織， 基本上都是臨時搭建的；而原來已經有組織的如「民主沙龍」、「圓明園沙龍」和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等試圖嚐試的自上而下的組織，與自發而起的基層組織，雙方 的骨幹又沒來得及互相認可。內部核心成員多不相識，瞭解和信任都需要一段時間，這恰恰是運動中最欠缺的。

最後提出一個疑惑，即這兩種方式的組織能否真正結合，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困難，因為兩邊的實力人物一般都不會輕易露面，而這恰恰又植根於我們的文化心理 背景，諸葛亮一般都隱而不現。這樣一來，在緊張的運動中，兩邊的實質性接觸就很難達成。這可能是中國人試行民主時的一個基本問題。

八、本章結論

綜上所述，八九民運失敗的根源並不是因為沒能「見好就收」；見好沒法收的根本原因在於組織混亂，在於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兩種方式的組織沒能來得及密切結合，也就是說，雙方都未找到對方的核心階層。【以上第 301 頁】

針對八九民運的組織過程中的教訓，有幾點值得總結：

一、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組織應該盡快結合；

二、結合的關鍵在於趕緊找準自下而上實力派的核心成員，建立信任，形成真正有代表性的統一領導組織；

三、必須杜絕「開希作風」，排斥華而不實利用媒體作秀的人；

四、破除大民主觀念，民主選舉出來的組織應該加強執行的權威。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於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補正於巴黎。作者按：本文曾投給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結果既未發表，也不說明理由。）【以上第 302 頁】

回應胡平－－答胡平公開信之四

胡先生，九五年七月號的《北京之春》刊登了拙文《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對當前爭議的幾點質疑》（以下簡稱《質疑》），接下來的一期，你發表《回應封從德》一文（以下簡稱《回應》）。以下是我的回應。

一、為何壓制我的文章？

胡先生，你的《回應》中許多話很有道理，比如你在文末建議：

在眼下這場反思八九的討論中，我們應該放下歷史的包袱，拋開個人的得失之心，面對真理，面對未來。自己過去有過什麼失誤，認識到就好了。別人提出了什麼 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要認真地加以思考。只要別人講的有道理，我們就應該欣然接受；別人有幾分正確，我們就該承認幾分。如果我們出於面子而不肯坦承自己的過 失，出於意氣而不肯承認別人的正確，還要對別人耿耿於懷，反唇相【以上第 303 頁】譏，我們就會把一場嚴肅的理性的討論變成一種無聊的以至惡性的相互攻訐。

在眼下這場反思八九的討論 中，我們應該放下歷史的包袱，拋開個人的得失之心，面對真理，面對未來。自己過去有過什麼失誤，認識到就好了。別人提出了什麼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要認真地 加以思考。只要別人講的有道理，我們就應該欣然接受；別人有幾分正確，我們就該承認幾分。如果我們出於面子而不肯坦承自己的過失，出於意氣而不肯承認別人 的正確，還要對別人耿耿於懷，反唇相【以上第 303 頁】譏，我們就會把一場嚴肅的理性的討論變成一種無聊的以至惡性的相互攻訐。

但這些話是否有誠意，卻是一個問題。比如你開篇便說，「讀了封從德的文

章，我第一個感覺是：怎麼這樣不經誇。」這種高高在上教訓人的口氣，不正是在「反唇相譏」麼？在要求別人的時候，自己先要做到，這樣才算得上有誠意。此其一，還不太要緊。

其二，最要緊的是你壓制我的言論，令人疑惑你是不是在說一套做一套。除了上段話呼籲接受他人意見以外，你的《回應》還特別強調了爭論的必要性：「沒有了 爭論，還有什麼民主？民主的精髓不在於票決，而在於自由的公開的爭論」、「良好的民主風度不是體現在有意見不提或不公開地提，而是體現在能夠用恰當的語 詞、恰當的言談方式去公開地陳述和爭辯」。但我發現你非但沒有「欣然接受」別人的見解，而且斷然壓制了我的言論，完全阻斷了進行「一場嚴肅的理性的討論」 的可能，很難看出你的「良好的民主風度」在哪裡。

以下是被你壓制過的文章：一、《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二、《見好怎麼收？－－答胡平公開信之一》；三、《見壞怎麼上？ －－答胡平公開信之二》；四、《見好沒法收，怎麼辦？ －－答胡平公開信之三》；五、《回應胡平－－答胡平公開信之四》；六、《讀丁子霖老師六四七週年祭文有感》；七、《廣場日誌：一九 八九年五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八、《柴玲「最後的話」－－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錄影談話》。另外還有收入本書的《五一四對話是「公開」的嗎？》、《五 一八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了嗎？》兩篇本來在《公開信之一》當中，因為你一直扣而不發，半年後我才只好重新整理出來，交香港兩家雜誌刊出。【以上第 304 頁】

只有第一篇是個例外，在你百般壓制無效後才勉強發表(北春一九九五年七月)。我聽當時在北春編輯部的人介 紹，你用了種種理由阻撓該文發表，比如說我對你的引文不實，編輯部其他人就逐條對照證明無誤，你才不得不承認。該文刊登後我發現有增文、誤植又刪掉兩段， 詳見《公開信之一》。而且，自你的《回應》在下一期刊登之後，我向貴刊投的所有文章就全部被壓，也不說明原因。

接下來四篇，是按照你來信的要求進行的理論分析，和對你《回應封從德》的回覆。若說其中有所批評，也都是出於討論的需要，或是我們觀點不同、或是指出你 背離史實、自相矛盾、或言行不一之處，沒有甚麼地方涉及我們的私事，何以只登你批評我的文章，之後就不再登我的回覆呢？我又沒有作人身攻擊，討論的都是民 運公案，何以民運刊物就不能刊登呢？是不夠水準麼？何以轉投它刊，又都發表了呢？我首先投給你們，就是因為貴刊是海外民運的公器。

如果說不能批評你，批評你就是批評民運，而「民運刊物不應該刊登批評民運的文章」，那麼第七第八篇只是民運史料和整理，完全沒有對你的批評。尤其是柴玲 講話全文正是九五年爭論的一個基本材料，且從未全文發表過，竟然也被壓制，我真不明白：《北京之春》是民運刊物還是你的私人刊物？你在七九年「民主牆」時 期就寫了《論言論自由》，何以有了一點權力就去壓制言論？你《回應》中說的道理，你自己是否準備實行？

總之，我看不出你的誠意。【以上第 305 頁】

二、斷章取義的情況

在分析與評述別人的言論時，斷章取義是一個大忌。犯此錯誤的人，通常將別人的話掐頭去尾、前後拼接，故而扭曲其原意。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記者對柴玲五 二八錄像談話的處理，把本來對不同記者說的兩句話拼在一起，刪去八千九百字而不露痕跡，結果變成「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而你卻辯護說，「這兩段話，既 無所謂『竄改』，也談不上『斷章取義』。」(我有另文詳述，參見《公開信之二》「九五年附和媒體」一節)看來你對「斷章取義」有不同尋常的理解。

其實，你的《回應》就常常犯此錯誤。比如，為了證明我「不經誇」、「失去了心平氣和的態度」，你舉出的兩個例子就是斷章取義的結果。以下是我《質疑》中的有關段落，下劃線處是你引用的兩句話：

其實，最令我為海外民運捏一把汗的是胡平的功利意識。胡平在《反思》中，反覆強調「民運應有強烈的功利意識」，「沒有這種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們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中國之春》八十三期十六頁)

恰恰正是這種現實功利意識，這種政治化的總結歷史之指導思想，導致了《反思》一文的匆促上馬，也致使該文漏洞百出，而至今還貽害大方。這一指導思想，從 胡文一開篇便是赤裸裸的，他說，雖然運動的許多重大事實尚未弄清，缺乏足夠的第一手資料，「然而，作為一場現實運動的投入者，【以上第 306 頁】

我們有必要及時地對這場運動作出我們的回顧。」胡平對八九民運(尤其對學運)能作多少回顧，又作了多少，很難說，他實質上作的，恰是總結，而且是歷史的總結，這在《中國民運反思》一書的封面文字中，一目了然：「……我們必須要有自己書寫的歷史。」

恰恰正是這種現實功利意 識，這種政治化的總結歷史之指導思想，導致了《反思》一文的匆促上馬，也致使該文漏洞百出，而至今還貽害大方。這一指導思想，從胡文一開篇便是赤裸裸的， 他說，雖然運動的許多重大事實尚未弄清，缺乏足夠的第一手資料，「然而，作為一場現實運動的投入者，【以上第 306 頁】我們有必要及時地對這場運動作出我們的回顧。」胡平對八九民運(尤其對學運)能作多少回顧，又作了多少，很難說，他實質上作的，恰是總結，而且是歷史的總結，這在《中國民運反思》一書的封面文字中，一目了然：「……我們必須要有自己書寫的歷史。」

要自己書寫歷史，野心也太大了一點，這是以前皇帝想做也沒有做到的。而胡平有此雄心，可見其「現實功利」與「政治」了。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太史公 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二十四史，皆述前而戒後，沒見過要「自己書寫歷史」的。於是，我愕然，在現代「黨史」、「派史」之後，竟然見識了「自己書寫的 歷史」！

我想，我夠不上「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也不懂怎麼「搞政治」，我只希望一條－－實事求是。

顯而易見，我反對的重點在於「這種現實功利意識，這種政治化的總結歷史之指導思想」，是針對你對八九民運的「反思」而說的。結果呢，你卻截斷我的兩句 話，不著邊際地反問:「奇怪的是，為什麼我們抱有改進生存環境、讓所有的人能夠生活得更好的意識竟然會讓封從德『捏一把汗』呢？」真是雞同鴨講，還由此 「證明」我「在鬧意氣」、「多半是情緒化的反應而已」，實在看不出有何邏輯。

三、倉促總結歷史的功利意識

【以上第 307 頁】

所謂「皇帝想做也沒有做到」，是因為中國很早就有了優良的史官制度。史官之良，可從二千六百多年前春秋時期 的一個故事看出：襄公二十五年，齊國大夫崔杼弒其國君。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杼殺之。太史之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捨之。南史氏聞太史 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弒」是以下犯上，非禮;「殺」則沒問題。也就是說，掌朝權臣為一字連殺二史，見老三照樣記作「弒」才作罷；不罷你也沒 用，因為外地史官聽說朝廷殺了太史，也冒死趕來要秉筆直書。後來中國有了皇帝，都是本朝史官修前朝正史，皇帝無權干預，連唐太宗希望讀一讀魏徵正在寫的隋 書都遭拒絕。而起居註、實錄之類則保證本朝史料的客觀性，甚至有皇帝若擅自闖入記錄起居註的辦公室也要罰款的規定。當然，我不是說官方正史沒有篡改的情 況，但相對而言，沒有人能否認中國史學曾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地位。

因此，我對「自己書寫歷史」的批評，主要是針對現代「黨史」、「派史」之風而發的。我們知道，中共是編造歷史的能手。無論是黨史、國史、世界史，皆得符 合其理論框架，而不是理論符合實際，因為他們自以為已經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樣，中國自秦以降便成了「封建社會」;這樣，日本是中共打跑 的。……國民黨史的問題大概程度輕一些，但據侯德健說，他曾統計過台灣教科書中殲滅的「共軍」數字，各處加起來竟然上億。這就是為什麼我反感黨史、派史的 原因。

可惜，胡先生，你在倉促總結和反思八九民運的歷史時，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你似乎也找到了一個絕對真理，即「見好就收，見壞就上」；你的「真理」也同樣不可質疑，於是一面宣【以上第 308 頁】稱 它「早已成為民運界大多數人的共同結論」，一面壓制我的異議；你也同樣要求歷史符合自己的預設框架。這裡僅舉兩個例子。例一，以「李鵬讓步論」支撐「見好 就收」論，不惜編造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而且「現場直播」的「史實」。例二，竭力掩蓋自己當年鼓動「見壞就上」的真相，不惜公然對阮銘先生和我抵賴。這 在前面的公開

信中已有詳述。

可惜，胡先生，你在倉促總結和反思八九民運的歷史時，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你似乎也找到了一個絕對真理，即「見好就收，見壞就上」；你的「真理」也同樣不可質疑，於是一面宣【以上第 308 頁】稱 它「早已成為民運界大多數人的共同結論」，一面壓制我的異議；你也同樣要求歷史符合自己的預設框架。這裡僅舉兩個例子。例一，以「李鵬讓步論」支撐「見好 就收」論，不惜編造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而且「現場直播」的「史實」。例二，竭力掩蓋自己當年鼓動「見壞就上」的真相，不惜公然對阮銘先生和我抵賴。這 在前面的公開信中已有詳述。

怎麼會這樣呢？這裡不能不進一步問：是不是你的功利意識在作怪？

你的《反思》在虛構歷史的同時，又竭力頌揚「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當時會有甚麼現實功利呢？答案似乎可以從你在《反思》連載期間 接受的一個採訪中找到。在這篇「孤獨的自由主義者－－民聯主席胡平訪問記」中，你反覆批評了民陣。當時民陣如日中天，排斥其它團體，比如民陣籌備會時你往 巴黎就被拒之門外，只是在「以個人身份、不能代表組織」的條件下才得以參加。於是你在採訪中大聲疾呼：「『新資格』在排斥『老資格』！作為先行者，並不能 佔很多便宜。」採訪時值民陣二大前夕，正是醞釀民陣民聯合並忙著尋找「領袖」的時刻。你指責民陣中許多是前共產黨人，利用在「體制內」的名望和資歷「搖身 一變」而佔據了民運中的主導地位；你舉出「在原共產黨體制內沒有顯赫的位置」的瓦文薩，感慨中國人沒有識別領袖的能力，暗示海外民運「如果有了瓦文薩，你 會去擁護他嗎？」，又列舉作領袖的三條要求，最後乾脆說：「政治活動家最重要的力量來源於他的理想與觀念的力量。就這一點而言，我對自己有相當的自信」。 因此你萬分感嘆別人對你的重視不夠，聽說自己的《論言論自由》受到表揚，馬上感嘆道：「這個讚揚來得太遲了。」……（安琪，《痛苦的民主》頁--〇三－一一 八；新聞自【以上第 309 頁】由導報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二日）

你的《反思》在虛構歷史 的同時，又竭力頌揚「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當時會有甚麼現實功利呢？答案似乎可以從你在《反思》連載期間接受的一個採訪中找到。在 這篇「孤獨的自由主義者—民聯主席胡平訪問記」中，你反覆批評了民陣。當時民陣如日中天，排斥其它團體，比如民陣籌備會時你往巴黎就被拒之門外，只是在 「以個人身份、不能代表組織」的條件下才得以參加。於是你在採訪中大聲疾呼：「『新資格』在排斥『老資格』！作為

先行者，並不能佔很多便宜。」採訪時值民 陣二大前夕，正是醞釀民陣民聯合並忙著尋找「領袖」的時刻。你指責民陣中許多是前共產黨人，利用在「體制內」的名望和資歷「搖身一變」而佔據了民運中的主 導地位；你舉出「在原共產黨體制內沒有顯赫的位置」的瓦文薩，感慨中國人沒有識別領袖的能力，暗示海外民運「如果有了瓦文薩，你會去擁護他嗎？」，又列舉 作領袖的三條要求，最後乾脆說：「政治活動家最重要的力量來源於他的理想與觀念的力量。就這一點而言，我對自己有相當的自信」。因此你萬分感嘆別人對你的 重視不夠，聽說自己的《論言論自由》受到表揚，馬上感嘆道：「這個讚揚來得太遲了。」……（安琪，《痛苦的民主》頁一〇三－一一八；新聞自【以上第 309 頁】由導報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二日）

可見，你當時最大的「現實功利」是與民陣的較量。自己是「先行者」，而民陣的人不過是「佔了便宜」。「例如《論言論自由》是我在民主牆時期時發表的，十 年之後了，關心這件事的人仍然認為這篇論文是最好的」；「事實上我對中國民運十多年來操了許多心，而且看法和實際活動、見解和主張的深度以及涉及問題的廣 度，我想在中國從事民運的人中是沒有多少人能比得上的，但我個人在這方面所受到的重視則是不夠的」；「後投入的人反而有更高的知名度」，「而人們又不去考 慮知名度是從哪裡來的」……。（同上）

平心而論，這番孤芳自賞與憤憤不平也不無道理。民陣確曾「掛羊頭賣狗肉」，本來以未來「民主中國」的聯合「陣線」為號召，以團體會員為架構，結果卻成了 個人會員架構的「八九民運流亡者俱樂部」，奠定了不讓其它組織分享資源的結構基礎。結果，以千百人的生命為代價、以全中國的未來作抵押而換來的滾滾捐款， 僅保障了十來個人的工資，而未來「民主中國」的總理、部長人選和待遇不僅是私下的玩笑，也正而八經地拿到五星賓館的會議廳裡討論，連國旗都設計好了，赫然 登在機關刊物《民主中國》的創刊號上。在某些藉六四鮮血而炫耀一時的政治明星自我陶醉之時，確實需要一些醒酒的藥。

四、「反思」背後的功利意識

【以上第 310 頁】

遺憾的是，你這時發表的 《反思》不是這類醒酒藥。一方面你要證明八九

民運並不那麼輝煌，無論「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另一方面你卻不敢直接批評你所不滿的人和事，而拿你曾極力 支持的八九學生作替罪羊，尤其是當時尚在國內逃亡的柴玲。這樣避實就虛，大概也是所謂「功利意識」吧。

為什麼說八九民運並不那麼輝煌呢？《反思》第一章論證了「八九民運的巨大規模是這場運動的最重要的意義之所在」，而內容則不怎麼樣；第二章則是「關於八 九民運失敗的結局」，第三章更是「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必然」，第四章則總結出這個並非必然的失敗的主要教訓是沒有「見好就收」。就是說，沒有遵照你的理論 當然就失敗了，而本來這是可以避免的，怎麼還有輝煌可言？至於你自己曾是怎樣「見壞就上」的，當然就無關弘旨了。

又為什麼說八九民運只「是在規模上而不是內容上勝過以往的幾次民主運動」的呢？因為「八九民運的歷史文獻中，其內容本身精闢豐富者確實沒有幾篇。然而在 民主牆運動和自由競選運動中，我們倒是真有一批佳作傳世的。」就差沒點你自己的《論言論自由》了，而按照對你的採訪，那自然又是這批「傳世佳作」中的最 佳。八九民運時你在海外，而民主牆與自由競選運動卻是你直接參與過的，加上海外民運，後來有人批評你的攀比心態時就指出，何以你對自己參與過的運動沒有反 思，卻偏偏寫了一篇八萬字的《八九民運反思》呢？這一批評不能說是無的放矢吧。

採訪中進一步透露出這種攀比心態背後的「現實功利」：當時你有「推銷自己」的需要。【以上第 311 頁】你 總結了作為先行者卻知名度不夠的教訓，開始選擇不再「作好人」而要「搞政治」。「搞政治就是要善於推銷自己的主張」，你說，「如果你不採取某些必要的手 段，就很難取得某種位置或者權力」，而「權力的爭奪難免把人性中很不好的部分召喚出來」，但「必須要獲得成功」，否則「倒是保持了追求的純潔性，但在政治 上卻是失敗者」。為此你還作了「檢討」：民主牆時期「我明明知道我的主張顯然比別人的更深入更正確，但我不會很強有力地推銷自己的主張。」直讓我想起吾爾 開希的「檢討」，即一九八九年他的錯誤就是沒能糾正別人的錯誤。你進一步認為自己還「有些東西比較欠缺」，即別人的「敬畏」，那怕「許多人對我的觀點比較 信服」，但對於一個「在搞政治」的人來說顯然不夠。於是，「名氣」或「知名度」便十分必要了，問題是「後投入的人反而有更高的知名度」。因此，「如果這時 你不提出資歷問題，人們就會對先行者的功績採取一種不公正的態度」，而「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會留很多後患」。果真，後患無窮。

採訪中進一步透露出這種攀比心態背後的「現實功利」：當時你有「推銷自己」的需要。【以上第 311 頁】你 總結了作為先行者卻知名度不夠的教訓，開始選擇不再「作好人」而要「搞政治」。「搞政治就是要善於推銷自己的主張」，你說，「如果你不採取某些必要的手 段，就很難取得某種位置或者權力」，而「權力的爭奪難免把人性中很不好的部分召喚出來」，但「必須要獲得成功」，否則「倒是保持了追求的純潔性，但在政治 上卻是失敗者」。為此你還作了「檢討」：民主牆時期「我明明知道我的主張顯然比別人的更深入更正確，但我不會很強有力地推銷自己的主張。」直讓我想起吾爾 開希的「檢討」，即一九八九年他的錯誤就是沒能糾正別人的錯誤。你進一步認為自己還「有些東西比較欠缺」，即別人的「敬畏」，那怕「許多人對我的觀點比較 信服」，但對於一個「在搞政治」的人來說顯然不夠。於是，「名氣」或「知名度」便十分必要了，問題是「後投入的人反而有更高的知名度」。因此，「如果這時 你不提出資歷問題，人們就會對先行者的功績採取一種不公正的態度」，而「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會留很多後患」。果真，後患無窮。

後患之一，民運分裂。民聯與民陣的分歧在採訪中已見端倪。除了民陣在籌備會時拒你之外，那篇採訪的按語說：「人們在憂慮海外民運的領袖危機的同時，將尋 覓的目光移到了胡平身上。然而，『辭職風波』使這種『熱點』迅即消融，並引起了一種強烈的『系列反應』，民陣民聯合併一事也因一方擔心『同床異夢』，一方 不願做『小老婆』而暫告無望。」所謂「辭職風波」，採訪中你試圖迴避，卻被記者點出：「你曾應萬潤南之邀在普林斯頓密商組閣之事，據悉萬潤南意欲拉你一起 競選民陣主席，而你也曾間接地表示倘若你做民陣副主席，民聯的人會有意見，認為民聯成了民陣的『小老婆』，這至少也說明你並非沒有競選民陣主席之念吧？」 對此你再沒否【以上第 312 頁】認。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也無意追究 「民聯民陣聯合受挫應該歸咎於誰」。我只是讀到一些文章說你以前就有「不能做主席就不加入民聯」的競選綱領，也讀到你後來在民聯民陣「合併」出三個組織的 過程中的作用。這些說法是否屬實我也無法核對。但這也難說不是爭資歷的「強烈的功利意識」留下的後患。

後患之一，民運分裂。民 聯與民陣的分歧在採訪中已見端倪。除了民陣在籌備會時拒你之外，那篇採訪的按語說：「人們在憂慮海外民運的領袖危機的同時，將尋覓的目光移到了胡平身上。 然而，『辭職風波』使這種『熱點』迅即消融，並引起了一種強烈的『系列反應』，民陣民聯合併一事也因一方擔心『同床異夢』，一方不願做『小老婆』而暫告無 望。」所謂「辭職風波」，採訪中你試

圖迴避，卻被記者點出：「你曾應萬潤南之邀在普林斯頓密商組閣之事，據悉萬潤南意欲拉你一起競選民陣主席，而你也曾間接地表示倘若你做民陣副主席，民聯的人會有意見，認為民聯成了民陣的『小老婆』，這至少也說明你並非沒有競選民陣主席之念吧？」對此你再沒否【以上第 312 頁】認。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也無意追究「民聯民陣聯合受挫應該歸咎於誰」。我只是讀到一些文章說你以前就有「不能做主席就不加入民聯」的競選綱領，也讀到你後來在民聯民陣「合併」出三個組織的過程中的作用。這些說法是否屬實我也無法核對。但這也難說不是爭資歷的「強烈的功利意識」留下的後患。

後患之二，輕斷歷史。在採訪中你表達了自己的歷史哲學，不斷強調民運也得講先來後到之後，你說：「應該建立起我們自己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倫理，就是順序問題。必須對他們(先行者)有一個新的正確的估價。換句話說，當代的中國歷史應該由我們來寫。」不難看出，這與《反思》中的歷史觀如出一轍：哪怕第一手材料不足，「然而，作為一場現實運動的投入者，我們有必要及時地對這場運動作出我們的回顧」、「我們必須要有自己書寫的歷史。」為了抬高自己的資歷而寫的歷史，其結果必然是扭曲歷史，乃至編造歷史，如上節之二例。

後患之三，打壓學生。但何至於虛構「李鵬讓步論」來替中共辯護的地步呢？我一直在巴黎，不瞭解柴玲在美國對你有何得罪。唯一見到的是有一篇文章提到柴玲曾在一個公開場合指責你的家務事(《前哨》一九九三年一月，頁七七)。公開說人私生活當然不對，但我想報復學生也不至於要到幫李鵬的程度吧。百思不得其解，九五年聽到一個解釋才恍然大悟。與你甚近、也是一位資深的民運領袖，當著我和另一位朋友勸導柴玲：「你知道大家為何打你而不打別人？就是因為你擋了大家的路。比如媒體上的影響力和捐款……。」這話應該說不是特別指你，但你九〇年的「反思」和九五年批判「激進學生」確實最突出，而那本來就是「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以上第 313 頁】現實的功利意識」使然，要「及時地對這場運動作出我們的回顧」而可以不待史實——正如《反思》開篇所聲明的那樣。

後患之三，打壓學生。但何至於虛構「李鵬讓步論」來替中共辯護的地步呢？我一直在巴黎，不瞭解柴玲在美國對你有何得罪。唯一見到的是有一篇文章提到柴玲曾在一個公開場合指責你的家務事(《前哨》一九九三年一月，頁七七)。公開說人私生活當然不對，但我想報復學生也不至於要到幫李鵬的程度吧。百思不得其解，九五年聽到一個解釋才恍然大悟。與你甚近、也是一位資深的民運領

袖，當着我和另一位朋友勸導柴玲：「你知道大家為何打你而不打別人？就是因為你擋了大家的路。比如媒體上的影響力 和捐款……。」這話應該說不是特別指你，但你九〇年的「反思」和九五年批判「激進學生」確實最突出，而那本來就是「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以上第 313 頁】現實的功利意識」使然，要「及時地對這場運動作出我們的回顧」而可以不待史實－－正如《反思》開篇所聲明的那樣。

總而言之，後患雖然如此，看來你的推銷卻不成功。海外民運「主席」沒做成，你的《反思》卻常常遭到反思，六四學生也沒銷聲匿跡。因此，即便從功利角度而言，你的「功利意識」恐怕也不可取。望你三思。

五、歷史假定法的問題

對功利意識的不同態度也導致了我們對史證方法的分歧。首先，總結歷史在先還是整理史料在先？我認為「在史實不清楚的情況下，可能很難作評價。要現在就想 對一九八九年這麼一場運動作評價，我覺得好像為時還早。歷史一般來說不是當事人自己來評，而是後人來評價的。」這麼簡單的道理，你卻拿來上綱上線，說只有 中共才會高興用「為時過早」為理由拒絕人民要求重新評價八九和六四的呼聲。我強調應該先整理史料再作總結的原意，卻被你偷換概念，與中共阻止重新評價六四 混為一談，真不知道你的邏輯在哪裡？

誰會讓中共高興呢？難道我希望你先弄清李鵬並未與學生「公開對話」和「現場直播」的史實，會讓中共高興？難道揭示五一四對話並非「公開進行的」，中共會 更高興？恐怕你同中共一樣，都不會太高興吧。其實，為了政治功利，可以不顧史實，在這一點上，你們真有相似之處。【以上第 314 頁】用混淆概念的手法對我的反駁，不過是繼續在為總結可以先於史料作辯護。

誰會讓中共高興呢？難道 我希望你先弄清李鵬並未與學生「公開對話」和「現場直播」的史實，會讓中共高興？難道揭示五一四對話並非「公開進行的」，中共會更高興？恐怕你同中共一 樣，都不會太高興吧。其實，為了政治功利，可以不顧史實，在這一點上，你們真有相似之處。【以上第 314 頁】用混淆概念的手法對我的反駁，不過是繼續在為總結可以先於史料作辯護。

第二個分歧是關於「歷史假定法」的使用範圍。你說「為了徹底駁倒我，

封從德又提出了一個論斷，他聲稱不能依據假設來討論歷史評價歷史」。我沒有這樣的 「論斷」。我對此有兩句話，一是「我覺得從史學的觀點來說，歷史是很難作假設的。」一是「對歷史能否作假設來展開推論，史學界多取否定或懷疑態度。對於歷 史假定方法，若不是說絕對不可用，也小心為妙。」與你說的「論斷」相去甚遠：一個是斷然否定，一個只是懷疑，希望你謹慎一些。我所強調的重點還是「史料先 於史評」，還舉了二個例子證明你自己就糊里糊塗，假設來假設去，結果自相矛盾。很遺憾，你的《回應》對此避而不談，更荒唐的是，為了說明我真有「論斷」， 你又引用了白夢的話。請問，你是在「回應封從德」還是在「回應白夢」？你還要不要講理？

邏輯如此混亂，怕是與「民運理論家」和「學者」不相稱。

六、關於「第二手材料」

在四、五兩節中，你回應「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的批評。你指我「對『第一手材料』的理解過於狹隘」，「以為只有當事者的敘述或回憶才叫第一手 材料」。這是對我的曲解。我不僅完全同意「各種媒體的現場報導和採訪記錄也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它們並不一定比當事者的敘述或回憶更不可靠」，而且事實上我 自己也常用這類材料。而你接下來辯護自己並非「懶【以上第 315 頁】於求證」的說法問題就更大了。逐條反駁如下。

在四、五兩節中，你回應「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的批評。你指我「對『第一手材料』的理解過於狹隘」，「以為只有當事者的敘述或回憶才叫第一手材料」。這是對我的曲解。我不僅完全同意「各種媒體的現場報導和採訪記錄也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它們並不一定比當事者的敘述或回憶更不可靠」，而且事實上我自己也常用這類材料。而你 接下來辯護自己並非「懶【以上第 315 頁】於求證」的說法問題就更大了。逐條反駁如下。

一，你說「《反思》一書依據的事實大體上只限於那些最一般、最基本的事實。這些事實經由多種獨立的媒體而加以披露和相互印證，因此具有相當的可信性。迄 今為止，我尚未發現任何有份量的反證，足以動搖我在《反思》中對八九民運的敘述與分析。」但是，你斷言李鵬與學生「公開對話」而且「現場直播」了，又是根 據哪些「獨立媒體」的呢？我在第一封公開信中已經詳細引用各種媒體，論證你的各種不實，那麼明確的反證，你又為何壓制發表、不敢正面回答呢？

二，你拿柴玲錄像談話與美國總統談論政策的文字來比，更透露你對求證「第一手材料」缺乏一些基本訓練。顯然，柴玲不是美國總統，廣場不是白宮，

哪有像美 國總統的秘書班子及和平時期的從容來起草和處理她的講話？而從聯經版《天安門一九八九》中的「柴玲講話全文」推論她曾有那麼險惡的意圖，你怎麼就一點也不 對「全文」的可靠性作點求證呢？沒有條件嗎？九〇年三月你開始發表《反思》，可以說是來不及核對，因為柴玲四月才逃到西方。但之後呢？到你九二年出版成書 之前，有兩年時間，你又問過她嗎？她在普林斯頓，你在紐約，離得那麼近，又不是沒有見面的機會。九〇年五月我們第一次見面，你根本不提此事，我們也完全不 知道你的傑作正在連載。《回應》中你說，「迄今為止，當事者們均不曾對該書中柴玲五□二八講話一文提出過任何更正聲明。」這也不是事實，早在六三會上我就 當眾指出那不是全文，沒有準確反映柴玲錄像談話的原貌。(北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八五)我當時還問誰看過錄像帶，你沒吭聲。你【以上第 316 頁】在 五月的文章中就聲稱聯經本為「全文」(北春九五年六月，頁五一)；到了八月發的《回應》中還以之為「第一手材料」，說明你還是沒有去找錄像來看。給你指出 來你也不去核對一下，這不是「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又是甚麼？後來，我又有文章指出你的《反思》史實上的錯誤，你卻壓制我的文章，確實不能以一 個「懶」字了事。現寄上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一萬三千字，其中七千字為聯經本所遺漏與誤植，請貴刊發表，亦請你承認一下以前所謂的「全文」是第二手的。

二，你拿柴玲錄像談話與 美國總統談論政策的文字來比，更透露你對求證「第一手材料」缺乏一些基本訓練。顯然，柴玲不是美國總統，廣場不是白宮，哪有像美國總統的秘書班子及和平時 期的從容來起草和處理她的講話？而從聯經版《天安門一九八九》中的「柴玲講話全文」推論她曾有那麼險惡的意圖，你怎麼就一點也不對「全文」的可靠性作點求 證呢？沒有條件嗎？九〇年三月你開始發表《反思》，可以說是來不及核對，因為柴玲四月才逃到西方。但之後呢？到你九二年出版成書之前，有兩年時間，你又問 過她嗎？她在普林斯頓，你在紐約，離得那麼近，又不是沒有見面的機會。九〇年五月我們第一次見面，你根本不提此事，我們也完全不知道你的傑作正在連載。《回應》中你說，「迄今為止，當事者們均不曾對該書中柴玲五□二八講話一文提出過任何更正聲明。」這也

不是事實，早在六三會上我就當眾指出那不是全文，沒 有準確反映柴玲錄像談話的原貌。(北春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八五)我當時還問誰看過錄像帶，你沒吭聲。你【以上第 316 頁】在五月的文章中就 聲稱聯經本為「全文」(北春九五年六月，頁五一)；到了八月發的《回應》中還以之為「第一手材料」，說明你還是沒有去找錄像來看。給你指出來你也不去核對 一下，這不是「慣於用第二手材料，又懶於求證」又是甚麼？後來，我又有文章指出你的《反思》史實上的錯誤，你卻壓制我的文章，確實不能以一個「懶」字了 事。現寄上柴玲錄像談話的全文一萬三千字，其中七千字為聯經本所遺漏與誤植，請貴刊發表，亦請你承認一下以前所謂的「全文」是第二手的。

三、你說《反思》中引用的幾句話，「僅僅是說明柴玲曾經有過『以流血犧牲喚起民眾』的意圖，這和今日『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版本顯然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沒有斷章取義。這個說法不能成立，因為第一，我說的是「最初版本」，與後來有「有很大的不同」並不奇怪，更何況你也沒否認我後面的質疑：「五年後的今 天，胡平在《回首天安門》一文中大事渲染柴玲『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第二，你的引用也不止柴玲這一段話。譬如關於「激進革命家」，你更在斷章取義後 又偷換概念，將柴玲對知識分子的悲哀偷換為對整個中國人的抱怨。你的引用是：「五月二十八日後我越來越悲哀。……我想說，但一直不願說，但有時不得不說， 那就是，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為你獻身。」但即便聯經本中，你引用的那段話之前也有「那天我從知識界聯合會，就是昨天，回來的時候，我哭了。」有「這 些人為爭奪這權力，而發起一次一次的攻勢。我就是想說中國人，我們作為這個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殘殺了，中國的機會已經不多了。」有「我感覺到我那麼 熱愛廣場上這幾萬萬的孩子們。我有責任用我們的生命堅持到底，【以上第 317 頁】但 是我又覺得我很悲哀，我實在是無力回天。」之後更有「可是我又想到這次運動的確還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學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識界的人。」 很明顯，柴玲是將學生與某些知識分子對立起來，而你卻在刪去這些地方之後說「柴玲抱怨起了中國人」。這不是斷章取義又是甚麼？

三、你說《反思》中引用 的幾句話，「僅僅是說明柴玲曾經有過『以流血犧牲喚起民眾』的意圖，這和今日『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版本顯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沒有斷章取義。這個說 法不能成立，因為第一，我說的是「最初版本」，與後來有「有很大的不同」並不奇怪，更何況你也沒否認我後面的質疑：

「五年後的今天，胡平在《回首天安門》 一文中大事渲染柴玲『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第二，你的引用也不止柴玲這一段話。譬如關於「激進革命家」，你更在斷章取義後又偷換概念，將柴玲對知識 分子的悲哀偷換為對整個中國人的抱怨。你的引用是：「五月二十八日後我越來越悲哀。……我想說，但一直不願說，但有時不得不說，那就是，中國人我不值得為 你奮鬥，為你獻身。」但即便聯經本中，你引用的那段話之前也有「那天我從知識界聯合會，就是昨天，回來的時候，我哭了。」有「這些人為爭奪這權力，而發起 一次一次的攻勢。我就是想說中國人，我們作為這個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殘殺了，中國的機會已經不多了。」有「我感覺到我那麼熱愛廣場上這幾萬萬的孩子 們。我有責任用我們的生命堅持到底，【以上第 317 頁】但是我又覺得我很悲哀，我實在是無力回天。」之後更有「可是我又想到這次運動的確還 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學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識界的人。」很明顯，柴玲是將學生與某些知識分子對立起來，而你卻在刪去這些地方之後說「柴玲 抱怨起了中國人」。這不是斷章取義又是甚麼？

四、同樣，關於「五二一」，你的回應也證明你缺乏求實精神。《質疑》舉證說明你顛倒了當時指揮部與北高聯的重要性，以為北高聯「不負有領導廣場的同學們 的直接責任」而指揮部「負有直接責任」。你在《回應》中卻硬說「我引用的事實決無偏差，分析批評也不失為中肯周全；我看不出封從德的指責有什麼根據。」不 是很滑稽嗎？更嚴重的是，你又指控絕食團指揮部「在獲悉軍隊要鎮壓的消息後，也不和大家打聲招呼就各自躲避起來」，幾乎到了「莫須有」的程度。開希喊撤時 我在廣場上，王丹、郭海峰也在廣場上，李祿說那晚他也沒走，還有其他一些同學如王文、王超華也曾是絕食團常委。許多歷史細節確實值得討論，包括五二一還有 許多沒有公開的內情，不瞭解當時的歷史環境確實很難理解，我也一直努力出版我的備忘錄。但是，像你這樣捕風捉影橫加指責，非但於事無補，反而會妨礙對史實 的挖掘。總而言之，指揮部不僅因復食而自然失去了「領導廣場的直接責任」，而且也不是你想像的那樣都「擅離職守而獨自求生」。這麼沒有根據，怎麼還能自許 「事實決無偏差」？你「引用的事實」在哪兒？你可以幫李鵬辯護，卻指責你曾支持的學生，怎麼還能標榜「中肯周全」呢？

五、關於「五一九復食」一段，更暴露了你對八九民運驚人的無知：你一直以為宣佈戒嚴【以上第 318 頁】是 在五一九，而且是在指揮部宣佈復食之前！所以你才會反問：「絕食團指揮部既然是在宣佈戒嚴的五一九才宣佈復食即收，

這和我所說的應當在戒嚴之前收一話分明 是兩回事，前者如何能構成對後者的反駁？」且再次自許「並沒有錯」。事實上呢，正式宣佈戒嚴是在二十日十時，最早也不早於二十日凌晨四十五分，即廣場上播 放的李鵬在萬人大會上的講話。而宣佈復食是在十九日晚二十一點十五分。也就是說，宣佈復食比宣佈戒嚴至少早了三個半小時。可見你引用「第二手材料」粗心到 何種程度！而從九〇年《反思》你就一直這麼以為，其中也說「這話和事實並無出入」，自我感覺之好，又這麼「懶於求證」，令人瞠目。你能說我們的「民運理論 家」不是在為李鵬辯護？連中共都一再承認復食在戒嚴之前，而你卻對曾是「同一條戰壕裡的戰友」這麼不寬容，這大概也只能從前面提到的「政治功利意識」中尋 找答案了。

五、關於「五一九復食」一段，更暴露了你對八九民運驚人的無知：你一直以為宣佈戒嚴【以上第 318 頁】是 在五一九，而且是在指揮部宣佈復食之前！所以你才會反問：「絕食團指揮部既然是在宣佈戒嚴的五一九才宣佈復食即收，這和我所說的應當在戒嚴之前收--話分明 是兩回事，前者如何能構成對後者的反駁？」且再次自許「並沒有錯」。事實上呢，正式宣佈戒嚴是在二十日十時，最早也不早於二十日凌晨四十五分，即廣場上播 放的李鵬在萬人大會上的講話。而宣佈復食是在十九日晚二十一點十五分。也就是說，宣佈復食比宣佈戒嚴至少早了三個半小時。可見你引用「第二手材料」粗心到 何種程度！而從九〇年《反思》你就一直這麼以為，其中也說「這話和事實並無出入」，自我感覺之好，又這麼「懶於求證」，令人瞠目。你能說我們的「民運理論 家」不是在為李鵬辯護？連中共都一再承認復食在戒嚴之前，而你卻對曾是「同一條戰壕裡的戰友」這麼不寬容，這大概也只能從前面提到的「政治功利意識」中尋 找答案了。

七、關於楊巍的見證

楊巍有文字見證你在八九民運後期力主「見壞就上」，我在第二封公開信《見壞怎麼上？》中已有詳述。但楊巍見證背後還有許多故事，也值得一提。

九五年六月三日北春討論會上，我質疑你為何自己主張「見壞就上」卻批評別人「激進」，你顧左右而言它，就是不正面回答，許多人都看不下去。會後楊巍找到 我，說你在八九民運後期也曾不顧他的反對而力主「見壞就上」，更印

證了我的疑點。我在《質疑》中提到這一問題，但【以上第 319 頁】未提楊巍的名字。一來初次見面不瞭解；二來也擔心給他添麻煩。因此僅曰「據當時民聯的一位骨幹說……」。但在你主持的北春上刊出時，卻被改為「據當時的民聯骨幹楊巍說……」，又刪去二段(一九九五年七月，頁三四)。我讀到後覺得奇怪，怎麼隨意加上楊巍的名字也不徵求作者同意？又怎麼知道是楊巍的呢？寫信去問，貴社于大海回道：「……編輯部的同仁雖然一起回憶了一下，還是想不起細節。對文章作刪節在編輯部來說還屬正常，至於加上楊巍的名字，就確實有些蹊蹺了。這顯然是因為有人特意建議這樣改的，至於是誰建議的呢？現在似已難查證了。」同樣的問題也數次寫信問你，你的回信皆避而不答。

九五年六月三日北春討論會上，我質疑你為何自己主張「見壞就上」卻批評別人「激進」，你顧左右而言它，就是不正面回答，許多人都看不下去。會後楊巍找到我，說你在八九民運後期也曾不顧他的反對而力主「見壞就上」，更

印證了我的疑點。我在《質疑》中提到這一問題，但【以上第 319 頁】未提楊巍的名字。一來初次見面不瞭解；二來也擔心給他添麻煩。因此僅曰「據當時民聯的一位骨幹說……」。但在你主持的北春上刊出時，卻被改為「據當時的民聯骨幹楊巍說……」，又刪去二段（一九九五年七月，頁三四）。我讀到後覺得奇怪，怎麼隨意加上楊巍的名字也不徵求作者同意？又怎麼知道是楊巍的呢？寫信去問，貴社于大海回道：「……編輯部的同仁雖然一起回憶了一下，還是想不起細節。對文章作刪節在編輯部來說還屬正常，至於加上楊巍的名字，就確實有些蹊蹺了。這顯然是因為有人特意建議這樣改的，至於是誰建議的呢？現在似已難查證了。」同樣的問題也數次寫信問你，你的回信皆避而不答。

然而，你的《回應》卻很好地利用了對我文章的添字和刪節。你用楊巍一事來證明我的「敘述與事實不合」，即「戒嚴後，民聯內部對胡平『見壞就上』的主張深為不安，要他以民聯主席的身份向國內建議撤離廣場，卻遭到胡平的壓制。」你回應道：你其實很重視楊巍的建議，而且為了保護他，更將「通話迅速地公諸於世，可見全無壓制之意」。你迴避了楊巍反對的「見壞就上」，只說他有「幾點建議」。雖然你聲稱「以為他的建議不錯」，但也承認「沒有答應他以民聯總部的名義向學生們正式提出這些建議」。我實在看不出我的引述（注意並非「敘述」）哪一點「與事實不合」？

這裡，你又兩次偷換了概念。即把我引述中的兩個概念的外延偷偷縮小：

一是將民聯內部深為不安的胡平見壞就上的「主張」偷換為你那篇《見壞就上，見好就 收》的文章；一是將要你以民聯主席的身份向國內發出的撤離廣場的「建議」偷換為你所公諸於世的和楊巍的「通話」。【以上第 320 頁】將「主張」偷換為「文章」，你當然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對我那篇文章，我並未聽到民聯內部有誰表示過反對意見」；將「建議」偷換為「通話」，你就更有道理：「把和楊巍的通話迅速地公諸於世，可見全無壓制之意」。因此，我的引述也就「與事實不合」了。

這裡，你又兩次偷換了概 念。即把我引述中的兩個概念的外延偷偷縮小：一是將民聯內部深為不安的胡平見壞就上的「主張」偷換為你那篇《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文章；一是將要你以民 聯主席的身份向國內發出的撤離廣場的「建議」偷換為你所公諸於世的和楊巍的「通話」。【以上第 320 頁】將「主張」偷換為「文章」，你當然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對我那篇文章，我並未聽到民聯內部有誰表示過反對意見」；將「建議」偷換為「通話」，你就更有道理：「把和楊巍的通話迅速地公諸於世，可見全無壓制之意」。因此，我的引述也就「與事實不合」了。

然而，這無異於掩耳盜鈴：楊巍當時在國內，不可能馬上看到和反對你的文章，但他反對你「見壞就上」，而且還認為當時民聯內部反對你「見壞就上」的不止他 一個。實際上，如果不將「主張」偷換成「文章」，就勢必把楊巍排斥在「民聯內部」之外。此其一。其二，楊巍的「建議」可不止五二三被你「公諸於世」的那一 次「通話」，從五二二到五二五，你們有四次通話，尤其是最後兩次，楊巍聽你說應該「見壞就上」，急得大叫：「只怕是越上越壞啊！」又悲愴地說：「胡平，流 血的危險依然嚴重存在，流血之後將是倒春寒。」他說：到這時，我算是證實了我一直在懷疑的事：胡平等人根本不同意發談判呼籲。（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八月頁 九一；及拙文《見壞怎麼上？》）你對楊巍的這些記載一直沒有回應，包括《回應》這裡提到楊巍一事也無澄清，看來是默認了。默認，但避而不談，還偷換概念， 又反過頭來指我「引述與事實不合」。豈有此理。

再說，你將通話登報前後的做法，實際上楊巍及其家人也非常不滿意。有人指你「為了出名不擇手段」，利用自己的地位與國內剛出獄的異議人士通話，卻常常在 未徵求對方同意的情況下拿到西方媒體作為對談發表，同王丹如此，同魏京生如此，同楊巍也如此。（曹常青，中春一九九六年三月，頁九一）我也未見你駁正。實 際上，對我的《回應》中你也承認，「楊巍的妹夫【以上第 321 頁】擔心這段報導會給楊巍招致危險。」你回答說公開通話內容是為了保護楊巍。

但是，楊巍的親人怎麼看呢？曹曾是你的好友，但他卻說：

再說，你將通話登報前後 的做法，實際上楊巍及其家人也非常不滿意。有人指你「為了出名不擇手段」，利用自己的地位與國內剛出獄的異議人士通話，卻常常在未徵求對方同意的情況下拿 到西方媒體作為對談發表，同王丹如此，同魏京生如此，同楊巍也如此。（曹常青，中春一九九六年三月，頁九一）我也未見你駁正。實際上，對我的《回應》中你 也承認，「楊巍的妹夫【以上第 321 頁】擔心這段報導會給楊巍招致危險。」你回答說公開通話內容是為了保護楊巍。

但是，楊巍的親人怎麼看呢？曹曾是你的好友，但他卻說：

……當時楊巍的妻子車少莉是民聯聯委委員，從打字員那裡得知消息非常震驚，立即打電話給胡平，認為發表「通話」，會給身在國內的丈夫帶來危險，要求不要 發表，並懇求胡平說，如果楊巍是你的弟弟，你能不考慮他的安全嗎？胡平竟回答說：有的人要當烈士，別人不能拒絕。隨後把「通話」發表在次日的紐約《世界日 報》上。車少莉後來退出民聯，從此不再參加民運，這是原因之一。而楊巍在美國的妹夫見到報上刊登的「通話」後，給胡平打來電話，也認為這樣做「會給楊巍招 致危險」。胡平不僅沒有任何歉意，還搪塞說，只有公開發表通話，才能更好地保護楊巍。（同上）

「有人要當烈士，別人不能拒絕」與「公佈是為了保護楊巍」，二說法相距甚遠。未見你的澄清，大概又是默認了。難怪楊巍及其家人對你有那麼大的情緒。按：查「歷屆民聯代表大會選舉結果」，車少莉在八八年一月的三大當選總部委員，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四大以後均不再現。

極其有趣的是，你又重複了蒙混過關的手法，建議我「查閱一下當年那份報導，相信會改變自己的看法。」好像你真的有根有據。但我數次寫信索求，你卻從來不屑於回答，不知有否誠意。

最後，胡先生，可以告訴你一個情況：我向楊巍求證了整整兩年，也沒輕易引證。收到他的原文，證實你確曾堅持「見壞就上」，並獲准引用，也都一直未用。後 來得知該文已發表過，但連載中關鍵的一篇卻一直找不到。九七年六四在紐約找到後才放心引用，加進《見壞怎麼上？》【以上第 322 頁】中。談這一情況是說明：一是擔心以不實之辭傷害你，二也無意急於抓你的辮子。而楊巍也一再對我說，雖然他對你有意見，但還是朋友，還是常見面，還是佩服你的一些文章。

最後，胡先生，可以告 訴你一個情況：我向楊巍求證了整整兩年，也沒輕易引證。收到他的原文，證實你確曾堅持「見壞就上」，並獲准引用，也都一直未用。後來得知該文已發表過，但 連載中關鍵的一篇卻一直找不到。九七年六四在紐約找到後才放心引用，加進《見壞怎麼上？》【以上第 322 頁】中。談這一情況是說明：一是擔心以不實之辭傷害你，二也無意急於抓你的辮子。而楊巍也一再對我說，雖然他對你有意見，但還是朋友，還是常見面，還是佩服你的一些文章。

八、其它一些細節

關於你《回應》中提到的對阮銘先生的回應、對柴玲錄像的分析、對丁子霖老師文章的引用，我在別的文章中已有詳述；加上其它一些細節，這裡一並簡答如下。

一，你用「和阮銘一樣，封從德沒有分清在我的有關文字中，哪些話是我自己的主張，哪些話是我對別人提出的一種可能性作出的理論分析」來搪塞我對你曾堅持 「見壞就上」的質疑，和你回應阮銘先生的一樣，是在公然賴帳。詳見第二封公開信《見壞怎麼上？》「三變之二：賴帳不認『見壞就上』」。

二，我對柴玲的五□二八講話所作的背景介紹，可不僅僅是我「自己的一套解釋」。這套「解釋」有旁證，如金培力、梁淑英，還有王力和一位女僑。詳情可參考 拙文《柴玲沒有「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至於「小人之心」，是對一些不顧史實，始終以為柴玲打算偷偷溜走的人說的。而《回應》卻還在說：「柴玲講話最 引人非議的一點是：為什麼她明知堅守廣場會導致流血並打算自己求生的同時，卻不向她所領導的廣大同學講明。恰恰是在這一點上，不論是柴玲自己，還是為她辯 護的封從德等人卻避口不談。」但我的文章回顧的情況，你都看過嗎？請弄清【以上第 323 頁】事實再批評。

二，我對柴玲的五□二八 講話所作的背景介紹，可不僅僅是我「自己的一套解釋」。這套「解釋」有旁證，如金培力、梁淑英，還有王力和一位女僑。詳情可參考拙文《柴玲沒有「讓別人流 血，自己逃生」》。至於「小人之心」，是對一些不顧史實，始終以為柴玲打算偷偷溜走的人說的。而《回應》卻還在說：「柴玲講話最引人非議的一點是：為什麼 她明知堅守廣場會導致流血並打算自己求

生的同時，卻不向她所領導的廣大同學講明。恰恰是在這一點上，不論是柴玲自己，還是為她辯護的封從德等人卻避口不 談。」但我的文章回顧的情況，你都看過嗎？請弄清【以上第 323 頁】事實再批評。

三、你也誤解了丁子霖老師的文章。丁老師九六年的六四祭文說：「我發現，我兩年前的那段話竟一再被某些民運理論家引用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似乎我也是主張 把運動導致鎮壓的後果歸咎於激進派學生的。這完全是一種誤解。」「現在去爭論運動是否『激進』，是否需要『見好就收』，以及學生領袖的功過究竟應該是『三 七開』還是『二八開』之類問題，總讓人有一種『隔』的感覺。」「我不知道爭鳴者能拿出什麼有分量、有說服力的事實去同別人爭鳴。比如有爭鳴者說如果當時學 生能『見好就收』就可以避免流血，我就覺得此論缺乏有力的事實根據。」不知你作何感想？我對此寫了一篇文章寄給貴社也被壓（《讀丁子霖老師「六□四」七週 年祭文有感》）。

四、關於「激進」。你說吾爾開希只是「被動激進」，那他發動絕食、公開對記者說「學運也要利用黨內鬥爭」、五一九還想當總指揮、五二七又自薦「人民發言 人」、直到六三還趕到廣場爭當副總指揮、晚上又在廣播站呼籲「堅守廣場，與廣場共存亡」……你又怎麼解釋呢？你認定「激進與穩健兩派之分乃不容否認的事 實」，雖然沒明確講過「不撤=激進，撤=穩健」，但除了喊撤，你還有甚麼根據把他和「主動激進」區分開來呢？只有一個例外：你說五一八與李鵬「對話」中， 吾爾開希說了「廣場上是多數服從少數」，因此是「為了遷就更激烈的少數同學」。然而，王丹在「對話」中馬上糾正他，說剛有統計，「百分之九十九□九的同學 投票表示不撤離廣場」，那麼照你的邏輯王丹不就成了十足的「主動激進」了？我《質疑》中也舉了另外幾人的例子，你也有誤解，這裡就不多說了。【以上第 324 頁】

五、我在任何文章中都沒有「指責別人是叛徒，是野心家」。你說「封從德否認八九民運中有激進派與穩健派兩 種策略之爭，但他又附和柴玲五□二八講話，一味指責其它學生領袖是『野心家』」，倒像是故意為我提供一個「客觀上是在學運骨幹中製造分裂與敵對」的證據 了。另外，你揶揄說：「即便我們想說封從德不是激進派，只怕他本人也堅決不答應。」但我在五四後辭職復課做論文，五一三也沒參加絕食，五二六支持以「空校 運動」撤，五二七在首聯會上贊同五三〇撤，六四凌晨主持口頭表決果斷宣佈撤離，你又作何詮釋？我既無意標榜「穩健」，也不否認曾經「激進」，而這樣截然二 分本來就是問題。我反對的是你在不瞭解實情就妄作論斷，尤其是你採用雙重標準，對自己曾經力主「見壞就上」的事實不但從無反省還公然抵賴。

九、誤解和曲解

最後簡要澄清二個被你誤解和曲解的概念。

一、「新民主啟蒙運動」是針對八九學運說的，你的回應誤解為對整個民運：「封從德堅持把八九民運定位為『新民主的啟蒙運動』」，說是引用六□三會上我的 發言。但我兩次提到的都是「八九學運」。其一，「學生運動的基本定位是一場新民主啟蒙運動，不是一場政治運動。我們既不是希望李鵬下台，也不是希望趙紫陽 上台，而這是社會其他階層根據他們的政治需要可以去作的。學生的基本的定位只是為民請願。」其二，「當時的學生運動一直把它定位成是一種【以上第 325 頁】新民主的啟蒙運動，所以我們覺得能夠達到一種啟蒙的效果，那麼才能夠解釋我們為什麼會堅持在廣場。」因此，你把「學運」偷換成「民運」後的一番議論就顯得無的放矢。另外，你說「言下之意是，只要發揮了啟蒙的作用，其餘一切均可不計。」是對我的意思的隨意延伸，也屬曲解。

一、「新民主啟蒙運動」是針對八九學運說的，你的回應誤解為對整個民運：「封從德堅持把八九民運定位為『新民主的啟蒙運動』」，說是引用六□三會上我的發言。但我兩次提到的都是「八九學運」。其一，「學生運動的基本定位是一場新民主啟蒙運動，不是一場政治運動。我們既不是希望李鵬下台，也不是希望趙紫陽上台，而這是社會其他階層根據他們的政治需要可以去作的。學生的基本的定位只是為民請願。」其二，「當時的學生運動一直把它定位成是一種【以上第 325 頁】新民主的啟蒙運動，所以我們覺得能夠達到一種啟蒙的效果，那麼才能夠解釋我們為什麼會堅持在廣場。」因此，你把「學運」偷換成「民運」後的一番議論就顯得無的放矢。另外，你說「言下之意是，只要發揮了啟蒙的作用，其餘一切均可不計。」是對我的意思的隨意延伸，也屬曲解。

二，關於「二元對立」與「鬥爭哲學」的關係，你的回應也有誤解，對此需要多說幾句。我們知道，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對立觀念植根於希伯來宗教信仰，比如上帝 與魔鬼、天堂與地獄等等的對立。中世紀的歐洲經院哲學家們首先就是神學家，自然走不出這一思維模式；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之後，哲學家們雖然逐步獨立於教 會，但這一思維模式依舊，其理論更發展到頂峰，即黑格爾哲學。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探討人們思考所用的根本概念，最普遍的是關係，而一切關係中最普遍的則 是相反的關係，即對立。於是就有了黑格爾辯證法：各種思想和事物按照「正－反－合」(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的規律， 本身都蘊含其反面，正反相抗，終於新生力量戰勝舊勢力，達到一更高的「正」面，如此往復而發展下去。黑格爾是路德派新教徒，在《歷史哲學》中頌揚國家，高

標德意志民族，而國家與民族的觀念正是歐洲北方新教幫主們用來對抗羅馬教廷與拉丁民族的有力武器。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只是將「民族」換成「階級」，再加上唯物論和進化論，便形成了「辯證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所以說共產黨的鬥爭哲學源於二元對立觀。

回到我們的爭論。我質疑你「要在八九學運中尋找『激進派』和『穩健派』的決然對立，客觀上是在學運骨幹中製造分裂與敵對，用一種斷然的二分法來形成二元對立，從理論的深處【以上第 326 頁】講， 並沒有跳出共產黨的『鬥爭哲學』」。你的回應引用這段話時故意漏掉「二元對立」那一句，然後說「共產黨鬥爭哲學的基礎並非歧異或多元，而是統一、一致。」 顯然沒有明白共產黨的統一並非將二元統一起來，而是用統一的一元去消滅另一元。你接著又說，共產黨「認定在人民內部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它才把任何不同的政 見都打成敵對勢力而堅決鎮壓。」說明你也瞭解其「統一」正是為了「對立」，卻又強詞奪理，思路實在混亂。這裡導致歧解的根源又是偷換概念，即不提我說的 「二元」，卻改頭換面成「多元」，再自說自話。我不明白，偷換概念如此頻繁，到底是你明知故犯呢，還是真的糊塗？或兼而有之？

回到我們的爭論。我質疑你「要在八九學運中尋找『激進派』和『穩健派』的決然對立，客觀上是在學運骨幹中製造分裂與敵對，用一種斷然的二分法來形成二元對立，從理論的深處【以上第 326 頁】講， 並沒有跳出共產黨的『鬥爭哲學』」。你的回應引用這段話時故意漏掉「二元對立」那一句，然後說「共產黨鬥爭哲學的基礎並非歧異或多元，而是統一、一致。」 顯然沒有明白共產黨的統一並非將二元統一起來，而是用統一的一元去消滅另一元。你接著又說，共產黨「認定在人民內部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它才把任何不同的政 見都打成敵對勢力而堅決鎮壓。」說明你也瞭解其「統一」正是為了「對立」，卻又強詞奪理，思路實在混亂。這裡導致歧解的根源又是偷換概念，即不提我說的 「二元」，卻改頭換面成「多元」，再自說自話。我不明白，偷換概念如此頻繁，到底是你明知故犯呢，還是真的糊塗？或兼而有之？

實際上，你的「見好就收」論正是作為「統一、一致」的真理來要求八九民運的。你反覆強調「八九民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對『見好就收』缺少共識」，即缺乏思 想上的統一和一致。這種思維模式怎麼能說跳出了共產黨的框限呢？你有沒有想過：要求八九民運在戒嚴前在三天內達到「共識」並做到「見好就收、見壞就上」， 除了一套嚴密而集權的組織和一群「全黨服從中央」的群體，誰還

能辦到？而這本身既不現實，也不民主，反倒像一群「小共產黨」，忽略了的，恰恰是「少數服從 多數」的民主原則。要知道，一個自由的群體是難以在倉促間達成共識的，而民主原則正是解決沒有共識的情況下的一個有效辦法，那怕多數人的選擇並非最佳。作 為「民運理論家」，這點民主常識你應該是瞭解的，但遇到具體問題時又糊塗了，能不說是這種黑白二分、責求統一的「共產黨鬥爭哲學」的思維模式在作怪？而你 當年主要鼓動「見壞就上」，事後又苛責「見好就收」，這與中共出爾反爾的行為，在「現實政治功利意識」這一點上不是也有某些相【以上第 327 頁】似之處嗎？

實際上，你的「見好就收」 論正是作為「統一、一致」的真理來要求八九民運的。你反覆強調「八九民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對『見好就收』缺少共識」，即缺乏思想上的統一和一致。這種思維 模式怎麼能說跳出了共產黨的框限呢？你有沒有想過：要求八九民運在戒嚴前在三天內達到「共識」並做到「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除了一套嚴密而集權的組織和 一群「全黨服從中央」的群體，誰還

能辦到？而這本身既不現實，也不民主，反倒像一群「小共產黨」，忽略了的，恰恰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要知道， 一個自由的群體是難以在倉促間達成共識的，而民主原則正是解決沒有共識的情況下的一個有效辦法，那怕多數人的選擇並非最佳。作為「民運理論家」，這點民主 常識你應該是瞭解的，但遇到具體問題時又糊塗了，能不說是這種黑白二分、責求統一的「共產黨鬥爭哲學」的思維模式在作怪？而你當年主要鼓動「見壞就上」， 事後又苛責「見好就收」，這與中共出爾反爾的行為，在「現實政治功利意識」這一點上不是也有某些相【以上第 327 頁】似之處嗎？

最後，回到開頭引用你的話，希望我們「拋開個人得失之心，面對真理，面對未來」，「只要別人講的有道理，我們就應該欣然接受；別人有幾分正確，我們就該承認幾分。」

（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稿於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修訂於巴黎。作者按：本文曾投給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結果既未發表，也不說明理由。）【以上第 328 頁】

第四輯：反思中的困惑

【以上第 329 頁】

反思中的困惑－－八九學運之我見

在「六四」二週年之際，謹將一些零散的思考整理成文，獻給那些為中國的自由與富強而堅持信念的人。

一、「新啟蒙」心態是理解學生運動的關鍵－－八九學運的主旋律

八九學運中的學生，自視為五四青年的後繼，要完成七十年前的同仁所未竟的事業，於是將自己的歷史使命認定為發起一場「新啟蒙運動」。不管這種自作多情是否這場運動的實質，但這卻至少是運動中的主旋律，學生們自始至終不斷在心底或大字報中哼唱，且有形形色色的變奏曲。

主題變奏之一－－不參與黨派之爭。啟蒙的對象是民眾，試圖通過老百姓的覺醒來解決中國民主化的根本問題。因此，學生的政治追求的著眼點是長遠的、整體上 的改造，是制度的更替，與誰在台上沒有多大關係（至少當時大家這麼想）。許多學生對中共領導層一概不信任，包括趙紫【以上第 330 頁】陽。在北京的趙紫陽與在海外媒體上的趙紫陽是兩個人，差距很大，正如戈爾巴喬夫一樣。有個同學說得最形象：「我們不是為了讓一批飽鬼下台，又讓一打餓鬼上台！」

主題變奏之一——不參與黨 派之爭。啟蒙的對象是民眾，試圖通過老百姓的覺醒來解決中國民主化的根本問題。因此，學生的政治追求的著眼點是長遠的、整體上的改造，是制度的更替，與誰 在台上沒有多大關係(至少當時大家這麼想)。許多學生對中共領導層一概不信任，包括趙紫【以上第 330 頁】陽。在北京的趙紫陽與在海外媒體上的趙紫陽是兩個人，差距很大，正如戈爾巴喬夫一樣。有個同學說得最形象：「我們不是為了讓一批飽鬼下台，又讓一打餓鬼上台！」

主題變奏之二－－「看看人民的表情」。《絕食書》原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在生與死之間，我們還要看看人民的表情－－我們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

這是在絕食之前，我們這批自視為啟蒙者的學生真實的受挫心態。

主題變奏之三－－堅守廣場、不怕犧牲。既然是啟蒙，那麼宣傳的強度與廣度自然是越大越好。由此才能理解學生們為何選擇絕食、絕水、等待屠殺，也

才能理解 為何要到天安門、在上千記者前將學生運動擴大到社會運動。廣場上縈繞在我心中的一個觀念是：廣場大旗不能倒，堅持一分鐘，就會引起一萬人的醒覺。潛在的思 路是：中國人從來都為了生計而麻木了人性自尊，只有通過一個最強烈的信號才能促使他們思考－－「在廣場上畢竟還有那麼一批學生敢於造反，為甚麼？」因此， 從直覺與感情上，我們不願撤離廣場，而情願等待屠刀。

二、為何要撤？－－道德勇氣的淪喪？

與堅持廣場、不怕犧牲相悖的事實是：學生最後和平撤離了廣場。從各方面的統計看，犧牲最大的是市民，「學生領袖」還沒聽說有誰傷亡。作為局中人，我難以對道義問題自加評說，因此將當時心理歷程作個紀錄，由大家論斷。【以上第 331 頁】

六月四日凌晨的去留表決，是由我主持的。雖然當時(凌晨四點半)情形已十分緊迫，但我自認為自己還很冷靜，甚 至在士兵掃射紀念碑上的喇叭時，我還沒有怎麼驚動。心中明白，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到了。紀念碑的最後的情況，侯德健在九〇年六月已講了很多。基本屬實，只 有兩點需要澄清：一、我自己沒有聽說過甚麼「等候趙紫陽到天亮」的傳言；二、侯德健等人是作為第三方去與軍方談判的，走之前我向他強調過不能代表指揮部。

主持口頭表決，是在我至今也不明白的一種召喚下作出的。因為當時我對廣場上的危急程度並不知情，甚至沒有去想它，心中有種感應，像是有個聲音在說，必須立即作個表決。當時，「四君子」已在廣播中勸了大家很久，不作表決無法統一思想與行動。

口頭表決的結果，我感覺是喊「留守」與喊「撤離」的聲音一樣高，但是，基於如下判斷，我在短暫的停頓後，果斷地宣佈了撤離，這是我一生中最為果斷的一次。

（1）以往的經驗與觀察告訴我，在有一半人想跑的情形之下，我們這個整體是沒有戰鬥力的。我擔心出現這樣的局面：同學的死傷不是因為槍彈，而是大家在奔逃中擠、踐踏而致。我更擔心中共將這種混亂的場面拍攝下來，而給運動抹黑。

（2）從心理上分析，喊「撤離」的同學必然不如喊「留守」的同學那麼理直氣壯，因此，我估計願走的人更多。

（3）這最後三、五千同學，是未來中國民主之光，我實在不願他們為了某種政治功利而犧牲。他們來自全國各地，二十年之後，這些新思維的種子一定能夠開花、結果。這是「新啟蒙」的另【以上第 332 頁】一重變奏。

（3）這最後三、五千同學，是未來中國民主之光，我實在不願他們為了某種政治功利而犧牲。他們來自全國各地，二十年之後，這些新思維的種子一定能夠開花、結果。這是「新啟蒙」的另【以上第 332 頁】一重變奏。

三、阻撓五□一四對話－－我最大的過失

絕食第二天，五月十四日，統戰部長閻明復與代表中共等真的學生代表們對話，是可能將學運引向良性發展的一次重要機會。對這次機會的認識，是在九〇年十月在舊金山與吾爾開希的交談中才明白的，這才在恍然大悟中，深深地自責自己當時的自負。

五月十四日早晨，我將自己在北大製的「絕食」大黑旗送到廣場後，便投入了廣場上第一個廣播站的籌建工作，借了一個香港記者的一千多元人民幣跑了一個白 天。下午廣播站建好，自然由我主持，這時絕食同學驚惶地聽說已有同學在與官方對話了。這顯然違背了絕食者的意願，第一，不是公開的（電視直播），第二，沒 有徵得絕食者的認可。這時，我和廣播站便投入了阻撓對話的行列，先後三次派代表去召回對話同學。我在自行以為堅持民主原則的激昂中，犯下了不可彌補的失 誤。

缺乏溝通，彼此不信任，是這場運動的悲哀，深究其原因，除了運動的偶發性、自發性和倉促性之外，也同當時組織結構上權力分散、模糊有關。

我在運動中還有許多過失，包括在北大籌委會時過分強調民主機制，反而使它的行政效率太低；在北高聯任職期間，沒能主持好五四大遊行的工作，致使周勇軍在莫名其妙中宣佈了復【以上第 333 頁】課 ；而我卻在五四之後，在一種受挫的情緒中辭職，從此對北高聯採取不合作甚至排斥的消極態度；在廣場後期沒能意識到學生成分的變化所需的組織調整，而把精力 過多地投入到整頓財務上了。另外，對媒體的排斥傾向，也很不利於這場運動，雖然我們的初衷只是力圖避免重蹈魏京生的覆轍。

我在運動中還有許多過失，包括在北大籌委會時過分強調民主機制，反而使它的行政效率太低；在北高聯任職期間，沒能主持好五四大遊行的工作，致使周勇軍在莫名其妙中宣佈了復【以上第 333 頁】課 ；而我卻在五四之後，在一種受挫的情緒中辭職，從此對北高聯採取不合作甚至排斥的消極態度；在廣場後期沒能意識到學生成分的變化所需的組織調整，而把精力 過多地投入到整頓財務上了。另外，對媒體的排斥傾向，也很不利於這場運動，雖然我們的初衷只是力圖避免重蹈魏京生的覆轍。

四、歷史的悲哀

中國的民主運動，歷來缺乏歷史繼承性，這是專制者的輝煌。每一次都幾乎從頭再來。八九學運的思想深度，是不及七九年的民主牆運動，而且幾乎沒有甚麼繼 承，這是我最近讀了魏京生辯護實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之後的很深感觸。一九八九年許多同學不知道魏京生是何人，另一個民主牆先驅任畹町更是受 到同學們刻意的「劃清界線」。

我們缺乏組織經驗的指導，柴玲因為聽取了民盟一個人的建議，就把北大籌委會的秘書處搞得很有聲色。但更多的組織過程是沒有這樣具體指導的。

我們缺乏思想理念的指導。民主與民主主義我們分不清；權力相對集中的必要性只是在泛民主傾向太過、行政效率太低之後才摸索出來的(如我在一次籌委會改選中提出要求緊急狀態下的「獨裁權」問題)；我們在主持了務實會之後，又不得不主持務虛會……

我們缺乏價值體系和信仰。在作原則性重大抉擇時，我們發現自己的任何判斷都沒有一套【以上第 334 頁】堅實的價值體系作依托，更沒有信仰的力量來支持，只是在一堆矛盾的兩難利弊中避重就輕。

我們缺乏價值體系和信仰。在作原則性重大抉擇時，我們發現自己的任何判斷都沒有一套【以上第 334 頁】堅實的價值體系作依托，更沒有信仰的力量來支持，只是在一堆矛盾的兩難利弊中避重就輕。

我們這一代，是在開放環境下長大的一代，照時髦的說法，是「長大的一代」，而不是「嚇大的一代」。但是，我們失落了信仰的根本，對傳統的華夏文明，我們 聽從了知識分子從五四就開始的拋棄態度，沒有幾個學生能體味琴、棋、書、畫之美，沒有一本教科書宣揚人生的修養；對西方現代文明，我們只有幻覺中的渴望， 更無真正的根基紮在心底。四十年的黨文化，將一切其他信仰摧殘，僅存的共產主義，卻已經在開放之後完全失落了。

我願以自己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的辭職書中的一句話(大意)作為本文的收筆：「這場運動，必須由像我這樣一批對社會缺乏認識，又沒有受過法律、政治等方面系統訓練的學生來領導，這個事實本身，實在是歷史的悲哀。」(一九九一年五月於巴黎)【以上第 335 頁】

八九學運中的派系淵源與組織問題

八九學運中的派系淵源與組織問題

鑒於作者親身參與了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對學生組織內部的形成，與發展有相當的經歷，謹藉「六四」二週年之際，向公眾作個說明，以使大家對於當時眼花繚亂的眾多組織有一個更深入的認識。

一、學運之前

學運之前，我在北京只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理科學生。雖然八七年元旦在天安門廣場上學生與軍警的衝突中，我也是被捕的三十四名同 學之一(當時共抓八十二人)；八八年六月的北大流產學潮中，也在一種激昂的情緒中參加過「行動委員會」，但可以說，那兩次我還只是一個「熱心的旁觀者」， 自己的行為完全是依從直覺與良知判斷；熱情隨學【以上第 336 頁】潮的迅猛漲潮而升高，也隨學潮迅速的退潮而衰退。對中國社會完全失望，既不感到自己在社會中有甚麼政治地位，又對假大空的政治宣傳厭惡透頂，以至於對一切爭論不休的社會問題都不感興趣。

學運之前，我在北京只 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理科學生。雖然八七年元旦在天安門廣場上學生與軍警的衝突中，我也是被捕的三十四名同學之一(當時共抓八十二 人)；八八年六月的北大流產學潮中，也在一種激昂的情緒中參加過「行動委員會」，但可以說，那兩次我還只是一個「熱心的旁觀者」，自己的行為完全是依從直 覺與良知判斷，熱情隨學【以上第 336 頁】

潮的迅猛漲潮而升高，也隨學潮迅速的退潮而衰退。對中國社會完全失望，既不感到自己在社會中有甚麼政治地位，又對假大空的政治宣傳厭惡透頂，以至於對一切爭論不休的社會問題都不感興趣。

因此，雖然王丹、楊濤等同學辦的「民主沙龍」已在北大活躍了一年，我竟毫不知情，其孤陋寡聞如是。因此，我對八九學運之前的組織脈絡沒有甚麼發言權。最能說明我對這些組織的無知的，是在學運之初，我們在「北大籌委會」中甚至差點將王丹除名。

雖然在運動之前我對活躍在北大的社團毫不知情，但在運動中還是有一些經驗使我對那時的組織淵源略有了解。加上最近撰寫回憶時參閱的大量資料多與這些經驗相印證，因此，就學生組織這一方面，我還是有一些基本概貌的認識。

學運之前，活躍在校園中的學生社團可算是五花八門。比如王丹、楊濤等人的「民主沙龍」、沈彤等人的「奧林匹亞研究院」、開希說在北師大還有一個未註冊的「孔子學會」，李錄在南京大學也是社團活躍分子。

二、學運之初(四月十五日—十九日)

這時在暗中引導學運的最重要的團體正是「民主沙龍」。理由如下：

１、王丹是這一階段中幾次「新華門請願活動」的主角。「北大請願七條」由他首先提出；【以上第 337 頁】他與北大前研究室生會主席李進進(被中共判

處四年徒刑，近釋放)及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被判四年)是當時大家推出的三個學生代表。

1、王丹是這一階段中幾次「新華門請願活動」的主角。「北大請願七條」由他首先提出；【以上第 337 頁】他與北大前研究室生會主席李進進(被中共判處四年徒刑，近釋放)及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被判四年)是當時大家推出的三個學生代表。

2、四月十七日在北大三角地發起的一次(悼胡募捐)活動，我印象中也是「民主沙龍」倡導的。

3、四月十八日清晨，王丹從廣場附近打電話回北大給方勵之的夫人李淑嫻(北大物理系副教授，北京海淀區人大代表，頗受北大同學愛戴)，告知請願同學在連 續二十四小時饑寒交迫的困境中，請求北大同學起來支持。上午，李老師便在三角地貼了一張題為《廣場上傳來的電話》的小通告。我和柴玲正是受這個通告的引 導，才逐步捲入了學運。

4、「民主沙龍」最具影響力的一個動作，是導致了第一個學生的自治組織－－「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的成立。

三、「北大籌委會」成立之初的情形(四月二十—二十二前後)

四月十九日中午，我在北大三角地見到一張通告，召集北大同學在當天晚上十點半在三角地聚會討論學運方向。不知是這個通告未署名還是我沒留心，當時我完全 沒有注意到這是甚麼「民主沙龍的第十六次聚會」。正是在這晚的聚會上，二千北大同學宣告成立自己的組織。這時，大家都認識到以往的學潮失敗的一個根本原因 就是大家沒有組織起來。【以上第 338 頁】

北大籌委會從一開始就是非常注意民主程序的組織，這一點從她的名稱上就可看出。我是這晚受眾人信託的八名委 員之一。當時我們提出這個組織的任務是：運動期間領導學運；運動結束，則籌備自治學生會的選舉工作。因此，我們自限是一個「籌備委員會」，且規定籌委會成 員不得參加未來的自治學生會的競選，從一開始就限制任何人的投機企圖。

北大籌委會是我至今所見到過的民運團體中，民主氣氛最濃、民主機制最完善的一個。但是，這種顯得有點過於廣泛的民主形式，並不十分適應運動時期的緊迫性 和對組織效率的要求。從長遠來看，北大籌委會基本上沒有出現過大的政策性失誤；但從當時局部的效率看，則很不令人滿意。這是一個矛盾：要民主形式的穩定性 還是要集權形式的暫時效率？這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這批缺乏組織經驗的學生骨幹層。

北大籌委會的廣泛民主形式與北大不迷信權威的性格有關。北大的學生運動從來都是多元的。實際上，四月十九日晚的這個「成立大會」，也不是「民主沙龍」的那批同學能夠操縱得了的，他們當時確有此意圖，但是，結果他們幾乎差

點被其他派系擠走。

當時學生中的派系，我以為主要有四個：一是「民主沙龍」；二是其他社團如「奧林匹亞研究院」的沈彤等人；三是學生會派的，這又有積極與消極之分：積極的 如前研會主席李進進和競選過研會秘書長的張志勇，他們後來都起了很大作用；消極的則是跟著官方走的那些學生權貴，他們實際上也同情學運，只不過有利益衝突 而不願捲入；四是如我一般的逍遙派，無黨無派，毫無背景，這類人還有如熊焱、柴玲、郭海峰等。【以上第 339 頁】第四種人在組織內實際佔了大多數，以至於我們在運動初期在一種無知中，差點將王丹除名，原因是他老不來開會。（現在分析起來，這是符合他作為學生和知識界的橋樑這樣的角色的。當時，他忙得四腳朝天，奔波於籌委會與各樣的知識分子之間。）基於這一經驗，我完全相信這場運動的自發性。因為即使是那些有準備、想引導學運的組織和個人，實際上在運動的運作過程中影響極有限。這是反證（我們的經歷則是正面證據）。

當時學生中的派系，我以為主要有四個：一是「民主沙龍」；二是其他社團如「奧林匹亞研究院」的沈彤等人；三是學生會派的，這又有積極與消極之分：積極的如前研會主席李進進和競選過研會秘書長的張志勇，他們後來都起了很大作用；消極的則是跟著官方走的那些學生權貴，他們實際上也同情學運，只不過有利益衝突而不願捲入；四是如我一般的逍遙派，無黨無派，毫無背景，這類人還有如熊焱、柴玲、郭海峰等。【以上第 339 頁】第四種人在組織內實際佔了大多數，以至於我們在運動 初期在一種無知中，差點將王丹除名，原因是他老不來開會。（現在分析起來，這是符合他作為學生和知識界的橋樑這樣的角色的。當時，他忙得四腳朝天，奔波於 籌委會與各樣的知識分子之間。）基於這一經驗，我完全相信這場運動的自發性。因為即使是那些有準備、想引導學運的組織和個人，實際上在運動的運作過程中影 響極有限。這是反證（我們的經歷則是正面證據）。

另外，據常勁（北大籌委會副主席，現居美國）回憶，北大籌委會成立第二天，四月二十日，王丹和楊濤曾提出辭職，原因是認為第二、三類同學不信任他們。北大籌委會內部的派系矛盾雖從一開始就存在，但在民主的原則與程序之下，還有能很好地分工合作。這更像是一種競爭關係。

北大籌委會經歷的第一次重大危機是四月二十四日在北大五四操場上召集

的全體學生大會。近萬名同學起來參加這個盛會，卻失望地看到台上籌委會的不成熟表現 和內部矛盾的公開化。這次矛盾的大爆發，是發生在第三、四類同學之間的。熊焱在台上高聲宣稱：「張志勇，是研會派來的奸細!」會場立即大亂，同學們以離場 來表示失望。

熊焱是個好義勇為的湖南人，容不得一點苟且。但是，後來的事實卻說明他太激動而判斷失誤。限於篇幅，有關詳情，按下不表。

在運動初期，北大籌委會代理了全市範圍的學運領導角色。最成功的是四月二十一晚至二十二日的遊行、靜坐請願活動。當時有三個原因。一是為了悼胡耀邦，二 是為了請願，三是為了抗議「四□二〇血案」。這時的北大已經率先發動罷課，籌委會的外聯部有上百名糾察隊員充當【以上第 340 頁】與 各校的聯絡員。四月二十二日三名學生代表長跪在人大會堂東門台階上，左邊是周勇軍(政法大學學生，被判四年)，右邊是張志勇(下落不詳)，中間是當時北大 籌委會的第二任召集人郭海峰(被判四年)，他手中高托的請願書正是「北大七條」，經籌委會通宵討論修正，由我找人書寫後小心翼翼地捧著到廣場上。

在運動初期，北大籌委會 代理了全市範圍的學運領導角色。最成功的是四月二十一晚至二十二日的遊行、靜坐請願活動。當時有三個原因。一是為了悼胡耀邦，二是為了請願，三是為了抗議「四□二〇血案」。這時的北大已經率先發動罷課，籌委會的外聯部有上百名糾察隊員充當【以上第 340 頁】與各校的聯絡員。四月二十二日三名 學生代表長跪在人大會堂東門台階上，左邊是周勇軍(政法大學學生，被判四年)，右邊是張志勇(下落不詳)，中間是當時北大籌委會的第二任召集人郭海峰(被 判四年)，他手中高托的請願書正是「北大七條」，經籌委會通宵討論修正，由我找人書寫後小心翼翼地捧著到廣場上。

四、北高聯及其他學生自治會的成立

北高聯的籌委會是在二十三日晚的「圓明園會議」上召開的。當時有代表二十一所高校的數十名同學參加，稱作「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我估計其前身是二十二日在廣場上臨時串聯形成的「十九所高校臨時協調小組」。

「圓明園會議」我沒參加。實際上當時我在直覺上反對這時成立這樣的大組織。那天白天，香港專上學聯有同學到北大籌委會，留了一本他們聯會的章程。我感覺 他們有提供組織經驗，希望北京學生成立學聯的意思，於是寫了一封短信，說明我作為北大籌委會常委，不支持現階段成立學聯的立場。我認為在大多

數院校還沒有 自治會的基礎上，貿然成立更高層的聯會，是有悖於民主自下而上的原則的；在代表性上，無論是形式還是實質，都有問題。

二十三日，清華大學成立了「和平請願會」。清華的情況與北大正相反，她的基礎非常紮實，可以形成數百人組成的全校班代表大會，每個同學也十分守紀律聽指揮。但是，他們很難形【以上第 341 頁】成上層組織，很少有同學敢於出面挑頭組織全校的自治會，即使組織，也在一種十分緊張的神秘氣氛中「猶抱琵琶半遮面」，而且經常就自動解散了。這與清華長年的政治思想控制和沒有一個開明校方有關。

二十三日，清華大學成立了「和平請願會」。清華的情況與北大正相反，她的基礎非常紮實，可以形成數百人組成的全校班代表大會，每個同學也十分守紀律聽指揮。但是，他們很難形【以上第 341 頁】成上層組織，很少有同學敢於出面挑頭組織全校的自治會，即使組織，也在一種十分緊張的神秘氣氛中「猶抱琵琶半遮面」，而且經常就自動解散了。這與清華長年的政治思想控制和沒有一個開明校方有關。

二十四日，北師大的「學生自治會」在一個全校學生大會上成立，與北大那天失敗的大會形成鮮明對照。師大與北大在風格上的對比還有很多，許多地方都染上了 「開希風格」的痕跡。他們一上來就是個要取代原學生會權力的學生自治會，此前，二十一日，開希獨自貼出兩張簡短的公告宣佈北師大自治會及「北京高校學生臨 時自治聯合會」的成立，落款皆是「主席吾爾開希」。北大採用的是常委負責制，師大採用的是主席負責制。北大的首領頻繁更替，師大則幾乎一貫是開希當政。北 大運作效率不如師大，五月十三日交到蘇聯大使館的對戈爾巴喬夫的邀請簽名信中，師大收集了六千師生的簽名，北大才只有三千。總之，師大採用的是權力相對集 中的運作方式，這也許更適合於運動時期的現實。

五、對話團的緣起

首都高校對話代表團是在五月三日籌建的，與北高聯有極深的淵源，包括她的發起、籌備和骨幹。但是在組織關係上，卻是獨立的。

四月二十九日，官方(以袁木為代表)與北京市學聯搞了一個假對話，以北高聯沒有形式上的【以上第 342 頁】合法依據為藉口，完全不承認北高聯的合法身份。有鑒於此，同學們才決定重組一個由下而上逐級選拔上來的各校對話代表組

成的對話團。因此要在形式上與北高聯獨立，使官方沒有理由不與對話團對話。

四月二十九日，官方(以袁木為代表)與北京市學聯搞了一個假對話，以北高聯沒有形式上的【以上第 342 頁】合法依據為藉口，完全不承認北高聯的合法身份。有鑒於此，同學們才決定重組一個由下而上逐級選拔上來的各校對話代表組成的對話團。因此要在形式上與北高聯獨立，使官方沒有理由不與對話團對話。

對話團是在北高聯的一手扶持之下成立的。從聯絡各校自治會、選拔對話代表，到最後開籌備會，都是由北高聯協助的。我自己便是在五月三日下午主持了北高聯 決定五四活動的大會之後，又到旁邊的教室召集對話團的籌備會的。這個籌備會上我將北高聯關於對話團的組織形式的建議向二十三個學校的幾十名對話代表表明之 後，便離開會場，從此完全由他們自行動作。

籌備對話團的骨幹，北大有熊焱與沈彤，政法大學有項小吉。後來項小吉作了團長，大約與他主修「國際談判」的研究生方向及他的口才有關，沈彤作為副手，熊焱則主持一個專題小組的工作。

六、絕食團的興起

關於絕食的發起，一般傳媒以為是開希、王丹等六人在五月十二日中午在一家旅館吃飯時想到的。其實絕食之議，早在四月二十二日就有同學提出，目的是迫使政 府接受請願。對話團成立了之後，政府一再拖延與同學的對話，這時在北大，五月九日有「四十六樓研究生」的絕食倡議書貼出。五月十一日又有「二十五樓博士」 的大字報進一步提倡。我記得柴玲在五月十一日晚【以上第 343 頁】跟我提到她有發動絕食的意願，並稱已在她的一批「哥們兒」的宿舍裡得到響應。當時學運已陷低潮，北大一半同學已自行復課了，要發動絕食不是件容易的事。

關於絕食的發起，一般傳媒 以為是開希、王丹等六人在五月十二日中午在一家旅館吃飯時想到的。其實絕食之議，早在四月二十二日就有同學提出，目的是迫使政府接受請願。對話團成立了之 後，政府一再拖延與同學的對話，這時在北大，五月九日有「四十六樓研究生」的絕食倡議書貼出。五月十一日又有「二十五樓博士」的大字報進一步提倡。我記得 柴玲在五月十一日晚【以上第 343 頁】跟我提到她有發動絕食的意願，並稱已在她的一批「哥們兒」的宿舍裡得到

響應。當時學運已陷低潮，北大一半同學已自行復課了，要發動絕食不是件容易的事。

北高聯與北大籌委會最初是不支持發起絕食的，原因大約是看到了中共內部趙紫陽的同情而擔憂同學們的激烈行為會導致不良後果。但是，在同學們的悲憤情緒中，絕食行動一發而不可收。當時柴玲在《絕食書》中的兩句話很好地表達了同學們的心境。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政府的面孔－－是答覆、不理睬、還是鎮壓？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人民的表情－－我們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

柴玲當時在北大廣場站唸了這份《絕食書》(由白夢潤色)，感動了不知多少同學。五月十三日當天北大參加絕食的同學猛增四、五倍。這時，北高聯與北大籌委會也放棄了反對絕食的立場，轉而作一些後援性的支持工作。但是，這時還沒有「絕食團指揮部」這樣的概念。

絕食團指揮部成立時，我不在場。據李錄的回憶錄(《Moving the Mountain》,，絕食團指揮部是在五月十五日上午，有鑒於十四日與政府對話時，和十五日凌晨開希勸導絕食同學東移讓出半個廣場後，廣場上出現了群龍 無首的混亂局面，柴玲以「死在同學之先」的氣概(當時她和幾個師大同學聲言要自焚)，自薦為第一任總指揮，在絕食同學的鼓掌聲中，宣佈成立一個正式的指揮部。這時，廣場上的組織工作迫在眉睫：組織糾察線和醫療隊，收集各校同學的意見以形成決議和付諸行動，對外有個權威的發言人，等等，都需要一個「絕食團指 揮部」。當日召開的各校代表聯席會議，確認了柴玲與李錄等同學的領導權。但具體過程，書中交待不清楚。詳情參【以上第 344 頁】見拙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

絕食團指揮部成立時，我 不在場。據李錄的回憶錄(《Moving the Mountain》,，絕食團指揮部是在五月十五日上午，有鑒於十四日與政府對話時，和十五日凌晨開希勸導絕食同學東移讓出半個廣場後，廣場上出現了群龍 無首的混亂局面，柴玲以「死在同學之先」的氣概(當時她和幾個師大同學聲言要自焚)，自薦為第一任總指揮，在絕食同學的鼓掌聲中，宣佈成立一個正式的指揮 部。這時，廣場上的組織工作迫在眉睫：組織糾察線和醫療隊，收集各校同學的意見以形成決議和付諸行動，對外有個權威的發言人，等等，都需要一個「絕食團指 揮部」。當日召開的各校代表聯席會議，確認了柴玲與李錄等同學的領導權。但具體過程，

書中交待不清楚。詳情參【以上第 344 頁】見拙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

七、後期廣場上的派系之爭

至此，代表北京學生運動的三個重要組織已經形成：北高聯、對話團與絕食團。但是，這樣的三駕馬車並不適應當時緊迫的學生運動對於統一領導的現實要求，以至於後來在廣場上出現了嚴重的內部派系鬥爭。簡言之，就是北高聯與絕食團之爭。

從戰略眼光上看，北高聯是傾向於溫和與保守的。希望鞏固和發展學運已取得的成果，因此行動上趨於退讓，多次主動要求撤離廣場；絕食團則是悲憤的絕食同學 所自發組織，宣誓要爭取到絕食的兩條最低要求：政府答應對話與推翻四□二六，且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因此在原則與戰略上都沒有妥協餘地。

從行動路線上看，兩個組織也是分庭抗禮的，廣場上出現了兩個廣播站，發出兩種聲音，代表兩個派系。五月十四日，我在廣場上建立了第一個廣播站，後來成為 「絕食團廣播站」，使五月十五至十七日前後，絕食團指揮部控制了廣場上的實際指揮權。但是，五月十六日，王超華（北高聯常委與副主席），與一些清華同學建 立了喇叭更多、功率更大的「學運之聲廣播站」，使北高聯逐步滲透了對廣場的指揮權。廣場上之內部矛盾，便從兩個廣播系統中傳了出來。當時廣場上有句話：「鏡頭面前出領袖，廣播裡面出指揮」。【以上第 345 頁】

五月二十二日凌晨，開希擅自在廣場上喊撤，結果不光導致了北高聯對他違反組織程序而作出罷免處分，也使得北 高聯「因為領導不力而暫回高校區休整」。從此，絕食團指揮部一班人馬又取代了廣場上的指揮權，直到六四，只是改名為「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而已。廣場後 期，學生成份起了根本變化，外地同學佔絕大多數。但是，我們這些主要由北大同學組成的廣場指揮部，沒有及時意識到這一點，沒有吸收外地來的有能力的同學參 與指揮運作，引起了外地同學的不滿。結果，他們自發形成了「外高聯」（似乎還根據當時廣場上的不同糾察隊派系又分出幾派）。這些各派的外地同學經常騷擾指 揮部和廣播站企圖奪權，迫使我們每天總要「鎮壓」一兩次「政變」。當時，我頗有感觸地對大家說：「現在我可理解了鄧小平為何總說『要安定團結』、李鵬為何 宣佈戒嚴和準備鎮壓了！」中國民主的問題，並不是共產黨單方面的問題，也同民眾甚至我們這批搞民主的同學的素質有關。

八、各界支持學運的組織

五月九日，約二百名首都記者到全國記者協會遞交一份「對話請願書聯名信」。這是第一次公開的非學生的有組織行動。此前，在五□四遊行中，也有記

者與知識分子參加。

五月十六日，在廣場上的醫務人員籌備形成「救護協調小組」，統一籌劃絕食同學的救護工作。官方的「北京市紅十字會」多方滲透，企圖取得這方面的領導權。知識界一千人發表《五□【以上第 346 頁】一六聲明》。

五月十六日，在廣場上的醫務人員籌備形成「救護協調小組」，統一籌劃絕食同學的救護工作。官方的「北京市紅十字會」多方滲透，企圖取得這方面的領導權。知識界一千人發表《五□【以上第 346 頁】一六聲明》。

五月十七日，嚴家其、包遵信等人聯名發表《五□一七宣言》。

五月十九日，在「外高聯」宣佈成立的同時，「北京工人自治會籌委會」發表了《首都工人宣言》，體制內的「三所一會」（陳一諮主持的中央經濟體制改革研究 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和陳子明、王軍濤主持的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

五月二十日，戒嚴當天，四、五百由個體戶為主體的摩托車隊（「飛虎隊」）在長安街上馳聘。

五月二十三日，「首都各界愛國護憲聯席會議」成立，並協調了北高聯與絕食團的衝突，確立了絕食團體系對廣場的指揮權。「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同時成立，二者從人員上看，頗有淵源。

另外，運動期間，「四通公司」一直給予學生以協助與支持，比如一些物資便是由四通幫助採購的。絕食團與後期廣場上，還有形形色色的糾察隊、聲援團、後援團、獻血團、敢死隊、自由奏……，在此從略。

關於非學生的組織派系，限於當時的緊迫形勢，我知之甚少。

九、對北高聯的再認識

【以上第 347 頁】

在運動期間，我對北高聯的認識有一個十分複雜的心理過程。最初，在原則上我反對這樣的大聯合體倉促上馬；但 是，她既已成立，北大只好表示支持與服從以顧全大局。然而，這樣的服從是很艱難的，北高聯的許多指令同北大同學的興趣相違背。比如遊行，北大等校離廣場最 遠，連續不斷的遊行已使大家精疲力竭，而北高聯則恰恰又要組織遊行。

四□二七大遊行後，北高聯的地位迅速鞏固，我意識到只能用積極的態度去影響這個組織的運作才是上策，於是在王超華的推薦下，在四月二十九日加入了北高聯， 接替王丹的北大代表職務，以圖加強北大的影響力。兩天之後，當選為北高聯第三任主席，接替當時受到便衣監視的開希。但是，五□四遊行的組織

過程，真正讓我 認識到北高聯的致命弱點。五月三日的北高聯大會上，四十七所高校代表表決在五□四到廣場集會。我安排周勇軍組織會場並負責聯絡。但是，第二天遊行去廣場 後，卻沒有聯絡員來北大隊伍，我和王丹怎麼也找不到集會的地點。結果在返回學校的途中，我才聽說周勇軍已經在廣場上宣佈了「復課」。而我作為北高聯的主 席，卻根本不記得有甚麼關於「復課」的內部決議(雖有激烈討論)。

對於北高聯，我在運動中形成的結論是：她是一個「佔據領導地位，卻無領導能力的組織。

實際上，北高聯有一批相當有才幹的同學，如開希、超華和周勇軍。但是，為甚麼在一些重大場合下，她總表現得那麼脆弱呢？比如四□二七大遊行之前，當時的 主席周勇軍派近百聯絡員發指令要取消行動；五□四他又擅自宣佈復課；後來在絕食後的廣場上，開希兩次喊撤，也都沒有組織的決議。是北高聯對首領沒有約束力 嗎？不是。四□二七後，周勇軍被撤銷主席職務，【以上第 348 頁】

五□四後乾脆開除出北高聯；開希五月二十二日凌晨喊撤也得到同樣處分。是這些首領脆弱嗎？顯然更不是，他們後來的表現證明他們十分堅強。那麼，到底是甚麼使他們「臨陣退縮」呢？

實際上，北高聯有一批相當 有才幹的同學，如開希、超華和周勇軍。但是，為甚麼在一些重大場合下，她總表現得那麼脆弱呢？比如四□二七大遊行之前，當時的主席周勇軍派近百聯絡員發指 令要取消行動；五□四他又擅自宣佈復課；後來在絕食後的廣場上，開希兩次喊撤，也都沒有組織的決議。是北高聯對首領沒有約束力嗎？不是。四□二七後，周勇 軍被撤銷主席職務，【以上第 348 頁】

五□四後乾脆開除出北高聯；開希五月二十二日凌晨喊撤也得到同樣處分。是這些首領脆弱嗎？顯然更不是，他們後來的表現證明他們十分堅強。那麼，到底是甚麼使他們「臨陣退縮」呢？

我以為，真正的原因是北高聯在組織結構上的根本缺陷使得這些首領有一種無力感。這個組織是架在空中的，她頂峰上的首領就更有被架空的乏力感。這正是我在任北高聯主席的那幾天所感受到的，也是五□四後立即辭職的一個心理原因。

北高聯在組織結構上到底有甚麼問題呢？

首先是權力來源有問題。「圓明園會議」上宣告北高聯的成立(雖正式宣佈是在五天後)，但代表二十一所高校的那些同學，絕大多數是沒有經過本校基層組織的 推選的。他們都自以為能代表自己學校的同學，卻說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他作代表。當時，多數學校根本就還沒有自治會或其籌備會。因此，雖然並沒有人反對 他們自命為代表並且成立「代表」基礎上的學聯，但是，這些「代表」們各自在形式上並沒有權力來源，這決定了北高聯也沒有形式上的權力來源。這樣，就形成了 一個怪局面：雖然全體同學都支持北高聯，但他們不清楚應該將這種信任交給哪些具體的人；雖然北高聯的首領們自認為對運動有領導權，但是卻找不到足夠多的可 以執行這些權力的代表－－因為這些代表多是沒有被「選民」在形式上認可的(他們並沒有指揮下面同學執行任務的權柄)。這就是倉促搞上層組織的根本問題，也 是民主運動不能由上而下搞的原因之一。

正是這種在理論上有權領導學運，而在實際上卻無法指揮具體行動的分裂格局，使這個組織和代表這個組織的首領感到虛弱乏力。【以上第 349 頁】
後來，隨著運動的深入，北高聯的權力來源與形式上的合法性問題有了改善，但這仍然掩蓋不了從她創建之初所遺 留下來的代表性問題，以至於在同學們自發組織到廣場絕食後，使她喪失了對學運的統一領導權。這--權力的喪失，使後期的學運陷入了群龍無首的混亂局面。可見 一個運動的最高權力的聯合組織，在她成立之初的代表性與合法性是多麼重要。這裡所說的代表性與合法性，是指形式上的：怎麼有充足的理由說明，佔據這個聯合 組織最高決策層的那些人，是真正的民意代表－－這一形式問題的實質就是：選票在哪?
在提到「形式」這個詞時，我的意思是說這樣的聯合組織在實質上是具有代表性與合法性的。具體地說，八九學運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學是支持和服從北高聯 領導的。但是，北高聯卻從來都拿不出由下而上的選舉來證明自身的合法性，這也並不是說大家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在運動中期，北高聯十分強調校園民主建議， 就是為了加強基礎和形式上的代表性。－－只有形式與本質相契合，這個組織才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對同學，她有令人信服的權威；對政府，可以不留把柄地證明 自身的合法性。這樣，才能在一切行為上名正言順和理直氣壯。

十、北高聯是民陣的前車之鑒

與北高聯有類似缺陷的是後來在海外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雖然居於民陣領導的那些骨幹在當時毋庸置疑地代表了「六四」之後幾乎整個海外華人團體與個人希望而聯合起來，共同【以上第 350 頁】與專制相抗，實現中國自由與富強的心願。但是，民陣在設計與成立之初，犯下了與北高聯相似的結構設計錯誤—由這批「流亡精英」來領導海外民運的形式依據是甚麼？多少人、用甚麼方式投了你的票?

與北高聯有類似缺陷的是後來在海外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雖然居於民陣領導的那些骨幹在當時毋庸置疑地代表了「六四」之後幾乎整個海外華人團體與個人希望而聯合起來，共同【以上第 350 頁】與專制相抗，實現中國自由與富強的心願。但是，民陣在設計與成立之初，犯下了與北高聯相似的結構設計錯誤－－由這批「流亡精英」來領導海外民運的形式依據是甚麼？多少人、用甚麼方式投了你的票？

至今我依然不能理解民陣在成立之初為何決定只收個人會員而不收團體會員。作為一個「陣線」，應該是在一面共同旗幟下的社團聯合體，形式上應該廣泛而鬆 散，口號與綱領應該是各社團的最低共識，運作上圍繞著一個或幾個核心團體帶動大家共同向前。平心而論，民陣作為一個陣線，其操作還不如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 期的「抗日救國統一陣線」那麼深入人心。

只收個人會員，將海外眾多的社團拒諸門外，實際上民陣是「名不正而言不順」，再看民陣兩年來辛苦勞作，慘淡經營而終陷低谷的這一段歷史，更讓人信服這樣 的古訓：「獨任之國，勞而多怨」。民陣成立之初，有意無意中帶上一個「流亡政府」的色彩，甚麼新國旗、新國歌，這樣的色彩在理論上必是野心家與投機分子趨 之若鶩，而為真正有識之士所不齒的：你有何德何能以服眾？當然，民陣之初的形勢對這一色彩不無影響。當時對民主運動的艱巨性有充分估計，對形勢有貼切認識 的人，要麼本來就不多，要麼根本就被淹沒在群情激昂之中，發不出一聲響亮的警鐘。

十一、總結

【以上第 351 頁】

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在組織形式上較以前的類似運動有了長足的進步，使得整個運動基本保持了秩序與非暴力方式。但是，由於這場運動的核心骨幹和組織設計者似缺乏基本的組織經 驗，導致了整個運動中權力過於分散的低效、混亂局面，大大削弱了這些受到廣泛支持的組織的戰鬥力。

在缺乏方法指導的背後，是缺乏理論、信念、意識形態的支持和歷史的借鑒。所謂「盲人騎瞎馬」、「跟著感覺走」、「一個坑裡摔幾跤」，這正是中國民主運動 的悲劇之源。這樣的悲劇，如果沒有足夠強烈的警報傳達到要求民主的大陸民眾心中，則還將重複下去，並不因人們善良的幻想而終止。(作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一 九九八年元月稍作修訂)【以上第 352 頁】

八九學運的反思與借鑒

當一些記者問起我對中國近期政局的預測的時候，我總是用這樣的話來回答

：歷史的發生是偶然的；歷史的結局是必然的。對於偶然發生的歷史事件，我並不如新聞人員那麼感興趣；但是，對於歷史事件的過程與必然結局，卻是我們應當重視而仔細研究的。

一九八九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正是有許多值得重視與研究的歷史過程。半過月前，在巴黎召開的為期八天的《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為這 一歷史過程留下了第一個由當事人集體作出的歷史見證，雖然它的範圍主要局限在八九北京學運。這一見證，將在半年內作有限公開。

通過這次見證會，使我更加清晰地了解了當時的歷史發展過程，這些過程對於理解這場運動的結局也許是最關鍵的。在此，我將提供二個這段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困境和這些現象背後我所感覺到的問題，供大家參考。

一、學運目標的泛化與異化

【以上第 353 頁】

參與八九民運的所有大陸人最為共同的一點，是他們都怀著一股壓抑的情緒和熱望而參加了運動。這股情緒與熱望源於中共長期的壓抑人性的專制統治。因此，無論怎樣總結這場運動的性質，將它理解為一場全民追求人性解放的人文運動是不可忽略的。

但是，感性上的情緒一致並不能掩蓋理性上的訴求分歧。

學生的目標是長遠而又現實的：一、成立學生自治會，促使中共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中的公民結社的自由權利；二、創辦獨立報刊，促使中共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 中的言論出版的自由權利。這一目標是早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晚北大同學成立第一個學生自治組織(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時由在場的二、三千同學 所明確認定的。

然而，歷史的悲劇在於，運動的發展超出了同學們的預測和理解範圍。當大家意識到如下的困境時，已為時過晚：

為了促成實現同學們這樣的有限現實目標，就必須走上街頭爭取其他階層的支持；但是，一旦走上街頭，其他階層就不光是聲援，而是帶著各階層的特殊訴求參與 到運動中而將原先的有限目標泛化和異化。中共長期的人性壓抑是如此的嚴重，人們對新希望是如此饑渴，至使四□二七大遊行和絕食以後已不再是北京學生佔主 體。而這一只佔少數的階層卻始終掌握著運動期間的行動決策權，成為這一運動在後期的混亂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時有哪些階層，帶著甚麼樣的特徵訴求參與了運動，是尚待進一步考察的工作。就我個【以上第 354 頁】人經歷和這次歷史見證的感受而言，可粗略分為

：

當時有哪些階層，帶著甚麼樣的特徵訴求參與了運動，是尚待進一步考察的工作。就我個【以上第 354 頁】人經歷和這次歷史見證的感受而言，可粗略

分為：

（一）、「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階層，即所謂的「體制內」、「體制外」的知識分子。他們在運動中所追求的目標，與學生最大不同的是像胡平所言的「政治功利」，說穿了是要讓李鵬下台而讓趙紫陽上台，以圖達成「新權威」的構想。這種傾向，是由其政治依附性所決定的。

（二）、市民階層，他們在精神和感情上與學生相通的地方很多，但更加看重「打倒官例」、「清除腐敗」、「平抑物價」等現實問題，這是運動後期的真正主體，可惜學生們沒有很好地同其結合。

（三）農民階層。這是佔中國人口最大的階層，卻又是運動中參與最少的階層，似乎對這場運動不感興趣或來不及形成他們的訴求。我只是在戒嚴之後才接觸到一個「農民七人團」，而其行為則相當隱秘。這一現象不僅說明運動的倉促性，也表明我們的理念的播及廣度與深度上的缺陷。

（四）學生階層，這是社會中的一個特殊階層，因為他們還未分配到社會中的不同利益階層，因此，社會的整體利益就是他們的最大利益。正如熊焱所言：我們並 不是要一群飽鬼下了台，讓一群餓鬼上台。因此，他們的目標是最為長遠而無私的。加上校園環境使他們在物理空間和思想空間上的接近，他們很快而自然地成為這 場運動的中堅和主導力量。

學運初衷逐漸被泛化和異化，而又沒能形成具權威的聯合體，是造成運動後期混亂的一個原因，也是今後必須吸取的教訓。【以上第 355 頁】

二、組織過程中的困境

關於八九學運中的組織過程和派系淵源，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其中分析了北高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的最初代表性問題和這一問題與民陣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提到了運動中的泛民主傾向，在此，作進一步的闡述。

使一個組織在設計之初便成為開放系統是至關重要的，這將直接影響到它的生存與發展，而在運作中，組織成立之初的代表性是我們最易於犯的錯誤。北高聯在一 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圓明園會議上是這樣，民陣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巴黎一大時期也是這樣。北高聯當時尚有北大四月十九日成立的籌委會的代表王丹，北師大第二 天（二十四日）認可的自治會主席開希和政法大學從學生會過來的周勇軍等，可算是合法代表；後來各校也逐漸形成自治會而選撥了合法代表，但在其核心，卻一直 未能消除最初代表性的缺陷，以至在絕食之後造成了權力混亂。

至於民陣，其一大籌備和進行過程，至今我都沒法搞清當時為何決定只收個人會員而將海外各個民運團體拒之門外；而又為何傳言當時幾大民運組織事先聲言不會 加入民陣。只收個人會員，不收團體會員，無疑是將民陣搞得「名不正而言不順」最後是「言不順則事不成」。因為民陣一大時期的骨幹，即使有些是海外民運組織 的代表，但必須以個人身份參加，那麼他就不是代表了；而剛從大陸出逃的「精英」，又是代表甚麼團體？有多少形式上的合法性？參加一大的一【以上第 356 頁】百六十七人，代表資格既沒有形式來源，也沒經過正式審查，追究到底 他們只能夠代表這一百六十人的利益。然而，卻又在有意無

意之間，有形無形之中，打著「海外民運旗幟」、「中國民主希望」甚至「流亡政府」的色彩去取得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道義上的支持。正如北高聯一樣，這樣架在空中、漂在水面的結構，是「佔據領導地位，卻少領導能力」的危險組織。

至於民陣，其一大籌備和進 行過程，至今我都沒法搞清當時為何決定只收個人會員而將海外各個民運團體拒之門外；而又為何傳言當時幾大民運組織事先聲言不會加入民陣。只收個人會員，不 收團體會員，無疑是將民陣搞得「名不正而言不順」最後是「言不順則事不成」。因為民陣一大時期的骨幹，即使有些是海外民運組織的代表，但必須以個人身份參 加，那麼他就不是代表了；而剛從大陸出逃的「精英」，又是代表甚麼團體？有多少形式上的合法性？參加一大的一【以上第 356 頁】百六十七 人，代表資格既沒有形式來源，也沒經過正式審查，追究到底他們只能夠代表這一百六十人的利益。然而，卻又在有意無意之間，有形無形之中，打著「海外民運旗 幟」、「中國民主希望」甚至「流亡政府」的色彩去取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道義上的支持。正如北高聯一樣，這樣架在空中、漂在水面的結構，是「佔據 領導地位，卻少領導能力」的危險組織。

我之所以強調形式上的代表性即權力來源，並非是指責這些「代表」不受歡迎，而是基於這樣的歷史觀點：民眾對一九八九年四月成立的北高聯和對一九八九年九 月成立的民陣，並不如對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熱情那麼深入而持久。那麼，如果我們再不檢討自身組織的代表性與合法性基礎，我們又怎麼保障這個「精 英組織」不像共產黨一樣遇到權力而腐化，特別是縮小代表範圍而集權？

我想加入「民主中國陣線」，但必須是真正的「聯合陣線」。

（此文為在一九九一年八月「民陣」比利時魯次大學會議上的發言稿，當時為特邀發言人之一）【以上第 357 頁】

八九學運組織結構的反思

有公開而廣泛的自治組織，是八九學運的一個突出特點，但很少看見對此的反思。主導學運方向的組織，從四一九到四二三是北大籌委會；此後直到五一三絕食， 當數北高聯；五一五到五一七，絕食團指揮部成為廣場上的核心，

也就是整個運動的核心；大約從五一八到五二二，北高聯又佔上風；五二三，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 的認可下，廣場指揮部再居核心地位，直至六四。本文即對這些組織的結構問題作一回顧與反思。

在歷次中國民主運動中，八九學運也記錄得最完整。雖有大量素材還留在國內，但許多關鍵人物已經流亡海外，並部分公佈了其回憶，使我們可以對這次運動中的 組織結構作一定的分析。就此，本文繼續拙文《八九學運中的派系淵源與組織問題》作進一步的反思。該文是在九一年四月完成了三十餘萬字的備忘錄之後的個人感 想；三個月後，十七位八九學運骨幹在法蘭西學院作了八天的集體回顧與反思，本文據此以及六年來陸續讀到的各種回憶，再做修訂與補充，以就正於大家。【以上 第 358 頁】

一、北大籌委會的優缺點

北大籌委會的特點，相對而言，也許可以說是「中庸」，即在「民主」與「集權」之間逐步調適。她有偏向於民主性、開放性與延續性的一面，代價是初期效率偏低，但到運動中後期因為其民主機制的完善而有長足改進。

「北大籌委會」是「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的簡稱，成立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晚，距胡耀邦去世僅四天，是學運中第一個學生自治會。在這次二千 多同學的聚會上，其民主性與開放性即有所體現。她並不排斥官方學生會。實際上在成立之前，同學們還呼籲學生會的幹部挺身出來領導學運，並給他們留了二十分 鐘。其名稱自限為「籌備委員會」，而且當眾宣佈籌委會成員不得參與未來的自治學生會的競選。因此北大籌委會從一開始就考慮到要限制個人私利、發展民主機制 以保障其開放性。

我在九一年的文章中粗略劃分了籌委會初期的四個來源：一、「民主沙龍」王丹、楊濤等人；二、沈彤等人；三、原學生會成員，如李進進、張志勇等；四、自發 的無黨無派同學，如熊焱、郭海峰、柴玲與我。無黨無派者居多，運動期間始終如此。這四類成分大體涵蓋了北大的各個層面，也顯示出籌委會的開放性。但籌委會 最初九位成員中沒有二、三類同學；「民主沙龍」雖佔了三人，卻不是初期幾任召集人，除了王丹等人的謙和，北大的民主精神應是重要原因。

隨著二、三類同學的加入，王丹等人差點出了籌委會。(會頁一七沈彤；頁五五－五八沈彤、【以上第 359 頁】常 勁、封從德。「會」即巴黎會議記錄《回顧與反思》，下同)但限制個人私利、發展民主機制確實在客觀上抑制了學運內部的派別之爭，尤其是王丹等人的「民主沙 龍」與沈彤等人的「奧林匹亞」之間，終究未爆發內訌，也未形成一派獨大的情勢。二十日凌晨沈彤對我和熊焱說:「當心民主沙龍王丹等人要控制籌委會。」這是 沈彤給我的最初印象。之後，二派對峙在籌委會內越演越烈，到了五一沈彤落選，柴玲建議他去幫助項小吉、熊焱等

籌組對話團，才結束了二個團體的衝突。

隨着二、三類同學的加入，王丹等人差點出了籌委會。（會頁一七沈彤；頁五五－五八沈彤、【以上第 359 頁】常 勁、封從德。「會」即巴黎會議記錄《回顧與反思》，下同）但限制個人私利、發展民主機制確實在客觀上抑制了學運內部的派別之爭，尤其是王丹等人的「民主沙 龍」與沈彤等人的「奧林匹亞」之間，終究未爆發內訌，也未形成一派獨大的情勢。二十日凌晨沈彤對我和熊焱說：「當心民主沙龍王丹等人要控制籌委會。」這是 沈彤給我的最初印象。之後，二派對峙在籌委會內越演越烈，到了五一沈彤落選，柴玲建議他去幫助項小吉、熊焱等籌組對話團，才結束了二個團體的衝突。

民主機制的另一貢獻，是議決四二七出校遊行。當時北大籌委會五人常委三比二反對出校，結果「部長會議」根據民主程序，聯名通過了否決案，北大的同學才順 利加入了四二七大遊行的行列，避免了一次歷史笑話。（會頁二七）這個反覆的過程，加強了我對民主機制的信念，對我後來的行為有極大的影響。

但是，對民主機制的強調也有副作用，尤其是運動初期，影響了北大籌委會的運作效率。召集人從四一九夜到四二五，不到一周換了三屆。尤其是四二四全校學生 大會的失敗，當時民主程序尚未確立，矛盾在三、四類同學之間爆發而不可收拾，結果沒能完成直選，喪失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四二五改選會上，我甚至提出需 要賦予籌委會在緊急狀態時的「獨裁權」，可見當時效率問題之嚴重。

然而，權衡利弊，我還是認為加緊建立民主機制是保障組織長期效益的關鍵。北大籌委會到了運動中後期則異常穩定，權力有相當大的延續性，內部也不再有大動盪，效率越來越高，實【以上第 360 頁】質上成為運動的中堅，無論是北高聯還是廣場指揮部，都主要依靠其支持。（北高聯總部從五月上旬便搬到北大，而指揮部的主要骨幹幾乎都有北大淵源，有關情況，另文詳述。）

然而，權衡利弊，我還是認為加緊建立民主機制是保障組織長期效益的關鍵。北大籌委會到了運動中後期則異常穩定，權力有相當大的延續性，內部也不再有大動盪，效率越來越高，實【以上第 360 頁】質上成為運動的中堅，無論是北高聯還是廣場指揮部，都主要依靠其支持。（北高聯總部從五月上旬便搬到北大，而指揮部的主要骨幹幾乎都有北大淵源，有關情況，另文詳述。）

二、清華模式與師大「開希作風」

相對於北大，清華更民主，師大更集權。運動中的學生自治會，清華與北師大可代表兩極。

清華極重基層民主建設。四月二十五日，王超華正好看到了清華、北大與北高聯三個組織的選舉，其印象非常戲劇性，也正好說明三個組織的特色。清華是「四百 人班代表大會」，在一個大禮堂；北大則在一間小教室，六十多人主要是各系分籌委會的代表；而高聯三、四十各校代表更是躲在五層樓的教室中，「氣氛特緊張， 像地下工作一樣」。對清華從容有序的基層民主，超華褒揚有加：「非常重視你有沒有代表性，一開始這個民主的概念和制度的概念就很強」。(會頁三九)相對而 言，清華學生自治會的高層則較弱，超華也說那晚北高聯的會議上其它常委院校都去了，而「清華的好像沒去」。我和熊焱四二〇去清華聯絡也感到這點。清華模式 大概可以說是工科院校的典型代表，比如農業工程大學也是以龐大的「宿舍代表大會」為架構。但這方面我也瞭解不多，巴黎會議上很遺憾沒有清華同學。

與清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北師大的「開希作風」。師大自治會偏重上層、尤其開希個人，這從二方面可以看出：開希的自封，和其他人對開希「單一的領袖形象」的維護。開希自封主席【以上第 361 頁】的情況，在巴黎會議上有許多見證，劉燕、沈彤和常勁都異口同聲地說「是他自己掛名的」,「他自己在師大貼了一張大字報。」(會頁六〇)開希自己也這麼說。以下是他九〇年四月在巴黎對中國問題專家的答問：

與清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北師大的「開希作風」。師大自治會偏重上層、尤其開希個人，這從二方面可以看出：開希的自封，和其他人對開希「單一的領袖形象」的維護。開希自封主席【以上第 361 頁】的情況，在巴黎會議上有許多見證，劉燕、沈彤和常勁都異口同聲地說「是他自己掛名的」,「他自己在師大貼了一張大字報。」(會頁六〇)開希自己也這麼說。以下是他九〇年四月在巴黎對中國問題專家的答問：

四月二十一號白天，我在師大貼了一張大字報：「北師大學生自治會成立了。原學生會和研究生會一律解散。北師大學生自治會希望尚未登記的各系同學，盡快來 西北樓登記。(那是我自己的房間)。北師大學生自治會願意接受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領導。簽名，吾爾開希，北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今晚集會籌備參加胡 耀邦的追悼會。」這個追悼會是在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這張大字報貼在北師大，但我作了幾十份縮小了的複印，貼在北京三十多個高校。在師大(的廣場上)，我 寫道：「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原學聯即行解散。今晚九點集會。簽名，臨時主席吾爾開希。」(譯自 BEJA 等，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ekin. Paris, Gallimard， 一九九一年，頁四七九－四八〇)

至於維護開希「領袖形象」的情況，梁二回顧道，師大幾個骨幹「決定團

結一致，避免分歧。因為二十四日我就聽見北大有內部分歧。我們決定保持單一的領袖形 象，那就是開希」，因為他的「感性魅力」和「演說能力」比別人都強，並決定由開希見記者。(會頁六一)這樣，開希就成了師大的核心，無人可以抗衡。開希的 作用自然不限於師大，本文後面還有進一步的分析。

三、北高聯的懸空

【以上第 362 頁】

北高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中共稱之為「高自聯」)是怎樣成立的，對我一直是個謎。其中關鍵人物如劉 剛、周勇軍和吾爾開希，雖已在海外，但我至今未見其詳細回憶；吾爾開希雖曾談及，卻語焉不詳。一般認為，北高聯是在四二三夜間的圓明園會議上由二十多高校 的同學成立的，當時叫「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自治聯合會」，簡稱北臨聯。但按開希的說法，北臨聯宣告成立的時間還要推前兩天，即他貼出自封兩個主席的大字報 時。他接著說，四二一全市學生大遊行之前：

那晚九點，有六到七萬人在師大操場集合，非常混亂。九點，我站出來宣佈：「請安靜一下。」馬上，全場靜得不可思議。「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自治聯合會，第一個民間團體成立了，取代原學聯，原學聯宣告解散。」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所謂雷鳴般的掌聲。(同上)

接下來開希強調了他在第二天的作用。十幾萬同學佔據廣場，以此悼念胡耀邦和請願(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內舉行)。開希說他是「四人代表之一」，是唯一「拒絕向李鵬下跪請願」的一個，且在「當時的學生會議中最活躍」。然後開希談到圓明園會議：

接下來四二四[當為四二三夜間——作者按]，我們舉行了北京高校的第一次全體會議。王丹有參加，同時還有二十六個高校的代表，並不都是被選舉出來的，卻 都是公認的學生領袖。我們於是就成立了北京高校臨時聯合會。實際上，我貼大字報的時候這個組織並不確實存在。同樣，當我第一次簽【以上第 363 頁】名作北師大自治會主席時，我是它唯一的成員。當北臨聯終於成立時，是政法大學的周勇軍當選主席。但由於他在四二七大遊行之前的錯誤便被開除出去。(同上)

接下來四二四[當為四二 三夜間——作者按]，我們舉行了北京高校的第一次全體會議。王丹有參加，同時還有二十六個高校的代表，並不都是被選舉出來的，卻都是公認的學生領袖。我們 於是就成立了北京高校臨時聯合會。實際上，我貼大字報的時候這個組織並不確實存在。同樣，當我第一次簽【以上第 363 頁】名作北師大自治會主席時，我是它唯一的成員。當北臨聯終於成立時，是政

法大學的周勇軍當選主席。但由於他在四二七大遊行之前的錯誤便被開除出去。(同上)

由此可見,「開希作風」一直被帶到北高聯,無論有沒有基礎,先宣佈成立再說。這與我當時的印象相吻合。記得四二三那天下午有人通知我參加晚上的圓明園會 議,我認為當時許多學校還沒成立自治會,沒有基礎建立學聯,所以沒去。當時我收到香港學聯到北大留下的章程,還回了一封短信,說明我的上述觀點。這裡面也 有等一等別的院校、不願總充老大的意思,可惜後來的發展反而違背了這份苦心。

吾爾開希的回憶將自己放在核心位置,但我的感覺卻是劉剛要重要得多。劉剛當時嚴格說已經不是學生,他從北大物理系碩士畢業,方勵之與李淑嫻曾是他的老 師,民主沙龍的創立也與他有關,一九八九年還在陳子明、王軍濤的青年經濟學會兼職,可以說是個聯繫廣泛的職業革命家。從巴黎會議上老木、張倫與王超華的敘 述來看,劉剛應該是北高聯的靈魂人物(會頁一六;四〇;五三;錄音稿頁二六;二七;二八;二九)。可惜二人也都不清楚劉剛對高聯的具體貢獻,而劉剛自己出 來後似乎也從未細談過。(本文定稿時,聽到邵江介紹:圓明園會議前身即「圓明園沙龍」,劉剛正是其創辦人,邵江後來也加入。成立北高聯的基本思路與八八年 「行動委員會」及一九八九年北大籌委會一樣:需要聯絡與協調組織。)

現在值得探討的是這二十六所(另一資料說是二十一所)院校中,成立了自治會的到底有多少。這我至今也無法確定,但不會超過半數,恐怕四分之一都不到。無論如何,我當時對此極有保留;但我沒去會上陳明,則也當反省。【以上第 364 頁】

對這種懸空架構的反思,我九一年的文章已談得很多。這裡要補充的,是對懸空的不安,在我從四二九加入高聯,尤其是第二天當選主席後越發有所體會,這也是我在五月六日辭職的一個心理原因。周勇軍在五四宣佈復課,而我作為主席事先都不知情,愈感懸空,自認無法負 責。超華見周勇軍、吾爾開希等人「都不作實事」(會頁七〇),才到北大叫我加入高聯。開希與王丹二十九日晚自辦「個人記者招待會」遭便衣跟蹤,從此不能來 開會,這是我很快接任主席的重要原因。但五月三日高聯大會剛完,開希卻又開記者會宣佈五四遊行方案,儼然還是高聯主席,這我在一九八九年都不知道。這種作 風與北大籌委會相去甚遠,對外有發言人,常委不得私見記者是一條紀律。超華與我也一度努力加強高聯組織建制與民主機制,但遇到這種虛浮作風時,我的能力卻 很不夠,不僅沒能力爭,反而很快抽身,現在回想起來,很值得反省。

懸空的後果,是高聯對常委缺乏約束力。一度有常委被解職的情況,隨即發現法理不通:常委代表本校,它校常委無權撤其職。但常委在高聯表現如何,幾大院校 卻不一定清楚,於是就有了脫節,導致身居顯位而不受約束的可能。開希是這種脫節的典型。別的不說,六月三日我代表指揮部去高聯總部邀請兩位常委到廣場作副 總指揮,開希正好在,馬上要求去廣場,我說你早就不是高聯常委了,開希便以「師大自治會主席」的身份當面宣佈撤銷梁二駐高聯的代表資格,並取而代之。「我 現在就是北高聯的常委了,你還有什麼意見?」

北高聯的懸空、對常委缺乏約束力,有領導之名無領導之實,最嚴重的後果是無力制止絕【以上第 365 頁】食的發起。

北高聯的懸空、對常委缺乏約束力，有領導之名無領導之實，最嚴重的後果是無力制止絕【以上第 365 頁】食的發起。

四、絕食團對北高聯的挑戰

五月十一日晚，吾爾開希、王丹、馬少方、程真、王文、楊朝暉在一個小飯店商議絕食，這是具體發起絕食的起點。六人全是高聯的活躍人物，開希還是主席，王 丹、馬少方也曾是高聯常委。儘管多數常委反對，高聯卻無法控制絕食的勢頭，這不能不從它的組織架構和代表性上去找原因。如果高聯是由下而上層層都有堅實的 基礎，完全可以用「最高統一組織」的威信要求局部份子服從領導，至少可以舉行一次各校投票，按民主原則少數服從多數。但是高聯當時無力這麼做。

這種無力感從王超華的敘述中也可以看出。她是高聯運作的真正核心，在巴黎會議上談到十一、二日高聯的三次常委會。十一日下午的會上，「馬少方和梁二發生 激烈的爭執，拍桌子紅臉。馬少方說，『上面已經說了，非常確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會頁九四)少方當時已經不是 高聯常委，是開希要求他與會的。接著，「晚上北高聯做出一個決議：反對近階段舉行任何大規模的活動。」但就在當晚，吾爾開希等六人執意發起絕食。第三次常 委會在十二日早晨，楊朝暉來說要絕食，「已經有十一個人了，而且已經串聯了十幾所院校。」超華當即說，「高聯馬上要發表聲明，這個絕食活動和高聯完全沒有 關係」，她【以上第 366 頁】非常氣憤，馬上就問「吾爾開希怎麼回事？他還有沒有原則性，昨天剛通過的決議。」鄭旭光這時衝她一拍桌子，「你以為高聯現在還有多少威信哪？你以為高聯現在說話還管用哪？」超華回憶道：「我一下就驀了。」(會頁九四—九五)

這種無力感從王超華的敘述 中也可以看出。她是高聯運作的真正核心，在巴黎會議上談到十一、二日高聯的三次常委會。十一日下午的會上，「馬少方和梁二發生激烈的爭執，拍桌子紅臉。馬 少方說，『上面已經說了，非常確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會頁九四)少方當時已經不是高聯常委，是開希要求他與會 的。接著，「晚上北高聯做出一個決議：反對近階段舉行任何大規模的活動。」但就在當晚，吾爾開希等六人執意發起絕

食。第三次常委會在十二日早晨，楊朝暉來 說要絕食，「已經有十一個人了，而且已經串聯了十幾所院校。」超華當即說，「高聯馬上要發表聲明，這個絕食活動和高聯完全沒有關係」，她【以上第 366 頁】非常氣憤，馬上就問「吾爾開希怎麼回事？他還有沒有原則性，昨天剛通過的決議。」鄭旭光這時衝她一拍桌子，「你以為高聯現在還有多少威信哪？你以為高聯現在說話還管用哪？」超華回憶道：「我一下就蔫了。」（會頁九四－九五）

第四次常委會是衝突的高潮，高聯不僅沒能約束自身的核心成員，更無力壓住北大的絕食行動。抗拒高聯最關鍵的一環就發生在十二日中午這次常委會上，特別是在柴玲與王超華之間。對此，柴玲在巴黎會議上回憶道：

我說：「你們為什麼不允許絕食？」我記得王超華就說：「是這樣，我們已經從上面得到消息，只要學生平息下去，上面準備用一種比較溫和的態度來解決。現在 有的同學感到在學運低潮，要做一些事情，很著急，我們也能理解。」當時我就問了一句，「你們北高聯已經同意了一個原則，就是你們只是作為一個協調性的機 構，為什麼到現在有權力做這樣的決定？絕食是同學自發的。你們實際是佔著領導的位置，沒有領導的能力。」當時沒有什麼聲音。我就說：「不管你們怎麼說，北 大已經同意絕食，而且我們也會進行。」就此就分開了。（參：王超華二五二北高聯反對絕食、會頁九〇）

關於「高聯祗是一個協調性的機構，而不是領導機構」，這是北大在五月七號與高聯達成的原則性協議（王超華，會頁七七；常勁，頁一一六－一一七）。這實際 上是對高聯的削弱，其影響力受此牽制很大。這當中與我對高聯的反省有很大的關係，在後面的反思中還有進一步的檢討。這裡要說的是，高聯從初創時期的代表性 問題帶來的懸空狀態，事實上無力控制北京高校學【以上第 367 頁】運的局勢。

關於「高聯祗是一個協調性 的機構，而不是領導機構」，這是北大在五月七號與高聯達成的原則性協議（王超華，會頁七七；常勁，頁一一六－一一七）。這實際上是對高聯的削弱，其影響力 受此牽制很大。這當中與我對高聯的反省有很大的關係，在後面的反思中還有進一步的檢討。這裡要說的是，高聯從初創時期的代表性問題帶來的懸空狀態，事實上 無力控制北京高校學【以上第 367 頁】運的局勢。

絕食後，高聯對局勢的控制能力更大大降低。絕食團形成一股強大勢頭，完全將高聯置之不理。超華也試圖約束開希，五月十三日晚，閻明復與知識分子和運動學生有次見面會。超華回憶說：

下午我們坐在一塊時就對他說，「開希你參加絕食已經違反高聯紀律了，你

不要再代表高聯講話。」所以十三日晚上連坐都沒有跟他坐在一塊。他先說了一下，他 代表北高聯，然後我發言時還說了一聲，他不代表北高聯，北高聯是另外有決議的，他們兩個在絕食行動中和北高聯不是一回事。(會頁一〇一)

但是開希這時完全滿足於以絕食團領袖的姿態出場，因為絕食是當時運動的中心；尤其是十四日對話時，若以北高聯身份，他反而可能不能參加。以後，開希到底 代表北高聯還是絕食團，就很難說了。實際上，他基本上不在任何一個組織中做事，而是依賴媒體和輿論的影響浮在整個運動之上。照梁二的回憶，至遲在五月十七 開希便被高聯徹底解職，而最荒唐的是他在五二二凌晨喊撤後，高聯竟然還得宣佈對他的「罷免」，許多人都還以為吾爾開希依然是「北高聯主席」，而「實際上他 沒有任何職務可罷免。」(會頁一六〇、一八二、二九六－二九七)

高聯的積弱，不僅沒能阻止絕食，沒能壓制開希的僭越，甚至無力控制高校代表會。而正是廣場上的這些各校代表會，成為絕食團指揮部與高聯抗衡的根據地。【以上第 368 頁】

五、絕食團指揮部形成的斷裂

關於指揮部的合法性問題，拙文《「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有所專述，這裡則側重於該組織在整個運動中所形成的斷裂：它因應廣場上的混亂局面而生， 卻進一步導致了學生組織的混亂。第一，統一組織的斷層，至此北高聯不再是運動的唯一最高機構；第二，領導人物的斷層，尤其是李祿的介入，開始以全新的人物 掌握運動的決策核心；第三，權力更替的斷層，或曰極端組織方式的開始，尤其是以「自焚」為旗號，而掌權後又馬上取消，實際上開了廣場「政變」之先河。

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首先是絕食團抗拒北高聯的繼續，是絕食同學在無序當中尋找自身代言人的新努力。十五日凌晨，在高聯支持下的吾爾開希(當時大家都把 他當作高聯主席)主持了廣場同學東移之後，廣場上開始混亂。李祿對此非常擔憂，找柴玲談了一個多小時，又徵求了十幾個人的意見，便在八點左右，由柴玲在廣 播站宣佈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李祿；而參加指揮部的唯一條件是在遭鎮壓時率先自焚。二人宣佈成立指揮部之後馬上召集的代表會議，一方 面確立其領導權，另一方面也否決了李祿的兩項提議：「自焚」與「臥路」。然後召開記者會對外宣佈；當晚十點發生了第一次人事變動，王文、馬少方、程真等人 另立一份名單，去除李祿；當夜的兩次代表會議中，李祿一度落選，結果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揮部，從此二人的地位不再動搖，直至六四。而馬少方等人則與指 揮部漸行漸遠，六一凌晨王文等人甚至【以上第 369 頁】發動綁架。

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首 先是絕食團抗拒北高聯的繼續，是絕食同學在無序當中尋找自身代言人的新努力。十五日凌晨，在高聯支持下的吾爾開希(當時大家都把他當作高聯主席)主持了廣 場同學東移之後，廣場上開始混亂。李祿

對此非常擔憂，找柴玲談了一個多小時，又徵求了十幾個人的意見，便在八點左右，由柴玲在廣播站宣佈絕食團指揮部的成 立：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李祿；而參加指揮部的唯一條件是在遭鎮壓時率先自焚。二人宣佈成立指揮部之後馬上召集的代表會議，一方面確立其領導權，另一方面 也否決了李祿的兩項提議：「自焚」與「臥路」。然後召開記者會對外宣佈；當晚十點發生了第一次人事變動，王文、馬少方、程真等人另立一份名單，去除李祿； 當夜的兩次代表會議中，李祿一度落選，結果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揮部，從此二人的地位不再動搖，直至六四。而馬少方等人則與指揮部漸行漸遠，六一凌晨王 文等人甚至【以上第 369 頁】發動綁架。

指揮部成立以後，高聯對學運的控制力進一步降低，尤其是失去了兩大陣地：各校代表會與廣播站。指揮部的「合法性」首先就是依靠廣場上的各校代表會取得 的。當時高聯的實際運作主要依靠王超華的凝聚力，但她也承認，「我們對絕食團的各校代表會採取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絕食團自己搞了一個代表會。可是事 實上，高聯在這個階段基本上沒有再召開代表會，因為都亂了。」（會頁一五九）而廣播站就是指揮系統，按李祿的說法，「沒有廣播站，實際上指揮部只是一個名 字，廣播站才是一個實際的團體。」（會頁一三八）從此以後，代表會與廣播站便成了高聯與指揮部爭奪的焦點。兩個組織各自召集代表會，因此廣場上常常出現截 然不同的決議；又各自掌握一個廣播站，因此廣場上經常聽到南轅北轍的通告。大體上，「絕食團廣播站」代表指揮部，「學運之聲」代表北高聯，而後者後來居 上，功率大大超過絕食團廣播站，因此高聯從五一七以後逐漸控制局面，直到二十三日被迫回校修整之前。這種由策略之爭而導致的權力之爭和兩套指揮中心的混亂 局面，鄭義也有生動的描述的（《歷史的一部分》頁九五）。

其次，從領導人物上看，斷層則更大。鄭義以為「指揮部成員大多數是市高聯的成員」，其實正相反，幾個骨幹當時不僅不在高聯任職，甚至在本校也無職務。李 祿來自外地不用說，柴玲與我都在五月六日辭了職，張伯笠、白夢從未在北大籌委會做過常委，郭海峰則在四月底就不再任要職。吾爾開希與王丹的情況比較模糊， 王丹是與我一道辭職的，吾爾開希按超華與梁二的說法並不代表北高聯，他們在北高聯到底有沒有正式職務很難說。結果，絕食團指揮部竟是個全【以上第 370 頁】新的組織。套用一句批評中共的話來說，指揮部根據的也不是「成文法」而是「習慣法」，即柴玲不得不承認的「老資歷」。（會頁一四五）

其次，從領導人物上看，斷 層則更大。鄭義以為「指揮部成員大多數是市高聯的成員」，其實正相反，幾個骨幹當時不僅不在高聯任職，甚至在本校也無職務。李祿來自外地不用說，柴玲與我 都在五月六日辭了職，張伯笠、白夢從未在北大籌委會做過常委，郭海峰則在四月底就不再任要職。吾爾開希與王丹的情況比較模糊，王丹是與我一道辭職的，吾爾 開希按超華與梁二的說法並不代表北高聯，他們在北高聯到底有沒有正式職務很難說。結果，絕食團指揮部竟是個全【以上第 370 頁】新的組織。套用一句批評中共的話來說，指揮部根據的也不是「成文法」而是「習慣法」，即柴玲不得不承認的「老資歷」。(會頁一四五)

最後，從組織方式看，「自焚」是指揮部合法性問題的根源。原先彼此有基本瞭解和信任的學生骨幹群由此被排除在外，而這一先決條件在指揮部剛一成立便被取 消，對於許多絕食發起人來說無異於「政變」，比如馬少方便指李祿是在「操縱民主」。這一思路無疑為後來對指揮部的諸多「政變」提供了依據，而到了運動後 期，這類「政變」更是家常便飯。有關情況，巴黎會議上有大量討論。(會頁二七九－二九〇)

六、廣場指揮部與首都各界聯席會議

絕食團指揮部與北高聯的抗衡，以五月二十三日高聯撤回高校整頓而告一段落。這天，同時誕生了兩個新組織：保衛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部與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以下簡稱指揮部和首聯)。以後對廣場控制權的爭奪，便主要在這兩個組織之間展開。

先看指揮部。在「絕食團指揮部」與「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之間，還有一個「臨時指揮部」，基本上是同一套班子。臨時指揮部的成立，實際上重複了絕食團 指揮部成立時的模式：開希喊撤，導致堅守廣場的同學遷怒於北高聯而另立上層機構，兩次皆是如此。五二二凌晨開希喊撤，當即遭全場反對和北高聯的「罷免」（王超華，會頁二一四）。晚上，北高聯與絕食團指揮【以上第 371 頁】部 共同召集各校代表聯席會議，結果四十五票同意，二十四票反對，通過組建廣場臨時指揮部，堅決不撤；北高聯則被迫同意撤返高校整頓，由臨時指揮部接管廣場二 日(二十四日聯合報、明報等)。這個暫理四十八小時的協議，指揮部的張伯笠已先同北高聯的王超華談妥。(會頁二〇八—九)超華記得協議中高聯和

臨時指揮部 帶有一種隸屬關係，或派出單位(會頁二六六)。

先看指揮部。在「絕食團指 揮部」與「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之間，還有一個「臨時指揮部」，基本上是同一套班子。臨時指揮部的成立，實際上重複了絕食團指揮部成立時的模式：開希喊 撤，導致堅守廣場的同學遷怒於北高聯而另立上層機構，兩次皆是如此。五二二凌晨開希喊撤，當即遭全場反對和北高聯的「罷免」(王超華，會頁二一四)。晚 上，北高聯與絕食團指揮【以上第 371 頁】部共同召集各校代表聯席會議，結果四十五票同意，二十四票反對，通過組建廣場臨時指揮部，堅決不 撤；北高聯則被迫同意撤返高校整頓，由臨時指揮部接管廣場二日(二十四日聯合報、明報等)。這個暫理四十八小時的協議，指揮部的張伯笠已先同北高聯的王超 華談妥。(會頁二〇八－九)超華記得協議中高聯和臨時指揮部帶有一種隸屬關係，或派出單位(會頁二六六)。

但指揮部從臨時「轉正」，卻依賴了首聯的支持，這是超華沒有料到的。那晚正好兩個聯席會議同時在開，另一個就是首聯的籌備會，第二天五二三首聯的第一次 正式會議上「授權成立廣場指揮部，統一廣場上的指揮」，這句話李祿記得是柴玲回來對他說的(會頁二一九)，我也記得柴玲在五二三下午對我說時的神情，好像 終於有了依靠。張伯笠也沒參加首聯會議，第二天超華拿著高聯整頓好的名單回到廣場來向他收回權力，伯笠便說「你找首聯去吧。」(會頁二一〇)至此，高聯徹 底喪失了對廣場的控制權。

再看首聯的成立。按包遵信的印象，首聯的前身是薊門會議，而他參加的五一八、九兩天都是陳子明、王軍濤親自用車來接的。五二二晚也是王軍濤親自用車來 接，而直到會開完，他才從軍濤那裡得知是首聯的籌備會議。(《未完成的涅槃》頁二二八－二三三)陳小雅按包遵信的回憶，歸納五一八薊門會議的「主要議題是 怎樣能影響學生，控制廣場局勢。王軍濤說，我們可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體工作可由他和陳子明的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來承擔。」(《八九民運史》頁三四七)因 此可以說首聯是一群知識分子的某些嘗試的結果，他們不安於廣場上的混亂局面而力圖介入學運的上層，以期左右局勢。按包遵信、張倫、老木的回憶和陳小雅的分 析，這群知識【以上第 372 頁】分子組織上的核心應當是陳子明與王軍濤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按一些人的說法，這就是運動「真正的黑手」。

再看首聯的成立。按包遵信 的印象，首聯的前身是薊門會議，而他參加的五一八、九兩天都是陳子明、王軍濤親自用車來接的。五二二晚也是王軍濤親自用車

來接，而直到會開完，他才從軍濤 那裡得知是首聯的籌備會議。(《未完成的涅槃》頁二二八–二三三)陳小雅按包遵信的回憶，歸納五一八薊門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怎樣能影響學生，控制廣場局 勢。王軍濤說，我們可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體工作可由他和陳子明的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來承擔。」(《八九民運史》頁三四七)因此可以說首聯是一群知識分子 的某些嘗試的結果，他們不安於廣場上的混亂局面而力圖介入學運的上層，以期左右局勢。按包遵信、張倫、老木的回憶和陳小雅的分析，這群知識【以上第 372 頁】分子組織上的核心應當是陳子明與王軍濤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按一些人的說法，這就是運動「真正的黑手」。

張倫的回憶也印證了上述分析。「聯席會議主要發起和組織的人是陳子明和王軍濤他們這批人。」而且他將這批知識分子的活動推前到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 悼會結束之後的當天下午在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開了一個重要的會。」張倫回憶說，他也參加了五一八的薊門會議，而且主持了五二二的籌備會。(會頁二三一－二 三二)

老木的回憶尤其能支持陳小雅的判斷，他特別強調王軍濤、陳子明 在整個運動組織方面的作用。他的言論曾經引起非議，特別是九〇年四月對法國《解放報》記者的談話。到了九一年七月的巴黎會議上，老木依然強調首聯的作用。「聯席會議是由一批獨立於體制的知識分子，在不同方向，在戒嚴前後，自動匯到一起的，其中主流是以王軍濤、陳子明為主。……保衛廣場臨時指揮部是聯席會議任命的，這是一個絕對的事實。再一個事實是，我的宣傳部、張倫的糾察總部，還有參謀部、聯絡部，並不是廣場臨時指揮部的下屬機構，只是平行機構。就是保衛 廣場臨時指揮部必須聽從聯席會議的決定。」(會頁二三三)

七、指揮部與首聯的結構問題

這便觸及到實質問題：指揮部與首聯到底是甚麼關係。為了探討這一問題，我們最好看一【以上第 373 頁】看原始資料。二十四日的《新聞快訊》第三期由包遵信負責、北明等編輯，其中記載了二個組織的結構關係：

這便觸及到實質問題：指揮部與首聯到底是甚麼關係。為了探討這一問題，我們最好看一【以上第 373 頁】看原始資料。二十四日的《新聞快訊》第三期由

包遵信負責、北明等編輯，其中記載了二個組織的結構關係：

本報訊：為了統一指揮，堅持鬥爭，首都愛國民主運動指揮系統在多日醞釀中成立並完善。以「保衛天安門指揮部」為中心，上設由各界人士代表組成的「愛國維 憲各界協商聯席會議」，和由全國各高校代表組成的「營地聯席會議」；下設聯絡部、宣傳部、參謀部、後勤部、糾察部。（《八九民運史》頁三五〇）

顯而易見，這個結構很混亂。首先是指揮部作為「中心」，與首聯究竟是甚麼關係？甘陽說「既不是隸屬關係也不是平行關係」，包遵信聽了，覺得「這說法真讓 人無法理解」，結果也用了一個很模糊的概括：二個組織「一是進行協商，一是負責執行；聯席會上討論定的事，大都要由廣場指揮部去推行。」（《未完成的涅 槃》頁二三四）首聯發言人劉蘇里在五二四下午對記者的解釋也自相矛盾：一方面，首聯是作為指揮部的後援組織，作用是出謀獻策，擔任智囊團角色，但對指揮部 沒有硬性制約關係，首聯提出的任何意見，最後決定權仍在指揮部（東方日報、快報五月二十五）；另一方面，首聯決定，天安門廣場保衛工作由總指揮部統一負 責，採取總指揮負責制，而總指揮則向聯席會議負責（明報五月二十五）。

這便觸及到第二個問題：指揮部到底聽誰的？「上設」的兩個聯席會議，一個主要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則是廣場學生的，二者有了分歧怎麼辦？如果說指揮部相當 於行政機構，聯席會議相當於議會，那麼現在出現了兩個「議會」，二者又都是指揮部的「上設」機構，問題就出在這【以上第374頁】裡。後面將分析的五二七建議的混亂局面便是這一矛盾的自然結果。

這便觸及到第二個問題：指揮部到底聽誰的？「上設」的兩個聯席會議，一個主要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則是廣場學生的，二者有了分歧怎麼辦？如果說指揮部相當於行政機構，聯席會議相當 於議會，那麼現在出現了兩個「議會」，二者又都是指揮部的「上設」機構，問題就出在這【以上第374頁】裡。後面將分析的五二七建議的混亂局面便是這一矛盾的自然結果。

第三，部門人員設置也出現了兩套人馬。一套是學生的，以原指揮部為核心，上面《新聞快訊》那段話接著是：

新成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成員有：柴玲（總指揮）、張伯笠（副總指揮兼宣傳部長）、連勝德（副總指揮）、郭海峰（秘書長）、李錄（外聯部長）、王剛（後勤部長）、楊朝輝（糾察隊長）、王超華（常委）等組成。

另一套班子則是知識分子的，大體上都是陳子明、王軍濤的朋友，由首聯發言人劉蘇里對記者宣佈的：

聯席會議屬下五個部：聯絡部（負責人劉蘇里）、宣傳部（老木）、後勤供給部（王剛）、參謀部（劉剛）、糾察總部（張倫）。聯席會議常設委員會共六人，為王丹、柴玲、張伯笠、李祿、封從德及郭海峰。（明報五月二十五）

第二天的《首聯簡介》上又說有十個部。可見當時的組織結構有多麼混亂，

又多麼變幻無常，給人隨意更改的印象。而實際上指揮部的核心人員也並非經過正式選舉的，比如我就沒參加過任何選舉，這個那個名單，當時連我自己都不清楚，讀到上面一些名單時，已經是幾年以後了。

總之，產生這些混亂有個過程，通過對各種回憶的分析可以看出：柴玲在二十三日首聯會上，因為臨時指揮部要「轉正」，故滿足於「授權」的上下關係；而李祿參加的二十四日的首聯【以上第 375 頁】會 上，指揮部的「上設」機構才另外增加了學生的「營地聯席會議」的。李祿是「學生議會」的主持人，因此不斷強調「廣場指揮部的權力來源，是建立在廣場議會的 基礎上，就是營地聯席會議」，而首聯只是「一個協調組織，給我們作後勤部，第二給我們作參謀。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作我們的領導和派我們、幫助我們成立一個 廣場指揮部，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我們這邊最高權力機關是廣場議會。」(會頁二三七—八)具體而言，五二七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建議三十號撤，結果沒有在廣 場議會上通過(李祿，會頁二三八；當時所有報導都是「建議」)，便是標誌著首聯對指揮部的權威實際上在廣場議會之下：首聯只能「建議」，表決權則在「廣場 營地聯席會議」。

總之，產生這些混亂有個過程，通過對各種回憶的分析可以看出：柴玲在二十三日首聯會上，因為臨時指揮部要「轉正」，故滿足於「授權」的上下關係；而李祿參加的二十四日的首聯【以上第 375 頁】會 上，指揮部的「上設」機構才另外增加了學生的「營地聯席會議」的。李祿是「學生議會」的主持人，因此不斷強調「廣場指揮部的權力來源，是建立在廣場議會的 基礎上，就是營地聯席會議」，而首聯只是「一個協調組織，給我們作後勤部，第二給我們作參謀。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作我們的領導和派我們、幫助我們成立一個 廣場指揮部，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我們這邊最高權力機關是廣場議會。」(會頁二三七－八)具體而言，五二七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建議三十號撤，結果沒有在廣 場議會上通過(李祿，會頁二三八；當時所有報導都是「建議」)，便是標誌著首聯對指揮部的權威實際上在廣場議會之下：首聯只能「建議」，表決權則在「廣場 營地聯席會議」。

八、總體反思：習慣法 VS 成文法

這樣，指揮部的「上設」機構就從知識分子「議會」還原回廣場學生「議會」，而「學生議會」的召集者與主持人卻又是指揮部，這樣一來，指揮部便可以自說自話，收放自由了－－收，可以用首聯的「授權」來對抗北高聯；放，可以用學生「議會」的「民主」來對付首聯。

最發人深思的，是學生與中共的組織方式竟然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上述結構實際上就是一種典型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有廣場議會；集中，則在指揮 部。而到了五月底更是集中到「核心例會」，基本上就是李祿、柴玲和我三人的每日碰頭會。到了六月三日，連柴玲都不知道，李祿與我商量要取代她作總指揮，我 取支持態度，因為運動中的經歷和廣場上的混亂局面【以上第 376 頁】

使 我感到確實有此必要，結果這一計劃自然是被六四打斷了。這不正是以民主始、以集權終的又一例證嗎？我無意誇大個人的作用，也不認為這就會怎樣，但我覺得我 們實際上沒有跳出黨文化的框限。這是很值得反思的。另外，指揮部－廣場議會－首聯，與中共－人大－政協之間，不知道是否也可作類比。我對政治理論知識有 限，還是留待有關專家來作分析。

最發人深思的，是學生與 中共的組織方式竟然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上述結構實際上就是一種典型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有廣場議會；集中，則在指揮部。而到了五月底更是集中到「核心例會」，基本上就是李祿、柴玲和我三人的每日碰頭會。到了六月三日，連柴玲都不知道，李祿與我商量要取代她作總指揮，我取支持態度，因為運動中的經 歷和廣場上的混亂局面【以上第 376 頁】使我感到確實有此必要，結果這一計劃自然是被六四打斷了。這不正是以民主始、以集權終的又一例證 嗎？我無意誇大個人的作用，也不認為這就會怎樣，但我覺得我們實際上沒有跳出黨文化的框限。這是很值得反思的。另外，指揮部－廣場議會－首聯，與中共－人 大－政協之間，不知道是否也可作類比。我對政治理論知識有限，還是留待有關專家來作分析。

去年一個會上有人說：中共只講「習慣法」，而不顧「成文法」，對憲法和法律隨意取捨。我一聽，當時便反省道：實際上學運發展到後期，也是「習慣法」佔上 風，若真拿條文來對，很多組織與個人便站不住腳，比如我自己並沒有絕食卻作了絕食團的副總指揮。本文分析的一些學運組織與個人也都都顯示出許多「成文法」 上的問題。共產黨「打江山坐江山」，學運組織後來也是看「老資歷」，看知名度，甚至「個人魅力」。

最近重讀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發現她早已用「成文法」對「習慣法」的模式來分析中共的權力結構。她說，「中國社會的兩極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有時

也表現 出驚人的一致︰一般均不拿『成文』憲法要求他們的領導黨，而更多的是談黨的政策和領導人的講話精神。」(頁一七八)滑稽的是，許多人在評議八九學運時，也 是同一思路：只關注幾個「領袖」的講話精神，卻漠視各組織的代表性和民主程序。王超華也有類似觀察(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本文進一步發 現，八九學運期間對民主程序的強調雖然是一個進步，但還未擺脫專制下的習慣藩籬。而在專制下怎樣才能自覺掙脫身上和心裡的雙重枷鎖，確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 問題。

另外，本文定稿前我讀到一篇反思文章，覺得很有道理，特別加寫此段。在《「六□四」【以上第 377 頁】反 思錄》中，北大八六級本科生唐山提到籌委會在成立後不久宣佈的組織原則是：１、新的籌委會由以下同學組成；２、新的籌委會委員由已有的籌委會委員提名並選 舉產生；３、並通知全體同學，徵求大家的意見。他說可能還有第四條：「為保護參加同學的人身安全，籌委會中的部分職務對外保密」。他觀察道：這種「小『政 治局』式的組織方式」，無論是北大籌委會，還是北高聯，還是以後的絕食團，採取的似乎都是這一組織形式——只是發號召，採取行動，宣佈組織人員名單，開新 聞發布會；領導著大家前進——甚至不怎麼再宣佈「組織原則」。(華夏文摘 cm9310c)民主機制要在這種基礎上逐步摸索出來，其艱難可想而知。民主機制 在八九學運中的建立，有一個艱難的過程。最大的困難是我們只有想像中的民主，卻從無體驗，因此得從零開始——其實是負數，即中共黨文化下的許多不良習慣。 可以預測，這個障礙在未來的民主運動中也難以避免。

另外，本文定稿前我讀到一篇反思文章，覺得很有道理，特別加寫此段。在《「六□四」【以上第 377 頁】反 思錄》中，北大八六級本科生唐山提到籌委會在成立後不久宣佈的組織原則是：１、新的籌委會由以下同學組成；２、新的籌委會委員由已有的籌委會委員提名並選 舉產生；３、並通知全體同學，徵求大家的意見。他說可能還有第四條：「為保護參加同學的人身安全，籌委會中的部分職務對外保密」。他觀察道：這種「小『政 治局』式的組織方式」，無論是北大籌委會，還是北高聯，還是以後的絕食團，採取的似乎都是這一組織形式－－只是發號召，採取行動，宣佈組織人員名單，開新 聞發布會；領導著大家前進－－甚至不怎麼再宣佈「組織原則」。(華夏文摘 cm9310c)民主機制要在這種基礎上逐步摸索出來，其艱難可想而知。民主機制 在八九學運中的建立，有一個艱難的

過程。最大的困難是我們只有想像中的民主，卻從無體驗，因此得從零開始－－其實是負數，即中共黨文化下的許多不良習慣。 可以預測，這個障礙在未來的民主運動中也難以避免。

九、我的反省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那天，我的電腦硬盤壞了。這個偶然竟成為我和柴玲逐步捲入運動的起點。五四後硬盤修好，我也「復課」回北大遙感所趕論 文，準備六月中的碩士答辯。但就這麼巧，第二天硬盤又壞掉，我這才義無反顧地投身學運。提到此事，可以說明運動中我為何缺乏準備與自信，也可以證明我當時 的幼稚，以為還能畢業。甚至屠城後逃亡，我都帶著波士頓大學的博士獎學金通知書，以為還趕得上九月份的開學。一個理科學生，簡單和無知如此，【以上第 378 頁】卻跑去承擔運動的某些角色，實在是不自量力。九一年我寫了一 篇《反思中的困惑》，最後引用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辭去北高聯主席等職務時的一句話：「這場運動，必須由像我這樣的一批對社會缺乏認識，又沒有受過法 律、政治等方面系統訓練的學生來領導，這個事實本身，實在是歷史的悲哀。」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 耀邦去世那天，我的電腦硬盤壞了。這個偶然竟成為我和柴玲逐步捲入運動的起點。五四後硬盤修好，我也「復課」回北大遙感所趕論文，準備六月中的碩士答辯。 但就這麼巧，第二天硬盤又壞掉，我這才義無反顧地投身學運。提到此事，可以說明運動中我為何缺乏準備與自信，也可以證明我當時的幼稚，以為還能畢業。甚至 屠城後逃亡，我都帶著波士頓大學的博士獎學金通知書，以為還趕得上九月份的開學。一個理科學生，簡單和無知如此，【以上第 378 頁】卻跑去 承擔運動的某些角色，實在是不自量力。九一年我寫了一篇《反思中的困惑》，最後引用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辭去北高聯主席等職務時的一句話：「這場運 動，必須由像我這樣的一批對社會缺乏認識，又沒有受過法律、政治等方面系統訓練的學生來領導，這個事實本身，實在是歷史的悲哀。」

但是今天，我不能依然滿足於用無知來阻礙進一步的反省。回想過去在組織

方面的失誤，至少還有以下幾點：

一是對北高聯的錯誤態度。強調民主程序也許沒錯，高聯成立時的代表性也許也有問題，但這種質疑態度到了後來卻有失公正。我沒能審時度勢，眼光只盯在北大 籌委會內部的組織建設，沒有意識到運動發展之迅猛而必須有一個一統而強力的組織。後來到了高聯，甚至作過一周的主席，卻沒有抓住機會盡力鏟除高聯內的一些 不良習氣，反而一走了之。而這種消極態度又帶回北大，結果是助長了對高聯的不滿，從而削弱了運動統一領導的可能性。現在看來，如果我當時破釜沉舟，全力加 強高聯的組織建設，也許對運動會有更多正面的作用。

二是對指揮部的認識不足。絕食團指揮部與廣場指揮部，兩次成立我都不在，但我也沒去追究其合法性，甚至自己沒絕食都接受了副總指揮的頭銜。也就是說，我 採用了雙重標準，以前苛責北高聯，到了廣場卻以為指揮部有當然的合法性。尤其是對指揮部召集的「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的合法性認識不足。那時我完全陷入運動 的漩渦之中，滿足於處理事務，更沒去審時度勢。指揮部召集的代表大會置高聯於不顧，可以說是源於把北高聯當作「協調組織」而非「領導組織」;【以上第 379 頁】但廣場後期的成分變化，外地同學越來越佔主流，加上其流動性等等，「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的合法性則應該大打折扣，而我當時卻沒意識到其嚴重性。

二是對指揮部的認識不 足。絕食團指揮部與廣場指揮部，兩次成立我都不在，但我也沒去追究其合法性，甚至自己沒絕食都接受了副總指揮的頭銜。也就是說，我採用了雙重標準，以前苛 責北高聯，到了廣場卻以為指揮部有當然的合法性。尤其是對指揮部召集的「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的合法性認識不足。那時我完全陷入運動的漩渦之中，滿足於處理 事務，更沒去審時度勢。指揮部召集的代表大會置高聯於不顧，可以說是源於把北高聯當作「協調組織」而非「領導組織」;【以上第 379 頁】但廣場後期的成分變化，外地同學越來越佔主流，加上其流動性等等，「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的合法性則應該大打折扣，而我當時卻沒意識到其嚴重性。

三是忽視了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作用。對基層組織的偏重導致我對上層構架的漠然，對高聯如此，對首聯也如此。五二七建議三天後撤的首聯會議我也在場，也同 意撤，但沒有進一步意識到這是運動最後一次機會。雖然首聯實際上的作用不大，雖然六四終止了一切，但至少從理論上講，我的這種漠視也可能為日後的危機埋下 伏筆。

總之，我對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反感情緒障礙了我對全局的思考， 對自下

而上的組織造成的斷層及其在整體中的負面作用也認識不足，這是我最值得反省的地方。我曾在《反思中的困惑》中說阻撓五一四對話是我「最大的失誤」， 現在想來，這個「最大」怕是有問題，不能這麼封頂。最後強調一句，以上只是捫心自問，反思並非是要誇大自己的作用；其實個人在運動中的作用極有限，我歷來 強調這一點，此處也不例外。(一九九八年二月於巴黎)【以上第 380 頁】

是深入考查八九民運史料的時候了

一、現代傳媒－－誤導八九民運史的原因之一

粗略分來，人事有兩類表象：內向與外向。外向的人與事在現代社會有較多的表現機會，特別是通訊、傳媒極度發達之今日。相對而言，內向型的人和事受到社會 重視的機會就少很多。八九民運，正是在內向型文化中長成的一群人所從事的一場外向型運動，其中的人與事，從內在到表象，本來分有許多不同的層次。而在一九 八九年五、六月，雲集北京的全世界二千多記者，只是非常集中地反映了表面一層，即一些熱鬧場面和幾個焦點人物。這在當時，對於引起全世界對這場運動的關 注，起了關鍵作用，就這一點而言，中國幸莫大焉。

不過，當時這麼高速、集中的新聞報導，也起了不少誤導作用，除了介入學運組織架構、製造「明星」、「領袖」，無知地與中共糾纏「天安門廣場死亡人數」以 外，對於後來研究八九民運發生發展過程、運動組織運作與決策過程及更深層的文化、價值背景等，也在無形中起了「障眼法」的誤導作用。因為對表層的過分關 注，相對而言，自然減少了人們對內在、深層的認識。【以上第 381 頁】

已出版的多數八九民運史料皆受當時報導之框限。

不過，當時這麼高速、集 中的新聞報導，也起了不少誤導作用，除了介入學運組織架構、製造「明星」、「領袖」，無知地與中共糾纏「天安門廣場死亡人數」以外，對於後來研究八九民運 發生發展過程、運動組織運作與決策過程及更深層的文化、價值背景等，也在無形中起了「障眼法」的誤導作用。因為對表層的過分關注，相對而言，自然減少了人 們對內在、深層的認識。【以上第 381 頁】

已出版的多數八九民運史料皆受當時報導之框限。

現在，是深入考查八九民運史料的時候了。

二、《回顧與反思》一書的史料價值

三、九一巴黎研討會的局限

（作者一九九八年按：以上兩節內容與序重複，此從略。全文見香港《前哨》一九九三年六月號。）

四、第二手理論家－－誤導八九民運史原因之二

越來越匆促的現代生活，使大多數現代傳媒的普通觀眾與讀者受限於浮淺的報導，這尚情有可原。奇怪的是，許多學者、「精英」、「理論家」，也追逐這些表面 的東西而媚俗，無不令人汗顏。平常生活中，我們要認識一個人，也不僅聽其言，還要察其行；我們信任一個人，也是因為了解他，是其人格力量在其言語背後說 話，何況我們要認識、研究、總結、評論的，是一場如此錯綜複雜的超大規模社會運動，怎麼就能只根據倉促之中報導和幾個「明星人物」的言論來評判這場運動 呢？報導可以「客觀地」記載事件的表象，可以轉述當事人的言詞，而在判斷當事【以上第 382 頁】人的可信度及人格方面，到底又能傳達多少信息給讀者與觀眾呢？在這個技術卓絕而生活倉促的現代社會，我們被言詞與影像所欺騙的例證難道還少嗎？

越來越匆促的現代生活，使大多數現代傳媒的普通觀眾與讀者受限於浮淺的報導，這尚情有可原。奇怪的是，許多學者、「精英」、「理論家」，也追逐這些表面的東西而媚俗，無不令人汗顏。平常生活中，我們要認識一個人，也不僅聽其言，還要察其行；我們信任一個人，也是因為了解他，是其人格力量在其言語背後說話，何況我們要認識、研究、總結、評論的，是一場如此錯綜複雜的超大規模社會運動，怎麼就能只根據倉促之中報導和幾個「明星人物」的言論來評判這場運動呢？報導可以「客觀地」記載事件的表象，可以轉述當事人的言詞，而在判斷當事【以上第 382 頁】人的可信度及人格方面，到底又能傳達多少信息給讀者與觀眾呢？在這個技術卓絕而生活倉促的現代社會，我們被言詞與

影像所欺騙的例證難道還少嗎？

不幸的是，一般觀眾與記者所接受的，多是這麼些表面印象，其中每每可嗅到商業和政治的氣息，而我們的一些所謂「民運理論家」，竟然也勇於憑藉這樣一些第 二手資料，在「六四」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給這麼一場宏大的運動把脈問診，作起總結來，明明知道「作為一項歷史事件的純粹的觀察者，在有關事實掌握得不充 分、不準確的情況下，匆匆作出自己的總結，可能是輕率的」，卻強說「作為一場現實運動的投入者，我們有必要及時地對這場運動作出我們的回顧。」其理由，在 同一宏文中透露出來，「民運應有強烈的功利意識……沒有這種強烈的、自覺的、清醒的、現實的功利意識，我們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 成。」

真是慚愧，大概就是因為我們不懂得「搞政治」，沒有「清醒的功利意識」，才導致了「失敗並非不可避免的八九民運的失敗」。更加愧疚的是，時至今日，我也 沒弄清，當時廣場上到底有多少學生與市民想到了要「搞政治」？在機槍與坦克前流血喪生的英魂是否都有「清醒的功利意識」？實在愧對這位「現實運動的投入 者」，北京的市民和學生欠他的「現實功利」何其多矣！

他的這本賬，不僅在九〇年四月就開始來討－－當時來不及列出第一手的單據尚屬情有可原，兩年後，又一字不改地列入《中國民運反思》那樣的巨著－－卻依舊 堂皇地用第二手材料；依舊謙虛地聲稱，「在有關事實掌握得不充分、不確定的情況下，匆匆作出自己的總結，可能是輕率的」；依舊堅稱「有必要及時地對這場運 動作出我們的回顧」；依舊要「功利」、「搞政治」。【以上第 383 頁】

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廣場，是人心匯成的磁場。可惜心靈的磁場無法簡單透過文字與鏡頭來傳達，可惜被言詞與影像蒙蔽了心靈的並不只是這位「第二手理論家」，還有一些坐在書齋裡的學者、教授對這一群不懂得「搞政治」的娃娃口誅筆伐。

五、下一步：無名氏研究

也許，這場外向型的運動的外在已經表現夠了；也許，這場運動的精髓當在這群內向型文化中生長的人；也許，我們應當「於無聲處聽驚雷」。也是九〇年四月， 剛逃出國門，來到巴黎，卻見到《民主中國》創刊號封底的兩幅「未來中國國旗」，立即聯想到一九八九年五月廣場上一個絕食棚上的幾個大字：「縱使無名，也頂 天立地」。反差太大。一方面滿地皆是「領袖」、「精英」，卻從未聽說有誰流了一滴血；另一方面是上千英魂血灑長安街，卻多隱姓埋名。

我想，下一步當留心的，是那些無名氏。因為，他們才是中國的脊樑，是未來中國真正的希望。（一九九三年五月廿二日 作於巴黎）【以上第 384 頁】

讀丁子霖老師「六□四」七週年祭文有感

丁子霖老師在「六□四」七週年有篇祭文，題為「多一份道義，多一份承擔－－為『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和生者而作」。(CND 華夏文摘 Zk9606，中國之春一九九六年六月)讀畢，感慨良久。茲以此文，聊陳心跡。

一、道義責任

丁老師是死難者的母親。她十七歲的獨子蔣捷連屬最早一批烈士，六三之夜十一時在木樨地二十九號樓前的花壇邊中彈犧牲。當讀到「我不能期望殺戮者懺悔自己 的罪孽，但我有權要求運動的發起者尤其是運動的領袖們對運動所帶給民眾的苦難負起道義的責任」這句話時，倖存者的愧疚再次攝取我心。儘管我歷來不敢以「學 生領袖」自居，儘管我一直堅持運動的主體精神並非幾個所謂「領袖」或「精英」所能代表，但作為當時一些決策的參與者，我對運動的悲慘結局也有責任。【以上 第 385 頁】
丁老師以長者的胸襟寬厚地說，「當時學生最大的過錯是太天真，沒有充分認識中國政府的殘暴。」直到開槍，許多 同學還以為不過是橡皮子彈。感謝丁老師對整個學生群體的理解，但我不認為自己可以幸免。我早有準備，「等待審判」，不僅是主張撤離的人們的審判，還有那些 主張堅守的：雖然今天人們似乎覺得撤比不撤好，雖然六四凌晨決定撤離的口頭表決也算某種民主程序，但在等量齊觀的「堅守」與「撤離」的喊聲之間，因為選擇 了後者，我有朝一日還是不能不去面對北京市民－－他們當中，有的曾在長安街等各個街口阻攔軍車，有的親人倒在長安街上，有的親自到過廣場衝著指揮部喊道： 我的兄弟已經死了，就是為了你們能夠堅守在廣場，你們怎麼可以臨陣脫逃？！對此我不知如何回答。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九一年《反思中的困惑》中用了「為何要 撤？－－道德勇氣的淪喪？」這樣的小標題。我寫道：「與堅守廣場、不怕犧牲相悖的事實是：學生最後和平撤離了廣場；從各方面的統計看，犧牲最大的是市民， 『學生領袖』還沒聽說有誰傷亡。作為局中人，我難以對道義問題自加評說，因此將當時心理歷程作個記錄，由大家論斷。……」那時，我就在「等待審判」。

二、要求回國受審

我不認為自己可以幸免，歸於這類「最大的過錯是太天真」的學生，這裡還有別的緣故。同文第三節，以「阻撓五一四對話是我最大的過失」為題，除較為詳述這一問題以外，還提到另【以上第 386 頁】外 五點過失。但今天看來還很不夠。如果柴玲確實有「讓別人流血，而自己要逃生」的打算，如果指揮部真有「秘密策略」誘導中國政府屠殺的話，那麼作為指揮部的 一員，我的「最

大的過失」便不是「阻撓五一四對話」了——那不止是「過失」，簡直就是罪惡。對此我也不能自加評說，因為我也不可以自稱瞭解了全部真相。我 所要求的，只是一個基於事實的審判。

我不認為自己可以幸免，歸於這類「最大的過錯是太天真」的學生，這裡還有別的緣故。同文第三節，以「阻撓五一四對話是我最大的過失」為題，除較為詳述這一問題以外，還提到另【以上第 386 頁】外 五點過失。但今天看來還很不夠。如果柴玲確實有「讓別人流血，而自己要逃生」的打算，如果指揮部真有「秘密策略」誘導中國政府屠殺的話，那麼作為指揮部的 一員，我的「最大的過失」便不是「阻撓五一四對話」了－－那不止是「過失」，簡直就是罪惡。對此我也不能自加評說，因為我也不可以自稱瞭解了全部真相。我 所要求的，只是一個基於事實的審判。

我不怕審判，更要求回國公開受審。九一年六月和七月，我已兩度進入中共駐巴黎大使館，就是為此要求而去。當時中國政府宣稱已經公開審理了王丹、王軍濤等 人的案件；而一些西方政客竟亦同聲附和。我並非要滯留西方貪圖什麼，也不是要逃避法律責任，而是認為中國政府沒有公開和公正地審理六四問題。這是我在西方 流亡的基點，如果這一基點動搖，人格與自尊也不許我逃避責任回國受審。那兩次大使館都拒絕受理，詳情見《九一六四備忘錄》。

人格與自尊同樣不許我作出背離歷史而媚俗的事。雖然八年後的今天，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變化，比如對傳統文化的再認識，但是，我不會忘記我們的初衷，那股 凝集在廣場上的精神。頭腦可以變，心不可變。底線就是不可為屠殺者推卸責任。而且，言論的轉變也至少應當作個說明，否則昨天一套今天又一套，只能歸之於風 派牆頭草。

三、不要為凶手開脫

這條底線，我會至死不渝。為了自己的初衷，也為了那些再也不能表白的死者，還有他們【以上第 387 頁】無 辜的親屬。「我真氣啊！我真氣啊！為啥不對我說清楚？為啥要開槍打死我的兒子？」這是一位農村婦女在兒子墓前的哭訴。那是九五年春天的一個陰雨天，丁老師 也與她相擁而哭，倒在墳頭。死難者的母親一再喃喃地重複著這句話。丁老師寫道，「她不清楚的也沒有想到要弄清楚的，是當年的民運領袖今天究竟在做些什麼。 我想，作為七年前那場運動

的領袖，不管是自己認為屬於『溫和派』的，還是被別人認為屬於『激進派』的都應該想一想自己為這位母親做了些什麼：至於是『激 進』還是『溫和』，我想這位母親是不會有興趣去追問的。」

這條底線，我會至死不渝。為了自己的初衷，也為了那些再也不能表白的死者，還有他們【以上第 387 頁】無 辜的親屬。「我真氣啊！我真氣啊！為啥不對我說清楚？為啥要開槍打死我的兒子？」這是一位農村婦女在兒子墓前的哭訴。那是九五年春天的一個陰雨天，丁老師 也與她相擁而哭，倒在墳頭。死難者的母親一再喃喃地重複著這句話。丁老師寫道，「她不清楚的也沒有想到要弄清楚的，是當年的民運領袖今天究竟在做些什麼。 我想，作為七年前那場運動的領袖，不管是自己認為屬於『溫和派』的，還是被別人認為屬於『激進派』的都應該想一想自己為這位母親做了些什麼：至於是『激 進』還是『溫和』，我想這位母親是不會有興趣去追問的。」

我真不知道那些在海外為屠殺辯護，說李鵬「已經作出了事實上的讓步，與學生公開對話了」的「民運理論家」，日後何顏回國見江東父老？你敢面對這位母親說，「學生賴在廣場不走，政府讓了步也不撤只好開槍」嗎？讓我們聽一聽丁老師的呼聲：

「如果得出結論說，當局的鎮壓是迫不得已（這樣的話不僅出自中國政府官方，而且出自某些民運『精英』），屠殺是學生逼出來的，那就是對歷史的歪曲。」「如果依照現在有些朋友所作的那樣的「反思」，那麼中國的老百姓永遠只能做中國政府暴政下的順民，成為萬劫不復的奴隸。」「我發現，我兩年前的那段話竟一 再被某些民運理論家引用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似乎我也是主張把運動導致鎮壓的後果歸咎於激進派學生的。這完全是一種誤解。」

四、原原本本的事實

【以上第 388 頁】

但是，「勿庸置疑，當年的學生領袖要對運動的後果承擔起道義的責任，尤其是在發生了如此慘烈的流血事件之 後。他們能活著撤離天安門，是以許多同胞的生命為代價的。」丁老師的這句話，又一次說到我的心裡去了。作為活著撤離天安門的指揮部成員，倖存者的內疚將伴 此一生。對於同胞的犧牲，我也責無旁貸。但是，用什麼方式去承擔責任呢？丁老師開篇說的那種「隔」的感覺，我也深有同感：「現在去爭論運動是否『激進』， 是否需要『見好就收』，以及學生領袖的功過究竟應該是『三七開』還是『二八開』之類問題，總讓人有一種『隔』的感覺。」我既不敢學毛澤東去抽象地分幾開功 過，也不願隨大流而媚俗，作一些空洞不實的「反思」。我以為承擔的方式有二：充實自己和整理史實，這是我在海外能做且當做之事，但至今皆乏善可陳，此吾之 憂。

丁老師接著寫道：

「許多深層的東西乃至內幕沒有被揭露，這不僅是指中共官方的，而且也包括民運方面的，何況許多當時已經被揭露的事情現在也漸漸地淡忘、湮沒了。我不知道 爭鳴者能拿出什麼有分量、有說服力的事實去同別人爭鳴。比如有爭鳴者說如果當時學生能『見好就收』就可以避免流血，我就覺得此論缺乏有力的事實根據。…… 我們需要的是事實，是原原本本，沒有經過任何篩選和加工的事實。這個事實中共官方不可能向我們提供，但我們能否期望當年運動的參與者尤其是運動的領袖們向 我們提供呢？哪怕所提供的僅僅是單方面的事實。」【以上第 389 頁】

要原原本本的事實，這是受難者親友的心聲。丁老師又一次與同學們想到一起了，九一年巴黎會議就是為了核對史 實。王超華在最後一天公開會議上說：「這次會之所以能夠聚集在一起，我認為是大家基於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對八九民運的反思和總結需要在事實的基礎上，我們 這些當事人有責任對證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實。」（《回顧與反思》頁三五一）開始有的還想反思、總結整個民運，結果在一些同學的堅持下，訂立了只陳述不評判的 原則，僅在最後補充和公開討論部分才涉及對整個學運的反思，也強調了該會的局限性。（同上頁三四一－三五一）許多重要細節沒有時間敘述，許多細節也沒有時 間作更仔細的核實；加上同學到得不齊，記憶又可能各有誤差，一些情況只能並存「不同版本」，擱置待核。儘管如此，還是努力提供「原原本本，沒有經過任何篩 選和加工的事實」，也希望日後逐步補正。

五、巴黎會議與「隔的感覺」

丁老師所說的「隔的感覺」，我於巴黎會議也感到好幾重。第一種來自於同學自身。雖有十七位同學到會，但還是有幾位同學沒來。其中一位稱在辦美國綠卡暫不能出國，卻出現在加拿大的六四紀念會上。另一位「絕食發起人」經我三請答應到會，最後也沒來，說是「度假去了」。

第二重「隔」來自民運內部。急於「反思」的理論家們十分不滿會議沒有將反思作為主要討論內容。會議內容是在兩年後才公佈的，但會還沒開完已傳言四起，說學生們在爭功奪利，似【以上第 390 頁】乎大家關心的祇是「究竟誰是絕食書的作者」這樣的問題，某些民運刊物有關會議的介紹便僅限於此。一家最具實力的六四組織本願包下會議記錄的整理出版，也在十幾人的常委會上遭多數否決。

第二重「隔」來自民運內部。急於「反思」的理論家們十分不滿會議沒有將反思作為主要討論內容。會議內容是在兩年後才公佈的，但會還沒開完已傳言四起，說學生們在爭功奪利，似【以上第 390 頁】乎大家關心的祇是「究竟誰是絕食書

的作者」這樣的問題，某些民運刊物有關會議的介紹便僅限於此。一家最具實力的六四組織本願包下會議記錄的整理出版，也在十幾人的常委會上遭多數否決。

第三種「隔」來自其它方面。僑界當時早已因為某些「學生領袖」的公子作風大為不滿，這時也殃及池魚。有人在報上說：這些學生又出新花招，不過是想從美國 免費來法國玩！殊不知許多同學是會議頭天到，結束第二天便回去了。尤其是王超華、常勁與梁二，他們都是初次到巴黎，除了巴黎的飛機場、地鐵和會址所在的法 蘭西學院以外，我真懷疑他們還見過甚麼「巴黎風光」！會議沒有旅館費，外地來的都住在友人家。

六、呼籲第二次會議

不過，眾人拾柴火焰高，我們還是得到了不少的支持。主持會議的巴黎「民主之家」先後收到共約兩萬三千美元(八萬零八百六十八□九九法郎和七千五百美 元)，雖不到預算的一半，畢竟將會開成了。除了不設旅館費以外，會議還有兩大節約：一是法蘭西學院十分看重該會的史料價值，提供了免費會議廳和價廉物美的 午餐；一是魯老闆的義氣，「紅寶石」餐館免費包了會議期間的所有晚餐。上述花銷帳目包括直至九二年十月的錄音整理、打字費。民主之家有詳細帳目，我手中也 有副本，隨時可查。【以上第 391 頁】

但預算中的出版費卻遲遲未能落實，會後再找就更難。這時我更體會到「隔」的感覺及其對實際事務的阻力。最後 才從美、德幾個學生會那里找到一些贊助，終於在九三年由德國萊茵筆會協助出版了會議記錄《回顧與反思》。說起來真是可憐，加上幾位留德學人私下墊的錢，總 共才印了不到三百本。這真可悲，六四捐款不下數千萬美元，而同學們能用於整理六四史料的卻如鳳毛麟角。不是指責誰，只想說：請多少關注一下整理六四史料的 工作。

具體來說，建議年底舉辦「八九民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由參與了八九民運的知識分子與六四學生為當事人，加上關心八九史實的學者一道參加。內容擴展 到整個「民運」，超越第一次會議「北京學運」的局限，至少應當包括知識界、新聞界、工人市民以及黨內鬥爭情況。時間可選在大家都休假的聖誕節期間，最好不 少於七天。也可分多組討論，比如學運內部還有大量細節需要核實。

另外，也應當成立相關的具公信力和透明的基金會，並請各個因六四而得到捐款的基金會和組織轉撥符合情理的比例的餘款，以便對類似的會議和書籍等六四史料 整理工作進行財政支持。我相信，六四死難者的親屬也希望將部分捐款用於探究真相。請記住丁老師的呼籲：「我們需要的是事實，是原原本本，沒有經過任何篩選 和加工的事實」。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於巴黎，一九九八年元月修訂於巴黎。作者按：本文曾投給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結果既未發表，也不說明理由。)【以上第 392 頁】

民主是手段還是目的?

－－困惑中的反思

一些零碎的思緒，久積於心，不吐不快。由粗而細，整理出來，獻給那些為了中國的自由與富強而堅持信念的人們。

一、民主競選：文化心理的反思

許多人一提到民主政治，馬上就想到美國的總統大選。然而，競選是否契合國人的文化心理，我有大困惑。

西方人講競爭、高標自我，中國人講謙讓、推重整體，這一文化差異雖然越來越模糊，大致傾向怕是還在。競選需言己之長、揭人之短，這在國人的修養中卻是大忌。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老言「不爭」，佛說「忍辱」，就連中共也講「謙虛謹慎」，無論傳統還是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倫理，國人還是推崇「謙謙君子」式的修養。即便相當西化的民運圈內，某某「愛出風頭、【以上第 393 頁】驕傲自大」，諸如此類，也還是平常的道德評判詞語。如此文化心理影響下的人群，又怎能靠競選而獲取以德服眾的一流人才呢？注重修養的人物，首先就很難說會主動出來爭個甚麼位子，這套競選機制又如何生效？即便勉為其難，出來競選，而「君子不黨」，怎麼理直氣壯去拉選票呢？況且，「君子訥於言」，就算迫於形勢去拉選票，又如何辯得過能說會道之士？再退一步，即便這麼爭來一個位子，困於一群靠表演而獲選的「秀」才當中，又能有何作為呢？

西方人講競爭、高標自我，中國人講謙讓、推重整體，這一文化差異雖然越來越模糊，大致傾向怕是還在。競選需言己之長、揭人之短，這在國人的修養中卻是大忌。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老言「不爭」，佛說「忍辱」，就連中共也講「謙虛謹慎」，無論傳統還是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倫理，國人還是推崇「謙謙君子」式的修養。即便相當西化的民運圈內，某某「愛出風頭、【以上第 393 頁】驕傲自大」，諸如此類，也還是平常的道德評判詞語。如此文化心理影響下的人群，又怎能靠競選而獲取以德服眾的一流人才呢？注重修養的人物，首先就很難說會主動出來爭個甚麼位子，這套競選機制又如何生效？即便勉為其難，

出來競選，而「君子不黨」，怎 麼理直氣壯去拉選票呢？況且，「君子訥於言」，就算迫於形勢去拉選票，又如何辯得過能說會道之士？再退一步，即便這麼爭來一個位子，困於一群靠表演而獲選 的「秀」才當中，又能有何作為呢？

因此，在以謙讓為美德的群體當中，所謂民主競選，是否會適得其反？我稱這種現象為「負淘汰」：本來選舉的目的是為了淘汰掉次品，然而在國人當中實踐的結 果，淘汰掉的卻常常是賢良方正之士。由上面的討論我們發現，所謂「負淘汰」可有三期反應：第一期，賢能之士恥於競選；第二期，出來競選又多敗北；第三期， 僥幸獲選也無能為力。於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我這麼說，絕非空穴來風，幾年來的實踐與觀察才有此反省。當然也得申明，這裡說的衹是一種相對的趨勢， 不是說選出來的都不行，希望不要對號入座。

那麼，為何西方就能通過競選而獲得優秀人才呢？我曾就這個問題與歐洲人討論，結果他們也不認為選出來的就是最好。可能一流人才是在哪兒都難以通過競選獲得；中西差別也許衹是西方人選出二流人才，國人則常常選出三流乃至末流人才。

西方人尚能選出較為賢能之士，應當說與其近幾百年來競爭意識的培養有關。其實，西方在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尚爭的歷史也不僅僅是在中世紀之後，希臘羅馬已 然，只不過中世紀基督教精神對此稍有緩衝而已。而在宗教與文化上，西方也一直相對於東方哲學有較強的擴張意識。【以上第 394 頁】比 如西方信徒喜歡傳教，中國人則「只聞來學，不聞往教」。又如哲學 Philosophy、智慧 Sophy 與詭辯家 Sophist，在西文詞源上並不遠。中世 紀歐洲社會的中心是神甫，現代西方則是商人、律師與政客，皆能言善辯之士。工業革命後的西方教育中，基督教的謙卑美德逐步隱退，優勝劣汰的競爭意識漸居上 風。在社會整體尚爭的風氣之下，以民主的競選方式篩選出賢能之士的概率就要大得多。

西方人尚能選出較為賢能 之士，應當說與其近幾百年來競爭意識的培養有關。其實，西方在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尚爭的歷史也不僅僅是在中世紀之後，希臘羅馬已然，只不過中世紀基督教精 神對此稍有緩衝而已。而在宗教與文化上，西方也一直相對於東方哲學有較強的擴張意識。【以上第 394 頁】比如西方信徒喜歡傳教，中國人則 「只聞來學，不聞往教」。又如哲學 Philosophy、智慧 Sophy 與詭辯家 Sophist，在西文詞源上並不遠。中世紀歐洲社會的中心是神甫，現代西方則是商人、律師與政客，皆能言善辯之士。工業革命後的西方教育中，基督教的謙卑美德逐步隱退，優勝劣汰的競爭意識漸居上風。在社會整體尚爭的風氣之 下，以民主的競選方式篩選出賢能之士的概率就要大得多。

中西既有如此差異，那麼尚爭好還是講讓好呢？也許這並非二元抉擇，這麼非此即彼的提問本身可能就有問題。我對此考慮得還不成熟，只好先閉嘴，也藉此機會請教大家。

二、「愛國」與「民主」

民主到底是目的還是手段？尤其對於八九民運？這是我的另一大困惑。很顯然，民主不是食物，民主也不是人生幸福本身。民主甚至也不必然導致社會安定與國家 富強，歷史和現實中正反兩方面的例證並不缺乏。這樣一來，民主便不應該是目的；它最多只能是一個階段性的目標。它更應該是一種手段，比如是達成政治清明、 社會穩定、國家富強等等目標的手段。八九民運中喊的都是「愛國民主運動」，在「民主」前面加上「愛國」，我覺得並非祇是因為共產黨灌輸的「愛國主義」的結 果。中國近代的衰落和列強的欺壓給國人留下的烙印太深，潛意識中的「強國夢」經久不衰，一九八九年把民主當作富強的手段，應該是許多人的深切情懷。也許不 是全體,【以上第 395 頁】但我相信一定不在少數。其中的邏輯可能並不複雜：西方就是因為民主體制才富強起來的，中國為何不能？

民主到底是目的還是手 段？尤其對於八九民運？這是我的另一大困惑。很顯然，民主不是食物，民主也不是人生幸福本身。民主甚至也不必然導致社會安定與國家富強，歷史和現實中正反 兩方面的例證並不缺乏。這樣一來，民主便不應該是目的；它最多只能是一個階段性的目標。它更應該是一種手段，比如是達成政治清明、社會穩定、國家富強等等 目標的手段。八九民運中喊的都是「愛國民主運動」，在「民主」前面加上「愛國」，我覺得並非祇是因為共產黨灌輸的「愛國主義」的結果。中國近代的衰落和列 強的欺壓給國人留下的烙印太深，潛意識中的「強國夢」經久不衰，一九八九年把民主當作富強的手段，應該是許多人的深切情懷。也許不是全體,【以上第 395 頁】但我相信一定不在少數。其中的邏輯可能並不複雜：西方就是因為民主體制才富強起來的，中國為何不能？

把民主當作富強的手段，如果這真的是一九八九年多數人的共識，很多現象也許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比如六四屠殺後人民並未大規模反抗，比如六四後的全民經商 熱。如果富強才是目的，而安定又是富強最基本的條件，那麼老百姓寧願承受集權專制以換取穩定，也不願冒險反抗而喪失必須的社會秩序，這也許就不是沒有道理 的了；如果民主不過是手段，那麼，六四後民眾發現通往民主的政治改革暫時此路不通，自然可以把它先放一放，轉而投入全力發展經濟，富強的目標並沒變，從長 遠來看也是為民主鋪路。由此，我們可能會發現，其實六四過後，國人並未放棄初衷，六四精神根本沒有熄滅，只不過換了一種形式罷了。八九民運，在我的理解當 中，根本上是為中國尋找希望、尋求精神動力的一場運動。這一理解有多大的普遍性，是需要考證的問題。

民主到底是目的還是手段，這個問題對探討中國的前途也許不無裨益，尤其民運的前途。我為此困惑了很久。問題最初的提出是由於一個強烈的反差：民主精英們 到了海外，「民主」前面的「愛國」多半就給丟了，有的甚至批判「愛國」，尤其是在力促西方制裁中國的時候。六四後我在國內逃了十個月，親身體驗到西方經濟 制裁對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影響，因此出來時這一反差就特別強烈。海外民運團體普遍有一種「民主至上」的傾向，似乎中國只要民主了就好，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 解，至於是否會有大亂的危險，二、三十年代的軍閥混戰是否可能重演，未見人討論；民主成為一種價值、一種目的，以至於不正視現實，過分抬高前蘇聯、東歐而 貶低中國大【以上第 396 頁】陸近期的經濟成就，也一直迴避討論印度、 拉美一些推行民主的國家何以不能富強，目光只盯著離與中國現實很遠的美國。我不知道如何解釋海外民運與國內民眾的這種隔閡。這只是由於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 嗎？還是有個人及團體利益的因素？如果因為在西方只談民主不談愛國而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就不再顧及國內民眾的反應，這又如何談得上繼承了一九八九年的基本精 神呢？丟了「愛國」，不就會比中共更不得人心嗎？

民主到底是目的還是手段， 這個問題對探討中國的前途也許不無裨益，尤其民運的前途。我為此困惑了很久。問題最初的提出是由於一個強烈的反差：民主精英們到了海外，「民主」前面的 「愛國」多半就給丟了，有的甚至批判「愛國」，尤其是在力促西方制裁中國的時候。六四後我在國內逃了十個月，親身體驗到西方經濟制裁對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影 響，因此出來時這一反差就特別強烈。海外民運團體普遍有一種「民主至上」的傾向，似乎中國只要民主了就好，一切問題

就能迎刃而解，至於是否會有大亂的危 險，二、三十年代的軍閥混戰是否可能重演，未見人討論；民主成為一種價值、一種目的，以至於不正視現實，過分抬高前蘇聯、東歐而貶低中國大【以上第 396 頁】陸近期的經濟成就，也一直迴避討論印度、拉美一些推行民主的國家何以不能富強，目光只盯著離與中國現實很遠的美國。我不知道如何解釋海 外民運與國內民眾的這種隔閡。這只是由於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嗎？還是有個人及團體利益的因素？如果因為在西方只談民主不談愛國而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就不再顧 及國內民眾的反應，這又如何談得上繼承了一九八九年的基本精神呢？丟了「愛國」，不就會比中共更不得人心嗎？

三、原則問題

民主應不應該是目的，這一疑惑也部分來自於八九學運中的實踐。那時我們把它看得那麼神聖，寧願犧牲效率也要盡力推行民主。比如最後廣場上的「營地聯席會 議」，如今許多人已經看出它的問題，像流動性太大而代表性有限等等。其實我想問題主要還不在於此，因為當時並非沒有學運骨幹意識到這些毛病，問題是我們又 能用甚麼別的「民主機制」來組織學運呢？批評家往往忽視了現實可能性，至今也沒看到有誰說究竟應當怎麼辦。那個時候，只要我們還堅持「民主原則」，只要我 們還不得不由在場的各校同學推選代表參加「營地聯席會議」的表決，只要我們還沒有退回到「全黨服從中央」式的「民主集中制」甚至獨裁，撤離廣場的決定應該 說是注定不能在屠殺前得到多數通過的。即便當時兩度喊撤而被廣場上的同學哄下台的吾爾開希，不僅當時就承認錯誤(香港時報、東方日報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 日)，一年後都還在強調「歷史的必然【以上第 397 頁】性」並質疑「當時策略上的改變可能不可能」(《爭鳴》一九九〇年四月，頁二八)。

民主應不應該是目的， 這一疑惑也部分來自於八九學運中的實踐。那時我們把它看得那麼神聖，寧願犧牲效率也要盡力推行民主。比如最後廣場上的「營地聯席會議」，如今許多人已經看 出它的問題，像流動性太大而代表性有限等等。其實我想問題主要還不在於此，因為當時並非沒有學運骨幹意識到這些毛病，問題是我們又能用甚麼別的「民主機 制」來組織學運呢？批評家往往忽視了現實可能性，至今也沒看到有誰說究竟應當怎麼辦。那個時候，只要我們還堅

持「民主原則」，只要我們還不得不由在場的各 校同學推選代表參加「營地聯席會議」的表決，只要我們還沒有退回到「全黨服從中央」式的「民主集中制」甚至獨裁，撤離廣場的決定應該說是注定不能在屠殺前 得到多數通過的。即便當時兩度喊撤而被廣場上的同學哄下台的吾爾開希，不僅當時就承認錯誤(香港時報、東方日報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一年後都還在强 調「歷史的必然【以上第 397 頁】性」並質疑「當時策略上的改變可能不可能」(《爭鳴》一九九〇年四月，頁二八)。

注意這裡的兩難選擇：若要認同「民主原則」，那就得接受廣場後期難以通過撤離決議的現實；否則拋棄「民主原則」，施行集權乃至獨裁，即一些人主張的強力 領導，以使「見好就收、見壞就上」成為可能，但這是否也就意味著拋棄了民主運動的基點，這是我的另一重困惑。而持後一觀點的批評家主要還是民運的理論家， 也對民主原則忽略不計，這是我懷疑國人是否真會把民主當目的的另一個原因。有的理論家本來在戒嚴後高喊「見壞就上」，六四屠殺後見勢不妙又去責備廣場上的 幾十萬人沒有「見好就收」，去「反思」別人的道德。姑且不論其自身的品性如何，這八字訣本身又有何民主可言呢？要做到這樣收放自如，不又是一個共產黨了 嗎？在這兩極之間是否還有第三條路線，這很值得我們探討。

部分民主精英是否真要民主，嘴上非民主不可，行動中是否脫去了專制下的老套，這一疑惑久久壓在我心中。姑且再舉一例。這便是民陣成立時的結構問題。試 想，如果民陣採用團體會員架構，何以有今日之分崩離析？如果民陣真的是一個「陣線」，由港支聯、民聯、各國學自聯等團體構成，只要反對六四屠殺和一黨專制 便可加入，這樣的團體在當時少說也上千，中共又怎能分而治之？總不能與如此規模的海外華人作對吧？那麼，民陣成立時為何取消了原先章程草案中的團體會員設 計，怎麼就變成了個人會員制呢？我至今也沒弄明白。民陣到底是「民主陣線」還是「流亡者俱樂部」？這裡面有沒有獨佔資源的嫌疑？即便不從公心私心上去評 說，首先這樣的結構是否民主？當初要形成囊括海外那麼多團體而又民主的架構，除了團體會員這樣類似於強【以上第 398 頁】調 地方自治的「聯邦制」的架構外，還有別的甚麼出路？致力於大中華聯邦制設想的嚴家其老師支持團體會員制，又是第一屆主席，實際上卻起不了主導作用，這不止 是「負淘汰」的第三期反應嗎？如果「聯邦制」在最具民主意識的海外都無法嘗試，還有甚麼希望要求十幾億中國人接受呢？如果在海外自由的環境下最後也是「小 圈子運作」，那又怎麼企望在中國實行民主呢？如果在這個最希望民主

的群體中也難以實行民主的話，那麼我們是否應當正視現實，去尋求第三條路線呢？反思至此，我是徹底地困惑了。

部分民主精英是否真要民主，嘴上非民主不可，行動中是否脫去了專制下的老套，這一疑惑久久壓在我心中。姑且再舉一例。這便是民陣成立時的結構問題。試想，如果民陣採用團體會員架構，何以有今日之分崩離析？如果民陣真的是一個「陣線」，由港支聯、民聯、各國學自聯等團體構成，只要反對六四屠殺和一黨專制便可加入，這樣的團體在當時少說也上千，中共又怎能分而治之？總不能與如此規模的海外華人作對吧？那麼，民陣成立時為何取消了原先章程草案中的團體會員設計，怎麼就變成了個人會員制呢？我至今也沒弄明白。民陣到底是「民主陣線」還是「流亡者俱樂部」？這裡面有沒有獨佔資源的嫌疑？即使不從公心私心上去評說，首先這樣的結構是否民主？ 當初要形成囊括海外那麼多團體而又民主的架構，除了團體會員這樣類似於強【以上第 398 頁】調地方自治的「聯邦制」的架構外，還有別的甚麼 出路？致力於大中華聯邦制設想的嚴家其老師支持團體會員制，又是第一屆主席，實際上卻起不了主導作用，這不正是「負淘汰」的第三期反應嗎？如果「聯邦制」 在最具民主意識的海外都無法嘗試，還有甚麼希望要求十幾億中國人接受呢？如果在海外自由的環境下最後也是「小圈子運作」，那又怎麼企望在中國實行民主呢？ 如果在這個最希望民主的群體中也難以實行民主的話，那麼我們是否應當正視現實，去尋求第三條路線呢？反思至此，我是徹底地困惑了。

四、道義責任

六四慘烈的結局並未導致中共政權的迅速崩潰，中國在頂住了西方一段時期的經濟制裁之後反而出現騰飛之勢，這是許多預言家所始料未及的。在如此驚心動魄之 後，中國居然像一頭睡獅開始復甦，許多謀求祖國富強的人們甚至看到了極大的希望，那麼，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個問題便越來越無法迴避：在現實的歷史條件下，依 賴中共強大的組織力量所維持的至少表面上穩定的局勢，會不會正是目前中國經濟成就的一個必要條件？換言之，為了中國富強而必須的安定局面，鄧小平在一九八 九年是否不得已才鎮壓，以防更大規模的不穩定？將這一問題延伸的結果是：六四的責任應該由誰來負？ －－既然政府是塊石頭，

拿著雞蛋去碰，是不是明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這麼想，也不知道這是否就是近幾年來一些人士反思八九學生過於激進【以上第 399 頁】的 潛在邏輯，不過我覺得這樣的反思不是沒有意義的。雖然看出一些反思文章、報導與影片有背離歷史、曲解歷史的漏洞，雖然為此寫了許多駁正的文章，但我迄今探 討的主要還是真假問題，而非是非問題；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尤其有關道義責任，我反而覺得這些反思有積極而重大的作用：對於未來可能加入社會衝突的人們， 這些反思至少可以防止八九學運中出現過的某些極端現象，比如「自焚」、「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之類。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這麼想，也不知道這是否就是近幾年來一些人士反思八九學生過於激進【以上第 399 頁】的 潛在邏輯，不過我覺得這樣的反思不是沒有意義的。雖然看出一些反思文章、報導與影片有背離歷史、曲解歷史的漏洞，雖然為此寫了許多駁正的文章，但我迄今探 討的主要還是真假問題，而非是非問題；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尤其有關道義責任，我反而覺得這些反思有積極而重大的作用：對於未來可能加入社會衝突的人們， 這些反思至少可以防止八九學運中出現過的某些極端現象，比如「自焚」、「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之類。

作為局中人，我無意在這裡擅論八九學運的是非與責任。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官民雙方真相的逐步披露，相信歷史自有公道持平之說。這裡我想提出的，是另一個壓在我心中的困惑：都在說道義責任，但究竟如何承擔呢？

首先，如果自責過分，是否也會構成對歷史的偏差呢？如果祇是空洞地宣稱自己責任重大而無具體的擔當，是否也不過是一種附和大眾情緒的產物呢？我沒有權利 去指責別人，但必須檢討自己，因為這種過分自責而造成偏差的情況，也許就在我的身上發生過。說「也許」，是因為我對以下事件尚有不確定的地方。

那是九一年六月，我在《明報月刊》上發表的《反思中的困惑》一文中，用了一段來說自己在八九學運中的過失，尤其以「阻撓五一四對話是我最大的過失」。這 一認識，得力於九〇年十月同吾爾開希的一番交談。然而，文章發表一個月後，在巴黎召開的「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會議上，我發現問題並非那麼簡單。後來 又見到一些對五一四對話的反思，越來越傾向於認為對話之所以流產，主要是由於學生這一方的原因。這種言論在影片《天安門》中達到高峰，當【以上第 400 頁】中以吾爾開希的話為結語：「對話完全被學生破壞了！」我不能確定的是，開希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否就是因為我們的交談或我的文章；也不能確定，影片這種有傾向性的總結，是否也是因為我的文章。

那是九一年六月，我在《明報月刊》上發表的《反思中的困惑》一文中，用了一段來說自己在八九學運中的過失，尤其以「阻撓五一四對話是我最大的過失」。這一認識，得力於九〇年十 月同吾爾開希的一番交談。然而，文章發表一個月後，在巴黎召開的「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會議上，我發現問題並非那麼簡單。後來又見到一些對五一四對話 的反思，越來越傾向於認為對話之所以流產，主要是由於學生這一方的原因。這種言論在影片《天安門》中達到高峰，當【以上第 400 頁】中以吾爾開希的話為結語：「對話完全被學生破壞了！」我不能確定的是，開希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否就是因為我們的交談或我的文章；也不能確定，影片這種有傾向性的總結，是否也是因為我的文章。

如果是這樣，那我罪莫大焉，因為我確實由於這樣的反思而得到過一些讚譽。然而，對話失敗的關鍵，應該說是因為中共內部有人卡了閻明復等人的脖子，當時沒 有轉播對話；而學生這方面的責任，無論是絕食同學還是王超華與我，應該說不是主要的。這樣一來，我既誤導了人們對史實的理解，又得到稱讚，無異於沽名釣 譽。當時寫自己過失的本意，不過是希望大家在巴黎會議上都能對自己作些反思。由此可見，如果為了反思而反思，有時也會是件危險的事。這一潛伏的危險，其實 在一些當事人的反思中已見端倪。如果不能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我想，損失還主要不是一些個人。某些同學有政治的考慮，這我是理解的；有些事情暫時不宜公開， 也並非不在情理之中，我祇是希望：先不說可以，以後慢慢說也不遲，但不要亂說，否則日後澄清起來對誰都麻煩。歷史是大家來見證的，要想扭曲並不是那麼容 易。

另外，我的行動可以印證我不是要迴避承擔責任。事實上，九一年六月和七月，我已經兩度進入中國駐巴黎大使館，要求回國受審。事情的經過刊登在九一年六月的《百姓》雜誌上和九月十七日的《明報》上，對此我也無意多作渲染。

五、另一種承擔

【以上第 401 頁】

許多人高呼要追究歷史真 相，卻不過是葉公好龍。承擔道義責任的另一個方式，我認為是交代清楚作為當事人的那一部分史實。丁子霖老師在去年六四七週年紀念文章中就呼籲，「我們需要 的是事實，是原原本本，沒有經過任何篩選和加工的事實。」九一年巴黎會議基本上就是為了這一目標，是否達到則難說。

八九學運與民運史，遠遠沒有澄清。許多關鍵事件還未披露。有的是因為當事人尚在獄中，有的是當事人不願說。中共那一方，更不知何時可能公佈真相。

但是， 也有這樣的情況：當事人寫好了回憶，卻發不出來。據說王丹出獄後曾與台灣出版商聯絡，結果碰壁(他的《獄中回憶錄》並非回憶八九學運)。我也遇到類似情 況。王超華的回憶從逃亡時就寫了不少，也一直未見出版。當事人在一些雜誌報刊發表的，多限於一些能吸引大眾的東西。

我覺得這不能怪出版商，因為海外讀者對這些史料性質的回憶畢竟興趣有限。我懇請注意的倒是那些以推進中國民主為己任的組織，這裡指的還不僅僅是「海外民 運組織」。六四捐款不在千萬美元以下，是否可以撥出合乎情理的比例來出版有關六四的回憶呢？我們不是經常感嘆大陸的民主運動缺乏歷史繼承性嗎，那麼在海外 有條件的情況下為何不多作點努力呢？

倉促行筆至此，不再多說了。以上皆是這幾年來我時常思考的一些問題，困惑之中多沒答案，有待大家指點迷津。(一九九七年五月於巴黎)【以上第 402 頁】

附錄

柴玲「最後的話」－－－－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錄影談話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午，柴玲與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的美國留學生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和香港《天天日報》記者梁淑英作了一次帶「遺言」性質的錄影談話，共七十五分鐘。台灣《聯合報》後來在《天安門一九八九》一書中以 「多少人在出賣這場運動，在葬送這場運動！」為題將其發表(台北，聯經，一九八九年八月，頁二六四－二六九)。九五年此篇談話引發爭議之後，電影《天安 門》的作者卡瑪□欣頓(Carma Hinton)在國際網路 Internet 上指出該書文本「有較多遺漏和【以上第 403 頁】不 確之處」，並刊出全文，註明其「記錄稿曾與原錄影帶多次核實」。卡瑪對八九民運史研究經年，可謂這方面的專家。但其瞭解與理解在某些細節上仍不甚切實，她 刊出的全文還有欠完美的地方。比如，柴玲投入運動是在四月二十二號，文中誤為「四月十八號」；又如將柴玲發表絕食倡議的時間五月十二日晚誤記為「十日 晚」；絕食發起人之一的「楊朝輝」誤記為「張輝」；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建議撤離的日期「三十日」誤記為「二十七日」等。尤其是這個「全文」也不全，刪掉了柴 玲講述家庭和父母的一段，

當中有「我很想(哭)活下去，都是為了他們(父母)」一句尤為關鍵。當然，卡瑪的文本已近乎完備，可惜沒有出版。現將以上二文本再與錄像作一校正，並標出校正結果與《天安門一九八九》中的文本之差異。為了以後引述方便，小標題是我所加。由於我手中的錄像幾經轉錄，音質欠佳，也有聽不明白處，錯誤在所難免，有待柴玲和二位記者及大家進一步核實。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午，柴玲與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的美國留學生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和香港《天天日報》記者梁淑英作了一次帶「遺言」性質的錄影談話，共七十五分鐘。台灣《聯合報》後來在《天安門一九八九》一書中以「多少人在出賣這場運動，在葬送這場運動！」為題將其發表(台北，聯經，一九八九年八月，頁二六四—二六九)。九五年此篇談話引發爭議之後，電影《天安門》的作者卡瑪□欣頓(Carma Hinton)在國際網路 Internet 上指出該書文本「有較多遺漏和【以上第 403 頁】不確之處」，並刊出全文，註明其「記錄稿曾與原錄影帶多次核實」。卡瑪對八九民運史研究經年，可謂這方面的專家。但其瞭解與理解在某些細節上仍不甚切實，她刊出的全文還有欠完美的地方。比如，柴玲投入運動是在四月二十二號，文中誤為「四月十八號」；又如將柴玲發表絕食倡議的時間五月十二日晚誤記為「十日晚」；絕食發起人之一的「楊朝輝」誤記為「張輝」；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建議撤離的日期「三十日」誤記為「二十七日」等。尤其是這個「全文」也不全，刪掉了柴玲講述家庭和父母的一段，當中有「我很想(哭)活下去，都是為了他們(父母)」一句尤為關鍵。當然，卡瑪的文本已近乎完備，可惜沒有出版。現將以上二文本再與錄像作一校正，並標出校正結果與《天安門一九八九》中的文本之差異。為了以後引述方便，小標題是我所加。由於我手中的錄像幾經轉錄，音質欠佳，也有聽不明白處，錯誤在所難免，有待柴玲和二位記者及大家進一步核實。

封從德謹識於巴黎，一九九七年四月
範例： 單刪除線：《天安門一九八九》中刪去文字；
雙刪除線：《天安門一九八九》中壓縮改寫處；
方框內為全刪處
斜體字：為《天安門一九八九》中錯處
凡「問：」除註明「梁淑英問：」以外，皆金培力所問。【以上第 404 頁】

一、四二二參加運動

我想這可能是我最後的幾句話了。因為現在的形勢就是越來越殘酷。我叫柴玲，我今年二十三歲。我的生日很奇怪，(不清)四月十五號，就是胡耀邦逝世的那一 天。我家在山東，今年剛滿二十三歲，八三年考北大的。北京大學，讀了心理學。八七年考的北師大的研究生，學的是兒童心理。(採訪人：大聲點。)

我在這次運動中，是在四月二十二號站出來的。就是四月十八號，我就開始很關注這場運動。那天情況很緊急，同學們餓得很久了，一直等著李鵬出來接見大家， 一直等著這個機會，參加一下追悼胡耀邦的追悼會。可是最後一拖再拖，同學們很憤怒。他們起來要衝進大會堂。我想要是衝進去的話，那天流血就要發生了，那時 我再也不能忍耐，我就站出來了，那時我嗓子已經啞了，我流著淚喊，隔著那個警察的那條防線拿著話筒喊，我說，處理學生關係的那些官員們，我說，學生委托我 們過來看一看，請你們出來聽聽同學們的要求和呼聲。沒有人理睬。那解放軍說，你別再喊了，沒有用，保護你的嗓子吧。他們有幾個摘下水壺給我喝，那時候我已 經二十多個小時沒有喝水(抽泣)，沒有吃沒有喝。大家的情緒越來越急躁。在最後的時候，我又是個女孩子，我馬上追出去。我說，北大的同學拉起手來。我愛人 他跟我在一塊。北大同學一齊趕快撤離天安門廣場。我想那次及時撤離，避免一場流血事件。從此以後，我就在北大的籌委會幹一些事情。【以上第 405 頁】

那天我愛人封從德咬了指頭，寫了血書，寫在手絹上(哽咽)，他寫了一個人民，寫了一個總理，他很難過，他 說：「我，(哽咽)我怎麼手上流不出很多血來？」(哭)他沒有寫完。(抽泣)當我們的同學跪下舉著那個請願狀的時候，全場的同學都哭了。本來是彈劾政府的 一些建議，居然我們必須跪著遞上去，而且沒有人理睬我們，沒有人接收，同學們都哭了。(抽泣)那天，後來我就在籌委會裡工作。這個經歷有很多，我想現在就 不再多說了。(擦眼淚)我的感覺就是說，參加籌委會的同學有熱血的，有真誠的，也有個人目的的，有虛榮的。有的人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那麼膽怯逃避；可 在虛榮面前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那麼功利。五月四號那天，我們又舉行了一次大的遊行，那天本來想發表一個宣言，宣告中國新民主啟蒙運動從此開始了。後來就 是到了、當時五月四號大遊行的五四的時候，已經去的同學已經比較少了，有一種疲倦感。沒想到那天很糟糕，有一個作為市高聯的，周、當時他是個常委吧，周勇 軍，他就宣佈五月四號、五月五號復課。同學都說這課怎麼復。當時場面搞得很糟糕，同學們當時很多很失望。也可以說這個時候宣告五月五號復課給全國的學運造 成巨大的損失。同學很痛心說，這是有些人想用幾億美元想買都買不來的，就給他一句話全葬送了；他全自己說出來了(抽泣)。後來北大的形勢也轉為低潮，同學 復課的越來越多，同學在復課跟罷課之間產生相當大的內耗，內部消耗。

二、絕食

【以上第 406 頁】

我覺得越來越苦悶，終於有一天我們認為，只能，必須，搞絕食了。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月十二號中午的時候，當時市高聯的 人拼命地

反對我們，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學，我們一再堅持下來。作了一些安排(雜音)一旦這個活動(聽不清)，最後呢，終於發起(不清)。因為我們很著 急，覺得跟同學們溝通的渠道太少，同學們的熱情在逐漸下降。那天晚上我看了看，因為要絕食，就徵集絕食同學的簽名，只有四十多名同學，那一張小小的紙，我 們這簽名是貼出去的，貼在三角地。在這張小小的紙上寫上為壯士，為勇士壯行。我一下感動了。後來我覺得很難過很難過。那天「自由論壇」上，我就講了我的 話。我說我們絕這個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看它是鎮壓，還是不理睬。這次絕食還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國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希望。那個時候，第 二天，當天晚上，有些同學就很，(不清)……我講完以後，有一個男孩就上來，他說，「我以前很不屑於參加這種政治，我覺得我自認為是中國的毛澤東，今天我 才感覺到我自己是那麼渺小。我愛我的父母，但是我更愛我的祖國！」所以他說，「我要加入絕食。」第二天，等第二天的時候報名，有二百多個……我想想，也許 是四百多個，(問：在北大？)在北大。最初我們堅定地參加絕食的只有北大，師大，還有北師院。那天，(聽不清)，我們宣誓。我們紮著紅帶，我的衣服上寫著 —後來丟了，很遺憾—前面寫著「柴玲絕食」；後面寫著一個大的「哀」字，這邊寫著「有心報國」，這邊寫著「無力回天」。當天，就是十二號晚上，有一個 女孩子找到我，她說你們這種絕食宣言太官方了，太 formal 了。你該用你的生命來寫一個絕食的宣言。當天，我們醞釀了好長好長時間。第二天上午，我們寫 了個絕食書。這樣的磁帶錄了很多，據說錄了一【以上第 407 頁】千盤。我希望以後我們到籌委會，北大

籌委會，也許能搞到。Eric 也許有。第二天，很多老師他們自己用錢來為我們這些絕食的同學來壯行，請我們去吃飯。那天我一 直很悲哀很悲哀，因為我寫了絕食書，那樣呢，我吃不下東西去。當天十二號晚上有個作家班的老師叫白夢，他說我在演講的時候，他們都哭了，而且他匆匆忙忙地 出去，給我們買了好多，特意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個體戶那兒買了幾大盤餛飩給我們吃。那個時候，我們很默契很默契。而且我說了一句話，我們是在「以死的氣概為 了生而戰。死亡絕不是我們的追求，死亡正期待著最永久最廣泛的回聲。我們用死，我們用生命，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中午十二點 半，同學就出發了。到師大來集合，一塊兒來準備絕食，我們走著，(嘆氣)

我覺得越來越苦悶，終於 有一天我們認為，只能，必須，搞絕食了。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月十二號中午的時候，當時市高聯的人拼命地反對我們，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學，我們一再堅持 下來。作了一些安排(雜音)一旦這個活動(聽不清)，最後呢，終於發起(不清)。因為我們很著急，覺得跟同學們溝通的渠道太少，同學們的熱情在逐漸下降。 那天晚上我看了看，因為要絕食，就徵集絕食同學的簽名，只有四十多名同學，那一張小小的紙，我們這簽名是貼出去的，貼在三角地。在這張小小的紙上寫上為壯 士，為勇士壯行。我一下感動了。後來我覺得很難過很難過。那天「自由論壇」上，我就講了我的話。我說我們絕這個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看它是鎮壓，還 是不理睬。這次絕食還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國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希望。那個時候，第二天，當天晚上，有些同學就很，(不清)……我講完以後，有一 個男孩就上來，他說，「我以前很不屑於參加這種政治，我覺得我自認為是中國的毛澤東，今天我才感覺到

我自己是那麼渺小。我愛我的父母，但是我更愛我的祖國 ！」所以他說，「我要加入絕食。」第二天，等第二天的時候報名，有二百多個……我想想，也許是四百多個，（問：在北大？）在北大。最初我們堅定地參加絕食 的只有北大，師大，還有北師院。那天，（聽不清），我們宣誓。我們繫著紅帶，我的衣服上寫著—後來丟了，很遺憾—前面寫著「柴玲絕食」；後面寫著一個 大的「哀」字，這還寫著「有心報國」，這還寫著「無力回天」。當天，就是十二號晚上，有一個女孩子找到我，她說你們這種絕食宣言太官方了，太 formal 了。你該用你的生命來寫一個絕食的宣言。當天，我們醞釀了好長好長時間。第二天上午，我們寫了個絕食書。這樣的磁帶錄了很多，據說錄了一【以上第 407 頁】千盤。我希望以後我們到籌委會，北大籌委會，也許能搞到。Eric 也許有。第二天，很多老師他們自己用錢來為我們這些絕食的同學來壯 行，請我們去吃飯。那天我一直很悲哀很悲哀，因為我寫了絕食書，那樣呢，我吃不下東西去。當天十二號晚上有個作家班的老師叫白夢，他說我在演講的時候，他 們都哭了，而且他匆匆忙忙地出去，給我們買了好多，特意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個體戶那兒買了幾大盤餛飩給我們吃。那個時候，我們很默契很默契。而且我說了一句 話，我們是在「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死亡絕不是我們的追求，死亡正期待著最永久最廣泛的回聲。我們用死，我們用生命，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 和國的天空。」中午十二點半，同學就出發了。到師大來集合，一塊兒來準備絕食，我們走著，（嘆氣）

問：這個絕食以前在中國是沒有的？
沒有的。

問：跟誰學的，是跟印度學的還是跟馬丁□路德□金（不清），絕食的主意從哪裡來？

這個主意好像最初我們就有，後來大家發起了，我想大家醞釀了很久吧。是自發的。因為我們當時遊行罷課政府都可以不理，我們沒有辦法，我們只好用生命來呼 喚一下，看看你究竟是什麼樣子的。絕食最初是不到一千人，第一天晚上，慢慢地擴大到三千，各地的同學紛紛湧來，初見規模。（不清）當時我在北大，我說我自 薦為北大絕食團的召集人，因為我有一種責任感，我覺得北大的絕食我的演講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想是這樣不是居功，我覺得我必須為這四百多個孩子的生命負責。 【以上第 408 頁】

那天，我都談，談得很坦 率地說。吾爾開希，……在十三號晚上閻明復又找我們去談話，談了一會兒，我們就很擔憂，看天黑了，怕政府採取行動，我跟

另外一個同學就退出了，他們在繼續 談。當時絕食團的四個代表，對話團的四個代表，還有高聯的幾個代表，還有些老師們，我感覺吾爾開希被閻明復那種慈父形象完全感化了，當天就，就要求，反正 就是戈爾巴喬夫十四號那天來之前要求大家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對話，不清）

對，但是我覺得，當時我們很不情願，而且我們一致決議不完不搬，因為，我想引用一位外國記者的話，他說：「人們都說，你們都在絕食了呀，還要你們怎麼 樣？」可是好多同學忍痛搬過去了，有的人就是被架著過去的。（哭）我為什麼那麼痛心？是因為，當時圍觀的群眾很多，他們不知道怎麼回事，一下子弄過去了， 一下子又散了。（抽泣）

三、成立指揮部

第二天早上我，還有李祿找到我，就是現在的副總指揮。他很痛心，他說，「如果政府如此無賴下去，這樣看著同學一個個這樣消耗生命的話，那我們就採取更極 端的措施」，他說，「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眼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死掉的話，那麼我們就作第一個死掉的人。」我把這句話拿到廣播站說了， 我說我自己願意做這個絕食團的總指揮吧，好像是，【以上第409 頁】不 記得怎麼說的了。而參加這個絕食團唯一的資格就是在同學們犧牲之前你願意首先犧牲自己來使更多的同學們活下去。最初絕食團就很團結，很純潔。大批大批的同 學倒下去了。救護車聲聲地響。最初的時候我在前面，有一天看到同學昏倒了，被抬上救護車，我直想哭（哭）。我不記得是哪一天，可能是第三天，第四天中午， 有人衝進大會堂，當時外圍糾察隊員我們調不上來，然後我們就說，「絕食同學，（抽泣）我們、如果你還有體力的話，就站出來。我們去保護大會堂。」絕食同學 都繫著白帶子，餓了好多天了，我們衝過去站在警、警察，隔在軍隊跟那個群眾之間，插進來在這裡邊，然後對群眾說，你們想來衝大會堂，可以，從我們身軀上踏 過去吧。（哭）。後來在記者招待會上我就說，我想我們呼籲記者跟我們在一起，給我們作一個公證人，來看看是誰在保衛大會堂。（抽泣）當時沒有意識到，我們 就是可以，因為我們自己在參加絕食，就沒有想，當時覺得廣場的局面越來越龐大，而這時候市高聯的一些領導人出面來控制這個

局面，而就在他們，我不想責怪什 麼人，但是我可以認為，市高聯以前的一些領導同學首先沒有領導素質，再一個，動機並不是那麼純潔。對不起，我這樣直說。

第二天早上我，還有李祿 找到我，就是現在的副總指揮。他很痛心，他說，「如果政府如此無賴下去，這樣看著同學一個個這樣消耗生命的話，那我們就採取更極端的措施」，他說，「我們 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眼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死掉的話，那麼我們就作第一個死掉的人。」我把這句話拿到廣播站說了，我說我自己願意做這個絕食 團的總指揮吧，好像是，【以上第 409 頁】不記得怎麼說的了。而參加這個絕食團唯一的資格就是在同學們犧牲之前你願意首先犧牲自己來使更多 的同學們活下去。最初絕食團就很團結，很純潔。大批大批的同學倒下去了。救護車聲聲地響。最初的時候我在前面，有一天看到同學昏倒了，被抬上救護車，我直 想哭(哭)。我不記得是哪一天，可能是第三天，第四天中午，有人衝進大會堂，當時外圍糾察隊員我們調不上來，然後我們就說，「絕食同學，(抽泣)我們、如 果你還有體力的話，就站出來。我們去保護大會堂。」絕食同學都紮著白帶子，餓了好多天了，我們衝過去站在警、警察，隔在軍隊跟那個群眾之間，插進來在這裡 邊，然後對群眾說，你們想來衝大會堂，可以，從我門身軀上踏過去吧。(哭)。後來在記者招待會上我就說，我想我們呼籲記者跟我們在一起，給我們作一個公證 人，來看看是誰在保衛大會堂。(抽泣)當時沒有意識到，我們就是可以，因為我們自己在參加絕食，就沒有想，當時覺得廣場的局面越來越龐大，而這時候市高聯 的一些領導人出面來控制這個局面，而就在他們，我不想責怪什麼人，但是我可以認為，市高聯以前的一些領導同學首先沒有領導素質，再一個，動機並不是那麼純 潔。對不起，我這樣直說。

當時我沒有想到，後來當我們忍無可忍的時候，廣場局面太亂了，而且絕食工作也基本上快結束的時候，我們覺得必須靠絕食團這個，起初這個團體，因為它一直 這麼堅定來領導廣場。於是有一天我就跟市高聯協商，召開聯席會議的時候，我們要求要把領導權交給我們，由我們來領導。當我們真的領導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廣 場已經出現那種局面，就是各種組織層出不窮。市高聯在他們在任期之間換了一百八十二任主席，就那麼幾天。隨便什麼人就可召集一個會議，接著拉起一幫人來， 然後把另一幫人清出去，(不清)又被【以上第 410 頁】別人否定掉，就這麼弄來弄去。而學生中又出現什麼 呢？小的，學閥割據，小學閥，自己拉起一幫人作糾察，而他糾察隊長可以說我是糾察總指揮什麼的。同學的健康狀況在急劇地惡化下去，(抽泣)市民工人的募捐 情況很糟糕，越來越糟糕，那個衛生條件也越來越糟糕，而且那種，爆發大瘟疫的危險越來越加劇。同

學情緒處於一種面臨崩潰，很激動，不太理性，燥狂，容易發 脾氣。有時我們在收拾以前的市高聯留下的那種，就是那種，「軍閥混戰」的殘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不時收到各方面的告急消息。一會兒是今天這邊一會兒是 鎮壓，一會兒又是怎麼怎麼樣。我們疲於制定各種應急措施。所以到現在，就是這麼一個局面。我們一再叮囑同學，要精簡機構，要堅守。我說一下現在的時局。現 在已經到了一種什麼樣的情況呢？作為政府，作為李鵬，為什麼這樣他通過這幾天的時間，他由最初的四個省市支持他已經爭取到二十七個省市，在黨裡面基本上獲 得統一。某些外地將軍也慢慢都屈從他，或者至少表面上跟他們一致了。而且本來以前軍方的力量已經爭取到六個軍區，而且在黨內部中趙紫陽這一派比較容易改革 思想和民主意識，或至少他們講的話中符合群眾對民主的要求，逐漸地遭到了清洗控制。

問：那麼趙紫陽下去(不清)學生有沒有合作，一起工作？

這個沒有。特別是王丹。你知不知道(不清)但是至少他們可以(不清)清洗，死在中國。

問：閻明復呢？

閻明復肯定是要被清洗的，還有秦基偉之類的。鮑彤，我只知道一點。【以上第 411 頁】

而同學這邊，就說，政府 一方面逐漸形成鐵板一塊，而同學這邊怎麼樣呢？市民的熱情在降下去，市民人心出現動搖，甚至有些市民開始慰問解放軍了。同學這邊，首先大部分同學軍心不 穩，都很失望，他們不知道，說我們到底要要求什麼，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有些同學就很傷心地走了，而且同學中出現了一些那樣的情況。有的同學打著民主的旗 號，實際上把募來的錢自己藏起來，而且又有些同學把市民給的錢拿去商店買東西。我這只是聽說，但我想這個消息會有人證明的。

問：(關於換外匯，不清)

對，對。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學逐漸被政府收買，他們作一種學生中的特務和奸細。這麼跟他們講，你們能讓同學撤走的話，那你們就是人民的功臣，國家的功臣，人民會記得你，國家會記得你；如果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話，那麼周圍的便衣你隨時可以調動。

問：你們有感覺嗎，就是說有學生叛徒？

絕對有感覺，而且我們有證據。

問：他們給多少錢？

錢我不太清楚。給他們什麼樣的許諾和交易不清楚。但有一次，我也有一次跟政府接觸的機會。我在跟他們的談話中感到他們帶有一種強烈的暗示性。

四、最後的陣地

【以上第 412 頁】

問：這次學生運動有什麼……最黑暗是哪一天？

最黑暗還沒有到來呢。(沉默)

可好多同學都不明白，我們現在在廣場這是我們最後唯一的陣地了。有人一再主張撤，這撤，唯一高興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麼呢？我是總指揮，我一再要求 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就是為了抵制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而且有人作為北高聯和外高聯，外校的高聯，他們又很願意要這種權力。(沉默)

作為一些知識階層的人，成立了一個知識聯、各界聯合會議，愛國維憲委員會，在昨天會上我很憤慨、很憤慨，因為我感覺到這些人也是在利用這次學運重新塑造他們的形象。我一再抵制這種傾向，(斷)

像劉曉波把吾爾開希。對不起，上面說的可以刪一下嗎？要推舉他為運動發言人什麼的。我在運動中對這類人有些看法，吾爾開希，就是他曾經利用他的影響，他 所處的那種領袖地位，對整個學運不斷產生了很大的破壞作用。這已經發生兩次了，最後一次給我們堅決抵制，而且罷免了。但現在他們有些人要重新樹他這個形 象。

問：吾爾開希是在(不清)

這個我們沒有證據。感覺就是一些，或者是角度、思考方法不對。當時我跟我愛人封從德，我們說：對不起，我們感到我們跟這次會議的氣氛整個很不協調，我們要求退出指揮部在這個各【以上第 413 頁】界聯席會議上的席位。

這個我們沒有證據。感覺就是一些，或者是角度、思考方法不對。當時我跟我愛人封從德，我們說：對不起，我們感到我們跟這次會議的氣氛整個很不協調，我們要求退出指揮部在這個各【以上第 413 頁】界聯席會議上的席位。

問：那麼(不清)是最好的、最團結的，是哪一段時間？

最好，最團結的，就是絕食團最初的那段日子，那時民眾也很支持，很關懷，那時喚醒的是市民的那種感性、感情，慈父心腸，慈母心腸。而且政府在絕食第七天 的時候，對同學施加暴力，市民們自動地去用自己的軀體去阻攔軍車。我想那是最輝煌的--頁，一下子讓市民看清了政府的嘴臉，法西斯的嘴臉，但現在他們通過種 種控制，比如說扣除獎金，開除黨籍，等等的這些東西把市民重新給統治住。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政府這方面已經逐漸的穩固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 我們在天安門廣場堅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團結起來，因為到最後只有是人民跟這個與人民作對的政府來較量了。同學們老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 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它的公民。 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學，有一些什麼上層人士，什麼什麼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這個工作，就是幫助政 府，或者不讓政府採取這種措施，而在政府最終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如果真正是這樣一種、同學們自我崩潰，自

我瓦解這樣一種 情況，我們要，要撤回原地的話，那麼中國就會變成這樣的一種情況：黨內的所有的比較先進的什麼思想有點民主意識的人，還有歷次運動中，像【以上第 414 頁】什麼四五運動，像什麼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歷次運動中沒有被打下去的人，這次一下全被清洗乾淨。而且鄧小平就說了，是有極少數的人，黨內有，好像社會上也有，學生中也有一小撮。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 學，有一些什麼上層人士，什麼什麼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這個工作，就是幫助政府，或者不讓政府採取這種 措施，而在政府最終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如果真正是這樣一種、同學們自我崩潰，自我瓦解這樣一種情況，我們要，要撤回原地 的話，那麼中國就會變成這樣的一種情況：黨內的所有的比較先進的什麼思想有點民主意識的人，還有歷次運動中，像【以上第 414 頁】什麼四五運動，像什麼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歷次運動中沒有被打下去的人，這次一下全被清洗乾淨。而且鄧小平就說了，是有極少數的人，黨內有，好像社會上也有，學生中也有一小撮。

問：那麼(不清)，因為鄧小平他們說，學生這些事為什麼能發生，因為他們沒有做他們的工作，沒有加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我知道，就是這個意思。然後、讓我說吧，他們就會認為，或者他們就會把以前的沒有徹底進行的工作，像反自由化清除乾淨的工作繼續做下去。把一大批這次運 動中先進的領袖，學生領袖，和知識界的人物，社會上的人，各階層的人士，還有黨內的，軍內的一些能與他們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聲的這樣一些人全 部清洗乾淨，然後他們可以控制或軍管新聞機構，重新把全國的局勢穩定下來，終於恢復到一種表面上很安定，很統一的那種「大一統」狀態，然後重新搞他們所謂 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中國要，中國要真是讓他們得逞了，那麼中國實際上要復辟，復辟四十年，七十年。因為如果這樣一大批的人被屠殺，被監禁，被他們殘害，多 少年以後民眾才敢站起來呢？不知道。

問：他們就是用謀殺、謀殺，還是從(不清)？

還有逮捕起來以後打，讓你精神分裂，對待魏京生就是這種手段。(抽泣)

所以我覺得很悲哀。(抽泣)這些話沒有辦法直接跟同學講，跟同學說，我們就是要在這裡流血，用我們的鮮血和生命來喚起民眾，同學們肯定會這樣做的，但是，他們還是年輕的孩子們(哭)。【以上第 415 頁】

(斷)

五、悲哀

所以從知識界聯合會回來以後，我就去與當時來負責保衛我們總部的糾察同學談了一些，他們說我們不是來當糾察的，我們就想來看看，看看真正什麼是民主？北 京在幹什麼？但是我們看到我們很失望，我們當一批糾察我們失望一批，我們整個組織究竟在幹什麼？還有一個同學說我們大批同學都走了，我們本來有五六百人， 現在只剩下十多個人。說我們這些人都堅持下去，都是堅定分子。因為，有一個孩子跟我說：「我就是不甘心，我要看看究竟亂到什麼程度。」

那天我從知識界聯合會，就是昨天，回來的時候，我哭了。(哭)我感覺到我那麼熱愛廣場上這幾萬萬的孩子們。(哭)我有責任用我們的生命堅持到底，但是我 又覺得我很悲哀，我實在是無力回天，(哽咽)我一個人太有限了，那麼多人爭奪權力，我從來不迷戀權力，我只是為了，為了良心，我才不願把這個權力放棄給那 一小撮那種投降派和陰謀家。但是我不知道這些人為爭奪這權力，(抽泣)而發起一次一次的攻勢。我感覺到特別累(哽咽)。我就是想全中國的中國人，(抽泣) 全世界的華人，我就是想說中國人，(抽泣)我們作為這個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殘殺了，中國的機會已經不多了。(哭)

問：你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感覺？【以上第 416 頁】

這個感覺，(抽泣)在籌委會，也就是五月十幾號以後，我就是越幹越悲哀。大該四月二十幾號時我就開始感覺到 了。(抽泣)那時我想，我現在也想說但一直不願說，因為中國人不能罵中國人，但我不得不說，就是，有時候我想，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哭)我不值得為 你獻身。(哭)可是我又想到這次運動的確還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學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識界的人。

問：(不清)你知道很多人認為學生(不清)就是說，好多年沒有這個精神(不清)。

我知道。我想如果今後中國再次陷入黑暗時期，也許中國老百姓再一次受蒙蔽，再一次互相欺騙，彼此沒有真正的感情和交流。我只是想說在海外的華人，你們有 自由的環境和人身安全的時候，這個時候，(哭)我希望你們，能夠首先做一個先進的中國人，因為你們有條件，有機會。(哭)

(斷)

我感覺到有時候他們祇是想了解事情的過程，這事情中進行的這些人的心態，他們怎麼想，他們的感受，(抽泣)這點讓我覺得痛心，因為最偉大的不是這種表 現，而是一種內在的，一種人性的展示。(哭)很少人去揭示這些東西。我有兩個朋友，作為知識界，只有他們兩個堅持到底。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好像是于浩成已 經被逮捕了。(抽泣)

問：被逮捕了？

被逮捕了。【以上第 417 頁】

梁淑英問：什麼時候？

昨天晚上我知道，從他們的嘴裡知道。

問：從廣場裡面被捕？

不是的。他……

問：在外面？

可能在外面。

問：你是從政府官員的嘴裡還是……？

就是從兩個朋友那裡。他們倆說，我們要撤，因為我們有個使命，我們要寫一部書，要把這個，這過程中，因為我們親自參加了這場運動，而且我們知道這運動最 真實的是什麼。他說我們的使命就是寫一部書，爭取這最後的機會寫一部書，讓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們說如果這部書發表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那麼，那麼我 們就是被殺了頭也甘心了。(哭)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為我，(哭)因為 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賣這場運動，在葬送這場運動，我感到很痛心的就是，最初絕食的這一千多名同學，(抽泣)我可以說他們的身體健康已經造成了 很大的摧殘，而這些人(抽泣)要葬送這一千多名同學，還有後來成千上萬的人民和同學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一些成果，他們要葬送掉，就只是為了他們個人的目的， 個人的希望，個人的私利(哭)(搖頭)中國人……【以上第 418 頁】

昨天我跟我愛人說，我再 也不願在中國待下去了，我說我想到國外去，因為我學的是心理學。在絕食的第一天我就說過：「我們不是為死而戰，而是為了生而戰。因為民主不是一代人的 事，」我現在更堅定這種信心，如果我有機會活下去的話，那麼我會用畢生的精力在中國，從一個孩子降生的時候就跟他說，要作一個正直的人，有良心的，有獨立 人權和人格的中國人。我要用畢生的精力來培養一批真正的中國人，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機會這樣做了。

我愛人說－－在這之前，在參加運動之前，我們一直在聯繫去美國留學，他托福考得很高，六百三十，很有希望．－－他說我只是想到國外去學習幾年，中國四五 年之內也許沒有希望了，我想有機會出去之後我就學法律，社會學，等等。他說十年之後我要組織一批人寫--部中國的憲法，一部人民的憲法(電話鈴響)。(抽 泣)

我知道我這時候要宣佈我辭職，或者我引退，同學不會理解，會罵你，我不在乎，整個運動我挨了很多罵，(哭)我很淡然。但是我希望如果我沒有能力做這個工作，(哭)沒有機會做這個工作，會有很多人去做這個工作，我用生命來呼籲。(哭)

梁淑英問：那麼你打算回去(不清)

你說甚麼？

梁淑英問：就是你打算回去支持、成立(不清)？

沒有。最近我一直感覺到特別悲哀，而且同學，就他們本身的民主素質也是相當差的。(哭)而且說句實在的，在我們倡議發起絕食這一天我心裡就很明白不會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以上第 419 頁】(哭)有些人、有些歷史注定是失敗的。(哭)我一直清楚這一點，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給大家一個堅定的形象，我們在爭取勝利，但我心裡很明白。(抽泣)

沒有。最近我一直感覺到特別悲哀，而且同學，就他們本身的民主素質也是相當差的。(哭)而且說句實在的，在我們倡議發起絕食這一天我心裡就很明白不會

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以上第 419 頁】(哭)有些人、有些歷史注定是失敗的。(哭)我一直清楚這一點，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給大家一個堅定的形象，我們在爭取勝利，但我心裡很明白。(抽泣)

(斷)
(以下錄音音質與雜音皆有變化，可能有中途休息。)

六、對談

問：絕食是你推動的？

絕食，它是，在北大是和師大的一些同學，他們倡議。但是在這之前我已經想過，但是我沒有跟他們……因為當時我在想通過廣播站跟同學交流思想，把大家熱情 都喚起來。後來當時王丹說要準備絕食，我馬上就簽了。而且……我當時……後來，有一個北京師範學院的同學，他叫楊朝暉，他也簽了名，也是發起人之一。後來 北高聯的同學一再勸阻他，說時機不成熟，怎麼怎麼樣，然後這孩子居然又、就又回來說，「你們不應該倡導絕食，雖然我是發起人之一，但我認為這樣說不妥。」 後來我們就強烈的跟他辯論說，你怎麼能這樣，我們一直在做(不清)的工作，而且這個決定沒有錯。為什麼改變主意？後來我和北大幾個同學一塊去說服市高聯， 他們始終很抵制，市高聯有些人是有投機傾向的，可以這麼說。後來當天晚上我跟另外一個叫邵江的同學，他本來十三號要考托福，我也要考托福。我說，我請求你 不要考了，他說好，我去做市高聯的工【以上第 420 頁】作，我相信有我 有這個影響力。後來當天晚上他們市高聯作了一個聲明，說，用的字眼是對我們這場絕食運動他們表示「同情和理解」。在我們心理上，我們感覺到，很憤怒，為什 麼？你、(悶，不清)你有什麼資格來同情理解我們？要是，真正的態度應該是愛護保護同學，支持同學。這都是一些，我不是想指責任何一個人，我就想這場運動 中，中國知識分子的(不清)

絕食，它是，在北大是和 師大的一些同學，他們倡議。但是在這之前我已經想過，但是我沒有跟他們……因為當時我在想通過廣播站跟同學交流思想，把大家熱情都喚起來。後來當時王丹說 要準備絕食，我馬上就簽了。而且……我當時……後來，有一個北京師範學院的同學，他叫楊朝暉，他也簽了名，也是發起人之一。後來北高聯的同學一再勸阻他， 說時機不成熟，怎麼怎麼樣，然

後這孩子居然又、就又回來說，「你們不應該倡導絕食，雖然我是發起人之一，但我認為這樣說不妥。」後來我們就強烈的跟他辯論 說，你怎麼能這樣，我們一直在做(不清)的工作，而且這個決定沒有錯。為什麼改變主意？後來我和北大幾個同學一塊去說服市高聯，他們始終很抵制，市高聯有 些人是有投機傾向的，可以這麼說。後來當天晚上我跟另外一個叫邵江的同學，他本來十三號要考托福，我也要考托福。我說，我請求你不要考了，他說好，我去做 市高聯的工【以上第 420 頁】作，我相信有我有這個影響力。後來當天晚上他們市高聯作了一個聲明，說，用的字眼是對我們這場絕食運動他們表 示「同情和理解」。在我們心理上，我們感覺到，很憤怒，為什麼？你、(閃，不清)你有什麼資格來同情理解我們？要是，真正的態度應該是愛護保護同學，支持 同學。這都是一些，我不是想指責任何一個人，我就想這場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的(不清)

(斷)覺得非常悲哀，好像中國就沒有人材了。

問：你們對民主怎麼理解？

民主，我沒有怎麼在理論上(不清)過民主，我想民主應該是很天然的一種要求和需要，使人們都會有自由的，有人權的保障。我們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 我們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觀點，我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有自己的思想體系。民主也跟人權的解放，人格，獨立和自尊的解放，人性的解放連在一起。

問：(不清)對話，跟政府對話，最終達到什麼目的？(不清)

(嘆氣)

對話對政府是一個強烈的挑戰，因為它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這麼強的對手，來自人民真正的呼聲人民要求，人民開始要求跟它公平地對話，而且監督他們一些政府領 導的過程，人民要求參與決策，要求檢舉不法行為，而不再像中國的那些「大一統」的黑暗統治。所以政府很害怕，它不敢，政府不敢，因為他們始終在竭力地維護 他們在，他們幾十年來苦心經營一種局面，一種對中國廣大人民的蒙蔽和欺騙。我想民主最根本的，對每一個人來說就是自我的覺醒，中國人的人【以上第 421 頁】性被壓抑的很卑微，包括在這次運動中看得很清楚。好多同學就等着。 就像外地的同學來了，我們要吃的，我們要住的，我們要什麼什麼，你們有什麼新聞告訴我們？你們下一步有什麼打算？我覺得很難過。你自己，你有雙手，你有喉 嚨，你有眼睛，你可以聽，看，你可以去說，去做，你可以豐衣足食，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見解，當然另一方面他們在盡力維持一

種領導的權威，這也是對的，但實際上有些同學就很不負責任。他們很習慣於，習慣於一種封建的專制，兩千多年來，我們要求民主，包括很多同學都不明白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我想這次運動只能說是民主的啟蒙運動。

對話對政府是一個強烈的挑戰，因為它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這麼強的對手，來自人民真正的呼聲人民要求，人民開始要求跟它公平地對話，而且監督他們一些政府領導的過程，人民要求參與決策，要求檢舉不法行為，而不再像中國的那些「大一統」的黑暗統治。所以政府很害怕，它不敢，政府不敢，因為他們始終在竭力地維護他們在，他們幾十年來苦心經營一種局面，一種對中國廣大人民的蒙蔽和欺騙。我想民主最根本的，對每一個人來說就是自我的覺醒，中國人的人【以上第 421 頁】性被壓抑的很卑微，包括在這次運動中看得很清楚。好多同學就等著。就像外地的同學來了，我們要吃的，我們要住的，我們要什麼什麼，你們有什麼新聞告訴我們？你們下一步有什麼打算？我覺得很難過。你自己，你有雙手，你有喉嚨，你有眼睛，你可以聽，看，你可以去說，去做，你可以豐衣足食，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見解，當然另一方面他們在盡力維持一種領導的權威，這也是對的，但實際上有些同學就很不負責任。他們很習慣於，習慣於一種封建的專制，兩千多年來，我們要求民主，包括很多同學都不明白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我想這次運動只能說是民主的啟蒙運動。

問：你們對官倒、反腐敗的問題怎麼看？

官倒、反腐敗，這是廣大人民群眾，很強烈地要求政府作自我檢討，自我來監督政府的一些腐敗現象，因為以前一直是什麼黨政一體，黨軍一體，公安也是一體的。沒有任何能夠強有力地，就是有一個獨立的什麼黨，政府和其他的各黨派也有領導關係，沒有任何一個途徑，沒有任何一個機構能監督它，所以它可以為所欲為。(咳)

問：去年人們談論中國學生愛錢，愛賺錢，而不像以前那樣，理想什麼的，很多人也沒想到，今年會這麼大規模遊行。你的看法怎樣？你們的同學、中國的同學，他們這個非常偉大的潮流是從哪裡來的？

我想在這之前，由於這個，整個體制改革措施的相當的失敗，中國人開始逐漸失去了信仰，他們沒有信念，就很功利地，很實際地滿足於基本的生存要求，他們就靠這個，無信仰地生活著。【以上第 422 頁】這次整個運動也有一個，有很多很多的人產生(不清)，我想中國人重新找到一種信念，就是中國問題要靠中國人民來解決，而不是靠政府，也不是靠這個國際的什麼輿論，必須靠中國人民

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很多青年人，很多市民，很多工人和農民，也開始覺醒。(嘆氣)

我想在這之前，由於這個，整個體制改革措施的相當的失敗，中國人開始逐漸失去了信仰，他們沒有信念，就很功利地，很實際地滿足於基本的生存要求，他們就靠這個，無信仰地生活著。【以上第 422 頁】這次整個運動也有一個，有很多很多的人產生(不清)，我想中國人重新找到一種信念，就是中國問題要靠中國人民來解決，而不是靠政府，也不是靠這個國際的什麼輿論，必須靠中國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很多青年人，很多市民，很多工人和農民，也開始覺醒。(嘆氣)

問：你們有沒有受到外面的影響？(不清)或是比較佩服或是比較不佩服歷史上(不清)

沒有，我想至少從我這。我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我很喜歡過一種安詳的，有一些 baby，有一些小動物的那樣的，那種，我可以和孩子們在一起，搞自己的 研究，來培養下一代。我很希望過這種很平靜，安詳的生活。我可以坦率地說，我沒有，沒有很多虛榮心，功利心。我，我和封從德結婚，當時那時候很簡陋，但我 們很天然地滿足這種，而且享受這種生活帶來的安詳和寧靜。我們一直在，儘管很多人都在賺錢，但是，－－就是說，我們也很艱苦，我們也拼命地賺錢，－－但我 們不是為了賺錢而賺錢，而是為了……，我們都很堅定，我們現在很艱苦，但是我們都是在搞事業，真正願意獻身事業那樣。不知道你們理解不理解。

在此之前，我們一直認為靠知識救國，就是到了四月二十二號那一天，我覺得，我覺得那時候是一種良心，我參加運動始終是一種良心，因為我跟同學講了，我們 現在在這兒爭取民主實際是在給每一個中國人在爭取一份權利，他們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我特別想告訴每一位同學，每一個工人，每一個市民，每一個知識分子，甚 至每一個便衣，每一個士兵，就是說我們同學拼著性命在爭取這個權利也有你們的一份。我想，如果是在大家捨生忘死爭取這個權利的鬥爭中，我坐一邊，不去衝鋒 陷陣，不去冒這個風險，但，一旦這個權利到來的時候，我說，給我拿來吧，【以上第 423 頁】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很慚愧，我做不出這種事情來，我想命中注定我就是這樣一種角色，因為只要你有良心，你就會站出來，你就會走到這一步。

在此之前，我們一直認為 靠知識救國，就是到了四月二十二號那一天，我覺得，我覺得那時候是一種良心，我參加運動始終是一種良心，因為我跟同學講了，我們現在在這兒爭取民主實際是 在給每一個中國人在爭取一份權利，他

們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我特別想告訴每一位同學，每一個工人，每一個市民，每一個知識分子，甚至每一個便衣，每一個士 兵，就是說我們同學拼著性命在爭取這個權利也有你們的一份。我想，如果是在大家捨生忘死爭取這個權利的鬥爭中，我坐一邊，不去衝鋒陷陣，不去冒這個風險， 但，一旦這個權利到來的時候，我說，給我拿來吧，【以上第 423 頁】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很慚愧，我做不出這種事情來，我想命中注定我就是這樣一種角色，因為只要你有良心，你就會站出來，你就會走到這一步。

問：作為現代人，你們沒有英雄嗎？可佩服的英雄，歷史上的英雄？

我想，譚嗣同。給大家一種感覺。他說，我以吾血薦中華，我用我的鮮血來喚醒民眾。我想在我們絕食的時候也是有這種感覺的。

問：絕食的時候，你們有沒有想到印度的甘地，或者美國的馬丁□路德□金的影響？

我想，作為我來說，我想我的所有的作為都是很天然的，我以前對政治並不是特別感興趣，也絕對不想作一個什麼精神領袖什麼的來獻身。我想搞的就是我安心地搞我的事業，過一種很安詳的生活。也許別的人有這種想法，也有很多思考。

問：那麼，廣場上發生了一個把毛澤東的像掛下來(不清)因為這在中國，平常來說這是極端可悲的(不清)佩服毛澤東(不清)

毛澤東作為這個人來說，他不值得佩服，因為如果是毛澤東時代，這種殘酷鎮壓也發生過，而且也會發生。我不欣賞他。

問：有人說把你們的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比，你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他們的想像力太低下。這是一場劃時代的－－我在十三號參加絕食時我就跟同學講，我想，我說作為我們每一個參加絕食的同學，作為我們每一個所謂的領 袖，甚至作為政府每一個人，作為每一個全國人民，都沒有想到，整個中國的學運已經起了劃時代的飛躍；他們誰都不會【以上第 424 頁】想到，而沿用一種老性的思維，無論是政府還是學運領袖，他們總是在犯一些錯誤，就是他們用以前的偏見來衡量這次運動。

我覺得他們的想像力太低 下。這是一場劃時代的——我在十三號參加絕食時我就跟同學講，我想，我說作為我們每一個參加絕食的同學，作為我們每一個所謂的領袖，甚至作為政府每一個 人，作為每一個全國人民，都沒有想到，整個中國的學運已經起了劃時代的飛躍；他們誰都不會【以上第 424 頁】想到，而沿用

一種老性的思維，無論是政府還是學運領袖，他們總是在犯一些錯誤，就是他們用以前的偏見來衡量這次運動。

(斷)
(以下錄音音質與雜音皆有變化)

七、家庭

(哭)我父親來過北京，那個時候是在五一的時候。我跟我愛人結婚的時候，我們倆感情上有時候有點磨擦，吵架什麼的，回家的時候我就跟我父母講，我父親就 很擔心，他非常非常鍾愛我。他就很擔心，他很希望，帶來好多吃的來看我們，就很希望能跟我們一塊玩玩，因為五一，北京氣候不錯，把我妹妹也帶來了。

但是他一來他就知道，我和小封，就是我愛人都已捲入這場學潮了，他一直很擔心。而且我們一直忙在北大籌委會工作，沒有時間陪他。那天晚上他說我要回家 了，他說我得走，因為我覺得我在這也幫不上你什麼忙。他說你怎麼辦，怎麼跟我聯繫，我說我隔三天給你拍一封電報，跟你說我平安。以後我把這個事情委托一位 朋友做這件事情。臨走時他突然說，(哭)他說，「萬一，」他差點要哭，他說：「萬一我收不到電報呢？」(哭)那時候我就說，「爸爸就不要再來了，來北京也 沒有用了。」(哭)【以上第 425 頁】

我差點要撲上去，我差點要哭了，我爸爸拍拍我說，「不要這樣，不要哭著告別，再見再見。」(哭)他一直很難 過。他去濟南。我妹妹是讀醫科大學的，(抽泣)他說：「我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培養了兩個珍珠，怎麼都捲進來了？」因為我妹妹他們也受了一些影響。她說，「我 太佩服姐姐了。」她這樣講。我真……(抽泣)

我父親，他一直非常要 強，有責任心。他是個大夫，他本來可以在事業上很順利，但最近一下裁軍，結果部隊就是劃入地方編制，不再屬於部隊了。他們這一代人的(不清)很希望，以前 他們一直寄托一種平等的靠工作努力然後升級，一步步地，他就希望有自己事業上的要求。可是一下希望就沒有了，而且大家很亂，都在賺錢，都在怎麼怎麼樣。他 們覺得他們這一生的信任就這麼一下子全垮了。我覺得我父親他很悲哀，我經常替他們難過。(抽泣)我跟他討論，他說不對，我們對國家還是很有感情的，他說我 是農民的兒子，他能成長到今天，也是共產黨的培養。我說我不相信他，我說共產黨愚弄了你們這一代人，我說你們本來可以得到的更多更多。可是共產黨嘛……

問：你父親他能不能理解你嗎？

他能理解。他說，我父親就後來說，你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他說，因為你們這一代沒有我們這一代的經歷，所以你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父親是很開明的人。(哭)

問：(不清)

我很難過的就是，我父親他很傷心。(哭)很傷心，因為在醫院遷離的時候，

使我家裡受到一【以上第 426 頁】場 大的災難，就使我媽媽生了大病。(抽泣)

從此我爸爸就一個人在支撐家裡的負擔。(抽泣)有一次我回家，他，(哽咽)看到他

摔東西。他說，(抽泣)我覺得我 再也支撐不下去了，我怎麼辦？我也哭了。我不知道這對一個中年人來說，一個家庭，一個……對不起，這些可不可以不要報導，好嗎？(斷)他其實在各個方面都 承受了很多、忍受了很多。他是一個中國人。(哭)我覺得很對不起爸爸和媽媽。(哽咽)

我很難過的就是，我父親他很傷心。(哭)很傷心，因為在醫院還離的時候，使我家裡受到一【以上第 426 頁】場 大的災難，就使我媽媽生了大病。(抽泣)從此我爸爸就一個人在支撐家裡的負擔。(抽泣)有一次我回家，他，(哽咽)看到他摔東西。他說，(抽泣)我覺得我 再也支撐不下去了，我怎麼辦？我也哭了。我不知道這對一個中年人來說，一個家庭，一個……對不起，這些可不可以不要報導，好嗎？(斷)他其實在各個方面都 承受了很多、忍受了很多。他是一個中國人。(哭)我覺得很對不起爸爸和媽媽。(哽咽)

我想(哭)活下去，都是為了他們。(抽泣)我願意是，給他們一些慰籍。我覺得，(抽泣)，如果，我，出事了，我父親受不了，也，他跟我說(電話鈴聲)：我再有甚麼企求，我就是，我把我一生的希望寄托在你們三個寶貝上－－我還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他說，你們三個是我的驕傲。(抽泣)因為我媽媽，有很重 的疾病，不太穩定，也怕她住院以後也很孤獨，她需要理解，而我在外讀書，沒有辦法回去跟她交流。我弟弟還小，不太能(不清)。(哭)

八、下一步

問：如果你是政府呢，你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我想政府一定會瘋狂的報復我們這些人的，因為中國人的報復心很強，我不抱任何幻想。

問：如果他們的處理是理想的方法，你希望，他們會不會對話？

不可能。【以上第 427 頁】

問：這樣說就是作夢？

作夢，真是，白日作夢。

問：(不清)

我當時，第一次對話不是中斷了嗎，當時我拿了五頁的絕食書，我希望在對話實現場直播，我想放一下，讓全國人民聽聽我們絕食的同學怎麼想，讓他們了解我們為什麼。我當時抱著幻想，我可以感化他們。

問：政府中有沒有人支持你們？就是，心目中理解你們但不敢說？

肯定有這樣的人的。而且我感覺到，如果人民的力量很堅強的話，政府就勉強維持的這種統一地位很快就會土崩瓦解，包括那些投機派，也會站在人民這一邊的。但是必須靠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團結起來。

問：你希望其它城市市民，什麼上海、西安，也參加運動？

因為說句實在話，我覺得這場運動它很多地方都不太成熟。首先這個機會很偶然，誰也沒想到胡耀邦會逝世。而且在這之前我們整個這個，就是中國人民，經歷了 思想很混亂，沒有信念，沒有理想這麼一個階段。這次整個的運動是學生和人民天然的一種民主意識的一種大暴露，知識界和理論界就遠遠的落後在這個之外。他們 沒有給這個運動提供任何一套成形的理論。而且我想這次最偉大的一個勝利就在於人們利益自發的一個大的展示。我相信天然的東西，我不相信現成的理論，我對理 論、名人、權威全部沒有迷信感，我不知道這樣好還是不好，但我就是這樣的人。【以上第 428 頁】

問：下一步呢？

下一步 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不過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來的，要是他敢採取下策 的話，即使不敢採取下策，保留一些火種和力量，在下一次革命中我們一定會站出來。我雖然對政治沒有興趣，但我只要有良心，在下一次運動開始的時候，我想我 還會再站出來，如果我還活著的話。我想最終的就是推翻這個沒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動的政府，而建立一個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讓中華人民真正地站起 來，讓一個人民的共和國真正地誕生。

問：對改革現代化的方式怎麼樣看？

我沒有說，但是我覺得這樣的改革不對頭，因為它富起來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有權勢的那些人。這種改革雖然帶來一些表面上的經濟繁榮，但實際上把廣大人 民，廣大知識分子都推上了一種沒有希望，沒有奔頭的那種……我接觸了各個層次的人，有些即使是得利者，如個體戶，有些什麼財團，企業家，還有那個很精明的 學生，還有一些工人，市民，都紛紛沒有安全感。很多人都流到國外去。我覺得這個國家快亡了，快亡國了。 到這種程度。

同學喊出了一個口號，說「人民是我們的人民，國家是我們的國家，我們不喊誰喊，我們不做誰做？」我想這次人民和同學都站起來，自己救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但為什麼我一直，在這之前我一直很願意科學救國。

當時我參加運動的時候，也就是二十五號那天，在_四月二十五日那天在籌委會，當時可能【以上第 429 頁】混進了便衣或什麼，我們在聊天，我說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說以前判三年，後來判五年，現在加到七年，後來加到十七年。當時我很悲哀，我在想十七年以後我出來就四十歲了，很不甘心的呀。

當時我參加運動的時候，也就是二十五號那天，在_四月二十五日那天在籌委會，當時可能【以上第 429 頁】混進了便衣或什麼，我們在聊天，我說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說以前判三年，後來判五年，現在加到七年，後來加到十七年。當時我很悲哀，我在想十七年以後我出來就四十歲了，很不甘心的呀。

（電話鈴響）

那天正好我接到國外以前一個很要好的朋友來信，跟我說我不贊成大家都

出國留學，但是心理學到國外來學，這是一定的。我一直是很願意通過科學救國的。我覺 得這場民主運動的最根本的勝利，不是只是為了希望，我覺得民主是保證大家的一種平等的自由的生存的權利和努力的方式，保證他們的成果得到承認，而不是被少 數人給侵吞去，讓每個人勞有所得，所有人都能夠很平等很自覺地建設我們的國家，建設我們的民……發揚光大我們的民族。但是我認為最根本的，就是在民主機制 建立以後，還可以有一批人通過科學來真正救我們的國家。我一直這樣想，

但是這次我覺得，如果是這個沒有人性的政府不推翻的話，中國人民永遠不會有希望，整個民族也不會有希望。當時我是想，雖然我想去國外留學，但是如果我們 自己國家能解決自己問題，為什麼要到國外去呢？為什麼把我們的建設，我們的青春，我們的才華都獻給國外？應該獻給我們自己的民族，因為這個民族太貧困太落 後了，需要很多人為她獻身，為她奮鬥。可是這個國家，這種統治，這種制度讓那麼多的人都走了。我們接觸了各個階層的人，都沒有安全感，沒有奔頭，都喜歡去 領到綠卡。

梁淑英問：你看這你們三十號撤出來有沒有一些堅定分子繼續留在廣場？

三十號撤離這個決議是所謂的愛國維憲各界會議決定的。他們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當時我【以上第 430 頁】也 在，但是我沒有很明確的意識到有這麼大的危害力。同時，興奮點集中與他們有一些人要通過這個運動樹一些自己的形象，什麼什麼的，而且我沒有堅決抵制這種東 西。他們這些人決定在新聞招待會上發布，來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後來我們一再聲明，還造成很壞的影響。但是可以說肯定有人堅持下去的，因為我就想告訴大家， 現在廣場是我們唯一的陣地了，我們再失守這個陣地話，那麼中國就要復辟了，我想每個同學都有自己的判斷。

三十號撤離這個決議是所謂的愛國維憲各界會議決定的。他們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當時我【以上第 430 頁】也 在，但是我沒有很明確的意識到有這麼大的危害力。同時，興奮點集中與他們有一些人要通過這個運動樹一些自己的形象，什麼什麼的，而且我沒有堅決抵制這種東 西。他們這些人決定在新聞招待會上發布，來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後來我們一再聲明，還造成很壞的影響。但是可以說肯定有人堅持下去的，因為我就想告訴大家， 現在廣場是我們唯一的陣地了，我們再失守這個陣地話，那麼中國就要復辟了，我想每個同學都有自己的判斷。

梁淑英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堅持嗎？

我想我不會的。

梁淑英問：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

我要求生。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麼的，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來接著幹下去，因為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這段話先不要披露，好嗎？

九、不再幻想

問：你們最開始跟胡耀邦(不清)有什麼關係？

這是一個藉口，我想，借機。

問：四月二十六號那個社論……【以上第 431 頁】

四二六，二十六號社論大家，就說社論激起大家更大的義憤，因為以前從文革一直是這樣，他們希望通過什麼一報兩刊來一篇社論，大家熱情馬上就打下去，他們這種辦法來管得很有效，所以這次同樣如法炮制，而那個新聞措辭(不清)都很一致。

問：和文革時一樣？

就是。誰在搞文革？是我們同學？人民？還是他們少數人？僅僅是因為他們掌握了輿論工具，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求對話？也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人民的思想傳播開來，他們絕對不會給這種機會的。(嘆氣)

問：你對外國報章、外國朋友有什麼話？國外的。

國外的，我剛才已經說了，我就希望，我想，我以前曾經聽到種種傳說，說我們再堅持兩天，戒嚴令還不撤除的話，那麼布什就講對鄧小平的政府不予承認(笑) 還說中國的外交力量，他們就不再承認這個政府。當時我們還曾抱過幻想，認為通過外界輿論，能夠促使我們的內部得到一些成果，但是今天我跟你講，我覺得不 對，可能政府大部份，他們有利益上的一些要求，他們在這方面不會這樣的。但是我呼籲全世界的，有正義感的，良心，我不知在國外有沒有這個字眼，他們如果能 站起來，他們如果能分清是非，而且共同支持中國作為這樣落後國家的這些很弱的，赤手空拳的學生和人民，他們這種民主救亡運動，通過他們的行動。

政府現在已經不要臉了，不怕輿論，不怕流血，什麼都不怕了。但是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抵制它，不再承認你這個政府，不再承認你們這一小撮，那麼我想對中國人民應該是很大的支援。【以上第 432 頁】

問：我相信，國外的人民，老百姓一定很支持你們，可是我們的政府也不一定好。

我想是。

問：不要要求太高，因為政府是政府，我們的美國政府也不怎麼好，美國政府不是人人都相信，站在你們這一邊。因為我們美國和英國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崇拜你們的。(不清)而且我相信你們學生(不清)偉大成果，這算不了什麼。

這種，我覺得太客氣了，用中國話來講。

我們在這之前，因為我們對出國抱有幻想。我們的同學對我們講，不要以為到了美國就是一個天國，不是的。到了那邊華人很多的地方，中國人的劣根性又表現出 來，他們又會互相的勾心鬥角，不團結。我現在就特別想說，就說你們在國外有很好的，自由的，比中國好得多的自由民主的機會，你們千萬不要再這樣，再這樣殘 殺，首先在國外的中國人，華人要團結起來。我希望他們能夠

這樣，因為這麼多的孩子，他們在用生命來爭取你們那些沒有遭到生命危險的人，應該來做一些工作， 至少消除一些隔閡和私慮，不要再孤立，為這個民族考慮考慮。十一億中國人民不能都亡。(哭)(作者按：本文曾投給胡平主持的《北京之春》，結果既未發表， 也不說明理由。)【以上第 433 頁】

九一六四備忘錄

時間：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下午二點四十分至三點三十五分

地點：巴黎，中國駐法大使館底樓接待處

11 Avenue George V 75008 PARIS

人物：

作者，封從德

陳立明，大陸公派留學生，八三年來法，現中國民主之家主席。

M.Gael，法國 Morlaix 市水手，導遊。

漢鋒，一九八九年六四後出逃的大陸公司職員，民主之家秘書。

Mlle Brucerralli, M. Gael 的朋友。

使館工作人員甲，男，約四十五歲，中胖身材。

使館工作人員乙，女，約四十歲，中瘦身材。

使館工作人員丙，男，約三十歲，使館保安負責人。【以上第 434 頁】

使館工作人員丁，男，約二十七歲，身份不明。

(註：甲男、乙女之稱是因為他們不願提供姓名，並無貶意)

背景：一九九〇年六月三日在美國首都國會山庄前的演講中，已作過類似的要求：「如果中國的法律能夠保障一個公正、公開的審判，我願回國受審。」當時是針 對中共當局長期非法超限拘押王丹等八九民運分子所作的抗議和交換條件。本欲在華盛頓中國大使館前的「天安門草坪」上作無限期絕食、但顧慮到將會影響已安排 好的同學會的美國之行計劃和一些現實問題(如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有一婦女在聯合國門前絕食長達二個月而無效；一些法律問題，剛到西方世界對許多東西不知情 等)，聽從了朋友的勸解，未付諸行動，惟留遺憾在心。一九九一年六月二日，應全德學聯和西德民陣分部之邀，在波恩人權研討會之後，又在科隆大教堂的紀念集 會上作了類似的演講，發出類似要求。

六月四日上午，在徵求了朋友們的竟見之後，草擬了《陳情書—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國大使館》(附後)邀約四位朋友，前往使館呈交。此時並未通知任何媒介，因為我將此事視為我個人同中國政府之間的問題。

經過：下午二點四十，我們來到大使館門前。漢峰同 Mlle Brucerralli 留在外面，陳立明與 M.Gael 陪我進入使館大門。進門向左，到接待處，由使館的甲男與乙女接待。起初他們大約將我們當作了普通留 學生。用一種平凡的態度問我們有甚麼事。當我告訴他們自己是一九八九年的「通緝犯」和姓名後，他們愣了一會兒，說大約還記得有這麼個名字。這時又盤問陳立 明與 M.Gael【以上第 435 頁】的姓名與職業，但態度還頗溫和。我們告訴乙女：陳是八三年來的公費留學生，Gael 是 Moulaix 市的導遊。

經過：下午二點四十，我 們來到大使館門前。漢峰同 Mlle Brucerralli 留

在外面，陳立明與 M.Gael 陪我進入使館大門。進門向左，到接待處，由使館的甲男與乙女接待。起初他們大約將我們當作了普通留 學生。用一種平凡的態度問我們有甚麼事。當我告訴他們自己是一九八九年的「通緝犯」和姓名後，他們愣了一會兒，說大約還記得有這麼個名字。這時又盤問陳立 明與 M.Gael【以上第 435 頁】的姓名與職業，但態度還頗溫和。我們告訴乙女：陳是八三年來的公費留學生，Gael 是 Moulaix 市的導遊。

然後我向他們陳明自己對中國公安部之兩點要求，請大使館轉達。但甲方並不接《陳情書》，也拒絕告訴我他的姓名，只是說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們將馬上上報到使館有關部門，請有關負責人來接待。打了幾個電話之後，他便離開，近半小時之後才回來。

其間陳立明請乙女拿了幾份《人民日報》海外版和參考文件，我們坐著閱讀等待。當時還聊起江青自縊事，乙女講她也是剛從法國電視台得知的，而國內還未傳來正式通報。丁男睡眼迷朦地進來，閒扯幾句後走了。他也盤問了一陣陳立明的身份。

甲男返回後，用一種庄嚴而謹慎的口氣同我有好幾次對質，簡略整理如下：

1，首先他答覆我說，關於第一點要求，為甚麼通緝，「你自己心裡其實也是明白的啦……」。我回答：「我不明白，所以才要求解釋。」

2，然後他問我另一條要求是甚麼。我反問他，大使館是否接受陳情書，他說不必了，我只好當眾宣讀了一遍。

3，他問我為何出來這麼久了不作要求，我告訴他在去年六月三日，我逃出不久，就在華盛頓發出類似要求，他無言以對。

4，他問我為何不直接回國去，我問：「我可以就買一張飛機票回去嗎？」陳立明問他是否大使館可以發我一本護照，或入境卡之類的。他再無言。【以上第 436 頁】

5，他說你是請大使館轉達你的要求，我們已經知道你的意思了，會適當處理的。我問他：「你們」是誰，大使館是否願意接收陳情書？他又沉默。

6，他說：這是你同中國公安部的事，直接同他們聯繫好了。我答：至今還未有任何機構通知我說我已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那麼在海外我只能同當地使館聯 繫。如果大使館建議我直接同中國公安部聯繫，請你們給我一個公安部的聯絡地址好不好？他答：我們大使館沒有中國公安部的地址。

7，他說：我們已經答覆了你，請不要糾纏，你們走吧。我再次問：「你們」是誰？他不正面回答，說：我要叫警察了。我說：我就是來等警察抓的。

8，最後他問，你的條件就是公開審理，若不公開就不回去，是嗎？我想了一下，說：是的，不是公開審理，我不回去。

9，我問完之後，回收發室去，同我們隔一道門窗。這時是三點半，我們同丙男辯論了幾句後，最後到收發室，再問使館是否有個明確答覆，是收還是不收陳情 書。甲男說不必收了。我再次追問這是誰的決定，他回答：我既然坐在這裡，就是大使館的人。我又問他的姓名與職位，仍無回音。最後我們的決定離

開使館。

其間同丙男的辯論，是他說已有答覆，要我們走。我追問是誰答覆，他亦無言。最後稱他是負責使館保安的，卻在無趣中走了。

在大使館的整個過程中，我抽空出來了一趟，告訴漢峰與Mlie Brucerralli還要等一陣。後【以上第437頁】來漢峰告訴我：當他們在外等候的一個小時之中，有好幾個人多次出門向他們張望，其中也有甲乙丙丁等。Mlle Brucerralli為我們進出大使館拍了些照片。

在大使館的整個過程中，我抽空出來了一趟，告訴漢峰與Mlie Brucerralli還要等一陣。後【以上第437頁】來漢峰告訴我：當他們在外等候的一個小時之中，有好幾個人多次出門向他們張望，其中也有甲乙丙丁等。MIle Brucerralli為我們進出大使館拍了些照片。

後記：中國大使館不願接收我的陳情書，甚至連中國公安部之地址都說不能提供，因此我只能通過其他渠道向中國公安部發出我的要求。六四當晚，美國之音中文 部的周友康先生為我近期所寫的三十二萬字的書稿一事採訪我，我藉機介紹了下午的情況，希望通過美國之音在中國大陸的廣播傳達到中國公安部。六月七日在巴黎 新凱旋門上的「中國民主化的進程研討會」上，我要求了一個五分鐘之即席發言，也提到此事。六月八日，在巴黎自由電台華人之聲節目中，向聽眾呼籲協助傳達此 訊息至中國公安部。我還將向法國難民局(OFPRA)及各個國際人權機構陳述。

給中國公安部的信，我只好將地址寫作：北京中國公安部。若一個月後沒有答覆，我將再次進入大使館。(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於巴黎)

陳情書

－－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國大使館

我叫封從德，一九六六年三月生於四川省宜賓市。由於參與八九年的學生運動，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受到中國公安部的全國性通輯十個月之後逃抵巴黎，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在法國取【以上第438頁】得庇護，居留至今。

我叫封從德，一九六六年三月生於四川省宜賓市。由於參與八九年的學生運動，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受到中國公安部的全國性通輯十個月之後逃抵巴黎，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在法國取【以上第438頁】得庇護，居留至今。

鑒於我是根據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學研究生會，按校方認可的章程所作的合法決議而進入北京大學研究生會主席團，受命領導學運的(參見中國國家教 委編寫的《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我認為在八九學運期間，自己並無違憲言行，故特此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國大使館向中國公安部轉達如下要求：1.要求 對上述通輯的理由(法律依據和事實根據)作具體的書面解釋；2.如果中國的司法機關能夠保障公開的審理，我愿通過下列地址聽候傳訊：17 ruede Tournon ,75006 PARIS FRANCE 所謂公開的審理，是指允許我的親友出庭，並允許錄音錄像和公開報導。此件副本，將轉呈法國難民局(OFPRA)和各國際人權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封從德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於巴黎【以上第 439 頁】

回國受審「自白書」

今年六四，在友人陪同下，我進入中共駐巴黎大使館，要求向中共公安部轉達二點要求：

１、解釋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通緝令的法律依據和事實根據。

２、如果中共司法機關能夠保障公開審理，我願回國受審。

這次進入公使館的一個小時中，使館接待人員始終拒絕接受我的陳情書(附後)，拒絕透露他們的職務與姓名，甚至拒絕提供公安部的地址。詳細經過，我已在六月十六日的香港《百姓》雜誌中刊出--篇備忘錄。

一個月之後，我再次進入大使館。這次唯一有點進步的是，接待我的中年人告知了他姓田，是新聞處的。他氣壯地稱，大使館不會轉達你一個通緝犯的請求。第一次進入大使館後，我已隨即以「中國北京公安部」為地址直接發出上述要求，至今毫無回音。

大約是蘇聯事變的衝擊或是李錄十六天絕食等聲援王軍濤、陳子明的行動的感動，世界媒【以上第 440 頁】體又恢復了對中國民運的熱心，路透社、BBC、加拿大電視台……，紛紛關心起我進入使館要求回國受審這一舊聞，眾說紛紜之下，不如作個自我分析來得全面。

大約是蘇聯事變的衝擊或是李錄十六天絕食等聲援王軍濤、陳子明的行動的感動，世界媒【以上第 440 頁】體又恢復了對中國民運的熱心，路透社、BBC、加拿大電視台……，紛紛關心起我進入使館要求回國受審這一舊聞，眾說紛紜之下，不如作個自我分析來得全面。

根本而言，提出回國受審是為了「守本」。因為六四屠殺和全國通緝是我逃離中國，來到西方的直接原因，在中共宣稱已經「公開審判了」王丹、王軍濤等人，而舉世對此冷漠的時候，我更無法不去澄清這一原因。－－如果中共真是能夠做到公開審判，我就願意以身試法。

這裡也就觸及到我所希望的一個副效果－－促進中共的司法透明度。如果中共司法機構能夠公開審理，本身就是大陸法治的一個進步。無論他們將用甚麼名義來為 我羅織罪名。無論是甚麼樣的刑罰，比較起這一進步來，我都心甘情願；更何況我有充足的信心，堅信全世界幾十億目光的注視將大陸的非公開政治融化的時間不會 太長久。

去年六四，我想到王丹他們長期受到非法拘押，覺得獄中同仁最 直接想要的，就是一個公開審理；今年春天，讀到王軍濤給律師的信，不僅有所謂「幸存者的負疚」，更受一種道義上的感動。兩次想為他們絕食，都因一些技術上 的原因受友人勸阻，於是萌生在心中的念頭終於以進入使館要求受審的直接方式表達出來。也是為了安慰獄中的戰友，願天地神明，告慰他們－－「你們並不孤 獨」。

議論紛紛之中，以下答客問：

－－為何逃？

－－求生。【以上第 441 頁】

－－何必返？

－－自主。

－－你在作秀？－－你怕人們忘記你？－－你到了海外生活沮喪，混不下去了？

……

我能說甚麼？只能簡單地向關心我的命運的朋友們匯報一下，在出來的一年半中，我放棄過四次獎學金的機會，以得罪友人和令他們失望為代價，努力完成我自以 為重要的事－－記錄八九學運經過，為歷史作見證，為將來作參照。目前已完成的是記錄自己經歷的三十餘萬字回憶和召集了一次由十七位當時關鍵的學生骨幹組成 的《八九學運歷史回顧研討會》，作了錄音，目前正在整理、準備出版之中。心中的包袱快要卸下，行將安心讀書之際，我還有甚麼不滿足，再「跑」回大陸求一些 虛無漂渺的東西？但我還不敢忘記孟子進言：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一九九一年七月於巴黎）【以上第 442 頁】

辭職書（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

（本文由余茂春博士在柏克利大學發現。從未發表過。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的辭職書，辭去北大籌委會常委及北高聯主席二職，回所寫論文。）

幾句心裡話－－致全市高校同學

同學們，同志們：

這是我申請辭去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及北京大學學生自治籌委會中的一切職務之後，徵得上述組織同意，以個人身份發表的一些個人觀點，以期對同學們作最後一次鼓舞。

一、瞧，這個人

1、平凡的故事【以上第 443 頁】

我生長於四川都江堰市的一個明淨的小河邊，接受了那兒人們的善良。從一九八二年秋，在北大度過我的青春，至今七載，染上了北大人的孤獨。

自己的評價，我不敢超過一個普通人，無論是智商、良知，還是自尊。還有一點，我以為由我這麼個從沒系統學習過政治、社會和法律的理科學生，在這次民主運動中充當一個重要角色，實在是歷史的悲哀。唐吉訶德怎麼說？

２、熱血與良心

四月十九晚，在北大三角地的那次二千多人的露天「民主沙龍」上，我站出來的唯一原因，大約便是一個青年的熱血和一個公民的良心。

那次沙龍上，我對大家說，以前的學運中，我一直是個熱心的「旁觀者」，我認為這是客觀的評價，雖然我八七年元旦因在天安門衝軍警而在中山公園派出所，與 其它許多同學及工人、農民、中學生和記者一起蹲了十二個小時；雖然八八年北大柴慶豐事件中，我是「行動委員會」之一員。因為我歷來不主張暴力和秘密行動。

衝軍警，是由於我對監獄及中國新聞歪曲過程，想看個究竟；「行動委員會」，我大約參加剛一晚，便溜了出來。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我願做堂堂正正的事。

那次沙龍前，我對妻子說(她後來也參加了北大籌委會)，我只說幾句想說的話，不會參加更多的活動。當時有個原因：我的計算機壞了。後來，同學們的呼聲，喚醒了我的熱血、良知與責任心。我當時的想法是：不能辜負了同學們。【以上第 444 頁】

那天晚上，我意識到自己的使命：竭力維護以後學生自治組織的民主制機制。

二 原因、結果與進程化的民主

1、必然與偶然

在中國大陸，爆發這麼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決非偶然。考查現代世界，不難看出兩大趨勢：政治的多元化與所有制的私有化。蘇聯政治「公開性」改革的成 果、波蘭「團結工會」的合法化、匈牙利承認多黨制，印度「社會主義」的私有化及非洲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採納的私有制，……，無一不是有力證據。中國大陸近些 年推行的改革，也或多或少地沿著這兩個趨勢走了下去。

然而，這次學運的諸多偶然因素，決定了其格局和意義。這場運動，起因於人民，特別是知識界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隨後演變成的這場民主運動，一個根本的缺 陷，是沒有充分的思想和理論準備。這一點，決定了這次學運，只能是一個前奏，而沒有成熟的主旋律，也決定了倉促上馬的自治組織，只能「跟著感覺走」。

另一方面，恰恰由於許多偶然因素，為這次學運創造了一個有利環境，取得

了許多重大突破(現在還不是總結的時候，權且總結至今日)：

(一)、形成了自治組織，？？？　部分爭取到合法地位。合法性在沒有結社法時，應由人民【以上第 445 頁】來裁定。

(一)、形成了自治組織，？？？▮部分爭取到合法地位。合法性在沒有結社法時，應由人民【以上第 445 頁】來裁定。

(二)、使用了法律武器，表明我們認識到了民主政治以法制為本。這次學運，也是場全民護憲運動。

(三)、得到了社會各界普遍的同情和支持，特別是記者、工人甚至中學生都走上了街頭。

(四)、政府作了許多實質性的讓步，表明政府亦不能完全無視學生和人民的呼聲。

其一，幾次大規模遊行、靜坐，實質上否定了「十條」的尊嚴。

其二，政府不得不表示「歡迎同學生代表對話」。

２、權利與尊嚴

作為一個學生，我不知道以何種方式向哪個學生組織表達我的意願，也不知道能依靠甚麼組織來維護我作為學生的權利。我不知道我有多少研究經費可按自己的興 趣去使用，也不知道受到了校衛隊的欺侮後找誰來主持公道。我只能忍耐。北大七年，我學會了太多的忍耐。它，給我以鬥爭的韌性。

作為一個公民，我不清楚我的選票應該投給誰，唯一知道一點的是李淑嫻，其原因是北大多數同學所共同的。我不清楚我參加選舉出的人民代表大會做過甚麼，在做甚麼，將為我做甚麼。從十八歲領到選票起，我便一直茫然。這種茫然，給了我探索的動力。

作為一個學生，我要求我天然的權利：由我及我的全校同學參與，成立一個民主的學生團體。【以上第 446 頁】

作為一個公民，我要求我天然的權利：由我及我的中國同胞參與，成立一個民主的政府。

如果現存的學生會(及研會)自認為是民主的，請回答我上述的疑慮；如果現存的政府自認為是民主的，請解決我上述的茫然。

我要求，學校不要無視我作為學生的權利與尊嚴；

我要求，政府不要無視我作為公民的權利與尊嚴。

３、復活

這場學生運動，是自七十年前五四以來，最為壯觀的一次大爆發。這是一場以學生為主體的新民主啟蒙運動的開端，是今後由各階層參與的一場徹底的民主運動的 號角。以後的民主運動，將導致中國產生一部以「科學與民主」為根本點的憲法，由這部憲法起，中國將從此擺脫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的影響，從此走上迅速富 國強民之路。

這場學生運動，還是對民族精神之喚醒。它在精神上拯救了中國。許多人士說：我們又看到了獻身精神，又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它將結束中國的信仰危機，喚起人民對「科學與民主」精神的膜拜。

４、天國之路

第一步：校園民主。中國目前的民主力量，主要集中在校園內。知識分子是中國最優秀的階層。他們是徹底的無產者，最有獻身精神，同時又具備最高的文化素養 和最明晰的民主意識。學生是民主運動的先鋒。除上述優點外，他們還有兩個力量之源：熱情與密集。他們都是熱血青【以上第 447 頁】年，為祖國和人民不惜犧牲一切；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上的相對密集，要催化了他們的民主意識和群體力量。

第一步：校園民主。中 國目前的民主力量，主要集中在校園內。知識分子是中國最優秀的階層。他們是徹底的無產者，最有獻身精神，同時又具備最高的文化素養和最明晰的民主意識。學 生是民主運動的先鋒。除上述優點外，他們還有兩個力量之源：熱情與密集。他們都是熱血青【以上第 447 頁】年，為祖國和人民不惜犧牲一切；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上的相對密集，要催化了他們的民主意識和群體力量。

校園民主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之突破口。需要民主啟蒙的，首先是學生自己。這次學運，充分暴露了為民主而奮鬥的同學們，甚至「學生領袖」們自身對民主的陌 生。大家不知道自己有責任參與和監督自治會的工作，而習慣於聽從其指揮；自治會逐步脫離廣大同學而成為一架疲於奔命的指揮機器；沒有形成一個由全體同學普 遍認同的組織規程，其民主機制更是若隱若現。「根本的問題，是人的素質問題」。雖然如此，我依然有理由相信，近期我們能看見中國民主政體之雛形－－校園民 主的學生會。

校園民主本身將是一場長期的鬥爭。其含義不僅是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鬥爭，還包含校園的另--個主體：教師及教育機構。我相信，在本世紀結束之前，我們能 有幸看到我們的校園由「教授議會」之類的機構來管理。以後學校培養的學生，不僅應有科學知識，也必須有民主意識。他們將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中堅力量。

第二步：民主啟蒙。由校園而知識界，爾後是工、農、商，將逐步根據鞏固了的校園民主的經驗，形成各級民主政體。這將在整個社會蔓延，且步步為營。首先取 得成果的，大約是新聞、出版界。現代傳播技術已深刻地影響了現代民主。當人們耳聞目睹了外部世界，而感受到強烈的反差時，一種要求民主的意識便自然得到了 強化。這正好有利於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全民民主意識的啟蒙。【以上第 448 頁】

第三步：憲法大討論。前面所說的以科學與民主為根本點的憲法，最樂觀的估計，我期望在五十年內能看到。從現 在起，我們就必須開始研究和傳播其思想。美國的憲法，以「民主與經濟」為本，可以說是第二次工業革命之產物。它將一半的選票交給全體公民，另一半則給了資 產所有者。美國由此富強起來了，但沒能全面、科學地解決整個社會問題。

第四步：以法立國。由這麼一部憲法而建制的政府，必須使古老中華迅速步入現代強國之林。

三、目前的任務及方式

就這次學運，早在五月一日前後，市高聯便作了一個估計：北京的學運高潮已隨四月二十七日之大遊行過去，並將以五四為界而告一段落；而全國性學運高潮是在五四。基於這種認識，我認為五四後的鬥爭重點應是：

（一）、復課對話，形式可改為由一部分同學靜坐甚或絕食，以要求對話。

（二）、加緊自治組織的合法化進程。形式可以是徵集全體同學簽名，成立學生議會（由班代表、寢室代表參加）或直接普選新的學生會。這一方面，校方及政府似乎比較寬鬆。

（三）、加強同社會各界的聯繫，聯合全國高校，宣傳民眾，聲援《世經導報》爭取民間辦報。【以上第 449 頁】

阿洪－－無名氏散記（柴玲逃亡的故事）

阿洪這個名字，即使是在巴黎，知道的人也不算多。而知道他是五年前將我和柴玲救出中國的人就更少了。至今，為了國內朋友的安全起見，他還依然不得用其真 名，地地道道成了一個「無名英雄」。前年「六四」，我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說一九八九年的精神不主要表現在我們那班「領袖」、「精英」們形形色色的「英雄 氣概」上，而更多地体現於千千萬萬個「無名氏」默默的情怀和高貴的人格之中。今年的四月一日，將是阿洪同我們一道抵達巴黎的五週年，謹以此文作為六四無名 氏研究之一號，期於為光大八九精神有所貢獻。

「是你的朋友我就幫」

六四屠殺後，柴玲與我在國內的逃亡將近十個月，靠的全是一群萍水相逢的義氣朋友。其中一位與阿洪情義深重，可謂兩肋插刀的知交，他知道阿洪有條件合法出入香港，便去找他：【以上第 450 頁】

－－能不能幫個忙？

－－說吧。

－－幫兩個朋友偷渡去香港。

－－是你的朋友，我就幫。究竟怎麼回事？

－－六四的人。

－－行，你的朋友一定幫，更何況因為六四。給我些時間，想好辦法就去找你，也叫那兩位朋友準備好隨時動身。

接下來的幾個月，阿洪不知探問了多少條路。自然也想過花錢走「黑道」，

但他一打聽，每人二十萬，也就只好作罷。屢試不中，腦汁絞盡，終於，摸索出一條自認有把握的路，他立即去找朋友。

當那位朋友找到我問是否願意出去，此時，我對這群義士真是依依不捨，他們皆佛道中人，一直帶我練功。起初兩個月，我心氣浮搖，六四強烈的衝擊，對海外民 運熱切的關注，加上十幾年的科學教育，皆使我對他們那一套「東方神秘主義」有隔膜。然而，一次闖邊境的經歷，動搖了我持之當然的科學主義的信念。當時，他 們又是「唸咒」，又是「佈氣場」，還要求我也不斷求觀音菩薩，唸六字大明咒，說我是當事人，不唸，他們再用功也白費。結果，三次幾乎落在士兵手中，三次皆 得逃脫。雖說不能就此證明甚麼，卻亦難以輕易否認了。科學不是講實事求是嗎？從此，我開始認真地跟隨他們練功，其間還有三個月是在森林中度過。【以上第 451 頁】

準備在不測時自殺

我們是在最後階段才給交到阿洪手中的，此前他全然不知要搭救的究竟是誰，這種單線聯絡的方式，全然模仿當年中共的地下活動。唯一的差別，是阿洪的行為， 憑的不是甚麼主義理念，完全是朋友間的義氣，這與那批佛道朋友一樣。雖然他們都同情受到鎮壓的六四學生，卻並不十分贊同運動中的西化目標，然而依然冒死相 救，不過是要實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之類積善積德的修行精神和朋友之間君子之交的義氣罷了。

一見到阿洪，我便感到其為人的沉著與穩重，雖萍水相逢初相識，心也踏實極了，整個行動中，一點也沒覺得心跳。

阿洪個兒不算高，卻很壯。年齡與我相若，練洪家拳卻已二十個年頭了。因為練拳的關係，兩眼炯炯有神，渾身剛健有力，壯實得如一頭小熊。中國武術防身健 体，講武更講德，武功離不開武德，武中常帶文氣。阿洪受其薰染，為人極謙讓，後來甚至發現，有些話題還能令他臉紅害羞。不知就裡的人，還以為他文弱可欺 呢。

當時阿洪也不多話，沉著幹練，動作敏捷麻利，很快將我們藏進一個 極隱蔽的地方，看來，事先的準備極充分。然而，這次行動一點也不似預計的那麼單純，頭一天便被迫將行程延遲、更改，中途又兩度邊防軍攔截和突擊搜查。事後阿洪直感嘆：本來並不打算將我們藏到一個那麼密【以上第 452 頁】蔽的地方，幸虧當時一閃念，否則早就被發現了。

當時阿洪也不多話，沉著幹 練，動作敏捷麻利，很快將我們藏進一個極隱蔽的地方，看來，事先的準備極充分。然而，這次行動一點也不似預計的那麼單純，頭一天便被迫將行程延遲、更改， 中途又兩度邊防軍攔截和突擊搜查。事後阿洪直感嘆：本來並不打算將我們藏到一個那麼密【以上第 452 頁】蔽的地方，幸虧當時一閃念，否則早就被發現了。

整個行動中，無論遇到何種意外，阿洪皆從容不迫。實際上，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作好了最壞的打算。行動前一天，他將貴重物留下，卻偷偷帶上一把小火 槍，這是他事先就置辦好的準備在不測之時自殺，以免中共嚴刑逼供，搜出他人的線索。由於行動的第一天，行程就被迫更改推延，他覺得此行凶多吉少，便去給一 個親人打電話：

－－要是我有甚麼意外，請好好照顧我媽媽，就當我是個不孝子，或乾脆沒我這麼個兒子。

－－甚麼？甚麼！

對方一頭霧水，又驚又急。阿洪沒更多話，將電話掛斷。

在裡面藏了四天五夜

我和柴玲藏在裡面，全不知情。本以為很快便能到香港，沒想到在裡面悶了三天還沒動靜。

情況逼迫，既進了去便不能隨便出來，平添無數困難，尤其吃喝拉撒，真讓阿洪費盡心機。

天黑時，他設法遞了張紙條進來，要我們準備長期堅持。秘藏的地方既憋悶，又特多蚊子，嗡嗡聲不停。因為吃素煉功的關係，又不得殺生，實在難受極了，只好 來個「精神勝利法」－－調心靜氣，漸入氣功狀態。說也奇怪，這麼一試，還真管用：起初奇痒難熬的感覺，漸漸化為一股清涼之氣，宛如夏天烈日之下在山谷中受 涼風一吹那種爽快。等出來時一看，渾身上下雖然滿【以上第 453 頁】是小黑點，卻沒有一處紅腫起來。看來氣功真的不光是改變了主觀感受，客觀上也起了作用。在艱難時刻，氣功幫了大忙。

天黑時，他設法遞了張紙 條進來，要我們準備長期堅持。秘藏的地方既憋悶，又特多蚊子，嗡嗡聲不停。因為吃素煉功的關係，又不得殺生，實在難受極了，只好來個「精神勝利法」──調 心靜氣，漸入氣功狀態。說也奇怪，這麼一試，還真管用：起初奇痒難熬的感覺，漸漸化為一股清涼之氣，宛如夏天烈日之下在山谷中受涼風一吹那種爽快。等出來 時一看，渾身上下雖然滿【以上第 453 頁】
是小黑點，卻沒有一處紅腫起來。看來氣功真的不光是改變了主觀感受，客觀上也起了作用。在艱難時刻，氣功幫了大忙。

在裡面憋到第三天，外面終於有了動靜。我們一直懸著的心稍稍放下，心想，這下該快到香港了。沒想到，中途又停了下來，不一會兒，一陣響動，聽不太清楚， 只隱約感覺是幾個人在大聲說話。我們藏的地方也被撞了幾下，過一會，又恢复了平靜。又是一天過去了，才又啟程。不久，又停下，又有人來，不

過這次沒等很長 時間，便又啟行。等到了香港，我們出來時一算時間，我們在裡面整整呆了四天五夜一百零八個小時。阿洪說他當時真擔心我們會在這裡悶死……這一百零八個小 時，他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壓力啊，然而，阿洪卻總是從容不迫，整個行動中沒讓我們感到一絲緊張。

一眼就能看出是「大圈客」

到了香港，一出來，阿洪便問我們接應的人在哪裡。我說，我這裡有他們的地址。阿洪聽了愣了一下。隨即，就近找了一間咖啡吧，給我們點了熱粥和叉燒包。老 闆向他擠擠眼：「哇！大圈客(港語：大陸偷渡客)！」阿洪覺得事情有些不妙，叫我們赶快吃完就走。本來，照原定計劃，阿洪只要將我們送到香港便完成任務， 因此，我將剩下的最後一千多元人民幣塞到他手裡，要他帶回去。阿洪手一推，說：「你以後可能還有很多困難，還是留著吧；要不就捐給民運。」【以上第 454 頁】他分文不取。

到了香港，一出來，阿洪 便問我們接應的人在哪裡。我說，我這裡有他們的地址。阿洪聽了愣了一下。隨即，就近找了一間咖啡吧，給我們點了熱粥和叉燒包。老闆向他擠擠眼：「哇！大圈 客(港語：大陸偷渡客)！」阿洪覺得事情有些不妙，叫我們赶快吃完就走。本來，照原定計劃，阿洪只要將我們送到香港便完成任務，因此，我將剩下的最後一千 多元人民幣塞到他手裡，要他帶回去。阿洪手一推，說：「你以後可能還有很多困難，還是留著吧；要不就捐給民運。」【以上第 454 頁】他分文不取。

阿洪很快便意識到我們和國內那些朋友對香港沒有起碼的了解，不明白這麼一身衣衫襤褸、披頭散髮的樣子，在香港大街上行走極易引人怀疑。明眼人一看便知是 偷渡客，一張口便會露餡。無論警察、記者還是黑道乃至中共人員，隨時可能給我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他不得不「送佛送到西」，陪我們去找那位聯絡人－－實際 上，只是國內朋友的一位表親，事先也並不知情。

阿洪先帶我們去附近的市場，買一身衣服換上，然後才敢乘坐巴士地鐵。一路上，阿洪買票問路，環顧左右，又讓我們盡量沿路邊不顯眼的地方走。我心想，嗨，都到香港了，怎麼還這麼緊張兮兮的？找到那人住處，他正巧在。由於事先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顯得顧慮重重。

－－唉，九七快到了，共產黨眼看就要來，我還有一家老小啊。過去在中國，我家就是地主成份，現在又做反共的事，以後可怎麼辦哦？……

阿洪一聽話不投機，便連聲道「打擾，對唔住!」便拉我們出門。當時我們聽不大明白廣東話，柴玲一時不解，見剛找到人又要走，還直問：「怎麼回事？」

找到中大的同學

外面的天陰沉沉的，毛毛細雨紛紛揚揚地隨風飄落，弄得頭髮濕漉漉的。我們躲在一座天橋下，何去何從，一下子有些茫然，對香港溫柔的春意，也沒一點心思。這時阿洪陪我們出來的【以上第 455 頁】時 間已過長，回去一定會受盤問，而我們出來時已被人看見，倉促間又來不及收拾好躲藏地點的雜物；聯絡人又是這副樣子，我們又講不好廣東話，幾重因素加在一 起，阿洪毅然決定不照原計劃回中國，而護送我們到底。他提議我們直接去美國領事館，但我擔心就這麼從大門進去，免不了生麻煩。當時身上除了那位「聯絡 人」，沒有別的地址，幸好還記得廣場上有位香港同學的學校叫中文大學，這才乘了地鐵、火車去投奔。

外面的天陰沉沉的，毛毛細雨紛紛揚揚地隨風飄落，弄得頭髮濕漉漉的。我們躲在一座天橋下，何去何從，一下子有些茫然，對香港溫柔的春意，也沒一點心思。這時阿洪陪我們出來的【以上第 455 頁】時 間已過長，回去一定會受盤問，而我們出來時已被人看見，倉促間又來不及收拾好躲藏地點的雜物；聯絡人又是這副樣子，我們又講不好廣東話，幾重因素加在一 起，阿洪毅然決定不照原計劃回中國，而護送我們到底。他提議我們直接去美國領事館，但我擔心就這麼從大門進去，免不了生麻煩。當時身上除了那位「聯絡 人」，沒有別的地址，幸好還記得廣場上有位香港同學的學校叫中文大學，這才乘了地鐵、火車去投奔。

找到中文大學學生會，我們還不敢直報身份，自稱是從天津逃出來的學生。還好，不太費力，我們很快便見到了廣場上認識的那位香港同學，然後再與有關機構取得聯絡，以後的事，一切順理成章，四月一日，我們便到了巴黎。

岑建勳見到我們大喜過望

補充一點，在直到中文大學之前，我們在國內近十個月的逃亡，依靠的完全是國內的人力財力，由一群素昧平生的俠義之士相助，一分一毫也未自外來。實際上我們幾乎沒有向外聯絡，更談不上「地下通道」、「黃雀行動」、「中央情報

局」之類聳人聽聞的名目。

當岑建勳突然見到我們突然出現在香港，大喜過望，一面覺得我們就這麼空手乘巴士、地鐵到中文大學有些不可思議，一面直感嘆：「你們至少節省了四十萬港 紙！」後來據局內人言，有些六四人士走「地下通道」，一人花了四十萬，皆來自港人私下捐款。港人對「六四」真是義【以上第 456 頁】重如山。我們為省去這許多費用而高興，再為阿洪和國內那批義士而自豪。

當岑建勳突然見到我們突 然出現在香港，大喜過望，一面覺得我們就這麼空手乘巴士、地鐵到中文大學有些不可思議，一面直感嘆：「你們至少節省了四十萬港紙！」後來據局內人言，有些 六四人士走「地下通道」，一人花了四十萬，皆來自港人私下捐款。港人對「六四」真是義【以上第 456 頁】重如山。我們為省去這許多費用而高興，再為阿洪和國內那批義士而自豪。

逃亡後期，我們的經濟相當拮据，他們中有人甚至將準備結婚的存款拿了出來。雖然並不十分贊同運動的西化目標，但他們依然本著佛道的修行精神捨生取義，冒 死相救。臨行前，他們對我和柴玲說：出去之後，一定不要宣揚我們。外面的世界紛亂不堪，你們最好也不要從政，多讀些書，充實自己。以後回了國，要是再有甚 麼急難，還可以來找我們。

國內朋友的情義、港人深厚的愛心和西方外交機構的機智，皆永世難忘。由於眾所周知的顧慮，在此暫不細表，本文記述的偷渡過程亦作了適當的模糊處理和順序安排，請讀者不必擔心。唯有一事，想藉此五週年之機，向公眾和盤道出－－當時台灣中國時報記者是如何搶到頭號新聞的。

台灣記者成了「張如大姐姐」

從香港啟程西行之前，我們已與一位西方外交翻譯見過一面，知道是由他陪同我們通過海關。臨行那天，一切手續齊備，各級人物離去後，那位翻譯給我們介紹了 一位女士，四十來歲，打扮得光艷入時。她自稱是來「路上照顧柴玲的大姐姐」，「叫張如，在香港開服裝店」。我們因為一直受到最嚴密的保護，一絲防備也沒 有。一路上，她想盡辦法向我們探聽逃亡經歷，還問我們是否收到一筆兩萬五千美元的港人營救捐款，使我們甚覺蹊蹺。當時柴玲因長期奔波勞累，【以上第 457 頁】又暈又吐，這位「來照顧柴玲的大姐姐」卻緊追不捨，喋喋不休。我終 於忍不住，只好老實不客氣地對她說：「柴玲身体不好，請原諒！」硬是將她弄開去。然而，她還不罷休，轉而向我和阿洪問長問短，又利用時機拍

了不少照片，信 誓旦旦地說，只是為了留個紀念，擺在自己的書房，絕不作他用—因為見到柴玲覺得十分榮幸。

從香港啟程西行之前，我 們已與一位西方外交翻譯見過一面，知道是由他陪同我們通過海關。臨行那天，一切手續齊備，各級人物離去後，那位翻譯給我們介紹了一位女士，四十來歲，打扮 得光艷入時。她自稱是來「路上照顧柴玲的大姐姐」,「叫張如，在香港開服裝店」。我們因為一直受到最嚴密的保護，一絲防備也沒有。一路上，她想盡辦法向我 們探聽逃亡經歷，還問我們是否收到一筆兩萬五千美元的港人營救捐款，使我們甚覺蹊蹺。當時柴玲因長期奔波勞累，

【以上第 457 頁】又暈又 吐，這位「來照顧柴玲的大姐姐」卻緊追不捨，喋喋不休。我終於忍不住，只好老實不客氣地對她說：「柴玲身体不好，請原諒!」硬是將她弄開去。然而，她還不 罷休，轉而向我和阿洪問長問短，又利用時機拍了不少照片，信誓旦旦地說，只是為了留個紀念，擺在自己的書房，絕不作他用－－因為見到柴玲覺得十分榮幸。

到達西方，她赶緊告辭。不久，香港媒体便滿城風雨，世界各地記者雲集巴黎，將巴黎大小醫院搜了個遍，鬧得柴玲毫無喘息之機，連身体檢查都沒來得及做，便 不得不面對記者了。《中國時報》搶先登出的頭條新聞下署名：「本報特派員江ＸＸ」。後來，那位翻譯很快便丟了飯碗，而光艷的江ＸＸ卻棄文從政升了官。事後 不久，「張如」來了一封信，依然以「大姐姐」自居，說當時那麼做，「是為了保護」我們，甚至又提出要我們寫一本書，她可「保證出版，賺到至少五十萬美 元」。你說噁心不噁心？

這封信，我們一直留著。這是我們在「自由世界」遇到的第一位享有「新聞自由」的記者，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近些年來，無論國內海外，多「有感於中國人的 騙」，希望本文多少能撫慰一些受傷的靈魂，知道中國人之間尚有真情和大義在，明白甚麼才是真正的中國人，企望國人能夠珍惜我們自家的文化自身的根。

阿洪讓出住房和獎學金

【以上第 458 頁】

都說當初六四「民運人士」在巴黎領了大筆港紙台幣美鈔，優哉悠哉，這大約除了那班一出來便忙著設計「未來中 國國旗」，忙於討論「分部主席回國後相當於局級還是部級」，每月領八千法郎工資(加上稅共一萬二)的「精英」、「領

袖」」們之外，別人是沒有這份悠閒的。 尤其阿洪，他除了一筆微薄的為期一年的生活補貼之外(當時我們還以為是法方獎學金)，實際上，由於他謙讓的品性，還使他丟掉了許多本當屬於他的東西，譬如 住房和獎學金等等。

到巴黎後不久，巴黎市政府照慣例要為我們三人安排一套低租金住房(HLM)，這是一般低收入階層的理想居處，因為有政府補貼，房租比一般的租金低許多。 很多「六四」人士先我們而到，住的正是這類房屋。由於我和柴玲很快便去美國參加「六四週年祭」，這個安排便告吹了。阿洪對此既不清楚，性格又極謙讓，從不 知為自己的利益去計較，我們當時初來乍到，正處於媒体焦點，又很快要去美國，加上對西方現實生活毫不了解，心思精力皆尚不能落回生活的實處，於此便忽略 了，結果，阿洪的生活以後完全是靠自己掙扎解決。本來一般難民可住在免費的難民營半年到一年，裡面還有許多對難民的針對性照顧，結果因為我們的關係和各種 陰差陽錯，他連這點起碼的東西也沒得到。

另一方面，在獎學金問題上，更能看出阿洪的謙讓和為此付出的代價。阿洪從不利用任何機會取巧謀利。幫助他們領身份證的法國朋友善意向他提議，既然他的意 願是上學，最好乘機將年齡報低幾歲，因為對年輕學生的照顧較多。阿洪沒有從命，並不指望甚麼不屬於他的東西，正相反，他還將本屬於他的一份獎學金讓給了另 一位六四學生，因為聽說那位同學比他還困難。這【以上第 459 頁】麼一 讓，義氣是義氣，阿洪卻為此付出了頗大的代價。原來，這筆獎學金因為是法國政府提供的，其有效性便不止是學法文的頭一年，以後只要成績過得去，至少可以供 到大學畢業甚至更高的學位，除學費全免，每月還有三四千生活費。而阿洪當時僅有的那點生活補貼只有一年不說，交了學費，便所剩無幾了，連頭一年學法文都不 能維持，阿洪實際上是借錢去外省學的法文(柴玲給了他很大的幫助，將當時的獎金、稿費寄給他)。尤其是到了外省的法文學校，他才了解到，原來那位同學並不 比他困難，也有其他渠道的生活費，而且比阿洪的還多一半，再加上獎學金，簡直是個學生貴族了。然而阿洪卻從來沒有在那位同學面前流露過一絲怨言。而我也是 直到這次為了寫此文，向他追問其經濟細節時，才得知的。阿洪與那位同學至今一直保持朋友關係。

另一方面，在獎學金問題 上，更能看出阿洪的謙讓和為此付出的代價。阿洪從不利用任何機會取巧謀利。幫助他們領身份證的法國朋友善意向他提議，既然他的意願是上學，最好乘機將年齡 報低幾歲，因為對年輕學生的照顧較多。阿

洪沒有從命，並不指望甚麼不屬於他的東西，正相反，他還將本屬於他的一份獎學金讓給了另一位六四學生，因為聽說那 位同學比他還困難。這【以上第 459 頁】麼一讓，義氣是義氣，阿洪卻為此付出了頗大的代價。原來，這筆獎學金因為是法國政府提供的，其有效 性便不止是學法文的頭一年，以後只要成績過得去，至少可以供到大學畢業甚至更高的學位，除學費全免，每月還有三四千生活費。而阿洪當時僅有的那點生活補貼 只有一年不說，交了學費，便所剩無幾了，連頭一年學法文都不能維持，阿洪實際上是借錢去外省學的法文(柴玲給了他很大的幫助，將當時的獎金、稿費寄給 他)。尤其是到了外省的法文學校，他才了解到，原來那位同學並不比他困難，也有其他渠道的生活費，而且比阿洪的還多一半，再加上獎學金，簡直是個學生貴族 了。然而阿洪卻從來沒有在那位同學面前流露過一絲怨言。而我也是直到這次為了寫此文，向他追問其經濟細節時，才得知的。阿洪與那位同學至今一直保持朋友關 係。

阿洪打工從負數做起

從九一年五月起，阿洪被迫中斷在外省的法文學習，回巴黎半工半讀。生活補貼到期，沒有獎學金、沒有低租金住房，沒有正常工作，語言還半通不通，甚至不能 告訴別人他的真實身份和經歷，這種隱姓埋名的狀況，更讓他在流亡者中得不到應有的照顧。實際上，他比國內的自費留學生還要艱難－－既沒有流亡者應得的許多 照顧，又有家不能回，不似留學生那樣還有一個同齡人群体稍解異鄉幽情。因緣際會，阿洪成了一個徹底的「無名英雄」，他要從零乃至負數(譬如語言、文化)從 頭做起！【以上第 460 頁】

巴黎六區，法式餐館 Petit Zinc(小吧柜台)，繁華的蒙巴拉茲車站旁。從九一年五月至九三年六月，每個周末兩天，每天十個小時，阿洪都在這裡洗杯、倒酒、沏咖啡。一天下來，精疲 力竭，換得二百七十法郎，得用來支付每月一千法郎的法文課學費，再加上房租和衣食，非常拮据。後來做到侍者，一天也不過三百法郎。有時工作太晚，赶不及末 班地鐵，還得掏錢「打的」。整整三年多，只有兩個暑假稍有變化－－由周末工改為全工，九三年暑假是在一家快餐店(Berger King)，收入沒甚麼差別，都是法國法定的最低工資(SMIC)。

說到住的地方，就更不像國內的人想像的那麼天堂。巴黎最窮的學生一般住一種叫 Chambre de bonne 的頂層閣樓，從前是樓下富人家的僕傭睡房，因吃飯洗澡皆在主人家，故這類房間簡陋至極。阿洪住的閣樓，又是這類房間中最簡陋的：七層高，沒電梯 得自己爬，室內沒有自來水，須到樓下去提：廁所在走廊外與人共用；裡面空間極小，從門到窗五步，從左到右三步，比伏契克的牢房還不如；一張床就佔了小半面 積，加上衣櫃桌椅，就剩不下多少可以蹬打的餘地，還得除去憑窗的斜樑所佔的空間。法國人美其名曰「鴿子籠」。窮學生住這樣的地方，不外一個原因：便宜。阿 洪那時每月租金五百法郎，整個巴黎，沒比這更低的房租了。

住在這裡的兩年，是阿洪生命的最低谷。他為了朋友義氣，拋棄國內的一切「當時他的月收入達一千五百元人民幣，在大陸是難得的高薪」；他捨命救出的人舉世 矚目，他卻幾乎沒人知道；他既回不了家，又回不了國；既非留學生，又還得在流亡團体中隱姓埋名；中國離他那麼遙遠，法國又不屬於他，卻不得不在其中謀生 存。他就像一隻斷線的風箏，隨風漂泊……【以上第461頁】

阿洪在商學院的遭遇

然而，阿洪還是憑著自己的頑強毅力掙扎了出來。九三年秋，他終於進入了巴黎大學商學院(I.U.T)，專修國際貿易，已順利通過了第一年的法律基礎課程 的十幾門考試，這對五年前一句法文不會、又無深厚英文底子的阿洪來說，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今日大陸一般，商學院在西方異常熱門，阿洪是憑著他不屈 的毅力拖著陌生的法文在與法國學生競爭的。而且，困難遠不止於此，許多情況是他的法國同學做夢也想不到的。譬如一次與一位系主任作入學面試，問及年齡：

－－二十八。

－－哦呵！你可以做 Grand－Pèrc(祖父)了，怎麼還來上學？

阿洪愕然了。這完全不是法國人的幽默。百分之二十的法國人投極右的「民族陣線」的票，就是覺得白種人比其他人種優越，而法國現今的衰落當歸罪於來法的外 國人。這類人完全忘了他們的父輩跑到別人的國土上所做的壞事。你要問東印度公司、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是怎麼回事，沒有幾個西方人清楚。相反，在巴黎大學中 文系的課程中，卻有「二十世紀中國史：洪水、飢饉、搶劫、賣淫、吸毒和幫會」這麼一門，屬高年級的「中國文明」課程。

更令阿洪難過的是公關課老師。她喜歡當眾嘲笑阿洪的口音，挑剔他的法文，

後來阿洪發【以上第462頁】憤，有了進步，她又冷嘲熱諷。有一次作文，阿洪按要求寫的自我介紹信極為通暢友善，文法也不差，這位公關老師竟跑到另一個班上去說：「有一個MEC(男人，極不禮貌的法文)，話都說不清，信卻寫得那麼漂亮，沒有搗鬼作弊，怎麼可能？」可想阿洪聽說後的心情。

更令阿洪難過的是公關課老師。她喜歡當眾嘲笑阿洪的口音，挑剔他的法文，

後來阿洪發【以上第462頁】憤，有了進步，她又冷嘲熱諷。有一次作文，阿洪按要求寫的自我介紹信極為通暢友善，文法也不差，這位公關老師竟跑到另一個班上去說：「有一個MEC(男人，極不禮貌的法文)，話都說不清，信卻寫得那麼漂亮，沒有搗鬼作弊，怎麼可能？」可想阿洪聽說後的心情。

諸如此類莫名其妙的遭遇，阿洪從不去計較，對人依然以誠相待，因為他有足夠的內斂忍耐功夫。後來他逐漸發現許多法國人的異常言行和不平衡的心

態，多來自 他們從小缺乏母愛、長大一直孤獨的生活經歷。家庭危機是現代法國諸多社會問題的本源，而阿洪反倒在這方面極「富有」－－他每月都同國內的家人通信去電話， 雖然萬里之遙，卻一直是他這幾年艱難歷程中的支柱。因此，他對那些輕率冒犯他的法國人反倒有一層怜憫。這真是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蹟－－一位流浪異鄉的孤客， 反倒同情起當地人的孤獨。

踏進一個法國家庭作客

九二年初的一天，阿洪下了課在地鐵等車，手中玩弄著一隻破碎的石蛋發愣。那是他同學借去弄碎的。當時阿洪心境極沮喪，心想：好好的，怎麼就給弄碎了呢？或許聯想到自己的漂泊與零丁，平添幾絲愁緒。正發呆，一位五十來歲的法國人走了過來。

－－年輕人，有甚麼傷心的呢？【以上第 463 頁】

－－你看，蛋破了。

－－年輕人，我可以請你去喝一杯咖啡嗎？

原來，法國人是一位養雞賣蛋的農場主，年輕時也曾艱難奮鬥過。他一見阿洪便覺投緣。在咖啡館裡，更仔細地詢問了他過去的身世、在巴黎打工上學的現狀和未 來的打算。阿洪皆如實相告。臨別，他邀請阿洪去他的農場。不久，陽春三月的一個明媚日子，阿洪利用假期應邀去三百公里的外省去拜訪。他永遠忘不了那一天的 情形：和煦的春光下，過了小橋，小山丘上一幢洋房，乳白的台階，雪白的牆壁，右邊是幾棵小樹－－竟與他十年前的一個夢境如出一轍，他在那裡呆住了。法國人 迎他進屋時，他依然感覺渾身輕飄飄的。他只聽主人說：我想不到你真的會來，我們萍水相逢，你還是接受了我的邀請，這太好了。對於真誠善心的人，我的家門永 遠敞開。

這是一個和睦的六口之家，之後的三天，阿洪在他們的熱情款待中，又品味到了一種家庭的溫暖，這是他三年來在法國的第一次。對於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是一 種何等的撫慰啊！雖然素昧平生，卻能互道真情，以誠相待，這種真誠的氣氛 ，三年來是何等的匱乏啊。臨別時，依依不捨，大家都掉了淚。他們為阿洪的艱辛與奮鬥精神而感動，阿洪則被他們的熱情與無私的愛心所感動。因為這一家人都信 天主教，阿洪便稱那法國人「教父」(法文也是「監護人」之義)。

可敬的法國「教母」

阿洪的「教母」與「教父」並不是一家人，她是一位「修女」。前年冬天我病重住院時，【以上第 464 頁】阿 洪介紹她來幫助我，因此現在我們都極熟悉，常常周末在她家聚會。她不是修道院中的那種修女，同一般人一樣有自己的工作，只是發過願終生不嫁，將一生獻給上 帝，工作的大部分收入則獻給教會。

她早已退休，六十八歲的人了，卻滿面紅光，心寬体胖。第一次見面時我吃了一驚，覺得不過四十來歲，比我那初入花甲的道士 教授顯得還要年輕。後來，我說給她聽，只見她張大了嘴哈哈一笑：「修道成仙又幹何用？」因為我常對她說一些道家氣功延年益壽之類的話。看來，無論甚麼宗 教，只要真信真修真行，自然就是氣功狀態，身心自然康泰，對不對呢？

阿洪的「教母」與「教父」並不是一家人，她是一位「修女」。前年冬天我病重住院時，【以上第 464 頁】阿 洪介紹她來幫助我，因此現在我們都極熟悉，常常周末在她家聚會。她不是修道院中的那種修女，同一般人一樣有自己的工作，只是發過願終生不嫁，將一生獻給上 帝，工作的大部分收入則獻給教會。她早已退休，六十八歲的人了，卻滿面紅光，心寬体胖。第一次見面時我吃了一驚，覺得不過四十來歲，比我那初入花甲的道士 教授顯得還要年輕。後來，我說給她聽，只見她張大了嘴哈哈一笑：「修道成仙又幹何用？」因為我常對她說一些道家氣功延年益壽之類的話。看來，無論甚麼宗 教，只要真信真修真行，自然就是氣功狀態，身心自然康泰，對不對呢？

「教母」曾在香港教過十七年法文，會說一口廣東話，因此從阿洪一來法國，便幫他學法文，又幫他出入各種機構辦理五花八門的證件，卻從來不主動向我們佈道 傳教，不使我們感到壓力與窘迫。這是一個真信教的態度，她對自己所信奉的神有信心，相信神自會在所有人心中做工，信徒的義務主要在善行而不在辭令上。相熟 了，阿洪同她甚至有過激烈的爭論，譬如前蘇聯車臣獨立問題。阿洪認為鬧獨立結果必起戰爭，兩敗俱傷不應該；「教母」立即從西方「民主」、「人權」角度指阿 洪「支持獨裁」。實際上，阿洪更為擔憂的是中國一些地方的獨立：「西方就是想把中國搞亂，弄成蘇聯、南斯拉夫的樣子，永遠不能富強。達賴喇嘛不也說只要自 治嗎？幹嘛西方人反倒更起勁要西藏獨立？」

阿洪身上的六四真精神

【以上第 465 頁】

其實，阿洪對於政治與宗教的興趣，遠不如其希望日後在貿易方面謀發展：「天下太平，大家安居樂業，我們才好 做生意嘛。」阿洪的生活狀況，自九三年秋住進了大學宿舍之後，已大有好轉。他正在努力完成商學院的學業，這樣日後的生活亦算有了保障。國內的親友為他的婚 事著急，要在大陸給他找個對象，他卻私下對我說：「不要了。這裡的苦要再多一個來吃，真不應該啊。許多大陸的留學生在這裡千辛萬苦也不向家裡說，國內的人 還以為我們在這裡享甚麼福

呢。不要了，我吃過的苦，不希望別人也來嚐。」其實阿洪正是有苦從不向家裡人說。

五年後的今天，才向大家介紹救我和柴玲逃出中國的阿洪，對他本身早已沒有多少「現實利益」了；憑著自身的毅力和友人的真誠幫助，阿洪早已走出了低谷。雖 然沒甚麼人將阿洪看作「六四」人士，然而，從阿洪的身上，我又看到了「六四」的真精神－－為道義為國運而忘我獻身、自強不息。我想，這個精神值得發揚光 大，可以鼓舞振作千萬人的心。但是，在我的眼裡，阿洪並不是「英雄」，更不是「領袖」、「精英」，他只是一個平常人，做的也是平常人可以做到的平常事；可 是，在他的平常當中，正見其不平常而又是許多人難以做到的。我想，是時候了，讓我們把眼光從那些「英雄」、「領袖」、「精英」們身上挪開，重新來認識「六 四」的精神。

－－我永遠不會忘記，廣場上三千一百四十四位絕食同學，他們在絕食棚上寫道：「只要中華富強，我們一無所求。」他們大多數的名字，已經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我永遠不會忘記，長安街上千百位烈士，他們面對士兵和坦克，手挽著手齊聲高喊：「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他們大多數的名字，至今還未公諸於眾。【以上第 466 頁】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北京以外的絕食學生、市民和烈士，他們更鮮為人知。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掩護傷員和逃亡人士的千萬義人，他們更不能公開。

－－我們還不要忘記，港、台、海外全体華人當時心連心的義氣，他們為海外民運做了不知多少默默的奉獻。

－－還有千百流亡人士，他們不僅受「理想幻滅」的煎熬，還要默默承受自己「領袖」們不負責的後果，更被西方政客所玩弄與出賣。然而「求仁得仁」，又更有何求？

千千萬萬的無名氏，早已回到了他們的平常生活當中。「六四」的動力，已經從現代西方政治的幻象中移開，轉而注入振興中國經濟的洪流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大業 中－－－一切皆將過去，惟有真情永存。－－阿洪從未忘記洪家拳師傅的教訓：「仁義為先」。（作於一九九五年三月）【以上第 467 頁】

書目舉要

圍繞「柴玲錄像事件」的爭議文章

薛曉光，「柴玲『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香港聯合報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同文在美國《世界日報》上的標題為「別人流血喚起團結自己求生！/《天 安門》記錄片一九八九年血淚篇 /期待天安門血流成河，柴玲的告白悲慘淒厲」；在《歐洲日報》（二十七日）上的標題為「柴玲『用鮮血和生命喚起民眾』/記錄片《天安門》披露一九八九年五 月談話」

薛曉光，「文革後青年的道德價值觀？－－從柴玲的『坦白』看幾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香港聯合報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香港聯合報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回響》專欄「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一、「 柴玲籲請『尊重歷史』/六四撤退走在最前排，自信談話不會有問題」

二、薛曉光：「柴玲為何『自己要走』/記得受訪有錄音但未作解釋」

同文在《歐洲日報》(二十九日)上的標題為「柴玲『我的下巴幾乎要驚掉下來』/看到『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報導，認有斷章取義之嫌」【以上第 468 頁】

曾慧燕，「柴玲作出『請尊重歷史』回應，聲言《天安門》記錄片斷章取義」，香港聯合報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薛曉光，「未解釋『自己要走』想法」，香港聯合報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Patrick E. Tyler, "6 Year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urvivors Clash Anew on Tactics" in New York Times. 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

《世界日報》社論，「天安門大屠殺的責任不容推諉或轉嫁」，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第二頁

柴玲，"Don't Blame the Victims of Tiananmen Sq." in New York Times.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一日。

胡平，「『失街亭』新編」，《世界日報》，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

魯言，「開拍歷史的另半邊臉－－訪《天安門》製片人卡瑪」，《中國時報週刊》，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頁四三

《世界日報》社論，「六四的鮮血終將孕育而成民主的果實」，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第二頁

Caroline Puel, L'anniversaire de Tiananmen agite la dissidence chinoise. Liberation, Paris, 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

王超華，「承認錯誤，肯定輝煌」，《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以上第 469 頁】

九日

吾爾開希：「理性和道德的光輝」，《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號(總第二十五期)，頁一〇－一二

王超華，「關於八九民運的思考」，《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號(總第二十五期)，頁二三－二五

柴玲，「請尊重歷史」，《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號(總第二十五期)，頁三一－三三。

阮銘，「怎樣『重估』歷史」，《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號(總第二十五期)，頁三四－三六

白夢，「天安門的審判」，《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號(總第二十五期)，頁三七－四四。

倪育賢，「從否定柴玲到否定民運」，《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號(總第二十五期)，頁四五－四九

胡平，「回首天安門－－對當前爭論的幾點評論」，《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號(總第二十五期)，頁五〇－五五

卡瑪，「對影片《移山》的幾點質疑」，《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六月號(總

第二十五期)，頁五六－六〇

阮銘，「末日審判前的賭博」，《天安門》雜誌，一九九五年六月創刊號，第二〇頁

鄭義，「為柴玲辯護」，《天安門》雜誌，一九九五年六月創刊號，第二十八頁【以上第 470 頁】

張伯笠，「誰該為天安門流血負責」，《天安門》雜誌，一九九五年六月創刊號，第十六頁

封從德，「背離歷史的歷史總結－－對當前爭議的幾點質疑」，《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號(總第二十六期)，頁三二－三八

胡平，「時局與策略散論」，《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號(總第二十六期)，頁三九－四五

龔小夏，「關於天安門運動的三言兩語」，《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號(總第二十六期)，頁四六

會議記錄，「群英會：八九民運研討」，《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七月號(總第二十六期)，頁七二－一〇〇

耶人，「海外民運跳不出共產模式」，《九十年代》一九九五年七月，頁八八

耶人，「海外民運要怎樣才能突破」，《九十年代》一九九五年八月，頁八五

鄭義，「試論『打破一環』」，《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八月號(總第二十七期)，頁三四－四二

胡平，「回應封從德」，《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八月號(總第二七期)，頁四三－五〇。

曹長青，「學生與天安門」，《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八月號(總第二七期)，頁五一－五七。

耶人，「跳出狹隘啟蒙的偏執」，《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八月號(總第二七期)，頁五八－【以上第 471 頁】

六六.

柳元，「也談怎樣『重估』歷史」，《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八月號(總第二七期)，頁六七。

鄭義，「等待審判」，《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九月號(總第二十八期)，頁六三－七一。

林牧(西安)，「八九民運決非激進主義」，《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九月號(總第二八期)，頁七二－七三。

楊海(西安)，「可珍貴的精神和原則」，《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九月號(總第二八期)，頁七四。

馬蘭，「為了忘卻的紀念」，《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九月號(總第二八期)，頁七五－七七。

胡平，「再論重建非暴力抗爭的信心－－答鄭義、曹長青」，《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號(總第三十一期)，頁三一－三八。

曹長青，「怎樣面對裸體的皇帝」，《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號(總第三二期)，頁九五－九九。

胡平，「讓激情歸激情 讓理性歸理性」，《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二月號(總第三三期)，頁五二－六四。

曹常青，「權力夢對人的腐蝕」，《中國之春》一九九六年三月號(總第一五〇

期)，頁八三－九六。
　　耶人，「《天安門》的挑戰」，《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四月號(總第三五期)，頁六二【以上第 472 頁】
　曹長青，「一篇文章引起的風波」，《中國之春》一九九六年九月(總第一五六期)，頁八二－八七。
　　封從德，「柴玲沒有『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九十年代》一九九七年五月，頁三三
　　封從德，「對影片《天安門》史料根據的質疑」，《世界日報》(世界週刊)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
　　李怡，「複雜情緒」，《蘋果日報》李怡專欄，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
　　胡雪姬，「讓歷史還她一個清白」，《明報》第四版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
　　蔡詠梅，「兩個女人的戰爭－－《天安門》製片人卡瑪談與柴玲的分歧」，《開放》一九九七年六月，　頁三〇－三三。
　　「柴玲的自白」，《開放》一九九七年年六月，　頁三四－三五。

其它文章

　　　胡平，「八九民運反思」，《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四月至十月
　　項小吉，「回憶對話代表團」，《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封從德，「反思中的困惑－我看八九學運」，《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六月【以上第 473 頁】

　　林澄，「天安門事件秘密會議」，《現代》(日本)一九九一年十月，頁三〇八－三二一：
　　王超華，「我與十二學者上廣場」，《百姓》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
　　楊巍，「上海八九民運回憶」，《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一九九四年一月。
　　陳力、蘆葦，「血與火的洗禮－－中國民聯簡史(第八、九部分)：民聯在『八九民運』中的活動」《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九－十月號(總第四－五期)
　　熊焱，「往事與舊情－－憶八九天安門一件小事」，《新聞自由導報》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個人回憶

　　　李祿，Moving the Mountain. London, MacMillan，一九九〇年 二一一頁。
　　沈彤，Prèque une rèolution.(traduit de l'anglais) Paris， Robert Laffont， 一九九〇年 三四〇頁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北京六四屠殺的背後》。台灣：聯經。一九九〇年 二一六頁
　　封從德，《八九學運備忘錄》。手稿，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九一

年四月二十五日。五一一頁【以上第 474 頁】
集體回顧，《回顧與反思－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記錄》。德國，萊茵筆會，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七當事同學集體回顧，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二十四日於巴黎法蘭西學院會議廳。三七一頁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台灣：時報文化。一九九二年。二五二頁
鄭義，《歷史的一部分》。台灣：萬象。一九九三年三月。四五五頁
包遵信，《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台灣：風雲時代。一九九六。三二三頁

資料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紀實（香港註釋本）》。香港，青文書屋。教委版一九八九年八月/香港註釋本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四三頁
聯合報編輯部，《天安門一九八九》。台灣，聯經，一九八九年八月。五三三頁
吳牟人等編，《八九中國民運紀實（上下冊）》。紐約，一九八九年八月。九九八頁
港支聯中國民運資料中心，《八九中國民運報章頭版專集》。一九八九年十月。五二三頁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十六位赴京同學日記/追記），「北京紀行」，《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香港，一九九一年十月。頁六三九－七七〇【以上第 475 頁】
BEJA Jean－Philippe， BONNIN Michel et PEYRAUBE Alain，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èkin. Paris， Gallimard， 一九九一年 五八九頁

著作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增訂版）》。香港記者協會出版，一九八九年九月初版，一九八九年十二增訂版
石川、齊墨、沈國斌、榮榮（德國萊茵筆會），《歷史不會忘記－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資料匯編》。德國，World University Service， Deutsches Komitee e.V.， 一九九〇年五月
胡平，《中國民運反思》。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五六頁。前一三五頁為 「八九民運反思」，曾刊於《中國之春》一九九〇年四月－十月
阮銘，《鄧小平帝國》。台灣，時報，一九九二年八月。二九七頁
譚璐美，《柴玲的夢》。東京，講談社，一九九二年九月。三一〇頁
安琪，《痛苦的民主》。香港，藝美，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四九頁
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台灣，風雲時代，一九九六年六月。五二三頁
卡瑪、高富貴等，《天安門》。香港，明鏡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八六頁【以上第 476 頁】

簡要大事記

一九八九年

四月

十五日　胡耀邦逝世。

十九日　北大籌委會成立。

二十二日　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十萬北京大學生佔據天安門廣場，
學生代表跪呈請願書。無限期罷課。

二十三日　北高聯成立。

二十六日　【以上第 477 頁】

《人民日報》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

二十七日　百萬北京市民與大學生遊行，衝破軍警阻攔。

二十九日　袁木等人與官方學生會代表「對話」。

五月

四日　趙紫陽發表溫和講話。十萬大學生遊行，北高聯宣佈復課。

十三日　數百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要求平反「動亂」和直播對話。

十四日　統戰部長閻明復等與學生對話，因未守諾轉播，對話破裂。
十二學者上廣場勸撤未果。

十五日　吾爾開希喊東移。絕食團指揮部成立，柴玲任總指揮，李祿副總指揮。
戈爾巴喬夫抵京。

十六日　閻明復上廣場勸撤。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以上第 478 頁】

十七日　百萬市民大遊行。

十八日　絕食第六天，李鵬與絕食學生見面。

十九日　復食。

二十日　李鵬宣佈戒嚴。北京市民開始阻截軍車。

二十二日　吾爾開希喊撤遭「罷免」。

二十三日　北高聯退出廣場。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成立。

二十四日　廣場指揮部成立。

二十五日　廣場學生聯席會議通過「主動出擊」方案。

二十七日　【以上第 479 頁】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建議三十日撤，未獲廣場學生聯席會議通過。

二十八日　柴玲作錄像談話。全球華人大遊行。

六月

一日　柴玲、封從德凌晨遭綁架。

二日　劉曉波等「四君子」絕食。

三日　晚上軍隊強行進城，屠殺開始。

四日　　凌晨五點，紀念碑上最後數千學生撤離廣場。【以上第 480 頁】

本書相關主要組織一覽表

【簡稱】【全稱】【成立時間】【主要成員】【備注】

【北大籌委會】【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4.19 晚】【丁小平、郭海峰、孔慶東、熊焱、謝劍、楊濤、王丹、常勁、趙體國、柴玲、張伯笠、王有才、沈彤、楊國忠、張智勇、孟昭強、彭嶸、封從德....】【間稱「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備委員會」】

【北高聯(中共稱「高自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4.23 晚】【劉剛、周勇軍、吾爾開希、王超華、封從德、楊濤、梁二、鄭旭光、邵江、馬少 方、王志新、翟偉民、王正雲、王有才、張銘、張志清、熊煒....】【4.23 至 4.28 稱「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自治聯合會」】

【北師大自治會】【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4.24】【吾爾開希、梁二、張軍、程真....】【4.21 吾爾開希宣佈成立，自封主席，「是它唯一的成員」(開希語) 】

【對話團】【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5.3】【項小吉、熊焱、沈彤、江旗生、童屹....】

【廣播站】【絕食團廣播站】【5.14】【封從德 張伯笠、鄭義、白夢、王童、北明、張華潔、袁倚天、羅勇....】

【絕食團指揮部】【高校學生絕食團指揮部】【5.15 晨】【柴玲、李祿、郭海峰、封從德、張伯笠(王丹、吾爾開希、王文、王超華曾任常委)】【5.13 至 5.15 晨的「絕食團」主要是幾位絕食發起人，但未形成組織。】【以上第 481 頁】

【學運之聲】【學運之聲廣播站】【5.16】【周峰鎖、王超華、張銳、楊濤＊....】

【工自聯或京工聯合會】【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5.19】【韓東方、劉煥文、沈銀漢、趙品潞、呂京花、岳武....】【間稱「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

【外高聯】【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5.19？】【連勝德、葛剛、侯鍾瑜....】【相對於「北高聯」】

【廣場指揮部】【保衛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部】【5.22 晚】【柴玲、李祿、張伯笠、封從德、郭海峰、張倫、辛苦、老木、王剛、張健、向俊、趙世民、丁丁、〇〇八....】【5.22 晚至 5.24 稱「廣場臨時指揮部」】

【北知聯】【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籌)】【5.23】【嚴家其、包遵信、遠志明、老木、榮劍、鄧正來、王魯湘、謝選駿、王潤生、甘陽、蘇煒、鄭義、陳宣 良、王志剛、張曉明、沈大德、張曉剛、蕭延中、閔琦、趙瑜、顧昕、董郁玉、厲劍....】【又稱「首都知識界聯合會」。包遵信提供的名單中還有許良英、劉 再復、于浩成、李洪林、蘇曉康、柯雲路、龐樸、侯仁之、季羨林、陳小雅等九十人】

【首聯】【首都各界聯席會議】【5.23】【陳子明、王軍濤、包遵信、劉剛、王丹、甘陽、劉蘇里、劉曉波、邱延亮、張倫、老木、吾爾開希、邵江....及廣場指揮部】【又稱「首都各界保衛廣場聯席會議」、「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以上第 482 頁】

出版項

《真相》系列（11） 總策劃：何頻

書 名：天安門之爭
作 者：封從德
發 行 人：JESSICA LIU
責任編輯：張芸
封面設計：易劃
校 對：胡澤西
出 版：明鏡出版社
全球資訊網：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hopinctny@aol.com
編 輯 部：P.O.Box 366,Carle Place,NYI 1514-0366,U.S.A.
電話：（516）338-6976 傳真：（516）338-6982
社 務 部：8636 MISSISSAUGA RD RR10 BRAMPTON
ONT CANADA L6V 3N2
國際統一書號：ISBN 1-896745-68-7
定 價：HK$107 NT$420
版 次：1998 年 6 月第一版【以上第 483 頁】

封底

【以上第 484 頁】